

政治科學大全（第二卷）

個體政治論

(*Micropolitical Theory*)

Fred I. Greenstein  
Nelson W. Polsby

主編



# 第一章 人格與政治

Fred I. Greenstein 著  
朱 宏 源 譯

## 導 論

是不是林頓·詹森 (Lyndon Johnson) 的脾氣致令越南糾紛升高？是不是教育方式的不同造成伍德羅·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無法促使參院通過凡爾賽和約？是不是理查·尼克森 (Richard Nixon) 與亨利·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兩人的人格及其政治行為間具有某種邏輯上的關連？法國人、俄國人、日本人、德國人、美國人等等是否由於特殊人格的關係而使之異於其他民族？這類歧異有沒有政治上的相關性？人格上的各種明顯特徵與政治行為各個面之間有沒有一致性？並進而形成由人格出發的各種政治格調，如對權威採不贊同或背叛態度、固執己見或見風轉舵？

上面提到的都是一些特殊的實質問題。這些問題已經形成經驗上以及理論上的各種專題，而統稱「人格與政治」。事實上，在這個範疇裏頭，所擁有的是一個十分簡陋的傳統（如果已經穩定到可以被稱為「傳統」之程度的話），而其中涵括了各種品位的文章，十分零亂。因為：

一、近年來出現了許多文章，企圖連結人格與府治。

二、這些從事連結工作的，多屬政治學界以外的人士，如新聞記者、心理學家、人類學家與精神醫學家。

三、此類文章並不在少，而來自政治學界之內以及之外的抨擊性文章亦復不少。他們對它廣泛地懷疑，甚至認為系統性研究人格與政治根本不可行。即便在幾個基礎性學科：如心理學、人類學與精神醫學等，人格研究都遭到了懷疑，政治學更不用說。但是，行為科學中的一支——社會學——卻在衆人羣起反對「心理化」聲中建立了起來。縱令涂爾幹（Durkheim）在一八九五年及一八九七年的著作中警告說：只有「從社會的標準」，才能解釋社會。但他的說法並不能阻撓社會學家從事態度的調查，更無法排除社會學在人格與社會結構上，從事次級學科的發現，而他們所遭遇的問題與研究人格與政治者並無不同。

四、政治學界至少有些人士不顧旁人的懷疑，仍舊鏗而不捨地探討人格與政治的關係。上述各學科中（包括社會學）都不乏參與探討人格與政治的人士，雖然他們不能全副精力投注在這個範疇上，但由於不斷地有新人加入，這批新力軍正日趨茁壯。總之，是有一羣人士正携手共進，努力於人格與社會結構等非政治的，但卻（與政治）異形同質的探究上面。他們的研究成果，也能夠或多或少直接應用到人類政治面之研究。

爲何人們會對一種研究起來混亂矛盾的東西有持續不斷的興趣呢？我認爲最根本的原因是在政治經驗上發現：個人的不同本質在決定政治產出（political outcomes）時，的確有不同的影響，而且常

常是相當的不同。這裡牽涉到兩點：一是特殊性方面，從政府的政治而來；一是普遍性方面，來自立即環境的政治。任何一方面都可以找到許多範例來解釋。

本章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詹森的人格對越戰升高的衝擊。當時甘迺迺與詹森政府中的許多參與者與觀察者，在後來所提供的第一手資料即已顯示：假使甘迺迺不死，東南亞的越南突縱令未能立即結束，也絕不會如此戲劇性地擴大開來。

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八年的軍事升高，與詹森及甘迺迺心理上的不同點有極大的關連。兩個人之間重要的不同所在，就是政治學家們通常不甚以為意的「認知」與「態度」。譬如：對國內與國際政治上的手段與目的之關係所擁有的明顯或隱晦的信念；對軍事和政治解決相關效果的假定；以及對越南各種團體的能力與合法性的看法。假如能夠用這些人格因素做前提，必可發現二者間更進一步的紛歧（也許更難處理），而有助於估量越戰之所以升高的原因。其中必然包括詹森個人對權力的強大需要，導致不支持當時西貢政府的結果。這種權力上的需要也成為美國的失敗，或者詹森的失敗的主要前提。另一個也許是更重要的個別差異，就是詹森喜歡對其部屬做無意義的干涉，喜歡作威作福。此一性格使其週圍充滿了對其自我敗滅政策的阿諛者。

甘迺迺則不同。雖然在許多方面與詹森無顯著區別，但他並不是把每件事都看成「不是對就是錯」的那種人。更不會把豐富的資源拿來胡亂投資。豬羅灣事件中的立即撤兵是最佳明證。他承擔了流產侵略的個人責任，而將他個人在政策上的得失置諸腦後，不怨天、不尤人。接受批評，積極主張他本人與顧問之間「取」、「予」的平等，並鼓勵人們要意志堅定，古巴事件更是著例。為設計對抗

蘇聯在古巴裝置飛彈的驚人措施，他乃採取行動。（參看 Barber，一九七二年第一部著作中對詹森及甘迺迪的分析）。

學術機構中行政權的轉移也是很好的例子。人格因素雖然複雜，卻無可避免地成爲政治觀察家注意的焦點。研究所畢業，對一般大學行政也有些瞭解的講師們，一定能深深體會誰來當系主任、院長和校長，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他們更進一步地認識到，這些「不同」並不僅止於辦公室內「角色需要」的影響，也超越教員與職員間對教育政策看法上的歧異。這並不是說職員（行政人員）的角色在討論其行爲問題上並不重要，而是說一旦成爲行政人員，則其在遵循職務所賦予之期望上面，也自行塑造了自己的角色。

政治行爲者本身常不斷地估量對手的特性。而政治分析家如果愈注意事件的利害關係，以及留心人、時、事上的不同性，則愈會發現人格分析有所必需。譬如以調查一九七二年水門事件及其錯綜複雜的下場來說，亦無非將所有參與者的特性視爲同一類型的一丘之貉罷了。下文是阿里森 (Allison) 見其一九六九年著作，頁七〇九）對古巴飛彈危機作深度個案研究及理論分析之後，曾提出的一個聲明，頗值吾人玩味：

官僚政治的重心就是人格。每個人在艱難困厄中如何自處，各個參與者基本的運作方式，各式人格的相互依存或自相矛盾，都屬分析人格各個面相所不可或缺者。

阿里森之所以有此看法，乃得自精密處理古巴危機期間特殊行爲所發現的結果。

筆者在本章裏頭，希望能夠將以往對人格與政治關係採取直覺式、逸事性表露方法所生之偏差予以改進。本文的宗旨在於討論個體政治 (micropolitics) 的各個理論面。筆者在本章中將廣泛解釋理論的分配情形。其中涉及對人格與政治各種研究方法上所採用之概念，以及所生困難的討論，並介紹各種重要的經驗性發現。其目的無非在提出分析困難之所在，並為坊間作品之如何消除這些難題予以紹介。大體上說，筆者立意達到一個普遍水準，其中排除了測量技術方面的討論。

下文所將闡述者，大部分可以在筆者一九六九年的著作中找到。當然有許多要點已經被重新組織、重新措辭，而有些主張也已更動，俾便形成更加清楚而系統的描述，進而促使各大家能夠針對要點而有所反應。●該書以及本章的許多主要文字，也印在筆者和倫諾 (Lerner) 一九七一年合著的批評性介紹上。讀者也可參考倫諾一九六九年的書以及那森 (Knutson) 一九七三年的幾篇評論性文章。至於非政治面的人格與社會結構，史梅舍 (Smelser & Smelser) 一九七〇年的著作是重要資料。

●請特別參考 Merelman 一九七〇年的書。該書簡潔地提出了一系列最為基本的問題，這些問題是企圖將人格與政治研究建立在穩固而有累積性基礎上的人士所亟思解決者。

本章的要點是：

(一) 觀念上提供：心理與環境因素如何影響行爲；心理先行因素的類別；社會背景的影響、心

理推論、與行爲三者之間的關係；總體系統 (macrosystem) 對個體政治行爲以及行爲的立即先行因素 (immediate antecedents) 之影響。(即本章的第二節)

(二) 爲澄清問題、解析問題所作之一系列考慮。這種考慮有時被認爲是研究人格與政治的障礙。但就整體來說，它卻反而成爲對以高度複雜方式運作的情境，從事觀察入微的研究之「第一近似值」(first-approximation)。(第三節)

(三) 將人格與政治之研究者作做概略的分野，同時在各個類別裏頭，將這些作品予以選擇性的評論，目的在說明過去所遭遇的困難，並對將來如何修正提出幾點建議。(第四節到第八節)

(四) 結論：簡單地評論。(第九節)

### 基本觀念上的廓清

這個廓清工作主要是根據史密斯 (M. Brewster Smith) 的「人格與政治分析圖」(見氏著一九六八年的兩部書)。循著他的指引，筆者首先介紹該圖的組成因子，進而綜合各因子，成功地塑造一個全盤的圖形。簡單地說，要找尋一組可以當作理論骨架而又是彈性的類目，重點在將因果關係環繞用圖形來加以表示。這種圖形的功用，在幫助指出研究的途徑。它並不等於人格「真正的」結構圖。(參見 Ryle 一九四九年；Wood 與 Piccher 一九七〇年的著作) 討論這個圖形，難免枯燥而

煩索，因此建議讀者們先將本節簡單讀過，俟讀到後面各個特殊案例時，再回過頭來看圖。

環境 → 預存傾向 → 反應 (E → P → R) 公式

爲求將行爲各種先行因素及其間的關係種類予以圖案化，魯文 (Kurt Lewin) 的中心公式 (formula central) 人所共讀，似可加以利用，而作爲簡捷的起點。(見魯文一九三六年的書，頁十一—十二；或戴維斯一九六三年書，頁一一六) 魯文說：「任何意識行爲都依個人及當時情況而產生。」簡單地說，就是  $B \rightarrow (P \rightarrow E)$  (譯按：即行爲是個人與環境的函數。) 拉斯威爾和凱普南 (Kaplan) (見其一九五〇年合著，頁四一六) 也做相同的區分。以環境 (E)、預存傾向 (P) 與反應 (R) 導出心目中政治分析名目學的「環境 → 預存傾向 → 反應」公式，而相當於「刺激 → 有機體 → 反應」。

這個大約等於大家所習用的「刺激 → 有機體 → 反應」典範的公式，就一般日常用法來說是沒有什麼可疑之處的。但事實上，仍然有某些爭端及限制。其中最基本的莫非是激烈的行爲派人士所宣稱的：人格上「精神」觀念的運用不合科學原理。行爲心理學家如斯金納 (B.F. Skinner) 見氏著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七一年的著作) 即強調：只有環境變數可以比做行爲，用作觀察與量度。崇斯基 (Chomsky) 一九五九年的書則批評斯金納的「語言行爲」(verbal behavior)，並稱科學界並不克將有機體的架構放置在投入及輸出基礎之上的先例。更何況就研究人類來說，這樣做也在所必需，俾便了解有機體極端複雜的行動本質。(參考 Scrievn 一九五六年討論斯金納著作，Podor 一九六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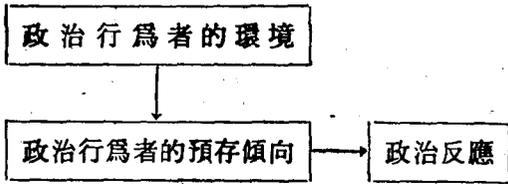
的廣泛評論行爲派心理學，與 Hempel 於一九六五年論不可觀察性建構的科學地位。）如此看來，吾人似有必要將用來描述預存傾向的各個名詞妥予說明，但筆者只想就 Campbell 一九六三年的作品中解釋預存傾向變數的八十個名詞中，挑選一小部分予以應用。

吾人不祇應考慮個體內部的預存傾向，而且更應將之視同「溢入」環境（“overflowing” into the environment）之內的東西。有句名言描述行爲（至少是由動機而來的行爲）是由「知覺到的」環境，而非「真實的」環境所影響。此外，政治行爲的「客觀」環境，實在完全是心理方面的東西，其中最重要的政治相關因素，就是來自政治體系內其他行爲者的規範、信仰與期望。

正如無能將預存傾向從等式中剔除，吾人亦不該唯我式地忽略「真正的」外在環境，因為它也涵括了許多心理成份。●要對現況有所知覺端賴各種原始的事件，這些事件是離開知覺而超然獨立存在的。更進一步說，在研究之中，應包含行爲者主觀的與客觀的環境兩者間之比較。環境就好比閃電，雖然缺乏心理媒介，卻也依然「能夠」發生作用。

●關於內——外的二元區分，是哲學上一個纏綿多年而無法定案的話題。此處若想對於哲學上的理想主義者、唯物論者、經驗論者、二元論者等等爭論良久不決的老話題拿來再行討論，並不會有什麼好處。因為這類論證，在語言學及概念假設上首先就把內——外的問題誤植了，更何況其中廣泛涉及西方世界的哲學問題。其次，此類「疑難」一旦開頭就有錯誤，則必然造成哲學上無事找事，爲賦新詞強說愁的局面。詳見 Gogber

一九五八年的書，及杜威與班特萊（Bentley）一九四九年的合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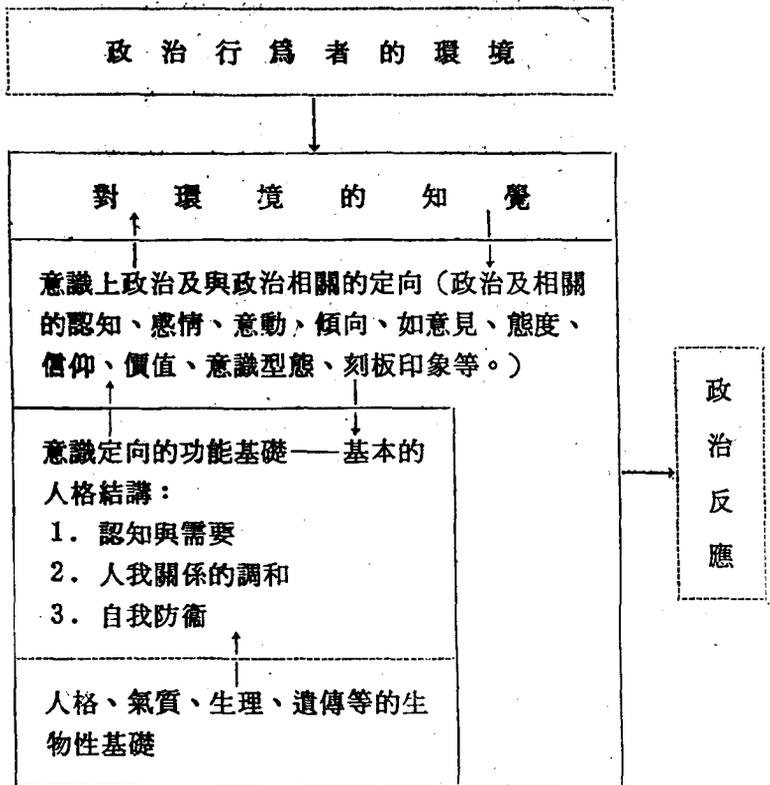
圖一：政治行為的基本前提：環境（E）  
→預存傾向（P）→反應（R）

魯文一派認為應依環境狀況來綜合研判行為，至於行為者本身的預存傾向則不該過分強調。環境變數能夠「挫抑」心理變數對行為的作用，而心理變數亦能反過來挫抑環境因素。例如一個外在威脅，每每能夠嚇阻大多數的人，但卻也可能刺激一二勇士或莽夫向前邁進；頑固的權威主義者在環境有利於其偏見的情況下，每每歧視少數黨。但這種人，依凱茲（Katz）與班傑明（Benjamin）一九六〇年的研究來說，如被置身於自由規範盛行之處，則又會撤除此類成見。以上所述，不過是舉例說明環境與預存傾向兩股力量交互作用下，產生在人格與政治行為間複雜而偶發的（不是直接而連續的）關連。對於此，下文還會提到。

圖一簡單地描繪了環境→預存傾向→反應的關係。指出環境是加在預存傾向之上，而為接著要提出並兼顧過去和未來狀況的明細圖之張本。同時，在考慮時間上某定點的某一行為，我們首需「透視」預存傾向這一區位，並牢記預存傾向的內部狀況是分析性的、不能直接觀察；它只能由外在的徵候來加以推論。

### 預存傾向變數的概念化

圖二是將圖一的預存傾向這一區位擴大而成的，它為某些人格理論的廓清工作，提供了相當簡化的憑藉。見霍爾（Hall）和林傑（Lindzey）一九五七和一九七〇年的書。



圖二：政治行為者的預存傾向

該區位與環境最具緊密關係的就是「對環境的知覺」。這一項正足以強調行為者對與政治相關之環境的觀感如何，在政治心理學上這一項正站在首當其衝的位置上——行為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什麼地方，他們如何來吸收及處理資訊，找尋那些資訊，運用那些類目等等，都屬於「環境的知覺」。這裏，牽涉具有形式的、物理根據之著作，社會知覺 (social perception) 的著作，以及各種針對「自然類目」(natural categories) 的認知性著作。在自然類目的

之中，人們不經意地形成自己的經驗。這些作品之中，最爲人類的智慧所強調的是「人種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象徵性互動理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見 Denzin 一九六九年的書)、認知人類學(見 Tyler 一九六九年的書)，以及對選擇性外顯與知覺(selective exposure and perception)的深度研究。(見 Freedman & Sears 一九六五年的書)

預存傾向的知覺層，就是意識上對於政治及有關政治方面，漸次形成的心理定向。雖然大部分政治行爲極少(如果有的話)屬於自我意識的明顯反應，並且，一如心理分析家所強調的無意識案例中，時常可以發現：個體爲了解釋其行爲，會製造意識上的「理由」，事實上這不過是一種自我欺瞞。而縱令這不是欺瞞，而是真實，意識上的心理定向仍不失其直接調節政治行爲的能力。)

- ③ 有關此種合理化的典型描述，詳見拉斯威爾一九三〇年書的第二十頁，該頁文字記述一個受試者在催眠之後接受指示而打開一把雨傘的經過情形。當他被詢及爲何要打開雨傘。他提出「理由」，說打開的目的是爲了確定那把傘是否爲他所有。事實上，當初他打開傘的真正動機並不來自意識上的任何因素。當然，吾人亦無庸諱言，雖然精神物理式測量技術(psychophysical measurements technology)已經足夠使一些對皮膚傳導係數、眼球收縮，以及其他肉體上的併發現象之測量成爲有所助益的工具，但是要把行爲中的意識性理由(conscious reason)與合理化(rationalization)予以明白區分，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對於「意識上的政治及有關政治的定向」這一項，有一個運作性的定義，可將之特化成一個定向，而能夠用適當的感官訪察(sensitive interviewing)和行政程序問卷法來加以掌握。在本區位

的這個項目裏，涵蓋了一般性的名詞，（如意見、態度、信仰、價值、意識型態、認同、刻板印象等）以及三個老生常談的廣泛卻互相排斥的名詞：認知（對資訊而言）、感覺（包含評估的感情內涵）以及意動（*Conations*；不同情況下如何行動的定向問題）。目的在方便描述心理的領域。提到意識上的政治定向，我不能保證這些定向能有穩定的與充分的發展。至於一般大眾在政治的認知和感情上有什麼缺點，康弗斯（*Conferre*）一九七〇年的書上所提到的例子可以參考。只要愈接近政治面，就愈發現更多具備高度政治定向的行為者。這中間不止牽涉行為者的政治嗜好，更及於其政治歷程的本質和運作的原則。對於智慧方面的重視，由雷效（*Leites*，見氏著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九年的著作）首開其端。而對於政治領袖們到底運用那些明白的及隱晦的假定法則，則由喬治（*George*：一九六九年的著作）所追尋而發揚光大。

大部分用在政治心理學上（如研究輿論、投票與政治參與）的資料都根據某種量度程序，而這一個程序本來是為分析「意識定向」而設計的。我們應該強調「設計」這個名詞，因為為求將各類政治定向確實分析、歸類，人們似乎仍未將過去懸而不決的重要難題予以克服。政治心理學中有些最具分析性而又有力的部門，如「政黨認同」（見 *Campbell, Converse, Miller, & Stokes* 一九六〇年的合著）一項就很難從答案固定的數個層次中窺出端倪。甚至從「同意、非常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沒意見」的分類中，也無法看出「真正的」客觀定向。（見格林斯坦與塔羅一九七〇年合著，頁五〇四—五〇五）

圖二的預存傾向類目的主要代表性區位，就是離「環境」、「反應」兩區位最遠的部分，涉及對

并存傾向行爲的根源性及精神生理性之影響，而這也是本章的特色。此即心理的問題——「意識定向的功能基礎」和「基本的人格結構」。下文筆者將以功能研究法展開對人格、意見及行爲三者間關係的分析工作（參見 Smith, Bruner & White 一九五六年；及 Katz 一九六〇年的著作），來繼續解釋史密斯（一九六八年第一及第二本書）的主張。本圖包含了三個基本的「意識上政治定向的功能基礎」（亦即「基本的人格結構」）。不管每一個體循什麼途徑來行使這些功能，也不論能夠完成到那個程度，這些功能基礎無疑在告訴我們完成基本的適應工作，究竟要經過怎樣的心理歷程。這裏並不意味個人或社會認爲這些歷程會具備功能的性質，而祇在說明他們代表了因果關係；透過這些歷程，個人才能經營其心理組織（inner economies），以便於配合所處的環境。這三個結構（或者說：功能性工作）是：

- (一) 認知：情報的獲得、儲藏、處理與運用。
- (二) 人我關係的調和：引起人我關係傾向的需要與歷程。包含認同、忠誠、正面與負面的參考團體等等。
- (三) 自我防衛：內部感情衝突的適應；包含創造性整合機轉（mechanisms of creative integration）以及其他症狀學上的問題。

雖然完形心理學（Gestalt）以及其他認知心理學家重視第一項，社會心理學家重視第二項，臨

床醫學家重視第三項，但是在大部分人格的理論中，人們對於這個三分法中的各項多少仍能兼顧，並且加以討論。而此三項恰好大致上相對等於弗洛伊德的自我、超我<sup>①</sup>與本我。一九三〇年代心理分析從弗洛伊德對潛抑 (repression)、潛意識 (unconscious) 與症狀之形成轉移到自我心理學對意識及適應歷程的重視。如安娜·弗洛伊德 (Anna Freud)、哈特曼 (Hartmann)、與艾立森 (Erikson) 等人即是。這種轉移，擴展了研究的領域，使原來單獨研究第三項的變成一、三兩項同時兼顧。(有關自我心理分析之演變與評論以及參考書目，請參閱雷茲一九七一年的書) 自我心理學家與本我心理學家對於人格的功能，基本看法上有類同之處。他們都假定自我的基本工作是對於外在真實環境的需要反應；它要同時處理限制性的超我，與原始的，完全潛意識的，感性的本我之間矛盾所造成的內部壓力問題。自我防衛機轉 (投射作用、轉移作用、對侵略者的認同作用等等) 就是對於不可接受的衝動採取「安全的」表現方式。

① 很顯然，史密斯的「人我關係的調和」實際上和弗洛伊德的「超我」有著不同的意涵。然而，吾人切要記著，弗洛伊德視超我爲兒童將父母價值觀的一種內化作用，並且視之爲如何來認同該價值觀以及其理想典型爲何 (即自我典型 (the ego-ideal)) 的工具。

霍爾和林傑 (一九五七年及一九七〇年的書) 對各種主要的人格理論下結語時，提出了一份人格理論的要素與重要的圖表。要素中的兩項，多少相當於第二與第三項功能基礎。這兩項就是潛意識的決定因素 (與自我防衛功能有關)，以及團體成員的決定因素 (與人我關係的調和功能相當)。

霍爾與林傑指出，有些人格理論，如出自榮格 (Jung)、荷妮 (Horney)、慕雷 (Murray) 與弗洛伊德的著作，莫不重視潛意識。其他如魯文、奧爾坡 (Allport) 與羅哲斯 (Rogers) 對於潛意識可以作為動機的一面 (至少對正常人的動機來說) 則極少予以注意，至於團體認同是否為行為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霍爾與林傑指出蘇利文 (Sullivan)、弗洛姆 (Fromm) 與魯文等人強調此一定向的重要性，而榮格、薛爾頓 (Sheldon) 與斯金納則對這種人我關係的調和缺乏興趣。(有關社會行為中利他主義或其他定向的動機與感情的重要性問題，可參考勒倍一九六五年的書。)

除了這些比較古老的人格理論外，當然也有一些為時甚久的人格理論及研究，強調認知及認知需要是行為的主要來源 (見 Neisser 一九六七年的書)。而近年來有個重要趨勢，傾向於承認「認知風格」與「潛在的非認知機性類型」之間，具有相互依存的關係。(見 Kagan, Moss 與 Sigel 一九七〇年的合著，Burger 一九六九年的書) 總之，個別的人格功能，甚至個人特質，都可以單獨地被認定，而建立與政治行為的關係。但如果想要尋找特質與功能間的互賴關係，也非不可能。具有特殊自我防衛型態的個人，會依照明顯的途徑——如傾向、或不傾向一致性——來為自己定向，並且甚至進而表現出明顯的認知型態。

霍爾與林傑一九七〇年著作的第五八八頁指出，對於心理因素究竟是不是互賴人格體系中的一部分，各種人格理論都有不盡相同的看法。從極小處來看，人格集體論者所需要的研究概念是「(人格) 錯綜複雜的，涉及行為所從出的情境」；從極大處來看，則反過來應強調每一個體都「緊密結合」，並且強調將每一行為者予以個案分析，也在所必需。

功能研究法的優點在理論上的普遍性，以及對「複雜的、多元的」分析採取開放的態度。它不同於早先的和較近的精神分析研究法；對於其意識的政治定向或行爲「必然」出於自我防衛和潛意識動態力量視爲當然者，功能論者持著反對的態度。但，它也不能排除把精神病學摻入政治學的可能性。美國政治史上因感情紛擾所造成的暗殺案例就是明證。（參考 Hastings，一九六五年的四篇文章 a、b、c 和 d；Rothstein，一九六四年、一九六六年兩年的著作；Weisz 與 Taylor，一九六九年的書）。奧斯華（Lee Harvey Oswalds）和布理莫（Arthur Bremer）的行爲，無庸置疑地，就是精神症狀學中自我防衛等面向所造成的範例。今天的政治行爲者，是否明顯地產生相似類型，而究竟相似到什麼樣的程度，則爲經驗上的問題。要處理此一問題，就要看觀念的區分能否有助於問題的真相揭露。（致於若採用認知一個因素來考慮概念化，來解釋制度中的行爲，究竟會產生那些缺點，則可參考 Argyris 一九七三年的著作。）

功能論者認爲任何意識的政治定向或行爲，可能是內在衝突的自我防衛或外顯。但它也有可能是基於社會性需要，比如：想成爲某集團的一員，想變成突出的人物（人我關係的調和）。也可能是理性行爲（不止是「理性化」的行爲）；不一定要精確地根據事實的前提，只要是對環境加以研判後所產生的認知學習，或內在需要，就可以算數。而且不論它究爲工具性抑或實質性的。最後，它也可能過份的武斷。

功能論者所找到最普遍的態度，無非是種族和倫理關係——是功能分析最早所發展出來的。某人之所以有種族偏見，可能因爲他是個南方人，而且從來不曾聽過或看過其他對待黑人的態度。而另一

之所以採取相同的態度，也許只因爲他要與同伴們看法一致；又一人則本身原是個舊式的感情頑固型人物，但因將壓抑的侵犯衝動與性衝動導入種族問題，而成爲種族偏執狂。更另一人則由於意識上的社會政治定向，而不管是種族問題也好，其他問題也好，都把上述三種功能基礎混合而成爲對外的態度。（皮狄魯，一九五八年）

環境會隨著行爲者的功能類型而改變，在其中，行爲者發展、啓發或改變了政治定向，並且反過來回溯到環境上。情報刺激對某些人有效，因爲這類人習於認知功能定向。但對於自我防衛定向的人來說，情報之於他，恰如回飛器（Boomerang），起不了什麼作用。這種人說不定可以透過非理性的程序來加以改變，如權威性建議（假使其自我防衛能以適當的方式表現），或一些足以生效的外在事物。而這種——不可見的、權威的建議——程序卻反過來對那些以認知爲定向的人產生不了作用。對於習慣社會定向的人，如果想改變其定向，則需要將其參考團體（Reference Groups）以及社會環境加以變換。斯奈德曼（Sniderman）一九七四年的著作以及他和西特林（Citrin）一九七一年合著的書中，都爲心理基礎之於信仰作了分類，提供分析上的範例，以便研究者預測其特性。

以上所論不過是功能研究法的初步介紹。除了內、外因素的互相作用外，尚有一種人格與政治間的關聯性。它並非一般性的，直線式的關係，而卻具偶發性，甚至相互作用。社會政治上相同的定向，會使不同的個體產生不同的功能需要；反過來，不同的定向也會導致相同的需要。最典型的例子莫非是：一個左翼觀念論者會因爲情感的轉變而成爲右翼份子。在這種案例中，教條意義的忠貞執著也許同樣可以滿足其人格的需慾。「功能研究法」就在鼓勵分析家們從事此類關連的研究，而不局限

於機械式地尋找「一般性」政治定向的明顯內容與潛藏人格結構間的關係。

「人格」因素究竟是不是政治行爲的主要導因？各家各派在人格的用法上都有某些錯誤的歧見。而圖二正足以爲人格用法上的不同提出簡潔的定論。史密、斯、布朗諾、與懷特等心理學家（一九五六年，頁二四）把人格視爲一個容易瞭解的名詞，它涉及「所有」定型的預存傾向。他們認爲不單「功能基礎」應被包含在內，而且更應涵括「意識的政治或涉及政治的定向」（conscious political or politically relevant orientations）；例如：政黨依歸、孤立傾向、國際主義、政治聯盟等等。在葛雷的概念裏，「人格」是「心理學中最容易瞭解的名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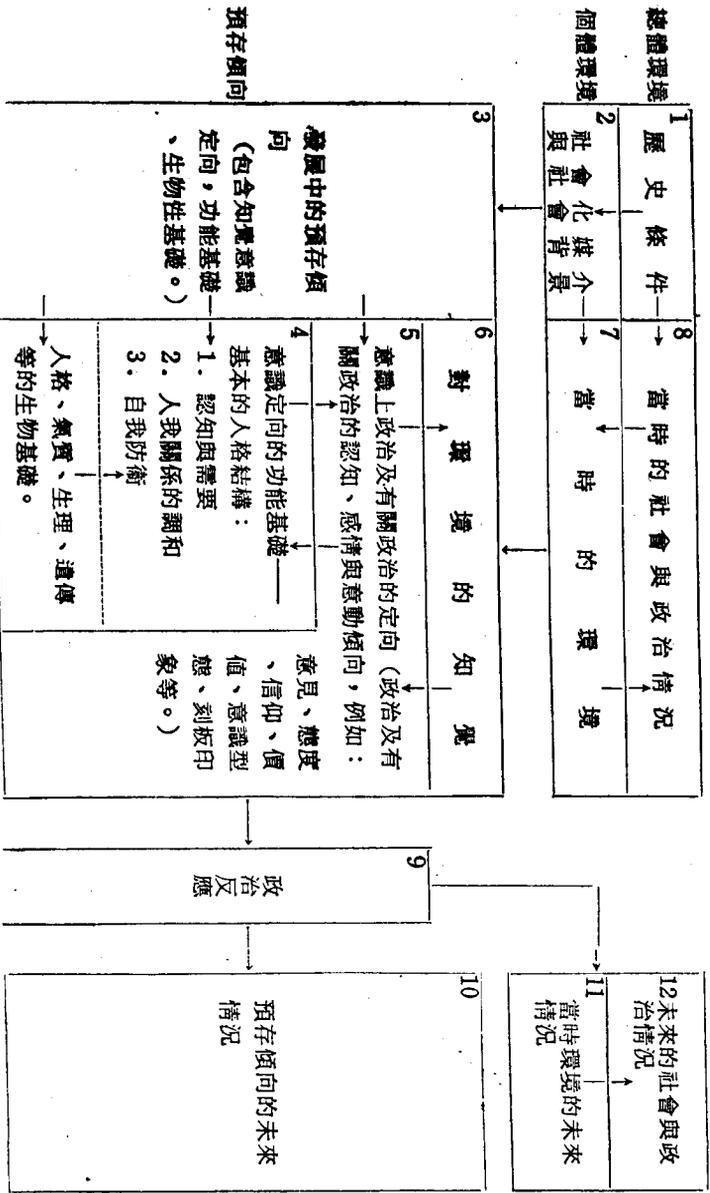
政治學家毫無困難地認識了意識上政治定向的因果關係。近代政治學界常做訪問調查，而這些定向每每是其變數的主要項目。當政治學家們問道：「人格是不是重要的？」的問題時，其所指涉的項目無非是圖二的左下角——功能的基礎。事實上，在許多政治學者心目中，「人格」的意義更狹隘，而只及於功能基礎中的一項——自我防衛。因爲早在心理傳記以及拉斯威爾的「精神病理學與政治學」（一九三〇年）等人格與政治的著作裏頭，即可發現自我防衛的各種功能就已經注意到了。

當然，一旦有了清楚的指示項，其用法如何就沒有什麼不同了，特別是研究上所涉及的並非一個稱作「人格」的實體，而卻是擁有特殊心理變項的。但我們總該弄清楚在用法上的特殊不同點，以免在遭受「錯誤歧見」摧殘的作品中，僅僅因爲咬文嚼字的語意問題，來造成自身的「錯誤歧見」。

附上時間與系統因素的考慮

過去 現在 未來

圖三：人格與政治分析圖



圖三由圖一和圖二的基本公式加上兩個元素而完成整個的概念。這兩個元素一個是時間上的一個是空間上的。亦即環境狀態隨著時間推移所造成的改變以及政治行為發生地在「當時」的情境與總體情境兩者間的不同。

時間的介紹導引我們從一個微粒式，當時性「環境——個人——反應」(E ↓ P ↓ R) 概念進入了一個政治經驗與預存傾向調和兩者間，無止境地相連的境域。根據圖三，與行為者目前預存傾向和行為所從出環境緊密相鄰的，就是行為者早先發展中的預存傾向狀況以及背景環境。社會背景、社會化以及學習對於行為時的環境與預存傾向等因素，都具有連鎖關係。歷史的先行因素固然無法直接作用在當時的行為上面，因此，假若能知道「所有該知道的」(有關行為者當前環境以及當前預存傾向的)東西，就能解釋當前的行為。這種說法大體上並沒有錯。但是，等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出，有多種理由足以證明：發展與社會化研究對政治心理學家而言，是有其價值存在的。

圖三進而指出在未來，亦以經驗以及預存傾向的改變有連鎖關係。這種關係代表行為者的行為，正持續地回饋到他所處的環境，以及自己的預存傾向狀態上面。政治的以及其他的行為者之所以不止是環境的產物，理由之一即在於他們會試著修正或調整所處的背景，就如他們會選擇自己所喜歡的背景一般。就像廣泛討論認知平衡性與連貫性的著作(阿培森等合著，一九六八年)所闡明的；對於某一個體在任何時刻的定向，具有持久影響力的因素，每出於嗜好的形成傾向中。這種傾向是認知的，同時也是感情的，並與其早先的行為具有連鎖關係。

圖三中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環境區域之所以被水平式地分割開來，目的就在區別行為的當時環境

和較大環境之決定因素。根據該圖，過去的與現在的總體環境影響力對於過去的與現在的預存傾向具有衝擊力。透過對立環境刺激的調和，如戰爭、革命、社會制度、較大政治結構等等，來發揮衝擊力。它們沒有直接性影響，但能深深觸及每個人所處的面對面環境，則為不爭之事實。然而，這不過是爲了說明上的方便，因爲根據目前這個定義，較大環境中真正觸及個人，使他如此行爲的部份，就成了當時環境的一個區域。

爲了把因果連鎖引向未來，上揚的箭頭代表一種整合關係——把影響行爲的當時環境與圍繞行爲者、社會以及整體環境牽連起來（參與艾爾德一九七三年的著作）。當然某一附加的簡單態度之影響行爲並不需要經過整合。吾人若將某人投票行爲的衝擊，與美國總統決定解散該國核子武裝系統的衝擊相比較，就可以明白其間有所不同。（筆者將在第七節討論整合所產生的效果問題。）固然，吾人也承認圖三並未巨細無遺地將較大環境對當時環境之作用，以及當時環境對行爲者作反應時的預存傾向之作用都包含在內。但是我們也應知道，大部分行爲並非對當時先存刺激之反應。

### 概念化的總檢討

總而言之，順著圖三文字順序，吾人很容易明白環境——人格——反應範式（Paradigm）：本章接下來的部份將用來討論循著順序而來的各種關係：

#### (1) 歷史上較大環境的社會政治結構形成

- (2) 社會化過程中的當時環境；進而導致
- (3) 發展中的心理；甚而導致
- (4) 當時的功能性預存傾向，
- (5) 意識的社會政治預存傾向，以及
- (6) 對環境的看法，形成看法之刺激來自
- (7) 當時環境的狀況，
- (8) 以及當時較大社會環境中的景象。進行產生
- (9) 目前（個人的以及個人類型的）政治行爲。這些行爲影響
- (10) 政治行爲者的未來狀況，
- (11) 行爲者的當時環境以及
- (12) 較大的社會。

右列全般圖說性公式具有啓發性。意在對思想與研究有所助益，而不僅僅限於真假，以及經驗上是否可證等問題。它展現於人格與政治研究之學者的，是個易解的變數類型圖，以及變數之間如何互相作用。它更鼓勵對各種研究的設計。這些研究本身雖然在考慮行爲決定因素、效果因素的廣大領域時，無法彼此貫串，但至少在智慧上能觸及較廣的內涵。

這種智慧上的透視又足以引致對交互作用、內涵相連關係的適當注意。這類關係在政治事務，甚

而在更廣的人類事務上，佔據著優勢的地位。這種在人格因素與行為方面對其偶然關係而非一般關係的強調，其適用的範圍無疑不能僅限於政治。而人格與感受二者如何關連，則可考慮麥基爾 (McGuire, 一九六八年，頁一一三九) 的說法：

人格因素……在形成影響力方面……可能與其他類別的因素相互作用。因此，吾人縱然在圖示「人格——可影響性」交互作用上，應該尋找一般性的關係，但更應明白此種交互關係來自各方面，而不單是無條件地受某一主要而單純人格變項的影響。

費德勒 (Fiedler, 一九七一年，頁一五) 在檢討領導統御的著作中，也有類似的說明：

我們現在可以十分確切地看出，為何領導特質無法預測領導效能。倘若任何一個人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成為有效的領導者，在另一些情況下則無法如此，那麼，單靠一項或綜合幾項領導特質顯然不能在所有情況下做預測的工作。這種單項或綜合的特質，在某些特化的狀況下，也許可以預測行為，此即偶發模型 (contingency model；費爾德所提出) 所表現的。

一如羅森伯 (Rosenberg) (對人的溝通) 所下的評論，於人類行為研究，具有較廣的意涵。他說：「就某些方面言，所有的關係都是有條件的。我們如果要看甲和乙的關係，一如所有社會條件下

所顯現的，在階級、性別、種類、年齡，一定不會完全相同。有條件的關係是常態而不是例外。不幸的是，某些研究者似乎將之視為刺激物，而非有意義的發現。」（參閱羅森伯，一九六八年，第五、六章）

採取相同角度，系統性批評時下論著中之疏於連結人格與行為者，屬艾可（Aiker，一九七二年的）較為深入的論文——「人格是否因事而異或者在外形之內具有關連性？」。對於交互作用的普遍重要性，松巨斯（Sonquist，一九七〇年）有較廣泛的討論。

此外，若有一圖能提供架構，使綜合與調和各種研究的不同發現與觀點成爲可能，那麼將利於智識的累積。（下文我將以校園活動爲主題，將六〇年代晚期和七〇年代的經驗性著作中，所發現似乎矛盾的現象，而能用此一架構來調和的情形加以說明。）最後，本圖對高度紛歧的分析性名詞提供了運作性定義，將各名詞所涉景象作因果性連接；並且有可能用它來解決或再定義下面所將提到的矛盾現象。

## 整體的理論問題

討論人格與政治的文字，似可用「形上論著」（metalliterature）一詞以名之。因爲這類論著，很少涉及個人心理作用與政治之間是否具備特殊的本質性問題，而卻及於建立這種關聯的可能與否的問題。有趣的是在其他學科如社會學、人類學之中，也存在著這種「形上論著」。人們試圖要在預存傾

向、個體與集體行為型態之間建立彼此的關聯。政治學界之中，有些人直指以人格來解釋政治並不怎麼成功，這些人中較知名的是班迪斯（Bendix，一九五二年）、席爾斯（Shils，一九五四年）、與威伯（Verba，一九六一年）；有些人則反過來認為人格因素具備政治相關性。此輩學人爲：郭漢漢（Goldhamer，一九五〇年）、李文生（Levinson，一九五八年）、藍恩（Lane，一九五九年C，頁九九—一〇〇）和筆者（一九六七年B、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一年）。

這些表面上相反的著作，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任何一方在爭辯上並非毫無限度，而許多案例中，雙方的論點事實上相當集中，並對第二節第四項所討論的偶發關係具有各種不同性質的理論觀察結構。本節的目的之一即在從這些討論中析出一個共同的理論基礎，以便引導研究之進行，而非增加爭論的強度。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要解除經驗上無法解決的爭辯，因爲其所以產生，主要乃由於概念化上的錯誤，例如上面曾提過的「精神式的」（mentalist）語言在科學上是可以接受，以及政治學家與心理學家提到人格時的不同指涉。

從形而上的論述吾人得以認清底下的問題，以使用再定義來解決，或用澄清的方式來消除疑難。

- 一、調和人格與政治行為情境解釋的問題。
- 二、人格的自我防禦是否具備政治效力的問題。
- 三、調和人格與政治行為角色解釋的問題。
- 四、調和人格與政治行為文化解釋的問題。

五、個體之社會特性比人格特性更能決定其政治行為的問題。

六、人格是否影響政治事件與結果；以及，反過來說，個體人格是否為其社會與時代產物的問題。

### 人格與情境解釋的調和問題

有關「人格——政治」研究是否有效，持最悲觀看法的，應是同時源自涂爾幹一派的社會學與行為派心理學的論點，他們認為：情境（環境的）因素比預存傾向更能決定政治行為。在某些「人格——政治」著作中，這當然與以心理預存傾向來全面解釋政治行為的說法是相對立的。⑤

⑤ 此處所涉者為人格與情境因素如何彼此關聯的問題，讀者需知在此一定式之中，人格被用在廣面的意義上，涉及的是一般性的預存傾向。此一定式顯然能够，而且也必須要在實際研究的系絡中作進一步的限制，俾便專對人格的某些特殊面向與層次。當然，若要在什麼樣的「人格」有政治性相關與什麼樣的人格無相關之間，劃出主要的不同點，則毫無疑問地應該要考慮到：在圖二及圖三中被稱為「功能基礎」的人格層次，究竟會不會影響政治，並且會影響到什麼樣的程度。

圖一——行為有必要應視為環境與預存傾向的聯合作用——正（為上面兩個對立的說法）綜合了一個觀點。這個觀點事實上來自有關著作的論辯，其中涉及二者間何者受到限制。這些限制提供了一系列有關環境的偶發前提。亦即在環境裏頭，為考慮政治行為者行為上的歧異，勢須或多或少知道行

爲者的預存傾向。

在鑑於行爲必受心理上的調節，研究任何行爲的心理應該是可能的。但是，行爲學家們所用的標準關連過程，卻無法使有關因素隨依變數之變化來變化，人們因此對之興趣缺缺。進而形成一種現象，如果偶然有不同個人產生相同的行爲，就會令人誤認沒有必要分析其人格（雖然，一如吾人所將要看到的，此種分析仍有其可能性與需要性）。但是，再反過來說，卻也有偶發性足以使人認爲，在政治行爲的歧異上研究預存傾向決定因素亦屬必要。下面一系列的命題（從「形上論」中挑出來的），除了一種以外，都與筆者（一九六九年，第二章）所論者具備同一性。在著作中，都對每一種主張的來源以及進一步推演的註釋有所交代。

設若給予相同的環境刺激，究竟那些因素（不管是環境的、預存傾向的或基於反應本能的因素）引導不同傾向的個人來從事相同的行爲？究竟是那些因素有助於循由行爲的歧異，來形成個人歧異的向外表現？

（一）曖昧不明的情境使個人歧異性有自我展現的機會。情境曖昧的最早範例，應屬羅氏墨漬測驗（Rorschach inkblot test），這種測驗並無認知的成份，而不同的個人對於相同的墨漬述說了一套與人不同的故事。曖昧不明的政治與其他情境時常包含底下三大特性中的一個、兩個或全部。這三大特性是：情境因素的新穎性、複雜性和矛盾性。⑥

① 對於這個命題，以及其他接著而來的命題，筆者曾予正面討論過，該文詳論各點，並及於論點之來源，請參閱筆者一九六九年書第二章。

(二) 一旦社會上沒有能力提供政治行為者一套精神準則，以便形成對曖昧狀況的看法與解決方案，則無能提供的程度越高，就越使個人歧異的機會增加。這一點足以與第一命題相輔相成。〔當然，人們之所以無法共有一套相同的信仰體系，也是人格因素不同造成的結果。參閱迪巴馬 (Di Palma) 與麥克勞斯基 (McClosky) 一九七〇年的著作〕。

(三) 個人行為上的歧異性，將視懲罰程度高低而異；如果懲罰的程度高，那麼對行為歧異的衝擊亦增高。茲以一極端的例子來說明，某建築物中的居民突然接到通知在既定時間內撤離該建築，否則將會造成某些傷亡。此時，居民對撤離的反應必然多所不同（見命題十）。但其撤離的行動則必定是完全相同的。

(四) 反過來說，如果傾向的強度高過懲罰，那麼個人的特性就更會影響行為。這一點屬預存傾向，正可與第三項環境命題相互輝映。

(五) 個人如果處於團體之中，一舉一動都為他人所能見，那麼個人的歧異就會減低。從對團體壓力的研究中，可以導出此一命題（參閱 Asch 一九五二年的著作；Milgram 一九六一年的文章）。

(六) 如果從他處得到啓示的需要相當強烈，那麼個人歧異的影響會減低。這一點是心理方面

的，相對於命題五。當然，「強制性認同」(Compulsive conformity) 本身就是一種心理變數，但是藉著鼓動個人對其環境的配合，其預存傾向就會減低，其他心理變數對行爲的影響（請再參閱迪巴馬與麥克勞斯基一九七〇年的著作。）

(七) 一個政治行爲者的感情介入愈深，則其他心理特性亦更能從行爲上表現出來。感情上高度介入政治的一個行爲者足以對抗許多個非政治性的個人。這些人的政治觀念相當空白、模糊而不明朗，以致除偶然的例外而外，並不能使其政治傾向在政治行爲上留下任何痕迹。

(八) 政治行爲的要求越高——對主動投注其力量的要求越高——行爲者個人特性的影響力也越高。此一命題並非導自環境或預存傾向的先決條件，而卻來自行爲本身。在懲罰方面它與命題三相對，在傾向的強度方面則與命題四唱和。

(九) 另一方面，個人特性的歧異也會從自然產生的行爲中表現出來，換言之，不經修飾、不經預謀的，來自衝動的行爲，足以表現個人的特性。●(但是，究竟這些特性能否被鑄成模型，以及是否可以預測，那就要看該個人在政治定向上是否具有充分穩定與有效的基礎。(參考命題七。))

● 命題九及十一係從筆者一九六九年書中相同的命題中，略加修飾而成的。

(十) 即使在行動的工具面上個人的歧異性較少有存在的機會，但在表示的方法上也會有不同。這一點在命題三曾經解釋。對於各種不同情況下的相同行爲究竟是否具備分析格調歧異性的價值，就要看分析者如何來權衡了。比如投票當天選民們究竟用那種方式去拉投票機的手（漫不經

心、非常用力等等），顯然沒有細加區分的必要。但美國總統對核子飛彈控制器的反應方式，卻極具研究的價值。這裏，套一句莎士比亞的話：「大人物細微差異，不應該漠不經心地予以忽略。」

(十一) 某人若就任一個並不指定要如何如何的職位，或人們有意使之在現任職務上自由發揮，則人格的歧異性會更加明顯。前述的幾個命題都與圖一三個區位中的某一區位相關連。而我們將會明白，有關角色的命題則與三個區位中的任何一個或全部有關。衛爾克 (Wilcox) 在一九六四年的著作中 (頁九—十) 倡言：軍事領袖的角色為何，每視該領袖對狀況的詮釋如何而定。當然在今天組織更形固定的現代軍隊中，這方面的特徵可能不如衛氏書中所論十八世紀的現象來得正確。整個來說，歷史上的某些狀況比另外一些狀況更適合上面所提到的項目。例如肯德 (Cantor) 一九六七年的著作 (頁一三六) 中提到中古時代的英格蘭：「政府機構嚴重地依賴國王的人格，若無英明強幹的專制君主，則皇室的統治與法律的有效性將被摧毀。反過來說，一個能力高強的君主足以對皇室聲威的擴充具備重大的衝擊。」克羅吉 (Coster) 一九六四年的著作 (頁一九二) 提供了有趣的說明，其中論及如果多人擁有無限權力，則君王的衝擊力不但不是優越的，卻反而變成次要的了。

一個具有十一個命題 (爲什麼不是十二個命題呢?) 的表，是缺乏明顯的對稱的。這個表不過是我將形而上的著作裏頭範圍廣大而雜亂的主張，謹慎地加以整理排列而成的。其中不會對任何一個命題之細部假說予以交代，事實上，就大體來說，將這些假說予以特別說明並非不可能。這些假說，用拉斯威爾和凱普南 (一九五〇年，頁二二—二三) 的術語來講，就是「假說概型」(hypotheses-schema)。(藉之，)「在用特殊引得將假說與某既定問題的狀態相連時，假說的描述就能夠形成。」

這些命題除了可作為試驗假說的來源外，更可充作圖一到圖三所述項目的「感光片」(sensitizing)。在強調政治行為歧異性的決定因素時，這些命題提醒人們注意「研究政治行為者預存傾向，(歧異性)是一種必要的而非充分的條件」。假使人們只注意研究那些產生歧異行為的政治心理因素，那麼政治心理學必然陷入牛角尖之危機。而對於表現出相當同一性的行為，不管其是否事實上已經具備了政治上重要性與心理方面的豐富性，都一概疏於推蔽。這將是尤其危險的事情。(進一步的討論，請參閱筆者一九七三年的著作，頁四四五—四四六)。

### 人格的自我防衛是否具備政治相關性？

上面提到的十一點乃政治行為者預存傾向之所以不同的必要條件，它們並不會提出究竟預存傾向那些種類歧會有政治上的關連性。紛歧的產生，也許是圖二和圖三裏頭，預存傾向區位內心理結構中的一種。然而，形上論述中每認為「人格」沒有政治關連性。這一類含糊的「人格」定義，排除對意識定向的考慮。這種含糊的定義有時甚至不包括人格三大部門——認知的需要、人我關係的調與自我防衛；不討論整個的功能過程，而僅及於精神功能方面的自我防衛。

現在，且不論是否接受這種將人格相等於心理動力的說法，吾人或可再將此類著作中各種合乎水準的主張，去其殘渣，存其精華。職是之故，吾人姑且不論一般性的人格解釋，而祇把焦點投在大受精神分析影響的人格與政治著作上面。(如：拉斯威爾的精神病理學與政治學，佛洛姆的逃避自由 (一九四一年)。筆者早先曾經提過，因精神病發而刺殺總統祇屬為數有限的案例，它所表示的是「某

些」自我防衛行為能在政治上發生作用。事實上若從更大的角度來看，底下三種非常一般性的環境、預存傾向以及反應上的狀況，更能增加「政治是自我防衛之出路」的機會。任何一種狀況都對前述十個命題中所述的條件有所增補，而且循由每一種狀況都會接受進一步的印證。

一、環境中某些種類的刺激比其他的刺激，在自我防衛或深度內部衝突方面，更能引起共鳴。藍恩與席爾斯一九六四年的著作（頁七六）提出：這類刺激每每是「有關個人普遍受到壓抑的東西。其中著例計有：戰爭或罪犯懲治（與侵犯性有關）以及墮胎或姦淫立法（與性有關）」。藍恩和席爾斯也提到人與人或團體與團體間的意見，比某些實際的話題（如經濟問題）更能引發人們非理性的想法。<sup>②</sup>

② 這裏所提到的命題，在筆者一九六九年的書中有更為詳盡的論述。詳見該書第三章。

二、自我防衛需慾是否影響政治行為者自我防衛需慾的高低有關。就一般實證的假設而言，自我防衛需慾並不會廣泛散播，而且在受到高度侵擾的精神醫院病患與大多數的常人，在人格動力方面有極少的關連。因此，柏文（Burwen）與勘倍一九五七年的著作（頁三十），在問卷資料中，發現一個事實，其為：個人對父母與對權威人物的定向之間缺乏關連。對於這一發現，他們說：

嚴重的神經病或精神病患者，不論在睡眠或在清醒狀態，總存有一種幻想，在幻想過程中對一切象徵一視同仁，而且覺得刺激無所不在。但這種象徵等量感或刺激普化感並不能干擾清醒中的正常人。

然而，有些人持相反的看法。許多流行病學的研究報告指出，神經病癥對普遍大眾的實質影響範圍（參閱 Stole 等一九六二年的合著：Manis 等一九六四年的合著：以及 Leighton 一九六七年的著作）。塔克（Tucker）一九六五年的著作論及某些領袖角色的種類，尤其是從戰鬥的革命政黨演變而來的一黨獨裁的頭目，似乎傾向於從某種具有精神困擾類型的人們中——特別是偏執狂（Paranoia）——來挑選幹部。他進一步假定極權的社會與政治體系之本質。認為獨裁者的病癥滲入政治裏頭。它藉著順服的部屬展開行動，而引向更為極端、過份的路途（統治、整肅等等）。根據塔克的公式，魯瑟福（Rutherford）一九六六年的著作研究某州立精神病院中的患者，企圖明白患者在加入該院病患自治組織之前以及加入之後，病症類型與政治行為間是否關連。結果發現在兩組之中，偏執狂病癥和組織參與有著驚人的關連。<sup>⑨</sup>

⑨ 在研究情感上受到干擾的羣體，如何對待猶太人的態度問題時，Ackerman 與 Jahoda（於一九五〇年的書上）發現：根據精神醫學症狀學的說法，祇有個人以際遇不佳憤而外顯的形式，才會產生反閃族傾向。此種傾向從未在壓抑性精神官能症上發生。這個發現，一如 Rutherford 所見，提出一個看法，就是那些有政治關連性的羣衆中，其一般性的自我防衛之分配，並不會發生什麼問題。問題是出在特殊形態的自我防衛分配。

三、最後，某些反應類型無疑地比其他類型更能為深度人格需慾提供宣洩的機會。譬如對矢言忠貞與羣衆運動中集體行動有所反應的類型，以及另外一些蓄意將感情注入政治的反應類型。

人格與角色解釋的調和問題

用「角色理論」來解釋人格，被許多行為科學界人士認為是動機以及其他心理學研究法的重要動敵。由於在政治體系與政治過程中，每個人都有一種階級地位的認定（正式的也好，非正式的也好），因而在解釋政治行為時，人們有時會用角色研究法來代替人格研究。

角色固然重要，但吾人若回到角色的本源——劇院——來，就會發現無法消除人格的影響。具備不同個性的演員，如（戲劇演員）基尼斯（Alec Guinness）與吉爾古（John Gielgud），如果要求他們扮演同一個角色，例如丹麥王子（the Prince of Denmark），也許會儘其能力來扮演得維妙維肖。但如以個性完全不同於吉爾古、基尼斯的人，如約翰韋恩（John Wayne）或伍迪亞倫（Woody Allen），來扮演哈姆雷特，其結果如何，吾人可以想像。尤有甚者，政治角色並不能完全以傳統戲劇中所賦予的角色來比喻。前面曾述及個人歧異性之於環境的十一項命題，其中提到許多政治角色多少是無所限制的，即使是基尼斯與吉爾古在毫無準備的狀況下上臺演出也可能會有極端不同的表演法。

一如李文生在其一九五九年著作中指出的，評論家們所謂的「角色」通常可分三種，這三種又把我們帶回到「環境——個人——反應」的公式上來。

一、在某些用法上，「角色」述及個人的預存傾向。即不祇是在現職上「應該」如何的問題，而是牽涉他個人對該職位的認知或情感定向（對自己被視為律師、醫生或總統的看法。）

二、在某些用法上，「角色」及政治行為者的環境。亦即在心理上預想，設若其他政治行為者，

處於他現在的職位上，將會如何做，能夠如何做以及應該怎麼做。職是之故，「美國總統的角色」組成因素之一就是，一旦就任這一職位，同仁們就不再稱呼他爲哈利、林頓或迪克，而變成「總統先生」了。●

● 反之，外部的反應也許會有內部的相關。對於兩位美國政治人物杜魯門 (Harry S. Truman) 與亞瑟 (Chester A. Arthur) 在獲取其高職之後如何改變風格 (也許更有心理上實質的改變)，請參閱 Rogov 與拉斯威爾一九六三年的合著。對於總統的重要關係人在華府的社交圈中，如何藉著觀察總統日常行止、偏愛，對某事或某人關切的層次等等，來爲自己的言行定向，Zelenski 會有深入的剖析。詳見其一九六〇年著作的第四章。至於涉及公衆對總統之期待者，請看筆者一九六五年的文章。

三、最後，在某些用法上，此一名詞祇涉及一個行爲者確實做了些什麼——反應的類型。任何特殊用法多少都是明示的，而且不祇涉及以上所列三種中的一種。不論在什麼狀況，清楚地認定 E (環境)、P (個人) 和 R (反應) 三要素在所必需。如此一來，不但表達得更精確，而且足以立即將實質的社會心理難題勾繪出來，並能重新檢討那些錯把三要素混爲一談的角色理論。總之，角色分析與傾向 (連同情境) 分析具有唇齒關係。

### 人格與文化解釋的調和問題

作爲行爲之形成因素，究竟文化重要還是人格重要？即使在今天人類學中觸及人格與文化研究

時，還會碰到一些文化重於人格的看法。這類主張使史畢羅 (Melford Spiro) 撰述「一篇稱爲人格與文化：一個錯誤二分法的自然史 (一九五一年) 的報告。後來在政治學界的討論中，也開始發現相似的主張。「政治文化」一詞借自人類學。當時政治分析家們借用的目的，在希望藉著一個固定的方法，在過去的、有爭論的、涉及國民性的著作中，解釋「比較政治心理學」中的問題 (參閱威伯一九六五年的著作)。通常來說，以文化代替人格來解釋行爲或特質類型時，每將過去以人格動力學術語的解釋方式予以變換，而改由文化習慣角度來說明。認爲事實上是文化習慢造成各種問題的類型，而非內心動力的向外表現。茲以三個例子來說明：

例一：過去，在權威人格量表上造成高分的原因，是基於受試者對底下各種問題有肯定面的反應：對上位者恭順、對低位者嚴峻、思想上定型、不樂於講求自我內心的感情、迷信權力與粗暴，以及對未經證實之他人的怪誕性行爲有先入爲主的觀念等等。在阿德諾 (Adorno) 等合著的權威人格 (一九五〇年) 一書中，這些特性都被視爲內部心理衝突的外顯，特別是認爲其屬於對抗權威壓抑的一種反應方式。然而，文化觀的學者卻視之爲教育程度較低，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個人，其對文化與次級文化定向的結果。(參閱 Hyman 與 Sheatsley 一九五四年的合著 Hyman 一九五九年的著作之頁二九—三六。) 這種論點曾被一些評論家 (雖然不是 Hyman 與 Sheatsley) 以文化而非人格的字眼加以表達。他們認爲 F 量表的分數來自文化的而非人格的影響。

例二：佛洛依德在對達文西的專論 (一九一〇年) 中，曾對蒙娜莉莎的作者，爲何會畫出那有名氣的謎樣微笑，做過精細的心理動力解釋。而查畢洛 (Meyer Schapiro) 在一九五六年卻表示那種做

笑事實上是當代的習慣笑法——當代有關言行舉止的書籍，足以提供資料表明當時人的習慣如何地來影響蒙娜莉莎的微笑。

例三：一般而言，根據明尼蘇達「多相人格詳表」，在病理學上之案例比率，美國黑人較諸白人爲高。但金瑟 (Gynther) 在一九七二年著作中卻一直認爲黑人之得到高分及因爲其次級文化中對社會的譏諷與不信任，而不是源於心理動力上的理由（也請參閱柯爾和布朗諾一九七一年的合著）。

一如對以「角色取代人格」所表示的反對態度，吾人十分贊同史畢羅精關的看法：以文化取代人格實無異於病急亂投醫的錯誤二分法。上面三個例子，以對照的手法，襯出了各個有關的要點。事實上，這種論調不過是想在態度和行爲的功能基礎上找尋其他的各種可能性。在每個例子當中，爭執的是：一個特殊的意識定向或反應類型之感情基礎，植根於認知的以及社會的，而非自我防衛的需要。此一論調的證據來自環境，而非預存傾向。換句話說，認爲探討中的項目與個人的社會環境有關，並經由模仿的以及其他基本上是認知學習的模式來加以吸收，而不認爲出自內心衝突的象徵性需慾。①

① 對於從文化的觀點看一般流行的各種類型（如鞭打小孩），會對某些人而不對另一些人產生自我防衛性人格需慾，艾立森曾有敏銳的論述，詳見其一九五八年書，頁六四—八〇。就文化與人格兩項對行爲的影響孰重孰輕，若予以錯誤分配會造成何種現象，曾有人做進一步的探究，而以威爾遜著名的拒向參院妥協，致令凡爾賽和約無法爲國會批准爲例，來加以討論。或謂威氏所以如此，乃因孩童時接受（嚴苛的）加爾文式教育，而並非因爲他本人有「人格頑強性」（“personality rigidities”）。將威氏深入處理，並對本文討論意涵頗有影響者，其爲喬治一九七一年的專文。

本章各圖中沒有「角色」的項目，而在圖二與圖三的預存傾向區位中也沒有「文化的預存傾向」之項目。由於「文化」一字十分曖昧，克若伯 (Kroeber) 與克羅孔 (Kluckhohn) 一九五二年合寫了一本書來解析它的涵意。和華理士 (Wallace) 一樣，我立意貶抑「文化」(至少是文化的非物質層面)，將之限定在集體一隅，而非個人的類型。心理學家把「文化」用在集體方面，認為它是「人格」運用在最大範圍之時的伙伴。根據此一定義，文化是過去與現在環境最關鍵的部份，在該環境中，人格與行為得以產生。但是一如情境與角色，「文化」不及於過程問題，不及於做為個人行為之源的預存傾向之過程。

個人的社會特性對政治行為的影響力是否大過其人格特性

這裏仍有一些由語意問題等等所引起的爭辯，這些爭辯早已使人格與政治著作固著在形上的問題 (meta-issues) 上面。●

● 拉斯威爾在一九五一年所編的書上第四百八十七頁中曾言：「某些假設如果牽涉多種過程而又自相矛盾，但卻年復一年地被沿用下來，那麼其所發揮的解釋效果，將不過是文字遊戲，而與真實現象的結構無關。」對於這一類目前已經不流行的文化與人格的討論，近年有 LeVine。其人正嚐試著有價值的努力，企圖將之建立在牢靠的基石上面。詳見 LeVine 一九七三年的書。

對人格與社會背景變數間衝突，最早提出責難的 (Prototypical imputation)，應屬對美國行動

派學生 (activists) 的研究。李普塞一九六八年用行動傾向者的人格來駁斥行動論的解釋。某些研究報告指出行動論者非同凡響的「健全」人格以及高度的認知能力，另一些報告指出自我防衛與至少某種類的行動傾向具有相關性。李普塞認為：行動主義「真正的」決定因素是行動派人士，不成比例地 (disproportionately) 來自猶太的背景（雖然其中只有極少數人真正參與猶太教活動），以致於行爲的種類足以從其特化的社會特殊背景中表現出來。

布洛克 (Block)、哈安 (Haran) 與史密斯在其一九六九年合著中指出 (頁一七〇—一七三)，社會背景與人格傾向兩變數並非完全沒有交集，而卻是：背景因素（一如生物性因素）能夠造成人格預存傾向，此一關係可參看圖三第二到第六區位。由這幾個區位就可想見李普塞研究學生行動派在設計上的謬謬。其他錯誤社會與心理特性間關係相悖之主張，也犯有同樣的毛病。這種設計錯把第三區位（社會環境背景）的因果因素以及從第四到第六區位（當前的預存傾向）的因素相鑿置，是錯誤的對比。事實上應該從社會背景出發，經由社會發展，而到達當前的傾向與環境。此外，吾人尤需注意從社會特性（如年齡、籍貫、社會經濟背景等）來推論心理傾向，在分析上所產生的缺點。（比較布洛克一九七一年，頁二七二—二七四的討論：「將社會階級觀念心理化的必要性」。）

政治變數的調查研究中，如果標準指示項的指涉曖昧不清，必增含混的程度。其中更同時涉及行爲者過去的以及當前的環境與預存傾向等因素。此種複雜而曖昧的資料常在傳統的多變異分析過程中發現。這個分析法不管因果的結構如何，亦少注意多重相關線性因素 (multicolinearity)（參閱 Blalock 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Farrar 與 Glauber 一九六七年的作品）。在統計上造成一種

似是而非的印象，以爲人格因素並不重要，因爲心理變數與政治變數之間的表面關係是可以控制的。此種被誤導的分析過程，可以懷特（一九六八年）的說法爲例來加以說明：政治社會中階級並不是重要的決定因素，因爲智商的管制（controls for IQ）使得階級與政治情報之間的關連得以消除（比較 Jackman 一九七〇年的作品以及筆者一九七〇年第三部著作）。而布魯芬（Bronfenbrenner）也以相近的理由下結論，認爲：「人格」對社會參與而言並不重要。所幸目前對於多變異分析已經有了更新的研究法，諸如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與相關過程（參閱 Duncan 一九六六年著作與 Sorquist 一九七〇年的作品），而有助於排除因果關係上的疑難問題。

人格是否影響政治事件和人格是否祇是社會與時代的產物

形上的最後一個問題，涉及的是個人的系統性影響，究竟能否產生衝擊。這裏，有三個相當不同但彼此互爲增補的主張值得注意。

- 一、個人並不重要，因爲他們是社會的產物。
- 二、單一的個人由於受環境所困（個人縱令有任何貢獻，也源自他人的影響，以及社會歷史過程和事件無法抗拒的本質），因此任何結果都不能歸功於個人。
- 三、個人的自身並不重要，因爲在社會角色之中，人格類型都胡亂地分佈著。

第一種主張認爲社會特性比人格特性更爲重要。其所以誤謬，理由亦與上面所述者相同。事實上，此種主張把排他性因果關係強加在圖三所示的因果連接線上。如果說家庭社會化過程以及其顯著

結果不重要，而且認爲其所以不重要是因為特性結構對社會需慾的反應，如佛洛姆一九四一年的著作所描述的（頁二八六—二八七），那麼，我們要聲明此種論斷有失恰當與簡化。吾人認爲，歷史過程以及當時環境中正接受社會化的人都「同樣」會影響個人發展中的預存傾向。或者說，如果家庭只是一種較大社會與個人間的輸送帶，那麼在預存傾向上，由家庭引起的歧異性勢必無法存在。這一點也與經驗事實不符。

第二種主張認爲單一行爲者不能影響事情的演變。其所以作如是觀，有古老淵源。它曾爲十九世紀歷史傳記作家在討論「偉人」角色的辯駁對象（雖然是項辯論主張，未經過嚴格的定義）。胡克的歷史英雄就是上述十九世紀文學發展而成的著例。他們認爲：歷史上的行爲者（如領袖人物）依賴適當的歷史環境以便發生衝突。職是之故，最值得注意的，是歷史環境而非個人。試想：拿破崙如果出生在中古世紀的佃農家中，會產生什麼影響力？

此類主張的問題之發生並非毫無道理。總而言之，大部份的人都極少（如果有的話）能在歷史上留下痕迹。可是，這些不管是大是小總在歷史上留下痕迹的人怎麼說呢？顯然持此主張的人反會將原因歸到偶發性上面。底下三個命題<sup>①</sup>是根據單一個人是否能對歷史演變有所衝擊的各種看法，綜合而成的：

① 有關理性之命題，在筆者一九六九年書的第二章會有更爲充分的討論。

（一）環境容許重建的層次越高，產生個人衝擊的可能也越高。歷史上有些時代是容許劇變的最

佳時機。其他時候則封閉於自我增強的格局中，而不易操縱。環境在溫和介入的基礎上，若能容許實質上的重建，那麼在平衡的觀念裏，它就是一種不穩定的狀況。以物理上的例子來說，就宛如山腰上的一顆巨石，其所以穩定，端賴巨石底下一顆小而重要的石頭來維繫。

穩定一詞，根據平衡的觀念而言，絕對不是「沒有流動性」的相似詞。一塊正在崩落中的巨石所表現的是一種特別穩定的狀態，在其下墮之中，任何想改變其墮落路線的企圖都不可能成功。這個譬喻顯示了穩定平衡的特徵，那就是說：某種範圍廣大的力量正趨向同一的目標。如此之下，任何單一行爲者，若不想朝著同一目標前進，勢必被巨流所淹沒；假如想反其道而行，則更祇有被壓毀一途了。

胡克就把一次世界大戰視爲既定巨流所造成的結果，認爲無法由個體的投入來控制。在另一方面，他把十月革命前的時期視爲不穩定。因爲他認爲一個小的轉機也引致實質的改變。這種分析顯然嚴重犯了方法學上的困難。因爲他以「套套邏輯」的方式來說明；用事後發生的結果來解釋歷史上的某一情境之所以不穩定，就是因爲它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獨立的指示項實在非常需要。

(二) 行爲者在環境中所處的位置影響其衝擊力。如果一個行爲者能具有與列寧一樣的情報來源以及領導地位，那麼一九一八年十月的俄羅斯就可任其操縱。當時其他少數的俄國人，也處在相當的位置上。

(三) 行爲者個人的強弱決定衝擊力的大小。政治行爲者是否能具備衝擊力，就如撞球檯上的狀況。球檯上的色球，其數目多寡就是打擊之後諸球位置如何（環境的可操縱性），母球的位置如位

何（行爲者的地位）以及撞球者的技術如何（能力的強弱）的一個函數。列寧的狀況也是一樣。大家都同意，設若任何列寧的同伴具備了相同的能力，也足以帶動十月革命趨向同一個結論。●

● 有關列寧在十月革命中扮演什麼角色，Danielis並未會抄襲胡克的看法，但卻有部分相似的結論。詳見 Danielis 一九六七年的書。

第三種主張除了同意「角色被隨機分配的個體無法影響事情的演變」外，甚至更認爲不祇單一個人無法影響社會與政治的未來狀態，而且集體的個人對當時環境所生的影響也與較大的環境沒有關連。

其實，吾人沒有理由相信個人在角色上的預存傾向是被隨機分配的。此外，一如殷格斯在其一九六三年的著作中所言，就算隨機分配是真的，這種分配會意味任何特殊的角色（如美國總統）上，各種人格類型也會完全正常地分配著，並進而以各種種不相同的途徑來表達同一個角色。人格因素不祇不會被忽略刪除，相反地，更可證明系統觀察的正確性，而且闡出制度化運作研究的園地，達到更爲精確的目的。雖然，在討論底下集體的問題時，吾人將發現企圖將人格引至制度化，並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

## 人格與政治著作的分類

克羅孔與燕雷於一九五三年將人格本質與決定因素的討論分爲三類：

每一個人某些方面：

- 一、像其他所有的人，
- 二、像某些一些人，
- 三、不像其他任何人。

數年之後，辛傑 (Milton Singer) 在一九六一年的著作中，就針對個人特質之(一)、同於所有的人；(二)、同於某些人的，如以多種人格類型分類之一種來發現某人之同於其他某些人；(三)、不同於其他個人的，如特殊的癖性等三方面，在文化與人格的著作中，有效地從事分門別類的工作。政治學如同一般的行為科學，縱令辛傑提到此一項目在人類學中討論的狀況，以及政治學家戴維斯在一九六三年的著作中借用了華理士早期(一九〇八年)著作——政治中的人性，以便發掘基本人類需要和習性的政治相關性，但是仍難在普遍不變的(「人性」)的研究中找到令人滿意的分析準繩。

找尋人類共通性之所以困難，主要是由於藉著標準化了的相關工具 (correlational means) 與實驗工具 (experimental means)，無法發現其變異之處。人們接著發現無法找到為大眾所接受的共同道德準則。就邊際性細節言，如禁止亂倫，在文化上就有不同的作法。也請參閱許多嚐試要建立「生物政治學」(biopolitics) 的文章。他們從生物與環境影響的互動關係中，就心理傾向觀點出發，來研究生物性「素質」("stuff") 的政治意義 (參看 Somit 一九七二年的著作)。

在「人性」的主題下，我們找到許多理論家持續不斷的著作，並且借用人類的社會「素質」一詞，來對社會從事形而上的研討。這類分析，有許多極具鼓舞作用，但卻時常半途而廢。它們曾經

受到人們的注意，在某種範圍內經驗論學者曾將其假設拿來試驗，希望發掘一些東西。後來新生的二代學者，卻又以換湯不換藥的說法將之取代了。在早一代的學人中，研究人格與社會而其文章較可讀的計有：衛斯特（Ranvard West）一九四五年的意識與社會（Conscience and Society），曼尼凱（Money-Kyrle）的心理分析與政治學（Psychoanalysis and Politics，一九五一年），以及佛洛（Freud）一九三〇年的文明與壓求（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和拉斯威爾一九三〇年精神病學與政治學的最後一章。其後跟進的是布朗一九五九年的抗死求生（Life Against Death），米契里（Alexander Mitscherlich）一九六九年的沒有父親的社會（Society Without the Fathers），馬休斯（Herbert Marcuse）一九六九年的性愛與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重印本，以及維因斯坦（Weinstein）和布拉特（Platt）一九六九年的自由的祈望（The Wish to be Free）和精神分析的社會（Psychoanalytic Society）。

本章接下來將把「人性」問題認作具有高度重要性的一個難纏的亂團，並予以擱置，而借用克羅（Cloward）與米契里（Mitscherlich）的孔與慕雷分類法的其餘部份，來確認人格與政治研究兩大主流的內涵：對政治行為者採個人分析與類型分析，個人分析與類型分析並未窮盡地涵括政治學者所有的研究法。政治學者也與社會學者一樣，關心的並不止於被孤立的人本身。他們關切政治集合體的如何發生功能。對政治體系和過程的分析，若把重點放在研究組或較大團體的個人或類型特性上面，那麼這種分析就可被稱為集合性分析。對於此，我心中涉及的有兩類研究法，一種是對政治行為者集體的研究，另一種則針對受到具有決策性的要人之衝擊的衆多個體，如研究領袖人物之於團體（參閱塔克一九六五年的著作）。

其實，任何一種調查研究涉及的並不單限於上列模式中的一種。而每一種研究模式邏輯推演的結果勢必牽扯其他兩個模式。個別政治行為者（如領袖人物）與同類型政治行為者（如領袖人物羣中心理特性相同的一夥人）的有關資料，都可成爲建立集體分析的基石。集體的現實（社會政治制度）提供了所處環境中的狀況，而個人以及相同類型的人們，就在此種狀況之中生活，產生言語行動，並接受社會化。又由於類型學不能窮盡地涵括其分類對象的所有個人的特性，而分類常可提供作爲診斷個人的工具。因此，如果閉關自守，僅在自己的模式中鑽研，不思旁及其他的兩種模式，那將既不合宜又不受歡迎。可是話說回來，這三種模式儘管有相互依存之處，但任何一種都也充分地顯現出其範圍之內亟需研討的難題。

### 對單獨政治行為者的個案研究

爲什麼要從事個案研究？

蕾伊·卡爾森 (Rae Carlson) 在一九七一年曾對近年佔領導之「主流」地位的兩個學派之心理學報——社會與人格心理學報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與 人格學報 (Journal of Personality)——的內容做過分析。她的論文題名爲：人格研究中的「人」何在？這篇文章很引起政治學家的興趣，藉著它，他們在撲朔迷離的心理學與精神醫學的著作中找到了自己的路子。蕾伊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就是學者們對於人之所以「不同於其他人」的地方缺乏興趣。她說：「這份研究中

發現坊間出版的文章中沒有人曾有一絲一毫的企圖來研究個人人格變項的體系。」（見一九七一年蕾伊·卡爾森的著作，頁二〇九）

對於這個問題，心理學界多年來曾經有過相當的討論。討論的重點，用奧爾坡（Allport, Gordon，一九六二年）的話來說，就是「心理科學中一般的與獨特的問題」。奧爾坡認為心理學家的工作之一應是將個人人格的複雜特性予以系統地描繪。（並參看 Holt 一九六七年的著作）對於不從事臨床工作的心理學家而言，奧爾坡這種論調沒有任何重要性。通常來說，人格與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者，認為個案分析頂都是描述性的，而無法與心理研究的宗旨建立——普遍法則以便應用到各式案例——直接關連。（有關社會科學的理論家們對於社會研究中一面倒地採用以自然科學「普遍法則」為基礎的研究法，曾經多所爭辯的情形，請參考本叢書第一冊中 Moore 的文章）。

不管人們對心理學中的人格研究如何妄下斷語，仍無法將之從政治學範疇中劃出，因為在事件中（如：古巴飛彈危機、俄國大革命等），不論個別行為者或個人所處的位置，都會對事態變化產生實質而巨大的影響。（一般性個案研究請參考本叢書第七冊（Eckstein 的文章）。以研究現代美國總統制的學者們為例，在筆者撰稿的時候，可供應用的案例也不過祇有七個：法蘭克林·羅斯福、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詹森、尼克森和福特。

政治的互動與行為有兩個特質，可以從上面文學的討論中推演出來。此二種特質使得以強度心理分析來研究單一的政治行為者成為必要。第一種狀況是環境中的行為者，其舉止言行無法先以情境之名來加以解釋。本章第廿七頁至三〇頁中所提到的十一項假設恰可針對這個狀況。第二種情形發生在

當週遭環境致使行爲者之行爲似有社會及政治相關性的時候（參考四〇頁）。行爲越具相關性，深入分析行爲者的價值就越大，即使其行爲似乎確能以情境爲詞來廣泛說明，但任何一個行爲者都可以作爲深入研究的目標。一如前面曾經提到的，如果僅在設定的特殊狀況下才來作人格分析，那麼政治心理學就將流於僅對逸出常軌的行爲聊作殘餘性解釋的東西了。

政治心理學著作包含兩種案例研究：一爲在一般大眾中找尋某些個別行爲者——如 Riesman 和 Glazer 兩人一九五二年合著之面對羣衆——亦爲就古今知名之士從事心理傳記之研究。這兩種模式之間，在證據、推論以及概念化等基本要求的差異，並不比二者在運作上現實考慮所顯現的差異爲大。

對一般大眾的個案研究，比起對現存或逝世名人之研究，有較多的直接接觸及正統的臨床資料搜集程序。然而，臨床學家亦講求不「在診療臺上」診斷病人。對當代人物作心理傳記的學者們，有時也可以對研究對象或認識這些對象的個人，從事臨床式的引導性交談。有時候可以找到具有臨床價值的檔案資料，如：日記、私人函箋、幻想物品（fantasy materials）甚至夢的記錄。

雖然人們有時會認爲臨床學家比心理傳記學家有利，因爲他們似可藉著適當的問題與各種能取得資料的刺激，來對研究標的從事假設的「試驗」工作，但臨床運作並不真倚賴這種能力（參與臨床案例的會議內容）。而心理傳記學者則至少可免於強加心理模式的病理治療於對象之嫌疑。此外，傳記學者對於知名之士各色各樣的行爲，常能比臨床學家獲得更多方面的報導，而不必單單依賴研究對象本身的報導。最後，傳記學者不必用資料來作「純粹的想像」，他無需礙於研究對象的盛名，來掩藏

生活史上的細節。簡言之，這兩種案例研究法有相輔相乘的功效。

### 在一般大眾中就個人做案例研究之論著

就一般大眾裏頭的個人，從人格角度所作的研究，正表徵了行爲科學中一種長期的調查傳統。特別是臨床心理學與人類學，雖然人類學之於生命史常著重文化族類的描繪，而較少說明研究對象之內部功能（參考 Dollard, 1935; Allport, 1942; A. F. Davies 1967; Mandelbaum, 1973）。對一般人作案例研究常將研究對象予以化名或改裝。這種研究（理論要點的描繪及變項間可能關聯的創發性分析）的宗旨以及改變細節的需要都足以使其精確的因素推論，比起心理傳記，較少壓迫感。當然，如果在診斷、治療與預斷（Prognosis）中，有心理治療方面的利益者，則另當別論。●

⑤ 在這樣的案例中，牽涉到任務、處置及盡責的問題，則在個人的層次上無可避免地需要做成堅定的決議。對於這一方面，精神病學家所從事的工作竟然可以和心理傳記家並行不悖。目的都是在尋找某政治行爲者對某一重要事件具有多少影響力。精神病理診斷之用於單一政治行爲者，在美國中央情報局裏頭已經行之有年。目的在藉用精神醫學的原理來預測，或者至少來預期某政治行爲者的行爲。這個方法據說祇用來研究美國以外的國家領袖及重要人物。但有一次例外。這個例外涉及 Daniel Ellsberg 引用並洩露五角大廈文件，以及藉著這些文件所作成的爭論不休的分析。有關 Ellsberg 本人的種切，請參閱一九七三年八月三日的《紐約時報》。

對一般大眾作廣泛的研究心理分析，目前縱然不多，但此種研究除了對象找尋方便之外，已有一

部份被認定具有影響力而且也廣被學者們所採錄與引用。這一點可以顯示，案例研究具有學術性，至少是教學性的價值。而一九五六年由三位傑出心理學人：史密斯、布朗諾和懷特共同創作的意見與人格，更令以大衆為研究對象的案例分析法，充滿了智慧的光輝，而這也指出了一個優良作品的「市場」。他們三人於一九四七年在大眾中選了十個男性從事前後為時約三十個鐘頭的面談與測驗，所採用的特殊資料包含：廣面生活史、人格觀察、政治定向的多種資料，並且特別重視研究對象對蘇聯的態度。（由於作者們也用這些資料來介紹意見如何影響個人的功能，因此其研究的成果並不僅限於案例研究。而意見與人格一書之里程碑式聲譽也因而建立。）

史密斯、布朗諾、懷特提供了所有十個研究對象的資料，但細節討論則集中在三個人，這三個人似乎較能妥切代表作者對意見功能基礎的分類：理性的、問題定向的（problem-oriented）法律系學生加維爾（John Chatwell）代表「目標評價」——如認知與事實試驗過程；藍林（Charles Lanlin）一個中位階級的推銷員兼小規模的地主，代表「社會需要」——人我關係功能的調和（見圖二與三）；最後，受焦慮支配的蘇禮文（Hilary Sullivan），是個自學出身，不切實際的共產主義信徒，代表「自我防衛」，有時心理動力需欲能透過意見來向外表達。就目前出版，對大眾做案例分析的研究心理著作而言，以上三案例可謂最屬廣博，提供人們最佳之基礎，俾就豐富的臨床案例檔案中，學得如何來研究個人。有趣的是，意見與人格一書中，在某些部分原來是非理論的細節描述，卻也能提供理論性的結論。這些一般性個人的案例資料，引出了存在於個別心理預存傾向和政治行為之間的許多關連。這種關連若運用多案例類型分析法，由於太特殊性（idiosyncratic），是無法認出來的。而這些

關連性如果出現在策略性（即關鍵性）政治行為者身上，必然會有極深遠的政治洞識存在。可惜這種關連是否真實，只能在非政治的實體身上做研究，因為祇有這些人才便於接受直接的面談與觀察。

讓我們以史密斯、布朗諾、懷特書中的主角之一——藍林——來說明。藍林的需要與權威性人物之間有一種倚賴關係，這是藍林案例的心中論點。縱觀其整個生活史上資料，這個特點無所不在，因此不可將之視為作者們的屈意解釋或面談後蓄意編造出來的東西。藍林十分稚氣，對父親順從到一種令人驚異的程度，談起孩童時期，對於他之樂於臣屬於雙親，藍林強調著一種具有雙重矛盾情感的驕傲。譬如，他曾經用一種兒童學習如何投向優越權威的口吻，來描述孩童時期的溫馴。當被詢及對蘇聯的看法及美蘇關係之時，其指向反蘇的主張，泰半可歸因於中下階級和新英格蘭式天主教徒的背景。他採用的特殊比喻及形容方式顯然與其人格需要有關，太少人有這種現象，因此極難用一般性命題的字眼來加以描繪——甚至對於有依賴需求的人們政治印象之如何所作的命題也無法適用在這個例上。科際需要方面他選擇「不能信賴的孩童」來看蘇聯，並認為蘇聯「依賴」美國，而不採用其他許多可用的印象，如：蘇聯的侵略性。

前曾提及人格特性與政治行為間比較上是一種複雜而偶發的，而非簡單而普化的關係。史、布、懷三氏的資料中發現人格——政治的特殊性連接，而有助於瞭解人格因素如何地具有政治關連性，而不單是具備了檔案性價值。目前三氏所採的方法，比起經過更精密設計，大抽樣的多重案例分析更能達到上項效果。顯然，「在真實的世界裏」個人的傾向和政治行為有所連接，但如不採上述辦法，而換以一般關係的形式來處理，則將失之於片斷與雜亂。●（請比較本叢書第四冊 Converse 的評論）

⑯ 根據非常大型抽樣所做的研究，有時確能測出高度「特化的」關係。Morris Rosenberg 在一九六五年書上所舉的例子就是最佳明證。他發現如果家庭中同一輩的成員，年紀較大的清一色都是，或大部分都是女孩時，必能發現這些年紀較輕的弟弟自尊心之高十分驚人。而這類的發現之所以可能，主要乃因為 Rosenberg 所採的原始抽樣相當龐大所致。

另一個具有影響力的單一行爲者研究，係藍恩在一九五七—五八年對新英格蘭東港 (Eastport) 工業都市中十五個勞工的一連串深入面談。採用意見與人格中的過程與研究途徑。就臨床心理學所有的醫療設備而言（如投射測驗），藍恩運用的技術性程序比不上史、布、懷三氏，而從生活史面談中來收集大部分的人格資料。（事實上史密斯等人已經發現生活史的面談比所謂的測驗資料更有用處。）除了主要從一個主題來檢視政治信念外，藍恩更擴展角度，採用一個相當具信服性的面談時間表，來研究個人的政治定向和參與的類型。

根據案例研究的發現（參考藍恩一九五九年 a 與 b），藍恩藉用文章來闡述工作的狀況，並將這些文章合組成一九六二年的巨著，這部書有相當部分超過我們所討論的個案分析。其中包含對討論美國國民性文章的批評，進而說明「民主性格」的原始類型建構內容。藍恩的案例提供不少有關個案分析的運用方法以及其困難所在。

藍恩對面談技巧的詳盡引錄，一如史密斯、布朗諾及懷特所提供之開放式案例素材一樣，有其鮮明性與創發性。這種案例所顯現的價值之一，就在對政治思想及表現展示出「自然的」分類，而不可以一般調查研究所採用的固定答案的問卷題目作預先製成的分類。當然，調查研究也用開放式問卷，但

調查研究本質上是多案例的；它不容許如藍恩用來引出回答者信仰與思想類別的「半現試探法，也不作巨細無遺的註解性努力。藍恩不用分析者的思想和表現類別，而改採回答者本人的參考架構，來引出所需之類別。對於他究竟如何處理這種分類問題，最佳範例莫非平等的恐懼一書（*The Fear of Equality, 1959b*），其中描述了勞工階級對權威具有雙重矛盾情感的內涵（texture），而此一內涵若以傳統的態度量表是無法獲得的。

對於潛藏的人格與政治傾向間，一般性以及特殊性關係，藍恩的案例資料也提供了許多說明。其方式不外提出假設，甚而及於初步證據，俾作充分之闡釋。比如在政治的意識型態中，藍恩稱呼一個研究的個體爲索可斯基（*Sokol'sky*）。這個人對政治有非常深的懷疑，其程度已經超過一個與他相當的社會背景出身的人所應對政治的否定態度。藍恩在政治的意識型態中所強調的，並不是提供一個接一個的案例，而在將他個人的技巧（在該書中有大約兩百頁之長），傳授給其他研究者。下文我們將會讀到有關自我防衛式權威類型的一個假設，在這種假設下的個人，有相同的人格需要。這種需要尤其鼓舞人對政治以及人性腐敗本質產生興趣，並且選擇性地予以採納，同時也鼓勵人對性的「進行」產生淫亂的幻想。有人在藍恩對索可斯基從事有意無意的敏感性引申式面談之抄本中，發現其方式與心理分析自由聯想之於測量權威人格十分雷同。該文述及：在廣泛討論政客們普遍腐敗情形之後，索可斯基立刻聯想到最近好萊塢的性暴力醜聞。藍恩對這兩種說法之間的功能性關係究竟如何，也許難以引證，但吾人不能不承認其面談內容具有高度的說服力。

藍恩有時也能以計量法處理小抽樣，而成就一種頗佳之類型分析。這裏，他借助豐富材料，從中

發現多種指標，來將回答者分類，其法一如研究受干擾的父子關係（參考藍恩一九五九年a之著作）。藍恩用一種心理計量技術研究法指認或歸結的方法，而能指認出四個回答者，這四人在父子關係上面有某種困擾。他把這四人與其他回答者加以比較，比較一些抽象的東西，如：對生活條件是每況愈下或漸漸好轉的看法，以及擬議理想藍圖的能力。結果令人驚訝地發現，這些與父親關係並不美滿的受試者比較上悲觀，對未來的定向則較少理想。●

● 不幸的是，這一類有趣的發現並不會有過類同的複製品。

由於坊間殊少對一般大衆中的個人做廣面案例分析之著作，有志於此類研究的人勢需參考兩部未經出版的博士論文，這兩部論文製作嚴謹，且富臨床上的敏感性。第一部爲巴倫迪 (Parodi) 在一九六二年所製作的一系列面談，對象爲四個義大利移民美國的家庭中之三代，包括祖父輩及其被同化、力爭上游的兒子及孫輩。從草案中巴倫迪就社會文化之同化與人格發展之間的相互作用，抽出精關而引人的結果。第二部是倫諾 (Lerner) 在一九七〇年所做三個特別廣泛的案例研究，目標是對大學生領袖做詳盡的解釋。倫諾分析的一個有價值的特色是他委由一位臨床心理學家，對每個對象做「盲目」診斷（“blind” diagnosis）。倫諾藉之建立了廣泛生活史面談的結論。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一本澳大利亞人所寫的小書，作者爲戴維斯 (A. F. Davies)，書名爲：私人政治：對五個政治展望之研究（一九六六年），處理羣衆與頭顱人物之間的案例。這五個案例所涉中級政治及政府參與者分別爲：政黨創始人、都市計劃家、國會議員、政府官員及公會會員。在幾

個月時間內，他總共花了從十二到三十個鐘頭來面談，其面談技巧及解釋模式並未標準化。除不合正統途徑外，戴維斯加上一個個案研究上十分重要的因素——技巧。就觀察的細節言，他的每個案例都處理得額外精細。在提出每個案例述說的結尾之先，總表示他在闡釋方面已經提供了必要的手段。然而，他的闡釋彼此無法銜接。他的方法曖昧，其中包含從精神分析角度，對日常生活現象的象徵性意義作詳細分析。一如佛洛伊德一九〇〇年的釋夢及一九〇一年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對文學的以及其他象徵性作品，則仿柏克 (Kenneth Burke) 一九四五年、一九五〇年所採用的感觸分析法 (textual analysis)。(對於戴維斯所探文學評論方面之技巧，請參閱 Holland 一九六八的作品。筆者一九六九年的 a 著作，則對戴氏的作品有進一步的討論。同時也請參閱 Little 一九七三年對澳大利亞三個大學生的政治心理案例之精心著作)。

### 有關政治人物的心理傳記

不論是從一般大眾中做心理個案研究，或就顯赫的人物做心理傳記，絕大部分都是根據佛洛伊德在本世紀初的作品中，有關心理分析的法則而來。七十年後的現在，除掉一部分撥人耳目不甚科學之外，●心理分析的人格理論依然繼續持有重大的影響。拋開精神醫學不談，佛洛伊德對當代最大的直接影響，似不在心理學，而卻在人文學(包含歷史)。(許多從事傳記或文化工作的史學家都在心理分析中找到靈感。)但若就間接而言，除了對當代日常生活的許多面向具有難以估計的影響外，佛洛伊德的思想亦影響了大多數人格理論的某些面向。此外，佛氏自身的臨床經驗及其文學的優美，也使

他的個案研究論著仍舊是人格與政治之後學者閱讀的對象。他早期曾以想像中的人物作為案例，如一九〇五年的「多拉」(Dora)、一九〇九年的「小漢斯」(Little Hans)及「老鼠人」(Rat Man)、和一九一八年的「狼人」(Wolf Man)。這些作品無疑地比起許多「真實」的歷史人物，更令後來的評論家所樂於討論。

⑥ 譬如利用名目學來玩文字遊戲，或者玩弄一些在某程度上存有潛在謬誤的命題。

一九一〇年佛洛伊德將其旺盛的精力投注到心理傳記方面，選擇了一個謎樣的人物達文西來作為診斷對象（而有關此人的史料是最不完整的）。此後，佛氏不再從事心理診斷，直到一九三八年才出版了摩西與一神教，而重返心理診斷的園地。事實上，該書所談有關心理傳記的部分並不算太多，佛氏似乎想藉此書來闡述猶太民族的歷史。但後來又斷斷續續地花費了許多年頭，與美國的一名外交官布利特 (William C. Bullitt) 合作，草撰有關伍德羅·威爾遜的傳記。該草稿保留到兩位作者都去世之後，才於一九六七年出版。也由於作者都已故世，使得人們無法分清佛氏在該書中所貢獻的份量究竟多少。

但佛氏對撰寫傳記技術之影響，並下單限於他偶而對知名之士所作的闡釋。一次大戰爆發之前，「佛洛伊德主義」開始有了分歧，一九二〇年代情況更加嚴重。當時對所有類型的知名人士都成為傳記作家的材料，其中如政治人物、宗教領袖，及其他與政治無甚關係的人物，如作家、藝術家，都有人替他們寫傳，使得傳記學進入了爆炸的年代。對於一部分歷史學家、許多的成名作家以及更多的個

人而言，心理分析似乎是哲學家開啓歷史分析大門的鎖鑰。

等到了一九二〇年代晚期，這一些著作已經足夠總彙成一大冊的書目注了（見 Fearing 一九二七年的著作）。當時有些書已經開始得到政治學界的認可。在少數對於這方面產生興趣的政治學家裏頭，以拉斯威爾為最有名。一九三〇年拉斯威爾在所出版的精神病理學與政治學中整理了有關精神病患者與類型分析的個案素材，此外，他對撰寫林肯傳記的精神醫學家克拉克（L. Pierce Clark）的著述也有興趣。（參考克拉克一九二一年及一九三三年的作品）。

早期的心理分析性傳記有些缺點相當明顯，以致遭遇到的誹謗甚至大過人們對它的關注。批評中所指出這些早期作品的問題，已在政治人格後設學的討論中有所披陳。它們認為這一類傳記時常：

- 一、將成人的人格一貫地歸結到兒童早期的經驗。
- 二、預先認定內部衝突單起因於性。
- 三、將特性相等於病理傾向及潛意識力量，認其通常未能充分考慮力量的來源及意識上的適應能力。

四、對行為的環境因素未予充分考慮。

五、時常根據不完整的資料來做診斷，而不能表明證據與推論的標準為何。

一九三〇年代中，人們對心理傳記的興趣較為減位，但二次戰後興趣又復提高，其原因有一部分係因為人們對於納粹黨過度的不理性行為究竟如何解釋相當有興趣。二次戰後數年間所作政治人物心理個案研究，就極少完全根據過去的心理傳記方式，來單獨而排外地引用心理分析。相反地，大部分

人或多或少自覺地要求自己免於陷入過去的牢籠。就針對政治人物所作的第二波段心理分析中，有些值得一提的貢獻，艾立森的兩部政治——宗教領袖之作：一九五八年的年青的路德，及一九六九年甘地真相；喬治夫婦處理十分得宜的伍德羅·威爾遜（一九五六年）。該書仍然沿用正統的佛洛依德式研究法，但比起佛洛依德及布里特的合著更為成功；一九六五年艾丁傑對德國社會主義領袖 Kurt Schumacher 從事人格分析；一九七三年塔克論述史達林的形成時期與崛起過程。其他如一九六三年羅高寫佛里斯托（Forrestal）和一九六六年格雷（Glad）寫 Charles Evans Hughes，比較上雖然較像是政治性傳記，並非從引言到結論都用心理性解釋法，但作者的歷史性敘述，係來源於全盤性的心理學概念，則無疑義。

政治學家所作的心理傳記傾向於明白引用臨床性論著以及傳記學家的推論邏輯。史學家則僅意在引介其診斷性結論，是按部就班地展開歷史性敘述。即便史學家們從事不可見的臨床式說明，借用的不過是其分析法，卻也使其從臨床式的鋪陳（clinical exposure）而獲得利益。這一點可以藉底下的比較而顯露出來。一個是布洛迪一九五九年情節動人的傳記，描寫一個心境複雜而苦惱的十九世紀的美國人史蒂文生；一個是多納（David Donald）一九六〇年及一九七〇年所寫的同時期的另一個心境複雜的人物——山諾。後一部史記，儘管十分費力，卻缺乏一個對主角內心動態狀況的內隱模式（implicit model）；若說要以外露的模式標準來繩量之，則差得更遠。結果，多納書中的山諾讀起來矛盾而莫測高深，而布洛迪所描繪的史蒂文生卻有著感情上的吸力。

有些著作同時包含個案及類型分析：武芬斯坦（Wolfenstein）在一個相當正統的心理分析性案

件中，提供了對列寧、托洛斯基及甘地三個人的生活、性格及個人發展的描繪（見其一九六七年的著作）。●但有趣的是，政治學家的武芬斯坦卻被心理分析家的艾立森（見一九六八年的書）所批評，說他過份運用了佛洛依德機轉性解釋技巧。巴伯一九七二年的第一部書：總統的性格；預測白宜內的作業發展出了政治領袖的類型學（後面將予討論），提供了從塔虎脫（Tatt）到尼克森等位美國總統的心理性傳記。巴伯避開了「深度」心理動態解釋法，但從深層心理學的註腳上，清楚地繪出了其對背景的了解。●

● 也請參閱 Wolfenstein 後來對邱吉爾、馬孔（Malcolm X），與尼采所從事的精神分析性解釋，詳見其一九六九年的著作。

● 請比較巴伯對尼克森所做之十分謹慎的歸納性精神診斷，與 Mazlish 一九七二年對同一人物採用的精神分析性分類。

### 政治行為者個案分析的證據與推論

雖然晚近的心理性傳記傾向於重蹈早期著作的覆轍，但心理傳記及個人案例研究通常在資料的提供、分析與解釋等項上，缺乏明示的孔道。政治行為者的個案心理分析，特別是大眾性行為者（public actors）的心理傳記，似乎已立刻成爲不可缺少的工作，而且連帶引發了廣泛的經驗性難題。人們對個案診斷的眞確性如何來予以評估，似乎是絕難明白確定的。

有些個案分析比其他更能令人滿意。從這些更令人滿意的研究中，吾人得抽離出標準，來爲個案

分析之證據與推論的嚴密性，作一種技術性改善的建議。下文的區分大致上是紮基在亞歷山大·喬治的討論（如一九六八年及七一年的書）上的。而這些區分也可以運用到政治人格類型學的建構與確認上。

心理診療學附帶有三種分析上可加以區分（如果經驗上重疊的話）的工作，其中最簡單的一種就是針對診療主體的「顯露性特點」（presenting characteristics）來描繪。如：個人較為穩定而可觀察的特質、對其環境的知覺、意識上的政治定向，以及在不同的環境刺激下其行動的規律類型。（參見圖三的第五、六和九區位）這種描述性資料的第一個層次，我在其他地方名之曰：「現象學」。（見筆者一九六九年著作，第四章）行為者的現象學在概念真空中是不能討論的，但若由一些採取激烈性的行為主義或心理分析學派的研究者，以其處理方式言之，則應能用概念化的字眼來討論。

喬治夫婦一九五六年對伍德羅·威爾遜的分析，也許是心理傳記中最有系統的。下列描述性因素可以在「現象學」的名目下來處置：剛直、自以為是、炫耀學問、頑固、在某些狀況下無意於妥協。一旦特質之描述進入更為細節及緊密的階段，則各種解釋上的問題就產生了。比如在某些情況下，有些似乎已經相當發展了的特質，並不會顯現出來。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個人的行為與已經發展成功了的特質之間有著十分不一致的關係。

因此威爾遜的剛直與涉及原則性論點時無意妥協的個性，在凡爾賽和約是否能在參院通過之危機，以及早年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為研究所所址而與反對者衝突等狀況下的執拗個性，在其他的情境下卻似乎戲劇性地消失了。在二十世紀開頭的十年中，威爾遜作了一次額外的轉變，從民

主黨的保守陣營轉移到了前進的一翼，並且有系統地迎合過去他所輕蔑的人物——白里安（William Jennings Bryan）。而在他初任新澤西州州長及總統的階段中，也對其所訂目標有著合理的妥協餘地。

這種不能連貫之情事有待解釋，而個人特質並列的現象亦然。此種解釋上的需要，引至診斷作業上第二個更難處理的階段。此即人格特質動力學的分析。動力分析最簡單的需要，其為對行動特質（traits-in-action）詳予描述，將之從一張張連串的幻燈片變成電影。但「動力」這個字眼就系統方面來說是曖昧的，而且涉及「內在動力」（inner dynamics）。其用意在將個體的內心過程、結構及需要和外露的現象學上表現相貫串。圖三之中，動力分析的焦點就集中在意識定向的功能基礎上（第四區位）。

一旦心理學的論述開始進入「深入」的內在心理結構，則解釋上發生不協調的情事是不可避免的。不但對前述內心狀態的所有概念究竟功用如何，每人說法不同；而且人格理論家們對「深入」心理結構及自我防衛，在概念化的意義及適當性上看法亦不一致。④喬治夫婦對伍德羅·威爾遜的動力研究包含的則是比較上少有爭論的因素，如環境的偶發性分析。為求得在權力的環境下，他樂於妥協；而一旦握有權力，則較無意妥協，除非那些權力不是他原先所認為的領袖「使命」的一部分。比較有；爭論的是，喬治夫婦主張在威爾遜統御的需要之下潛藏一種預存傾向式的條件，此一條件拉斯威爾在一九四八年時認定為權力追尋動機的一種來源——一種受了傷的自尊。最遭受爭論的，喬治夫婦將此一受傷的自尊比作一種壓制下來的對父親的敵意，此一敵意藉一種被其他男性統禦的強烈抗拒而

顯現，特別是針對這些威爾遜將之視為與其父親對他那種方式相同的人。

● 此種歧見在過去十年中由於曾有激烈論辯而十分明顯。其爭論重點在於行為論者的心理療法（行為療法）與較為正統的內視療法二者間孰善孰惡的比較。而內視療法的目的在於使患者自己明白，其內心的糾葛乃起源於那些表現病徵的行為。對於這類討論，Mikulas 曾經做過綜合性的論述，詳見其一九七二年的文章，特別是頁九〇—九二。

威爾遜成年之後，早年意識及潛意識上對父親的記憶仍持續地影響著，此類動力說明指出了似乎有必要引用心理診療學第三組的分析工作，亦即對某個人之成年類型，從事發展性的根源分析（圖三的第二及第三區位）。一個被列為疑問的政治行為者，其真正的「發展經驗」究竟是什麼？這裏沒有必要意含：完全採用「心理根源假設」的方式來處理「發展經驗」。「社會學習」理論（見 Bandura 與 Walters 一九六三年的合著）特別能夠適用在這個地方。此一理論引用了一個重要的發展概念——「模式化」（modeling）。在某種程度上，此一字眼與心理分析的一個名詞「認同」（identification）有重疊之處。

一如「動力分析」比之「現象分析」更少普遍信服力，「發展分析」更較「動力分析」缺乏信服力。發展分析之所以最不信服力，部分原因在於政治分析家缺乏歷史人物生命中關鍵性時期的資訊。此外，心理發展的複雜性以及行為科學家用來檢視人類發展的假設之理論及經驗來源十分薄弱，使得心理根源解釋法相當不穩定。所幸從政治分析的立場，發展性解釋處理的東西，在時間上與因果

關係上，與政治分析家所想解釋的行爲產生距離最遠。因此心理診療在這方面的本質上困難，就整個來看，並不會是致命性的。

喬治夫婦處理威爾遜這個案例算是很幸運的。因爲關於威氏早年的事情曾由某一家庭保存著記錄，並且有一位傳記學家廣泛地收集了威氏親朋戚友的資料。或許是動力性假設所影響，喬治夫婦傾向於指認一系列的發展性經驗，這一點其他的傳記學家不曾注意過。而此種經驗卻有助於支持其動力性的解釋。他們注意及威氏與其父親之間極其密切、感情上又有相責相成的師生關係；伍德羅早年時期由於在語言技巧上無法達到父親高度要求的標準，而造成他後來非常強調自己政治行爲上有關這方面的能力；以及老威爾遜常在大庭廣衆下嚴厲痛責其子。早年的這些經驗，根據喬治夫婦的看法，造成一種類型——威氏潛抑其反抗父親的苦悶，而反過來將父親理想化，進而決定性地引導成爲與某類男性共事的一種巨大衝突。

根據現象的、動力的及根源的解釋方式，底下五種簡要的描述步驟似乎極有助於個案分析中，導入一種系統性的證據與推論。

一、目前如果可能的話，至少可以在第一個層次，最理想的則爲在所有三個層次中，將個體心理功能假設予以「明白定式」(explicit formulation)。就整個來說，這些並不是先驗性假設，不能使研究者於進入有關主題的資料時，得到詳盡的路線。但到目前爲止，分析者在提出有關現象類型、潛在動力以及發展關係的假設時，應該說明此種方式潛在上仍有錯誤的可能。

二、解釋與(所根據的觀察性)素材之間應加區分。解釋比起其觀察性基礎更容易造成爭論，雖

然吾人亦需認清，在完全沒有解釋性利益的狀況下，觀察也並非從來不根據理論 (never “theory-free”)。

三、特殊運作標準應該建立，俾便於從事觀察性陳述時，滿足引用各種名詞的需要。

四、在個案分析，一如在多案分析裏頭，有可能集中在某一有組織的途徑上，以便建立「信度」。從這一點來說，縱使個案分析家只處理單一行爲者，但若能認清該行爲者亦與廣大觀察對象產生多種關連，應該會對分析工作大有幫助。在臨床心理學之中，正把個案分析每個主題的素材，分成許多項目來做定量處理，而且有所展進。(參看 Davidson 與 Costello 一九六九年的書：Barlow 一九七三年：S.R. Brown 一九七四年)。對政治行爲者所做的個案分析，也正在從事相同的努力，雖然這樣一來產生某種危機，人們會用無效的科學主義來替代有效的臨床想像。●一般來說，藉著區分描述性與解釋性素材，表明解釋性的標準，並引用判斷小組 (不必要局限在目前所流行的量化上面) (employing panels of judges)，則信度的發展與建立應爲可行。

② 此處沒有任何否認「臨床想像」及「設身處地體認」個案分析上的重要性意味。這些是發現邏輯 (the logic of discovery) 的各個面向，而我這裏所關心的，則在「表明」(demonstration) 一項。

五、最後，個案解釋除了考慮信度之外，亦需注意效度。這裏涉及一個基本問題，即以多案分析爲基礎所成立的命題，是否可比照爲個案分析的理論命題，而且又有經驗基礎？(讀者如果想進一步了解，可參看筆者一九六九年著作的第三章。至於評估效度的問題，從心理學當今思潮言，可參考

Fiske 一九七一年與一九七三年的著作。) )

## 政治行為者類型的多案研究

### 政治類型學的論著

在類型學這個標題下，我包含了整個明白或隱晦的涉及分類之多種案例分析 (multi-case analyses)。因此，類刑學在這裏被用來當作一個傘性名詞 (umbrella term)，其可能涵蓋的範圍，從直截了當在羣衆中劃分界限的分類，到個人特質的類別，如高度或低度自尊心、自我的力量等；以及於精細的「徵狀」分類，將各色各類五花八門的獨立特質羣，藉不同的來源、動力與行為連鎖而予以認定。如權威主義類型。在過去，此一名詞 (即「類型學」) 所指的用法，僅止於將一個持續性變數加以分類而已，尙未到完善運用的地步。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政治人格類型學並非始自佛洛伊德，人們只需要注意到柏拉圖所著共和國的第八及第九冊，其中提及貴族型 (the aristocrat)、民主型 (the democrat)、榮譽型 (the timocrat)、暴君 (the tyrant) 等政治類型。在兩代之間，兒子常有承襲乃父缺點之現象。(對於共和國一書這方面的論點，晚近有拉斯威爾於一九六〇年提供了註解。至於涉及心理分類史方面者，參考 Eysenck & Eysenck 一九六九年書，第一至六章)。

精神醫學方面，雖然 Kraepelin 的精神病分類法是十九世紀的產物，但他分類時所採的規則，

就大體特性結構來說，仍不失為基本的來源。頂多不過略加修正就可以了。他所引用的規則，通常都有一些非心病之人格來做為類比的對象。佛洛伊德臨床上涉及者，大部分是有關神經性而非精神性之病症，使得他朝此方向來指認許多人格的徵狀。其中最著名的是口腔型、性器型及肛門型。性器型者以三種獨立之中心特質為最，即：頑固、吝嗇，而有條不紊。他所描述的特性都曾經合理確證，而且頗能令人信服。（見 Kline 一九七二之著作第三章）。

二十世紀人格心理學有另外一個主要傳統，出自人格的檢驗，其為：心理測量分類(psychometric classification)。此種分類也許墊基於多少較屬中庸性質的心理特質清單 (on more or less eclectic inventories of psychological traits) 或者在於由各種人格理論所建立的檢驗上面。一九七〇年的那一冊研究人格分類的新途徑，係由 Alvin Mahler 所編纂。這書一如美國精神醫學會一九六八年對「精神失調」類型從事編集工作，也對當代分類方式的多元性紛歧提供了簡明的引導。（晚近對於人格類型學問題的探討，有 Dahlstrom 一九七二年的書，相當值得參考。）

政治心理學中，分類的開山性工作為拉斯威爾所發動，他首先處理的是官能症的心理分析性解釋。雖然，在其中他也預見了心理測量式的政治研究法，並且運用了精神醫學家對心理症的診斷。拉斯威爾在他那部書名用錯了字眼的精神病理學與政治學中，企圖論證其心理症的「臨床仿製品」(clinical caricature) 能提供政治分析家一幅「純粹的」，如強化過的，人格特質的型態，因為人格特質確實存在但非藉心理症的角度不能觀察，然而在處理的實際狀況中，拉氏並未能使我們看到許多人格病理影響政治的例子。有鑑於心理症角度仍有此用途，並因該症患者的詳細資料找尋方便，

拉氏覺得精神患者羣是研究政治與人格關係的可見來源。他的建議後來為路瑟福（於一九六六年的書中）所接受運用，來研究伊利諾州艾爾金州立醫院（Elgin State Hospital）的患者。該書發現精神診療類目與政治依變項間具有充分而強烈的相關，顯示拉氏之途徑似乎值得做進一步追索的必要。一如前所提及，路瑟福發現被診斷為偏執狂的病患不論在醫院的自治體系下，或復原之後在真正世界中，都具有高比率的參與現象。（讀者想知道條件如何訂定、如何衍申至非病患羣體者，請閱一九七一的著作。）

拉斯威爾本身對於政治類型學的貢獻是在介紹政治領袖及其他行動家的三種分類，亦即：游說家、執行家、與理論家。任何單獨一個政治行為者也許屬於某一類型，也許是多個類型的綜合。這種正方興未艾而且有效的類型學，是有一套明白的邏輯存在著。這一點在拉斯威爾的分類之中，就可以發掘到。拉氏的分類法，由於在其一九四八年的權力與人格以及一九五一年的民主性格兩書之中另外加上一些東西，而更形精緻。晚近A. F. Davies於一九七三年的專文中提供了拉氏有關類型學的最後資料，文中十分審慎地將其最初的定式（initial formulations）加以綜合，並且配合有關的經驗性發現，而將這些定式予以並排。拉氏在他一九三〇年的書的第四章及一九六八年的書上面，建議性格分類學應該要從「核心」（nuclear）類型開始。此一類型足以在某些中心變項，或變項與變項的關係上有轉實的餘地。而其附從物亦因此得以系統地建立。拉氏將此一結果所生的徵狀稱作「相關的」（co-relational）類型。對於這個「性格類型」（character type）當時面向的分析，因此再被擴展，用過去生活中該性格類型之先決條件為基礎，來從事發展性分析（亦即「根源」分析）。②

● 拉斯威爾的三個名詞與筆者的現象學——動力學——根源學之區分正好並行不悖。

拉氏的作品引致進一步的研究。這些政治的或有關政治的類型中，有相當部分事實上並未局限在系統的說明及確認上面。比如 *Riesman* 著名的三分法——傳統、自我、及他人取向（見 *Riesman, Glazer, and Denney* 一九五〇合著），*Riesman* 後來（一九五三年）也承認，將個體的社會行為與其內心定向看得同樣重要。*Riesman* 的類型學並不在內部心理動力上面下太大的功夫，固然吾人亦承認他在其所定公式的心理層面上，以及在針對自我——他人指向的連續表發展一套方法上，曾從事經驗性的努力。（參看 *Lipset* 與 *Lowenthal* 一九六一年的作品。也參考 *Riesman* 的類型學之出處——佛洛姆一九四七年的類型學。）

截至目前為止，政治心理類型學中討論最多、引起的爭議也最多的是權威人格。此種類型學在一九三〇年與四〇年代發展出來的某些面向，至一九七〇年代始流行，主張「新生的一代並不特具某種強烈的性格傾向」的文章指為「時代錯誤」(anachronistic)；見 *Sanford* 一九七三年的著作)。但近年來亦有如 *Wilkinson* 者（見其一九七二的著作），卻能把權威類型運用來從事政治趨勢的大型調查研究。吾人在此，最重要的一點並不是討論權威性格是否為當代主要徵狀，而是在說明權威性格的論著豐富，其間可涉入多種爭議，這種現象或許足以令此類作品成為描繪政治與人格問題，最富饒而單一的資源。

縱然有關「權威人格類型」並無唯一的「正式的」模式存在，但實質上類型學的討論都同意在類

型學上用核心定範性格 (nuclear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的說法。即具備權威人格特性的個體，有一種順上壓下的態勢。每一個體對順從與壓制的傾向之不同，在一般觀念的羣衆心理學 (folk psychology) 中也許被當作是種主要的成份。這個主張在一九三〇年代中獲得了一個形式智慧建構上的地位，其所以如此，乃因學者們不得不對極權主義的興起（特別是德國的國族社會主義），<sup>②</sup> 以及在此等政治體系中領導與服從的離奇關係，加以研究，來尋找足以令人了解的解釋。

● 若論及「權威人格」之建構功勞誰屬，則不可能祇提及某一個人。此種學說在一九三〇年代甚囂塵上。而在一九四三年馬斯洛 (Maslow) 的論文中採取做爲題目，名爲「權威性格的結構」。Edwards 一九四一年對法西斯態度作過心理測量研究。此外更有流亡的德國學者們在權威與家庭之研究（該書爲 Horkheimer 在一九三六年發表），所撰寫的多篇報告。其中之一的弗洛姆，後來繼續將此一建構公諸於世，把德國境內極權主義之所以興起，用佛洛伊德——馬克斯式的分析法予以剖析。並且藉之探視當代工業社會的心理根源，而著有逃避自由一書，於一九四一年出版。

對於希特勒德國權威主義施行下，羣衆集體的非理性現象，盲目遵從希特勒以及納粹的種族優越感與歧視，學者們若想從心理的角度來解釋，會自然而然地走上從「個體」感情受到干擾——即所謂的心理分析——來解釋的路子。一九三〇年代及一九四〇年代早期對於權威類型的記述，有另一點值得提出來，那就是信賴馬克斯主義者將個人與社會層級予以貫串的說法。佛洛伊德將權威主義視同偉伯 (Weber)的清教徒倫理，並認爲這種性格類型是資本主義經濟運作上的一種後果，以及功能上的需

要。後來的權威主義作家（其中以阿德諾諸人合寫的權威人格最為著名），傾向於將非社會主義的工業社會，視同具有向極權主義屈服的潛在危險性。因為權威主義者在此種工業社會中遍地皆是。

上述的想法以及社會心理測量技術都在柏克萊計劃（Berkeley Project）中表現出來，有關此一計劃的詳細情形請看阿氏的權威人格。該部巨著泛論各種涉及反閃族態度與其心理相關的解釋性研究。截至目前為止最直接的影響屬F量表。表面上採用非政治的、非意識型態的問卷項目，似乎在避開政治及種族歧視，而指涉有關兒童遵從性的意願，社會如何處理性異常、迷信，某人對某人感覺所表示的態度等等。實際上各項目所顯示的內容則係潛藏人格徵狀的指示項，其中蘊釀著以感情為基礎的種族偏見及順上壓下的需要。「F量表中的F原係人格指向支持法西斯主義者。」

權威人格在一九五〇年出版，成爲了心理學研究的一個特殊的媒體。一九五八年 Carnie 與 Cook 所寫的一篇（威認並未將有關資料搜集完整的）目錄學文章中，就已經列出了兩百六十個涉及權威主義的研究。而到了一九六七年 Kirscht 與 Dillehay 就發現有未爲權威傾向著作綜合編纂目錄的必要。不幸的是大部分研究都機械地使用F量表，而該量表少有明白從人格的建構來論述權威傾向者，把阿德諾等的合著中所用的理論性假定予以簡單綜合而相當成功的，其爲該書（權威人格）作者之一的 Sanford 於一九五九年的文章。

然而，早在一九五四年，想藉用權威傾向研究來完成心理探索的初衷，無疑地，已經開始有消褪的迹象。當年出現一本批評性且具影響力的著作——權威人格的範圍及方法（Christie 與 Jahoda 一九五四年合著），其中多篇文章對於人格及社會政治行爲的分析，有著根本性的貢獻。特別是該書對

於權威人格一書的批評，有助於人們發展出滿意的人格與政治（不論是類型上的或者其他特性的）研究，其中尤其相關的有底下數項：

一、F 量表與人格徵狀究竟真有多少關係，有關的證據並不充分。特別是在表面特質的特殊類型（particular pattern of surface trait）、無意識的人格動力，以及發展性經驗，權威人格一書更少論列。

二、權威傾向的作者似乎習於專注在右翼的權威傾向上，結果竟把左翼定向視同相等於心理健康。●而對於底下數點似乎未能充分注意：甲、人格傾向會用多種途徑來宣洩，左翼份子也如右翼份子，有著權威性傾向。乙、具有不同的潛藏人格結構的人，會產生相同或相似的信仰體系，當然其間在力量與持續性上或許會有不同的程度。

●這是一些人的想法，認為後者在論述學生活動的心理狀況之著作中復活了。詳見 Bay 一九五八年的書，及一九六七年的文章；Berns 一九六一年的文章，及 Hampden-Turner 一九七〇年的書。特別是前兩位作者。

三、最後，權威傾向的作者們習於將「個人」權威傾向輕易地連到政治「體系」的風氣上面，而其間相通的管道，就是那些具有權威性格的個人。

除了權威人格研究的範圍及方法書中論及的困難之外，不久又加入了另一複雜的爭論，重點在：「反應組」（response set）是否應對研究權威傾向學者所發現某些主要原則負責（譯按：亦即反應集

合與主要原則間是否相關)。一九六七年 Samelson 與 Yates 對於此類研究的來源曾提出廣泛的比較，仍執意於發現這一方面的可能性。(對於有關人格的一般性試驗之爭論在近日延續的情形，請參閱 Bentler, Jackson 與 Messick 一九七一的合著，Block 一九七二年的書，以及書中所提及的有關資料。)

權威傾向研究中「反應組」的主要問題，其形式是這樣的。早期權威傾向調查研究的統計基礎，大部分根源於 Likert 量表格式「同意——不同意」正相關的試驗。在 F 量表上得分高的個人，也似乎會在反閃族 (A-S) 以及政經保守主義 (PEC) 量表上得高分。但後來有人發現，所有這些因素都與社經和教育地位有共變的現象。亦即一個人的社經地位 (SES) 越低、教育程度越低，則其 F 量表、A-S 量表，以及 PEC 量表上的得分越高。

有許多原來量表上的共變現象，很顯然地是用來測量權威傾向之試驗所刻意製造的結果。不同量表中所有項目都用正面字眼來修飾，以致於導出「同意」反應的高分。某些個體——特別是這些社經地位及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對於試驗題目的「內容」如何，並不怎麼反應，而卻對受試時環境內的氣氛有著特殊的考慮，他們多多少少會自動地圈選「同意」，特別是對一些含混而冠冕堂皇的題目。簡單地說，低經濟與教育地位的人之所以傾向於高分數，似乎關鍵在(若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具有一種傾向「同意反應組」的功能。因此，美國的投票人 (Campbell 等一九六〇年合著，頁五一—五二—五三) 書中就提到如果調查研究者在文字修辭上做了某些轉變，則會提高 F 量表「不同意」的反應造成高分的權威傾向，而此一結果顯然與原先的「標準發現」相反。在 Campbell 等人的調查裏頭，具

有較低社經地位與教育程度的受試者，在權威傾向上「低於一般人」。很顯然地，在F量表上對於諸如：「服從與遵敬是兒童所應學習的最重要美德」、或「心智健全的人從不會想到需要傷害其摯友或「親人」等題目，都習於回答「同意」的人，也大半會同樣地在把上述題目用否定方式出現時圈選「同意」。●似乎，如果人們認為題目本身相當含混，則會把兩個正相反對的陳述，都一律回答「同意」。此一現象值得注意。

●也請注意 Carr 用 *anomie* 量表來測量南部地方貧窮的黑人。他是同意該量表的每個觀點的。（參考 Carr 一九七一的文章；及 Proctor 一九七一的評論）讀者如想閱讀一種書目學性質，其中介紹F量表，*anomie* 量表以及其他量表的不同看法之文章，請看 Bonjean, HHI 與 McLemore 一九六七年的合著。若論及尋求以正（同意）負（不同意）兩面反應組合來做為人格之測量者，請看 Couch 與 Keniston 一九六〇年的合著。討論 *anomie* 與疏離感 (*alienation*) 之關係者，請看 Yinger 一九七三年的專文。

「反應組」爭論的結果，發展出了多種經過修訂、改換與混合的F量表。（見 Titus and Hollander 一九五七年；Christie, Havel, and Seidenberg 一九五八年；R. Brown 一九六五年著作的第十章；Samelson and Yates 一九六七的書）。在「一九七〇年代，亦即柏克萊計劃之後廿五年，有關採用這些量表內的變項來從事研究的報告仍然時有所聞，而人們也曾企圖要把不同的發現予以調和，並加解釋。一九七二年所出版一系列涉及權威傾向研究的報告（見 Greenstein 一九七三年著作的第四五一頁），其中在某些知名的學報裏頭有七篇文章將注意的焦點投注在權威傾向、F量表

以及相關的題目上。似乎在研究者的心目中，權威類型已然在經驗的事實中，成爲不可或免的重要題目。然而，過去的如此，不必象徵未來將持續如此矣。

以上對於權威類型的理論及研究之曲折歷史所提出的綜合討論，描繪了類型研究各色各樣的陷阱、問題及展望。特別是針對此一研究在第一個例子裏所發現，在概念化上的不充分明白清晰，以及此種研究機械地倚賴在方便而做作的心理測量過程的有限範圍內。提起測量，Samelson 的評語十分中肯，但他的觀點卻太少人注意到。

……對於本作者來說，Likert 量表的資料並不適合產生一個滿意的解決方案，來解答在 F 量表上的「內容對反應組合」(content-versus-response-set) 的難題。因為藉著未定範圍 (unscated) 的項目以及多重選擇反應，在所需要的資訊中，有太多要首先被置入資料羣，而這是十分困難的。一如曾有其他人所提到的，或許我們應該要給較多的問卷，而在更細與更深的地方來研究態度的問題。(見 Samelson 一九六四年的書，頁三四二)。

權威人格研究的支流之一，是教條主義 (dogmatism) 的論列，羅基 (Rokeach) 在一九六〇年所寫開放及閉鎖的心靈會有極饒趣味的報導。羅氏尋找出一個有選擇性的類型定式以及測量過程，免除意識型態內涵的限制，也不致於犯上席爾斯批評權威人格所曾犯「對左翼權威傾向」不敏感的弊病。羅氏所探指認信仰所在的工具，有意擺脫研究對象政治立場的影響，但不幸的是由於他用來說明

的憑藉，是針對一個由十三個英國共產黨員組成的團體，而使研究停留在一個單獨而左傾的比較上面。在開放與閉鎖的心靈一書的附錄裏頭，羅氏小心翼翼地條列每項教條主義的分數，其中含有右翼與左翼團體，企圖藉之建立教條主義量表免於意識型態限制的地位。在許多例子中，他所尋找的兩種團體對於量表上各個不同的項目都有正面的回答，並且獲得高分。而奇怪的是這些項目中的一部分似乎與上述團體與上述團體所明白標揭的意識型態相接近。由於這個緣故，羅氏量表企圖測量內在的人格動態狀況，事實上的確有可能消除掉研究者本身的意識定向及態度。然而羅氏許多其他的發現（涉及解決教條主義高或低分的難題之能力者）則提出教條主義可以是政治分析家所要處理的一個類型。

人們之所以對政治人格類型意識型態之認定發生興趣，其原因固然很多，而早期的一個就是克里斯帝（Christie）頗能引人入勝的馬基維里型研究。由於人們警告從權威傾向來研究在測量上會生困難，因此克里斯帝把著作的發表延後了好幾年，俾將所設計的「馬氏」（Mach）量表做得盡善盡美。馬氏量表並不會對「同意——不同意」的反應組織過分敏感，而包含強迫選擇。此外，克氏從事許多確證性及其他經驗性的研究。（見克里斯帝與 Geis 一九七〇年的合著，以及 Guterman 一九七〇年的書）一如羅術（The Prince，或譯君王論）一書的作者（譯按即馬基維里本人）所稱，馬基維里測量目的亦在設法認出個體如何處心積慮地完成控制性的社會及政治角色——這一類個人，較少受人際關係的感情因素所影響，而注重傳統道德及意識上使命感的強度。這種人從整個精神病理學（gross psychopathology）看來，極少利用其辯性來作為「交換機」（operators）或「控制器」（manipulators）。

克里斯帝的調查研究顯示輝煌的成果。他把早期的測量技術再加修正，使之更盡圓滿，然後再予運用。其謹慎而妥善編排的實驗性調查，更能進一步將表面看來似乎矛盾的一些發現變成可以解釋的東西。馬基維里傾向之研究（克里斯帝及 Geis 一九七〇的書）所採納的研究途徑，目的在化解其他研究之間明顯的矛盾。事實證明十分成功，完全能配合本章所強調的政治與人格間關係的交互作用。馬氏量表的高分及低分會不會對某實驗性刺激採取不同的反應，主要涉及情境上的三個「調節性變項」（moderator variables）。例如：「情境中的某些既能助長又會妨礙傾向歧異的特性」。這些特性涉及有：是否該情境要求面對面的交互作用；是否該情境容許即興式的改變；以及該情境是否會引進「不相關的影響」，而可能將「非馬基維里傾向」，從克氏與 Geis 要求其研究對象扮演的各種工作中抽離。（見克氏與 Geis 一九七〇合著，頁二八五—二九四）。

上面剛討論三種量化的類型學著作，處理的是權威傾向、教條主義，及馬基維里傾向。這些作品比之早期的心理測量研究更能產生實質的興趣，也更能製造可信的並經分類的發現。因為在早期的測量裏頭，標準人格及政治態度清單，失之簡略而不審慎，並且彼此相互牽絆。而運用的對象通常僅是由大二學生所組成的原型母體（archetypical population）。對於這種「特質——態度相關性研究」，史密斯、布朗諾及懷特在評論政治與人格的作品時（見一九五六年著作，第二章），指出早期的研究（如：以內向——外向作成光譜來比較急進與保守），相關性低，而且並不連續。

我們從反應組的論證裏頭，逐步發現早期研究之所以沒有累積性的原因之一。對於依變數與獨立變數，他們太常運用不能令人滿意的辦法來探討。一方面是測量技術太「弱」，以致無法開拓人格與

態度的領域；另一方面則因技術的太「強」，結果產生過多人造的相關。除此之外，由於無法系統說明「觀察情境中涉及態度與行為決定因素的方法」，因而使得研究特質——態度的學者抱怨自己無法達到持續性，因為他們無能將調節變數置入研究調查之中。

總而言之，縱令困難無法完全消除，卻也可以藉令人滿意的研究設計，而達到實質上的緩和效果（即把困難的程度減至最低）。有關於細設計、嚴格概念化的心理測量研究之各種模式，讀者似應從麥克勞斯基（McClosky）一九五〇年代晚期對全國性以及明尼蘇達州的公民及政治領袖，所做一系列重要研究報告下手。此一經過週詳設計，具龐大樣本的研究，係利用最具效度而方便的人格——態度量表。而麥氏及其同事也一直十分謹慎地在從事這一方面的發掘。（參考：麥氏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七年的書；麥氏與Schaar一九六五年的合著；Di Palma與麥氏一九七〇年的合著；Sniderman一九七四年的書；以及Sniderman與Citrin一九七一年的合著。）麥氏多少年日積月累下來的研究發現，即將以書本的厚度呈現在大家面前。該份厚重的報告足以使人了解；一如克里希帝在他對馬基維里傾向的綜合報告所言：人格與政治間在實際世界中的複雜關係，會造成各色各樣的反應。其中與目前較有關聯的因素如下：

一、麥氏（與 Paul E. Meehl 及 Kenneth E. Clark 合作）所發展出來的一般性問卷，其成長及效度足以提供人們在一次調查中評估許多的項目：政治態度（如：孤立傾向）；意識型態定向（如：階級的保守主義）；社會態度（如：沙文主義）；極端的政治態度；對當前問題的看法（如：對聯合國的信賴）；對政黨體系的態度（如：初選會的利用）；參考團體的認同；對民主價值與人權

自由的使命感；社會及私人調適性如何的指示項（如：*anomie*）；各種臨床的心理特質（如：對曖昧及敵意的容忍）；以及當然要包括的標準社會心理測驗之指示項的全面排比。此一問卷至少具備兩種特色：甲、它象徵對美國人政治信念及行為加以多面測量的偉大抱負；乙、它代表大部分調查測量技術所具有的精細而嚴謹的發展，其中它避開了僅賴一、兩個項目來作為指示項的公式，而且進一步發展出多項目量表，以便在一系列持續的研究中產生交互有效的後果。

二、麥克勞斯基一九五八年對意識型態與人格關係的先鋒性研究，顯示了保守主義某一主要面向的強烈心理根據。（這裏所謂的保守主義意思是古典的保守傾向，或者對變遷採取古典定向。）

三、麥克勞斯基與夏爾（*Schar*）對 *anomie* 心理學的初度分析。在此之前，*anomie* 被看成一種社會學上的現象，但麥氏及夏爾發展出一套補充性的心理模式，告訴人們某些人格特性如何來獨立地影響到 *anomie* 的發展。相當具有說服力。

四、麥氏一九六七年對孤立傾向的心理有精闢的分析。其中闡示介乎孤立性態度與許多反對性人格特質間所具有的強烈關連。這種所謂「反對性人格特質」（*aversiv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指的是如發生在一般公民和具有政治影響力者裏頭的一種無彈性及敵意的特性。

五、Sniderman 與 Citrin 一九七一年對人格與孤立傾向間關係的分析，表明了孤立主義的信念構架，係依賴在是否孤立傾向由人格所發動上面。（譯者按：本文對於 *Isolationism* 一字，或譯「孤立主義」或譯「孤立傾向」，端視其前後文而定。）職是之故，政治態度的心理根基為何，是個頗值得研究的重要題目，因為那些根據個人需要來形成政治觀點（至少對於外交政策方面）的人士，

對其他的政治問題的看法，也很可能大不同於以其他因素（如：社會學習）來形成對外政策定向的人士。

六、Sniderman 一九七四年對自尊 (self-esteem) 的分析中指出將全球的（而且時常被鬆散地定義的）人格特質化整為零，分開來處理的重要性。自尊可以被化解為三個面向，此即：個人自認沒有價值的感覺，在社會上有自卑的感覺，以及人際間競爭的感覺。這三面中祇有第三面與判斷某人是否具有政治上的主動，或則是否為政治領袖具備關連性。

七、Di Palma 與麥克勞斯基一九七〇年對於同一性 (conformity) 所做的心理動力分析上，指出相同的人格特性（如：自尊的程度低）在實驗室中如何地趨於同一性，而在實驗室外，卻又如何地時有越軌情形。他們廣泛地採用教育來做為調節性變數，來研究人格變數之間的關係，以及掌握非典型的 (atypical) 政治態度。（有關政治上不合常軌的行為與精神病理學間的關係，似乎以未受教育的人，比受過教育者較具有關連性。）

八、Sniderman 一九七四年對人格與政治領導關聯的研究，勾繪出把研究重點從特質分析轉移到輪廓分析 (profile analysis) 的重要性。特別是，雖然自尊程度較低者，具有固特性的某些特徵，導致終止政治參與，但那些自尊程度既低，而嚴格的程度則高的人，卻更較自尊與嚴格程度都低的人，易於表現政治上的積極性。簡單地說，這兩種特質如果分開來檢視，都會指向禁止參與的路子，但如混合在一起，則反過來變成了積極的參與。這裏頭使我們發現了一個更為一般性的原則，那就是研究的重點不祇應放在人格與情境的互動上面，而且更要注意到各種人格特質間的互動關係。

對於政治人格類型的研究，不從心理的範圍，而直接注意政治舞臺上行爲者，以巴伯政治領袖四型之分類爲最著。巴伯一直鏗而不捨地尋找發展類型分類之準繩，以方便預測和評估官員們的行爲。他將一對二分變數予以交叉分類，而每一個變數又可以被視爲一條線上連續的點 (points on a continuum)。這些他在先後兩個研究中用法有些不同的變數，涉及個體「行爲的層次」以及比較一般性之對政治及生活的「感情」。

巴伯首次研究康乃狄克州於一九五八年選出的議員（參考巴伯一九六五年的書）。對受測者使用問卷法，同時並將受試羣體中的某一分子集合拿來做進一步的訪問錄音。結果用高與低兩種層次，歸納出這些議員的立法行爲。測量的依據，在行爲方面，以演講次數多寡作爲客觀指示項，來看活躍的程度；在感情方面，則以其會議報告內容所表示的意願或非意願，來檢視感情上的正面或負面意向。結果得出四種組合——制法者 (Lawmakers)、宣傳者 (Advertisers)、旁觀者 (Spectators) 與勉強者 (Reluctants)——而分別在社會的及心理的特性上具有特色，詳見圖四：

巴伯本人也爲自己所發現四類型之每一類的結果而訝異。假如政治參與只不過是對政治上正面定向的一個函數，則演變出來的結果是，大部分議員會被歸納爲高度參與、正面情感的一組，而其餘的大部分則爲低度參與、負面情感的一組；亦即前者爲「制法者」，後來爲「勉強者」。然而事實上四組裏頭人員集中的情形則大致是相等的。巴伯因此曾經思考過一個問題：爲何某人並不喜歡該角色，但卻做得很積極主動？相反地，爲何某人喜歡該角色，但卻不會積極主動地去追尋？巴伯手邊資料提供了答案，而將之在圖四中簡潔地陳述出來：主動但負面情感的「宣傳者」樂於尋找知名度以推展事

圖四：巴作對議員們政治風格之分類

| 對立法角色感的情感  |  | 感<br>情<br>與<br>參 |
|--|--|------------------|
| 面<br>負   | 面<br>正   |                  |
| <p><b>宣傳者</b></p> <p>表現挫折感，易興奮。藐視其他同仁。對引起注意比對實際政治問題還關心，通常多屬從競爭激烈地區所選出的事業基礎未穩定的律師，常爲了意識上的經濟性動機，及潛意識中補償其權力需慾而來尋求人們的注意。</p> | <p><b>制法者</b></p> <p>富理性；喜於解決問題，政策上有定向，敢於接受挑戰，通常多屬從競爭激烈地區所選出的教育程度高、事業相當成功的律師。</p>                                    | 高                |
| <p><b>勉強者</b></p> <p>地方上的長老善宿，基於責任感而出任斯職者，係競爭不激烈地區所提名者，斯職在該地區中無人爭取，而必需尋找某人充數。</p>  | <p><b>旁觀者</b></p> <p>喜於從別人的認定來得到滿足與自尊（如 <i>Ridgman</i> 所謂的他人取向類型）；時常因缺乏旁人的敬重而回到老家去尋求補償。係競爭不激烈，無人願意擔任斯職的狀況下得到提名的。</p> | 低                |

業，並且似乎對政治舞臺有各色各樣的敵視及侵犯性衝動。不主動但正面情感的「旁觀者」則趨向於從政治的認定中得到一種「有價值」的感覺（Sense of worth）。他們一如「宣傳者」，所要求於政治的，不是他們能貢獻出什麼，而卻是能夠得到些什麼。

巴伯在一九六五年出版的書中（頁二一九—二三三）接著主張，主動式政治參與喜於從一般大眾之中，選擇感情上不同於常人者來擔任。因為做一個新興的但並未廣泛受到尊重的行業——從事政治——在心理上要有相當高的水平才行。要從地方性的主動參與層次昇高到競爭議員職位，勢需一股額外的感情上的推動力量。巴伯認為這種動機可能來自不滿與緊張。這些特色在宣傳者與旁觀者兩類上是真確的，對勉強強者而言則或許在某個程度上是如此；這種動機也可能來自正面的力量，亦即主宰的需慾、喜於化解難題（樂於助人），以及接受挑戰，如制法者所表現的特性。如此一來，若以自尊之類的感覺來做為人格變數，而以一般大眾比較時，上述迫於議員職位的人就似乎可以用兩個模子來加以撮合了。

巴伯強調動機性歧異，而大不同於其他政治人格學者以單獨一種人格特質的分配為唯一標準，來檢視「所有」政治人物。就如拉斯威爾早先所提出的（見其一九三〇年著作第四章），真實世界中的個體在完成過去所謂政治角色時，由於太具紛歧性，因此訂不出統一的品質。爲了這個原因，拉斯威爾乃尋求認出「功能上」性質相同的角色（如權力的追求），而尋找的方向則放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如除了政治、政府之外，亦注意教會與商業。此種在政府與政治裏頭，動機上的多模式本質使我們無法依照處理人格清單之程序，來尋找政治人物「單一的」人格特質，來與非政治性的人物相區分。

(如 Hennessey 一九五九年的書、Schwartz 一九六九年，與 Di Renzo 一九六七年的著作，並參考筆者一九七〇年第二部書，及一九七三年著作的頁四五六—四五七)。

緊接著州議員的研究，巴伯繼續對二十世紀的美國總統從事分類，資料取自傳記性的文章。而於一九七二年出版其研究結果名曰：總統的性格：預測白宮裏的行爲。早於此書者，有一九六八年第一部及第二部作品，一九七一年的著作，亦論及相同的主題。以主動、被動來區分總統並不太難。柯立芝 (Calvin Coolidge) 素以被動聞名，他每天的睡眠加上午間的休息共需十二小時。而其座右銘是：「夠好就好。」(“Let well enough alone.”)。他的被動性格是其「慢慢來」(go slow) 政治哲學的最佳表現。繼任者胡佛，也同樣持有保守性政治哲學，但卻明顯地是一個積極主動的角色。胡佛一直都在工作，不然也是在行動；打從晨間體操開始，直到初更之後的內閣會議，總是在忙碌之中。

有關情感範圍大小的測量，在總統身上就比議員困難多了。因為政壇競逐之激烈足以排除掉那些對總統一職完全缺乏興趣的人。巴伯因而提出另外一種正——負情感測量法，從塔虎托到尼克森加上安德魯·詹森 (Andrew Johnson) (對於後者，請參閱巴伯一九六八年第一部作品)，把這十二個總統的歷史性資料予以研判，結果相當顯著。本測量的標的訂在他們「對人生的一般看法」上面。巴伯這裏所指涉的特殊標準是：這些領袖如何來「看自己的所做所為。相對地說，對於其政治生涯他的感覺主要是快樂的或傷心的，樂在其中或令人失望、正面的或負面的……，即就表面觀之，在政治生活之中，他是否感覺到樂趣？」(參閱巴伯一九七二年第一部書，頁四十二)「以及他對自己的經驗採取什麼樣的看法——其一生的掙扎奮鬥究竟算是應予忍受的苦差事，還是個人快樂的源泉？」

(見巴伯一九七二年的書，頁四九五)。

⑦ 對於嚐試將分類法運用到美國一九七二年總統候選人身上的情形，請看巴伯一九七二年的第二篇文章。Payne 則同時擴展 (expanded on) 與濃縮 (contracted) 了巴伯的研究法，用動機性 (以他的字眼來說，是 "incentive") 類型的說法，採納自行設計的一系列引文，來把政治人物予以分類。但其中避開了類型學的論點。對於他的以及其他有關的作品會作綜合性討論的文章，請看 Payne 與 Woshinsky 一九七二年的合著，以及 Payne 一九七二年的書。

憑心而論，有些總統是樂觀、進取、外向的，如天生精神飽滿無以復加的樂觀主義者——杜魯門。另一些則性格上有較為負面的表現——沉默寡言的柯立芝是個明顯的例子。雖然巴伯所採用第二種分類法是兩套二分的變數，但他析出的四種總統類型，與他先前所研究之州議員表現了大體相同的心理類型。圖五就是巴伯將其研究的總統們，以兩組二分法作成的分類。

### 政治行為者類型研究的證據與推論

許多人認為個案分析證據與推論上的準繩，失之過少，而多案類型研究在運作程序上的心理測量標準則失之過多。<sup>⑧</sup> 但是，在量化類型研究有充分發展的經驗模式之中，卻有著最繁複難纏的爭執點。其中最著名的例子無乃是權威人格研究錯綜複雜的歷史。權威研究過程上所發生的問題，依 Smelser 一九六八年的書上所稱，是來自理論上而非經驗上的方法學難題。即便如「反應組」之類的

圖五：巴伯對總統性格的分類

|       |         |      |       |          |       |       |            |
|-------|---------|------|-------|----------|-------|-------|------------|
| 面     | 負       |      | 面     | 正        |       | 主     | 動          |
|       | 主動——負面  | 宣傳者  |       | 主動——正面   | 制法者   |       |            |
| 5 尼克森 | 4 林頓·詹森 | 3 胡佛 | 2 威爾遜 | 1 安德魯·詹森 | 3 甘迺迪 | 2 杜魯門 | 1 富蘭克林·羅斯福 |
| 面     | 負       |      | 面     | 正        |       | 被     | 動          |
|       | 被動——負面  | 勉強者  |       | 被動——正面   | 旁觀者   |       |            |
| 2 艾森豪 | 1 柯立芝   |      | 2 哈丁  | 1 塔虎特    |       |       |            |

爭論，也不全是測量上的問題。假使能自然地產生適當的概念化，則此類爭論或許可以避免。而在藉用適當概念化，以描繪如何可能消除權威研究的疑難雜症時，若能採取本文第三部分所介紹，用現象學、動力學以及心理根源學的概念來區分，則必能重建權威人格類型學。此一重建足以提供系統性的檢視計劃，俾針對每一專題，將對權威傾向建構之效度所遭遇抨擊與辯駁，從漫漫長夜，帶往光明的解決途徑。

● 有關人格量表的信度及效度如何檢視，筆者不想在這裏討論。學者可檢視 Edwards 於一九七〇年及 Michael 於一九六八年所出版的教科書。

在現象學（即「展示出來的特性」）的層次上，（吾人假定的）類型學的重建頗能符合政治心理學之旨趣，也許可以把阿德諾及其同仁所謂的「權威性侵犯」與「權威性臣服」（即對上專事巴結，對下大肆淫威的權威傾向）作為一對核心特性（nuclear traits）來解釋。必能極有裨益。藉著在一九四〇年代，對加里福尼亞州懷有種族偏見及沒有偏見的人民，所作的臨牀性面談，以及某種程度內根據弗洛姆等人早期的臨牀性著作，權威人格一書的作者們，乃進一步深入人格特質的細部，發現一系列的相關，形成徵狀，為F量表測量上的基礎。這些權威傾向現象學上附帶的面向包含：從權力的角度來看某人對人際關係採取何種傾向的觀點；刻板性的思想方式；對曖昧事物容忍的程度；以及強迫自己附和社會團體的程度。

對於以上特質方面的組合，另外還有一組更進一步但較不明顯的特質，它們表面上似乎並不怎麼

關聯，實際上若從權威人格作者們所意涵的權威傾向的心理動態解釋來看，則頗為重要。此種特質，我們也許可以稱之為「自我防衛性權威傾向」。這是一種指標，其中包含迷信，對男子氣概懷有成見，對男性存有僵硬的固執性（與這一種相對稱的則為視女性為傳統定義下的柔軟的角色，即所謂的「假女性」(pseudofemininity)）。權威性格者對於人類本性喜歡採取悲觀的及懷疑的態度。認為「世間充滿危險與野蠻」，而「世界就是叢林奔原」。對於別人的性活動表現過份的關心，而又樂於見到性的冒犯者之受到懲罰。最後，此種人更表現出「反自觀」(anti-introception)的現象。亦即「對於反主觀、反菩薩心腸等事表現出一種不耐煩的樣子」，特別是對於自我的感覺與幻想，他們沒有能力來發現，也沒有能力來反省。

權威人格處理做為一種類型的權威性特質，似乎有意不將究竟是在描述「可觀察的表面特性」(observable surface characteristics)，或者是在解釋「潛藏的心理動力」(underlying psychodynamics)做一個明顯的區分。的確，這些展示出來的特質之中，有一種我並不會列為假設的權威傾向現象學中的一部分，那就是投射性 (projectivity)。這種涉及內心防衛機轉者，也許可以用動力解釋 (dynamic-level explanation) 來定式，亦即將此類投射視為對待環境中某敵對人物，在觀點上一貫採取的偏向。

即在權威傾向研究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在建構權威類型及各種次類上，人們對描述性特質 (descriptive traits) 的廓清工作仍然做得太少而且沒有系統性、經驗性。他們大部分在追求自然性的類型 (naturalistic patterns)，比如採取因素分析的途徑，而不得不倚賴 T 量表，把該量表的優缺

點都一貫地承襲下來。史密的研究是一個重要的例外。他修正權威傾向的問卷式測量法，藉著項目週轉 (item reversals) 來考量「反應組」之傾向，並且用相同主題來計量精神醫學的開放性面談，藉以修正量化分數，而達到相當的效準。從事面談工作的精神醫學家，或將精神醫學家面談成果報告換算成量化的「人格評估分數」的心理學家，都不曾知曉史密斯在權威傾向的現象學上，特別是理論方面的的重要性。然而，這些由精神醫生與心理學家合作，對一些主題所研究產生的臨床性輪廓，卻與權威人格書中所提出的類型性描述互相吻合。史密斯利用一種附加性非問卷式的程序，所造就權威傾向測量上的成功，使得過去在心理測量方面的曖昧不清，露出了較為明朗的曙光。

類型分析和個案分析相同，如果企圖解釋較不「明顯」的因素、各種明顯的不連續性 (the apparent in consistencies)、以及現象類型的各種狀況，都會走上動力性解釋的路子，一如吾人所知，權威傾向著作對於權威人格的作者們採用心理動力解釋是否適當，通常都加以論列，間或其測量方法究竟是否僅能區分每個個人不同的教育及概念層次。藉著前面介紹過的區分方法，吾人得以採取一種潛藏的可驗證的形式來運用這兩種解釋 (譯按：即現象學的及動力的解釋)。而把經驗上每一種權威傾向是否都存在，或都不存在，或有些存在有些不在的問題，留待以後再來解決。

權威人格中假定了「自我防衛性權威傾向」(ego-defensive authoritarianism) 的存在。此一自我防衛性權威之徵狀就是內心衝突的外顯。這種衝突圍繞在被壓抑而對權威人物的敵意上面。喬治夫婦就認為這種現象曾經發生在威爾遜身上。他們內心的「自我」有感於敵意的潛在威脅，乃藉著激烈的自衛機轉向外反應，來防衛自己。因此，權威性格者此種對權威 (就表面觀之，是一種高度正面的

情感)所採取的自我防衛態度，事實上是一種愛恨兼備的矛盾感情，在意志力所及的範圍之外，兼雜著負面的因素。

根據佛洛依德「潛抑因素復返」原理 (principle of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自我防衛式權威性格者無法避免其內心強大而不自知的敵視衝動之影響。這些衝動有其主要的宣洩孔道，如透過投射或轉移來對卑微的個人、社會上受輕視的團體，以至於外國等等，表現出敵視的態度。他們把這些人或集團看成與自己相反對，並進而變成他們表現敵意的合法對象。同樣道理，透過權威性格者所看、所認知的其他面向，也似乎在敵意的、負面的情感上，存有某種一般性的混淆現象。自我防衛式權威性格者用在壓抑上面的大量精力，與其感覺上的普遍不安心以及無意反省，在基本認知上與感情上，彼此有進一步的相關。●

● Schulberg 一九六二年的文章，特別是 Kogan 一九六五年的文章，都是少數針對自我防衛式權威傾向的動力性假設，明白提出研究計劃的著作。

前面提到權威傾向來源的另一種理論，可以簡單地稱作「認知式權威性格」類型。就目前出版的著作而言，這類徵狀較少為人們所詳細討論，因此尚不足以真正用「類型」來稱呼。其中主要討論到的，是某些階級內個體的生活環境，每每鼓勵其成員運用簡單的字眼來思維。F量表中各種不同的說法就著眼於此。根據這一認識，我們接著發現大部分有關認知式權威傾向的討論，都較少涉及心理性功能，而較多及於該羣體（如：教育程度較低的團體）之具有權威傾向，乃種因於佔優勢的社會規範

及生活環境。(譯者按：即較強壯外在的規範與情境，而較少考慮心理問題。) 如想閱讀從認知的角度來進一步處理F量表之發現者，請參考 Selznick 與 Steinberg 於一九六九年的合著。

那麼，究竟如何來區分「自我防衛式」和「認知式」權威傾向呢？這就要看權威性格者現象學上向外表現的性格屬於那個面向，以及該面向與何種功能基礎相關連。我前面已經提到過一種可能的辨識法：認知式權威性格者所表現的特質，從現象學的觀點來說，是「比較明顯」的一羣，而不是那些「比較不明顯」的，如抗拒內省的工夫。動機性基礎也應該建立。即處理某個體之人格在同一時間的其他表現，來評估自我防衛需要與認知能力的基本層次。動機的描繪另外也可以藉發展性資料，以及牽涉權威性態度與行為之關係資訊來完成。一如吾人在討論意見的功能基礎時所看到的，基於不同功能基礎的各種信仰，其所以生，所以變都源於不同的特性。

認知模式的心理根源因素強調以簡單的方式來掌握環境中流行的規範。在 Pettigrew 一九五八年的書中就可找到例子。其中斷言「認知上的種族偏見」(cognitively based racial prejudice) 在美國南部較為普遍，因為當地人將偏見當作需要人們來學習的社會規範。北部就不然。在北部，偏見係建立在自我防衛上面。自我防衛式權威性格的心理根源在 Frenkel-Brunswik 一九五四年的書上有所論列。簡單地說，兒童們如果被誇張某一類的衝動，如打擊他們生命中的某些權威，同時又禁止他們模仿，甚至意識上有一絲絲這種念頭都不可以，那麼這些兒童就會有養成此種性格結構的可能。

## 人格與政治的集體分析

本文所謂的「集體」(aggregation)指的是個別及類型的政治行為者對政治集合 (political collectivities) 所產生的影響。小從短時間的兩人式次級體系 (如在行政機關裏頭從事暫時性工作的團體)，大到團體性的、具政治的交互作用的穩定體系 (如軍事聯盟諸國所組成的銀行團)。集體分析是頗有問題的。因為許多人集合在一起運作的結果，並不等於把每一個成員運作的結果，用算術方法相加起來的總和。某甲也許是個獨裁者，某乙可能是個唯唯諾諾的人；而人的參與也許不但不能增加該團體的生產力，而且反而減弱其力量。當然，這些現象與本文第二、第三部分最後段落中提到的問題相關連。(有關致力於藉用一般的經驗性方式，來研究個人和集合體的相連結者，請閱 Lazarfeld 等人於一九七二年合編的選集第三部分。)

### 討論集體的著作

在早期的人格與政治的論著之中，大部分都不知道：將個人層次的資料推向系統層次的解釋，是頗有問題的作法。恩格爾斯 (Inkels) 與 Levinson 在一九五四年合著之第九七七頁上，討論人格與政治的古典著作中涉及「典型人格」(modal personality) 之類者，認為早期許多討論國民性的文章，如 Ruth Benedict 一九三四年所著文化的類型，似乎無法在社會文化體系與個人人格之間，做

一個觀念上的明白區分。相反地，它們似曾「假設個人的人格乃是文化的心理連貫性之同質同形態 (isomorphic)」。吾人皆知這顯然不合事實。而即使是「化約論」最嚴峻之批評性文章，也不否認個人的傾向有可能會對大型的社會文化現象造就某些貢獻。(請比較 Weston 一九七三年的書) 什麼人在某一制度中工作就會使該制度做什麼方式的運行，若想要將這二者間的關連否定掉，則是十分困難的。

對於在次於國家性的層次上從事集體分析，有巴伯純理論性的處理，可以為例。在制法者一書，吾人得以看出他如何建立四種類型，並且應用到立法功能上面去。「制法者」類型的人會投注必要的精力與受到訓練的心智來推動政策；「宣傳者」提供感情上的熱力，俾於較為廣大的羣衆中，引發政治方面的興趣；「旁觀者」則為潛在的仲裁者及合法性的支持者；「勉強者」則可權充當朝者的維護者。但是，巴伯這種說法仍舊有待經驗性的檢證。

從事以心理資料來推論而及於政治體系之特性的嚐試者，就目前為止，以國民性研究為最著（雖然不是最受到敬重）。國民性的論著，可以說與一九六五年 Verba 所著的政治文化有著關聯；前者多多少少對後者的產生有一種線性的先決條件 (linear antecedent) 之意味。大約早從一九三〇年代開始，許多人類學家尋找對發明文字以前的文化類型之解釋，而採用心理動態途徑，並特別注意孩童養育如何造成某些典型的人格結構。(有關以歷史性綜合討論來看文化與人格研究，請閱 Singer 一九六一年的作品。) 在二次大戰期間，這種相同的分析角度被用來研究進步而複雜的社會，並且獲得盟邦國家學術界的諮詢。因為這個緣故所以研究重點放在德國及日本上面，如 Benedict 所著菊花與

劍（一九四六年）；Dicks 著有人格特質與國家社會主義者的意識型態（一九五〇年），這兩部著作  
在發表之前，都曾經是同盟國領袖們了解對方背景的文件。（也請參閱 Keckemeitl 與 Leites 一九  
四八年合著的第一、二、三部作品。）此外，另有 Margaret Mead 以同盟國彼此間關係為題材來  
從事分析，旨在解釋美國及英國人民間相對待的關係，而於一九四二年發表。冷戰早期，國民性研究  
持續蓬勃發展，而注意焦點則轉移到新的對手上面。（如 Gorer 與 Rickman 一九四九年；Dicks  
一九五二年；以及 Solomon 一九七一年的著作）。

直到一九五〇年，國民性論著早於權威傾向研究數年，開始遭到爭辯及抨擊。批評的重點指出了  
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在某些方面竟與早期個案以及類型研究的困難相近似。主要則為下列數點：

一、過份強調孩童早期的社會化情形，認其為成年人行為最決定性的（縱令不是唯一的）因素。  
二、所倚賴的資料來源不能令人滿意。其來源最主要的係出自人類學上的一些報告，而不是對相  
關羣體從事多角度，代表性的直接觀察；亦即疏於在當地從事不論是面談與測驗，或者透過對實際行  
為的觀察等等活動。

三、有意無意中，不加質疑地運用一種假定，認為一個文化或社會事實上會有一種單一的主要人  
格類型。（「典型的」人格一詞，最先在一九五四年為恩格爾斯與 Levinson 所引用，藉以取代「國  
民性」一詞。在他們的觀念裏，認為在經驗上來說底下的可能也許存在，那就是一個社會或許沒有單  
獨一種典型人格類型，而卻可能有「多典型的」，或甚至根本沒有任何主要人格模型存在。）

四、隱隱中假定文化類型事實上有性格動力上的根據。此一假定本身卻也因為目前對於「文化」、

「人格」與「社會結構」等詞，在語意學上有混淆現象，而愈發顯得複雜。

五、傾向於用假定方式，而非以經驗為基提，來主張某一國家的典型人格類型（或者甚至更進一步溯源於典型的孩童早期之社會化運作），與複雜的歷史及社會政治現象，具有圓滿的一致性。（有關國民性方面的批評，重點似常放在英國人類學家 Geoffrey Gorer 推論的不著邊際上。例如，他企圖將蘇聯的領袖如何襁褓其下一代與蘇聯的外交政策相連結（見 Gorer 與 Rickman 一九四九年合著）。另外，在其《美國人民》（一九四八年初版；一九六四年修訂，頁九六）一書的有關文字中，提及：美國的眾議院，相對於參議院，有一種不負責任現象。其所以如是，蓋在於美國的年輕弟兄養成功一種不負責任的傾向，因而擴展到了眾院。

另外有一種論著，把介於個別的心理性動機類型，特別是成就需欲，與國家經濟成長率之間的關係，做一種相當直接而不合要求的連絡。這類研究在 McClelland 一九六一年書中有綜合性討論，並述及成就動機在國民羣體及國民經濟成長率之間出現的情形。（也請參閱 Hagen 一九六二年的書。）雖然 McClelland 所提的依變數並不是政治性的，<sup>20</sup> 他的作品及批評其作品的文章，因為雙方面都存在著有待解決的疑難，所以仍需依賴人格與政治的學者們作進一步的驗證。

<sup>20</sup> 然而，有許多政治研究利用 McClelland 的投射試驗指標，來探討心理狀態。請閱 Browning 與 Jacob 一

九六四年·Donley 與 Winter 一九七〇年·Greene 與 Winter 一九七一年·以及 Winter 與 Wiercking

一九七一年的著作。

人格與政治論著集體分析的最後一類，討論個人心理需求與國際間衝突的關係。目前此類也不得勢，但一如國民性著作，也有可能用另外一種面目再行出現。而對於這一類別，佛洛依德又是一個潛在性的概念來源，他一九三〇年所寫文明及其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尤為衆所週知的。書中主張：廢棄用來塑造文明的直覺上之需慾，結果會形成摧毀的衝動，並加強了侵犯性以及國際間的衝突。此一論點後來有人進一步予以發揮——其中有許多是在戰後的那段時間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贊助下完成的——他們企圖用相似的假定來運作，但對於戰爭的不可避免問題，所得到的結論並不若佛氏那麼悲觀。（例如 Klineberg 一九五〇年；Branson 與 Goethals 一九六四年的著作。）有時候我們也會看到一些文章，從動物行為與人類生理學來加以推演，而主張可以用生物——社會解釋法（*biosocial explanations*）來處理人類的衝突問題（請參看 J. C. Davies 一九七三年的綜合性討論）。

柏森斯（Talcott Parsons）曾於一九四七年撰文：西方世界社會結構中侵犯性的某些基本來源及類型，提出了一種典範性（*paradigmatic*）的看法謂：私人的緊張會引致國際的衝突（*Private tensions → international conflict*）。柏森斯認為某些可預測的緊張，或有助於人際衝突之形成者，常來自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內彼此的關係，來自為求某職而引起的緊張，以及來自成人角色上的種種要求。在面對面的環境裏頭，上述這些緊張的對外舒解被強烈地禁止，代之而起的，是投射及轉移等著名的自我防衛機轉，透過了侵犯性衝動的頻道而向外發散。此一頻道首先造成社會之內團體與團體關係的兩種化（*polarization*），但是，在國內維持某種程度之團結的需要，終於使得此種侵犯

性的衝動（透過國族主義的態度）導向國際性的衝突。

但一如 Waltz 於一九五九年所指出，此種人類挫折感多多少少屬於一種常數，而國際間的衝突則為一種變數。因此，所謂「個人的緊張引致戰爭」的公式（individual tensions → War formula）應被嚴格地予以規定，並將之置入較大的、多變數的解釋模式的脈絡中。此外更有進者，如奧斯固（Osgood）一九五五年指出的，吾人有關國際衝突的本質，以及國際政治的正常狀況為何之假設，正是整個研究分析所倚賴的重心，但是，這些假設都是非歷史的（ahistorical）及非政治的（unpolitical）。因此雖然過去有人認為研究國際關係時，國家的利益是重要的決定因素，以及研究國與國間政治行為時，得到中央的合法機構之支持與否，有相當的顯著性，並且運用此種看法來從事研究分析。但現在就很少重視此類分析，國際關係之中以「利益」做為決定因素的看法，為研究國際政策制定者內心動機提供了一個基礎。這種看法，不再採用柏森斯在國際衝突中強調自我防衛的動機性決定因素，而將重點放在國際舞臺上的手段——目的關係的認知性定向，以及自己國家中領袖們對責任的看法（即自我或他人取向）上面。（有關外交決策心理，請看 George 一九七一年，及 de Rivera 一九六八年的書。）

集體的過程（processes of aggregation）並不祇是集體中個人傾向的總和。對於此，奧斯固曾在批評柏森斯的公式傾向於將政治體系的所有成員一視同仁，看成具有相同的衝擊力。但事實上身為領袖者，遠比其跟班人物，在政治、軍事上，更具衝擊力。第二，此種公式有意假定行為的動機係根據行為的目的而來的。當然，這種現象有時符合真實：聖人及博愛論者也許常會出乎助人的目的，而

來從事助人的行爲。但，亞當史密斯早就指出：肉販及麵包店老板之所以供應各類必需品，並非爲了養活社會大眾，而卻是爲了要謀利。「侵略性引致戰爭」(aggressiveness-and-war)和涉及「動物行爲與人類生理學以及戰爭」(animal behavior—human physiology-and-war)的著作，都傾向於假定侵犯性行爲之發生係源自侵犯性的動機。(而非根據某一意識性的目的。)

對於柏森斯公式所生的缺點，<sup>①</sup>晚近的研究提供了啓示性的描繪。Peter Bourne 在一九七一年發表一份相當具建設性的研究報告。氏曾任美國駐越醫療隊神經精神科主任。他在一項分析之同時採用生理化學(physicochemical)與心理學的資料，結果與本章的說法不謀而合。Bourne 採用除了韓戰之外很難有機會運用的醫學及邏輯的技術。藉著對尿液中腎上腺皮素成分(levels of 17-hydroxycorticosteroid)的測量，來檢查腎上腺的功能，進而得以採用物理測量法來長期掌握內心緊張程度之變化。他研究一個直昇機醫療支援小組及一個特遣隊在越南執行艱巨任務的情形，在停火期間以及戰鬥期間或面臨交戰關頭的時刻，從事定期的精神醫學上的面談，以及生理化學性測量。早先所做的研究已經建立了正規的腎上腺皮素成份的檢定，並且知道在增減壓力的影響下，其成份變動的正常情形爲何。(當時用來增加心理壓力的方式有賽車、徑賽，及等待開心手術等等。)

① 本段下面部份以及接著下來的三個段落，皆係從筆者一九七三年著作，頁四六五—四六六中，經過少許改變而抄錄下來的。

Bourne 以上的發現確能道出，根據行爲的生理及心理變數之間的關係，小心地從事分析，則理

論上「應該」要發現某種複雜的互助類型。而且會假定軍事行為之發動，應該會有感情上的興奮狀況為基礎。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直昇機醫療隊是在腎上腺分泌的含量多寡的檢查中，所顯現的答案竟然是反常地「低」。其含量層次並不跟隨戰役緊張程度的高低來變化。雖然，在各種「個人的」壓力狀況下（如嚴重的意外傷害），含量的層次會有所改變。這些直昇機隊員似乎可以藉著注意力集中於手邊的機械性工作，和藉著一系列不可思議的心理防衛力量，來免除嚴重的不安。

特遣的戰鬥小組的表現多少有點不同。他們在敵人的領土之內，並且受到一個具有全面壓倒性優勢之武力長期攻擊的持續性威脅。這些人也比一般正常人顯現出較低的分泌層次。但軍官的分泌層次則顯著地高於士兵。此一現象與精神醫學上的證據完全相符合。因為軍官之負有嚴重的壓力，是局勢的不穩定及領導統御的責任感所造成的結果。而士兵們則可以藉著士氣的鼓舞、濫發奇想、以及將注意力集中在其任務中例行的機械式作業上面，因此能夠控制不安的情緒。尤有進者，在與敵軍接觸作戰前的片刻，軍官分泌物層次大大地「升高」，而士兵們則「下降」。Bourne 於是在他一九七一年報告的第二八七頁中，以結論的方式提出了底下的推想：

乍看之下，或許會覺得這些在人類身體上發現的現象，與在動物體上所注意其侵犯行為之生理層面所顯示的深度資料不同。然而，吾人若做進一步的檢視，即可從許多理由中發現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不管心理上或生理上，都不能夠與動物的侵犯行為相比擬。第一：戰爭是高度制度化。以一個士兵來說，對於他的領導人所做的決策，他個人實際上無法加以控制，也無法將他個

人的情緒投注其間。他發現自己被迫聽從指揮，而他所關心的則不再是個人的侵犯與否的問題，而變成如何循求社會所接納的方式來繼續活命。第二：特別是對於正在執行轟炸任務的飛行員、或正在槍戰中的步兵而言，戰爭已經變成一個機械行為，在其中根本沒有個人的存在。在大部分的時間裏，這些士兵會覺得他祇不過是在做一件事，而極少體驗到憎惡 (animosity) 或侵犯性。第三：人類心理運作過程足以使人感情上產生一種力量，來與所受到的威脅或侵犯事件相隔離，這種運作過程，似乎並不是動物所能夠做到的。

Bourne 的結論恰好和雷以一九七二年書上的嚴謹討論及提供的資料不謀而合。對於有些政治心理學家所廣泛接納的假設，認為「精神病理的」或至少小侵犯性的態度是「軍國主義」必要的先決條件，雷以不以為然。他們兩人同時否認藉著某一單獨的傾向狀態 (dispositional state) 就可以計量軍事行為。在這一點上，Dicks 一九七二年著作的結論也很有意思。根據他對納粹禁衛軍的劊子手 (Nazi S.S. killers) 所做的精神醫學式面談，Dicks 認為：產生侵犯症狀，進而發生行為的主要動力，來自認同的需欲，而非精神醫學上的失調。

### 集體研究的證據與推論

這裏，吾人或有必要尋求其他途徑來加以討論，而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為求達此鵠的，勢須再行回頭檢視前面曾經討論過的東西，但以其多方面涉及研究人格與政治所遭遇的問題，因此仍有重提

的價值。此即：權威人格一書。是書對涉及集體的重要問題，曾多所論列。當然，吾人亦不否認其討論的深度仍舊有待加強。而另外有一本書，是權威人格一書觀念之所從出的，也值得在此一提。這部書是弗洛姆一九四一年所寫的逃避自由。

弗洛姆在其信念中有一點說得很明白，那就是權威傾向之特性與納粹德國廣大羣衆之所以臣屬於權威統治，有著關鍵性的關連。就好像在工業技術進步的社會裏頭，其工業的階層之維繫有賴於某一鎖鑰性的因素一樣。阿德諾及其同事較少從事此種全面性的集體式推論，而權威人格及其他著作（如Frenkel-Brunswik 一九五四年書的二二八頁）在許多觀點上都在有意無意地指陳：從人格結構推論到政治結構是相當複雜的。但無論如何，藉著引用「同情法西斯」的性格結構，和藉著把此種描述推論結推論到美國社會中的「偉大的……法西斯潛力」（“Great……Fascist potential”），他們也顯然在暗示一個社會裏頭主張採權威方式去統治的潛在力量，可能與該社會中所發生具有權威傾向人格特質的事件有關。字裏行間似可隱隱約約地發覺其邏輯與國民性及國際性緊張的理論家們所採用的邏輯相似。（早期的論文對於糾正過去有關國民性著述中採用同樣闡述方式者，以 Leites 一九四八年的著作最重要。）

避免此類情事的方法之一，不過是要對總體與個體現象間有關連的各個要點，予以系統地注意，因為祇要關鍵性的轉換點存在，則要在一種簡單的累積性上進一步發揮是有可能的。我們可以先引出圖三中所提因素（都有編號），藉著所編號碼的順序，來一一認清這些地方所建立的因果性關連，沒有可能好好予以掌握。

然而早期文化與人格的作者們，有些傾向於直接從兒童的社會化來推論較大的社會結構，或者最多也不過是從成人的典型人格結構來推論社會結構。其間有許多因果性的關連，需要在從個體到整體（micro→macro）的推論法被接納之前，就予以明白研究。底下的因果連鎖有賴吾人委予思索：人格的物理面之特性→兒童的社會化→當前基本的人格結構→意識上的社會政治定向→當時的情境刺激→個體的及典型的政治行為→當時的與較大的社會與政治環境上之集體效果。每一個連結點上的因果箭頭所表示的是一個不等符號（inequality sign），其間所連結的關係，有可能相當複雜，而且甚至不需要正面的（positive）。②（在監獄的警衛裏頭，如果再添加了一位具有權威傾向的成員，則其對整個監獄所造成的影響，也許並不在監獄權威結構的強化，而卻演變成爲囚徒們的集體造反。）

● Levine 在一九六〇年提出，在單純的社會裏頭，孩童的教養工作與模範性人格的分配，似乎直接與整個社會的政治結構之間，有著連續性的關係。而在複雜的現代社會之內，則無此種關係。並請看筆者一九六八年的文章，及 Eckstein 一九六六年的書。

集體分析家（aggregator）從複雜的關聯中，推論並綜合成理論建構與研究設計，他們強調問題的複雜性。這裏姑且不論其所提出的警告爲何，但集體分析裏頭確實沒有簡單的法則。集體性分析是不好做但必須做的。要想對許許多多巨型結構有所了解，就必需觸及其賴以組成的個體和類型。目前，在一些比較流行的集體性分析之中，有些策略具有潛在的相輔相成功效，值得在此一提。

一、從直接觀察小型政治過程來「建設」 有一種看法認為行為應該被當作行為者心理傾向和環境組合的聯合函數，並從這一角度來分析。這種看法為邁向詳盡評估集合性關係，提供了第一個助力。為配合前述的不平等狀態，這種看法在預存傾向及行為之間，建立了不基於先驗而基於經驗的連絡。比如研究一個國會委員會的成員之傾向及角色，應視其組成方式及權力關係，並且重點多少應該放在該委員會主席爭取議會發言權的傾向上面。

人格分析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涉及政治行為組合的「情境構造」者，較為特殊的範例有喬治夫婦一九五六年分析威爾遜所遭遇的某些情境，比如在談判凡爾賽和約的巴黎和會。另外，Hodgson、Levinson 和 Zaleznik 一九六五年所出版之頗饒趣味的傳記，其中對某一組織裏三巨頭彼此關係有著審慎的處理及發現。同時也請參閱 Zaleznik 一九六五年及六六年的作品，以及 Browning 與 Jacob (一九六四年) 和 Browning (一九六八年) 的著作。●在一系列迥然不同的政治組合中，來對政治及非政治的人士加以研究。

●對於這些命題的廣泛討論，請看筆者一九六九年的書之第五章。

二、把心理特性的類數接連到系統特性上面 Gorer 用一種無文件可資證明的制度性類型，來把美國無目標的年青一代予以貫串。這在程序上顯然是大進步，但需符合三條件，即：(一)在羣體中，心理定向的分配係根據經驗而建立；(二)其依變數有文件可資證明；(三)其依變數從衆多個體經合理假定集合而成的。而這些個體又在逐漸形成某些獨立變數所預設的類型。若干選舉調查已在

這個類型上建立頗為可信的關係，並且在意識的政治定向上運用心理性資料。如一九六〇年 *Archie Campbell* 發現國會期中選舉時，總統在自己所屬政黨得到的支持票，總有減少的現象。對於這種現象，他的解釋是：選民對總統選舉及國會選舉，在心理特性上有著不同的表現。●

② 對於 *Campbell* 對英國補選制的看法之應用，請閱 *King* 一九六八年的文章。並請參考 *Converse* 與 *Dupeux* 一九六二年的文章。該文藉著與美國的比較，從政黨認同者缺乏的觀點，來解釋法國新政黨的所以興起。

三、修飾頻數分析法以便顧及「非附加性」的問題 前面曾經數度注意到，對於某一政治集合體而言，並非所有屬於集合體的政治行為者，都對該集合體具有同等份量的作用。職是之故，在從事現象的集體性分析時，若遇到一些重要的特殊角色的扮演者（不論是不是領導人），就需因勢利導，把此種分析法做某種程度的修正。

四、從系統的及心理的理論性分析來「往回做」（亦即從集體的研究成果推演到類型以及個體）。政治學就像社會學一樣，時常提出一些心理學家們並不怎麼感興趣的心理問題。其所以如此，乃在於政治學與社會學並不十分關切的一般性的作用，而卻注意個人的足以推動體系之運作的功能。（參考 *Inkeles* 一九六八年的書；筆者一九七〇年第一部書）因此，政治及社會分析家們所感興趣者，乃是進一步學理根據的集體性分析，其中涉及系統地注意那些足以建構制度性類型（*institutional pattern*）的角色。這些角色反過來也許具有明顯的心理需求，對於此類角色需求及人格需求的分

析，請參考拉斯威爾一九五一年的論文民主的性格。（也請參閱筆者一九六六年的書。）

人格與政治研究在內容上的特色：對這類著作的描繪性評論

對於一九六〇及七〇年代在大學（及學院的）校園裏頭發生的衝突事件，人們曾經從事相當多而且龐大的研究與評論。這些多而雜的論述正提供一個絕佳的機會，來檢討此類著作的思路大要，並為本章所討論的材料找出其間的互動關係。各大學（及各學院）都有其個別的政治結構及狀態。行為科學家們較多人熱衷於此。他們基於各種動機，來對校園中所發生的各種理論或實際上有興趣的現象，從事研究的工作，而從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至一九七〇年代早期，有許多抗議政治（protest politics）發生，這些都可以分別在個人的、類型的及集體的層次上來加以研究。

此類研究多數在美國各色各樣的學院及大學中進行。Keniston-Lerner 在一九七一年的第二部著作——書目評鑑中條列了兩百一十一項美國境內的此類研究報告。（並請看 Keniston 一九七三年的書，及 Albach 與 Kelly 一九七三年的著作。）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對學生行動傾向（student activism）以及大學之中的政治狀況，也有著相當數量的研究——雖然其中的大部分並未採用行為科學的技巧。

即使我們考量的祇限於美國的學術界，其內容的比較研究仍要涉及廣大的範圍。各學校歧異之所以廣大，主要涉及環境及預存傾向兩變數，因為制度性結構的範圍不同——從龐然的大學到初級的迷

你學院，從嚴苛的甄選到開放性的入學——就像種族、性別及地理區域的不同一樣。在研究校園內的行動傾向及衝突的時候，時間是一項附加性變數，相當重要。因為在某一固定點的時間上美國大學內的衝突情況，都與當時社會運動的特性有關。

上述研究倘若對於學生行動傾向所激發的行動派學生個人心態不予注意，不從事一般性的及特殊性的問題之論究，則將有失本題研究之旨趣。他們的心態有著多種問題，諸如：行動派學生是否不能適應環境？是否為智慧性的理想主義者，有眼力看到那個光著身子的皇帝（the unclotted emperor），或者祇屬湊熱鬧、跟時尚。這類問題都引導我們走向收集大量人格資料的路子。而此類論述中的解釋性專題，有許多可以用本章所提供的圖示，藉著其中所蘊含的廣大系絡，來重新說明及配合。

目下許多的研究發現，在彼此配合方面相當鬆散。就像不同的研究人員在自說自話一般，給人一種鑲嵌工廠將東西七拼八湊的感覺；其間頗多雜亂與片斷。當然，若說借用本章之圖示即可將這些雜亂鋪陳之事物予以系統整理，也未免樂觀。但是，根據圖三，似可將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連成一氣。有些看起來似乎相衝突的東西也變得能夠連貫。茲舉一例：本章第三部分曾經討論有關學生行動傾向研究，應該重視社會特性或者人格特性的問題。人們原有的觀念基礎上不同的看法，此時若借用圖三，問題就容易協調。

由於篇幅的限制，這裏祇能略微提到小部分可以用圖三來說明的研究與解析。同時也強調一點：此處所作的挑選著作之綜合討論，僅止於描繪性，而絕非意指能對行動傾向及校園衝突之研究找到一個「真」的結論。

圖三的第一目爲歷史性較大社會之先決條件。大學內衝突事件之先決條件爲何，曾由席爾斯加以檢視（見其一九六九年的書）。他把重點放在國別的歧異點上。雖然六十年代的衝突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在各國發生，但其行動傾向間亦可找出國與國互相仿模的共通點。如此一來，整個行動傾向及衝突的現象，在六十年代中，有一部分依賴在意識型態的及行爲模式的歷史性紛歧上面。除此之外的其他年代裏，行動傾向在個人層次上所得到的影響就沒有這樣大。

第二目爲當時環境中的社會化經驗。有關不同類型的行動派和非行動派學生在當時環境中的各種社會化經驗，曾被人透過反省法來加以研究，見 Block, Haan 與 Smith 一九六九年的文章；Flacks 一九六七年的文章；Everson 一九七〇年的書；以及 Dunlap 一九七〇年的第二篇文章。就時間上與制度上不同的階段而言，不同的環境以及社會化的經驗都與行動傾向相關連。

第三至第六目涉及心理的預存傾向。有關學生行動派心理預存傾向之報告，曾散見於上述的著作之中，再加上 Keniston 一九六〇年的文章及 Kerpelman 一九七二年的書。這些研究報告牽涉許多有趣的發現與論辯，而目的則不外乎企圖明白：行動派學生的政治定向與行爲，是否滿足認知性的而非自我防衛性的需求，以及能夠滿足到什麼樣的程度。Flacks 一九六七年的文章係針對芝加哥大學行動派學生的研究報告，該文拒絕「學生之反叛係出於自我防衛」的解釋法，則不認爲學生之抗議叛亂是爲了反抗父母的權威。反之，它所提供的資料顯示行動派學生在理智性的需要及能力上十分強烈。然而，若以巴伯在研究政治體系中人後所作成之報告——整個研究群體中的政治人物之人格力量的分配，在積極與消極兩端上都可以發現其存在——來加以檢視，則不難發掘 Flacks 未能將資料加

以理論化，也未會將之好好驗證。不單如此，Flacks 甚至有意暗示，這些行動派學生祇有憑藉其「健康的」性質（“healthy” qualities）<sup>⑤</sup> 才益發顯得突出。

⑤ Kerpelman 一九七二年的書中提出 Flacks 用來研究一九六〇年代中期芝加哥大學行動派人物智慧能力的資料有問題。因為 Flacks 所根據的成績報告，是這些行動派學生自己報給他的。Kerpelman 指出，他所從事的有關研究，發現這些人所報告的並不真是他們所實際得到的等級，他們的等級並不高於其他非行動派的學生。

接踵而來的研究則與 Flacks 的發現大異其趣。Block, Haan 與 Smith（在一九六九年的著作中）重新分析其對一九六五年柏克萊分校發生第一股示威運動的行動派學生之研究，他們發現同時參與抗議行動及社會服務行動的示威學生，基本上有相當程度係紮根於自我防衛的力量以及認知性的需求，那些祇對抗議有興趣的學生，則表現出較多的自我防衛性的面貌。（也請參閱 Smith, Haan 與 Block 一九七〇年的合著。）

在研究行動主義第一波之後，調查的對象轉移到知名度較低的大學及學院。在這些學校裏，行動主義發展較慢，當時行動主義已然遍及大部分的青年男女，而行動主義的標記（如自由的象徵等）亦在各處。Dunlap 研究奧勒岡大學的學生（見其一九七〇年的第二部書），Everson 研究南伊利諾大學的學生（見其一九七〇年的書），就較少發現任何顯著的行動派特徵，而不能與發生此一運動波濤的柏克萊和芝加哥大學的學生相比擬。這個時候的行動主義（或譯「行動傾向」，原文為 activism）

就漸漸變成比較上是一種常數 (constant) 而不是一種變數 (variable) 了，而開始的時候所具有的明顯相關也因此而逐漸喪失。⑤

⑥ 行動風氣如果越形普遍，則越會從這些在人我關係的調和方面，總喜歡向小團體去認同的人士中去挑選，而此種小團體，是同儕式的團體 (Peer group)。一如前面曾經提到過的，認同需慾的層次決定了政治行爲，而其他種類的預存傾向所發生的影響效力就比較輕微。在一九六〇年代後期研究行動主義的題目中，有一個小而卻受到高度注意的次要性題目。其中討論小型但有高度破壞力的團體，如 the Weatherpeople。這些團體並不會用來作爲人格測驗的對象；然而毫無疑問的，這些團體的成員確實具有不同的人格品質。

第七目即刻情境。由於研究工作牽涉制度類型方面的各種不同廣度，使得學生日常生活上的各個面向，諸如班級人數多寡、教員與學生的比率、學校的風氣等等，也多有不同。而人格方面的論著正足以提供深入了解學生抗議行動當時各種環境的先在條件 (immediate environment antecedents) 之機會。把大學視同政治結構來處理的，可參考 Parsons 一九六九年的專文。藉著制度性類型來驗證校園內的暴力及非暴力性事件者，見 Astin 一九七〇年的專文，以及 Bayer 與 Astin 一九六九年及一九七一年的合著；Keniston 與 Lerner 一九七一年的第一部合著；以及 Scott 與 El-Assal 一九六九年的合著。在制度性的類型方面，由於每年所體驗到的衝突不同，而有年年不同的變化。一九六〇年代（以及一九七〇年代早期）的抗議浪潮確實具有顯著的循環性模式存在著。

第八目爲當前的大社會。在許多方面總括學院及大學當時之特性 (immediate characteristics)

的當前大社會之一項明顯特點，就是越戰的產生。（比較 Dunlap 一九七〇年第一部書）的確，這是大環境內的一宗事件，一九七〇年春尼克森政權決意進軍高棉之後，肯特州立大學（Kent State University）學生的抗議及被殺案件接踵發生，進而帶領校園內抗議行動達到最高點，其中包含一些至今仍不明為何行動主義的學生的抗議行為。（見 Peterson 與 Biorusky 一九七一年的合著）。

對於圖上所列的第九及第十目之變項（即抗議行動的具體內涵；及抗議所造成對學生自己未來地位以及其即刻環境和未來環境的影響），筆者不想繼續用上面的方法來分析，而祇想提出一點，那就是剛才討論的這些抗議行動浪潮，結果造成校園管理上的許多改變。除此之外，大部分人都相信，抗議對其所屬的較大型社會也產生影響。諸如詹森總統決意不爭取連任提名，以及尼克森政權的頭四年中將美國駐越南的地面戰鬥部隊撤離等等，抗議行動是促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上討論明白顯示：有關學生行動主義——校園衝突之著作可以導出人格及政治研究的三大基本模式。人們會直覺地發現，即使該時期的衝突之中，個人所扮演之角色如何，並不會詳細地檢視過。但大學裏頭個別行政人員以及學生領袖的素質——其價值觀、動機：政治手腕等等——對於全校衝突之發生，以及如何來表現自己，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一點則無庸置疑。制度性產出（institutional output）的比較分析之中，有些不能一致解釋，毫無疑問地就需考量其領袖人物所具有的媒介性的素質。至於心理類型方面，則一如 Block, Haan 與 Smith 所言，在有關的論著中較為常見。而把個人的以及類型的集合在一起，則會以衝突的、缺乏衝突的、制度改變的、以及制度持續的諸方式導致集體的結果（collective outcomes）。

結 論

本節的陳述有一部分是本章主題相當一般性的總結，另一部分則企圖將本章的假設與觀點予以表明。

政治行為者個人的素質如何，對政治過程的影響確實很大。這一點，如果密切注意政治事件及後果的內涵，將不難發現。而此種影響與政府是否具備滿足人民需要的能力，有著直接而顯著的關連。人類如何來處理自身的事務，不管是值得炫耀的成功政治，或者是人類種族一貫的有所不能（chronic inability），其能耐的大小，比如怎樣操縱物理界的現象——包含毀滅性的技術，都牽涉到「人的因素」。對人類政治能力之泉源的更佳了解，勢將大有助於發現解決領導統御難題的更佳策略，而假借系統的努力來尋找此類知識，照理說應可按部就班，循序完成的。但事實縱如此，其實卻不然，其中仍舊有著重要的困難。

困難之一在於人類心理性功能，和個人行為以及集體行為在心理傾向的連絡關係方面都顯得十分複雜。

另外一個困難，甚至更加麻煩的障礙，則在於如何連結心理學和政治學。問題並不單限於討論與政治的著作當中的矛盾現象，而且在心理學本身，對於涉及人類一般性心理功能的任何一個（或者所有的）主題，究竟其本質為何，如何來適當地研究，學者們無法協議，甚至爭論不休。但若採取底下

的策略，則問題即使不能消除，也會緩和下來。

縱令爲了解釋某些概念，需要冒製造更多斤斤於危言，既不能使理論更趨於具體，又不能使理論更趨於抽象。因爲一方面目前已經產生的爭論會阻礙研究的進行，一方面在處理此類繁複的現象上，普遍需要一種整體性的看法 (overall perspective)。

方法論上要講求多元。人格與政治的研究對象容許多種高度紛歧的分析性研究途徑的同時存在。如：單一行爲者的個案心理研究法、心理測量研究、決策過程的歷史性或參與觀察式研究、實驗法、擬態法 (simulations) 等等。任何一種研究途徑不可能提供「所有的答案」，而縱使真有此種智慧性的單元會在恒常的未來裏建立，也唯有就近透過目前的、暫時的方法，來處理紛歧，來邁向恒常。

理論上要普遍一致 (ecumenicism)。政治心理學顯然有多種面向，而可藉人格心理學中不同的理論重點來予以描繪——比如本章中所提到的動力心理學、認知心理學、學習理論、功能研究法等，以及各種社會心理研究法、和根據社會的及政治的架構來連結個人傾向的各種理論。概念化也在所必需，如此才有充分的廣度來處理終極的經驗性關連，而又不能兼顧似乎會應用到的多變數關係 (multivariate connections)。

最後，現實的複雜性使得理論的建立在所必需，俾研究人員藉之認出複雜的關係。這裏並非主張模稜兩可，認爲人格與政治之間的關連太抽象、太不規則，因而不能加以偵察與認定。相反地，它勸導追求確實存在的偶發而互動的關係。或許我們可以藉著「結構因素」與「個人心理傾向」來調和或提升任一心理變數對政治行爲的作用。因爲結構因素 (structural factors) 會將心理傾向在不同的情

境中，導出不同的行為後果。而其他的個人心理傾向則會與利益的變數產生互動關係，此外，複雜性的存在，也正為綜合個體與類型兩模式，提供一條步向大社會政治的結構與過程的光明路途。

※

※

※

前面的提要及結論各點，大部分都不能「證明」。（其所以如此，）在某些案例中，是因為目前政治研究的知識相當有限。在另一些案例中，則因案例的啓發性本質，導致驗證工作無法切中要點。在這些目前無法驗證的假設裏頭有一項，就像本結論開頭所提到的：個人對於政治行為的影響，此人的狀況有著高度相關。而人們愈對「此種主張在幾個顯著點上是否為真」產生懷疑，愈排除萬難傾全力於其中以尋求智識則感到興味。

## 參考書目

- Abelson, Robert P., et al., eds. (1968). *Theories of Cognitive Consistency: A Source Book*. Chicago: Rand McNally.
- Ackerman, Nathan W., and Marie Jahoda (1950). *Anti-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 New York: Harper.
- Adorno, T. W., Else Frenkel-Brunswik, Daniel J. Levinson, and R. Nevitt Sanford (1950).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Alker, Henry A. (1971). "A quasi-paranoid feature of students' extreme attitudes against colonialism." *Behavioral Science* 16:218-27.
- \_\_\_\_\_ (1972). "Is personality situationally specific or intrapsychically consist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40:1-15.
- Allison, Graham T. (1969). "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September) 63:689-718.
- Allport, Gordon (1937). *Personality: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Holt.
- \_\_\_\_\_ (1942). *The Use of Personal Document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Bulletin 49.
- \_\_\_\_\_ (1962). "The general and the unique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30:405-22.
- Altbach, Philip G. and David H. Kelly (1973). *A Selecta Bibliography of Student Activism and Related Topics*.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Committee on Nomenclature and Statistics (1968).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2d edition.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 Argyris, Chris (1973). "Some limits of rational man organizational theo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3:253-67.
- Asch, S. E. (1952). "Effects of group pressure upon the modification and distortion of judgments." In Guy E. Swanson, Theodore M. Newcomb, and Eugene L. Hartley (eds.),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Holt, pp. 2-11.
- Astin, Alexander W. (1970). "Determinants of student activism." In Julian Ioster and Durward Long (eds.), *Protest! Student Activism in America*. New York: Merrow, pp. 89-101.
- Bandura, Albert, and Richard H. Walters (1963). *Social Learning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Barber, James David (1965). *The Lawmakers: Recruitment and Adaptation to Legislative Lif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68a). "Adult identity and presidential style: the rhetorical emphasis." *Daedalus*, 97:938-68.
- \_\_\_\_\_ (1968b). "Classifying and predicting presidential styles: two weak resident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4:51-80.
- \_\_\_\_\_ (1971). "The interplay of presidential character and style: a paradigm and five illustration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Michael Lerner (eds.), *A Source Book for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Chicago: Markham (now distributed by Humanities Press, Atlantic Highlands, N.J.), pp. 384-408.
- \_\_\_\_\_ (1972a). *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 Predicting Performance in the White Hous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_\_\_\_\_ (1972b). "The question of presidential character" *Saturday Review* (September 23), pp. 52-6.

\_\_\_\_\_ (1974). "Strategies for understanding politicia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8:443-67.

Barlow, David H. and Michael Hersen (1973). "Single-case experimental designs: uses in clinical research."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9:319-25.

Bass, Bernard M. (1965). "Authoritarianism or acquiescenc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616-23.

Bay, Christian (1958). *The Structure of Freedo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aperback with new preface, 1970.

\_\_\_\_\_ (1967). "Political and apolitical students: facts in search of theor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3:76-91.

Bayer, Alan E., and Alexander W. Astin (1969). "Violence and disruption on the U.S. campus, 1968-69." *Educational Record* (Fall), pp. 337-50.

\_\_\_\_\_ (1971). "Campus unrest, 1970-71: was it really all that quiet?" *Educational Record* (Fall), pp. 301-13.

Beier Helen, and Eugenia Hanfmann (1956). "Emotional attitudes of former Soviet citizens, as studied by the technique of projective ques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143-53.

Bendix, Reinhard (1952). "Compliant behavior and individual person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8:292-303.

Benedict, Ruth F. (1934). *Patterns of Cultu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_\_\_\_\_ (1946). *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Bentler, P. M., Douglas N. Jackson, and Samuel Messick (1971). "Identification of content and style: a two-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acquiesc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6:186-204.

Berns, Walter (1961).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al things: the case of Christian Bay's 'The Structure of Freedo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1:550-1.

Blalock Hubert M. (1963). "Correlated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e problem of multicollinearity." *Social Forces* 42:233-7.

\_\_\_\_\_ (1964). "Controlling for background factors: spuriousness versus developmental sequences." *Social Inquiry* 34:28-39.

Block, Jack (1965). *The Challenge of Response Sets: Unconfounding Meaning, Acquiescence, and Social Desirability in the MMPI*.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_\_\_\_\_ (1965). *Lives through Time*. Berkeley, Cal.: Bancroft.

\_\_\_\_\_ (1972). "The shifting definitions of acquiesc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8:10-1.

Block, Anne H., Norma Haan, and M. Brewster Smith (1969). "Socialization correlates of student activism."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5:143-77.

Bonjea, Charles M., Richard J. Hill, and S. Dale McLemore (1967) *Sociological Measurement: An Inventory of Scales and Indices*. San Francisco: Chandler.

Bourn Peter G. (1971). "Altered adrenal function in two combat situations in Viet Nam." in Basil E. Eleftheriou and John Paul Scott (eds.), *The Physiology of Aggression at Defeat*. New York: Plenum, pp. 265-305. Excerpt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 Bramson, Leon, and George W. Goethals (1964). *War: Studies from Psychology, Sociology,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Breger, Louis, ed. (1969). *Clinical Cognitive Psycholog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Brodie, Fawn M. (1959). *Thaddeus Stevens: Scourge of the South*. New York: Norton.
- Bronfenbrenner, Urie (1960). "Personality and participation: the case of the vanishing variable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6:54-63.
- Brown, Norman O. (1959). *Life Against Death*. Middletow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 Brown, Roger (1965). *Social Psych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 Brown, Steven R. (1974). "Intensive analysis in political research." *Political Methodology* 1:1-25.
- Browning, Rufus P. (1968). "The interaction of personality and political system in decisions to run for office: some data and a simulation techniqu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4:93-109.
- Browning, Rufus P., and Herbert Jacob (1964). "Power motivation and the political personalit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8:75-90.
- Burke, Kenneth (1945). *A Grammar of Motiv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_\_\_\_\_ (1950). *A Rhetoric of Motiv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_\_\_\_\_ (1961). *Attitudes Toward History*. Boston: Beacon.
- Burwen, Leroy S., and Donald T. Campbell (1957). "The generality of attitudes toward authority and nonauthority figure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24-31.
- Campbell, Angus (1960). "Surge and decline: a study of electoral chan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4:397-418.
-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 Campbell, Donald T. (1963). "Social attitudes and other acquired behavioral dispositions." In Sigmund Koch (ed.), *Psychology: A Study of a Science*, Vol. 6. New York: McGraw-Hill.
- \_\_\_\_\_ (1965). "Ethnocentric and other altruistic motives." In David Levine (ed.),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pp. 283-311.
- Cantor, Norman F. (1967). *The English: A History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to 1970*.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Carlson, Rae (1971). "Where is the person in personality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5:203-19.
- Carr, Leslie G. (1971). "The Strole items and acquiescenc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287-93.
- Chomsky, Noam (1959). Review of *Verbal Behavior* by B. F. Skinner. *Language* 35:26-58.
- Christie, Richard, and Peggy Cook (1958). "A guide to published literature relating to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hrough 1956." *Journal of Psychology* (April) 45:171-99.
- Christie, Richard, and Florence L. Geis (1970). *Studies in Machiavellianis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_\_\_\_\_ (1933) *Lincoln: A Psycho-Biography*. New York: Scribner.

Christie, Richard, John Havel, and Bernard Seidenberg (1958). "Is the F scale irreversibl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Christie, Richard, and Marie Jahoda, eds. (1954).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Clark, Leon Pierce (1921). "Unconscious motives underlying the personalities of great statesmen and their relation to epoch-making events: a psychologic study of Abraham Lincoln." *Psychoanalytic Review* 8:1-21.

Cole, Michael, and Jerome S. Bruner (1971).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inferences about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6:367-76.

Coleman, James S. (1958). "Relational analysis: the stud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with survey methods." *Human Organization* 17:28-36.

\_\_\_\_\_ (1964). "Group and individual variables." In his *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Sociology*.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pp. 34-90.

Converse, Philip E. (1970). "Attitudes and non-attitudes: continuation of a dialogue." In Edward R. Tufte (ed.),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Problem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p. 168-69.

Converse, Philip E., and Georges Dupeux (1962). "Politicization of the electorate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6:1-23.

Couch, Arthur, and Kenneth R. Keniston (1960). "Yeasayers and naysayers: agreeing response set as a personality variabl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151-74.

Crozier, Michael (1964).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ahlstrom, W. Crant (1972). "Personality systema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ypes." Pamphlet.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Daniels, Robert B. (1967). *Red October: The Bolshevnik Revolution of 1917*. New York: Scribner.

Davidson, P. O., and C. G. Costello (1969). *N = 1: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Single Cases*.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Davies, A. F. (1966). *Private Politics: A Study of Five Political Outlooks*. Melbourne: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73). *Politics as Work*. Melbourne Politics Monographs. Parkeville Australia: Dept. of Politics, Melbourne University.

\_\_\_\_\_ (1967). "Criteria for the political life history." *Historical Studies of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13:49, 76-85.

Davies, James C. (1963).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New York: Wiley.

\_\_\_\_\_ (1973). "Aggression, violence, revolution, and war." In Jeanne N. Knutson (ed.),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p. 234-60.

Denzin, Norman K. (1969).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ethnomethodology: a proposed synthe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4:922-34.

de Rivera, Joseph H. (1968). *The Psychological Dimension of Foreign Policy*. Columbus, O.: Merrill.

- Dewey, John, and Arthur F. Bentley. (1949). *Knowing and the Known*. Boston: Beacon.
- Dicks, Henry V. (1950). "Personality traits and national socialist ideology." *Human Relations* 3:111-54.
- \_\_\_\_\_ (1952). "Observations on contemporary Russian behavior." *Human Relations* 5:111-75.
- \_\_\_\_\_ (1972). *Licensed Mass Murder: A Socio-Psychological Study of Some S. S. Kill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 Di Palma, Giuseppe, and Herbert McClosky (1970). "Personality and conformity: the learning of political attitud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1054-73.
- Di Renzo, Gordon J. (1967). *Personality, Power and Politics*.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Dollard, John (1935). *Criteria for the Life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onald, David (1960). *Charles Sumner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Knopf.
- \_\_\_\_\_ (1970). *Charles Sumner and the Rights of Man*. New York: Knopf.
- Donley, Richard E., and David G. Winter (1970). "Measuring the motives of public officials at a distance: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American presidents." *Behavioral Science* 15:227-36.
- Duncan, Otis (1966). "Path analysis: sociological exampl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2:17-31.
- Dunlap, Riley (1970a). "A comment on 'multiversity, university size, university quality, and student protest: an empirical stud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5:525-8.
- \_\_\_\_\_ (1970b). "Radical and conservative student activists: a comparison of family backgrounds."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13:171-81.
- Durkheim, Emile (1895). *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 Paris: Alcan. Eng. trans. (1938),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printed (1950),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_\_\_\_\_ (1897). *Le Suicide*. Paris: Alcan. Eng. trans. (1951), *Suicide: A Study in Sociolog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Eckstein, Harry (1966). "A theory of stable democracy." In his *Division and Cohesion in Democracy: A Study of Norwa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225-88.
- Edinger, Lewis J. (1964).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bi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s* 26:423-39, 648-76.
- \_\_\_\_\_ (1965). *Kurt Schumacher: A Study i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al Behavi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Edwards, Allen L. (1941). "Unlabeled Fascist Attitude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575-82.
- \_\_\_\_\_ (1970). *The Measurement of Personality Traits by Scales and Inventori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Eisenstadt, S. N. (1963). "The need for achieve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1:420-31.
- Elder, Glen H., Jr. (1973). "On linking soci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i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6:785-800.

Erikson, Erik H. (1958). *Young Man Luther: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_\_\_\_\_ (1968). "On the nature of psycho-historical evidence: in search of Gandhi." *Daedalus* 97:695-730.

\_\_\_\_\_ (1969). *Gandhi's Truth: On the Origins of Militant Nonviolence*. New York: Norton.

Everson, David H. (1970). "The background of student support for student protest activities in the university." *Public Affairs Bulletin* (March-April).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Eysenck, Hans J. (1968). "Emil Kraepelin." In 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8. New York: Macmillan, pp. 599-650.

Eysenck, Hans J., and Sybil Eysenck (1969). *Personality Structure and Measurement*. San Diego: Knapp.

Farrar, Donald E., and Robert R. Glauber (1967). "Multicolinearity in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problem revisited."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49:92-107.

Farrell, Brian A. (1963). "Introduction." In Sigmund Freud, *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Harmondsworth, Eng.: Penguin.

Fearing, Franklin (1927).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historical personalit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4:521-59.

Fiedler, Fred E. (1971). "Leadership." Pamphlet. New York: General Learning Press.

Fiske, Donald W. (1971). *Measuring the Concepts of Personality*. Chicago: Aldine.

\_\_\_\_\_ (1973). "Can a personality construct be validated empiricall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0:89-92.

Flacks, Richard (1967). "The liberated generati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roots of student protes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3:52-75.

Fodor, Jerry A. (1968).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New York: Random House.

Freedman, Jonathan L., and David O. Sears (1965). "Selective exposure." In Leonard Berkowitz (ed.),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pp. 58-97.

Frenkel-Brunswik, Else (1954). "Further explorations by a contributor to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In Richard Christie and Marie Jahoda (eds.),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ology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pp. 226-45.

Freud, Anna (1946). *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Freud, Sigmun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24 volumes. J. Strachey (ed.). London: Hogarth, 1953.

\_\_\_\_\_ (1900).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In Standard edition, Vols. 4 and 5.

\_\_\_\_\_ (1901). "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In Standard edition, Vol. 6.

\_\_\_\_\_ (1905). "Fragment of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In Standard edition, Vol. 7, pp. 9-122.

- \_\_\_\_\_ (1909a). "Analysis of a phobia in a five-year-old boy." In Standard edition, Vol. 10, pp. 3-149.
- \_\_\_\_\_ (1909b). "Notes upon a case of obsessional neurosis." In Standard edition, Vol. 10, pp. 153-318.
- \_\_\_\_\_ (1910). "Leonardo da Vinci and a memory of his childhood." In Standard edition, Vol. 11, pp. 59-137.
- \_\_\_\_\_ (1918). "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 In Standard edition, Vol. 17, pp. 3-122.
- \_\_\_\_\_ (1930).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Standard edition, Vol. 21, pp. 59-145.
- \_\_\_\_\_ (1938). "Moses and monotheism: three essays." In Standard edition, Vol. 23, p. 223.
- Freud, Sigmund, and William C. Bullitt (1967). *Thomas Woodrow Wilson: A Psychological Stud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Fromm, Erich (1941). *Escape from Freedom*. New York: Rinehart.
- \_\_\_\_\_ (1947). *Man for Himself*. New York: Rinehart.
- Geiger, George Raymond (1958). *John Dewey in Perspective: A Reassess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orge, Alexander L. (1968). "Power as a compensatory value for political leader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4:29-49.
- \_\_\_\_\_ (1969). "The '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 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3:190-222.
- \_\_\_\_\_ (1971). "Some uses of dynamic psychology in political biography: case materials on Woodrow Wilson."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Michael Lerner, *A Source Book for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Chicago: Markham. Now distributed by Humanities Press, Atlantic Highlands, N.J., pp. 78-98.
- \_\_\_\_\_ (1972). "The case for multiple advocacy in making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6:751-85.
- \_\_\_\_\_ (1974). "Assessing presidential character." *World Politics* 26:234-82.
- George, Alexander L., and Juliette L. George (1956). *Woodrow Wilson and Colonial House: A Personality Study*. New York: John Day. Paperback edition with new preface (1964), New York: Dover.
- Glad, Betty (1966). *Charles Evans Hughes and the Illusions of Innocence: A Study in American Diplomac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Goldhamer, Herbert (1950). "Public opinion and person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55:346-54.
- Gorer, Geoffrey (1948; revised edition, 1964).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Norton.
- Gorer, Geoffrey, and John Rickman (1949). *The People of Great Russia: A Psychological Study*. London: Cresset.
- Greene, Dwight L., and David G. Winter (1971). "Motives, involvements, and leadership among black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39:319-32.
- Greenstein, Fred I. (1965). "Public images of the presid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22:523-9.

\_\_\_\_\_ (1966). "Harold D. Lasswell's concept of democratic character." *Journal of Politics* 30:696-709.

\_\_\_\_\_ (1967a). "Art and science in the political life history: a review of A. F. Davies's *Private Politics*." *Politics* 2:176-80.

\_\_\_\_\_ (1967b). "The impact of personality on politics: an attempt to clear away underbrus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629-41.

\_\_\_\_\_ (1968a).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_\_\_\_\_ (1968b). "Private disorder and the public order."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37:261-81.

\_\_\_\_\_ (1969).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Problems of Evidence, Inference, and Conceptualization*. Chicago: Markham. Paperback edition with a new preface, New York: Norton, 1975.

\_\_\_\_\_ (1970a). "A note on the ambiguity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definitions, criticisms, and strategies of inquiry." *Journal of Politics* 32:969-78.

\_\_\_\_\_ (1970b). Review of Gordon J. di Renzo, *Personality, Power and Politic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Italian Deputy and His Parliamentary System*.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85:365-8.

\_\_\_\_\_ (1970c). "The standing of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an addendum to Jackman's critique." *Journal of Politics* 32:989-92.

\_\_\_\_\_ (1971).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overall consideration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Michael Lerner (eds.), *A Source Book for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Chicago: Markham, pp. 4-32. Now distributed by Humanities Press, Atlantic Highlands, N.J.

\_\_\_\_\_ (1973). "Political psychology: a pluralistic universe." In Jeanne N. Knutson (ed.),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p. 433-70.

Greenstein, Fred I., and Michael Lerner, eds. (1971). *A Source Book for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Chicago: Markham. Now distributed by Humanities Press, Atlantic Highlands, N.J.

Greenstein, Fred I., and Sidney Tarrow (1970). "Political orientations of children: the use of a semi-projective technique in three na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s Series No. 01-009* 1. Beverly Hills: Sage, pp. 479-558.

Guterman, Stanley S. (1970). *The Machiavellian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Study of Moral Character and Organizational Milieu*.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Gynther, Malcolm (1972). "White norms and black MMPs: a prescription for discrimin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8:386-402.

Hagen, Everett Einar (1962).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How Economic Growth Begins*. Homewood, Ill.: Dorsey.

Hall, Calvin S., and Gardner Lindzey (1957).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Wiley.

\_\_\_\_\_ (1970).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2nd edition. New York: Wiley.

Hampden-Turner, Charles (1970). *Radical Man*. Cambridge, Mass.: Schenkman.

Hanfmann, Eugenia, and Jacob W. Getzels (1955). "Interpersonal attitudes of former Soviet citizens, as studied by a semi-projective method."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69:1-37.

Hastings, Donald W. (1965a). "The psychiatry of presidential assassination: part I: Jackson and Lincoln." *Journal-Lancet* 85:93-100.

\_\_\_\_\_ (1965b). "The psychiatry of presidential assassination: part II: Garfield and McKinley." *Journal-Lancet* 85:157-62.

\_\_\_\_\_ (1965c). "The psychiatry of presidential assassination: part III: the Roosevelts." *Journal-Lancet* 85:189-92.

\_\_\_\_\_ (1965d). "The psychiatry of presidential assassination: part IV: Truman and Kennedy." *Journal-Lancet* 85:294-301.

Hempel, Carl G. (1965). "The theoretician's dilemma: a study in the logic of theory construction." In his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pp. 173-226.

Hennessy, Bernard (1959). "Political and apoliticals: some measurements of personality trait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36-55.

Hodgson, Richard C., Daniel J. Levinson, and Abraham Zaleznik (1965). *The Executive Role Constellation*. Boston: Division of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Holland, Norman H. (1968). *The Dynamics of Literary Respons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lt, Robert R. (1967). "Individuality and generalization in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 In Richard S. Lazarus and Edward M. Opton, Jr. (eds.), *Personality*. Baltimore: Penguin.

Hook, Sidney (1943). *The Hero in History*. New York: John Day.

Horkheimer, Max, ed. (1936). *Studien über Autorität und Familie*. Paris: Alcan.

Hyman, Herbert H. (1955). *Survey Design and Analysi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_\_\_\_\_ (195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

Hyman, Herbert H., and Paul B. Sheatsley (1954).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In Richard Christie and Marie Jahoda (eds.),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pp. 50-122.

Inkeles, Alex (1963). "Sociology and psychology." In Sigmund Koch (ed.), *Psychology: A Study of a Science*, Vol. 6. New York: McGraw-Hill, pp. 354f.

\_\_\_\_\_ (1968). "Society, social structure and child socialization." In John A. Clausen (ed.), *Socialization and Society*. Boston: Little, Brown, pp. 73-129.

Inkeles, Alex, and Raymond A. Bauer (1959). *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nkeles, Alex, Eugenia Hanfmann, and Helen Beier (1958). "Modal personality and adjustment to the Soviet socio-political system." *Human Relations* 11:3-22.

Inkeles, Alex, and Daniel J. Levinson (1954). "National character: the study of modal personality and sociocultural systems." In Gardner Lindzey (ed.),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Cambridge, Mass.: Addison-Wesley, pp. 977-1020. Revised and expanded in Gardner Lindzey and Elliot Aronson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ition, 1969, Vol. 4.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pp. 418-506.

\_\_\_\_\_ (1963). "The personal system and the sociocultural system in large-scale

organizations." *Sociometry* 26:217-29.

Jackman, Robert W. (1970). "A note on intelligence, social class, and political efficacy in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s* 32:984-9.

Jessor, Richard and Shirley L. Jessor (1973). "The perceived environment in political science: some conceptual issues and some illustrative dat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16:801-28.

Kagan, Jerome, Howard A. Moss, and Irving Sigel (1970). "Psyc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styles of conceptualization." In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ed.),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203-42.

Katz, Daniel (1960).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attitud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4:163-204.

\_\_\_\_\_. (1973). "Patterns of leadership." In Jeanne N. Knutson (ed.),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p. 203-33.

Katz, Irwin, and Lawrence Benjamin (1960). "Effects of white authoritarianism on biracial work group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1:448-56.

Kecksemeti, Paul, and Nathan Leites (1947). "Some psychological hypotheses on Nazi Germany: I."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6:141-83.

\_\_\_\_\_. (1948a). "Some psychological hypotheses on Nazi Germany: II."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7:91-117.

\_\_\_\_\_. (1948b). "Some psychological hypotheses on Nazi Germany: III."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7:241-70.

\_\_\_\_\_. (1948c). "Some psychological hypotheses on Nazi Germany: IV."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8:141-64.

Keniston, Kenneth (1970). "Student activism, moral development, and mor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40: 577-92.

\_\_\_\_\_. (1973). *Radicals and Militant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Empirical Research*.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Keniston, Kenneth, and Michael Lerner (1971a). "Campus characteristics and campus unres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95:39-53.

\_\_\_\_\_. (1971b). "Selected references on student protes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95:184-94.

Kerpelman, Larry C. (1972). *Activists and Nonactivists: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New York: Behavioral Publications.

King, Anthony (1968). "Why all governments lose by-elections." *New Society* 11:413-5.

Kirscht, John P., and Ronald C. Dillehay (1967). *Dimensions of Authoritarianism*.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Kline, Paul (1972). *Fact and Fantasy in Freudian Theory*. London: Methuen.

Klineberg, Otto (1950). *Tensions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Bulletin 62.

Kluckhohn, Clyde, and Henry A. Murray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David M. Schneider (1953). "Personality formation: the determinants." In Clyde Kluckhohn and Henry A. Murray (eds.), *Personality in Nature, Society, and Culture*, 2nd edition. New York: Knopf, pp. 53-67.

- Knutson, Jeanne N., ed. (1973).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Kogan, Nathan (1956). "Authoritarianism and repressio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34-7.
- Kroeber, Alfred Louis, and Clyde Kluckhohn (1952).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Papers of the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 47: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 Lane, Robert E. (1959a). "Fathers and sons: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belief."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501-11.
- \_\_\_\_\_ (1959b). "The fear of equa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March), pp. 35-51.
- \_\_\_\_\_ (1959c). *Political Life*.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_\_\_\_\_ (1962). *Political Ideology: Why the American Common Man Believes What He Does*.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 Lane, Robert E., and David O. Sears (1964). *Public Opin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Lasswell, Harold D. (1930).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printed in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Harold D. Lasswell* (1951), Glencoe, Ill.: Free Press. Also reprinted in paperback edition with "Afterthoughts: Thirty Years Later" (1961), New York: Viking.
- \_\_\_\_\_ (1948). *Power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Norton. Paperback edition without appendix (1962), New York: Viking.
- \_\_\_\_\_ (1951). "Democratic character." In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Harold D. Lasswell*.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_\_\_\_\_ (1960). "Political character and constitution." *Psychoanalysis and the Psychoanalytic Review* 46:1-18.
- \_\_\_\_\_ (1968). "A note on 'types' of political personality; nuclear, co-relational, developmental."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4:81-91.
- Lasswell, Harold D., and Abraham Kaplan (1950). *Power and Society: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azarsfeld, Paul F., and Allen H. Barton (1951). "Qualitative measure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lassification, typologies, and indices." In Daniel Lerner and Harold D. Lasswell (eds.), *The Policy Sci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zarsfeld, Paul F.; Anna K. Pasanella; and Morris Rosenberg (1972). *Continuities in the Language of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Leighton, Alexander H. (1967).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prevalence of mental illness in contrasting communities." In the Lord Platt and A. S. Parkes (eds.), *Social and Genetic Influences on Life and Death*. New York: Plenum, pp. 97-111.
- Leites, Nathan C. (1948). "Psycho-cultural hypotheses about political acts." *World Politics* 1:102-19.
- \_\_\_\_\_ (1951). *The Operational Code of the Politburo*. New York: McGraw-Hill.
- \_\_\_\_\_ (1953). *A Study of Bolshevism*.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_\_\_\_\_ (1959). *On the Game of Politics in Fr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71). *The New Ego*. New York: Science House.
- Lerner, Michael (1969). "A bibliographical note." In Fred I. Greenstei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Problems of Evidence, Inference, and Conceptualization*. Chicago: Markham, pp. 154-84. Paperback edition, New York: Norton, 1975.
- \_\_\_\_\_ (1970). "Personal politics."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 LeVine, Robert A. (1960). "The internalization of political values in stateless societies." *Human Organization* 19:51-8.
- \_\_\_\_\_ (1973). *Culture, Society and Personality*. Chicago: Aldine.
- Levinson, Daniel J. (1958). "The relevance of personality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2:3-10.
- \_\_\_\_\_ (1959). "Rol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organizational setting."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170-80.
- Lewin, Kurt (1936). *Principles of Topological Psychology*. New York: McGraw-Hill.
- Lipset, Seymour M. (1968). "The activists: a profile." In Daniel Bell and Irving Kristol (eds.), *Confrontation: The Student Rebellion and the Univers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45-57.
- Lipset, Seymour M., and Leo Lowenthal, eds. (1961). *Culture and Social Character: The Work of David Riesman Reviewed*.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 Little, Graham (1973). *Politics and Personal Style*. Melbourne: Nelson.
- McClelland, David C. (1961). *The Achieving Society*. Princeton: Van Nostrand.
- McClosky, Herbert (1958). "Conservatism and personal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2:27-45.
- \_\_\_\_\_ (1967). "Personality and attitude correlates of foreign policy orientation." In James N. Rosenau (ed.), *Domestic Source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pp. 51-109.
- McClosky, Herbert, and John H. Schaar (1965).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of anomi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14-40.
- McGuire, William J. (1968). "Personality and susceptibility to social influence." In Edgar F. Borgatta and William W. Lambert (eds.), *Handbook of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Chicago: Rand McNally, pp. 1130-87.
- McKinney, John C. (1966). *Constructive Typology an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Mahrer, Alvin R., ed. (1970). *New Approaches to Personality Classific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andelbaum, David G. (1973). "The study of life history: Gandhi." *Current Anthropology* 14:177-206.
- Manis, Jerome G., et al. (1964). "Estimating the prevalence of mental illn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84-9, and the sources there cited.
- Marcuse, Herbert (1966). *Eros and Civilization*, revised edition. Boston: Beacon.
- Maslow, Abraham H. (1943). "The authoritarian character structur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8:401-11.
- Mazlish, Bruce (1972). *In Search of Nixon: A Psychohistorical Inquiry*. New York: Basic Books.

- Mead, Margaret (1942). *And Keep Your Powder Dry*. New York: Morrow.
- Melnik, Constantin, and Nathan Leites (1958). *The House Without Windows: France Selects a President*. Evanston, Ill.: Row, Peterson.
- Mercelman, Richard M. (1970). Review of Fred I. Greenstein,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Problems of Evidence, Inference, and Conceptual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919.
- Mikulas, William L. (1972). "Criticisms of behavior therapy." *Canadian Psychologist* 13:83-104.
- Milgram, Stanley (1961).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studying national differences." *Scientific American* 205:45-51.
- Mischel, Walter (1968). *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 New York: Wiley.
- \_\_\_\_\_ (1969).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persona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24:1012-18.
- Mitscherlich, Alexander (1969). *Society Without the Father*. London: Tavistock.
- Money-Kyrle, Roger E. (1951). *Psychoanalysis and Politics*. New York: Norton.
- Murray, Henry A. (1968). "Personality: contemporary viewpoints: components of an evolving personalogical system."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 Neisser, Ulric (1967). *Cognitive Psycholog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 Neustadt, Richard E. (1960). *Presidential Power: 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 New York: Wiley.
- Osgood, Robert E. (1955). "Observations on the clinical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tensions." *Social Problems* 2:176-80.
- Parenti, Michael (1962). "Ethnic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a depth study of Italian-Americans."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 Parsons, Talcott (1947). "Certain primary sources and patterns of aggression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Western world." *Psychiatry* 10:167-81.
- \_\_\_\_\_ (1969). "The academic system: a sociologist's view." In Daniel Bell and Irving Kristol (eds.), *Confrontation: The Student Rebellion and the Univers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159-84.
- Payne, James L. (1972). *Incentive Theory and Political Process*.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 Payne, James L., and Oliver H. Woshinsky (1972). "Incentives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orld Politics* 24:518-46.
- Peterson, Richard E., and John A. Bilorusky (1971). *May 1970: The Campus Aftermath of Cambodia and Kent State*.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 Pettigrew, Thomas F. (1958). "Personality and socio-cultural factors in intergroup attitudes: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29-42.
- Proctor, Charles H. (1971). "Comment on Carr's Srole item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1107-8.
- Putnam, Robert D. (1971). "Studying elite political culture: the case of 'ideolog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651-81.
- Ray, John J. (1972). " Militarism, authoritarianism, neuroticism, and anti-social be

- havio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6:319-40.
- Riesman, David (1953). "Psychological types and national character: an informal commentary." *American Quarterly* 5:325-43.
- Riesman, David, and Nathan Glazer (1952). *Faces in the Crowd: Individual Studies in Character and Pol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bridged paperback with new preface (1965).
- Riesman, David, Nathan Glazer, and Reuel Denney (1950). *The Lonely Crow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Abridged paperback edition with new preface (1961).
- Rogow, Arnold A. (1963). *James Forrestal: A Study of Personality, Politics, and Policy*. New York: Macmillan.
- Rogow, Arnold A., and Harold D. Lasswell (1963). *Power, Corruption, and Rectitud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Rokeach, Milton (1960). *The Open and Closed Mind: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and Personality Systems*. New York: Basic Books.
- Rorer, Leonard G. (1965). "The great response-style my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63:129-56.
- Rosenberg, Morris (1965).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68). *The Logic of Survey Analysis*. New York: Basic Books.
- Rothstein, David A. (1964). "Presidential assassination syndrome."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1:245-54.
- (1966). "Presidential assassination syndrome. II. Application to Lee Harvey Oswald."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15:260-6.
- Rutherford, Brent M. (1966). "Psychopathology, decision-making,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0:387-407.
- Ryle, Gilbert (1949). *The Concept of Mind*. London: Hutchinson.
- Samelson, Franz (1964). "Agreement set and anticontent attitudes in the F scale: a re-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8:338-42.
- Samelson, Franz, and Jacques F. Yates (1967). "Acquiescence and the F scale: old assumptions and new data." *Psychological Bulletin* 68:91-103.
- Sanford, Nevitt (1959). "The approach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In James Leslie McCary (ed.),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 New York: Grove.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Logas Press (1956), pp. 255-319.
- (1973).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in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In Jeanne N.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p. 139-170.
- Schapiro, Meyer (1956). "Leonardo and Freud: an art-historical study." *Journal of Historical Ideas* 17:147-78.
- Schulberg, Herbert C. (1962). "Insight, authoritarianism and tendency to agre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orders* 135:481-8.
- Schwartz, David C. (1969). "Toward a theory of political recruitment."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22:552-71.
- Scott, Joseph W., and Mohamed El-Assal (1969). "Multiversity, university size, university quality and student protest: an empirical stud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4:702-9.

Scriven, Michael (1956). "A study of radical behaviorism." In Herbert Feigl and Michael Scriven (eds.), *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 and the Concepts of Psychology and Psychoanalysis;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88-130.

Shils, Edward Alpert (1954). "Authoritarianism: 'right' and 'left'." In Richard Christie and Marie Jahoda (eds.),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pp. 24-49.

\_\_\_\_\_ (1969). "Plenitude and scarcity: the anatomy of a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crisis." *Encounter* (May), pp. 1-18.

Singer, Milton (1961). "A survey of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 In Bert Kaplan (ed.), *Studying Personality Cross-Culturally*. Evanston, Ill.: Row, Peterson, pp. 9-90.

Skinner, Burrhus F. (1953). *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r*. New York: Macmillan.

\_\_\_\_\_ (1971). *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 New York: Knopf.

Smelser, Neil J. (1968). "Personality and the explanation of political phenomena at the social-system level: a methodological statemen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4: 111-25.

Smelser, Neil J. and William T. Smelser, eds. (1970).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ystems*, 2nd edition. New York: Wiley.

Smith, M. Brewster (1965). "An analysis of two measures of 'authoritarianism' among Peace Corps teach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33:513-35.

\_\_\_\_\_ (1968a). "A map for the analysis of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4:3, 15-28.

\_\_\_\_\_ (1968b). "Personality in politics: a conceptual map,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problem of political rationality." In Oliver Garceau (ed.), *Political Research and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77-101.

Smith, M. Brewster, Jerome S. Bruner, and Robert W. White (1956). *Opinions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Wiley.

Smith, M. Brewster, Norma Haan, and Jeanne Block (1970). "Social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student activism." *Youth and Society* 1:261-88.

Sniderman, Paul M. (1974). *Personali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niderman, Paul M., and Jack Citrin (1971). "Psychological sources of political belief self-esteem and isolationist attitud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401-17

Sofer, Elaine G. (1961). "Inner-direction, other-direction, and autonomy." In Seymour M. Lipset and Leo Lowenthal (eds.), *Culture and Social Character: The Work of David Riesman Reviewed*.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pp. 295-315.

Solomon, Richard H. (1971). *Mao's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omit, Albert (1972). "Review article: biopolitic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209-38.

Sonquist, John A. (1970). *Multivariate Model Building*. Ann Arbor: Survey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Spiro, Melford E. (1951).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the natural history of a false dichotomy." *Psychiatry* 14:19-46.

- Srole, Leo, et al. (1962). *Mental Health in the Metropolis*. New York: McGraw-Hill.
- Stagner, Ross (1936). "Fascist attitudes: their determining condition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7:438-54.
- Tannenbaum, Arnold S., and Jerald G. Bachman (1964). "Structural versus individual eff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9:585-95.
- Tiryakian, Edward A. (1968). "Typologie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6. New York: Macmillan.
- Titus, H. Edwin, and E. P. Hollander (1957). "The California F scale in psychological research: 1950-1955." *Psychological Bulletin* 54:47-64.
- Tucker, Robert C. (1965). "The dictator and totalitarianism." *World Politics* 17: 555-83.
- \_\_\_\_\_ (1973).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879-1929: A Study in History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Norton.
- Tyler, Stephan A., ed. (1969). *Cogni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Verba, Sidney (1961). "Assumptions of rationality and non-rationality in model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orld Politics* 14:93-117.
- \_\_\_\_\_ (1965). "Conclus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culture." In Lucian W. Pye and Sidney Verba (eds.),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512-60.
- Wallace, Anthony F. C. (1961).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Wallas, Graham (1921). *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3rd edition. New York: Crofts. Originally published 1908.
- Waltz, Kenneth Neal (1959).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ebster, Murray, Jr. (1973). "Psychological reductionism,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large-scale problem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258-73.
- Weinstein, Fred, and Gerald M. Platt (1969). *The Wish to be Free: Society, Psyche, and Value Cha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_\_\_\_\_ (1973). *Psychoanalytic Sociology: An Essa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Data and the Phenomena of Collective Behavior*.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 Weisz, Alfred E., and Robert L. Taylor (1969). "American presidential assassinations." *Diseases of the Nervous System* 30:658-9.
- West, Ranyard (1945). *Conscience and Society: A Study of the Psychological Prerequisites of Law and Order*. New York: Emerson.
- White, Elliott S. (1968). "Intelligence and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in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s* 30:50-68.
- Wilkinson, Rupert (1972). *The Broken Rebel: A Study in Culture, Politics, and Authoritarian Character*. London: Harper and Row.
- Willcox, William B. (1964). *Portrait of a General*. New York: Knopf.
- Winter, David G., and Frederick A. Wiecking (1971). "The new Puritans: achievement and power motives of New Left radicals." *Behavioral Science* 16:523-30.
- Wolfenstein, E. Victor (1967). *Th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 Lenin, Trotsky, Gandh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69).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Belmont, Cal.: Dickenson.

Wood, Oscar P., and George Pitcher, eds. (1970). *Ryle: A Collection of Essays*. Garden City, N.Y.: Anchor-Doubleday.

Yinger, Milton. (1973). "Anomie, alienation and political behavior." In Jeanne N. Knutson (ed.),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Zaleznik, Abraham (1965).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in organizations." In James G. March (e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Chicago: Rand McNally, pp. 574-613.

\_\_\_\_\_ (1966). *Human Dilemmas of Leadership: A Pioneering Study of the Tensions and Conflict Inherent in Assuming Responsibility a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 Strengt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第二章 政治社會化

David O. Sears 著  
王 浩 博 譯

一個人的行爲一般被分析爲是過去歷史及目前時期之影響的一種共同作用。關於政治社會化的研究乃想處理成人政治態度與行爲之歷史性影響——至少曾在個人的人生旅程中，而且對其生活空間有某種極近關係的那部分歷史。本章的主要目的即在摘要敘述目前政治社會化知識的狀況。我的意願在使專業性的讀者及研究者，對這個正伸展的領域能夠跟得上時代，以及提供有關文獻的參考。首先，我必須坦白地說，「目前的知識狀況」並非總是允許做非常確定的結論。因此，在許多情形中，我對使各種相干的理論假定能夠明白及提陳任何可用資料（經常不足）同樣地注意。我的希望是這條途徑可以有助於精確顯示目前仍存在的基本實證問題。依此意義，則本章不僅是一篇學科狀態報告，而且我希望也是更進一步研究的一篇結論。

因此，本章主要注重的將是在「政治社會化」這個名詞下所涵蓋的幾個領域之實質理論與研究的狀態，而非對整個領域作某種重要的縱覽。然而，爲了取向的目的，我仍將由淺談與此學門有關者開始——包括它的歷史、與其相干理論有關的政治內涵、及它所陷入的一般性問題（但最後一點之評價將延至本章之末，以便它可以根據該學門之實際進展來處理）。

當然，從柏拉圖到盧梭到毛澤東，幾乎在每個時代的政治理論中，皆有人預想到政治社會化這個

領域。就其變成當前之形態的時期而言，則主要來自一九二〇年代，及一九三〇年代之美國人的公民教育研究（參閱 Merriam, 1931; Wilson, 1938）。不過，它進入經驗取向之政治行為的著作中，還要多少延後些，例如在一九五四年之社會心理學手冊中有關投票的著作之摘要裏，根本還不太提到它（Lipset et. al, 1954, pp. 1143-1150）。然而，這方面的研究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末及一九六〇年代初，突然開始興隆，主要是受海曼（Hyman）的評論性文章（一九五九年）及佛烈德·格林斯坦（Hess and Easton, 1966; Hess and Torney, 1967; Easton and Dennis, 1969）。到了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研究量大增，使得一九六九年版的社會心理學手冊就關於政治行為的評論性文章花了超過三分之一的篇幅在政治社會化上（參閱 Sears, 1969a, pp. 370-399, 414-419, 438-443）。而從那時起，研究的產出乃以幾何的比率增加，導致最近幾本教科書及選讀的出版（Adler and Harrington, 1970; Bullock and Rodgers, 1972; Dawson and Prewitt, 1969; Dennis, 1973; Greenberg, 1970a; Jaros, 1973; Riccards, 1973; Sigel, 1970; Weissberg, 1974）。本文的書目也可視為這個領域之研究者雜亂蕪章的一個證言（有用的歷史與書目也已經由 Koeppe, 1970 及 Dennis, 1973 所出版）。

最常被研究之政治社會化的內容大致可分為三類：（一）對政治體系的依附（attachment to the political system），（二）黨派的態度（partisan attitudes），及（三）政治的參與。「依附」通常被界定為注意政治體系或「政權」（regime）之制度、結構、及規範；而「黨派性」注意當前在位者之「權威」（authorities）及其他競爭權力與影響之個人、團體、政策姿態、及意理（Easton, 1965）。依附與黨

派性間的區分，雖初看直覺地令人感到愉快，從實證的觀點看，卻變為令人不舒服的一個模糊區分，讀者在後面就可見分曉。不過，每一方面的研究卻是如此自發地來自另一方面，因此，他們將在此處十分自然地以兩個各別部分來討論。

第三個內容——政治參與，由於好些不同的理由不在此處考慮。依附和黨派性主要牽涉到態度，而參與大部分涉及公開之行為的舉動，所以實在難於以任何一個極統一的理論性組織去適合兩套現象。特別是，它們的發展可能以極不相同的方式與生命循環相關（參考 J. D. Barber, 1968; Jennings and Niemi, 1968b）。不過，凡是比較對參與感興趣的，應參考本叢書第四冊之威巴（Verba）與奈伊（Nie）的文章。

「政治社會化」曾經以廣泛不同的方式加以界定，不過它們可濃縮成兩種主要的途徑。最傳統的界說，意含「社會」根據某個先驗的型模，（通常是為使現狀長久的一個型模），來「模塑兒童」（society's molding of the child）。「灌輸」（indoctrination）、「涵化」（acculturation）、「教化」（civilizing）、「文化的傳遞」（cultural transmission）及「適應文化規範」（adopting cultural norms），這些名詞皆是這個用法之同義字。藍敦（Langton, 一九六九年，四頁）以下面這種方式說：「政治社會化，就最廣泛的意義而論，即指社會將其政治文化從一代傳遞到一代的方式。」另外一個較常被忽視的界說是強調「兒童之特質的個人成長」（the child's idiosyncratic personal growth），在此種成長中，發育中的人逐漸達成其自身的個人認同，此種認同使他得以表達自己，並尋求以其自身的方式來應付自己的特性需求與價值。兩者對於觀察兒童的政治意向，或觀察其在生命

歷程中如何轉變，皆不是一個必然的先決條件，或一個努力的後果。政治社會化的研究未必是現狀之符合與維持的研究；儘管曾有人這麼批評。

政治社會化的理論一般也採取兩種形式的其中之一，即如伊登與丹尼斯（Dennis；一九六九年）所曾提過的：「心理的」或「政治的」。「心理的」理論視個人的意向（如兒童之政治態度、政治介入之層次等）為其興趣的主要產出變項，而「政治的」理論只是視其為與政治體系之某個面向（例如它的存續），或政治性政策有關主要產出變項之路上的一個小站。

再以另一個方式說明，對於政治學家，研究政治社會化最基本的理由，乃是早期的態度獲取在政治體系中有某種最後的影響。當然心理學家，天生對發展過程本身較感興趣，而此可能導致一些漂亮而令人迷惑的對白。盤據於政治學家心中之政治性內容（例如政黨認同），可能看起來在心理學上屬於外圍的，因而對發展的心理學家而言，是令人厭倦的；然而奧秘的心理學理論，若與成人之政治行為並無任何極明顯的相干（例如 Piaget 的那些理論），則在政治學家看來似乎並不相干的（參考 Greenstein 1970）。在本文中，心理學的理論將不會極詳盡地予以考慮。

認為政治發展發生的年齡範圍，多少年來一直有搖擺不定之感。今天，有一種傾向，即視「政治社會化」為未成年甚至青春前期政治行為的研究。這當然是對早期認為兒童沒有政治思想，公民成為選民們發展成熟之想法的一個反動。的確，關於政治依附之最有趣的研究，皆集中焦點於青春前期，雖然最近青春少年與年輕的成人已成爲很大的關懷。不過，在黨派性方面，發展顯然可能潛在整個人生旅程的許多重要點上，採取十分不同的形式。因篇幅所限，此處不擬較詳細處理在人生旅程較後

期的發展，不過早期社會化之遺跡的存續，乃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在本文之末將說明。●筆者認為這兩個問題在未來皆將處於研究注意的尖端，因此，就在另一部著作中廣泛地論述了（Sears, 1975）。

① 在筆者看來，整個人生過程的政治社會化，在未來將是愈來愈重要的一個研究領域。（就筆者所知）同樣的注意趨勢也已獨自發生於發展心理學。就某個意義而言，佛洛伊德重新發現了兒童，但只在最近才有發展心理學家再注意到比嬰孩及學前兒童更老的人（見 Baltes and Schaie, 1973; Kagan and Coles, 1972）。

任何一個吸引如此大量研究活動的領域，必定迅速吸引一些人主張此種努力之某部分全部為誤導的。其中有些評論者當然是建設性的批評，其他則只是惡意譏諷及抨擊。如欲尋求對此學問作比較有思考性之評價，則參閱 Dennis (1968, 1973), Greenstein (1970), Kavanagh (1972), Koeppe (1970), Marsh (1971, 1972), Searing, Schwartz, and Lind (1973), and Weissberg (1974)。目前的較大批評所主要關心的，就整體而言，可能發生方法學上的不足、政治的不相干性、研究中的保守偏見，及缺乏早期社會化遺跡的持續。如前文已指出的，本文之重要點在此領域之實質發現，而非整個領域的一個縱覽。筆者在本章之末，將回頭來談這些問題，因為它們在已從事之研究系絡中得到了最適當地處理。筆者要說（雖然在此不必詳盡地說）的是前三個批評；一般而言，筆者並不太支持；重要與有趣的問題顯然正在研究中；目前的方法學，與其說是完全誤導及誤引，不如說是尚未臻於完全；而近年來體系挑激的意向與體系維持的意向，皆已同樣受到研究。最後的一個批評，即關於早期社會化之遺跡的持續，倒真是引起一些有趣且到目前為止未解決的實證問題。不過，這些問題筆

者在本文結尾時，再予談論。

現在，就讓我們先談一談依附。

### 政治體系上的依附

兒童早期對政治體系符號的依附，曾經受到很大的注意，部分原因乃由於認其（對成人之一種政治正統感的發展）有政治上的重要性，部分原因則由於其為兒童對政治領域所作最早的情感反應之一，實際上，一個人究竟如何界定依附，或將之與比較黨派性的態度區分，並非如乍看之下那樣簡單的一個問題。我們在回顧有關依附之實證研究後，將再比較詳細地來討論此一問題。在「依附」之定義下，一般而言，其主要內容可以簡單地分類為包括對政權符號的情感（旗幟、公共建築、歷史文件、口號、光榮的民族英雄及事件），一般化的政治信任，對制度的支持，對公共政策的支持（特別是外交政策），及行為之與其相符，以及對政治遊戲之統治法則的支持。

#### 兒童時期的社會化：初期的觀點

一九五〇年代末及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由格林斯坦、伊斯登及海斯與其同事所收集的早期資料，為其後一切必須評鑑的工作提供了一套水準基準。他們的結論強調兒童對政府之人格化及理想化的觀點，以及因此兒童對政治體系之積極的情感依附。不過，他們的資料在周延性上有極嚴重之潛在缺

陷，因為他們所收集的，在時間上只是歷史上的一個點，而對象則主要為居住於城市及市郊之中產階級白人的美國兒童，首先，讓我們來簡要地評論早期研究之觀點（如欲更詳細的評論，請參閱 Easton and Dennis, 1969; Greenstein, 1965; Hess and Torney, 1967; 或在 Sears, 1969a 中的摘要），然後再考慮稍後在一個較廣之歷史的、國家的、與文化的情境中從事之工作所加的限制。

單純的大國沙文主義 最早的國家概念或政治體系的概念，兒童似乎以其自身之國籍概念所組成。（在調查各個不同的國家時）六歲兒童認為其他國籍的團體與他們自己不同，而他們的國人則皆是類似的（Lambert and Klineberg, 1967）。當兒童稍微長大，便獲得對自己國家不同符號的一種堅強積極的感情，儘管概念內容是相當含糊的。美國學齡兒童對美國國旗、美國及美國人具有堅強而積極的依附情感（Hess and Torney, 1967; Lawson, 1963）。對此種依附之一般性辯解（例如，美國因為其自由、民主而偉大），僅在稍後兒童開始進入青春時期才出現。

擬人化與理想化 兒童因認得政府中卓越的領袖們而開始接觸政府。例如，格林斯坦（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五年）抽樣調查四年級的學生中，發現有百分之九十六的人，都能舉出總統的名字；而對政府之其他方面就所知不多，因此兒童乃擬人化了政府，認為它只包含其偉大的領袖，而非機構、規章、法律或建築。例如，伊斯登與丹尼斯（一九六五年）發現二年級生，當要求其選「兩個最佳的政府形象」時，則傾向於選喬治·華盛頓與甘迺迪總統（百分之八十六）。同樣地，他們挑選總統為「治理國家」（也佔百分之八十六）及「制定法律」（百分之七十六）的代表。伊斯登與丹尼斯也下結論說，年幼的兒童們視警察為政府之化身，產生了調查者稱之為政府之「首與尾」（head and tail）

的一個早期接觸模式。

年幼的兒童們也傾向於「理想化總統」；二年級學生認為他與「父親」一樣為「我所最喜歡的人」；而百分之七十五的幼童認為「如果你寫信給總統的話，他會很關心你的所作所為」，而且有很高比率認為，「如果我需要的話」，總統「會隨時幫助我。」(Hess and Torney, 1967)。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四年級至八年級的學生中，對艾森豪總統的評價非常肯定，以致令格林斯坦描述艾森豪在他眼中為「一位仁君」。

年幼兒童們並不以同等程度來理想化其他的權威人物，不過他們一般對其所熟悉的各種權威與機構皆具支持的態度。例如，百分之七十二的四年級生說「政府」「幾乎從來沒有」或「很少」犯錯，而非「有時」、「經常」、「通常」或「幾乎總是」犯錯(Easton and Dennis, 1965)。他們對最高法院、一般政客、政治候選人及警察也都持類似的態度。而那時的成人們對總統也具有積極的、但非過度的態度(Greenstein, 1965)。但根據這些早期的研究，在其中最理想化的，就是在年幼兒童們眼中的總統形象，亦即政府的化身。

當兒童們年齡稍大後，他們對總統的理想化便降低，且他們不僅愈來愈以擬人的方式來認知政府，而更多以機構、法律、角色和其他的權威來認知政府；在伊斯登與海斯的研究中，八年級生將政府擬人化要少得多；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挑選華盛頓總統和甘迺迪總統為政府之象徵，只有百分之五十八認為總統統治國家，且只有百分之五認為他制訂法律(Hess and Torney, 1967)。年紀較大的兒童逐漸視機構(如國會)為體系之中心。而他們對其他政治角色和人物的訊息顯著地增加(Greenstein,

1965)。而且，對體系中其他權威的支持也增加了。

所以早期的研究發現，青春前期前的兒童們對於總統要比對其他任何一位公衆人物（或機構）來得熟悉，他們傾向於視總統為政府之化身，並把他理想化。當兒童們進入青春前期，他們變成比較知道政府的其他成分，日漸開始以團體與機構而非僅強調個人來認知政府，並且較少把總統理想化，雖然，他們一般還是支持其所熟悉的其他機構。

這種型態產生兩個一般的意涵。其一是心理的：兒童的擬人化及理想化，乃來自於他的認知限制、起源於動機或衝動之精神力量或行為需要（Greenstein, 1965; Hess and Torney, 1967）。另一個是政治的：這種早期的擬人化及理想化，被闡釋為兒童對政治體系之忠順，及其後成年時期對政治權威的正統性感覺的一個必要先決條件，而後者最終被視為是政治體系持續的一個重要先決條件（Easton and Dennis, 1969）。

### 後來的批評

從這一早期的研究之後，又做了許多研究，且考慮了一個範圍較廣的兒童及政治體系。研究者業已發現一個極不相同的兒童態度之形象。他們已經發現兒童並非一成不變地擬人化及理想化權威，且他們就這種早期的社會化對於後來之體系支持究竟有多重要，已經起了疑問。

不詳的發動者 兒童們以總統的形態（或國家的其他首腦）來把「政府」人格化的觀念，意味該角色佔有者之某種特殊的可見性。依此觀點，總統被認為突出於兒童生活空間之上，就如初民對神的

形像一般。但證據顯示，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並非一成不變地具有此突出性。

在美國，一般而言，總統的確在兒童與成人中同樣被視為最著名的公衆人物（Greenstein, 1965; Sears, 1969a）。在一次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舉行對十三歲兒童的調查中，有百分之九十四的兒童都可認出總統，百分之六十可認出副總統，但只有百分之十六或更少的兒童可以認出他們的參議員、國會議員、內閣官員或國會領袖（Greenstein, 1973）。法國戴高樂的情形（Roig & Billon-Grand, 1968）及英國女皇的情形（Greenstein, 1973）也都一樣。

但在其他國家，政治領袖並非如此爲人所熟知。在澳大利亞（Connell, 1971）及加拿大（Pammett, 1971），兒童之對美國總統的熟悉勝過對自己總理的認識。

且知識也非一成不變地個人化。的確，在法國、英國和美國的兒童們，對他們的領袖（首相、總統）的角色比對他們國家的立法機關有較多差別的形像（Greenstein, 1973）。但是，在加拿大，兒童們對國會比對總理知道得多（Pammett, 1971）；而在哥倫比亞，最年幼的兒童們較多將政府之中心歸於國會，將較多權力歸於最高法院而非總統（Reading, 1968）。

國家的首腦是否在兒童的英雄譜中佔居中心的主宰地位呢？顯然並不如此。兒童們的「榜樣」（你最喜歡像誰？）曾經在幾個研究中調查過，格林斯坦於一九五八年的研究中發現，只有百分之三提及總統，另外百分之七提到華盛頓或林肯（一九六五年）。在英國一九六九年的調查，百分之十七的女孩舉女皇或皇室中之某人，而只有百分之二舉某位當前的政治人物；對於男孩，則分別是百分之八與百分之七（Stradling, 1971）。以上兩個研究也回顧了所有已做過的調查，十分令人驚訝地，其

情形竟與本世紀之初的調查一樣。而一九六四年之法國兒童在列舉對法國最有貢獻的人時，幾乎完全忽視戴高樂總統，而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兒童列舉巴斯德（Pasteur；譯按：為法國之化學家及細菌學家，狂犬病預防接種法及牛乳殺菌法之發明者；Roig and Billion-Grand, 1968）。這些當然不是國家首腦有巨大中心地位的案例。而一九六七年對德國高中生所作的試驗，很少人列舉當前的領袖為他們國家最值得自豪的人物，而有百分之二十二之兒童列舉希特勒為他們最感「不」自豪的人物（Baker, 1970），所以，即使處於中心地位，一個國家的領袖可能不是一位英雄。

因此，我們並未得到任何極堅強的證據說，兒童把任何對一位堅強領袖的需求加諸於對自己之政治體系的認知上。相反的，他的中心地位是一些某些時候的事物，較依賴於他在體系中的實際角色及特殊聲譽，而非兒童們的需要。無論如何，他在兒童的英雄譜中，並非經常居於一個十分中心的位置。

惡意的及（或）可能犯錯的領袖 兒童們通常並不對國家首腦都具有一種巨大的理想化的觀點。最初的「仁君」乃是在艾森豪時代末期及甘迺迪時代初期的白人中間階級的兒童中發現的（Greenstein, 1960, 1965; Hess and Easton, 1960; Easton and Dennis, 1965）。現在我們已經從一個較廣的歷史階段（包括其他較不孚人望的總統），從一個較廣範圍的人口及其他政治體系得到資料，而產生的一個十分不同的形象。

即使在基本上同樣年齡的團體中（大約九歲至十四歲），其後的總統就從未得到這種理想化的觀點。一九六七年，賈羅士、霍士奇及佛雷龍（Jaros, Hirsch and Fleron；一九六八年）發現在阿帕

表一 從百分比來看一九六八年及一九七六年青春期前兒童對突出之公共人物的評價

| 受難的領袖及家庭           | 樣本       | 喜(1)歡 | 不喜(2)歡 | 不確定(3)沒有感覺 | 不知道(4)的人 | 淨感情 |
|--------------------|----------|-------|--------|------------|----------|-----|
| 約翰·甘迺迪總統*<br>(刺殺後) | 一九六八 S 一 | 九五    | 一      | 二          | 一        | 正九四 |
| 羅伯·甘迺迪參議員<br>(刺殺前) | 一九六八 S 一 | 七二    | 六      | 一六         | 四        | 正六六 |
| 泰德·甘迺迪參議員          | 一九七一 F   | 六〇    | 七      | 二二         | 一一       | 正五三 |
| 馬丁·路德·金<br>(刺殺後)   | 一九六八 S 二 | 七八    | 五      | 一四         | 二        | 正七三 |
| 在位的總統              |          |       |        |            |          |     |
| 林頓·詹森*             | 一九六八 S 一 | 四六    | 二二     | 二五         | 五        | 正二三 |
| 理查·尼克森             | 一九七一 F   | 三一    | 三九     | 六          | 二四       | 負八  |
| 其他政治領袖             |          |       |        |            |          |     |
| 羅納·雷根州長*           | 一九六八 S 一 | 二六    | 四九     | 二一         | 四        | 負二三 |
| 羅納·雷根州長            | 一九七一 F   | 二四    | 三八     | 一四         | 二四       | 負一四 |
| 理查·尼克森             | 一九六八 S 一 | 二二    | 二〇     | 三〇         | 二九       | 正二  |

|                  |                     |    |    |    |    |     |
|------------------|---------------------|----|----|----|----|-----|
| 韓福瑞副總統           | 一九六八 S <sub>1</sub> | 三七 | 八  | 三五 | 二一 | 正二九 |
| 穆斯基參議員           | 一九七一 F              | 一四 | 九  | 四九 | 二八 | 正五  |
| 少數民族領袖           |                     |    |    |    |    |     |
| 西撒·恰培芝           | 一九七一 F              | 一九 | 一四 | 四七 | 二〇 | 正五  |
| 安希拉·大衛士          | 一九七一 F              | 一八 | 二〇 | 三九 | 二三 | 負二  |
| 馬丁·路德·金<br>(刺殺前) | 一九六八 S <sub>1</sub> | 二一 | 一九 | 二二 | 三八 | 正二  |

注意：受測的兒童爲在加州之沙卡拉明多各公立學校，第一次在四月(S<sub>1</sub>)，第二次在六月(S<sub>2</sub>)，一九六八年(n=11284)；及在加州之佛連梭各公立學校(F)，時間爲一九七一年二月(n=1946)，年齡範圍是九—一四；在沙卡拉明多，種族分配爲百分之六十七英裔，百分之十四黑人，百分之十一墨裔；在佛連梭，其比率分別爲百分之四十一，百分之二十八，及百分之二十五。其餘兒童來自各不同種族團體。

\* 只有在這些案例中，提供個人的頭銜；在所有其他的案例中，只有他們的名字。

拉契山區的一個擁護共和黨的區域中，白人兒童對詹森總統完全沒有很積極的評價，且這些研究者引用「惡君」(malevolent leader)這個名詞來描述該羣少年們的譏諷。我們一九六八年及一九七一年在加州所作抽樣測驗的兒童中，對詹森及尼克森之評價充其量爲不十分熱心的(如表一所示)。同樣地，貝南寇德(Vailancourt；一九七二年)於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發現，舊金山灣區域的兒童

對詹森與尼克森的評價消極多於積極。脫累 (Tolley, 一九七三年) 於一九七一年很廣泛地測驗了不同的青春期前兒童，而發現對尼克森之越南的處理有極大的消極態度 (六五頁)；即使在想像中認為理想化的三年級學生，其積極評價的數目也並未大大超越那些消極的評價 (六十九頁)。在這裏，他使用了「可能犯錯的領袖」這個名詞。②

② 相當有趣的是，方法論上的差異，可能造成這些回答的相當差異。格林斯坦訪問了十至十四歲的孩子，問道：「一個新的孩子來到你的學校，他來自另一個國家，他對你說，『美國有些事我不太懂。請告訴我美國總統是怎麼一回事。』」在一九六九年 (尼克森政府開始之時) 及一九七三年 (水門事件正爆發中)，約有半數回答是積極的，而幾乎無消極的回答，在這個過程中，與本文中所舉的那些不同的有：(1) 尼克森本人未被提及；(2) 兒童乃直接對一個成人談話；及(3) 他十分可能「輕描淡寫 (他的) 國家的腫瘤」，而成爲外國兒童「到華盛頓的一個愉快嚮導」。一切皆可能努力朝向更正面的評價。見 Greenstein (1973) and Greenstein and Tarrow (1970)。

在其他國家的兒童研究中，未曾有巨大的理想化出現。羅伊格 (Roig) 與畢龍·格蘭德 (Billon-Grand, 一九六八年) 發現法國兒童對當時的戴高樂總統的消極評價之可能性比積極評價大得多。而在英國學童中，史特拉德齡 (Stradling) 和祖力克 (Zurick, 一九七一年) 發現對英國的政黨領袖很少理想化，且有許多消極的評價。格林斯坦與塔羅 (Tarrow, 一九七〇年) 在一個使用投射技術的研究中，也得到類似的發現：在美國對國家元首之積極評價多少超過消極評價，但法國與英國則異

是。阿伯蘭山 (Abramson) 與英格哈特 (Inglehart, 一九七〇年) 報導說，在英國及紐西蘭，對國王有早期的理想化，但對法國總統或三國之首相則極少。

甚至更顯著的是，有人發現在某些社會團體中的兒童，對於總統具有明顯的消極態度，而非早期的理想化，在我們的加利福利亞抽樣中，如表二所示，青春期前之黑人兒童及墨裔美人兒童，皆對尼克森有高度的消極態度，同樣的發現有加西亞 (Garcia, 一九七三年)、西卡 (Sica, 一九七二年) 和脫累 (一九七三年) 等的報告 (一九七三、七二頁)。另一方面，在甘迺迪及詹森政府期間收集的資料，即在總統對黑人空前的支持期間，年幼的黑人兒童，顯示對總統有相當高的積極態度，且經常比那些白人兒童更支持 (Jaros, 1967; Abramson, 1972a, p. 1264; Sigel, 1965, 1968)，到了一九六八年多少就降低了 (Greenberg, 1970d)。在脫累關於越南態度的研究中，中等收入的白人兒童 (八二頁) 及來自軍眷家庭的兒童，比那些來自上等收入及 (或) 民間家庭的兒童對尼克森總統表示了較大的積極態度。

附加說明一下，早期所從事的一些調查，發現兒童早期對政治體系的依附，由於他們以警察的形象來擬人化及理想化政府而有所促進 (Easton and Dennis, 1969)，但最近幾年來，顯然並非所有的兒童都理想化警察，猶如他們之不願理想化不孚人望的總統。在洛徹斯特 (Rochester) 一九六九年的一次調查中發現兩個種族的兒童，尤其黑人兒童，比一九六〇年代早期較不常認為「所有的法律皆公正」一樣真實 (Liebschutz and Niemi, 1974)。而在最近之每一個比較兩種族對警察態度的研究中 (Elder, 1970; Laurence, 1970; Greenberg, 1970b, 1970d; Engstrom, 1970; Rodgers and

Taylor, 1971), 黑人兒童皆表現比白人兒童對警察具有更大的敵意。這似乎反映了成人意見之差異。在一九六〇年代從事對成人之研究, 一再地發現在黑人當中有同樣反警察的敵意(參考 Campbell and Schuman, 1968; Sears and McConahay, 1973)。

表二：對政黨與領袖評價的種族差異，以百分比表示淨感情

|         | 黑人      | 墨裔美人 | 英裔美人 |
|---------|---------|------|------|
| 泰德·甘迺迪  | 正 六六    | 正 六〇 | 正 四〇 |
| 民主黨     | 正 二〇    | 正 一三 | 正 一四 |
| 共和黨     | 負 一〇    | 負 五  | 正 一三 |
| 理查·尼克森  | 負 三七    | 負 二八 | 正 二〇 |
| 羅納·雷根   | 負 四八    | 負 二四 | 正 二二 |
| 安希拉·大衛士 | 正 三四    | 負 四  | 負 二三 |
| 西撒·查培茲  | 正 一〇    | 正 三四 | 負 一一 |
|         | N = 二六一 | 二三四  | 三九〇  |

資料來源：一九七一年佛連梭資料(見表一詳情)，所得數目記載是根據對下面一個問題各種族團體之反應，把說「喜歡」的百分比減去說「不喜歡」的百分比而得。這個問題是，「你對(這個人) / 所擔當

(的這個職務) 感覺如何？」

艾克與甘迺迪家人之特殊吸引力 早期研究的理想化，如何能夠與其後許多研究所出現之混雜態度特徵加以妥協呢？我們在此處不妨說，早期的發現多少只是一件歷史性的意外。伊斯登與海斯及格林斯坦的計劃，乃在艾森豪與甘迺迪政府時從事的——前者剛好是在一段圍繞於一極孚人望之總統身邊極少黨派爭論的時期，而後者，我們要說，是一位對兒童有不尋常吸引力的總統。

艾森豪總統在兒童中口碑極佳，但他同時也在成人中聲譽甚隆。即使在他成為總統之前，他就已榮登全國最受敬仰之人的榜首。在他八年任職期間，他的聲望不斷地維持在自羅斯福後比任何總統皆高的水準上。即使他的侵略性黨派政治，亦未對他的人望有多大的傷害。在他自己競選期間（Campbell et al., 1960; Converse and Dupoux, 1966），在他任職期間（Mueller, 1973），及在他的副總統想直接接任而企圖不成功期間（Key, 1966, p. 140），艾森豪成功地維持了選民的大量支持，甚至於來自民主黨人、史蒂芬生派人士及甘迺迪派人士的支持。的確，比起杜魯門、詹森及尼克森在其任期中聲望大失的情形（即使甘迺迪也在其未完成之第一任中多少有些下降），艾森豪之保持大量人望，想起來十分驚人。而且可能還如格林斯坦說的（一九六五年），兒童們甚至於比成人更喜歡艾克，但即使在成人中，相當少人不喜歡他。

約翰·甘迺迪則就不同了。他上任時並無此種顯赫之信任與人望。身為一無經驗的年輕人，在經過一場帶有艱苦的宗教性偏見的競選後，他以此些微差數贏取了一九六〇年的選舉。雖然他迅速地在成人中贏得了相當的人望，他最後一年的評價與其後那些在同樣時期的總統並無二致。不過，由於一般而言，總統的聲望似乎是一朝在職便要下降，所以這意味着，甘迺迪之短暫的總統職位，就平均而

言，似乎比其他那些人爲較孚人望些（Meiler, 1973）。所以，有證據說甘迺迪，和艾克一樣，爲在成人中有不尋常之人望的總統。

但除此之外，甘迺迪（及其兄弟們）似乎一向對兒童們具有不尋常的吸引力。也許此處最顯著的一個表現方式，就是拿甘迺迪兄弟與其他政治領袖相比較。這樣一個比較，在我們一九六八年與一九七一年之加利福利亞兒童抽樣中（即表一）做了。我們可以很明白地看出，受難的甘迺迪總統及活着的羅伯·甘迺迪與泰德·甘迺迪所得評價，遠超過其他任何領袖。唯一接近的對手是最近遇害的馬丁·路德·金。而受測當時之兩位在職總統、兩次測驗時的州長及一羣其他有很高聲譽的官員，皆遠不如甘迺迪家人望。即使在少數民族的兒童中，唯一能與甘迺迪家對抗的是馬丁·路德·金；如表二所示，安希拉·大衛士在黑人中較泰德·甘迺迪不孚人望，而西撒·查培效在墨裔美人中亦較泰德·甘迺迪不孚人望。●

● 表一所摘要的這些特別資料，並非只是一個強烈偏向民主黨人之樣本的加工品。沙加拉明多的兒童是百分之二十二民主黨與百分之十四共和黨；在佛雷斯諾，他們是百分之二十四民主黨及百分之十四共和黨。其餘的兒童沒有穩定的政黨認同。關於環繞這些兒童周圍之黨派意見的證據，一個獨自在沙加拉明多之雙親的回信調查，及兩個城市中兒童對其雙親與同學之黨派偏好的理解，兩者皆指出整個加州的人，一般的反映稍微有利於民主黨。但兩者的有利皆不足以大到可說明甘迺迪的大受人望。

可能有人會認爲，所有這些親甘迺迪的情感只是由於哀悼遇害的總統。的確，兒童們對第一個

甘迺迪的遇刺極爲懊惱，特別是那些在兒童階段末期的兒童。根據西格爾於遇刺後的調查（一九六五年），大多數兒童的情緒反應超過成人或青少年。兒童們更憂慮國家未來將發生什麼，而他們對甘迺迪總統的印象在他死後變得更理想化。根據渥芬斯坦的臨床研究（Wolfenstein and Kliman, 1965），青少年尤其深深地受到干擾，把他們未來將變成成人而必須被父母棄絕之預期、比較個人的未來對象的損失之感情都移置在他身上。

成人們也在甘迺迪死後把他理想化，半數的人稱他爲「這個國家所曾有過兩個或三個最佳總統之一」（Sheatsley and Feldman, 1965），雖然只有百分之五十九曾支持他不久前處理該職務的方式（Mueller, 1973）。而全世界的成人們顯然也有同樣的感覺，甚至鐵幕後亦然；例如，就在遇刺之前與之後，在波蘭的華沙所作的調查發現，甘迺迪突然被認爲是對維持世界和平曾經做過深遠貢獻的政治家（Sicinski, 1969）。而就在之後的年代，成人們（如格林斯坦所曾指出的）塑造了甘迺迪之偉大的神話而使其不朽——猶如在林肯死後所塑造的神話一樣。

然而，當首次刺殺的情緒影響退入記憶中時，成人們對剩餘的兄弟們並未維持這種高度的理想化。羅伯·甘迺迪在加州以些微差數贏取了一九六八年的民主黨初選，而泰德·甘迺迪在查巴奎狄克之後在成人中的評價，比在表一所述的兒童中要低得多。

其他案例之死亡或刺殺，也未使兒童留下對已故者如此高度的積極感覺，更別說他們在世的親人。康乃爾（Connell，一九七一年，一二六—一二八頁）報告說，澳大利亞的兒童爲羅伯·甘迺迪之被殺比爲他們自己的首相之溺死更惱怒。如表一所示，馬丁·路德·金在被刺後之支持者數顯著地

上升，但即使在他死後亦未得如甘迺迪家之受尊敬。白人兒童（及成人）一般並未為金氏之被刺而極端惱怒（Clarke and Soule, 1971）。更別說馬爾孔·X（Malcolm X）、米加·約勃斯（Medgar Evers）、喬治·林肯·洛克威爾（George Lincoln Rockwell）等人之被刺（Kirkham, Levy, and Crotty 1969; Hofstetter, 1969）或是對喬治·華來斯之幾乎成功的企圖了。

因此看起來，甘迺迪總統在被刺前（由早期研究所顯示）及被刺後（為其兄弟所共享）在兒童心中的巨大聲望，可能並非僅由於他為總統或他之被刺。那麼為什麼甘迺迪家人對兒童有如此特別的吸引力？沒有人真正知道。我們可以想像約翰·甘迺迪之慈愛而高度引人注目的父親身分，他自我嘲弄的幽默感，他個人的吸引力，他的活力，他鎮靜而堅強的樣子——所有這些加起來形成了每個人喜歡的爹地（或電影英雄）。他在一九六〇年代之核子對抗中看似防衛性的角色，可能使他變成對兒童特別重要。或者他可被看作年輕的大衛對抗年紀大的哥利亞。就我們而言，這都無關緊要；要點是任何兒童對總統之態度的評估，依賴於對艾克或約翰·甘迺迪之態度時，必然多數如早期之研究般，為有利地偏見所影響。

因此，這些發現對早期研究兒童進入政治體系，經由一個理想化之國家首腦（或）警察的形態來擬人化政府這一點，提示了重要的限制。擬人化與理想化同樣似乎都在一個歷史的階段（一九五〇年代末及一九六〇年代初）及一個政治體系（美國）是最普遍的。其後的總統、警察及國家首腦，皆未從年幼的兒童中得到這種反應，且在美國之內，某些團體的兒童已顯示對總統及警察皆極明確地表示不支持，特別是當成人對這些人的評價有敵意及有衝突之時。

## 堅定的發現

如果早期開拓性的研究所形成的形象有待後來的研究加以修正，則早期所獲取與政治依附有關的內容，還有什麼堅實的實證發現留存著？如我們所已知的，各種態度之邊際次數的確相當地不同，但根據年齡、種族、國籍及性別，則似乎有某些可靠的規律性。所以讓我們在考慮比較最近之資料的理論應用前，先轉移注意力於這些顯然可答覆的發現上。

早期的堅決，後期的黨派性 八至一〇歲左右的小孩，（正開始逐漸知道政治的世界）對於政治世界的各種符號幾乎必然地比正在進入青春年紀之較大的小孩（亦即十二至十五歲左右）更為堅決。這種年齡的差異幾乎舉世皆然，超越了行政、時間、國家、種族團體、及政治社會化研究所會從事的地方。

年幼兒童之早期積極的情感，在青春期前的年齡範圍內，已經證明逐漸在消失的，計有下面這些方面：對荷蘭的女王與首相、及對法國的總統與總理（Abramson and Inglehart, 1970）；對哥倫比亞的總統（Reading, 1968）；對英國的政府、國家及黨領袖（Dennis, Lindberg, and McCrone, 1971; Stradling and Zurick, 1971）；對美國的總統（Easton and Dennis, 1969 Chapter 8; Greenstein, 1965; Tolley, 1973; Greenberg, 1970d）；蘇聯黨（Greenberg, 1970b; Easton and Dennis, 1969, Chapter 10）；對法律（Hess and Torney, 1967; Rodgers and Taylor, 1970）；對政府整體（Greenberg, 1970b, 1970c）；及對一般化的政治信任（Jennings and Niemi, 1974,

## Chapter 5)。

對於這種在兒童接近青春時期，在積極情感上的一般下降有什麼例外嗎？顯然地，只有很少爭戰或沒有爭戰的領域，如對美國國旗的情感 (Lawson, 1963) 或英國的君主制 (Abramson and Inglehart, 1970)，這兩方面皆未顯示隨著年齡而有任何顯著的變動。政治體系之規範細節，諸如有投票的義務或異議的權利，其評價似乎隨著年紀多少變得比較積極，但也許此乃由於增加的知識而非增加的依附 (Dennis, Lindberg, and McCrone, 1971; Gallatin and Adelson, 1970; Parnetti, 1971; Zellman and Sears, 1971)。不過，整個巨大的壓倒性的發現，是早期積極的情感隨著年齡而消失。

消極評價之數目的增加，其所以發生，主要是當兒童們對標準的政治符號走向較為黨派的評價時。黑人小孩在尊重警察方面顯示最大的下降 (Greenberg, 1970b)，而共和黨的小孩在敬仰甘迺迪總統上也顯示最大的降落 (Easton and Dennis, 1969)。現在尚不清楚的是，在那些長大後被期望如所談論之政治象徵的兒童中，積極情感是否也會下降，如民主黨的兒童之對於一個民主黨的總統。我們可利用的分析不允許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不過，似乎某種下降的確發生了 (cf. Easton and Dennis, 1969, p. 196)。亦即，積極情感的下降並非由於增加的黨派性。

有一些證據證明，政治智慧低的兒童，下降發生得較遲。智商低的小孩、女孩、阿米教派 (Amish) 譯按：為天主教之一支，其教義主張與世隔離、生活簡樸)、墨裔美人、持天真之種族態度的黑人，及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小孩，皆已顯示出對權威比其他的兒童維持較長的積極態度 (參考 Hess and

Torney, 1967; Greenberg, 1970b; Garcia, 1973; Sears, 1974; Jares and Kolson, 1974)。

**黑人的政治社會化** 另外一套一貫的發現，乃關於早期政治態度的種族差異。黑人兒童的政治社會化，近幾年來已經很自然地變成一個重要的實際問題，而且關於此，有一些很不同的意見。一方面，有米爾德 (Myrdal, 一九四四年) 知名的觀察，謂：「黑人為誇大的美國人，要比白人更熱情地相信美國的信條。」另一方面，有許多觀察者寫道，黑人之成長乃帶著比白人更譏刺、不平、不信任的態度，因為他們在美國一直受到不好的待遇。(參考 Greenberg, 1970a; Laurence, 1970; Bullock and Rodgers, 1972; Lyons, 1970; and many others.)

另外一個問題是這些種族的差異，(如果有的話) 近年來究竟如何在變動。在這兒主要的問題是，黑人早期的社會化是否已經從主流體系的支持變至政治的不平。被認為與此有重要關聯之急遽的歷史性變動，包括從幾乎整個二十世紀之廣大的人口變動(十九世紀、半文盲之南方鄉村的黑人移居至大量現代的北方城市貧民窟) 至較限制性歷史事件，諸如美國制度於戰後的整個取消種族隔離、一九五〇年代末及一九六〇年代初之民權抗議運動。以及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之都市暴亂 (Abramson, 1972a; Paige, 1970; Sears and McConahay, 1973)。

這些關懷可簡縮為兩個基本的問題：目前黑人兒童在政治依附方面，是否不同於其他可比擬的白人兒童？及此種差異是否隨著時間而有所變動？

首先，相對於白人的兒童，黑人兒童的確對黑人之黨派敵人(當這些敵人在過去十年被確定時) 顯然比較持消極的態度。他們比起白人兒童對警察及「法律與秩序」確是大大地持消極的態度

(Greenberg, 1970b, 1970d; Laurence, 1970; Rodgers and Taylor, 1971)；對越戰也比較消極 (Laurence, 1970; Tolley, 1973; Smookler, 1971)；對尼克森總統及其他保守的共和黨人亦較消極，如表二所示 (also Jaros and Kolson, 1974; Liebschuts and Niemi, 1974; Orum and Cohen, 1973)；且他們在政治生活中感到較少效力感及有權力 (Abramson, 1972a; Laurence, 1970; Lyons, 1970)。

另一方面，他們一貫地對其政治盟友，諸如甘迺迪家人，比白人兒童較為支持 (Sigel, 1965; 見表二)，而對詹森總統則較少支持 (Greenberg, 1970b, 1970d; Jaros, 1967; Sigel, 1968)。他們一貫地比白人兒童更拒絕人種的定型 (racial stereotypes) 而支持人種的反抗 (racial protest)。一九六八和一九七一年的黑人兒童，乃大力支持黑人種族，對種族問題知識豐富，黑人意識很高，親民主黨的黨派性很高，且政治知識亦高 (Laurence, 1970; Orum and Cohen, 1973)。④ 所以有很多證據證明，自一九六〇年代末以來，黑人兒童之高度黨派性的社會化。

④ 這些發現合於早期對於黑人成年人所觀察的模式；甚至接合於華茲區暴亂，暴亂區域中的黑人成年人乃最支持金 (King) 與白人自由派，而不支持黑人好戰分子及白人保守派 (Sears, 1969b; Sears and McConahey, 1973)。

但是對體系的依附如何呢？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問題，因為黨派性及依附間的界線很含糊。最不含混的依附測量似乎是那些對法律的服從與一般性政治信任的集中。這些測量一般並未顯出白人兒童

與黑人兒童間有何差別。在三個各別的研究中，並未發現在支持服從法律方面有種族的差異(Rodgers and Taylor, 1970, 1971; Engstrom, 1970)。在政治信任及政治的犬儒主義這個大領域中，有較多的證據可得，而其同樣顯示只有微小而不一貫的種族差異。阿伯蘭山 (Abramson 1972a) 之仔細的回顧(以及 Jennings and Niemi 之著作，一九七四年)指出，一九六七年前沒有種族差異，但他結論謂自那時起，黑人兒童比白人兒童一直較少有政治信任。不過，如阿伯蘭山所承認的，即使這個明顯的日後 (later-day)，暴亂後的犬儒主義也有疑問。政治信任的種族差異傾向相當微小，差異在百分之二及百分之十四之間，且其統計上的意義多數還有疑問。一九六八年由格林伯格 (Greenberg) 在費拉德爾菲亞和匹茲堡所做的一個研究，經常被引為一九六七年後黑人之無依附性的一個例子，但仔細檢查資料，我們發現在被理解政府的善意、積極角色的執行或對總統的支持等方面，並無種族的差異(雖然，黑人兒童在理解政府的義行方面較低)。所以，在這個領域中的十幾次研究裏，只有里昂 (Lyons, 一九七〇年) 在托雷多的研究與柯亨在伊利諾的那些研究顯示，在政治信任與政治的犬儒主義方面，有任何主要的與可靠的種族差異。

黑人兒童看來較為無依附的，是在那些公開的內容與依附有關的測量上，但對這些測量，他們顯然多數在反應種族的或政治的黨派性。近年來，他們對總統與警察之較大的敵意，可能反應了黑人對「當局」(the authorities) 而非對「政權」(或體系本身) 的黨派性反應。表二明顯地顯示出黑人對民主黨、泰德·甘迺迪及黑人領袖安希拉·大衛士有積極的反應，而對共和黨、共和黨領袖尼克森及雷根有消極的反應。

表三 種族差異：為黨派性與依附間劃一界限

|                                     | (不支持的%) |    | 種族的差異% |
|-------------------------------------|---------|----|--------|
|                                     | 白人      | 黑人 |        |
| 警察與政治的黨派性                           |         |    |        |
| 你認為警察可以被信任嗎？(不的%)                   | 二四      | 六〇 | 負三六    |
| 你覺得理查·尼克森怎麼樣？(不喜歡的%)                | 二九      | 五一 | 負二二    |
| 你認為總統比較願意幫助富人嗎？(是的%)                | 一六      | 三九 | 負二三    |
| 制度：總統與政府                            |         |    |        |
| 你覺得美國政府如何？(不喜歡它的%)                  | 一〇      | 一七 | 負七     |
| 你對「我們的政府」觀感如何？它經常、通常的%)             | 二四      | 三五 | 負一一    |
| 你時常認為總統犯錯？(時常的%)                    | 二〇      | 二五 | 負五     |
| 若你或你的雙親寫給總統一封信，他會心，根本不關心的%)         | 二一      | 二七 | 負六     |
| 對政府與州長們的批評                          |         |    |        |
| 你不應該說我們國家法律的壞話？(不同意的%)              | 四一      | 四二 | 負一     |
| 如果有一個人上電視說他不同意總統在越南所為，這完全沒有關係？(是的%) | 六二      | 五八 | 正四     |

一旦某個人被選為總統，你就不應說他所做事情的壞話？  
(不同意的%)

我們不應該說我們所投票支持者的壞話？(不同意的%)

你是否認為人們不抱怨而就讓政府去做它想做的，則人們會好過些？(不的%)

### 美國與外交政策

如果你是個男孩，剛好到達服役年齡你願意去打一場你認為是不好的戰爭嗎？(不的%)

其他的國家應當試使他們的政府完全像我們的政府？(不同意的%)

我們的政府知道什麼對別的国家最好？(不同意的%)

美國所打過的戰爭都是好的？(不同意的%)

我願見美國統治全世界？(不同意的%)

資料來源：一九七一年佛羅里達資料(見表一以知詳情)，由作者再加強調。

表三以另一種方式顯示黑人兒童對美國制度的基本支持，而對警察與尼克森的黨派性持敵意。他們對尼克森與警察的確較白人大大為反對，但當以一較為制度而較少黨派性的系絡來考慮時，則只是對「總統」與「我們的政府」有一點點反對而已。最後，在對政府及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方面，他們甚至於較白人為「更」支持。⑤唯一主要的例外是一個關於打不良戰爭的題目，這也許可以根據黑人

|    |    |     |
|----|----|-----|
| 五四 | 四〇 | 正一四 |
| 三八 | 二一 | 正一七 |
| 七〇 | 五三 | 正一七 |
| 三一 | 五一 | 負二〇 |
| 三九 | 二六 | 正二三 |
| 四二 | 二四 | 正一八 |
| 七三 | 五四 | 正一九 |
| 六四 | 四〇 | 正二四 |

對越戰之較大的反對來解釋。

⑤ 我們不應將後者太認真地視為相反。這些黑人兒童一般比白人兒童為屬於較低的社會階級；事實上，階級一般而言，在兒童中 (Greenberg, 1970d; Hess and Torney, 1967; Greenstein, 1965; Tolley, 1973) 及在黑人成人中 (Miller, Brown, and Raine, 1973; Sears, 1969b)，對依附是相反關係的，雖然在西卡 (一九七二年) 的墨裔美籍兒童研究中有相反的情形存在。此處關於黑人兒童所爭論之點，即他們相對於白人，乃是十分黨派性的，但非不依附的，在別處關於黑人成人處有過 (Sears and McConahay 1973，第十二章)。奈特林 (一九七二年，一九七四年) 曾經最仔細地引證了一個比較一般的觀點，即政治信任的測量，事實上，得到了許多關於在位者之黨派的感情。

或者，把我們一九七一年佛連梭的資料與格林斯坦一九七〇年比較積極的資料加以比較，前者有百分之十四的黑人說，他們「喜歡」尼克森總統，百分之五十一的黑人說，他們「不喜歡」他，後者有百分之二十八表示對總統的支持態度，只有百分之三不支持 (Greenstein, 1973)。但前者問了黨派性的問題，而後者要求兒童向一個外國小孩解釋美國總統 (而不提尼克森的名字)。所以，顯然地，黑人兒童對他們黨派性的反對者較為不信任。究竟除此之外，他們是否對政治體系為較不依附，則還有甚多疑問；的確，在已出版的文獻中，缺乏此種黑人不依附性的積極證據。

不過，在政治犬儒主義方面的較大種族差異，仍然有可認知的變動證據。歷史上，成人黑人似乎一直與白人一樣地對政治體系支持，當然，那些對他們有直接、具體和明顯不利的則為例外。我們已

在其他部份討論了這種形態 (Sears and McConahay, 1973, Chapter 12) ；其他的證據也易得到 (參見 Hero 一九六九年分析黑人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支持) 。但同樣的，我們也容易列舉著作以各種形式表現最近日增的政治不信任 (Aberbach and Walker, 1970; Miller, Brown, and Raine, 1973; Sears, 1969b) 。在這種變動中，政治社會化可能正在扮演何種角色呢？

在其他地方，我們曾說過，它一直以兩種一般的方式在運作 (Sears and McConahay, 1973) 。第一，相對於舊時鄉村的南方，當代北方都市貧民窟之新形態的早期政治社會化特徵，影響了年幼黑人兒童之最早的政治態度。特別是，在當代都市之北方中成長，假設為黑人兒童政治社會化中已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增加了他們的政治不平、黑人的自尊，及世故與政治積極主義。第二，青少年與年幼的黑人正被假設為已經由於最近之民權抗議運動及暴亂的時代而再社會化成為更大儒的 (譏諷的) 及好戰的觀點。這些社會化情況、早期社會化及再社會化中的變動，已導致了稱為「新都市黑人」的一代。這些變動也許已經增加了黑人對不利於其利益之政策，及在位者的反抗並促進了政治的暴力，但並未減少他們對政治體系的依附。

目前尚難以下定論證明，北方黑人戰後的社會化，已經不同於他們在二次大戰前南方鄉村的社會化。不過，許多博學的觀察者確認為還那樣。而成人的資料卻是一致的。西爾斯 (Sears) 與麥柯那黑 (McConahay, 一九七三年) 及貝基 (Paige, 一九七〇年) 已證明，較年輕的、在北方長大的——或西方長大的、都市的，受過較好教育的黑人 (這些人前一研究稱之為「新的都市黑人」) ；而 Caplan (一九七〇年稱之為「新的貧民窟人」) ，(相對於深居南方的及 (或) 鄉村長大的，較少受教育的

黑人)有較積極的黑人認同，較多反白人的敵意，較一般化的政治不信任及更政治世故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他們解釋這些差異為反應黑人早期政治社會化的歷史性變動，但當然，其證據乃間接的。

西爾斯與麥柯那黑探討了貧民窟暴亂之再社會化的影響 (一九七三年)，他們顯示了戰後洛杉磯華效區之成人黑人間的代間差異，與暴亂及更進一步暴力之渴欲解釋有關——但無其他變數之影響用來作為變動之早期政治社會化的指標。他們因此推論，「新的都市黑人」在較年輕的一代居於主宰之多數，把他們社會背景十分不同之同儕，有效地再社會化，並認為那些新事件，可能早期的社會化提供不了清晰的規範。而事實上，這種再社會化可能在暴亂前較長的一段時間早已一直在進行，因為民權運動已採取了一個又一個新奇而空前的戰術。

大量貧民窟暴亂的時代似乎也已經增加了黑人兒童、最有早期政治社會化之犬儒主義及不平。阿伯蘭山 (一九七二年 a) 之評論顯示，如果說黑人兒童比白人兒童有政治信任感，那是一九六九年前的事，而事實上，如果說有相反情形的話，從那時起也的確是那樣，黑人兒童對總統的感情從甘迺迪到尼克森的下降前面已有記載。所以看起來很有可能，暴亂時代對兒童之早期的社會化及後期青少年與年輕黑人的再社會化皆發生了影響，這兩種影響乃建立在隨著大量人口移動而來之黑人早期政治社會化中的某種較長期變動。

其他次文化及民族 關於抽樣及政治體系的研究限制，隨著時間 (及展示) 而變得愈醒目，因此愈來愈多之研究已經在中產階級的美國白人之外從事。例如，賈洛士 (Jacobs) 與科松 (Kojson) 一

九七四年)曾調查了阿米教派的兒童，這些兒童的父母，其形式的意理乃顯然反政治的。的確，他們對政治十分不熟悉，且可以說，他們多數長大後皆不計劃去投票支持國家或為國家而戰。

隨著墨裔美人好戰性的增長，開始出現了關於他們早期政治社會化的研究。我們將不再細論，但他們在各種依附性的測量中，看來與英裔兒童並無多大不同(例如身為美國人的驕傲或對政府仁心的理解)。不過，他們的政治性知識之水準要低得多。而在他們對保守的共和黨在位者(如尼克森總統與雷根州長)的評價，也更為消極。同時他們對警察與執法者也一直較英裔兒童更為敵意(Garcia, 1973; Sica, 1972)。

就潛在上而言，所有研究中最有意義的應該來自於對各不同類政治體系之政治社會化所做的比較。對政權的依附，目前已在廣泛不同的國家中研究，雖然迄今只是在民主的國家中。不過，很不幸，只有極少數曾經作過多國家的比較。在這些之中，阿伯蘭山與英格哈特(一九七〇年)、阿德生和畢歐(一九七〇年)、格林斯坦(一九七三年)及由東尼(一九七四年)與其他人所正從事的IEA多國研究是最佳的例子。從其他的研究，實在難以評定國家的差異，因為過程大不相同了。然而，其數量仍然令人印象深刻。也曾在英國從事過(Dennis, Lindberg, and McCrone, 1971; Stradling, 1971; Stradling and Zurick, 1971; Greenstein, 1973; Dennis et al., 1968; Blumler et al., 1971; Adelson and Beall, 1970)；在哥倫比亞(Reading, 1968)；義大利(Hennessey, 1969; Dennis et al., 1968; Barnes, 1972)；加拿大(Pamnett, 1971)；法國(Greenstein, 1973; Roig and Billon-Grand, 1968; Abramson and Inglehart, 1970)；澳大利亞(Connell, 1971)；西德(Baker,

1970; Adelson and Beall, 1970; Dennis et al., 1968; Weiler, 1971) • 菲律賓 (Tilman, 1970) • 日本 (Langdon, 1967; Okamura, 1968) • 荷蘭 (Abramson and Inglehart, 1970) • 坦桑尼亞 (Prewitt, Von Der Muhll and Court, 1970) • 及蘇格蘭 (Jahoda, 1963, 1964) 從事起。當然，大多數的研究（及研究者）仍然是來自美國。

### 一個體系持續的政治理論

伊斯登與丹尼斯（一九六九年）曾經做了最和協的努力來設計一個特殊性的「政治」理論，把兒童時期政治社會化與政治體系持續不同的變化加以連結。他們的理論確實是最具包容性、系統性，及有特殊的、可用性的，所以是值得加以評價的。

根據他們的理論，爲了使體系的持續盡量可能，早期的政治社會化應該如下般進行：首先孩子要通過與他有親身接觸之最近的人物（警察）及遙遠的政府中人的象徵（總統）而變成知道政治體系（政治化）。他因此視政府爲由這兩種人所代表（擬人化），而認爲他們是有力量的及仁慈的（理想化）。當孩子成熟時，這個早期理想化與擬人化的政府觀點，逐漸地演化成爲政府是由（兒童一般支持與喜歡的）制度所代表（普化了體系的支持）。公民間體系支持的普化（diffuse）被認爲對體系支持是重要的，至少就長期而言是如此。

這個理論中最基本的命題是：早期的理想化與擬人化，乃以後體系支持普化的必要條件。其意含是這種附帶發生的事物應該在個別的兒童中存在。伊斯登與丹尼斯對於這點未加驗證，而代之以證明

同一年齡羣之整體爲依循此一順序的（或至少在他們一九五〇年末及一九六〇年代初的美國白人兒童中是如此）。所以單從他們的資料，我們無從知道，對政府之早期的擬人化與理想化的觀點究竟是否爲其後普化之體系支持的一個必要先決條件。其他的資料多少與理論較直提相干，所以讓我們簡要地回顧一下。

我們早先提到的資料曾指出，美國兒童從未傾向理想化總統及警察，而其他民主國家的兒童並未一成不變地擬人化或理想化政府。就其本身而言，這並沒有證明什麼，因爲這些缺點，對於普化體系支持這些孩子中，可能是很重大的。然而，有幾個研究的確顯示，明顯的非理想化團體興起對體系堅強的支持。海內西（Hennessee，一九六九年）發現在義大利參加共產黨的青少年比非共產黨的青少年的更支持民主的規範。同樣的，表三之證據顯示，黑人兒童(1)比白人兒童對總統及警察更要詆毀，卻又(2)充分支持政府與國家。就此種情形看，他們早期之非理想化的態度，似乎並未妨礙他們對體系的依附。

即使如此，這些最不理想化的共產黨及黑人兒童，也可能是對他們的政治體系最不依附的，因此，比這些團體的比較更相干的，乃是兒童早期之理想化與其普化體系支持間的直接相關。曾經有兩個以一般的政治信任及服從法律爲指標的研究。恩格史多姆（Engstrom；一九七〇年）報導說，在白人兒童間理解到警察的仁慈與服從法律是相關的（ $\gamma = .30$ ），但在黑人兒童間則不然（ $\gamma = -.07$ ）。羅吉斯和泰勒（一九七一年）所從事的一個回歸分析同樣發現，對於白人兒童而言，對警察的有利態度，十分有助於服從法律及政治信任，但黑人兒童則不然。既然在兩個研究中，不同的種

族，對政府信任與服從法律都有所不同，則似乎對警察的理想化並非體系支持的一個必要先決條件。其他類似的資料曾在海外收集。卡瓦納夫（Kavanagh，一九七二年）觀察到丹尼斯、林伯格及麥柯隆尼（一九七一年）的資料指出，英國兒童對他們之特殊的政府形式，並非是高度愛國主義的，不過他們仍產生高度的忠順。史特拉德齡及祖力克（一九七一年）發現在英國的學童中，完全沒有趨向對英國君主政體的理想化與普化的體系支持相關（而Bumler等人，一九七一年，報導說英國成人也一樣）。而羅伊格及畢龍·格蘭德（一九六八年）發現在法國兒童中，沒有傾向對法國大革命的理想化與對目前法國政治體系的任何態度是相關的。

所以兒童並非總是擬人化及理想化的，而即使他們並不如此，他們也經常表現高度忠順。是故，到目前為止的證據，並未指出早期的人格化與理想化乃是在形成兒童普化的體系支持中重要的成分。

但所有這些關於兒童及成人的資料，沒有一個直接觸及到該理論（即以爲早期的社會化應該是其後成人期對政權之依附的準備）之基本的發展命題。這項聯結難以引證，所以大多數研究者皆只是假定它已存在，我們在本章之末，考慮所有各種早期社會化遺跡持續至成年期時，將回頭討論這一點。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即究竟在兒童期或成年期中是否真有「普化的體系支持」這樣一種單一的建構。在下一部分中，我們將以兩種形式來考慮這個問題，這兩種形式是：假定在兒童時期，這些對政治符號的積極感情與對政治體系的依附間有密切的關係；及假定在成人時期，依附與政治之正統性的某種後果意識間有密切的關係。

最後一點，要驗證伊斯頓——丹尼斯之觀點爲一個「政治理論」，需要基本的結果變項——政治

體系的持續——有一個範圍值。然而，伊斯頓與丹尼斯自己的資料只處理了它的一個值：一九六〇年代中期美國政治體系的狀態。因此，他們退回到只企圖說明那個時期美國兒童之普化的體系支持（或在各方面之個別差異）。這一來又變成了只是說明個別兒童之態度的一個比較「心理性」的努力而已，雖然由于對這些態度之較廣系統的後果，可能有不尋常的敏感而已有所聞了。

### 對體系依附的測量中黨派性的闖入

我們在前文開始時，先區分了「對體系的依附」與「黨派性」，因為它們一向被分開來研究。上面我們所討論過的一切研究皆想要闡明前者，事實顯然為關懷前者。我們在開始時曾提到此一區分有其問題，而我們將延緩考慮，直至研究發現本身的主旨要清楚了以後為止。現在就以一較系統的觀察來看「依附」此一概念的時候了。

此處最有影響力的分類，即那些由伊斯登（一九六五年）所提出的。他首先區分依附的三個可能標的物：(1) 政治社區 (political community)——一羣人政治性地連結在一起；(2) 典則 (the regime)——憲政秩序，包括供處理政治性事物，特別是有關誰支配權力，如何允許去支配，誰要服從及其服從的條件等的政治角色、制度、規則或規範；(3) 權威 (the authorities)——權威角色的擔任者。筆者對後面兩個標的物的反應，乃是政治社會化的領域中最常研究的。

在典則這一層次，主要的注意力集中於正統化的意理 (legitimizing ideologies)。他們關心對當前政權及權威統治的權利（亦即相信權威角色及其他典則結構之正統性）之支持或挑戰。許多我們

所討論中的研究皆欲調查普化體系的支持，亦即對典則與權威之正統性的一般化信念：「成員這方面堅信，他接受及服從權威，並且遵守典則的要求是對的及適當的。」(Easton, 1965, p. 278)。

另一方面，黨派的意理 (partisan ideologies) 關心的是每日政策的偏好，及特定在位者或候選人中黨派的偏好 (ibid., pp. 286-287, 336-338)。它們主要在「權威」的層次上受到注意，雖然並非完全關心在任之政治官員的評價。

因此，我們「對體系的依附」與「黨派的性向」已有了明顯熟悉的區分。其在理論上是相當清楚的。其在實際上的問題，主要來自於難以找出體系支持的指數，而較少來自難以找到黨派性的指數。這些問題既是概念性的，又是實證性的。

初看時，體系支持之測量的明顯內容，似乎並未顯出概念性的問題；多數似乎顯然注意「典則」層次而非「權威」層次。讓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上面我們已涵蓋的那些內容：(1) 政治信任、犬儒主義及不滿的一般化測量 (generalized measures of political trust, cynicism, and disaffection; Abramson, 1972a; Lyons, 1970; Sears and McConahay, 1973; Orum and Cohen, 1973; Rodgers and Taylor, 1971)；(2) 對制度的支持，如對立法機關 (Boynton, Patterson, and Hedlund, 1968) 司法機關 (Weissberg, 1972) 執政黨 (Dennis, 1966) 、「政府」(Easton and Dennis, 1965; Greenberg, 1970c, 1970d; Dennis, Lindberg, and McCrone, 171) 、「黨派」(Easton and Dennis, 1969; Rodgers and Taylor, 1971) 、「總統或國王」(Easton and Dennis, 1969; Abramson and Inglehart, 1970; Greenberg, 1970b, 1970d)；(3) 對政權象徵的支持，如「民主」(Dennis et al.,

1968; Tilman, 1970)・國旗 (Lawson 1963)・過去之光榮的革命 (Roig and Billon-Grand, 1968)・國家過去不名譽之惡行 (Baker, 1970)・君王 (Blumler et al., 1971) 及國家過去之光榮的或不名譽的領袖 (Baker, 1970; Greenstein, 1965; Roig and Billon-Grand, 1968; Stradling, 1971)・<sup>(4)</sup>對體系規範的支持，如異議的自由或其他特定的民主規範 (Dennis et al., 1968; Hennessey, 1969; Pammatt, 1971; Prothro and Griggs, 1960; Stouffer, 1955; Zellman and Sears, 1971)・及服從法律 (Engstrom, 1970; Hess and Torney, 1967; Rodgers and Taylor, 1971)・<sup>(5)</sup>行為與體系規範一致或在危機時支持政權，諸如投票及黨派性 (Pammatt, 1971)・缺乏移民的興趣 (Roig and Billon-Grand, 1968; Tilman, 1970)・支持國家的外交政策 (Hero, 1969; Rogers, Stuhler, and Koenig, 1967)・特別是在危機時 (Katz and Piret, 1964; Sears and McConahay, 1973, Chapter 12)・在刺殺或選舉後支持總統 (Mueller, 1973; Sheatsley and Feldman, 1965)・拒絕變成參與抗議性的示威，民間不服從行動或叛亂 (Easton and Dennis, 1969; Sears and McConahay, 1973)。

然而，並非每個人皆同意這些题目的表面效度 (face validity)。問題在於政權的規範傾向於含混的及有時是衝突的。是否認為自己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便是合於規範 (Dennis, Lindberg, and McCrone, 1971)・或者極端的愛國主義就是不合於一個更高的容忍規範 (Kavanagh, 1972)・兒童們效法國家過去的英雄，如邱吉爾、華盛頓及路易士・巴斯德 (Greenstein, 1965; Roig and Billon-Grand, 1968; Stradling, 1971)・或拒斥過去的領袖如希特勒 (Baker, 1970) 便是體系——支持。

兒童應該反對國家的敵人（如共產黨）或應該給他們言論自由呢？（Zellman and Sears, 1971）民間的不服從是表示反對體系，還是反對體系遊戲規則的進行呢？兒童在戰爭時應馬上對總統表示支持呢？還是應反對國家參加貶低自己之一個不道德的戰爭罪行？（Tolley, 1973）

這些都屬於分析性的及概念性的困難，而非實證性的問題。哲學家與政客們將永遠為政權規範的內容與應用爭辯——特別是關於權威的服從規範帶領公民破壞其他政權之規範多遠的問題。即使大量的努力與天才也無法為實證的研究者解決這些問題。不過，它們使得體系支持的研究先天上就含混；對於到底什麼構成支持是永遠也無法如水晶般清楚的。

但第二個主要的問題在性質上便是實證的：如何把政權的「正統性」與對在位者之權威及其政策的「黨派性」作一實證的區分。實際上，它們變成真正難以解決。實際上，所有顯然注意體系支持的測量（如我們上面所列舉的），皆在實證上變成被「黨派性」所污損。這可以由存在於下面各方面支持之黨派的，種族的或階級的分裂看出：對英國君主政體的支持（Abramson and Inglehart, 1970; Blumler et al., 1971）；對總統、美國的及其他（Converse and Dupoux, 1966; 上面表一）Mueller, 1973; Tolley, 1973）；最高法院（Dolbear and Hammond, 1968; Murphy and Tanenhaus, 1968）及司法過程的其他方面（Weissberg, 1972）；國會及其他立法機關的選舉（Dennis, 1970）；言論自由（Stouffer, 1955; Zellman and Sears, 1971）；美國的外交政策（Hero, 1969）；參加戰爭（Mueller, 1973; Tolley, 1973）；甚至於對總統遇刺的反應（Sheatsley and Feldman, 1965; Sigel, 1965）。看起來好像沒有一個政府角色，在任者、機構或規範不引起某種黨派的分裂的。

也就是說，表面上測量「正流性」的題目，必然也引起由於同意特定政策或聯想到帶有情感的黨派象徵而產生的「黨派性反應」。當政策改變或新人上任，政策支持的軌迹以及程度也經常改變。

關於這個黨派性之闖入體系支持的測量，有兩點要說明一下。第一點，從方法學上看，上面所舉體系支持的表面測量中，沒有一個是事實上「純粹的」。在每個測量中，必須應用更深入的統計方法來區分兩個變異（普化的體系支持與黨派性）的來源；我們不能先假定任何一個題目是兩者中任何一個的純測量。

第二點是比較有趣的實質問題。儘管伊斯登之政權對權威的區分，乍看似乎為直覺上可行的，它可能與人們實際上思考的方式並不符合。也許體系的支持乃不斷地隨著不同團體的變動及不同的成果滿足而變化。因此，「正統性」可能一直都在不定及變動中。亦即，此種探索兩個不同的變化來源可能證明大部分為徒勞的。

的確，若再進一步探查；更令人驚異的複雜性出現了：相反的闖入也發生。這種情形的一個最顯然的一般性案例，即我們稱之為「積極性偏見」(“the positivity bias”)的，亦即以一種一般性積極的方向來歪曲公眾人物與機關之評價的傾向(Sears, 1969a; Sears and Whiney, 1973a, 1973b)。因此，即使黨派敵人也很少得到極負的評價，在位者常令人驚訝地得以回到原職，剛上任的得有一段暫時的蜜月，總統一般(雖非必然)獲得同甘共苦的支持等等。不管在政治刺激的大量評價中存在著何種黨派的成分，似乎皆覆以另一個一般性的積極成分，其最可能來自政權層次(或可能甚至於社區層次)的某個基本的依附。

最後，可能會有人想依靠「行爲」的體系支持測量，因為它們比這些態度性的測量更有效且不含糊。但它們本身轉成爲任何基本正統性，甚至更不純的測量。強制性限制或純然機會的層次與登記、投票、參加遊行或叛亂及服從交通法規這類不同的行爲有很大相關。且甚至於當它們並不如此時，行爲的「意義」也開放供許多爭辯。例如，參加貧民窟的暴動曾經不同地被解釋爲無害的及無意義的一時放縱行爲，被解釋爲對不公正的一個合理的抗議，或被解釋爲對抗政權及其「法律與程序」體系的一種危險的革命性行爲。

正統性與黨派性間的區分，的確是一個有待研究的重要區分，主要因爲它是一般政治爭辯的一個重要部分。但目前實難以決定政權態度事實上不受黨派態度影響，也難以分隔我們所討論過的測量中之兩個變異的來源。這是更進一步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優先，而幸運的是，某些人已開始着手（see Citrin, 1972; 1974）。

### 黨派傾向的成年前發展

要找出黨派傾向較爲容易，因爲它們一般較少與其他態度混雜而變成含混。它們的存在也廣泛不同，焦點各異，有置於個別之政治領袖的，有置於不同之政治、社會、國籍、宗教團體的，有置於不同之問題立場的，及對歷史事件之態度的。

黨派傾向部分來自兒童期，目前已成定論。值得更注意研究的問題只是這些兒童期的傾向來得多

早、有多強，及如何持續以及在形成之時，家庭扮演了何種角色。

### 兒童期的開端

最初的黨派情感在小學低、中年級時候，顯示在與許多政治及社會事物的關係上。這是一個本身即很複雜的研究領域，我們在這裏只須勾劃一個大要。

國籍 在最早的小學年代，兒童們對自己的國籍立刻有好感，而且事實上他們可以隨時表達對不同國家的簡單情感。塔吉飛爾 (Tajfel, 1969, p. 87) 說：「在英國，六歲與七歲之兒童，對於他們喜歡與不喜歡那些國家比較意見一致，而對那些國家之其他任何實際上的事物，則較少有一致意見。」通常只有到十歲左右，才有相當數量的人發展對敵對的或敵人的國民同等層次的不喜歡——如以色列兒童對阿拉伯人，美國與西德兒童之對蘇俄等 (cf. Lambert and Klineberg, 1967; Lawson, 1963; Middletown, Tajfel, and Johnson, 1970)。

隨著這個簡單的「朋友與敵人」黨派性，懷特 (一九六九年) 曾提到成人中一個更複雜的型態，他稱之為「親——我們」(Pro-us) 與「黑——上層」幻覺 ("black-top" illusions)：成人們假定在他們敵對國家中的「人民」要比實際上的更為友善些，而「政府」要比實際上的更不友善些。這也顯然地有其兒童期的根源：一九七一年，在佛雷士諾的未成年抽樣中，有百分之三十七不喜歡中共政府和百分之四十三不喜歡蘇俄政府，但只有百分之十不喜歡中國老百姓和百分之十四不喜歡蘇俄老百姓。

種族 有系統的種族態度也有其學前及小學低年級年代的起源。哈丁等人 (Harding et al., 1969) 提示說，美國兒童一般經過三個不同的階段：三歲至四歲時有「種族的覺醒」(“racial awareness”)，四歲至八歲有原始分類與情感的「種族取向」(racial orientation) 以及小學低年級年代之有清楚的「種族態度」。在這些早期偏好之經典展示中，有克拉克 (Clark, 一九三九年) 的黑洋娃娃與白洋娃娃研究 (black doll-white doll study)，在該研究中，他們觀察了黑人幼童之種族的自我毀損 (self-derogation)。晚上，黑人兒童們似乎顯示對黑洋娃娃有偏好，大抵反應了對他們種族之積極的評價 (Hraba and Grant, 1970)。不過，以上兩個研究，都提供了大量證據證明在成年前就獲取了這種種族的驕傲偏見 (Ashmore, 1970; Proshansky, 1966; Katz, Chabasiński, and Connolly, 1975)。

在種族上，尤其傳統的規範，由於膚色之顯然不同及其他結構上的特徵而加強了。這些膚色本身也在兒童期早期成爲與好壞的情感有關。白人兒童甚至於在幼稚園前就評價白的刺激爲正的而黑的爲負的，而且把白色與好的人類品質聯結，而把黑色與壞的人類品質聯結。在一個研究中，白人兒童甚至於在搗碎一個黑色的波波娃娃時，要比搗碎一個白色的輕易些 (Williams and Stabler, 1973)。

社會的階級與其他的團體 社會階級的不同評價，已經顯然出現於小學開始的幾年時期 (Tudor, 1971)，職業聲望不同的清楚意識也是一樣 (Simmons and Rosenberg, 1971)。在第三年級時，已可觀察到對某些團體中人的偏好，對某些姓名之偏好亦可看出 (Johnson and Stafieri, 1971)。而性角色差異之政治後果，在青春前期亦可見到。例如，女孩或者較具有女性角色認同的兒童，比男孩或

具有較多異性認同之兒童更爲反對戰爭 (Zellman, 1973)。因此，六至十歲的兒童已經有廣泛不同（並非顯然政治性的）社會差異之黨派性情感偏好。

黨的認同：美國 政黨的認同一般也是源自於青春前期。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在美國所從事的早期研究發現，約至五年級（十一歲左右）時，兒童有黨偏好的比率迅速增加，然後就是逐漸的增加。在伊登——海斯的研究中，百分之五十五的五年級生有一個偏好 (Hess and Torney, 1967, p. 90)，而格林斯坦則發現百分之六十一有（雖然他並未供給兒童公開而「獨立的」選擇）。其後的研究證明兒童有一黨認同的比率，在此年以後增加得較慢。到了第十二年級，根據耶寧士 (Jennings) 和奈米 (Niemi, 1968b) 一九六五年所使用一近於代表全國之抽樣的極佳研究指出，百分之六十四有一個黨的偏好（雖然其樣本刪去了那已離開學校之將近百分之二十六的人；參見 Niemi, 1973a）。

然而，根據三個晚近在加州所作的研究，今日年幼的美國兒童，似乎並未如過去般獲取黨的認同。在我們一九六八年沙卡拉明多的抽樣中，百分之三十六的五年級生與八年級生的混合有黨的認同，而在一九七一年之佛雷士諾抽樣中，則有百分之三十八。（沒有任何主要的年齡差異）。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之舊金山灣的研究中，貝蘭寇德發現百分之三十六有一長達六個月的穩定偏好（一九七三年）。所有這些研究皆使用了基本上相同的題目，所以資料皆大抵可以比較。同時，在這個青春前期的層次，宣稱爲「獨立者」之比率似乎不再有增加；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期有百分之二十六，對抗佛雷士諾與沙卡拉明多抽樣中，有百分之二十四與百分之二十八。相反的，近年來似乎愈來愈多之青春前期少年，就是不熟悉偏好的面向，他們不能把自己放在傳統之民主黨——獨立派

——共和黨的連續統 (continuum) 中。

顯然地，後者的許多兒童，當他們接近青春期末及投票年齡時，皆自稱為「獨立派」。「獨立派」隨著年齡有顯著增加，直至青春期中期 (Jennings and Niemi, 1974)。而格倫 (Glenn, 1972) 年的同組對象分析 (cohort analysis) 紀錄了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這段歷史性時期，新的投票者自稱為「獨立派」之比率顯著增加。這些發現似乎皆來自近年來美國兒童之獲取一堅定黨派偏好比率的某種降低，而非任何先天上與年齡有關之事物 (亦即他們是「代間」(generational) 效果而非「生命循環」(life cycle) 效果。見 Abramson, 1974; Glenn and Hefner, 1972)。

**黨的認同：**歐洲 如兩個由丹尼斯與麥克隆尼 (一九七〇年) 及阿伯蘭山和英格哈特 (一九七〇年) 所做的多國性研究指出，在黨認同之早期獲取方面，西方民主國家中似乎有著很大的差異。英國兒童最可能獲取一種認同：在八至十歲的年齡，百分之八十有一偏好，而該比率持續不斷甚或在青春時期更增加。西德、荷蘭及比利時的兒童也迅速獲得一偏好，在同一年齡範圍中約十至十七歲左右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以上。比較之下美國的兒童顯出多少落後，從少至百分之四十 (如上面加州資料所指出) 至百分之六十四 (Jennings and Niemi, 1968b)。法國兒童為最遲緩的；事實上，他們因缺乏黨的偏好而別具一格。羅伊格和畢龍·格蘭德 (一九六八年) 發現僅百分之十三 (十至十四歲) 而阿伯蘭山及英格哈特 (一九七〇年) 發現百分之二十六 (次級學校) 有任何政黨認同。●義大利兒童也較大多數其他歐洲兒童更不可能採取一種早期的黨偏好。

⑥ 一個例外是丹尼斯與麥柯隆尼（一九七〇年）的報告，其謂他們的法國兒童樣本（雖然只有五十四個人回答）在十五歲至十六歲時，有一種黨派的偏好。對於目前現存的大多數多國性研究我們要很小心，因為它們通常只是依賴來自一或兩個地方的小抽樣，其可能或不可能做為整個國家的代表。

不過，在歐洲及在美國，似乎皆可覺察出重要的歷史性變動。在不同時點所做的調查提示，西德、義大利與法國的兒童們，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及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皆日趨於黨派性的顯示，而這段時期，美國兒童在黨派性方面顯著地減少。如同美國人一樣，卡美隆（Cameron，一九七二年）及丹尼斯與麥克隆尼（一九七〇年）解釋歐洲人的變動為一種代間的移轉，而非年齡或生命階段的影響，他們假定，當前的社會化較諸前代（不管是戰時、戰爭與戰爭間或剛剛戰爭結束時）之政治紛擾的時日更具黨派性。根據卡美隆（一九七二年）之比較一九五八年與一九六八年所做之調查，戴高樂主義者的黨派性與女人之相當晚的授與選舉權（一九四四年），最後皆開始提升了黨派性的一般層次。例如在那十年中，成年婦女具黨派偏好的比率由百分之四十三升至百分之七十八。

**早期黨派認同的力量** 由於對此一青年期的黨認同之後來的重要性已說得不少，所以提出黨認同在此一年齡一般是否很強烈是有理由的。黨派態度，依具有心理力量的這樣一個遺傳型面向作了相當適切地分布，而在認可、自我參與（ego-involvement）或任何為你喜好的術語中有所不同。在較早期時，我們曾嘗試形式化這樣一個基本面向的觀念，以我們稱為「長期黨派傾向」（Sears, 1969a）或「持續之認可」（Sears and Whitney, 1973a, 1973b）的態度來固著於一堅實的終點上。這個連續統之軟弱的終點，則以康佛斯適切地稱為「非態度」來固著，因為這種公開的意見似乎並未基於任何

## 穩定之基本性向。●

的確，對於多數讀者，顯然地，這個研究法建立於廉佛斯之最重要的貢獻之分量很大。

我們曾提議使用三種實證的指標來區分持續的認可與非態度：(1)時間上的穩定性，例如在小組研究 (panel studies) 中有高的試驗——重試驗 (high test-retest) 的相關；(2)堅定的情感 (affective consistency)，在顯然類似的或相關的認知內容上的堅定情感，例如超越題目措詞之不同、顯然相同的政策問題，或一個候選人的不同屬性；及(3)當與上二者在一起時新起之認知的內容在決定態度中之力量 (power in determining attitudes)，例如新的候選人或新的政策問題。不過，認知的複雜性與廣泛的區分，並不一定為區分的因素，因為此處主要的遺傳型面向乃是個人之情感認同 (affective commitment) 的力量，而非其認知的象徵。

所以，這個早期的黨認同，是否符合上面所舉持續認可之標準呢？首先，這些早期的忠貞有多穩定？顯然的統計似乎為一試驗——重試驗的相關 (test-retest correlation)：在一兩年的期間，成人最佳的資料為·八四 (Pearson r) 或·七〇 (Converse, 1964, 1974)。在幾個年齡約九至十五歲的兒童研究中，其結果相當低，但並非極低。在海斯與東尼的研究中，插入他們試驗間的短短兩週期間，對甘迺迪之選舉勝利的黨派反應仍然為高度穩定的 ( $r = .83$ ; 1965, p. 423)。貝蘭志德 (一九七三年) 發現來自奧克蘭及柏克萊兒童兩個月的試驗——重試驗之相關為·六二、四個月的為·五七，六個月為·四七。

不過這些相關可能使人易對兒童產生錯覺，因為他們採用了順序量表 (ordinal scale)，而許多兒童（不像成人）給予量表外的回答（例如，「不知道」）。因此，更能有力說明的，也許是一開始為黨派性的兒童，其後表達了同樣偏好的比率到底一有多少。貝蘭寇德（一九七三年）發現起初為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兩個月後仍維持偏好的有百分之七十；在我們沙卡拉明多的資料中，有百分之六十五在兩個月後仍維持忠貞。在這兩個研究中，變節為敵黨的只有百分之八與百分之九（其餘的轉為「獨立派」或「不知道」。）

所以兒童早期黨派認同的穩定令人訝異，但一直到青春期中期前，他們都沒有真正接近成人態度的穩定性。在九歲至十歲的兒童中，貝蘭寇德（一九七二年）發現了一個僅·三〇之六個月的 *beta*，而十三歲至十五歲為·五九，與康佛斯（一九六四年）所舉成人之·七〇並不太遠。

兒童早期的黨派性向情感似乎相當一貫，五年級生與六年級生，極端如其老師沿著黨的路線來對甘迺迪之選舉反應，而他們在其他許多不同面向上，也把較大的優點歸於己黨 (Hess and Torney, 1967)。我們的資料顯示，對於尼克森與雷根等政治人物有強烈的政黨極端化，而對於宣稱己黨對解決全國性問題有較優勢力則多少較無顯著傾向。這些發現，也似乎與成人的偏好相似（雖然一定是一個比較有選擇性的樣本，因為只有少數的兒童有黨派的認同）。

迄今為止，關於兒童早期之政黨認同，對於新的意見形成的力量 (power)，並無多少可資利用的證據，亦即關於一個反應對新候選人與問題能持續黨派性多久。要處理這個問題，有待更進一步之實驗性的及（或）小組的研究。

如許多作者所曾提到過的，這些早期的認可在認知上是較成人的爲空白些（Greenstein, 1965; Hess and Torney, 1967）。兒童們對於大多數成人能夠區分之政黨是什麼及利害不同的因素或問題，乃是十分含混的（見 Sears, 1969a，有一關於成人資料的摘要）。另一方面，許多兒童對於最重要之政治領袖的政黨身分的確有某種感覺：例如，在我們佛雷斯諾的資料中，正確的黨乃經常給予雷根（百分之四十六）、尼克森（百分之四十八）、甘迺迪（百分之三十七），韓福瑞（百分之四十）及安格紐（百分之三十六），而平均有百分之十四給予不同的黨。

因此，目前的證據是，到青春期中期時，美國兒童之政黨認同乃是正接近成人情感的穩定與一貫。不過，在有認可之兒童的數目及其力量方面，皆有一個比一般所認爲要慢的發展。而關於這些早期態度之實際的力量，其證據仍然多少有些含糊。他們在時間上，顯然的穩定性可能並非由於強烈的認可，而是由於缺乏在態度實質性上屬於相當非政治性之環境（在此環境中，許多早期的政治社會化發生）的有效挑戰。所以，很有可能這些青春期的態度，在潛在上十分易於變動。青少年對這些早期態度之認可的程度給予更多的證據。不過，要點在於，黨派意向之「早期的政治社會化」乃是一件逐漸進行的事物，在青春期中期達到頂點，而非在兒童時期就結束與完成。

### 雙親的傳遞

在政治社會化之實證研究早期，許多學者就得到了一個一般性的結論，即兒童之黨派態度主要是雙親態度的複本，而且這個結論迅速成爲一個傳襲性的智慧。衛斯特（West，一九四五年）的觀察

便是一個典型，他研究了中西部的一個小城，認為「一個人之生而成爲他所屬政黨的一分子，正好他生而成爲他雙親所屬教會之一分子的未來可能性一樣。」許多發現似乎都證明了這個結論。兒童的確似乎廣泛地採納了對一個政黨的偏好，而他們在這麼作時，顯然對他們領導者之黨並無多少知識（Greenstein, 1965）。海曼早期有一篇極佳的文獻（一九五九年），發現雙親與子女之政治態度間一般有一高度的相關性：「從不同研究中得到的極多相關來看，其中值接近·五〇」（頁七二）。這樣一個結論也幫助解釋了在某些地理區域歷經好幾十年而投票型態有不尋常之連續性；政黨的認同引導了個人的投票，而且就只是由父親傳給兒子歷經許多代。它幫助解釋了各不同社會與政治態度之人口學上相關的持續性，例如在政黨認同或非經濟性自由主義之不同領域中社會階級的差異，種族偏見中之區域與階級的差異等。而當兒童（Greenstein, 1965）、大學生（Middleton and Putney, 1964）或成熟的成人（Kornberg, Smith and Bromley, 1969）被問及他們早期偏好之來源時，最普通的回答是他們從父母得到的。

不過晚近對家庭在早期黨派社會化之突出性，有人已採取了一個更爲重要的觀點（Connell, 1972; Jennings and Niemi, 1968a; Niemi, 1973a; Sears, 1969a）。事實上，最近一篇評論結論說：「有具體的證據證明家庭內的過程與特定意見的形成多數不相干」（Connell, 1972, p. 330），政黨的偏好證明爲唯一主要的例外，而非一代代表性的例子。

在這一節中，我們將評價這些相衝突的觀點。適當的出發點便是評估雙親與子女間意見一致的程度，因爲那爲雙親之影響的最大可能程度定下了一個清楚的限度。

**親子間意見一致的程度** 親子在政治態度上意見一致之最佳的估計來自耶寧士及奈米（一九六八年 a）的研究，在該研究中，一九六五年有一九九二個高中高年級生，及至少雙親之一（其中四三〇個案例為雙親）的一個幾近代性的全國性訪問抽樣。在該研究中，百分之五十九在政黨認同上一致（親子屬於同黨或皆為獨立派），百分之七有敵對的政黨認同，而在剩餘之百分之三十四對中，一個是獨立派，而另一個是有政黨偏好（ $\tau$ -beta = .59）。這個發現符合康乃爾（一九七二年）對幾個研究所估計的大約·六之相關。且其與成人選民之資料相差不遠。SRC 一九五二年之選舉調查指出，百分之五十二的美國成人與雙親的政黨認同意見一致，而僅百分之十有相反的政黨偏好（Campbell, Gurin and Miller, 1954; see Sears, 1969a, p. 376, 有圖表）。這種來自生命過程較後點的估計，自然是較不可靠的，因為它們必定有賴於兒女之對其雙親偏好的不正確回想，這種回想最可能誇大了家庭裏代間的意見一致。

不過，在大多數政治問題上，意見一致的比率要低得多。康乃爾（一九七二年）在一篇評閱性的文章中，估計親子在政黨認同之外的問題方面之意見一致大約為·二的中值相關。在一個受限制的研究中（Niemi, 1974），有二十個不同的政治取向被使用，其中只有一個（總統的偏好）顯示出比政黨偏好更高的一致性（Jennings and Niemi, 1974; Niemi, 1974）。其他許多的研究也已提出了同樣的型態（cf. Butler and Stokes, 1969; Dennis, 1969; Dennis and McCrone, 1970; Kubota and Ward, 1970; Friedman, Gold, and Christie, 1972）。

這些結果又補充說明了在民主社會中親子間僅有溫和的政治意見一致。即使那個時候，意見一致

似乎僅僅限於少數問題，縱使是最具爭論性的問題。在另一個地方，筆者曾詳細地評閱了這些發現 (Sears, 1975)，但為長話短說起見，對筆者而言，似乎分為四類：(1) 雙親與青少年之最大的意見一致，乃關於高度具體可見的事件，例如一位總統的候選人，一場對外戰爭，或在一個危機支配的時代中，核子戰爭的威脅。一個可能的例外，必然是雙親不能把他們對刺殺甘迺迪總統之陰謀的猜疑傳達，因為縱使刺殺是高度具體可見的，可是陰謀卻不是 (Oren and Peterson, 1967)。(2) 政黨的認同比其他的政治問題一貫地產生較大的意見一致 (R. 6)，雖然，這個意見一致來得較慢，也許在青春期後期達到頂峯百分之六十，而自此之後即搖擺不定。一般看來，美國似乎高於其他國家。(3) 社會團體與道德的陳腔濫調顯示雖依然重要卻較少的意見一致，從個人的宗教派別上，達到極高的程度，到關於少數團體、種族政策、宗教教條之細節、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及對道德的信念之比較低的程度。(4) 政策問題、政權規範及一般化的政治意向實際上顯示並無意見一致。政治效力感、投票義務感、對政府的支持、政治的信任、對政黨系統的支持、政治自由的具體應用、政治的利益，及許多其他不同的問題 (Jennings and Niemi, 1968a, 1974; Connell, 1972; Dennis, 1969) 則顯示無關緊要的意見一致。

**雙親影響的動力** 這兒另外一個主要的問題，乃關於什麼決定了雙親對子女態度影響的程度。試圖說明家庭影響（或缺乏影響）的理論中，最簡單及最有助益的社會心理理論，似乎主要來自於參考團體 (reference group) 研究法。這主要關心的將是團體規範的溝通（它們的清晰、力量與次數）及對團體的認同 (Campbell et. al. 1960; Festinger, 1950; McClosky and Dahlgren, 1959; Sears,

1962a)。用家庭的術語來說，這樣一種研究法將特別集中於雙親政治態度的溝通，對雙親的情感聯繫及家庭外的影響。④當然，這個研究法沒有注意到兄弟姊妹及大家庭的可能貢獻，但我們必須從最簡單的假設出發，亦即單單處理雙親之影響。

⑤ 平均的一貫性理論和認知的一貫性理論，也將同樣地從通訊信息之值與次數及情報來源之目標評價來預測（目標之前態度一樣，其在年幼兒童方面，將傾向於一個主要的因素；Anderson 1971; Osgood and Tanenbaum, 1955）。所有這三個理論，皆來自於社會心理學而非發展心理學。它們始於情況的影響專門處理，而儘管所用術語有別，卻都做了幾近同樣的預測。

這些一般化的變數，如何與家庭對兒童之黨派社會化的影響之特殊點銜接呢？一個雙親立場之經常的與一貫的溝通，應該依賴幾個附帶條件。首先，必須有一「真正」可供溝通的雙親，而這大抵有賴於(1)一個單純而穩定的態度標的；(2)雙親態度在時間上能維持穩定；及(3)對政治問題，雙親間的意見一致。然後其溝通的可能性，應隨著(4)家庭成員之政治參與的一般水準，及(5)引發溝通之公共事件的發生而有所不同。單單有雙親溝通這個事實當然是不足的，如果沒有(6)被兒童充分而無偏見地接受的話，而這可能並非非常事。所有這些因素，都應該影響兒童正確地接收穩定的雙親態度。

然後，這些被接收的雙親態度，究竟是否積極地影響了孩子，導致一致性、或沒有影響、或消極地影響了孩子、導致反叛性的反一致性，理論上皆應有賴於(7)兒童對雙親的情感聯繫。最後，整個家庭團體的影響，應該也有賴於(8)家庭之外，在兒童的意見環境中主宰之態度，傾向於加強或反對家庭

規範的程度。

在這個領域中，最仔細而包容廣大的實證工作，仍然是由耶寧士及奈米基於其一九六五年之調查所從事的 (Jennings and Niemi, 1974; Niemi, 1973b, 1974)。看來十分顯然的，親子間最大的意見一致，發生於簡單而穩定的態度標的方面 (諸如美國的兩大政黨)，以及在雙親態度 (諸如政黨的認同或總統的偏好) 及雙親的意見一致有最大穩定性方面 (see Jennings and Niemi, 1974, 第二章及第三章)。不過，一般說來，關於政治問題的親子溝通，必須被視為很局部的且極有瑕疵的。

因此，由於受到雙親態度成功溝通之無數障礙的影響，兒童的理解的正確並非很顯著。例如，在耶寧士——奈米之高中高年級生的全國性研究中，百分之七十一能夠正確地區分他們的雙親為民主黨人、獨立派、或共和黨人 (see Sears, 1969a)。學生由雙親報導的特性而得之理解的 tau-beta 相關，對總統選舉為·八二，對投票結果為·六八，對政黨認同為·五九及對政治利益為·二五 (Niemi, 1973a)。這可能是子女正確性的一個高峯，因為高中高年級生幾乎仍普遍與雙親同居之年紀最大的一羣。

無疑地，許多不精確性，乃由於上面所提示各種溝通的失敗。不過，在無知而留下一片空白之外，兒童似乎就填上某些可預測的偏見。最重要的，他們一貫地對許多不同的屬性之家庭內意見一致高估了，誇大了親子的相關至·一〇 (Niemi, 1973a)。有趣的是，做父母的甚至於更錯誤地假定他們的子女依隨自己的步驟，他們的偏見膨脹了這一相關至·一九 (see Niemi, 1974)。兒童們也慷慨地過分把社會渴欲的屬性歸諸於父母；例如，投票的雙親被誤認為不投票的只達百分之二，而不投票

的雙親被錯誤地認為投票的達到百分之三十九。同樣地，兒童們的歪曲過分將選票歸於獲勝的總統候選人 (Niemi, 1973a)。

根據上面所舉幾個社會心理學理論，則家庭政治規範的採納，與兒女和其父母的情感聯繫，應該是密切相關的。若他對他們有強烈地積極感覺，他應該會採納他們的態度（就他所知而言），而若他對他們具有強烈地敵意，他應該會拒絕他們的觀點，可能甚至於反叛或「回飛」(“boomeranging”) 至一個相反的政治立場。

相當令人驚訝的，似乎實際上並無這種一般的影響。在兩個包含與父母及子女之直接訪談的研究中，與父母的接近性（或其他親子間情感聯繫的指標）與政治意見一致的程度並不相干 (Jennings and Niemi, 1974; Thomas, 1971)。不過，在前一個研究中，親子接近性對政策問題的意見一致是相干的。在另外兩個其他的研究，完全有賴於兒女的報告，則接近性或依賴乃與一致性相干 (Kubota and Ward, 1970; Middleton and Putney, 1963)；而在另一個研究中，對母親或父親相對的接近性乃與對其中之一或另外的相對一致性是相干的 (Jennings and Langton, 1969)。在較早之依賴子女的報告之研究中，雙親紀律的極端似與黨派的反叛有關係 (Maccoby, Matthews, and Morton, 1954; Middleton and Putney, 1963)。在來自父母之獨立報告方面，這個發現並不成立，但它的確在某些帶有情感的政策問題方面是成立的 (Jennings and Niemi, 1974, p. 80)。

因此，簡單的情報交流差異，似為父母對子女政治態度之影響的最重要決定因素。親子關係的性質，不管是在一般公眾及在較高政治化的家庭中，似乎皆較少有一貫的影響。⑨

⑨ 附加說明，我們注意到這些發現適合一般所知的政治遊說者。在他處，我們會提示成人政治意見之成功改變的主要障礙是：(1)，政治情報之接受的一般程度低；(2)，由於對最爭論性的問題有高度的前認可而拒絕所接受的情報；及(3)，政治溝通者的黨派評價，導致對反對方面的低度信用 (Sears and Whitney, 1973a, 1973b)。雙親影響的證據恰合於那個分析所期待的。兒童具有相當弱的前態度，並且一般對他們的父母有支持的關係，所以拒絕所接受的情報在代間的傳遞中並非一個主要的障礙。相反的，主要的問題似乎在親子溝通的低水準，導致兒童的無知及(或)對其雙親觀點的歪曲。

令人驚訝的，在青少年之同儕團體或較廣的意見環境之政治社會化的影響方面，一直沒有直接的研究。某些研究已顯示出在社區規範的方向方面，有較大的叛離雙親的態度 (Berelson et al., 1954; Maccoby et al., 1954; Hyman, 1959)，或青少年同儕團體規範的再社會化影響 (Langton, 1967; Newcomb et al., 1967)。最近有一個最仔細的研究，在同儕團體內及雙親的訪談中，運用了社會計量的測量，並發現同儕及雙親對青少年的黨派性有重大的影響，雖然前者比較沒有那麼有力 (Jennings and Niemi, 1974, Chapter 9)。

### 來自成人前政治社會化之餘值持續

成人前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性，主要在其餘值對成人態度與行為的影響。為了具有這種影響，它們當然必須以某種形式持續及通過成人期。但它們事實上持續嗎？這個問題向為在這方面著作的人

所急切關心的。某些人認為持續至少由可資應用的資料，諸如成人對他們自身態度之反省性的記載（Campbell et al, 1960, pp. 161-164; Butler and Stokes, 1969, Chapter 3; Converse, 1966），或由長期縱貫性的研究（Feldman and Newcomb, 1969, pp. 320-322; Bloom, 1964, p. 173）有部份地顯示了。另外有些人則只是假定它（Davies, 1965; Dawson and Prewitt, 1969），或即使在缺乏硬性研究的情形下願意暫時地接受它（Easton and Dennis, 1969），或提升它成爲一個可資研究的問題（Jennings and Niemi, 1968b; Langton, 1969）。還有另外一些人則視兒童的態度爲十分不穩定，對成人的取向不可能有大影響（Vaillancourt, 1973），或認爲主要的變動發生於整個人生旅程中（Jennings and Niemi, 1974, Chapter 10）。

但所有這些看法，只是在交代或提及一個特定研究的發現時所提出的。迄今尚無人曾試圖把關於這個主題目前所已知的糾集起來，而對這個最重要的問題另眼相看。本章其餘的部分，即致力於成人前政治社會化餘值持續於其後生活的問題。不過，在此，僅能簡短地及相當膚淺地考慮它；如欲有一全面性的分析，（請參見 Sears, 1975）。

在討論持續時，我們必須再強調我們所關心的只是任何個人態度的一個次集合而已。至於內容，我們所關心的還是對體系的依附及黨派的性向，而非參與性的取向。較早時，我們曾舉出依附的許多外貌，而且認爲一切皆在人生早期獲取且在其後維持的這個想法至少當作一工作性假設，似乎是很適當的。至於黨派的取向，某些爲一般所同意會滲入早期的社會化中，但有許多卻並不。且某些黨派態度是堅強而穩定的，而另外一些則相當弱且暫時性。此外我們真正關心的只是較強的較穩定的黨派性

向，因為只有經由它們，許多政治社會化可被假定留下餘值影響成人的態度與行為。因此，我們根據這樣一個區分來限制我們的注意力，乃是不爭之事實。

如果我們把我們的討論限制於「持續性的認可」(“enduring commitments”)，則我們將處理那些態度呢？美國成年人（作為一個整體的公衆）的態度，對於極多態度的標的，甚至於不符情感穩定、一貫及力量的最低標準。最顯著的例子是，(1) 政黨的認同，及(2) 種族的態度，至少那些在當代的調查研究中須定時研究的問題。對於(3) 種族與階級態度的某些款式；(4) 盲目的愛國主義及國家主義；(5) 民主原理的口號性款式；(6) 道德的價值；及(7) 對少數公衆人物（諸如FDR、JFK或希特勒）的態度等廣泛的認可，人們也可作有利於己之事實和證據（雖然是基於一遠為不確定的資料）。評估大眾態度在這些內容領域之穩定、一貫及力量的資料，曾在他處被評閱過（Sears, 1969a），所以我們將不在此處考慮它們。⑩ 因此，關於持續的證據為何？

- ⑩ 在他處，我們會相當廣泛地提出支持這些標準之選擇，及其運用至美國人政治態度之這些內容領域的資料（Sears, 1969a）。這個一般的理論架構，也會應用至幾個不同領域中許多政治意見的分析：黑人及少數民族聚集區暴亂的起源（Sears and McConahay, 1973），郊區白人種族主義及其對投票行為的影響（Sears and Kinder, 1971），及在政治社會化領域中，羣衆的政治說服（Sears and Whitney, 1973a, 1973b）對兒童之容忍政治異見的起源（Zellman and Sears, 1971），及性角色社會化對政治態度發展的影響（Zellman, 1973）。

## 關於持續的實證證據

一般而言，一向有三種關於持續的實證證據。當然，最好的是長期縱貫性的證據，在此種證據中，兒童受測驗，而後在其成爲一成人時再測驗。第二種是比較會遭壓力變動與未遭壓力之大體可比較的人。第三種證據是代表性的 (cross-sectional)，在這種證據中，某個年齡團體的總體反應，與在同一時間點受訪問之年紀較大團體的總體反應加以比較，而有一假定，即差異是由於後者的態度變動。另一不同的形式，即性質類似之同組對象的分析 (cohort analysis)，亦即把生在一个特定時期而在一個時候受測之人的總體反應，與另一生在同一時候，而在另一個歷史時點上受測者的總體反應加以比較。

**長期縱貫性的研究** 長期縱貫性的證據難以獲得。關於政治態度之最佳資料來自某些相當近的研究，特別是耶寧士與奈米 (一九七三年) 對於一九六五年訪問的高中生與雙親的八年追蹤，以及紐康伯等人 (一九六七年) 之對貝靈登畢業生的二十年追蹤。SRC 的三波小組，從一九五六年經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 (Converse, 1964, 1970)，我們都已提到過；而格利累與史培斯 (一九七〇年) 曾經做了一個四年小組的研究 (一九六四年至一九六八年)，其對象爲大學畢業生的一個全國性抽樣。其他幾個小組研究曾以幾年爲一段時期從事 (Butler and Stokes, 1969; Bachman, 1970; Himmelweit and Swift, 1971)，雖然迄今尚未充分利用。早先我們會提及試驗兒童態度在時間上之穩定性的某些努力 (Hess & Torney, 1965; Vaillancourt, 1973; Vaillancourt & Niemi, 1974; Zellman,

1973)。還有一個較早的文獻研究價值的穩定，主要追蹤大學畢業生，這已由布隆姆（一九六四年）作了很好的評論。最後，目前正對有限制的抽樣從事某種創發性的利用，這些抽樣多年來由於其他心理學的理由而曾一再地測驗，例如：德曼（Terman）的天才兒童抽樣，柏克萊引導抽樣，費爾斯研究所的長期縱貫性抽樣等。（Hoge and Bender, 1974; Knutson, 1973; Riley, 1973; Nesselrode and Reese, 1973; Schaie and Parham, 1974）。

但一個嚴厲的事實是，迄今這些資料只能是提示性的，因為只有極少數研究曾試圖評估我們所感興趣之段人生過程——從青少年至（或）經過成人——的態度穩定性。而且也難以比較在廣泛不同之時間過程所從事之研究的統計數字。越過兩倍之某個設定的時間間隔的試驗——重試驗相關應該大約是越過原先之時間間隔的同樣相關的平方。所以當我們把康佛斯或格利略與史倍斯之不同的四年小組與紐康伯之類的二十年追蹤加以比較時，我們必須應用十分不同的標準。<sup>①</sup>

① 關於此點，我借自 Robert P. Abelson。

因此，關於此處我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評估在這些不同的研究中，穩定係數之大小的適當順序。首先，在兒童時期中之持續的研究結果可能再提及，雖然它們在此處並不真正相干。據報九歲至十五歲的兒童，兩個月有·六二之政黨認同的 Tau-beta 相關，而六個月有·四七（Vaillancourt, 1973），而對一九六〇年之甘迺迪總統獲勝的黨派反應是  $r = .83$ （Tess and Torney, 1965）。觀察前者資料的另一方式是注意約百分之五十的白人兒童（及百分之三十的黑人）六個月來皆是完全穩定

的 (Vaillancourt and Niemi, 1974)。在依附方面，有可相比擬的相關存在。貝蘭寇德 (一九七三年) 發現在一段四個月的時間中，一個對總統的依附指標 (基於伊登——海斯型的個別題目) 顯示有 +.49 的試驗——重試驗 tau-beta 相關，及一個支持尼克森總統的情感指標顯示 +.43。該樣本的年齡範圍為九歲至十五歲，但在年紀較大的兒童 (十三歲至十五歲) 間，相關較高：分別是 +.55 和 +.50。傑爾曼 (一九七三年) 利用了同樣的年齡團體，但是一段兩個月的時間，發現十二歲以上對較複雜的依附題目 (關於戰爭、政治自由、警察及黨派衝突的渴欲性) 平均的 tau-beta 是 +.32。

許多研究會追蹤青少年至早期的成人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耶寧士 (一九七三年) 之追蹤，原在一九六五年受訪問的十七歲青少年。政黨認同方面，tau-beta 是 .四〇。在追蹤他們成人時期的研究中，曾報導有更大程度的穩定性。耶寧士 (一九七三年) 的研究也追蹤青少年的雙親同樣的八年，發現政黨認同的 tau-beta 為 .六九。這與康佛斯較早 (一九六四年) 的一個報告是可比較的，該報告在一段兩年的期間裏，成人們的試驗——重試驗相關超過 .七〇。格利略與史培斯 (一九七一年) 在一九六四年與一九六八年期間訪問了一九六一年的大學男畢業生，而發現政黨認同方面轉變並不是很普遍：百分之七十五的原為黨派者立場堅定，只有百分之八叛離至敵對黨 (不過，有百分之四十四的原為獨立派者轉成為某一黨或另一黨。紐康伯等 (一九六七年) 對貝靈登女校友的二十年追蹤，發現有十分顯著程度的穩定性：她們在一九三〇年代期間高年級時的保守主義與其一九六〇年時的保守主義成 +.47 的相關而與在中間時期被支持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數目成 +.48 的相關。此外有些基本價值的長期縱貫研究，也已經顯示他們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穩定性 (Bloom, 1964; Kelly,

1955)。

誠如所意料的，對於政策的態度或比較普及的及抽象的態度，其穩定性顯然低得多。當然，康佛斯（一九六四年）報導了成人中政治態度之兩年或四年的穩定性，大約為·三〇。格利略與史培斯（一九七〇年）發現，大約三分之一的一九六四年之「自由派」到一九六八年轉為「保守派」；反之，也有大約同量的移動。最後，希姆爾維特與史維夫特（一九七一年），對英國青少年的十一年追蹤，在一個權威主義的量表所得的個別題目上，甚至於是統計上顯著的（ $T \geq 14$ ），卻得到了相當少的相關（三十二之八）。

顯然地，這些資料是零碎的，且極少支持關於早期社會化之持續的任何最終結論。除了較早時所提到的問題之外，這些測量之大多數的可靠性並不為人所知，且或許在可能的試驗——重試驗相關上，造成一種人為的低程度。但很可能這些相關是良好的估計，且它們指出在成人期中之「持久性的認可」（“enduring commitment”）有相當高度的持續——但在兒童期或從青春期末至成年早期則低得多，對於政策態度或更普及及全球性的態度面向也一樣要低得多。關於如何去解釋在·四〇至·六〇範圍中的試驗——重試驗相關，可能會有一些爭論，但是想到許多錯誤的可能來源，筆者對它們似乎印象相當深刻。

對影響力的抵抗 另外一個評估持續的方法，便是比較曾暴露於某種可估計之潛在影響的人，與那些未曾如此的人。迄今對於人們究竟是在年輕時較易受影響，或是在成熟後這個問題，仍無一個一般性的回答，因為尚無人做過必要的研究（See McGuire, 1969）。但某些造成變動的體系壓力已受到

評估。由於我們已在其他地方十分詳細地討論了這種研究 (Sears, 1975)，此處僅摘要說明。

社會流動使成人暴露於新社會階級的規範，而因此逼迫他們放棄其原來的態度。迄今最佳的證據是它產生了某些再社會化 (J. A. Barber, 1970; Jackman, 1972a, 1972b; Lopreato and Hazelrigg, 1970)，但這種再社會化多數發生於個人初次進入工作崗位時 (Abramson, 1972b; Abramson and Books, 1971)。想像上地位的不同壓迫某些成年人轉移至一比較激烈的或比較極端保守的立場 (視個人的理論而定)，但最佳的證據是除了早期社會化的加強之外，它們沒有多大政治的影響 (Knoke, 1972; Treiman, 1970)。大眾傳播應該會刺激態度變動，但傳統的智慧，仍以爲成人的態度主要是被加強而非改變 (Hyman and Sheatsley, 1947; Klapper, 1960; Sears and Whitney, 1973a, 1973b)。

某些生動的個人經驗，的確再社會化了個人。紐康伯所研究之貝靈登女校友 (1943; Newcomb et al., 1967) 便是典型的答案。如果只是在成年期的早期，則社會性的流動者似乎也會再社會化。貧民窟的大暴動看來再社會化了年輕的黑人 (Sears and McConahay, 1973)。但是非常仔細而控制、延長及似乎有力再社會化年輕成人的努力，經常只有邊際的效果 (Cook, 1970)。如欲得一更詳細有關再社會化的分析，請參見 Sears (1975)。

因此，我們所得到的推論是，這些因素一般並未足夠使成人從其早期的政治社會化之餘值 (或較後之青春期的再社會化) 中轉移。由於那些經歷這種經驗者的自我選擇，以及經驗的異質性，我們不能夠堅信這個推論；這些顯然都不是基於隨意選擇之實際團體的生活所形成，完全爲人所知之面向的干預。不過，沒有影響或極少影響的形態卻令人印象深刻。

總體資料或年齡相關者之可能的誤解 兩種其他的資料經常誤用來辯護或反對持續。其中之一，即有時候，在不同時間所測量而得之總體性個人反應的固定（或變動）被用來斷定個人態度之持續（或變動）。例如，一九五〇年代及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美國成人間政黨認同分配的固定，常被用來意指其在個人之內也是穩定的。另一方面，近年來成人人口中政治信任層次之降低，以及獨立派之增加一直被用來反映羣衆個別態度的變動。但密勒（Miller；一九六七年）及康佛斯（一九六四年）曾具有說服力地顯示，即使當各不同態度之邊際頻率，在整個人口內歷經時間爲固定的、許多個別態度的變動仍可能發生。

另外一個問題是，把在某一個時間受訪問設定的抽樣，態度上的年齡差異，誤解爲個人年齡較大時態度便變動的指示。因此在任何一個設定時間內年紀較大者，與年紀較輕者間，在政治信任（Easton and Dennis, 1969）、大儒主義（Jennings and Niemi, 1968）、及總統偏好（Lipset and Ladd, 1971）上的差異，偶爾會被錯誤地用來指示其在人生過程上的變動。當然，由於缺乏對早期社會化的歷史階段做某種控制，把這個做爲隨著年齡而來之態度變動的證據是不適當的。它們可能只是反映了代間的差異。

有一個應付這兩個問題的分析性策略（至少是令人部分滿意的），便是「性質類似之同組對象的分析」。這就牽涉到把某一個出生羣在兩個不同點的測量作一比較——例如，出生於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一年這個時期的人，在一九五六年抽樣，而在一九六〇年又再抽樣，若（從同一出生組得到之）兩個樣本的态度，在兩個測量點大體可比擬，則最佳的猜測是個人的態度並未有太大的變動（至少它

們未以任何一致的方向變動)。

近年來，曾從事過許多這類研究，且持續而不作態度的變動，乃是迄今最普遍的結果。耶寧士與奈米(一九七四年)曾徹底記錄了年紀較大者(在任何一個時間受測)之較大的黨派性。但格連(一九七二年)使用了同組對象分析，卻發現自許為獨立派者的數目並未隨著年齡而減少，而克里脫登(Crittenden, 一九七一年)、格連與赫夫納(Hefner, 一九七二年)及克雷卡(Klecka, 一九七一年)曾發現，一般並沒有因為年齡增加而就瘋狂地靠攏共和黨或保守主義。阿伯蘭山(一九七一年、一九七四年)曾發現，當任何設定的出生羣達到(或通過)成熟的年代時，以階級為基礎的投票率並無顯著的變動。而年齡的增長甚或使得成熟的投票人稍微移向自由派的方向，亦即與整個選民的移動一樣(Gleyn, 1974)。所以來自這些年紀大及年齡增長的調查所得資料，一般皆支持一個持續的觀點。當然在任何特定的案例中，其他的解釋也是可能的，不過就整體而言，證據所述是令人驚訝的。

早期社會化的獨特性 隨著持續的評估，一般所產生的一個問題是態度的標的物(及其相關態度的題目)會隨著時光而改變得相當厲害。持續的問題因而降為是否一個固定的情感表達以改變刺激的題目，其次人們必須問，是否早期的政治社會化一般牽涉到制約特定的情感至相當特定的態度標的物，例如，「好」的情感指「白」的東西？或者它也涉及比較全球性及一般化之認知結構的獲取，它通常可以比較應用至廣泛不同之過去、目前及未來的政治標的物，諸如「普化之體系支持」的一般意向、「保守主義」、「疏離感」等？

這是一個引起相當爭辯的問題。曾經有力地採取了各種不同的觀點，多數來自於某個先驗的理論

性先入之見。凡是從一般化認知階段的立場（如 Adelson, 1972; Tapp and Kohlberg, 1971）或全球性之人格需求的立場（如 Knuson, 1974）去探討此問題的人，皆傾向於根據一般化的信念體系來看早期社會化的遺跡。它們被視為並非與特定內容密切相連，且被認為與新的、正出現的態度標的物是容易一般化的。同樣地，凡是與伊登一樣（一九六五年）探討該問題是出之於對政治體系之命運感興趣的人，則尋求相干之一般化的政治意向，諸如政治效力感、權威的仁慈、對政府的信任、服從法律等。這些普通的意向，也被認為隨時一般化為整個人生之廣泛不同的情況與標的物。

另一方面，來自學習理論的一個態度獲取的模式，則視情感與制約的原來刺激有較密切的聯繫（例如，Anderson, 1971; McMurty and Williams, 1972）。只有有限的一般化可期待，其主要是基於態度標的物間相當簡單及膚淺的類似性。

目前，在我們看來，證據的要旨是朝著多數原先社會化之獨特性的。對於這個結論，我們可以給予許多理由。首先，很顯然，兒童的情感偏好發展得比他們的知識儲存更為快速（Greenstein, 1965; Sears, 1969a）。其次，同樣的結論正緩慢地出現於非政治性的，但在心理上類似的社會態度之研究。愈來愈顯著的，多數人並無對權威之廣泛一般化態度，並無廣泛一般化之道德規範及對於曖昧的容忍等（Mischel, 1968, pp. 20-28），至少在一個設定文化內的人們，並未依這些面向而有系統地不同，不管他們也許曾內化了多少共同的文化規範。相反的，他們在這些方面的態度與行為傾向，對特定的態度標的物或情況為獨特的。第三，積極顯示兒童政治態度中之一般性（亦即，對不同內容的一貫性）的研究一直很少。由於這個問題一直未被直接提及，任何關於它的結論必然為一預感。但多數兒

童之政治態度的研究，有賴於個別的題目而非合併幾個密切相關之題目的量表，而所以如此，部分原因乃兒童的態度一般在不同的題目上並非密切相關的。凡是可發現此種一貫性者，其通常發生於題目中的重要字眼幾乎完全一致時，例如，「相當多主宰政府的人為不誠實的」，和「相當多政客為不誠實的。」(Dennis, 1969, p. 24)。當在理論上測量同樣態度的題目被十分不同地措辭時，回答的一貫性便顯著地降低，且常低至消失點(如欲見其例，請參閱 Dennis, 1969; Vaillancourt, 1972; Table 2 above; Zellman and Sears, 1971)。而我們早先亦曾舉證以駁斥一個「普化體系支持」的單一面向的廣泛存在。

這種一般化的結構，不僅在兒童之中相當不普遍，就是在大量的成人公衆也似乎令人感到稀少。一般化之政治意向的量表(例如關於國內的自由主義、政治效力感、政治信任等)常可基於成人的代表性樣本而形成，提示某些基本的態度結構(例如，Campbell et al., 1960, Chapter 9; Hensler, 1971; Searing, Schwartz, and Lind, 1973; Sears and McConahay, 1973)。但各題目間的相關卻仍傾向於相當微小(Converse, 1964)，而在其他領域，這種意向對特殊的政策題目的關係卻傾向於十分微弱(Searing, Schwartz, and Lind, 1973)。各種不同態度間的拘束並非十分有力，而最普遍的組織乃近於霧狀而非集中狀。

多數學者對於成人間成拱形之抽象的理念結構的存在也表懷疑。美國的成人表示或實際擁有任何極抽象之自由——保守思想的並不多(Campbell et al., 1960; Converse, 1964)，即使在一場熱烈的總統競選之詞彙中極強調這些術語(Field and Anderson, 1969)。抽象之程序的原則，諸如言論自

由的原則，似乎只是不一貫地應用到具體的情況 (McClosky, 1964; Stouffer, 1955; Zellman and Sears, 1971)。像疏離、參與、效力、及政治信任，這些被認為全球性的體系態度，若以實證的角度來省察，便轉為比我們平常所想像更具異質性及獨特性 (See Citrin, 1972; Finifter, 1970; Hensler, 1971)。種族與人種的偏見也傾向於針對一個特定的其他羣體 (outgroup)，而非反映容忽或不容忽的某個一般因素 (Harding et al., 1969, p. 14; Sember, 1961; D. T. Campbell, 1947)。

由於這些理由，目前最適當的想法，似乎是把早期的政治社會化視為主要在對相當特定的態度標的物提供情感的意向，而具相當有限之認知的應用與聯想。這種看法將有助於解釋在今日文獻中許多看來含混的發現。兒童們從他們對異議者的態度或一個簡單的言論自由口號，似乎能夠對一個容忍異己的具體情況多少加以一般化，但該一般化乃十分有限的，似乎並不能超越涉及不同之歧異者的具體情況 (Zellman and Sears, 1971)。在成人期中，一般化的政治意向傾向，只是漠不關心地與並不會公開乞求此種意向的政策選擇有關；例如，一般化的政治信任只是微弱地與各種越南政策之可能選擇的偏好有關 (Searing, Schwartz, and Lind, 1973)。在凱伊之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六〇年總統選舉的分析中 (一九六六年)，只有當候選人或他的黨被公開地乞求時，政策的偏好才與總統的選擇是高度的一致的 (See Sears, 1969a, pp. 361-363)。加州人近年來之投票與其自命為「自由派」或「保守派」一致並擁有適於這些立場的政策態度，乃是當該州主要的政治人物正以那些術語來公開界定其自己及政策問題時 (Bicker, 1972; Sears and Kinder, 1971)。

如果早期政治社會化的餘值最常傾向於狹窄與特定的情感，而非全球性及一般化的意向時，則態

度標的物的連續性在決定早期社會化餘值的持續中，甚至於變得更重要。顯然地，它們可能持續，但若在成年期中(1)態度標的物本身已經與其在早期社會化中所呈現的有很大的變動；或(2)適當的態度標的物，並非總是呈現為一具體可見的選擇，則似乎就不可能。換言之，爲了持續能在公然的行爲中顯現，以及在隱含的意向中存在，則不管是在一個訪談的過程或投票箱或其他任何地方，便必須在可供回答的選擇範圍中，配合以某種選擇自由。●

● 這個觀點似乎符合其他曾調查在心理意向中個別差異之人生過程穩定性者的觀點。對這個連續性的假定，所作最銳利之批評之一即爲 *Walter Mischel* (1968)。他批評的要點是，表面上測量在多重情況之同樣人格特徵的不同測驗，一般皆無法有極高的相關。從這一點出發，他說，人格的意向乃比一般所被認爲的更具有情況特殊性。但是關於態度，*麥克*的批評多少有些不同，比數與我們的分析一致。

一個人過去的行爲，經常可以用來預測他未來在類似情況中的行爲，而許多症狀顯示，經過一段長時間仍有相當的穩定性，特別是當相干的刺激情況卻維持穩定……認知的一致性傾向特別強……而在一個人自身中及在其他人人格中之固定性的主觀印象，並非一個幻覺……對於個人歸諸於他們自身之描述性的類屬、人格的標幟及態度與價值而言，長時間的一致性似乎是高的 (*Mischel*, 1969, pp. 24, 26)。

## 摘要：早期社會化的持續

持續的觀點有其堅強的形態，也有其軟弱的形態。其最堅強者，是社會化到青春早期早期左右大部分告成，此後極少發生態度變動。其較弱者，是社會化乃從兒童期中期至青春早期逐漸進行，而其完成只有當年輕的成人已經再社會化或未曾再社會化之時。

以簡單描述的方式，可以說四個主要的發現代表了關於持續證據的要旨：(1)成人們堅定地抵抗改變他們黨派態度的任何有系統的壓力；不過(2)長期縱貫性的研究指出，隨著時間而有某種前後移後的變動，而且顯然地，政治信任一般隨著年齡而腐蝕；(3)任何再社會化，即使在成年期的早期，顯然地需要有一個費力的及通常有力的社會情況；及(4)原先兒童期社會化之大而有系統的背離，似乎限於青春期及緊接於青春期之後的一段年齡階段。因此，就其最簡單之形式來看，持續的觀點誇張了情況。比較可行的是一種修正的觀點，其說明了青春期及進入成年期之早期不斷進行的社會化及偶爾的再社會化。

不過，一些理由使我們猜疑可用的證據之偏見。美國戰後的政治穩定性也許已經導致對進入成年期早期之持續的某種高估，雖然，也許近年來並未如此。另一方面，持續很可能在多數的實證研究中一般被低估了，其原因是(1)長期縱貫性的研究因時間而產生之態度標的的變動；(2)態度標的內涵隨著時間而產生改變。若事實上社會化的餘值傾向於相當特定，且並不隨時一般化為其他內容，則它們可能以其原來的形式形成高度的持續，而其乃具有繼續不斷之政治相干性，只要同樣的政治衝突與社會

衝突存在的話。

## 結 論

最後，要抱怨政治社會化研究的品質是容易的，而許多人也曾如此做過（雖然就此而言，這個領域與其他處理自然進行過程之社會科學領域有許多共同處）。爲了提及指引對這整個領域所曾有過的主要批評，目前也許應該回顧一下。

簡單地說，所曾有過的主要批評是：(1)早期的政治態度是難預料的及不真實的；(2)它們只是曾經被（主要以問卷法）膚淺地及不適當地測量過；(3)抽樣一直是那樣不充分，以致於使研究結果無價值；(4)早期的政治態度在兒童期或青春期後並不持續；(5)它們對成人的態度與行爲無多大影響或根本無影響；(6)它們在政治系統內無多大重要性或根本無重要性；(7)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具有一種保守性的偏見，因爲其研究模式的維持而非態度的變動（see Kavanagh, 1972; Marsh, 1971, 1972; Searing, Schwartz and Lind, 1973; Vaillancourt, 1973）。

在縱覽此一堂皇數量的工作時，筆者的反應是，自從海曼（一九五九年）、格林斯坦（一九六〇年）及海斯——伊斯登（一九六〇年）等極優秀之開拓者的努力初次出現後短短的幾年來，它的品質之顯著的增進，相當令筆者印象深刻。這些批評在筆者看來似乎並不如某些其他人所能做的一樣地有力。且讓筆者依序來處理。早期政治態度的「真實性」，可由運用穩定性、一致性及力量的測驗來直

接加以評估 (Sears, 1969a)。這似乎是要認真地處理早期社會化之餘值的一個重要先決條件，而我們在本文中已曾明白地努力爲之了。許多研究一定未曾應用過這種測驗，也許它們應該應用。

方法論上的問題，諸如反應測量或同儕抽樣，我想現在並不是十分嚴重的困難。雖然詳細的訪談 (Adelson, 1972) 或投射技術 (Greenstein and Tarrow, 1970; Knutson, 1973) 的確值得一試，迄今它們並未產生與標準的問卷法十分不同之實質的發現。抽樣的偏見曾經證明造成大差異，特別是當牽涉到顯然不同的政治情境時 (例如，在黑人、山地人、教友派、軍隊小孩中等)。但如早先所曾指出的，最近的研究已走向對少數團體及其他文化有較大的注意，即使真正比較性的研究仍在幼年期中。

成年前政治社會化之餘值持續至成人期這個假定，當然是一個以資料比以議論解決得更好的問題，所以筆者曾嘗試在本文中公開明白地處理 (也在別處更深入地處理，見 Sears, 1975)。多數研究者都只是假定早期的社會化持續，而此假定主宰了他們的研究。不過，如前所示，我的看法是這個假定現在變成已經有相當良好的根基——但有某些重要的條件。

早期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性，不僅只在於其餘值持續至成人期。它們必然在組織或決定成人期之政治取向中也是十分有力的。從一個社會心理學者的觀點來看，這種影響必須就成人的態度與成人的行爲各別地來考慮。這種餘值對成人態度之影響的問題當然不屬本章之範圍，因爲它是屬於一個成人之公意的動態性問題。不過，迄今可能有人認爲，政治信任、政黨認同、種族偏見及其他此類推想的早期社會化餘值很明顯地在決定一般公民對政治事件及政治選擇的反應是主要的，這的確是戰後時期

多數關於羣衆政治行爲之主要研究要旨，曾以廣泛不同的內涵加以呈現（例如 Campbell et al., 1966; Citrin, 1972; Key, 1961）。這裏不是回顧所有這些證據的地方（在他處較詳細地考慮；見 Sears, 1969a, pp. 324-369, 399-443）。依我的觀點，具有指導投票、政策偏好、及候選人評價的這些成人態度之結果性測量，其基本的態度意向之一致性已經有十分豐富的文獻，不應再有嚴重的爭論。

● 簡言之，最近走這條路線的幾篇重要文章，乃以多少笨拙之歸納式的散彈槍的方式，來探討這個問題，而因此並不令人驚訝，所發現的極少。更多理論性引導的調查，事實上發現更多積極的結果；例如，把許多 SRC 投票分析或希特林之著作（一九七二年，一九七四年）與 Searing, Schwartz, and Lind (1973)，或 Sears and McConahay 之理論性引導的叛亂參預分析 (1973) 特別是第二、五、六、七及十一章與 Mcphail (1971) 比較一下。

但早期社會化餘值對成人政治行爲之影響是一個較複雜的問題。對於社會心理學家，它已證明爲一多刺的柞木叢 (cf. Collins, 1970; Freedman, Carlsmith, and Sears, 1974; Mischel, 1968; Wicker, 1969)，而政治學家曾經相當通情達理地探詢了早期社會化的態度，對於控制其後之行爲：諸如涉入積極的政治參與的力量 (Greenstein, 1970; Marsh, 1971; Searing, et al., 1973; Kavanagh, 1972)。當前證據的要旨是情況的變數在決定公開的行爲舉動（不過，當然不排除態度）中，扮演了一個大的角色。政治參與本身的決定因素由伯巴及奈伊在本叢書的第四冊中加以討論，但其證據

似乎並不剝奪成人前的社會化，在促進黨派的認可及未來候選人或種族積極主義等之活動層次中的角色 (also see Milbrath, 1965)。

縱使成人前的社會化，可證明為影響大量成人的公共態度及行爲，這些態度與行爲又轉而在政治系統中有任何重要的影響嗎？(Marsh, 1971)。政府政策的決定因素，的確不在我們有限的焦點之內，但公衆及公衆意見（不管是以投票或其他方式表示）的重要性，確爲多數關於羣衆政治行爲及民意之研究背後的一個假定。

最後，有人認爲政治社會化研究，一般具有一種保守的偏見，主要因爲它處理了系統維持的政治意向（諸如對體系的依附），而對擾亂現狀形成不滿的意向（諸如政黨認同），則幾乎沒有處理。且由於許多人認爲「社會化」這個概念意涵，強使兒童的態度、行爲和傳統的成人規範一致。

舉證此種指控是很容易的。但若認爲研究政治態度之發展的任何努力，便要有這種偏見，那就不對了。近年來所從事關於黑人兒童與墨裔兒童之多數研究（見 Greenberg, 1970a; Laurence, 1970; Garcia, 1973; Burton, 1974; Liebschutz and Niemi, 1974），皆已集中注意力於系統挑戰的意向，且經常帶著一種同情的而非批評的眼光。認同於黑人文化作爲促進對社會問題之深度覺醒及引發的好戰性，和社會行動的角色，也已同樣地給予更多的分量。（見 Sears and McConahay, 1973; Sears, 1973）。而筆者也曾提示，根據個人有效最大化其自己的興趣，而非根據其對傳統規範的服從性，來界定成功的社會化，可能導致所調查之結果變數的某些刺激性改變 (Sears, 1968)。雖然在此仍表現出，一個一個來看社會化餘值的一致性，而非一個一個個別的來看的主宰性傾向。

這些批評值得一提及加以評價，但對筆者而言，它們並未具有主宰的重要性。我認爲在這種文獻中真正的缺陷，反而是來自兩個其他的來源。一個是分析性的淺薄。理論陳述不夠清晰或者資料不夠紮實，不足以驗證理論，這種事太常發生了，阿伯蘭山（一九七四年）、格連與赫夫納（一九七二年）、及英格哈特（一九七一年）關於代間的影響，或者西特林（一九七二年）、英格史多姆（一九七〇年）及羅吉斯與泰勒（一九七一年）關於信任及正統性，乃是很好的反例——他們的型模都能有效而精確地指出理論性的問題，而且配合以有力的實證資料之分析。

另外一個一般性的問題，乃是獨立變數的軟弱測量。如前所提及的，筆者比較不會像某些大學同事那樣對以問卷爲基礎的依變數感到不舒服，但獨立變數的測量，大體而論，一直感到十分不足。不幸的是，要給在學兒童態度問卷是容易的，但要直接從父母得到態度資料，要得到關於家庭的人口學資料，要得到關於在課堂中實際進行什麼的紮實資料，或者關於兒童與其同胞兄弟姊妹、同儕、家庭外成人，媒體及政治競選運動等所作政治性接觸的資料卻是困難的。還有，要得到關於兒童之良好的人格資料或認知階段資料也是不易的。結果是關於兒童政治態度之內容與結構，要比關於它們的原因知道得多的多。

最後，似乎很可能，早期熱心研究成人前期的熱潮，將會逐漸由注意整個人生過程所取代。發展心理學本身也終於轉到這個方向，離開其一向對嬰兒及學前兒童的太過注意。也許最初有一種誘惑去視成人期或青春期以後爲多多少少無區分的人生過程（至少直至老年期開始）。但有更大的理由認爲，其在政治上，社會學上或心理學上並非爲完全無區分的。所以也許「成人期政治社會化」的研

究，將能如同「人生過程發展心理學」的研究（the study of “life spa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一樣，利用在後期的發展中各特定階段間的差異。

## 參考書目

- Aberbach, Joel D., and Jack L. Walker (1970). "The meanings of black power: a comparison of white and black interpretations of a political sloga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367-88.
- Abramson, Paul R. (1971).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Western Europe: a cross-national longitudina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131-55.
- \_\_\_\_\_ (1972a). "Political efficacy and political trust among black school children: two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34:1243-69.
- \_\_\_\_\_ (1972b).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and partisan choi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6:1291-4.
- \_\_\_\_\_ (1974). "Generational change in American electoral behavi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93-105.
- Abramson, Paul R., and John W. Books (1971). "Social mobility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Comparative Politics* 3:403-28.
- Abramson, Paul R., and Ronald E. Inglehart (1970).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ic support in four Western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419-42.
- Adelson, Joseph (1972). "The political imagination of the young adolescent." In Jerome Kagan and Robert Coles (eds.), *Twelve to Sixteen: Early Adolescence*. New York: Norton, 106-43.
- Adelson, Joseph, and Lynette Beall (1970). "Adolescent perspectives on law and government." *Law and Society Review* 4:495-504.
- Adler, Norman, and Charles Harrington (1970). *The Learning of Political Behavior*. Glenview, Ill.: Scott, Foresman.
- Anderson, Norman H. (1971). "Integration theory and attitude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78:171-206.
- Asch, Solomon E. (1956). "Studies of independence and conformity: I. A minority of one against a unanimous majority."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70: No. 9.
- Ashmore, Richard D. (1970). "Prejudice." In Barry E. Collins, *Social Psycholog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Bachman, Jerold G. (1970). *Youth in Transition, II: The Impact of Family Background and Intelligence on Tenth Grade Boys*. Ann Arbor, Mich.: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 Baker, Kendall L. (1970). "Political alienation and the German youth."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117-30.
- Baltes, Paul B., and K. Warner Schaie, eds. (1975). *Life-Spa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Personality and Socializ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Barber, James Allen, Jr. (1970). *Social Mobility and Voting Behavior*. Chicago: Rand McNally.
- Barber, James D. (1968). "Classifying and predicting presidential styles: two weak president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4:51-80.
- Barnes, Samuel H. (1972). "The legacy of fascism: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Italian attitudes and behavior."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41-58.
- Eicker, William E. (1972). "Ideology is alive and well in California: party identification, issue positions and voting behavior." Prepared f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 C.

- Bicora, Benjamin S. (1964).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Human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Wiley.
- Blumer, J. G., James R. Brown, A. J. Ewbank, and T. S. Naziter (1971). "Attitudes to the monarchy: their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during a ceremonial occasion." *Political Studies* 19:149-71.
- Boynton, G. R., Samuel Patterson, and Ronald D. Hiedlund (1958). "The structure of public support for legislative institution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163-80.
- Bullock, Charles S. III, and Harrell R. Rodgers, Jr. (eds.) (1972). *Black Political Attitudes*. Chicago: Markham.
- Butler, David, and Donald Stokes (1969). *Political Change in Britain*, College edi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Button, Christine Bennett (1974). "Political education for minority groups." In Richard G. Niemi (ed.), *The Politics of Future Citize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Cameron, David R. (1972).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patterns of French partisanship."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19-30.
-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 (1966). *Elections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Wiley.
- Campbell, Angus,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E. Miller (1954). *The Voter Decides*. Evanston, Ill.: Row, Peterson.
- Campbell, Angus, and Howard Schuman (1968). "Racial attitudes in fifteen American cities." In *Supplemental Studies for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Campbell, Donald T. (1947). "The generality of a social attitud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Caplan, Nathan (1970). "The new ghetto man: a review of recent empirical studie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6:59-73.
- Chaffee, Steven H., L. Scott Ward, and Leonard P. Tipton (1970).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Journalism Quarterly* 47:647-59.
- Citrin, Jack (1972). "Political disaffection in America: 1958-68."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1974). "Comment: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trust in govern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973-88.
- Clark, Kenneth R., and Mamie Clark (1939). "The development of consciousness of self in the emergence of racial identification in Negro pre-school childre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0:591-97.
- Clarke, James W., and John W. Soule (1971).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racial tension, and the acceptance of violence: reactions of Southern school children to the King assassination." In William J. Crotty (ed.), *Assassinations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Collins, Barry E. (1970). *Social Psycholog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Connell, F. W. (1971). *The Child's Construction of Politics*. Melbourne, Australia: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72).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the American family: the evidence re-examined."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323-33.
- Converse, Philip E. (1964). "The nature of belief systems in mass publics." In D. E. Apter (ed.), *Ideology and Discontent*. 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
- \_\_\_\_\_ (1966). "The concept of a normal vote." In An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Elections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Wiley.
- \_\_\_\_\_ (1970). "Attitudes and non-attitudes: continuation of a dialogue." In E. R. Tufté (ed.),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Problem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_\_\_\_\_ (1974). "Public opinion and voting behavior."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Converse, Philip E., and G. Dupeux (1966). "De Gaulle and Eisenhower: the public image of the victorious general." In Angus Campbell,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Elections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Wiley.
- Cook, Stuart W. (1970). "Motives in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attitude-related behavior." In W. J. Arnold and D. Levine (eds.),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969*.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Crittenden, John (1962). "Aging and party affili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6: 648-57.
- Davies, James C. (1965). "The family's role i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61:10-19.
- Dawson, Richard E., and Kenneth Prewitt (196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Dennis, Jack (1966). "Support for the party system by the mass publi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0:600-15.
- \_\_\_\_\_ (1968). "Major problem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research."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85-114.
- \_\_\_\_\_ (1969). "Political learning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a study of fifth, eighth, and eleventh graders in Milwaukee, Wisconsin." Madison: Center for Cognitive Learning, Technical Report, No. 98.
- \_\_\_\_\_ (1970). "Support for the institution of elections by the mass publi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819-35.
- \_\_\_\_\_ (1973). "Future work o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Jack Dennis (ed.), *Socialization to Politics: A Reader*. New York: Wiley.
- Dennis, Jack, Leon Lindberg, Donald J. McCrone, and Rodney Stiefbold (1968).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o democratic orientations in four Western system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71-100.
- Dennis, Jack, Leon Lindberg, and Donald J. McCrone (1971). "Support for nation and government among English childre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5-48.
- Dennis, Jack, and Donald J. McCrone (1970). "Preadult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party identificatio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243-63.
- Dolbeare, Kenneth M., and Phillip E. Hammond (1968). "The political party basis of attitudes toward the Supreme Cour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2:16-30.

- Donald, David (1956). *Lincoln Reconsidered*, 2nd edition. New York: Vintage.
- Easton, David (1965).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Wiley.
- Easton, David, and Jack Dennis (1965). "The child's image of government."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61:40-57.
- \_\_\_\_\_ (1969). *Children in the Political System: Origi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New York: McGraw-Hill.
- Elder, Glen H. (1970). "Socialization and ascent in a racial minority." *Youth and Society* 2:74-110.
- Engstrom, Richard L. (1970). "Rate and compliance: differential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olity* 3:101-11.
- Feldman, Kenneth A., and Theodore M. Newcomb (1969). *The Impact of College on Students: Vol. I. An Analysis of Four Decades of Research*.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Festinger, Leon (1950). "Informal social communic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7:271-82.
- Field, John O., and Ronald E. Anderson (1969). "Ideology in the public's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1964 elec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3:380-98.
- Finfister, Ada W. (1970).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alien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389-410.
- Freedman, Jonathan L., J. Merrill Carlsmith, and David O. Sears (1974).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 Friedman, Lucy N., Alice R. Gold, and Richard Christie (1972). "Dissecting the generation gap: intergenerational and intrafamilial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334-46.
- Gallatin, Judith, and Joseph Adelson (1970).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public good: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adolescent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226-12.
- Garcia, F. Chris (1973).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Chicano Children: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Anglos in California Schools*. New York: Praeger.
- Gergen, Kenneth J., and Kurt W. Back (1965). "Aging, time perspective, and preferred solutions to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9:177-86.
- Glenn, Norval D. (1972). "Sources of the shift to political independence: some evidence from a cohort analysi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52:494-519.
- \_\_\_\_\_ (1974). "Aging and conservatism."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76-86.
- Glenn, Norval D., and Michael Grimes (1968). "Aging, voting, and political interes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3:563-75.
- Glenn, Norval D., and Ted Hefner (1972). "Further evidence on aging and party identific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6:31-47.
- Greeley, Andrew M., and Joe L. Spaeth (1970). "Political change among college alumni." *Sociology of Education* 43:106-13.
- Greenberg, Edward S., ed. (1970a).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New York: Atherton.
- \_\_\_\_\_ (1970b). "Orientations of black and white children to political authority figure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51:561-71.
- \_\_\_\_\_ (1970c). "Children and government: a comparison across racial line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4:249-75.

\_\_\_\_\_ (1970d). "Black children and the political system."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4:333-45.

Greenstein, Fred I. (1960). "The benevolent leader: children's images of political authori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4:934-43.

\_\_\_\_\_ (1965). *Children and Pol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69).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Chicago: Markham.

\_\_\_\_\_ (1970). "A note on the ambiguity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definitions, criticisms, and strategies of inquiry." *Journal of Politics* 32:969-78.

\_\_\_\_\_ (1973). "Children's images of political leaders in three democracies: the benevolent leader revisited."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_\_\_\_\_ (1974).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Greenstein, Fred I., and Sidney G. Tarrow (1970). "Political orientations of children: the use of a semi-projective technique in three nations." *Sage Professional Paper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1:479-558.

Harding, John, Harold Proshansky, Bernard Kutner, and Isador Chein (1969). "Prejudice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Gardner Lindzey and Elliot Aronson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ition, Vol. 5.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Hennessey, Timothy M. (1969). "Democratic attitudinal configurations among Italian youth."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3:167-93.

Hensler, Carl P. (1971). "The structure of orientations toward government: involvement, efficacy and evaluation."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Hero, Alfred O., Jr. (1969). "American Negroes and U. S. foreign policy: 1937-1967."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3:220-51.

Hess, Robert D., and David Easton (1960). "The child's changing image of the president."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4:632-44.

Hess, Robert D., and Judith V. Torney (1965). *The Development of Basic Attitudes and Values Toward Government and Citizenship During the Elementary School Years, Part 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_\_\_\_\_ (1967).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Attitudes in Children*. Chicago: Aldine.

Himmelweit, Hilde T., and Betty Swift (1971). "Adolescent and adult authoritarianism re-examined: its organization and stability over tim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357-84.

Hofsetter, Richard C. (1969). "Political disengagement and the death of Martin Luther King."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3:174-79.

Hoge, Dean R., and Irving E. Bender (1974). "Factors influencing value change among college graduates in adult 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9:572-85.

Hraba, Joseph (1972). "The doll technique: a measure of racial ethnocentrism?" *Social Forces* 50: 522-27.

Hraba, Joseph, and Geoffrey Grant (1970). "Black is beautiful: a reexamination of racial preference and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398-402.

Hyman, Herbert (195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Glencoe, Ill.: Free Press.

Hyman, Herbert, and Paul B. Sheatsley (1947). "Some reasons why information campaigns fail."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1:413-23.

Inglehart, Ronald F. (1971).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rgener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991-1017.

Jackman, Mary R. (1972a). "Social mobility and attitude toward the political system." *Social Forces* 50:462-72.

————— (1972b). "The political orientation of the socially mobile in Italy: a re-examin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213-22.

Jahoda, Gustav (1963).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ideas about country and nationality. Part II: National symbols and themes."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3:143-53.

————— (1964). "Children's concepts of nationality: a critical study of Piaget's stages." *Child Development* 35:1081-92.

Jaros, Dean (1967). "Children's orientations toward the president: some additional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data." *Journal of Politics* 29:368-87.

————— (1973). *Socialization to Politics*. New York: Praeger.

Jaros, Dean, Herbert Hirsch, and F. J. Fleron, Jr. (1968). "The malevolent leader: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an American subcultu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564-75.

Jaros, Dean, and Kenneth L. Kolson (1974). "The multifarious leader: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Amish, 'Yanks,' Blacks." In Richard G. Niemi (ed.), *The Politics of Future Citize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Jennings, M. Kent (1973). "The variable nature of generational conflict."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ongress, Montreal.

Jennings, M. Kent, and Kenneth P. Langton (1969). "Mothers vs. fathers: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orientations among young Americans." *Journal of Politics* 31:329-58.

Jennings, M. Kent, and Richard G. Niemi (1968a). "The transmission of political values from parent to chil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169-84.

————— (1968b). "Patterns of political learning."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38:443-67.

————— (1973).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political orientation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wo generations."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New Orleans.

————— (1974).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Adolescenc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ohnson, Peter A., and J. Robert Stafferi (1971). "Stereotypic affective properties of personal names and sumato-types in childre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176.

Kagan, Jerome, and Robert Coles, eds. (1972). *Twelve to Sixteen: Early Adolescence*. New York: Norton.

Katz, F. E. and F. V. Piret (1964). "Circuitous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9:367-373.

Katz, Phyllis A., T. Chabaszinski, and H. Connolly (1975). "Anti-Negro prejudice: a review of research." In Phyllis A. Katz (ed.), *Toward the Elimination of Racism*.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Kavanagh, Dennis (1972). "Allegiance among English children: a dissen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127-31.

Kelly, E. Lowell (1955). "Consistency of the adult persona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0:659-81.

Key, V. O., Jr. (1961). *Public Opinion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Knopf.

\_\_\_\_\_ (1966). *The Responsible Elector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irkham, James F., Sheldon Levy and William J. Crotty, eds. (1969). *Assassination and Political Violence*. Washington: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Klapper, Joseph T. (1960). *The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Klecka, William R. (1971). "Applying political generation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behavior: a cohort analysi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5:358-373.

Knoke, David (1972). "Community and consistency: the ethnic factor in status inconsistency." *Social Forces* 51:23-33.

Knutson, Jeanne Nickell (1973). *The Human Basis of the Polity: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olitical Man*. Chicago: Aldine.

\_\_\_\_\_ (1974). "Prepolitical ideologies: the basis of political learning." In Richard G. Niemi (ed.), *The Politics of Future Citize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Koeppe, Sheila R. (1970). "Children and complian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cialization studies." *Law and Society Review* 4:545-64.

Kornberg, Allan, Joel Smith, and David Bromley (1969).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atterns of Canadian and American party officials: a preliminary report."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63-88.

Kubota, Akira, and Robert E. Ward (1970). "Family influence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Japan: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140-75.

Lambert, W. E., and O. Klineberg (1967). *Children's Views of Foreign Peoples*.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Langdon, Frank (1967). *Politics in Japan*. Boston: Little, Brown.

Langton, Kenneth P. (1967). "Peer group and school and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roc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751-58.

\_\_\_\_\_ (196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Lawrence, Joan (1970). "White socialization: black reality." *Psychiatry* 33:174-94.

Lawson, Edwin D. (1963). "Development of patriotism in children—a second look." *Journal of Psychology* 55:279-86.

Lieschutz, Sarah F. and Richard G. Niemi (1974). "Political attitudes among black children." In Richard G. Niemi (ed.), *The Politics of Future Citize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Lipset, Seymour Martin, and Everett Carl Ladd, Jr. (1971). "College genera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60's." *The Public Interest* 25:99-113.
- Lipset, Seymour Martin, Paul F. Lazarsfeld, A. H. Barton, and J. Linz (1964). "The psychology of voting: 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behavior." In Gardner Lindzey (ed.),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2.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Lopreato, Joseph, and Lawrence E. Hazelrigg (1970). "Intragenerational versu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 relation to socio-political attitudes." *Social Forces* 49:200-16.
- Lyons, Schley R. (1970).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ghetto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s* 32:288-304.
- Maccoby, E., R. E. Matthews, and A. S. Morton (1954). "Youth and political chan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8:23-29.
- Marsh, David (1971).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he implicit assumptions questioned."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453-65.
- (1972). "Beliefs about democracy among English adolescents: what significance have the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255-59.
- McClosky, Herbert (1964). "Consensus and ideology in America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8:361-82.
- McClosky, Herbert, and H. E. Dahlgren (1959). "Primary group influence on party loyalt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757-76.
- McGuire, W. J. (1969). "The nature of attitudes and attitude change." In Gardner Lindzey and Elliot Aronson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ition, Vol. 3.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McMurry, C. Allen, and John E. Williams (1972). "Evaluation dimension of the affective meaning system of the preschool chil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6:238-246.
- McPhail, C. (1971). "Civil disorder participation: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recent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1058-73.
- Merelman, Richard M. (1971).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y thinking in adolesc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1033-47.
- Merriam, Charles E. (1951). *The Making of Citize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iddleton, Margaret R., Henri Tajfel, and N. B. Johnson (1970).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aspects of children's national attitud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9:122-34.
- Middleton, R., and S. Putney (1963). "Student rebellion against parental political beliefs." *Social Forces* 41:377-83.
- (1964). "Influences on the political beliefs of American college students: a study of self-appraisals." *Il Politico* 29:484-92.
- Milbrath, Lester W. (1965).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hicago: Rand McNally.
- Miller, Arthur H., Thad A. Brown, and Alden S. Raine. (1973) "Social conflict and political estrangement, 1958-1972."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onvention, Chicago.
- Miller, Warren E. (1967). "Voting and foreign policy." In James N. Rosenau (ed.), *Domestic Source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213-30.
- Mischel, Walter (1968). *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 New York: Wiley.

\_\_\_\_\_ (1970).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persona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24:1012-18.

Mueiller, John E. (1973). *War, Presidents, and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Wiley.

Murphy, Walter F., and Joseph Tanenhaus (1968). "Public opi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The Goldwater Campaig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2:31-50.

Myrdal, Gunnar (1944). *An American Dilemma*. New York: Harper & Row.

Nesselrode, John R., and Hayne W. Reese, eds. (1973). *Life-spa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Methodological Issu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Newcomb, Theodore M. (1943). *Personality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Holt.

Newcomb, Theodore M., K. E. Koenig, R. Flacks, and D. P. Warwick (1967). *Persistence and Change: Bennington College and Its Students after 25 Years*. New York: Wiley.

Niemel, Richard G. (1973a).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Jeanne Knutson (e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_\_\_\_\_ (1973b). "Collect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family: a problem in survey methodology." In Jack Dennis (ed.), *Socialization to Politics: A Reader*. New York: Wiley.

\_\_\_\_\_ (1974). *How Family Members Perceive Each Oth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Okamura, Tadao (1968). "The child's changing image of the prime minister: a preface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Japan." *The Developing Economics* 6:566-86.

Orren, Karen K., and Paul Peterson (1967). "Presidential assassination: a case study in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29:382-404.

Orum, Anthony M., and Roberta S. Cohen (1973).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orientations among black and white childre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62-74.

Osgood, Charles E., and Percy H. Tannenbaum (1955). "The principle of congruity and the prediction of attitude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62:42-55.

Paige, Jeffrey M. (1970). "Changing patterns of anti-white attitudes among black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5:69-86.

Pammett, Jon H. (1971).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orientations in Canadian schoolchildren."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32-41.

Prewitt, Kenneth, George Von Der Muhll, and David Court (1970). "School experiences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 study of Tanzania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203-25.

Proshansky, H. M. (1966).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group attitudes." In Louis W. Hoffman and M. L. Hoffman (eds.), *Review of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Vol. 2.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Prothro, J. W., and C. W. Grigg (1960).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democracy: bases of agreement and disagree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22:276-294.

Reading, Reid R. (1968).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Colomb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exploratory study."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352-381.

Riccardi, Michael P. (1974).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Citizenry: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New York: Chandler.

- Niley, Matilda White (1973). "Aging and cohort succession: interpretations and misinterpretation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7:35-49.
- Rodgers, Harrell R., and George Taylor (1970). "Pre-adult attitudes toward legal compliance: notes toward a theory."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51:529-51.
- \_\_\_\_\_ (1971). "The policeman as an agent of regime legitimation."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5:72-86.
- Rogers, W. C., Barbara Stuhler, and D. Koenig (1967). "A comparison of informed and general public opinion on U. S. foreign polic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1: 242-52.
- Roig, Charles, and Francoise Billon-Grand (1968). "La socialisation politique des enfants." *Cahiers de la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No. 163. Paris.
- Schaie, K. Warner (1970). "A reinterpretation of age related changes in cognitive structure and functioning." In L. R. Goulet, and Paul B. Baltes (eds.), *Life-spa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The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chaie, K. Warner, and Iris A. Parham (1974).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adulthood: ontogenetic and socio-cultural chan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0:483-92.
- Searing, Donald D., Joel J. Schwartz, and Alden E. Lind (1973). "The structuring principl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belief syste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415-32.
- Sears, David O. (1968). "Review of the R. Hess and J. Torney,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Attitudes in Children*."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38:571-78.
- \_\_\_\_\_ (1969a). "Political behavior." In G. Lindzey and E. Aronson (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ition, Vol. 5.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_\_\_\_\_ (1969b). "Black attitudes toward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Watts insurrection."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3:515-44.
- \_\_\_\_\_ (1973). "Protest and the residues of preadult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Montreal.
- \_\_\_\_\_ (1975). *Political Attitudes Through the Life Cycle*.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 Sears, David O., and Donald R. Kinder (1971). "Racial tensions and voting in Los Angeles." In Werner Z. Hirsch (ed.), *Los Angeles: Viability and Prospects for Metropolitan Leadership*. New York: Praeger.
- Sears, David O., and John B. McCaughy (1973).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The New Urban Blacks and the Watts Riot*. Boston: Houghton-Mifflin.
- Sears, David O., and Richard L. Whitney (1973a). *Political Persuasion*.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 \_\_\_\_\_ (1973b). "Political persuasion." In I. deS. Pool and Wilbur Schramm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Rand McNally.
- Segal, David R. (1970).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party choice in Canada: an attempt to replicat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471-4.
- Sheatsley, Paul B., and Jacob J. Feldman (1965). "A national survey of public reactions and behavior." In B. S. Greenberg and E. B. Parker (eds.),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ica, Morris C. (1972). "An analysis of the political orientations of Mexican-American and Anglo-American children."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 Sicinski, Andrzej (1969). "Dallas and Warsaw: the impact of a major national political event on public opinion abroad."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3:190-96.
- Sigel, Roberta S. (1965). "An exploration into some aspect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school children's reactions to the death of a president." In Martha Wolfenstein and G. Kliman (eds.), *Children and the Death of a President*.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 \_\_\_\_\_ (1968). "Image of a president: some insights into the political views of schoolchildre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216-26.
- \_\_\_\_\_, ed. (1970). *Learning about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_\_\_\_\_ (1968). "Image of a president: some insights into the political views of school childre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216-26.
- Simmons, Roberta G., and Morris Rosenberg (1971). "Functions of children's perceptions of the stratification syst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235-249.
- Smookler, Helene V. (1971). "War, police, and democracy: how children view the issues and the na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Stember, C. H. (1961). *Education and Attitude Change*. New York: Institute of Human Relations Press.
- Stouffer, Samuel A. (1955). *Communism, Conformity,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Doubleday.
- Stradling, Robert (1971). "Socialization of support for political authority in Britain: a long-term view."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21-22.
- Stradling, Robert, and Elia Zurick (1971). "Political and non-political ideals of English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hildren."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19:203-28.
- Tajfel, Henri (1969). "Cognitive aspects of prejudi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5:79-98.
- Tapp, June L., and Lawrence Kohlberg (1971). "Developing senses of law and legal justi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7:65-92.
- Thomas, L. Eugene (1971). "Family correlates of student political activism."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206-14.
- Tilman, R. C. (1970). "Student unrest in the Philippines: the view from the South." *Asian Survey* 10:900-9.
- Tolley, Howard, Jr. (1973). *Children and War: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o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Torney, Judith V. (1974).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IEA cross-national civic education data for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of American adolescents." Paper presented a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eeting, Chicago.
- Treiman, Donald J. (1970). "Status discrepancy and prejudice reconsidere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5:863-5.
- Tudor, Jeannette F. (1971).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 awareness in children." *Social Forces* 49:470-6.
- Vaillancourt, Pauline Marie (1972).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young people: a panel survey of youngsters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_\_\_\_\_ (1973). "Stability of children's survey respons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7:373-87.
- Vaillancourt, Pauline Marie, and Richard G. Niemi (1974). "Children's party choices." In Richard G. Niemi (ed.), *The Politics of Future Citize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Verba, Sidney, and Norman Nie (in press). "Citizenship and Civil Milieu." In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eds.), *Handbook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Reading: Addison-Wesley.
- Weiler, Hans N. (1971). "Schools and the learning of dissent norms: a study of West German youth." Paper deliver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Chicago.
- Weissberg, Robert (1972). "Adolescents' perceptions of political authorities: another look at political virtue and power."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6:147-68.
- \_\_\_\_\_ (1974). *Political Learning, Political Choice, 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 West, J. (1945). *Plainville, U. S. 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hite, Ralph K. (1969). "Three not-so-obvious contributions of psychology to peac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5:23-40.
- Wicker, Allan W. (1969). "Attitudes vs. actions: The relationship of verbal and overt behavioral responses to attitud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5:41-78.
- Williams, John E., and John R. Stabler (1973). "If white means good, then black . . ." *Psychology Today* 7:50-54.
- Wilson, Howard E. (1938).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 New York: McGraw-Hill.
- Wolfenstein, M., and G. Kliman, eds. (1965). *Children and the Death of a President*.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 Zellman, Gail L. (1973). "Sex roles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 Zellman, Gail L., and D. O. Sears (1971). "Childhood origins of tolerance for dissent."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7:109-36.



### 第三章 政治人員甄用

Moshe M. Czumowski 著  
翁 瑞 廷 譯

導論：政治人員甄用有關事項和政治人員甄用之研究

政治人員甄用的研究，是探究個人或羣體被引入實際政治角色所經過的過程。我們研究主題的定義，藉與政治精英研究的區分，主要在下列兩方面：(1)雖然政治精英的研究，涉及在政治上位居要津者，或是有關這些精英所來自的社會階層。政治人員甄用的研究有關達到這種地位的社會或政治過程。(2)精英的研究，傳統上是指統治人才，然而政治角色較廣泛的定義是包括反對黨成員，革命領導者，及其他在一定政制結構外之政治的反對精英。

就此界定而言，政治人員甄用研究是一相當新進的經驗性政治學。即使可以回溯至現代政治社會學之父，例如摩斯卡 (Mosca)、帕雷圖 (Pareto)、和威伯 (Weber) 等的著作，皆曾強調精英的循環性及以政治作為專業。然而，這並非檢查「貴族政治的墳場」(Pareto, 1935)，政治人員甄用的研究是在探究政治職歷 (career) 的發展。

馬維克 (Marvick, 1961a) 曾對發展的觀點，作一理論性的辯正。其論點可加簡要敘述如后。

政治角色研究的非發展性之研究法，認為政治角色的行為動機乃決定於其社會起源，藉此理論來解釋

政治決策者的執行行為或成就。不管，「官員行動的前提大部分是否導自關係遙遠的社會背景」。但因政治人員甄用的選擇工作所導致在技術和能力，及組織和價值等的不同，卻鮮少爲人所知。政治人員甄用的目的，是解釋產生區分政治精英和大眾，及政治和其他社會精英的過程。這些研究的重要性，遠超過他們的近程目的，其目的旨在期待政治人員甄用類型能解釋官職執有者，其他政治精英的取向，和角色扮演的某些特性。

我們在下列三個問題領域上，對政治學中政治人員甄用研究集中的程度，加上評估是有可能的，就此而言，政治人員甄用的研究途徑和理論對整個學科或有重大的貢獻。(1) 政治人員甄用是政體與社會間的重要聯結點；(2) 對非政治性目標的達成而言，它是政治上有關因素的指標；(3) 政治人員甄用的研究可以使之相互競爭，有時相互排斥的當代政治學上一些矛盾趨於一致，以下我們試扼要就政治人員甄用在這三個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加以說明。

### 政治人員甄用是政治與社會間的重要聯結點

就政治人員甄用的界說——個人被引進實際政治的過程——而言，無疑地，它是社會與政治系統的聯結點。其重要性乃在它具有建構政府與社會間關係的功能。由於政治系統同時具有反映和控制社會變遷的雙重特性，故政治系統與社會的關係存在著三個基本難題：

1. 政治秩序有賴於制度的持續性，但持續中卻隱含著人員的更新。

2. 政策目標在於相關性、持續性、效能性；但於實際社會中即在顯示出社會、經濟、及文化變遷的事實。

3. 政府以權威為基石；而權威的維持則有賴於合法化；但合法化的獲致則有賴於政府對社會所作出的反應及肩負及職責的達成。

這些難題的解決之道，大部份全視政治人員甄用的一般型式和這些型式之變化而定。政治人員甄用之所以是政府與社會間的重要聯結點，乃因它具有「系統維持」之功能 (Almond, 1960)，及可充當變遷之主要孔道。

### 政治人員甄用是政治上完成非政治性目標相關的指標

政治人員甄用的研究，是能對政治學有所貢獻的領域，即對政治行動者、候選人和官員的目標取向加以分析。政治家動機中私人（個人）和公共（集體）目標間的區別上，提供了在一定社會或社會次級系統中，對政治和政治職歷的「功能性質」加以評估的有用的指涉標準 (Eulau and Koff 1962; Czudnowski, 1968)。

許多研究精英和精英行為的學者，假設政治學為下列兩因素所激勵：(1) 個人的報酬期待（物質的、社會的或心理的）；和(2) 他們對公共問題、領導者、或主義的取向。故私人或公共目標取向或誘因，不僅彼此有別；並被假定為兩者是分離、不重疊的動機。但有些學者則將兩種取向型式聯結成一

單一的動機症候羣 (a single motivational syndrome)：如威伯的「非職業性的轉變政治家」即包括了某些爲主義而奉獻的政治行動者 (Weber, 1921)；拉斯威爾就把政治家描述爲一個將個人需要變轉成公共目標的人 (Lasswell, 1930, 1954)。但是，政治過程包含了達成共享 (公共) 目標的集體行動，和那些謀求公職卻不尋求、亦不接受公務支持以助其滿足個人需要的候選人。

對政治行爲者之私人 and 公共目標之考慮，指出了政治行爲和其他型式的社會行爲之基本差異。雖然，所有社會行爲都有私人 and 公共兩種可見的後果，但僅政治行爲 (或其他社區取向的行爲) 有私人 and 公共之意欲後果 (目標)。更甚者，非政治性行爲爲公開宣示的和爲社會接受的目標，都是私人性質的，而在政治上，公開又被接受的行動目標則爲集體性質的公共目標。由於政治行爲具此種特性，使得政治學家中必須藉明示的公共目標，和隱藏的私人動機，來解釋政治行動的可觀察結果。

在政治人員甄用的研究中，做這種觀察是最適切的。藉獎助一個政治事業，政治行動者將其個人目標，與公共目標，依其優先順序加以排斥。因此，政治人員甄用是政治系統對個人提供報酬的重要指示器，而且在追求非政治性目標上，又能充當評估與衡量政治和非政治性手段之相互交換程度的檢驗器。這種相互交換性，是評估一個政治系統的重要變數，其範圍從交換性爲零的極權，到交換性高的自由主義，形成一個程度不同的連續體。

### 政治人員甄用和當代政治學中的矛盾

關於政治學科的現狀，我們從另一個不同的觀點來看，政治人員甄用的研究，可澄清一些理論上

的矛盾。在這些矛盾中，甄用的聯繫功能與甄用研究假設的一致性兩者之間，存著一種平行發展的理論。

第一個矛盾在「制度的傳統」和「行爲學派」之間，對於政治社會學企圖藉諸心理、社會、和經濟的變數來解釋政治過程，兩者對此種主張立場不同。傳統派認爲，果如此，則政治過程將統一獨立的行爲範疇，被化約成一個由非政治因素所引發的依變數。而政治人員甄用研究，則聯結了這兩種立場的主要因素，其焦點集中在個人的心理、社會、經濟的特點上；依政治的指涉標準，透過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過程，使個人進入政治體系制度化的角色結構中。

第二個矛盾是關於經驗政治學傾向於實證研究，認爲政治學應研究「是什麼」，而不能研究所有與政治有關的事項，如變遷中的衝突。這種論點的支持者指出，早期經驗研究的瑣碎發現，乃由於研究興趣過度集中於羣衆的政治行爲上，特別是投票行爲；但對於精英行爲的研究則發展緩慢。如前述之矛盾，政治人員甄選之研究是建立在與此兩立場相一致的假定上。政治體系反應並控制社會變遷，「實然」包括了對體系的支持和變遷中的衝突。變遷（或現狀維持）的規範性標準，爲政治精英所聯接，且透過甄用過程，使贊成另一套規範標準的潛在精英，得以扮演決策的角色。

最後是全體主義與方法論的個體主義間的矛盾。全體主義假定「不論是體系的分析或該國的歷史性分析」，政治過程僅能從「全體」(the whole)的觀點加以瞭解，即對較大的單元從事分析。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假定，不論是分析小羣體的政治行爲或是分析較大聚合體的政治行爲，其基本的分析單元，仍然是個體。個體政治學和總體政治學被視爲兩個互斥的理論架構，但在今日，我們能在空

間（生態的），和時間的分析尺度上加以概念化或解釋行為，這種區別已逐漸被淹沒了。政治人員甄用的研究對個人進入政治職歷的路徑加以概念化，視此路徑為個人變數、社會審核過程、政治組織、有系統的制度和規範和爭論等一連串的互動過程，因而政治人員甄用研究，乃固定在總體主義和個體主義的政治過程中。

假如這些是政治人員甄用的研究或與其相關領域的研究目的，則此種學科的情況如何？在過去與現在的努力下，其研究發現與理論上的卓見又如何？從未來的研究取向、範圍、方法上，我們能得到什麼樣的結論？本章將對這些問題加以研究。

我們將從對某些主要概念的意義澄清開始討論，並對政治人員甄用研究所採用的觀點（*Perspective*）、模式作一概觀（見第二部份）。其次是對研究發現加以檢討，在此強調的是，研究者研究焦點所在的一系列變數（見第三部份）。在這些變數討論的次序中，反映出政治人員甄選的發展模式：社會背景變數、政治社會化、最初的政治活動、見習、職業的變數、動機和選擇，最後於第四部份，我們將研究發現的理論性解釋結合成甄用理論的一個大綱或模式，此亦是日後研究的憑依。

本章中的焦點，全在於個體分析上。但有無數對精英背景、職業的總體解釋，對於這些卓越的見解我們可加以利用。此包括：一九六三年 *Gutisman* 對英國精英、*Singer* (1964) 對錫蘭精英、*Frey* (1965) 對土耳其、*Zapf* (1966) 對德國、*Dogan* (1967) 對法國、*Linz* (1973) 對西班牙精英的研究。這些文獻大多是關於精英和政治系統的社會學歷史（*sociological history*）的資料，而不是對甄用過程的研究，在此我們不加以討論。本章對於共黨、亞非發展中國家精英甄用也不加以討

論，到目前爲止在這些國家中，甄用的過程並不是極可研究的。

### 概念、觀點和型模

在我們強調把政治人員甄用的概念化視爲發展途徑理論上的利益之後，它乃需要考慮某些基於發展架構的選擇所遺留下來之方法論上的困難。首先，是政治人員甄用過程運作定義的問題。是否應參考達到的目的點，指出過程完成後事件的狀況，而加以界定？假如是，何處是終點？或是否應以動機或行爲的特徵，及其發生的情況來界定？無數的研究包含不同的運作定義及對某些關鍵概念不同的解釋，將在第一部份討論，以澄清「最初政治人員甄用」的概念。

其次，政治人員甄用包括潛在的候選人，甄用的機構，社會和政治環境，和某一段時光。這些面向 (dimension) 提供不同的有利地點，和政治人員甄用的不同觀點，並包括不同的研究策略。第二部份涵蓋有關策略的利弊。

最後，在一定的研究策略中，研究者將選擇其所願引入分析的變數。這些變數構成其解釋架構型模。因爲政治人員甄用的過程頗爲複雜，而研究者從不同的有利地方，藉不同的強調領域，來探究政治人員甄用的研究，研究的文獻展示了許多不同的型模。這些最重要的型模將在第三部份討論。

### 政治人員甄用運作定義的探討：某些關鍵性的概念

只有少數的研究，把政治人員甄用視為他們探究的中心目標，政治人員甄用的假設和發現的解釋，通常只在涵蓋廣泛論題的精英研究中居於次要的分析地位。關於誰被選拔的研究興趣總是超越於如何被選上。關於政治家的社會和人口統計學上的人物評論的問題，是比嘗試重建包含過去情境、激勵、態度和行爲的過程問題，來得容易回答政治人員甄用研究的（明示或暗示的）偏見，可以在不同階層政府決策制度的精英行爲的研究，在主要是研究領導，在分析政黨結構與功能及選舉制度與選舉，在單一行爲者的政治傳記或世代變遷的精英結構之描述，在變遷或發展的研究，和在某些嘗試發現政治人物的人格結構的規律性研究中發現。這些不同的探討模式是逐漸增長研究興趣和政治人員甄用的分枝化的明證，他們也是在這個領域探討發展，尋求範例，可匹敵型模，和方法論上不可知論（methodological agnosticism）的初期指標。

概念的明晰對複雜現象的分析是必需的，但觀點的分歧卻把概念弄模糊了。政治人員甄用的概念在意義上是不夠清楚的。在阿爾蒙（Almond, 1960）的政治體系功能型模中，政治人員甄用被描述為一種功能「甄用社會和特定次文化宗教社區、地位、階級、種族社區、和其他類似者的人員，而且引導他們成爲政治體系中的專業角色，訓練他們適當的技術，提供他們政治的認知圖案、價值、期待和影響。」政治人員甄用的功能討論一般政治社會化功能所留下的領域，但政治人員甄用過程的系列，展示了與政治社會化大爲不同的變化類型。

政治體系中每個專業政治角色，其所需法律的必要條件，接近政治的手段，依經驗的先決要件和對黨派的涉入是不盡相同的，正如他們在政治權威的資源、範圍、影響方法和實質的領域上，有相當

大的不同。政治體系也不可能建立一個單一向的政治職歷或角色的階梯，然而政治專業顯示角色的升降序列，遵循一廣泛資源的類型，權威的影響方法有時減少決策者結合體的大小或從立法職位移向行政職位。即使官職的階層體系並不一定沿著權威結構的階層化而變化，特別在政治權威依功能和區域路線分開的體系中，美國國會衆院議員尋求參院議席或法國市長競選衆議院（Chamber of Deputies）席位，在實際意義上，此乃是尋求政治上的進升。政治人員被甄用至黨的選區領導者或市委員會的過程與甄用至國家立法者的過程是不同的，此乃自明之理。但「政治人員甄用」的名稱卻應用在這種情況中。

爲了利用以往經驗來區分這兩種政治人員甄用類型，有人建議把最初的政治人員甄用和政治的升遷加以區別，（Jacob, 1962）並有許多研究嘗試評估最初政治人員甄用類型，對伴隨而來的事業歷程的影響。然而，最初政治人員甄用的概念需要運作的開端（Threshold），一銳利的點。最初政治人員甄用能被視爲完成角色的特性爲何？不同政治體系與文化，對政治活動的性質與範圍、甄用的重要開端的眼光可能有所不同，故若要對不同環境的研究發現加以比較，需要某些在理論上有意義或運作上可應用的共同標準。

對於這個問題的探究，我們可從對政治家、官員所表現的行爲、取向、及政治涉入情形的基本差異著手。最時常被政治精英研究者提及的差異，乃在於「業餘和專業的」差別。它反應出政治涉入的範圍、類型和特徵的不同，但其他的觀察者則訴諸不同的環境和時期，賦予這些名稱更特殊的意義，使其互相有別。藉著對這些解釋的詳盡檢驗和引證來判斷這些區分的證據之檢討，將提供幾個「最初

政治人員甄用」運作定義的標準。

馬克斯·威伯一九一九年在慕尼黑大學的演講「政治為一種職業 (Politics as a Vocation)」(Weber, 1921)，仍是所有對政治人才甄用的經驗理論有所貢獻的文獻中最有意義的。對威伯而言，非職業性的政治家是一個偶然的政治家，「一個以從事政治為副業」的名人。職業化政治家是對政治工作作持續奉獻的人。而這種區分的標準是功能性的，因為「權力實際上是在那些持續地處理這種工作的人的手中」。與其功能標準相一致，威伯拒絕依個人背景或目的來判定政治的職業化；職業的政治包括那些「為政治而活」和「靠政治生活」的人。故對威伯而言，職業的政治家是一個持續的政治活躍者或是一個「全職」的政治家，而與他所期待或實際收到的報酬形式無關。

密布雷斯 (Milbrath, 1965) 提出在美國政治涉入的層級，其範圍從「冷漠者」、「觀察者」、「轉變者」到「鬥士」。此一尺度也可考慮為金字塔形，因為，時常為之的行為模式較多在底部，而較少在高階層。所有不同的政治行為類型發生的頻率和他們在尺度上的等級，及政治涉入的指標，也是花費時間和精力所得代價的指示器。在威伯的意義上，並非所有的行為都是職業性的，包括在鬥士範疇內的所有政治行動者，因為他們缺乏持續性的特徵（如在一場選戰中奉獻時間、參與幹部會議、請求基金）。然而，有些鬥士以政治為其職業，而非有閒暇時間才參與。密布雷斯的範疇，形成一連續的面向，而不就職業和業餘的政治家加以區別。須加以注意的是，其整個代價範疇中可直接測度的變數，就只為時間而已。

對政黨或公職的持續性服務和全職的政治行為，反映出兩種不同性質的奉獻。一個政黨活動者很

規律地參加一或兩星期召開的委員會，但他卻不必放棄他們的職業。而全職公職者將發現，要調和他的政治和非政治職責是極爲困難的，縱然這種調和並非不可能的；甚至他是一個自己經營的商人也相同。研究精英的學者，有時強調這些時間面向的問題。Mathews (1960) 在其對美國參議員的研究中，聯結了持續性（服務的長期性）和政治事業歷程類型的起源地位兩因素，他發現，職業性的政治家有著較長期的服務經歷和較低的社會起源；而業餘的政治家其服務時間較短，但其起源的社會地位則較高。巴克 (Buck, 1963) 研究英國下院的業餘者和職業者議員，首先他界定職業的政治家是奉獻所有時間於其工作的，而以服務的長期性來區分業餘和職業的政治家。當然，這些標準是互不重疊的，即使在巴克的抽樣中有八十二位議員在第一次任滿後即退出議壇（而被列爲業餘的政治家），其原因乃在調和兩種全職的工作。

薩托里 (一九六七年) 認爲政治職業化並不僅包括全職的工作和依政治而活的人。其中最重要的區別在於實際上或潛在的可選擇職業的有無。西歐國家的社會黨和共產黨中有許多職業的政治家，他們沒有其他的職業，一九五八年有百分之二十三的義大利國會議員落入這個範疇。在其他情況，職業化是伴隨議員生活的長度而來，但要決定不能回首點 (point of no return) 是不容易的。薩托里遂認爲，有潛在選擇職業的人爲半職業政治家 (semiprofessionals)。羅文伯 (Loewenherg, 1967) 與費雪 (Fisheh, 1972)，在研究西德國國會議員時採用了與薩托里相同的類型來分類，但 Beyme (1971) 則採取與威伯相同的觀點。

一九六〇年代美國的政治文獻中，「業餘」和「職業」的名詞被應用於政治行爲的動機和形式

上，如威爾遜（Wilson, 1962）的業餘的民主黨人（The Amateur Democrat）。業餘者發現政治中真正的報酬：在原則的基礎下決定公共政策，以反對專業者的外在報酬：權力、收入、地位、及競爭的樂趣。專業者視政治為贏取選舉，政黨利益，這種概念通常包含了妥協與訴諸特別利益；業餘者則視政治為爭議——實質的（如自由主義）或程序的（如改革主義）。專業者在政黨組織內運作，而業餘者的運作則奠基於俱樂部之上。

依威伯的理論，威爾遜主張業餘者乃為政治而活的人，至於他是否為一個全職的政治家是與此範疇無關的。專業者通常是一全職的政治家，但他卻未必是依政治而活的，他可能獲得權力或地位的報酬——此威伯將之歸屬於業餘者。在這方面威爾遜專業人員的建構包括 Rogow 和 拉斯威爾（一九六三年）描述的兩種類型的政治老板（political boss）；對博奕政治家（game politician）而言，政治的遊戲是自我表示和自我實現的主要模式；另一為獲利的政治家（gain politician），他利用權力地位，透過貪污來增加個人的財富。

要解釋爭議取向的業餘者與專業者利用妥協以贏取選舉兩者的不同，其理由就在於內部和外部報酬的不同，利用政治人員甄用不同的誘因（incentives）來解釋政治行為形式的差異（Clark & Wilson, 1961），而不同的誘因似乎與社會人口統計上的特性有關係。然而，我們應注意到，威爾遜分類中的不相稱性：鑒於專業政治的形式和目標與個人的目標，取向相一致，而業餘者顯然全沒有個人目標。甚至於在毫無任何個人報酬的情況下，捲入實際政治中，例如在沒有道德變化的滿足與自然實現需要的滿足時，這種捲入可能非常短促。然而，這是一個非常站不住腳的假設，比較可能的情形

是，個人滿足的期待是隱含的，較不易查覺發現。

威爾遜對業餘者的描述，是建立在對芝加哥、洛杉磯、紐約的一些政治俱樂部的觀察上，此為後來的某些研究加以證實。赫池菲、斯瓦森，和布拉克 (Hirschfield, Swanson and Blank, 1962) 研究紐約區四〇九位民主黨、共和黨、自由黨的黨委員會黨委，指出加入政黨的決定因素是理念而非社會經濟，黨組織被視為影響政策的有效工具，而非個人安全的避難港，委員會委員較熱衷於社會改革，而非迎合個別選舉。佔優勢的民主黨委員較少數黨委員對政治的涉入途徑要來得專業化。這種「新形式」使人也想起都市政治家社會人口統計的側面圖之變遷，他是（都市政治家）較年輕，受較好的教育（百分之六十受過大學教育），中、上階層的職業；幾乎有二分之一是婦女，且多於三分之一是未婚。作者深信自私自利仍是決定涉入政治的重要因素，但大多數的行動家，無論是意識或無意識地，皆把它附屬於「公共利益」的概念中。●

① 在聖路易 (Salisbury, 1965-66) 研究一百一十八位民主黨的區和鎮區組織的委員中顯示，在某些大城市，政黨對業餘者政治較其他城市更無動於衷。聖路易活動者和俱樂部委員並無適於業餘或專業的模式。論題取向似乎並不關涉政治參與。而家庭影響作為最初參與的刺激是大而易見的，此與其說是習慣毋寧說是目的。百分之四十是婦女，但教育的尺度較接近這些專業人員。而在聖路易的活動者中，職業的輪廓有幾分在專業和業餘之間。百分之十四有過贊助工作，但僅百分之六十八以此理由加入俱樂部，另外百分之三十在不同時候有過暫時的贊助工作。無一解釋提供聖路易業餘的反人才之缺乏。這問題不在此追究。

與高華德(Goldwater)的代表在一九六四年共和黨大會中會談，和麥卡錫(McCarthy)的代表在一九六八年民主黨大會的會談(Polsby, and Wildavsky, 1971)，及對一九六八年民主黨大會的一八〇位代表的調查(Soule and Clark, 1970)指出業餘的反对派精英(counterelites)的發生，並不只限在大都市中心的政治背景，此研究顯示出業餘的代表，內在的興趣乃在於實質的目標和黨內的民主，不像其他專業人員勉強論題妥協來維護黨的團結。專業者是地方取向的，業餘者有世界主義的傾向。波士畢和威爾達夫斯基描述這些業餘者為「純粹派者」，其態度有強烈的道德傾向。總統候選人的道德誠實是比贏取選戰的能力更為重要。專業者深信在交易和漸進的政策變遷中，以求得最大的支持。

Hofstetter (1971) 接受威爾遜建構的「業餘」和「專業」而作更嚴格的分析，他利用傾向測量工具來探討對專業者和業餘者對政治組織角色的認知(收集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地區的黨的區域領導人、輔助的黨俱樂部成員及黨內叛徒的資料中)，他證明對政黨程序的認知，和對會議的涉入模式，不能依單一面向來加以組織。這兩套模式在因素中顯示出集中於兩個不同的因素上。Hofstetter 然後使用五十個獨立的變數來確認這兩種建構。這些變數包括社會人口學的特性、社區的整合、對候選人的評價標準、選戰的技術和政治涉入。雖然這些變數的相關與威爾遜的理論上的預測相一致，但過程面向上的相關卻高於爭議面向上的相關。在某些實質上最重要的項目上，實證結果卻反駁了理論上的預測：(1)政治家應扮演代表的角色。(2)其他人則為目的而活躍在政場上。(3)視政治為一同意的過程。Hofstetter 指出威爾遜的作品對業餘者和專業者特殊屬性的定義是不清楚的。故依實證結果應加以修正。此一因素分析「很清楚地提議對業餘主義概念的重新建構是有其必要的。」

在 Hofstetter 的資料和分析中，過程和爭議參與兩面向上，皆傾向於對組織原則的態度，而非實質的爭議。業餘者的爭議參與態度旨在增加領導者對部屬的反應和責任。他們建議利用撤消或急劇降低對領導者的支持來達成這個目標，這些支持的資源是領導者建立權力地位的基礎。由於這種獲得支持的需要，使得專業者在爭議中保持中立（或採取彈性立場）。業餘者因而以不妥協的爭議立場來強調領導者的責任，但實際政策的目標卻沒有一個附著於這些要求上。無論這種態度在那兒流行，一九六〇年代的業餘者與改革運動的成員卻似乎並無多大不同。假如業餘者是高華德和麥加錫理想派選舉的工作者（和一九七二年麥高文選戰中的自願工作者），那麼「新政治」是「政治學者重覆發現的美國政治的重視特色之一」，此種情形是可能的（Wolinger 1972, p. 394）。然而格林斯坦（1970a, p. 58）指出，至少業餘的民主黨員是專心致志於一個特定政策的，即民權法案。

業餘者的理想取向因而結合了反對組織權力者和信奉「非貪得」（non-acquisition）或「後資產」（post-bourgeois）的價值（Inglehart, 1971）。此舉不像革命的學生領袖將這些取向轉變為烏托邦的無政府主義（見 Cohn Bendit, 1968）。業餘改革者透過說服來尋求支持，透過政黨制度來運作，然而他只能從經濟上信奉「後資產」或文化上有此傾向的社會層面中得到支持。如 Wolinger (1972) 曾極力辯稱，在美國的大都市中心，人口統計的移動，業餘者雖反對已建立的政黨組織；但這種人口移動卻增加窮人和未受教育的人口比例，而非減少；甚且，不論大小企業皆是政黨機器的自然跟隨者，如同移民一樣；選舉中贏得公職的候選人所面臨的是一多元的環境；在立法機構（如市議會）他仍會採反對立場，但在行政機構中，他就須適應環境的結構。基本上，決定業餘者是否放棄其不妥協

立場的程度者，乃是他個人對持續的政治職歷的承諾。

在對三藩市海灣區市顧問的研究中 (Black, 1970), Black 指出，個人和公共目標達成一致的傾向，也在市委員會的組織中流傳。他以一般專業化的定義來評估政治行為者的角色認知，在多元的政治體系中，流行在政治界中的標準是捐客、交涉。在研究上發現，他指出視政治過程為交易和實際從事政治交易的人都較信守於其政治職歷，但此種承諾乃是城市大小和公職競爭性的函數，我們可以如此推論：政治專業化的標準是有效性與功能性，因此在一個大而又較異質性的城市中，交易的姿態是贏取選戰的必要條件。這種推論與實際觀察相符，即仍處身於政治界中的大多數業餘者，被社會化入專業精神的社會思潮中。

環境結構與政治行為的不同誘因兩者的關係，在比較研究繁榮郊區、不繁榮鄉區的民主和共和黨選區主席時，曾被加以檢視 (Conway & Feigert, 1968)。Conway & Feigert 區分「目的」動機 (合乎業餘政治) 和「團結」、「物質」動機 (合乎專業主義)，他們發現在所有四個組織中，三分之二或更多的人為「目的」動機而參與政治，這些人認為如果他們離開政治，他們所失去的將是非目的的滿足，但富裕地區的領袖，其最初目的之變動較大，而不繁榮地區的領袖則較少變動。顯然，有計劃的懇求是導致最初進入政治的主要基礎，但此在從事選區領袖角色的工作時卻較無效。甚且有某些證據顯示，最初人才甄用中非目的、自我取向的誘因，並未因不斷的政治活動而逐漸改變成公共取向、目的取向的動機。Eidersveid (1964, p. 287) 指出，百分之七十五至九十七的民主黨地區主席、委員會委員，底特律區領袖在剛開始進入政治時雖有「個人化的動機」(Personalized

motivations)，到最後並未改變或傾向於「非個人取向」；在共和黨此差距是百分之五十七至九十二。開始時具「非個人動機」，只有百分之十二的民主黨和百分之二十二共和黨，後來未採取「個人化取向」。

這些嘗試建立政治角色認知的類型，對最初人員甄用定義的標準形成有何貢獻？任何超越單一情況的人才甄用的研究，需要一個能夠辨別各種狀況的標準。但超越各情況的通則化，總引起比較性和等值的問題，因最初人員甄用是過去的事情，是政治角色政治歷程的一個階段，而政治歷程卻變化莫測。除非最初的人員甄用，被界定為首次捲入任一社區取向的行為——此定義將使概念成爲無用——某些能從變化多端的政治職歷的模式及環境中加以觀察批評的出發點必須加以辨明。

先前對業餘和專業者差別的討論，顯示出訴諸動機併發症或行爲涉入特性（連續的活動或今天的職位兩者）區分的基本標準。作爲職業的「不能回首點」，只有薩托里的專業化定義才固著於動機和行爲兩個變數之上，然而，它的應用性只限於勞工階級中良好組織，並集中化的團體和其他零散的政次級文化團體。在動機與行爲涉入的可能關係範圍中，「不能回首點」只代表某種特定的情況，檢視這些可能的關係，對於最初人員甄用運作定義的標準選擇，能提供某些有用的指導。

諸如目的或無目的的動機具有廣泛的範疇，無數不同和可區別的目標取向，在強度上是有相當變化的，更甚者，衆人和公共取向的強度是彼此獨立的，對某一特別的論題，個人可能有特別強的感覺，但卻僅有薄弱的動機去參與集體的努力以達成。因爲參與包含了價值，當價值甚低時，較弱的個人取向就能滿足參與社區或政治事務的刺激，許多個人附帶許多不強烈的動機就能付予參與的價值，

當價值增加，不僅將是較少的個人能提供投資所須的資源（主要是時間、能力——在美國特別指選舉時動員財政資源的能力）且引導參與所須的——較強烈動機也是必要的。然而，參與集體行動的個人目標取向的強度增加時，動機的差異性將會減少。至高無上的價值（如今日的政治職位）所需的動機強度，也同樣是最高的，只有少數人才付得起較高的機會成本（價值依資源的可利用性來衡量）動機強度能達到這種放棄資源的他用性動機數目，最後將化約至少數人類的基本需要。這些需要是生存、安全、自尊（地位、威望、贊美），和自我實現（影響力、權力——在一般或特殊的生活領域），並且依 Maslow (1970) 之說，這些需要形成一個動機層級。●在行為涉入的最高層面上，在個別實例中（或在羣衆或體系間）的比較性，也同樣達到最高層面，因為動機的價值與強度是不斷的，而變化的可能性也是最低的。

● 依 Maslow 需要的層級結構之政治行為分析，Davies (1963) 和 Knutsen (1972)；Payne (1972)；Payne 和 Woshinsky (1972) 運作化動因的類似類型態度和風格之要素，在本章有關動因的討論部分提及。

在行為涉入（動機的價值、強度），（動機變化性遞減）遞增的連續體中，這兩條曲線幅度陡增的開端有二：(1) 從偶然到連續參與的路徑，(2) 從部份時間到全職涉入。在方法論的領域中，這兩個開端的可比較性會增加，也可做為人員甄用的指標。連續性的標準更進一步為威伯的理論所支持，威伯認為連續性助長權力的累積，比超越部份時間、和偶態參與的自願者，此理論付與全職涉入一個更有力的理由。另外有一外在的評價標準，來解釋從部份時間到全日涉入的路徑價值的陡增：政治行為者

非政治承諾的變化、生活形式的變遷、住所位置的變遷。

因爲最初人員甄用的定義包括官僚、行政任命，此可能爲政治的或文官的標準所領導，故限制此概念的使用於選舉的政黨或公共職位——立法、行政、司法，此舉是有用的。「全時」一詞不需解釋得太狹窄，全時的學術任命與生產線上全時的工人，兩者所指的乃完全不同的期待。在任一政治體系中，政治職位的「全時」與否完全由規則、典範和習俗所決定，其分界線在於行爲的範圍，個人不拘其收入來源而奉獻出大部份時間與努力，而在其他生活領域上，其行爲的涉入則是偶然的、邊際的。最初人員甄用的定義在人員甄用過程各階段加以運作化，對這個過程的研究中，研究者選擇了不同的觀點和分析單元，下述部份將對這些選擇的主要考慮，和其結果加以檢視。

## 觀點

所有社會行爲均包含兩個或更多角色的互動，此種互動對角色本身和相關的環境而言，均有其意欲和實際的結果。每一個角色、環境的成員有其自身利益的背景，藉此角色本人對其行動，後果加以認知、解釋。此處所提的這些永恆的解釋架構，即稱爲觀點。研究者有自己的觀點，這種既存觀點與他對分析單元的選擇，所欲分析的環境因素的決定都有密切關係，甚且它亦決定了解釋其觀察的通則化層次。在相當程度下，研究者對特殊觀點的選擇就決定其所採的研究策略。此處對人員甄用研究所採用的觀點與策略加以討論。

人員甄用過程包括：(1)一個(或一羣)可能的候選人的觀點；(2)甄用機構的觀點；(3)候選人期待

引出支持的環境觀點；(4)時間的觀點。環境可被視為包括社會、經濟、文化團體、政治的或行政的各種單元，這些要素可能部份或全部重疊，一個要素可能包括數個不同種類的單元（例如，政黨選區的選民包括不同倫理和經濟的團體）。最後，組織的要素展示了組織各層級間依賴或整合的程度（例如，地方黨部委員會，區黨部委員會和州委員會決定對初選中不同的候選人之支持）。

對於現職者或競爭者的甄用模式的研究，研究者對分析單元的選擇，亦包括其所欲研究職位的層級。不論這個決定的基礎為何，任何實證研究，包括場地研究，均受制於職位層級和研究的可接近性兩者相反的關係。職位的層級越高，研究的可接近性越低。甚且，不論是在政府或政黨，職位的分佈總是地方職位多於中央的全國的（高層級）政治的職位。研究的可接近性與職位分佈的交互影響結果，造成對高層級政治家只有少數經驗研究，但在對地方或地區候選人和官員的甄用研究，其數目卻持續增加。加上時間觀點來考慮，我們將發現對民族精英長期的研究，幾乎完全是建立在對出版的記錄和圖書館的研究上，已出版的記錄包括報紙，對研究者提供相當多的客觀指標。然而，它們對目前的或過去的候選人，在位者主觀的觀點卻只是驚鴻一瞥式的言及。在甄用相關的情境中，關於個人知覺、動機的資訊甚少或全無的情況下，即使研究範圍包括了數代或一大羣的在職者，對甄用過程的瞭解，也是微不足道的。在這些研究中所缺失的，要用對精英的社會、經濟、職業特性的長期發展分析中加以彌補，而這些特性是可以社會中非政治的次級系統之社會變遷指標來加以比較的。

關於研究者處理時間觀點的方法，個體政治的文獻展示了兩個主要的研究策略：(1)長期「回顧的預測」(long-term "retrospective prediction")即基於過去的模式來解釋，加以通則化。(2)短期的情

境分析。把政治社會化作為人員甄用的一個因素，就是第一個策略的範例。對於特定選舉的候選人提名的分析，是第二個策略的例子。

「回顧的預測」策略，論及兩個不同的理論見解。最時常面臨的見解乃是假設尋求、接受、和追求政治歷程至少部份是先前因素的結果。更特殊的是目前職位的追求或執有者展露了兒童、青年、和成年生活的經驗。此一見解也包括人格傾向途徑，因為人格的特徵和心理的需要根基於個人早期的發展時期。這些研究也結合了使用於「情境策略」的變數，諸如機會結構的要素（情境的競爭性，官位的權力潛力——僅舉此兩項為例），但爭辯的主要焦點在於過去經驗的影響與情境要素兩者間的互動。第二種「回顧的預測」理論的見解是約瑟夫·斯勒辛格（Joseph Schlesinger, 1966, 1967）所提出的「政治的野心理論」。其論點為任公職的野心激勵政治家，使他們的行為皆以獲得該職位為目的。政治家的行為是對其職位目標的反應。這研究不探究人員甄用的先決條件；為何某些人需要獲得公職是一問題，然此研究法並不嘗試回答，且斯勒辛格引為何人增加其收入的經濟理論於其心理論中。這一長期機會結構解釋的困難，在於長程目標與職歷的開始並無多大關係，然而在職歷的前進時期中，最初人員甄用的動機，可能沒有多大重要性。甚且，野心僅是一工具價值，且能充當滿足不同需要和目標的手段。

短程的情境研究，是與長程回顧預測相反的，它有利於引導更多的變數在分析中。甚且，或許一樣重要的是這種觀點，並不排除過去經驗在甄用情境中的影響。雖然它不管企求職位與現職的政治家的社會化自體的重建，它尋求流行的社會化影響的指標與在情境、職業中的人格結構的指標

(Czudnowski, 1970b; Beyme, 1971, Black, 1972)。此見解並不否認期待的社會化，例如因為對未來取向的職位尋求而塑造其目前行為；它僅接受的事實是在大部份文化中，特別是在西方某些政治文化中，社會規範並不贊成個人的政治野心，故野心並不是一個可研究的變數。因此職位層級的高低與時間觀點的選擇，對行為變數的可接近性的影響就很大。有時研究者集中於對來自某單一面向的變數來研究，例如，候選人的動機和行為。但通常他們都聯合以反證候選人行爲，甄用機構，和政治上有關的環境觀點的變數，形成一特殊模式；對於這些模式我們將仔細地加以檢查。

### 模式

不論研究者決定採取那種分析單元和觀點，他將更有效地決定少數有關的變數。在選擇這些變數時，他是受到下列假設的指導，即這些變數就能解釋所觀察的甄用過程和結果的複雜現象。在某些條件下，就是這些變數的假定解釋力使他們合成一個模式。在此處檢視的模式都是研究者對政治人員甄用所提出的主要問題。當一個模式只在一研究中使用，其研究發現將在此提出。

最簡單和最早的人員甄用模式，由賽里曼（一九六一年）所提出，他視人員甄用由下列三要素所構成：(1)候選人資格取得的審查與孔道；(2)候選資格是一兩步過程（two-step process）——發起與加強二步驟；(3)選拔一實際候選人的選擇。此一模式的妥切性並未受挑戰，它僅被擴充至包括可解釋這三時期的所有變數。有某些經驗研究，明白採用此一模式（Valen, 1966; Prewitt, 1970; Czudnowski, 1970a, 1972）。

雅各擴充賽里曼的模式，增加人格特性和與人員甄用有關的地位於其中；最初人員甄用是一個過程，在社區中有某些人格特質與具有特別社會地位的個人，經政治機構的審查，加以甄用。主要的人格特質指對聲望、權力、「成爲公眾注目之焦點」的需要。與人員甄用有關的地位，其特徵是他們扮演捐客的角色（而非其職業角色），他們傳授有關的技巧、提供聯繫、助長財政之資助，且允許利用時間去追求官職。另外一個社區因素是視政治地位的追求是值得贊美的。最後，在甄選過程中，雅各的模式區分「封閉的人員甄用」與政黨組織的強大有關，和「開放的人員甄用」，政黨的力量薄弱，對候選人選擇的控制力較小。

巴博（一九六五年）提出一個稍有不同的模式，其模式下有三面向：動機、資源和機會。它們的影響是累積的，並且彼此不能獨立運作。一個可能的候選人須被刺激去追求職位，但其動機又多所不同；其資源可能包括下列資產：有彈性的職業和作財務奉獻的能力；最後，機會包括甄用機構選拔標準的一致性和選舉結果才確定的程度。

勃朗寧（一九六八年）在人格與體系互動的模式中，對動機和機會重要變數加以詳細說明，並對此互動如何影響行爲一一說明。他並提出如何運用電腦化模擬技術來應用此模式。甄用行爲爲動機症候羣和期待所決定。期待在社會過程中獲得，並將動機導入政治舞臺，但所尋求職位的類型與政治家的行爲是由支配性動機所決定。當權力動機高而成就動機低時，其行爲是組織取向的；反之，其行爲是關心政策取向的，而當兩種動機都高，其行爲是影響政策取向的，高度的聯盟動機導致消極的行爲，且只有當地位動機高時，其行爲才是地位取向的。在勃朗寧模式中體系的機會變數包括職位的

更換率，職位與職位間的流通率，黨領袖對提名的控制程度和贏得選舉的或然率。

賽里曼最近提出的模式（一九七一年）較一九六一年論文提出的模式來得複雜。被選舉資格被界定為在機會和風險結構中的地位，而機會包括正式的規則，有效的機會和動機。有效的機會為社會地位和資源所決定，而資源包含組織的贊助，財政支援，與傳播媒介的接近性和政治計劃。此一資源的定義指出了政黨扮演的重要角色。風險是損失的代價，且它在甄用的第二階段——選拔的競爭性函數。風險也是被選舉資格的要素，因為(1)它吸引特別動機進入政治圈（而反對較穩定的職業）；(2)它同時吸引那些能承擔風險和無財可失的人；(3)當風險高時，在職者將阻止那些年青的候補者。賽里曼模式的選拔過程中，其後果由三個論題所決定：由誰選拔依何種標準（歸屬性的或依成就），透過那種機構（由委員選舉、徵召、政府機構、官僚體系、自我發起）。選拔可依其開放性加以評估；決定選拔的開放性與複雜性的變數為：政黨的競爭性、黨內中央集權的程度、選民的社會異值性、選舉過程中的階段數目。

在賽里曼較近提出的模式中，唯一最重要的改革是風險的面向（Seligman, 1967, 1971）。在政治生活中，它是一重要的面向，一個人若能衡量政治生活，職歷中的風險總數，他就能決定體系在由自由民主到極權獨裁連續體中的位置，以及政黨在體系內的位置。然而，迄今仍無一個衡量運作風險的量表曾被研究發展。

布雷克（一九七一年）曾把風險解釋為政治候選人的成本，並視其為選區（城市）大小，職位競爭性的函數。候選人的成本僅是一種投資，而風險所衡量的失去成本不但是過去投資（美眾議員放棄

其席位而競選參議員)也是失敗者未來公、私生活後果的函數。風險的測量需有一外部的變數，以作為一普通的量表，即須有一個 *numeraire*，基於此政治投資和非政治的損失能加以衡量。在這兒就引出了爭議，即達成目標的政治和私人行動間的互換性與替代率的問題。布雷克(一九七二年)正確地指出一個事實，即個人於政治的投資，只有一部份能應用至非政治的選擇上，只要個人繼續對政治職位投資，則其對非政治的淨投資是成遞減狀態的。

普瑞維特和尤勞 (Prewitt and Eulau, 1971) 提出一系絡模式，用來研究非黨員接近地方政治職位的資源和手段。他們認為甄用資源是輔助性的地方政府和公民羣衆的領導者，而主要的接近方法乃在職者的贊助和「從旁進入」(*lateral entry*)。此系絡變數為城市選舉的投票率及連任的失敗率——在職者尋求競選連任的被更換。把這兩個系絡變數兩極化，就出現了四種選民類型：(1) 嬌寵的——投票率和連任失敗率皆低；(2) 支持的——高投票率，連任失敗率低；(3) 有辨別力的——投票率低，連任失敗率高；和(4) 易變的——投票率，連任失敗率皆高。

這個由演繹法引出的選舉人系絡的類型，在區分三藩市海灣區八十七個市顧問甄用不同類型的資源和晉身路徑時，被證明是相當有用的。嬌寵的系絡顯示出對輔助的政府和公衆團體領袖的甄用，其比重是一樣的，但其選民卻較喜歡贊助的職歷，而不喜歡從旁進入者。在易變的系絡中，其贊助的職歷最低，方可選擇輔助性政府的比例為二比一，而且有百分之五十八的市顧問是從旁進入委員會的。在支持的系絡，市委員會中有百分之六十五是從旁進入的，但對甄用資源和贊助的職歷則無明顯的偏好。最後在有辨別力的系絡中，市委員會中有百分之六十三的人偏好輔助性的政府，而從旁進入者僅

占百分之三十一，贊助職歷在其中一半的市委員會中較常出現，在另半中則較少出現。

此一模式利用投票率和官職的連任失敗率為指標，衡量非黨員系絡的競爭性的非常成功。它也對社區財富與地位較高和較低社區的委員會加以區分，其中最重要的變數是現職者的資助職歷的比例，因為在一黨員系絡中，它符合了封閉或開放候選人選擇的體系，而反對開放或外部選舉。投票率似乎是一獨立函數，因為在地方委員會與社區財富相關甚高（.87, Gamma）較低（-.20 Gamma）的城市中都出現了較低的投票率。從這一研究發現所得到的理論上結論是值得深思的。連任失敗率高可能反應出這是一個爭議取向的選舉，但連任失敗率高而投票率低，則與選民的多寡和關切與否有關，但卻沒有任何指標以說明，為何這些選民被歸類為「有辨別力的」。特別是在支配性的人員甄用資源為輔助性的政府職位時亦然。而此範疇中有一半的城市是實行在職者贊助的人員甄用。此一模式理論的重要性，至於分析系絡的概念化，將精英與大眾的行為加以結合，則用這些系絡模式來分析甄用之過程。

史諾維斯（Snowiss, 1966）對芝加哥地區國會議員甄選的研究模式，集中於組織的人員甄用

有關方面上，大城市黨派之競選中，人員甄用體系基本上即為組織的體系。在此模式中有四個變數：(1)社會基礎，對政黨而言，這指初選的選民，而非一般選民；(2)資源、組織所能動員以激勵工作，吸引反對精英的一切誘因，包括物質和非物質的；(3)結構：組織層級、中央集權的領導，不受外在影響的（此與物質的誘因有關）；或較少層級結構，較易受外在影響的（此與非物質的誘因有關）；(4)組織風氣（ethos）：都市政黨組織的層級結構增進交易的政治風氣，而層級結構較少的組織增進爭議取

向、理念的風氣。在政黨能控制候選人的情況下，人員甄用乃是組織風氣的反映。當人員甄用在組織內發生，其風氣將流行於對候選人的選擇中，然而在高度競爭的情況下，政黨可能故意甄用一個不與組織分享同一風氣的候選人。

分析芝加哥的國會議員（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四年）——城市的民主黨員和市郊的共和黨人及市外的競爭區。史諾維斯展示了此一組織——情境模式的適切性，此模式將甄用機關、選區社會結構的觀點與被甄用的候選人的特性，政治風氣加以連結，其研究的某些發現可扼要加以說明。在城市中心區的民主黨員甄用是由內部和組織機器控制的；對國會議員的交易、談判、妥協能力俱加訓練；他們評價光的凝聚力，但組織並不依國家政策而為他們準備國家性的職位。甚且，市中心的民主黨員並不實踐人格政治，同時也怨恨個人知名度的宣傳。

相對地，郊區的共和黨國會議員傾向於論題取向的保守者，其技巧在於公開地鼓吹某事，他並不評價黨的凝聚力（即使他做，亦不能強制執行）。在缺乏適當的組織下，他必須從事人格政治。因為他不能對獲勝過分寄望，而郊區的民主黨員不可能遵循老路線的組織，故其甄用時常充當為年青律師職業的或政治的廣告。郊區民主黨員與共和黨員相同，較爭議取向，實踐人格政治；此乃因民主黨所能提供的物質誘因並不能投合郊區較富有的民主黨員的心意。在城市外圍區，人口的變遷創造了一個競爭的政黨體系，即使民主黨的組織成功地利用物質來吸引反對精英，其人員甄用卻與舊時老政治家的甄用大為不同，因為在一個競爭的情況下，候選人的甄選傾向於分權化，即把選擇者留給地方委員會，讓其委員去評候選人的入選。

黨控制被選舉資格與選拔在另一模式中，是一個主要變數，形成團體取向的甄用 (Czudowski, 1970a)。團體取向模式通常與名單投票法 (list voting) 和比例代表制有關。此模式論及了組織化的團體與多黨體系。決定黨对被選舉資格的控制變數：(1) 團體在黨中的位置 (是核心或邊緣團體)；(2) 政黨間對該團體票源的競爭性；(3) 政黨對該團體的價值取向。政黨對其核心團體的被選舉資格的控制較低；至於對其他團體，當政黨的理念對羣衆漠不關心時，而又不考慮政黨間的競爭性時，其控制力較高；在價值取向是積極的，而政黨間競爭甚低時，其控制力亦高。政黨對有選舉權的團體候選人的選擇控制，全視團體組織少的效能而定；團體的組織力越有效，其控制力越低。

納賽 (Knesset) 提出以色列國會議員的徵用資料，在其研究中指出，在模式變數與社會規範變遷對選舉過程的影響兩者的互動。政黨對非協會與組織較弱的團體之候選人的控制，導致了「象徵性的代表制」，其實這些被選中者乃黨中之官僚。由於職位的互換率低，協會團體總是那些在職的黨閥中尋求代表。而人員甄用在左、右兩翼的反對黨，只是一種基於理念動機的行動。甄用加強了中心政黨的實證主義和那些反對黨的教條主義。●

● 派系主義和利益團體一般在政黨結構、代表和政策投入之觀點上研究。Zaritki (1960) 比較研究派系，並指出幹部會議和支部會議政黨間派別的性質和穩定性，和在政變中社會結構和派別主義的關係。Nicholson (1972a, 1972b) 最近發展了一派別類型的類型和檢查，在印度部長會議的委員之職歷類型內，政黨派別的角色。他指出即使派系的人才徵用，也反映缺乏穩定和正式的人才徵用過程 (例如：互選)，它執行支持的動員化和地方、州和中央政府間政策產出分配之聯結適應功能。人才自由徵用的功能，並不能執行的很成功。賦予這功能主義和互選的特質而缺乏派系人才徵用的條件和標準以維持相當大穩固性。

康堡和維斯堡祿 (Kornberg and Winsborough, 1968) 建構了一個多變次的選舉間或然率模式 (multivariate inter-election probability model)，對任何兩個選舉而言，第一次選舉的甄用結果，可由下列數點來代表：(1) 地區候選人的平均地位；(2) 地區候選人地位的差異；(3) 競爭的候選人之數目，此處地位是以鄧堪地位指數表示，基於加拿大上次選舉的資料（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五年）——超過加拿大聯邦選區的百分之六十，此模式預測 (1)、(2)、(3) 的價值乃前次選舉中平均地位、地位差異、候選人數目、競爭性的函數。選舉中候選人數目的改變和個別候選人地位的改變是某些理論興趣所在的相關資料。作者證明了候選人平均地位的改變是依政黨在全國性選舉的成功與否，而非依其政黨的理念而變化。故在新民主黨與自由黨的差距為十七分；社會信託黨 (Social Credit Party) 和保守黨的差距為十二分；而自由黨與保守黨兩者之差距則僅有三·五分。

因為並非這四黨皆在所有地區競選，故每區候選人數目對第一位候選人的平均地位有相當影響；候選人數目增加，第一位候選人的平均地位則下降。最後跨越各地區、政黨、選舉，我們可看出候選人平均地位很有系統地由第一位到第四位而降低。在此研究中有些潛在的有趣因素，我們可能最想獲得的是，對健全的方法論的洞察力；及如何從長期累積的資料中如何做與理論有關的測量操作。

不管人員甄用學者所顯示出在途徑、興趣的差異，他們的研究發現似乎可用五組變數加以集結。每一組變數皆被假定在甄用過程中有重大決定性作用；或反應出此一變數在觀察實際結果時的重要性。第三部份將檢查每一組變數羣的經驗發現。

### 某些研究發現：主要的變數

在決定甄用過程開始的時間與場所，及其發展模式上，人員甄用各階段的特性並非十分有幫助。在選期的選任過程上，藉直接的觀察就可以；但政治人員甄用是一長期過程，它並非僅包括一種規定性的訓練，它可能在甄用的生活圈的任何時間中完成。在缺乏直接的證據下，我們必須依賴試驗性的理論，及此學科的鄰近領域之發現（如政治社會化研究或政黨研究），依賴政治家專業職歷的資料，或他們自己的回憶。

把人員甄用概念化爲選拔的結果是有用的。每一次的選拔消除了大部份的競爭者，而使「殘存者」進入另一選拔階段。有一理論的途徑把殘存者的或然率歸因於社會起源和人口統計特徵上的優勢：階級、地位、教育或財富。社會化理論強調早期在政治家庭中習得的政治經驗，或透過政治角色、政治事件而習得。其他人則辯稱社會起源或社會化，僅能決定其被選舉資格，但甄用過程的發展則視其在政黨活動公民組織、任命性的官職中學習，訓練成功與否，在特別職業中學得的技巧與這些職業對政府職位的接近性，被視爲被選舉資格時選拔的環結。心理學與心理分析理論認爲，缺乏強烈的動機，結構的接近性或適當的技巧，是政治中人才甄用的非充分條件。最後，選拔的標準和政治機會結構，附加爲甄用過程最後階段的要素。

適用於甄用過程的不同時期，和從不同面向引伸出的不同的變數，假設並非互相排斥。他們測度

的領域、經驗、事實所支持的程度，乃下列五個部份所要討論的主題。

### 社會背景的特性

在早期人員甄用的研究中，最早最廣泛探討的問題集中於政治家的社會起源，和人口統計學上的特性。這些研究大部份是探究性和描述性的；收集的資料類型使他們想去測度 Mosca 的統治階級理論，他把統治階級的形成，歸因於某些集團對資源和功能的獨占（如軍事技術、土地、其他財富的形成和宗教的功能）（Mosca, 1939, pp. 50-59）。把 Mosca 的理論適用到西方民主國家——其中社會層級體系不是或不能是完全僵固的，（雖然它反應地區性的變化）。但這個研究肯定了政治人才的社會結構，是不同於一般人的。此部份將檢查在此領域中的主要發現；在檢查政黨間和汎體系間的差異後，我們將對一個假設質疑，即假設社會人口統計的特性是特定的社會、政治態度之指標；而暫時不管個人行爲、互動環境中的社會、政治結構。

政治人物的事業職歷史是歷史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所採用的最主要資料。一九五二年拉斯威爾、勒納和羅哲威爾編纂十項職歷史，並加以解釋，他們認爲「選拔的特性出現的比較數次，其分佈在特定時空中的連續值是不相等的」，此乃各種政治人才結構在「方向、範圍、和變遷比率上的」指標。

從總體政治和長期的觀點而言，這是精英研究正統的出發點，因爲精英結構乃社會變遷和社會、政治權力分佈改變兩者關係的指標。精英的職歷史研究在精英的社會背景和在職者事業模型上，累積

了相當多的資料。即使是關心某些在職者或立法機關的政治家短期變換的甄用取向研究，也指出社會背景資料是他們研究甄用過程中立即可加以利用的相關資料。但這些研究者並沒有告訴我們這些資料是如何假定與甄用過程有關的；然而幾乎沒有一個研究，不提及精英的年齡、性別、種族、宗教信仰、教育、父親的職業、收入、居住城市的大小、婚姻，第一次涉入政治的年齡，及其他特性。

當馬殊 (Matthews) 在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出版人才甄用的論文時，正如其標題所指，他考慮題目的名稱爲政治決策者的社會背景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Political Decision-Makers)，三十年後，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UNESCO) 出版一卷原題爲現代國家之決策和決策者 (Decisions & Decision-Makers in the Modern State; 1967)，其中收集不同國家的立法和行政精英的社會背景和正確的資料。印度鄉村對「精英形成的研究」 (Robins, 1967) 或在沙勞越的政治人才甄用 (Glick, 1966) 是屬於同一類的，正如早期在美國對奧克拉荷馬的委員會主席的研究報告 (Patterson, 1963)，和最近在紐西蘭的議會政治之背景的研究 (Forster, 1969)。但雅各 (一九六二年) 懷疑其意義，並注意到馬殊 只是詳細描述其參議員在選舉時的年齡，但並未提示我們年齡在此有何重要性。數年後，賈諾維茲 (Janowitz) 對拉斯威爾 (1952) 精英比較研究大綱也提出相同的批評，在對納粹、蘇聯、中國精英比較研究中，他批評道：「社會剖面分析仍餘留在描述階段……，人才形成的動態學是值得我們做明確、獨立分析的。雖然，只有少數學者會對此加以否認，但卻也只有少數學者實際對此論題加以研究」(Janowitz, 1954)。

對於某些研究人才甄用的學者而言，社會背景資料的收集不僅只是爲了研究方便而已，如馬殊就

不會忘了如雅各所提的理論解釋之需要，在一九五四年發表的專論之導論中，他寫道「巧妙的社會選擇，較之初選和選舉，更易於消除大部份潛在的決策者。」馬殊注意到上層階級在政治精英中過多的代表，他強調「也許社會上的成功者有較多的機會，因為其他人都仰慕這些成功者。」在討論上層階級在甄用過程所占相對的優勢，和對成功的尊重時，馬殊不僅對美國層級化系統加以評論，並明白地否認統治階級的存在——馬克斯理論和密爾斯在「權力精英」中所作的主張。隱含在「尊敬成功」論證背後的，乃是承認社會的成功，特別是經濟上的成功，是獨立於政治權力之外的，而且政治機會結構，並不阻止不同價值範疇中成就的轉換 (Prewitt, 1965, p. 98)。

社會人口統計的背景資料，常被用來比較競爭的精英，或用來比較官職尋求者與其他在政治中積極活躍的階層、大眾的差異。某些美國的研究中顯示，在民主黨與共和黨領袖之間只有極少的社會差異。對一八一位愛荷華州的立法者，四八四位「關切的選舉人」（即活躍的階層），九十九位遊說人員和九十位政黨的郡級主席泛層級研究 (Patterson 和 Boynton, 1969) 顯示在這些精英的職業、教育、收入、居住城市的大小間，並無明顯差異；但在精英與選民之間則有實質的差異。所有三個政黨（民主黨、共和黨、自由黨）在曼哈坦區的委員間，在社會經濟的特點上，並沒顯出重大的不同，除了民主黨中民族和宗教成份、自由黨中出現較高比例的第三代美國人、猶太人和專業人員 (Hirschfield, Swanson, and Blank, 1962)。但亞爾佐夫 (Althoff) 和派特生 (Patterson) 兩人對伊利諾州鄉村民主黨、共和黨選民委員會的委員社會特徵研究中，俱未發現明顯的差異。

其他的研究，則發現在政黨領袖，活躍者間有顯著的差異。馬維克和尼克森 (Marvick and

Nixon, 1961) 對一九五六年選舉洛杉磯地區民主黨、共和黨的自願助選員加以比較，他們發現雖然兩黨皆自中產階級甄用人員，但共和黨助選員的年齡較大，收入較高，較有聲譽的宗教關係，較有聲望的職業，較完全的教育，在社區中社會基礎較穩固。他們認為在洛杉磯的政治並非與政治競爭相關，上述的差異即為明證。同樣的，在 Pomper (1965) 擁有的新澤西州的郡委員會主席的資料中，只有社會特性與政黨親和之間有顯著的關係存在。Eldersveld, (1964) 對底特律的政黨之地區執行委員會和選區領導者加以研究——在底特律工會委員會執行民主黨的選區工作，而管理階層則走共和黨路線 (Greenstein, 1970a, p. 83)——顯示出兩黨在收入、教育、職業上要比在洛杉磯和曼哈坦的黨工人員的差異為大。加上階層化面向的分析結果，Eldersveld 發現，兩黨低階層人員在經濟地位上的分佈較廣泛，但在共和黨後備人員上，則顯示出與上層領導者的種族、宗教和職業相反的結構；換言之，民主黨層級體系之向上流動較之共和黨更易與社會結構整合在一起 (Eldersveld, 1964)。

當各國移民為不同政黨所整合時，政黨間區委員會在種族結構的差異曾加以觀察，例如康威爾指出在羅德島民主黨受到愛爾蘭移民的控制後，共和黨的「洋基」領導人則尋求義大利移民的支持，而義大利移民則逐漸成為共和黨的支配團體 (Cornwell, 1960; Greenstein, 1970a, p. 60)。

政黨領導是否更能代表其選民或其追隨者呢？上層領導是否比下層人員更能代表其主要支持團體呢？有人可能假設在整體層面上黨工人員較接近初選區選民的社會結構，而公職人員或候選人則不一定要從與政黨最有關聯的社會階層中加以甄用。下列兩個變數較之其他變數更能決定候選人背景的面圖。

選舉人制 在單數選區中，候選人的成功必須訴諸於多數選民，而不管其選民的社會結構；但在多數選區中，政黨的候選人表示要能反應選區中多數的社會團體之需要。

政黨的相對力量 多數黨將較少關心社會人口統計的代表性問題；而少數黨可能嘗試維持其在主要支持的羣衆中的力量。

因而，在相同的環境中，典型的或非典型的候選人提名決定，在政黨中的變化可能是相當大的。瓦倫 (Valen, 1966) 在對挪威南方地區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在非社會黨的階層中移動愈高，各政黨的社會特性愈不同，……然而，在勞工黨中其模式則與此不同，人力工人在政黨領導階層中所佔的比例，較之普通選民和政黨的認同者爲小。」

在某些情境中，政黨精英間或許在某些面向上有所差異，但在其他環境中，此種差異則不一定出現。例如，對麻州和北卡羅萊納州地方黨工人員的比較研究中，顯示出在北卡羅萊納州，政黨黨工人員的職業地位並無差異，但在麻州則有顯著差異，民主黨只有百分之五十是白領階級，而共和黨則有百分之八十七是白領階級。這種差異或許可以加以解釋爲：在麻州這個高度都市化城市中，兩黨制體系其尋求支持的對象是各種特性不同的團體；而在北卡羅萊納州，一個都市化較低，經濟較未發展的地區，修正的一黨制所尋求支持的對象與麻州有所不同，是較同質性的 (Bowman & Boynton, 1966)。

在美國各階層政府中較持續的發現之一，是只有少數比例的政治家具工人階級的背景，而且他們幾乎全是民主黨員 (參議員部份見 Mathews, 1960；政黨全國委員會，見 Cotter & Hennessey,

1964; Epstein, 1967; 州立法者, 見 Zeller, 1954; Key, 1956; Epstein, 1958; Sorauf, 1963; Dye, 1965), 但是政黨間不同的程度是依系絡而異的。

從美國政黨領袖的描述中, 可作一結論; 在民主黨和共和黨領袖間, 在社經特質上似乎沒有太尖銳的差異。大部份觀察到的差異都可解釋為地區工業化程度不同, 政黨競爭性程度的後果, 故沒有尖銳差異是不足為奇的。社會流動率高, 工業化擴展、交通、通訊的改進, 人口的迅速轉變, 大眾消費取向的工業發展都有助於社會分化的消除。繼續存在的差異, 諸如貧窮、財富集中, 少數種族的缺乏整合, 這些因素似乎並不足以使黨候選人間產生社會兩極化的現象。假如這些社會人口統計背景, 與社會化過程的社會人口統計背景相同, 那我們可以想見政治領袖在態度上不會有太大的不同。然而麥克勞斯基、霍夫曼和奧哈拉 (McClosky, Hoffmann, and O'Hara, 1960) 發現, 兩黨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 在所有的議題如公共所有權、經濟規章、平等主義、社會福利、賦稅政策、對外政策上都有相當的歧見。

從這些發現推論社會人口統計因素, 在態度形式上有其有限的影響, 這種推論有冒生態學上錯誤的危險。如從集體資料推論個別層面關係的錯誤, 我們應該就下述問題加以質疑, 即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 不同的社會化經驗之下, 為何個人客觀的地位、收入、職位被視為與相同的態度 (主觀的評價、情感取向) 有關。

從其他政治體系中得到的證據, 更進一步說明此論題, 在一些階層化較僵固的國家, 諸如英、德、法或義大利, 各政黨國會議員的社會特性上有顯著差異, 依德國聯邦統計局的報告 (一九七〇

年），第六屆德國聯邦下院中，社會民主黨（SPD）與自由黨（FDP）的聯合政府中，其行政人員之代表議員數目較之基尼黨（CDU）多二倍，而勞工代表則多三倍；但在基尼黨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農民代表，百分之三十三的商人代表（Beyme, 1971）。在法國第四共和（一九四五年—一九五八年）議員中，具商業背景的議員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代表為天主教黨（MRP）和 Poujadist 運動的成員，而六十六位教師代表中，有六十一位是共產黨、社會主義黨的成員；一三三位工人代表中，則有一〇位隸屬上述兩黨（Dogan, 1961）。藍奈（Raney, 1965）對英國衆院議員候選人的研究中，計算保守黨、勞工黨各行業的非連任者候選人，在各選舉區的獲勝率；勞工黨中最有利的五種行業為：政治組織者、工會官員、有照的會計師、人力工人、記者和政治評論家；而在保守黨中則為農人、公務員、富有的私人、政治組織者、記者和評論家。需加注意的是，保守黨記者獲勝率是勞工黨的記者的兩倍。

這些發現提示我們，在階層化體系較僵固的國家，其職業的範疇與政治態度、政黨認同比美國要有較強烈的關聯。甚且，不管政黨或社會文化的分歧或重疊，他們都是社會特性與政治甄用關係的主要決定因素。最後，重實際的政黨，其甄用來源可能有所不同，而重教條理念的政黨在選取其核心分子時的立場總是較僵化。由此可知，社會生態與政治的環境可能改變個人社會關係與政治甄用中的誘因和機會結構。

，與甄用過程有密切關係但又較少為人研究的，是社會背景在政治職歷的選擇中所扮演的角色。社會背景是如何影響不同職歷的選擇，不能利用不同政黨領袖，活躍者的比較來評估，也不能由政治家

與一般大眾的比較而得知。只能從其他的社會精英中抽取樣本作為控制組，來與政治精英比較；來探尋是否某些社會人口統計的特徵較有利於政治事業，而較不利於從商、軍事，或其他的專業事業。即使此舉有其限制、不周延，但就已有的證據來看，政治家與其他社會精英兩者，在社會背景的剖面圖上並無太大的不同。

亥克 (Hacker, 1961) 研究一百位美國參議員和一百位美國最大工業公司的董事長，來探討這些差異，並闡明了一個在政治甄用研究中未加討論過的面向。此一面向——家鄉的大小和地理上的流動性——區分早期與成年的社會化變化繼而比較大都市取向的業餘政治家與社區取向，以社區為基礎的職業創事業前的職歷的流動性政治家兩者的差別，亥克證明了就民族、地域起源或教育而言，參議員、董事長間並無顯著差異。然而董事長中百分之五十二位的家鄉是大都會中心區；而參議員中百分之六十一的人是小城市農村出身，甚且，百分之七十一的參議員其目前住所仍在故鄉或不超出一百哩；而百分之三十六的董事長其住所則離家鄉遠達五百哩以上，另有百分之三十四的董事長其住宅距家鄉在一百到五百哩之間。最後，典型的參議員選區與董事長全國性的供應者、顧客、工會等「選區」相較之下，其範圍就顯得比較小。有人或許會把這些發現解釋為，參議員得到實質上廣泛而地域上較為狹隘的觀點，而未來的董事長，由於早年社會化的環境是一變化甚大的大都會文化，成人時的社會化則形成實質上較狹隘而在地域上卻有一幅度甚廣的觀點。

在美國某些州立法者和市委員的研究中 (Patterson, and Boynton, 1969; Boynton, Patterson, and Hedlund, 1969; Prewitt, 1970)，顯示任公職者在教育和職業地位上與一般民衆有相當的差異，

但他們與「活躍的階層」和「關注的選民」之間，並無明顯的差異。④

④ 在愛奧華州立法者的研究上，Boynton, Patterson 和 Hedlund 在在位者中過度代表的職業範疇是農人，但這些立法者實際上僅有少數居住在農村。

因而，在某些體系中，政治人才的社會特性，並非預測政治甄用的政黨認知、政治態度的一個很好的指標；然而，在其他的體系中，它們就與政治特性有密切的關係。社會流動率，階層化體系橫切面的差異，都不是政治家社會起源的可靠指標。馬殊（一九五四年）二十世紀對英、美的領導人才甄用加以評論時，他觀察到「兩個社會越平等，較低階層進入決策者中的人數與較僵固、階級限制嚴的國家（英）要少。」艾普斯坦扼要說明了階級取向、階級決定的西方民主國家之人才甄用的證據，他認為社會主義勞工政黨的存在，是西歐對美國政黨體制最重要的差別，他強調「在某些社會中，一個勞工階級的政黨，或許是需要的（但在其他社會則無此需要），使其領導者有一出路。但這種社會在較少階層化的社會中，或許是全然無關緊要的。」

此論證反應出許多美國觀察家所分享的觀點，如康貝爾等人（一九六〇年，頁三四七）對美國投票行為加以分析，他們的結論是「社會階級在政治行為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被動的，並且視當時地位極化（status polarization）的程度而定。甚且，在美國地位極化的可能性甚低，因為美國人口是沿著整個地位等級的連續值分佈的，在其中並有許多中間等級透過等級間的互動和接近性，促使人們對地位有一錯誤的認同。」此處所討論艾普斯坦論點的適切性有二：

一、精英的社會與人口統計學上的特性，可以是機會的指標。當然，其假設是一個人可以證明，在甄用過程中某些社會屬性，與較好的機會是有關係的，而不是從被甄用的精英之社會特性來推論其機會。

二、某些在一定環境中機會的適切指標，在另一個環境中不一定是適切的。不僅是體系間有其自身的社會或文化差異模式，就是在次級系統中亦同；這些差異是否轉變成政治衝突，或在這些差異中的那種差異，被何種團體轉變或政治衝突，這種轉變是隨系絡而異的。

例如，社會特性對不同的系絡而言，是沒有相同的意義的，因為在一定地區中（不論是收入、教育、種族起源、或職業）決定該範疇社會或政治意義的，乃是各種範疇的分佈情形。社會行爲，包括政治精英的行爲，其意義來自於行爲者與環境的互動，而政治行爲的目的，在使環境發生某種變遷——包括行爲者的地位。

林芝 (Linz) 在其對西班牙地區差異的研究中 (Linz & Miguel, 1966; Linz, 1969) 曾提供了一個極好的證明，即系絡是社會人。統計學的特性，與信念間的一個主要的中介變數。分析不同的職業團體現代化的信念，並控制環境之經濟發展層面（地方上每人的收入）他發現，在中、高收入的地區，同比例的農人與白領階級的工人，深信在生活中驟然的成功乃因幸運，然而在低收入地區，指同樣信念的農人的比例是白領階級工人的三倍。同樣的，高收入地區深信成功乃基於「努力」、「智慧」的農人比例是低收入地區的兩倍，但白領階級工人在這方面則無顯著的差異。某些職業團體主觀的階級認同，在高低收入地區間有很大的變化，但對另一些團體而言，則無此種變化 (Linz, 1969, p.

116)。

艾丁格和西林 (Edinger and Searing, 1967) 在比較法、德社會和政治領袖後，亦作了同樣的結論，他們嘗試找出預測領袖政治態度的最佳社會背景變數，研究結果發現民族性是最好的預測器，故他們將其抽樣劃分為兩個同質性的團體。在德國，社會背景的變數變成比民族抽樣更好的次級抽樣的態度預測器，然而在法國，社會背景的變數與次級抽樣較無關聯。故當我們就國家抽樣與次級抽樣一併考慮時不僅社會特性與態度的關聯會有所變化——此一發現指出，在一體系中亦需系絡的解釋——而且在作體系間接切面比較時，兩者關聯的力量是呈消長的狀態。西林 (一九六九年) 重新再對五個國家作同樣的研究 (增加美、委內瑞拉、以色列)，他的發現再度肯定了這種關係，即體系間背景變數與態度的關係，其關聯的程度是有所變化的。

在此處對這些研究討論的結果，導致了下列的結論：在集體的層面上，政治精英的社會人口統計特性，與一般羣衆有很大的差異，但在不同的精英間，相同的精英團體中就不盡然如此。甄用研究的興趣不在於發現一般的、非系絡解釋的社會背景指標。社會地位系絡解釋的指標之概念化工作，在於描述個人對客觀環境所存的主觀觀點。這種描述可以依拓撲學的語言 (Scheuch, 1969) 加以運作化，並且用來作跨系絡和超體系的比較研究。

### 政治社會化和人才甄用

到目前為止，對人才甄用的「社會背景研究法」之批評，主要是方法論上的，但即使是一健全的

方法論，仍無法替代理論。這種對背景資料盲目收集的論辯，對於指出某些區分標準——理論假設的需要，是無多大助益的。政治社會化的研究，的確提供了一個選擇性利用背景資料的理論基礎，某些作者視社會範疇為「與精英態度有關的社會化經驗的分類……，但社會範疇本身並不重要。」（Searing, 1969），故甚致年齡也可以是一個與社會化有關聯的指標：一個在童年期即遭遇二十年代末期三十年代初期經濟大蕭條，其對經濟、政治、社會秩序的認知，與一個在青年期或成年人，早期才遇到這種大蕭條的人，會有很大的不同。當然，我們在此並不注意社會化的理論的探討，社會化將在本叢書中另闢專章加以討論，其中關涉的問題是：政治候選人和官職持有者——被甄用的政治家——是否真的展示了一個社會化模式，以區分他們與羣衆和其他精英的不同？他們的社會化經驗足以說明其政治職歷即政治事件，政治影響力的選擇，而這些經驗對百分之九五至九八的羣衆而言是很少或全然沒有經歷過的？或許他們分享一較廣泛階層社會化的經驗，僅預先使他們傾向於政治活動，而只有那些稍後受到較直接的刺激，才會發現是處於一與甄用相關的環境中——對公職或黨職的追求。

即使接近最初連續或全天候政治職位路徑變化，僅少數候選人無以前的政治或政府之經驗（除了在革命的人才甄用）典型的候選人，是徵自如 Prewitt 所稱的「學徒地位」，於此地位中，他展示自己的能力和價取向。政治社會化被視為是由「先學徒時期」組成，學徒分享極廣泛政治活動的階層、和較後時期類似中世紀基爾特（guild）的學徒地位，其中潛在候選人較接近決策中心，學習新的技能、社會化正式或非正式結構，或社會化政府和政治特殊領域的政治文化中。在此二時期有相當

的差異：不僅後者較進展，且它也被角色結構的制度化 and 較明確的標準來評價其績效。社會化人才甄用取向的研究，幾乎全限於早期，無結構時期。下列對主要探討取向和研究發現的討論，將證明先學徒時期社會化的非結構特性——類型的分歧，導致減低了先成人時期社會化的解釋潛力。

### 家庭

社會化是一連續性過程，包括「生活圈的每一時期所有的政治學習——正式和非正式、精心構思和非計劃的」(Greenstein, 1968)；文化人類學家和心理學家辯稱，早期社會化是比後期學習經驗更基本，且較能抗拒變遷 (LeVin, 1963; Erikson, 1950; Pye, 1961)。早期和成人社會化的區分擴大了人才甄用的社會化取向之研究，而其區分的假設和事實，乃生活圈中的各階段有其特別的社會化機構，和影響力來源在其中運作。

所有在孩童和青少年早期中運作的社會化機構裏面，家庭是最重要的。除了政黨認同的傳承外 (Hyman, 1959; Greenstein, 1969)，有關家庭角色的兩類證據已提出：(1) 在少數政治家庭中，政治職位的累聚；(2) 政治上活躍的父親，在社會化上的影響。此二類型的證據是推論的，除了有政治傳記，對家庭在甄用中所扮演的角色曾加以記載。然而這些少數有用的傳記，只記載某些傳出的領導者事蹟，故無所提供充分的基礎，作廣泛的通則化研究。

政治家庭 對於在十八、十九世紀英國政治職位世襲移轉的證據 (關於 Derbys, Salisburys and Devonshires 政治職位移轉的重新建構，請參閱 Gutsman, 1963)，基於在貴族間的通婚，和藉婚姻

之非貴族的選舉。在歐美，血統關係而非繼承關係是接近公職路徑的標準。海斯(Hess, 1966)描述十六個美國政治家庭王朝，其中出了八位總統、三位副總統，三十位參議員，十二位州長，五十六位眾議員和九位閣員。更甚者，有七百個家庭中有二位或更多人員在國會中服務，占國會議員中(自一七七四年起)的百分之十七。在八十五位回答克祿鮑、維倫斯基和伯杭(Clubok, Wilensky, and Berghorn, 1963)編纂之問卷的國會議員中，百分之五十四有親戚任選舉官職；在地方政府層級的親戚占百分之二十六；百分之六在州政府層級；在州及地方均有親戚者占百分之十七·五，在國會中的占百分之六。

在美國國會血統關係比例的年代和地域分析，克祿鮑和他的同僚也顯示高度的血統關係比例，被界定為國會議員，有兒子、孫子、姪兒、兄弟和親堂(表)兄妹，在南部諸州比較流行，而東部諸州也大體如此；中西部和西部則顯出較低比例。更甚者，國會過去一般比例穩定，從第一到第五屆國會達百分之二十到四十的高比例，自二十六到三十屆國會的百分之十六到二十，百分之八到五十一在十五屆國會，百分之五到六·八在八十一到八十六屆國會。

家庭人才徵用可能不是一無次元的情境，在近代的早期，家庭的角色較擴散，政治功能較少區分化，政治人才較偏向社會性狹隘界定的階層。克祿鮑和他的同僚考慮在國會家庭人才徵用的降低，為社會動員的附隨物和政治現代化相關。他們也顯示血統關係的人才徵用之降低，並非人口成長的結果，政治變遷的比例大抵同於社會變遷的比例(人口統計學和教育)。但落後於技術變遷和溝通體系的发展，在當代民主政治，家庭人才徵用的相關性可能較接近(Prewitt, 1965)「感光過度」的假設。

在家庭中時常密集地暴露於爭論和人物研究中——透過政治上的親戚，或早在選戰中家庭參與的早期觀察——可創造政治職歷的有利印象和密切熟悉政治的某些方面，和熟悉地方或地域的優秀公共人物，可產生對政治職歷的興趣和對此努力成功的希望。

政治上活躍的雙親 家庭雙親或其中之一在政治上活躍，提供家庭社會化的類型。其中「起初對政治過度感光」時常發生，易言之：多數和較有利於政治活動的開端得以傳遞，即使許多研究者提供證據或理論辨證，強調成人社會化的角色 (Edinger, and Searing, 1967; Hacker, 1976; Prewitt, Eulau and Zisk, 1966-67; Kornborg, and Thomas, 1965; Patterson, and Boynton, 1969)。這些作者中某些和許多其他的人，也報告在政治上活躍的家庭時常在回答中提到。只要不詳知有多少接受類似的政治信號的「異常藥劑」而不被拉進政治中去，那末，普瑞維特 (1965) 就正當地懷疑是從這些報告中作出有效的結論了；然而，有一個人研究提供美國公民政治活動之估計；在一般成人中，一個公民中有一人是在大選中積極參與活動的 (Woodward and Roper, 1950)，馬里克和尼克森 (一九六一年) 發現，在洛杉磯兩黨的選舉工作者中，幾乎有百分之四十，父母中至少有一為政治活躍者。利用上述的估計可以結論：選戰工作者的家庭是來自相當政治化的家庭，他們提供「政治化家庭為維持自願性政黨機構的核心，且維持能力和技術、經驗和信念的連續性」。

就政治上活躍的商人和非政治家團體，加以比較布朗寧 (一九六八年) 報告，政治家中有半的父親在政治上是活躍的，而非政治家則無。布朗寧深信——明示的成就和權力能夠聯結，努力達成許多其他生活領域的成功。活躍的政治家引出他們最初政治活動和競爭具有相當高權位和成就機會的職

位，而整代在不同競爭上的尋求成功，可從他們的父親政治活動之最先的社會化而解釋之。即使觀察的案例，對統計顯著程度的測度太小是百分之五十比零的比例，的確表示雙親社會化的影響。

政治家時常來自政治活躍的家庭之證據，對於在官職結構中不同水平的政黨和公職持有者是有用的。在兩個加拿大和美國城市研究政黨活動者，康恩堡、史密斯和布魯姆萊（一九六九年）已調查過雙親的政治活動在許多人才甄用相關之行爲指標上的效果。因此，雙親的活動在完成教育和首度從事黨工作所經過之時間幾乎有兩年的差異，在首度從事黨工作的年齡上，美國有兩年半的差異，加拿大有兩年十個月的差異，在繼續爲黨工作上，則幾乎有一年半的差異。這些差異都指向期待的方向。這是統計上意義。不過，推論雙親的行爲可以產生某些早期涉入。雙親行爲的最大影響，是在首度政黨認同的年齡，在雙親行爲的所有結果皆探討後，吾人仍須說明百分之三十五的美國和百分之六十五的加拿大黨務工作，卻沒有在政治上活躍的父親。

在北加羅萊納和麻薩諸塞州，依鮑曼和波恩頓報告，地方政黨官員家庭的政治活動比西雅圖和尼亞波里斯的政黨工作者較少出現。這些政黨工作者，康恩堡和他的同僚會比較加拿大的政黨官員，他分別從在麻州的百分之二十八共和黨員到北加羅萊納州的百分之四十九之民主黨員，對於在聖路易的民主黨工作人員，其比例是三分之一（Salisbury, 1965-66）。在市委員會，舊金山灣，僅百分之十四的委員提到政治家庭爲其成人前政治社會化的來源。但另外百分之二十八提到家庭和學校，事件和政大人格（Prewitt, 1970），附於這些委員會非黨派的選舉，雙親社會化的影響顯然相當高。在四個州的州立法者，據報告有一個或更多親戚在政治中的百分比，從紐澤西州的百分四十一到俄亥俄州

和田納西州的百分之五十九 (Eulau, 等人, 一九五九年)。

在歐洲的社會主義政黨，與工會運動部份重疊的政治活躍家庭，是當今政治領袖大部份人生中最主要的社會化因素。然而在制度化青年人的社會化勞工運動，年青人的組織成爲領導者人才徵用的單一最重要來源 (Beyme, 1971)，這也應用到以色列勞工黨第一代和第二代領袖的人才徵用。(論及以色列青年運動者，Eisenstadt, 1967，論及徵用青年運動者，Laquer, 1962，論及跨越年齡羣組織的功能，Zisenstadt, 1956)。

成年前和成人的社會化

政治社會最重要來源，政治化的家庭環境不須到政治職歷的起源；某些研究者問他們的被詢問者，他們最初有志於政治的來源，在檢查這些發現上，人們應該記得其不可能已經清楚，不論問題推及對政治之興趣，或將爲對政治活動之興趣。

康恩堡、史密斯和布魯姆萊 (一九六九年) 指出興趣爲政治社會化的三個時期，興趣和認同知悉之一。他們斷定興趣主要依賴知悉和認同。但這似乎在所有的案例上並不以此爲結果。研究黨的活動者發現在美國的案例有相當的數目，認同先於知悉和興趣，且參與政黨工作的時期愈落後，興趣愈落於知悉和認同之後。

在美國有四個州的州立法者的資料顯示，在政治活躍家庭和家庭爲最初興趣的來源是很清楚的證明 (Eulau et al, 1959) 指出，家庭是最初興趣的反應顯示頻率低於一位或以上的親戚在政治中爲立

法者。這種比率在加州是三十比四十三，新澤西州三十四比四十一，在俄亥俄州為三十九比五十九，在田納西州為三十五比五十九。家庭的影響仍相當大，但不如從同樣背景資料的推論之結論那麼強。在校園政治中參與的頻率和政治之研究，正如最初的興趣資源。在田納西州的百分之八十，到加州的百分之三之間。在百分之四十三和百分之七十的州立法者之間，報告稱政治活動之參與者作為最初興趣的來源，本範圍所引之某些反應，指出反應者興趣在政治職歷而非興趣於政治。

在底特律僅百分之二十的共和黨和百分之十五的民主黨選區領袖，而聖路易的市黨部組織委員，則有百分之四十解釋他們最初的興趣是受家庭影響 (Eldersveld, 1964; Salisbury, 1965-66)。更有趣的，在聖路易四十五歲年齡者中，由家庭影響的案例之比例是二十一歲到三十歲的兩倍，而由家庭影響行動者相當均勻。目前的年齡、社區大小、都市化和黨組織的型態對於那些提及的家庭——即成年前的社會化之頻率是有影響的。藉區分在成年前和成年環境以及政治興趣之來源的簡化分析，假定家庭在未成年社會化形成一支配的角色是很有用的。此種簡明化即因官職持有者到達成年前，首度在政治上有興趣之比例公正地橫切職位水平之發現而有了進一步的保障。對州立法者，未成年與成年社會化的比例近於六十比四十；對市委員，則是五十五比四十五，尤又進者，在立法者的類型間沒有黨內的不同差異 (Prewitt, Enlau, and Zisk, 1966-67)。

最近的研究更指出成人在形成政治家態度和行為典型中的成人經驗中心。康恩堡、史密斯和布魯姆萊 (一九六九年) 研究兩個美國城市和兩個加拿大城市的一、二五七名黨的積極活動者，提出報告說有百分之三十二的美國人和百分之四十的加拿大人，有一次以上改變其對黨的認同。在加拿大對於首

次或第二次改變認同的平均年齡分別是二一·九和二六·八；而在美國是二十歲和二十四·七歲。第二次改變最常提出的理由是公開人物（百分之四十一至四十四）和公開事件百分之三十二至三十八的影響。第三次改變有百分之四十八至五十五的回答者提到公開人物。這些積極活動者與人口橫切面抽樣的比較。作者發現有百分之二十四的美國人，而加拿大的選民有百分之五十一報告會改變其政黨認同；美國的積極活動者較常改變其政黨認同，而加拿大比起不積極活動者的共同公民較少改變。但證據是很明顯的，較年青的成年人處在一定生命的時期，其中有三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受研究者主要政治取向曾經改變。這並不意味政黨認同的改變是聯結政黨工作的最初參與。康恩堡等僅報告百分之五十的加拿大和百分之六十一的美國政黨活動者為較遲的開始者，例如開始其政黨活動在二十六歲以後。此例說明了探究成人和成人前期社會化的正確性。

⑤ 這些數字指那些改變政黨認同兩次的人士。第一次和唯一改變的低年齡，在加拿大為二十五歲，美國為二十三歲半。

康恩堡和湯瑪斯（一九六五年）曾使用三分法的分類——兒童、青年和成人期，來比較美國和加拿大的州立法者和國會議員，展示在生命週期中每一時期不僅聯結不同時期的社會化，且在行為者和環境中有不同的關係。在兒童時期，政治興趣是出自家庭的影響；在青年期的初期，興趣是聯結自我的涉入（involvement）；而成人的社會化是由特別的政治事件、環境和論題所引起。比較橫剖面的國家立法者職位（對聯結美、加的國家議員羣體）顯出在青年期範疇和兒童社會比較時常的案例。然而

主要不同是加拿大的立法者，對於美國立法者，具相當高的兒童社會化的頻率。美國的國家立法者並不為一代表例（它僅包含「上層……委員會主席和列出的少數委員」），而這個數目是頗小的（三七）；然而它注意的興趣是這些上層領袖，其成人社會化的頻率比在州議員要低。較後的社會化也暗含較遲；但到資深的路徑和其他國會領導地位比其導至州立法者要來得久些。故有人或會推論對某些「遲來者」被選為州立法者為易或為難；猶如同對另外一組「後來者」到達國會領導地位者然。換言之，這些個人可能構成兩組不同的官職尋求者。

年青人和成年人接受和反應不同的政治訊息，和他們的政治認知以及對政治事務的動機，將依之而變化。個人的態度（*Predispositions*）和政治事件在最初的政治社會化是兩個最時常提出的因素。而非家庭的影響和學校或學院在政治上有關的經驗。然而，成人前和成人的社會事件和性格（*disposition character*）有明顯的區分化。州立法者和市委員會委員在成人前之社會化是以總統、州長、和參議員的選舉為最初興趣的來源。在成人生活中政治社會化常被「遲來者」提到的政治或經濟危機和地方性論題。至於個人對政治家的贊美和對政治權力的野心，是較聯接於未成人的社會化。然而職責感和義憤感是成人社會化的特性（*prewit, Zulan and Zisk, 1966-67*）。

國家立法者的早期成人前社會化，時常顯示發生在較高職業地位的家庭，然而較低地位的家庭幾乎排除於成人社會化的聯結之外。農人比任何其他羣眾較常是青年期社會化的自我發起者（*Kornberg and Thomas, 1965*），美國州立法者的分類資料，依徵選前之職業流動，也展示出向上的移動，例如選舉較低地位家庭起源者開始涉入政治，要比較後的生活者的地位堅固（*Eulan, and Koff, 1962*）。

一九六八年民主黨黨員代表大會的代表研究索爾和克拉基 (Soule and Clarke, 1970) 發現成人前的家庭社會化，專職者比業餘者要較具特性 (使用 Wilson 在二者間之區分指標)，業餘者較常被成人之同儕團體和社會政治事件社會化政治。即使這些發現的意義並不高 (P. 20)；他們則受到來自政治上不活動家庭的三分之二業餘者，而非二分之一的專業者此一事實的支持，作者提供公認的純理論解釋認為，專職者的早期社會化，主要聚集在政黨認同和忠誠上，因此專職者在政黨中受到信任，其取向導致了較實證的研究。

因為利用哲學原則作政治判斷是與年齡俱增的 (Adelson and O'neil, 1966)，業餘的理想主義者能用理念性來關心事實，而非更直接的家庭社會化導入政黨政治。業餘者清晰的抽象合理化，可能是其達成智識上成熟之政治社會化的功能。對於此種假設的證據可能從麻州、北卡羅萊納州、奧勒岡州和猶他州 (Zeigler and Baer, 1968) 立法者和遊說人員的人才徵用之研究比較上發現。因為遊說人員是問題取向的，並不扮演理念的政治取向角色。某人期待立法者顯示早期政治興趣，而更快速政治之互換，將比在成人期中政治化的人與遊說人員有較高的互動比率。此種假設在奧勒岡州和猶他州有相當合理支持的資料。

在非政黨環境上的政治社會化和人才甄選

政治人才甄選的大部份研究並不管試回答的問題之一，是可觀察的社會化僅是政治人才的特性程度。在政治家庭中成長的兒童尋求政治職歷的比例是多少呢？通常假定有許多因戲劇性的政治事件

或社會化所影響，但僅有少部份的人在政治上求發展，然後將這些事件的政治職歷歸屬於興趣。社會化創造了性格和期待，但何者是甄用之變數。普瑞維特在舊金山灣的八十七個城市之四百三十五位市委員的職歷作了廣泛研究後，指出市政府並非政黨環境，社會化並非人才甄用有關的變數 (Prewitt, 1970)。

普瑞維特「適任者」研究的是居於支配地位的社會階層人員；政治的實際階層就從中「出現」。「學徒」和一些「甄選人員」就是從此後一階層選出來的，社會適任者佔該社區依據教育和收入上層人口的五分之二；政治活躍者至多是全人口的十分之一。關於到達活動階層的路徑，普瑞維特在其主動角色為先前的政治涉入和興趣的延續（市委員的百分之五十）之政治社會化者，和由政治活動先於接近公共職務的政治上動員者組成之「突然進入者」階層（百分之三十八），以及直接因徵召而擠身公共職務後來進入者（百分之十二）之間作區分。

社會化的經驗，在早已提出報告：政治家庭、學校經驗和戲劇化的政治事件。隨著學校愈來愈有政治意識，在四十歲以下的市委員時常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人提到其進入政治活動階層的學校經驗間的相關性，比那些已超五十五歲者的百分之三十五為多。大約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政治社會化也提出政治理念性的吸引。但在注意他們社會化的細節之前，無人才甄用的類型可供辨識，普瑞維特引出有力的結論說個人生活經驗上的意外，決定其加入活動的階層，這些意外者並非平均地分散於社會上是真的；有些則偏向於有利社會之適合者，然而，在大部份適任者中，有少數政治活動者到達活動階層是偶然發生的事件之結果。

政治社會化在「導致活動階層中」出現剩餘的範疇，包含個人的種種經驗並不適任人才甄用類型。在此一特殊研究中，有百分之五十的市委員屬於剩餘範疇的。更且，在活動的階層，發現政治社會化者具公民和政黨雙重角色。<sup>⑥</sup>最後，政治社會化者陳示幾乎類似於政治動員者的最初活動；僅在「一般興趣」的範疇，他們多少顯得多一點。

⑥ 在無黨派選舉中選出之委員的整體中，「政治社會化」說明委員百分之八的少數中之百分之八十五從政黨角色中引入實際的階層。

在政黨的系絡中，自認知圖式心理上依戀到政治取向目標，可能是杜撰的架構，並無證據指出，紛雜的社會化經驗受到相當的縮減。畢竟，就相同的人口和精英來說，沒有黨性的市政府與有黨性的州和聯邦政府共存。成人前政治社會化的研究，就態度形成和羣衆行為理論來說，也較較其精英甄用理論之相關性尤有過之。人才甄用因成人經驗和情況變項的決定，較之因早期獲得對政治的一般傾向似乎尤為嚴格（就作為解釋或預測變項的社會化資料使用之批判討論，請參閱 Greenstein, 1970b）。較直接有關人才甄用的成人經驗類型之一，是早期在政治上的實際涉入。對於學徒制和地位這些活動，我們在下文中討論。

### 最初的活動和學徒制

不管何種政府，也不管何種選舉制度，沒有一位公職候選人是於隱名的社會和政治適任者中出現

的。不僅他必需能說服黨的甄選者或初選團，他已成功地完成了一次相關的見習年限，並且他也需要一個初選支持者羣——選民。在政黨，在指定的政府職位，在市民組織或利益團體的領導上，最初的活動，可能使他符合資格的要求，人才徵用的特殊標準變化萬殊；但這些資格是候選人功能的先決條件。政黨在程度上不同，提供不同程度的學徒地位和接觸公職的途徑。在某些政黨體系中，許多便不是政治人員唯一的養成場所，也是主要的養成場所；在美國的制度下，有一連續的、功能良好的政黨組織與其說是原則，毋寧說是例外。學徒制時常在指定的公共職位上尋得。但政黨擔承對候選人的提名和支持上，以及在延續實現政治雄心的學徒制之看門人的甄選上，扮演著主要的角色。「政黨需要權力鼓舞職歷者，因為它是——權力尋求羣，但它不能提供太多的權力鼓舞者……，權力的替代物必須發現，諸如特權、地位、承認、社會酬賞」(Eldersveld, 1964)。

然而，提供學徒制地位的功能，需要具有留心組織的人員之組織；政黨同時也執行其他功能，諸如甄選職位的候選人，提名他們並動員羣衆來支持。當然政治與公共輿論站在一邊。這些功能是相互關連的；但需要具有不同的技術和取向的政治工作者和職員。作為一個自願的動員支持組織而言，政黨擁有作為主要的工作者，具組織需要的支持者和職員的人員一致之目標。政黨職位對候選人提名公職利弊各半，但那是政治職位，即使僅是一準職歷性的 (Kornberg, Smith and Clarke 1970)。

從可得到的證據上看，黨官可渴望較高的黨職位或政府公職；他們達到晉昇的程度則各有不同 (Patterson, 1963; Eldersveld, 1964; Althoff and Patterson, 1966)。他們在擔承黨職務期間或之前，他們也擔承由任命或由選舉而取得的公職 (Mayntz, 1961; Pomper, 1965; Ippolito, 1969)。這

些職歷的類型不盡符合公眾意像的階梯；「它更像佔椅子的遊戲」(Pomper, 1965)。在某些事例中，特別是歐洲的左派羣衆政黨的較高階層，政黨地位是到國家性立法機構或行政機構的踏腳石。法國、德國、意大利、奧地利等工黨，在議會的領袖，大都是專業的黨政客 (Beyme, 1971)；在美國 Eldersveld (1964) 發現地區黨委員會主席有三分之二，和選區領袖有百分之五十七，不僅被吸引至黨中央之州委員會，也被吸引至國會、州議會、和郡級的官職。

在較低的職位上，黨職歷者任期較短，更換率偏高 (Marvick and Nixon, 1961; Eldersveld, 1964; Kornberg et al. 1970)，在地區委員的階層，某些職歷者的任期在十五年至二十五年之間，甚至在選區的層級上，底特律的兩黨領導者，服務至少有二十五年；某些政黨的職歷於中間的或甚至較高級的職位開始，但大部份官員則於一正式的地位開始 (Kornberg et al. 1970)，黨內的流動有相當程度的變化。康恩柏和他的伙伴發現，依初次地位任職期限，地位的分歧和投資時間的尺度來看，至少有十種不同的政黨職歷的類型。在底特律，地區委員會較高的流動率達到其他地位所需要的平均年限 (mean number) 是十四年。早期的選區領袖職位是急速流動的工具 (Eldersveld, 1964, Bochel, 1966)；而所有在地區階層的官員，都曾經歷選區之領袖職位。Bochel 也指出美國工黨區書記 (ward secretary) 地位是提名爲市委員會的要件。競爭性地區提供較多的機會給向上移動的忠實黨員、年青人、較少財富者、和較不利的種族羣體 (Eldersveld, 1964; Pomper, 1965)，少數黨選區主席則比較年青 (Conway and Feigert, 1968)。

對大多數政黨官員的研究，研究過最初涉入政黨工作的動機。⑦ Eldersveld 的涉入來源的類型

(外緣的影響，自生的力量，和意外的涉入)曾使用在數個研究中。底特律選區領袖，有二分之一以上起源於甄用；百分之十六是自發力量；百分之二十二意外涉入。類似的分配在麻州和北卡羅萊納州發現 (Bowman and Boynton, 1966)。在伊利諾州的一個偏僻的郡裏，兩黨有百分之八十的選區委員是甄用來的 (Althoff and Patterson, 1966)；在底特律，政黨領袖和無黨的羣體所甄用的組織流動性，比其他型式的甄用要低些。

⑦ 即使使用的技術 (例如在或多或少建構性直接訪談中) 是非常不可靠的。這是惟一有關最初涉入的動因之有用證據的型式。人格清單和主題的統覺測定，使用在人才徵用研究推論之人格變數上。

由報告提出最初活動的動機，有時二分爲(1)理念、社會，或社區利益 (非人的動機)；或(2)社會的接觸或物質的報酬 (屬人的動機)。在都市環境中，政黨官員和活動者報告之理念和論題取向的動機，比個人取向更爲常見；在鄉村地區，他們則比活動者較頻繁 (Hirschfield, Swanson and Blank, 1962; Salisbury, 1965-66; Althoff and Patterson, 1966; Conway and Feigert, 1968; Ippolito, 1969)。接受領導地位的理由則以問題和社區取向，包括候選人取向的措詞指述之，而又與黨派支持則經常聯繫這些指標在一起 (Conway and Feigert, 1968)。此一領域最具眼光的研究解釋之一是 Eldersveld 的觀察，因選區領袖中百分之九十九的領導者在某些非人取向上佔重要的比率；而有百分之九十二也提出證據證明，人的需要條件是重要的。事實上，進入政黨工作有兩種動機要素。「多數政黨領袖視政治爲個人工具 (權力、地位、流動和關係)，同時宣佈涉入的其他理由」

(Eldersveld, 1964) ②。

② 參看討論業餘者和專業者的討論報告。

人才甄用的學者，尋常主張自我取向的動機是相互排斥的。這種假設更進一步因對稱的業餘者和專業者的政治類型而強調。然而這些範疇的相互排斥是很顯然的。尋求附帶報酬的組織取向之專業者，並不能贏得選舉。他們僅在價值判斷上不同意業餘者，易言之，他們寧願維持理念上的純粹，而冒失去的危險；或爲了勝利而允許妥協以能補足政策計劃的不足。僅尋求政策目標的業餘者，則兩者都不取。所有種類的理念上自願者，依其委付的原則而作爲，但他們是在委付之個人參與上，嘗試補足這些原則。

沒有人在違背自己的意志之下積極地去從事政治的。甚者，論題的立場，政策取向，或理念的態度，並非是參與的充分條件。這些取向被期待此類政策之受惠者團體，以及有政治警覺性和公共取向的公民所分享；然而，祇有流動者在政治俱樂部或政組織中尋求或接受參與的額外「負擔」。吾人必定結論認爲，他們從參與本質上獲得若干滿足。當活動者不願或不能期待其他的個人「報酬」時，參與是對參與本質的積極取向事實上充足證據，而作爲目標本質之參與是個人的報酬。

政治行爲是集體的行動，在集體行動中的參與最好依雙重動機的二階層解釋來分析 (Olson, 1965; Czudnowski, 1973)。斯勒辛格的「政治雄圖」論（一九六六年）將個人層次的變項——雄心和傳統層次的變項——機會架構結合在一起。如此，就較偏向於甄選的單層次解釋了。不過，這不能說

明動機的二層次；甚且，因為不同政治職歷路線間的取捨之最初甄選上仍然是公開的，所以也不是最初甄選的理論。

政治的學徒地位，位於政黨中抑或位於公民、種族或經濟組織上，是體系間結構差異上的事。在此領域有相當的體系研究和理論化。人才甄用的學者一般集中在候選人的特性或政治支持的結構上。學徒時期的概念首先由普瑞維特在一九七〇年研究委員的人才甄用時導出。假如學徒的概念理論有用處，它必須先於最初的人才甄用所運作。當然，選舉的地方政府官員，提供一潛在的國會議員候選人之學徒地位，就制度化之在職學習經驗之一般意義而言，選出的地方官員就是已被徵用的政治家，而他必須在較狹隘的人才甄用之有關的意義上，展示其在職歷早期的學徒經驗。

在舊金山海灣地區，普瑞維特的市委員之研究，在描述學徒制的角色上並無困難，因為他處理了一較低層次的職位。即使他考察非制度的角色，諸如參與某些特定的選舉或為某些特定動機，如學徒的經驗；這些證據指出在多數的案例中，輔助性政府中官員和準官員的地位（百分之五十四的委員）和在公民組織中的領導地位（百分之五十）。在學徒制的角色中，求職的鼓舞者可公開展示其技術，且從徵用機構的期望上，制度化的學徒制有助於找出潛在的候選人。評論選擇過程加諸區分化的額外費用之技術，和潛在候選人能發展或展示在學徒制之角色上，普瑞維特引出拉斯威爾之論辯，「當我們向上移動現代工業社會之階梯時……，必須維持無數聯結其他人成功的化約壟斷之有效性」。在一個政治活躍的階層中，選擇和揀選的過程，將消除人際關係技術上有缺陷的人。當其於在位時政治互動的面對面之特性猶如選擇時期一樣。

在嘗試回答政治體系中決定學徒角色的問題上，(Czudnowski, 1970b) 概念化這些角色為溝通系統中重要的聯結地位。報告以色列一百零二位全天候選任的政客（四十四位立法委員和五十八位市長）在他們初次來充任選舉官職之前所擔任的職位上，他區分了普遍的和組織特定的學徒制之職位間之差異。其有一半的中央和地方官員是從普選職位上甄選來的，易言之，在許多近代和轉變的社會中，時常是社會和專業角色的甄用來源，其中包括公務員、新聞從業員、作家、專任或經濟組織官員、律師、市委會秘書等。餘下百分之五十選出的政治家則自組織特定地位中徵用。這些輪流展示的特性導致有關短期的國家論題和目標的活動，和代表長期社會組織和服務之顯明特色間更進一步的區分。這種類型不僅具深刻印象，且在職位階層和國家立法者（其主要人才甄用自國家有關之論題地位）和市長（其人才甄用自地位優越之社會組織，和有關服務之地位）間人才甄用來源的相關性，有統計意義上不同的事實所展示。就此研究法的有用性之判斷，必須延至證據從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環境中變成有用時始止。

### 職業

不像其他社會經濟的特性，職業包含了一些不同的變數，諸如：技巧、收入和地位，其可能獨立影響政治職位的合法性。甚且，職業的歷程反應成就，和個人能向上移動職位的階層；最後某些職業的範疇，如律師，似乎比其他職業聯結了較大數目的政治有關之特性，而具有在位者相當程度的過度時期之傾向，特別在美國為然。在人才徵用中，就職業變數角色的較詳細考慮而言，因此有一充分的

判斷。在美國政治中，律師受到特殊的注意，因其地位提供了查證政治人才徵用之特性和政治發展結構之間的關係。

職業做為一變數

職業是一項變數，縱非全部，卻橫切在大部份精英和精英甄用研究所採用之理論觀點上。就那些從社會、階層化理論的觀點來探討人才甄用的學者來說，職業是一階級和階層的指標。其他學者則依位置職業來考慮，例如：在功能中的地位分工——作為不同於階層的分工。商、農、工或交通服務是職業的位置。聯結層級的地位和位置，學者就能決定個人在政治決策中心所處地位的親疏。另外一條通往人才甄用研究上職業變數的途徑，便是與一既定職業有關之技術的評估，以及在任何既定社會、文化、發展階段或政治情況與政府的有關性。在人才徵用捐客技術關涉的決定上，拉斯威爾在一游擊國家 (*Garrison state*) 的暴力專家之人才徵用功能理論上和政治中的律師之說服專家的某些解釋，便是採用此研究法的較著名例子 (*Lasswell, 1948*)。當沒有其他經濟地位之資料可用時，職業也用為收入之指標，諸如，它與一定的政治職位之收入相比較，尤由進者，職業的威望，與政治職位的威信比較時，被分析為人才徵用的變數 (*Rosenzweig, 1957; Eulau and Sprague, 1964; Barber, 1965*)。最後，在自然雇用和雇員以及依個人從某職業，接受兼差或全職的政治職位之能力的職位流動性；或在一短暫失業後回復其職位上一般被視為重要的人才甄用之變數 (有用性)。

在職業或有關上述分歧的透視中，展示了職業實際是一羣變數。變數中的某些具較高的相互關

係，諸如教育、收入和職業的社會地位，雖然，在一職業中，可能有較廣距的地位和收入。律師的收入自一年數千元到數萬元變化的事實，至少依收入而言，使其在合成單一的範疇並無意義。接近政治決策中心有效性和政治上的功能技術，並不需要彼此聯結或教育和收入聯結。立法者職業的輪廓，因此不是人才甄用過程之導因。

兩個更進一步的困難牽入在人才甄用研究之職業特性的無差別的利用上。首先，職業研究所依據之資料，是官方或公開印製的記錄，指述之職業可能隱藏文化和政治偏見。許多工人階層政黨的議員，註冊為工人；即使他們花費大部份時間在勞工聯盟的官員職務上；在歐洲的農業政黨中，許多農人實際上僅是農人市場組織的代理人，主管新聞出版的政黨官員，有時視其自己為「新聞從業人員」。而德國的州僱用人員畢業於法學院，可能寧願取得律師的資格；公開印行的政治家之職業資料必須打點折扣。其次，且在理論上很重要的，即在職者任何範疇的職業背景，並非每一人才甄用之變數，因其已涉入一定職業的小部分委員，而不顯示任何而非從事同職業中數百或數千個其他的特殊個人羣，以尋求和取得政治職位之理由的資料。這種批評，如普瑞維特（1965）正確指出的，對任何社會背景變數，或對人才甄用理論之整個社會階層化探討法，是有效的，可作為集體的資料；職業的指標主要有由於人才甄用的縱的總體分析。

變動性

也許職業本身更重要的是職業的職歷史和職業的可變性 (Eulau and Koff, 1962; Bowman and

Boynton, 1966)。因為它們是潛在的社會取向和政治體系之輪廓，個人地位的指標和成就之取向。更甚者，政治經歷可充當職業或社會向上流動的輪子。年輕人在職業的起初時期——大部分為律師——常尋求當代政治歷程使成可見的，建立接觸的，和創造名聲的途徑。

政治職歷對於這些在他們希望整合進去的社會中缺乏達到社會成就所需資源的人也是流動的動力。在此範疇中，地位低的少數和種族移民羣體，在美國受到都市政治機構分配的政治上恩惠。在美國有一含蓋廣泛的種族政治文獻，包含歷史，引起廣泛印象和體系的經驗研究，指述在政治動員和人才甄用的種族整合之動因和參數。此一文獻由李特 (Litt, 1970) 依據「政治的功能性質」巧妙地摘要和解釋了 (Eulau and Koff, 1962)。由黨和黨控制的地方政府和社會機構表徵之類似模式的人才甄用特徵，如同社會和經濟整合和進步之輪子一般，在具有傳統文化背景，卻無專精技術的大量東方移民流入時期，湧進以色列的近代社會和政治的結構 (Czudnowski, 1970a, 1972a)。

美國黑人人權，教育機會和經濟發展則沿著一較複雜的途徑在奮鬥；除了抗議和率直地拒絕這些制度外，它還將遲延的整合容入流行的整合架構內。僅在迅速成長的黑人少數移入北方大都市的中心以後，這種正在出現的黑人領導權才有足夠的選民把它們的要求帶至市議會、州議會，最後的國會去。雖然，在一些如芝加哥這類城市中，黑人領導者的人才甄用透過民主黨機構而進展，黑人的次文化發展了其自己的社區領導者之角色，其充當之學徒地位以便這些人尋求整合入政黨的體系。沒有一種黑人政治家人才甄用之經驗研究可以使用的；但一九五〇年代黑人領袖之職業背景的描述包含了相當部分的牧師、殯儀業者、社會工作者和全美有色人種發展委員會 (NAACP)，和工會的活動者與

職員、醫生、教師和律師<sup>⑥</sup> (R. E. Martin, 1953; Barth and Abu-Laban, 1959; Prautz, 1962; Wilson 1960; Ladd, 1966)。人權法案的立法、特殊福利的創造和種族關係的機構，提供了無數特別的黑人領袖之學徒位置，數位最近選出的黑人國會議員擁有此種位置；更多的軍事領袖在一九六〇年代後期出現，亦展示了趨向政黨和公共職位的分歧，但並未充分記錄下來。

⑥ 黑人人材徵用上，律師的角色可能大異於非黑人律師，除了在執行法律的地位而外。

在某些政治文化或現代化的時期，職業是唯一最重要的人才徵用之潛在資源的社會指標。一九二〇年和一九五七年 (Frey, 1965) 描述政治體系上從伊斯蘭軍事制度轉化成近代世俗國家上，職業角色為「踏入政治的門徑」。在考慮下的轉換時期，僅有百分之九的國會代表是農業職業，然而，農業提供男性人口百分之六十至六十八的職業，政府和軍事官員估計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代表，相對地在人口中僅有百分之一·六至百分之十一·三的差距，專業者的過度代表，其中百分之六十是律師，至少大於官員代表的兩倍，這些例子解釋職業作為人才甄用的潛在資源之社會指標，不僅具社會結構的功能，也表示是意識型態或政體的功能；例如：在一定的體系中，職業也指示政治或政制的取向。

在一社區社會中職業羣體絕對大小的流動上，卻不需要反應立法機會的職業結構，就一定職業團體來說，改變中的政治相關性，更似乎與來自該團體之立法委員比例之移動相連接。庶威爾和派特生 (Jewell and Patterson, 1966) 報告在經濟困難時期，農人的比例在州立法機構增加（在農業佔相當大的部分之州）。然而在繁榮時期，農人比例減少而律師增加，在與律師比較下，暗含律師是一利

益團體嗎？它亦顯示在康涅狄克州立法機構中律師的比例是聯結人口比例中比例而變的，同樣，列為退休人員的比例是與依人口中超過六十五歲的比例而變動的（Barber, 1965）。

隨著政治職歷專業化的增加，它也變成增加需要詳加說明，是否要參考政治家甄入連續全天工作的職業，或當其在政治職位時，維持或多或少的工作的職業。在職者被甄入全天政治的職業，可能是其角色和政治職位間某些類似性之誘因。然而，兼職的政治家的職歷，可能同樣代表政治上的經濟利益（例如農人），此關係就變得較複雜。當筆者考慮全職政治在位者獨立的收入，亦有一公司的正式執行者；就被其長官准許競爭人才甄入政治的收入來源。律師和經濟管理者職歷作為到政治職位之路徑增加的重要性，不僅在美國，也在歐洲受到注意。貝美（Beyme, 1971）報告在德國政黨領袖的上層階級的職歷類型之成長比例；在英國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九年下院保守黨有百分之三十三，是「公共公司的董事」（Berrington and Finer, 1967）。金姆（Kim, 1967）發現公司行政人員和雇員的類似比例，在日本縣議員中是不可能的。政治職歷時常在職業失敗後提供「第二機會」，但甚至在成功的中年商人、律師或大學教授，放棄專業政治職歷的職業，暗示承認在首次職業之選擇，至少在心理上是有些不滿足的。

律師在政治上

最一致的發現之一，是在立法機構中相當大比例的律師之普遍存在性。在許多國家中，他們在議會會有最大的單一職業羣體，緊接著是農人和商人，或者，在擁有大組織共產黨或社會主義政黨的西歐

國家；緊跟著是農人和工人。對於在美國的州立法機構的較低層次，海尼門（Hyneinan, 1940）報告，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七五年間有百分之二十八的律師比例，而即使在一九四〇年間減少，一九五〇年在某些州則增加相當大（Barber, 1965; Jewell and Patterson, 1966）。各州長時期有系統之資料不是容易得到的。在第八十五屆國會，估計律師在參議院有百分之六十五，衆議院百分之五十五（Jewell and Patterson, 1966）；斯勒辛格報告，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五〇年間，美國各州九百九十五位被選出的州長，有百分之四十六曾執業律師；在其他國家的比例較小。在意大利，律師在立法機構的比例自一九四六年的百分之三一·八，下降到一九五八年的百分之二〇·八（Satori, 1967）。在法國，律師估計在兩次大戰間佔立法者百分之二十四，但在第四共和時期僅百分之十三（Dogan, 1961）；英國在一九五〇年新選出來的保守黨國會議員中，有百分之二十一為律師（barrister and solicitor），在一九五五年佔所有保守黨員的百分之十三；一九五一年下院的整個比例是百分之十九（Berrington and Finer, 1967; Dogan, 1961）。在二次大戰後，德國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三年在下院的比例是百分之七，一九六五年是百分之九·三（Dogan, 1961; Beyme, 1971）。最後，在挪威國會，律師的數目似乎是驚人的低（Valen, 1966）；而金姆報告，一九六三年在日本縣議會有多少律師。

大部分政治學者，特別是美國政治——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和法學家，被大量律師具有政治地位的事實所困惑，且嘗試較明顯的解釋，豐富的文獻切實地簡化，則由 Eulau and Sprague (1964) 依政治的觀點解釋，加上在美國四個州立法機構的律師——立法者的詳盡分析。

托克維爾相信，合法職業的較高級地位，助長了律師接近政治的途徑。威伯歸屬律師獨立地位的優越性，包含在現在資本經濟中其可利用性上。布萊斯（一八九四年）相信美國聯邦主義者二層級之立憲體系，使學法者敏感到政治和法律的關係。最近，馬殊（一九五四年）更進一步發展威伯式的論斷，指出律師較易利用政治職位，因法律改變緩慢，甚至缺乏法律業務之執行，並不會傷害其重返職業的能力。

如先所述，在當代美國社會中，法律專業者之收入和高地位的論斷並非十分正確。威爾斯（一九六四年）顯示法律專業是依執業之大小和範圍而有所別。大的法律公司並不類似其小的伙伴，或在都會區域的單獨執業者，以及在小都市的律師，並無採取一不同的類型。三種律師羣體也依種族、宗教和其他社會特性而不同。更甚者，某些律師因富裕和便利之故而能進入政治；但對於其他人而言，立法者薪水是對某私人收入的實質補助。最後，「登廣告者」時常是一年青的律師，但由 Eulau and Sprague 分析的證據上看，並不清楚肯定年青的律師在達成其目標後從其立法中退休。

一有力的制度論斷由斯勒辛格（一九五七年）所提出，指出三分之一的州長是直接從執法的職位上趨前的。他們壟斷了執行法律的職位，付予律師在政治競爭上的明顯利益：一八七〇年、一九五〇年，百分之五十六至六十八的州長曾是律師，這些州長中，百分之五十至八十五曾擁有執行法律的地位；而且，最後在選上美國參議院的公共職位上，有百分之十二的參議員有一法律執行的地位，但另外百分之一三·五在其職歷之早期有法律執行之職位。Eulau and Sprague 顯示在州階層中二十七位百分之三十六的律師——立法者，曾有司法和其他法律執行之職位。既非斯勒辛格亦非 Eulau and

Sprague 顯示許多法律執行的職位是選舉的，有許多是被任命的，此區別很重要；因為選舉的職位需要政治隨員和提供相當的政治經驗。

斯勒辛格也辯稱，當他們是職業政客時，法律運作和政治專業的適應性主要引起律師的利益。這種敘述的證據構成一個事實，即一個人在選為州長之前，在公共職位上愈久，他是一位律師的可能性愈較高。律師的常數的分配，從無以前公共職位經驗的州長與百分之二十到十四年公共職位經驗的州長有百分之五十八是可信的；然而此種論斷無關於人才甄用，除非個人願意斷定，具政治野心的年青人寧願受法律的訓練，因其助長接近政治職歷。威爾遜敘述，他進入法界，因其選擇政治為一專職，時常被引用來支持此一論斷。Eulau and Sprague 展示，律師立法比立法者而非律師者，顯示一早期之政治興趣，並有較多的親戚在地方司法、州立法和政黨職歷之前為政黨工作，並自認為一自我甄用的政治家。這些發現似乎指出一更強烈的政治社會化，和一較強烈的政治取向。

但法律專業也提供其他的可能性，律師曾在商業上創造財富 (Miller, 1951); Fellin (1967) 曾提出證據，即對來自紐約市的國會議員——律師而言，國會的職位是達到司法性任命的踏腳石。一九四六年和一九五六年的紐約代表，自願放棄國會議員十五位律師中之十三席而接受法官職位，有一位則被任命為地區檢查長 (district attorney)。Eulau and Sprague 在州立法者的資料中，也顯示律師——立法者更時常比非律師——立法者鼓舞至地方或州司法職位和州參議會。

因此，律師能鼓舞四個不同的職歷；(1)假如他遇到大的法律公司的選擇性社會標準，他能從事一較成功且獲利的法律執業。如果不然，他仍能使自己建立較少特權但獲利的法律執業。(2)他能使自己

建立在政治上或在商業和財政管理上的聲譽。(3)他能建立一政治上的聲譽，以更進一步執業法律的目的，或獲一選舉性或任命的法官職位。(4)他能從事一政治職歷。有待於解釋的是(3)和(4)時常發生的理由；例如，為何律師在政治上有利益，則與其抱負無關。最時常面臨的解釋是律師的角色和政治家的功能之類似性：在律師——委託人的關係和政治代表上，律師角色是一擁護者，在法律的矛盾中到法院中為其委託人辯護。其角色為談判、媒介或仲裁（捐客角色），以及顧問。Eulau and Sprague 顯示，不管律師的訓練和經驗在政治上有關的角色如何，在政治的競技場上之行爲並無不同於非律師——立法者。五十年以前，威伯觀察，律師是近代專業政治家之原型。Eulau and Sprague 闡揚這種意見，且解釋他們的發現，提出法律和政治專業的同型性，在社會次序增加的複雜性反應上需要的功能（或歷史）的聚合。

在政治人才甄用的職業角色——輪廓上，Czudnowski 提出(1970b)在法律和政治專業的同形異質 (isomorphism) 之間僅是在通則化的較高水平之概念化的角色類似性，角色類似性是律師與其他人才甄用所分享的職業來源。較高水平的概念化至一般性的取向，聯結其能力來執行複雜的運作，且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溝通網絡上，定位於重要的聯結地位上。九七九個職業頭銜中的五十二種分享政治角色的輪廓特性，且最小空間分析 (smaller space analysis) 顯示，人才甄用上最時常出現的某些職業來源，聚集在由相關性的職業，角色——輪廓變數決定的空間上。貝美（一九七一年）考慮德國公共專家和科學家的政治候選者的人數增加，是肯定角色——輪廓溝通——聯結的政治面向，但他深信作為政治角色的定位化之結果，一般性取向僅能評價高層政治人才的某些人選。

在政治上，律師「遍在」的比較評估導致為美國情境的結論是一例外。律師的過度代表展示兩要素：(1)反應角色類化的一跨國有效要素，說明律師在國家立法機構佔百分之十至二十的比例；(2)美國政治上的體系——特定要素，說明了國會席次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五的附加分享，需要在歷史與理論上加以解釋。

Eulau and Sprague 指出，律師在政治上的優勢與商業和經濟成長時期一致，例如：增加分工的時期，但為何在歐洲分工和經濟成長的同時期卻缺乏創造——法律專業的類似機會？托克維爾是對西方的智識歷史上最深入的觀察者之一，他將美國政治中律師的優越性歸屬統治階級的缺乏。他作的觀察，在今天如一五〇年前一樣仍具永久性，「在美國幾乎只有很少的問題，其中並不成為司法辯論的主題」，即使這些問題是社會或經濟歷史學家或文化人類學家比政治學者擁有較好知識回答，托克維爾的觀察似乎並不完全是無關的。斯勒辛格的州際景觀比較（一九五七年）提供了該回答的部分意見。在其政治上律師角色的研究中，他引我們注意州長中變化相當大的律師比例之事實。因此，單單職業角色輪廓不能說明律師在政治上的「過份代表」；特定的區域經濟或生態系統也涉入在內。擴張中的經濟為鐵路、保險、石油利潤和鑛冶業的調節創造了政治需求。最時常的需要之一是衝突的經濟利益的合法訴訟，首由競爭的擁有者團體，後由經理和勞工所創立。這些情況置法官和公設律師於顯著的策略地位。

在長期建制的歐洲社會，經濟成長和工業化創造了嚴謹階層化體系的社會和經濟衝突。司法者到處要求協助公共事務管理，以順應陳舊的政府和法律體系之新需要。但其任務祇在轉換和適應既存秩

序到上層階級和上層中產階級的利益上去。由於這些階級已壟斷了司法官署和立法職歷，該任務並無特殊困難。在美國，既無嚴格的階層化，亦無傳統固有的社會和政治秩序。聯邦組織、衆多的執法官署、經濟和政治角色，以及個人的民族精神，便於律師接近政治。誠如 *Eulau and Sprague* 所指出，在最近，大公司、貿易協會、工會和行政協調機構的發展，和經濟的公共部分之擴張，甚至產生法律和政治的彼此接近是真的。但在十九世紀中葉至末葉可適用的論辯，並不適用於二十世紀。因此，吾人必需解釋律師在政治上的持續性爲個別現象。政治學家易於指出美國政黨的鬆弛組織，其相關的異質性，和缺乏社會性同意的教條理念。在社會政治體系上，他們所服務的黨機構和經濟、社會和政治目的是地區性和臨時的，個別企業家就進入了。就此任務而言，律師較其大多數競爭遠爲有準備，而執法官署提供了他主要接近途徑的制度化壟斷。此種解釋受到歐洲體系上，律師在政治上的比例在不同政黨間有相當變化事實所支持。在意大利、法國和德國，組織不嚴格的政客，律師人數就較多。一九四五和一九五八年間，法國「獨立派」的代表中，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律師。在第三和第四共和時期，訓練較不嚴格的法國政黨之「激進派」中，有百分之二二·五的律師，但在天主教的國會代表中，祇有百分之一·六的律師，而社會主義派中有百分之十四。同理，在意大利國會，律師的最低百分比爲共產黨，社會主義政黨和基民黨，最高者爲自由黨、共和黨以及社民黨。在德國，甚至於社民黨聲勢日隆且成爲一勝利政黨後，在基民聯盟中仍有較多的律師（計算和排列依據 *Dogan, 1961; Sartori, 1967; Beyne, 1971* 的資料）。

此種分析進一步闡明對一種社會——人口統計特徵的系絡解釋之需要。不僅律師不同於依技巧爲

準之其他職業的那些人，顧客——代理人關係，及其近似的政府程序；同時，在甄選程序上，他們的相關利益，也高過那些在其他職業上依賴於人才甄用政黨之人員。在尋求人才甄用至選舉之職位上，許多律師是私人的政治企業家，多少有點嚴格階層建構之組織良好的政黨，卻並不偏愛私人政治企業者的鼓勵。組織鬆弛和分權的政黨，律師——企業者，在較為良好的位置上，使其最初的利益高於盛行在其他人才甄選過程上之其他職業團體之成員。

### 刺激

在社會起源的利益、職業背景、和政治人才的學徒制地位，皆反映了社會學上人才甄用研究的門徑。分析單元是幾組聚集人才甄用的資料，甚至當吾人說明在職業特性和特殊環境結構間之互動時，職業範疇中個別成員間之不同乃降至分析的參數。因此，吾人假定，在會聚水平上，這些不同不影響受觀察多數間的關係。

此種政治社會學者的參數假設，是由他祇以少數變項有效討論之事實，由其在心理學上不充分的訓練，和也許由其不情願接受，卻具有很大的經驗性參數變化和通常不接受的解釋規則之心理學和心理分析的分析架構，加諸其研究模式上的一種限制。換一個方式來說，決定將人格上差異降至不運作的精英研究參數，沒有理論上的證明性。事實上，沒有可研究的假設用來解釋何故祇有某一社會範疇的一些成員、團體或人才甄選——關係特徵的職業尋求政治職歷，而其他則否，所以，在理論化人才精英甄選上，有一道甚深的差距存在。

嘗試聯接此差距，涉及衝突的假設或差異，強調(1)人格特質或心理動機化的關係，影響政治行爲和整個人格之「定形」；(2)在此種人格「特性」間和他們顯示非政治行爲的領域之關係；和(3)在人格和特殊政治情境或環境間的互動，以作爲反對通則化的政治取向之概念。

政治心理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家的信仰系統和行爲模式，而非人才甄用的人格角色。這些文獻在格林斯坦本冊第一章和政治心理學手冊 (Knudson, 1973) 的獻詞中受到檢查和討論。本文將僅檢查人才甄用討論的直接興趣之研究，有用的證據很少且無結論，最好是將之概括爲「政治人格」的問題，例如政治家的動機併發症的特性。

最初之人才甄用的研究在本章前部份已討論過，「動機」一詞應用於社會政治目標取向，以及社會、物質和心理報酬的自我中心取向。在「人格和政治」的文獻中，「動機」指示心理的傾向、人格特質、需要或動機。這些研究假定，尋求積求政治角色的個人，因慾望或衝動培養「動機」以滿足此種需要，而結果，政治候選人應較有類似的社會、經濟和教育卻不尋求積極的政治角色的個人，展示更大的有關「心理傾向」的熱度。

如格林斯坦在本冊的篇幅中充分地展示，政治行爲的心理取向分析，視人格爲媒介和受社會、文化和情境因素之媒介體。格林斯坦對人格和政治分析概念化的擴張，提供了三個層次的社會生態空間的特別次元，和三時期的時間觀點。解釋此中間的社會生態之層次，亦即個體環境爲包含活動者自己在環境中的定位，和考慮這些層次的社會生態組織以涉入經驗和分析的明顯永久景觀，吾人將發現，在此種爲心理傾向設計的「擴張概念架構」中接合動機概念意含兩者是不可能的。因此，人格要素、個

人層次的目標和意圖的公共結果是政治行爲動機分析的三個局面。

在一本早期的著作中，格林斯坦（一九六九年）在該文獻中提出有系統地描述之命題，此類命題涉及角色履行上人格要素的相關衝突。至於這些命題，角色期待的特性和情況的曖昧，就人才甄用上心理傾向的相關衝突之評估到積極的政治角色來說，都是特殊的相關性。角色期待的特性愈少，或情況的曖昧愈大，人格因素在角色履行上的衝突就愈大。此種論證已由 Knutson（1973）類化爲政治活動的典範或水平：「人格的影響力直接關係到政治相關行爲的特性」；因爲廣大的普遍行爲（亦即投票）、社會和文化常模時常「履行該行爲。」甄選人才至積極的政治角色上，較在選舉當天投票選舉幾位候選人，更要涉入較大的情況曖昧性，和較少的特定期待。因此，氣質在政客和非政治的比較上，較在選民的比較上，更應是一種區別的標準。在評論美國總統的心理傳記上，格林斯坦（一九七三年）補充說，活動者行爲的結果愈大，就愈需要熱烈地研究該領導者（心理特質）。

此論斷應用在角色決定上，心理和情況變項間的互動條件，以與角色決定的行爲相對，人才甄用是「角色取得」的例子，而非「角色實行」。然而，在西方大部份的社會中，一地區的角色取得行爲，一點也沒有特別期待可言。公民期待投票，卻不期待他也要成爲一位活動者或官職的候選人。在某些政治文化中，政治候選人被視爲分政行爲形成之原因，而導引特別的人趨向它。

人格因素可能是人才甄用有關之主要變數的命題，在本能上是很動人的，但努力展示人才甄用有關特性，既非無數亦不很成功。雖然近代政治心理學由拉斯威爾從病理到政治涉入推論開始（Lasswell, 1930），大部份政治學家趨向心理學和心理分析來研究人格特性、政治態度和行爲的關係。然

而，除了可研究性以外，還有數種理論和方法論上的問題。心理學的理論已提供了許多分析架構，但是，這些架構的實利性依賴於使用來評估歸責於動機架構之行為測度方法的有效性上。此理論依此步入橫切情勢的有效性問題，此問題混合了相當多選舉性問題的事實，其中諸如政客的權力慾望之動機甚至在政治互動的相關系絡上自我表現出來 (George, 1968)。吾人可能針對 Knutson (1973) 的抱怨辯稱，人格評估就其意指展示之架構之「存在」作了貧乏的展示，畢竟，此種架構「存於」分析者的心智上。然而，此種論辯沒有說中推定為愈時的穩定性和人格一貫性之經驗上較為突出的問題，以及其對物質政治之經常性或可預述性之變項關係。社會化理論和研究，以及 Rokach 在信仰體系架構上之作品 (一九六八年) 結合起來支持基本人格架構之早期建立的假設，但是，政治心理學考慮「整個生命中的重新發展和局部重建」(Levinson, 1958)。最近不久，格林斯坦 (一九七三年) 已擴張互動假設，以及潛在的分離，為導自個人特徵至集體的社會政治結果的因果鎖鏈上的互相變項：(1) 發生和獲得的生理化學的 (Psychochemical) 傾向；(2) 童年環境的影響；(3) 成人的人格；(4) 成人的社會政治取向；和 (5) 個人的行為。在政治行為上，人格決定的動機穩定性假設，幾乎直接遭遇到隨著基本需要之層級等級而來的馬斯洛 (Maslow) 之生長論之挑激：(1) 物理的需要 (食物、水、性)；(2) 安全 (即秩序、可預言性)；(3) 愛、感受，歸屬感；(4) 自尊；(5) 自我實現 (Maslow, 1970; Davies, 1963)。然而，暗示在馬斯洛理論上架構較變遷動力就更容易研究 (Knutson, 1972; Inglehart, 1971)。

較少關涉的乃人格的心理起源，人才甄用的學者曾從事研究成型的政治人格。理論化權力中心的

人格開始自拉斯威爾依私人動機取代公共目標，和依公共「善」而合理化的政治人之概念。他強調權力的重要，而非其他某些價值，是限制接近其他價值被權力使用，以克服事實的結果，因此，「權力是防衛」和「個人轉向它以克服較低自我的評價希望」。在一九五四年，拉斯威爾也敘述其假設形成之原因，在大規模之現代政治，其中比較性的自由制度的存在，諸如尊敬（名望）、正直（作為公共服務者的名聲）或財產（生計），高度權力中心的人傾向於被委付較小的角色，因此，在民主政治，基本上健康的人格是根本在永久的未確定之政治生活中殘存，但在集權政體，自我中心和權威人格可提昇至較高位置（Lasswell, 1954; Tucker, 1965），依政體之組織原則見功能的人格結構之個人政體的政治文化有選擇性之甄用。更甚者，學者必須確記，人才甄用的過程，起自地方化的環境，在較低的組織層次，其中可以允許相當程度的文化變異。最後在人才甄用中，權力取向所關涉為真者，並不需要應用至人才甄用過程中其他基本人類需要和需要的完成。

在嘗試複製應用拉斯威爾心理病理學的識見到政治心理學的研究之方法上，路瑟福（一九六六年）已檢驗過一座精神病醫院的監護委員會之參與情形。他發現監護委員會的領袖中，有百分之四十六是偏執狂患者，與他們所選出來的人口中祇佔百分之十二的比例成一對照。在路瑟福的研究上，「偏執狂」一詞不屬於精神病一類（那是指瘋狂症）；那是指有關環境狀態，此種狀態具有本文作者信其為政治人格的許多特徵。偏執狂的動力是投射和侵略，但對社會常卻很敏感。偏執狂人格時常給予自滿和優越的印象。賦以自負和優越感的印象。自我之力量、自信和有實力的感覺——所有實際政治參與的附隨物——也是偏執妄想狂人格的描述整合良好的人格較常參與，但焦慮的個人則避免領導角色

的主題，依據路瑟福的意見，並不參與者中盛行的偏執狂矛盾。偏執狂人格投射和取代罪惡和焦慮，並因整合良好，就不要求其信念作理解和交感性的評價。筆者認為，在政治參與的人格類型之研究上，吾人應在外在和內向之間作區別。政治世界提供許多機會給外向人格者投射和取代其焦慮和精神間的衝突。

引自路瑟福研究之推論有其嚴密的限制。這些發現建立在一高度可區分之母體上，而筆者斷定他是政治人格的單一類型。在政治領導者行為中極端偏執妄想狂錯覺的要素，曾在希特勒 (Langer, 1972) 和史達林 (Tucker, 1971) 之心理傳記中描述，也許更重要的是，焦慮是對安全需要未完成之假設，此在政治中也能歸屬於外在原因。

另一精神病理學取向的研究報導了多少有些許差異的發現。馬可斯 (Marcus, 1969) 將一列有二十二條目指示傷害的精神症候檢視設備，適用在一黑白兩個任意抽樣的社區、高階層的黨官，和民權組織的職員上。此一因測試精神病人團體和一個控制的健全之個人的團體而有效的設備，包括諸如「感到很虛弱」、「精神不振」、「慌張」、「憂慮」、「睡不著」、「記憶衰弱」、「發冷汗」和「在朋友中感到疏離」等項目。馬可斯發現，「傳統的」行動者在其測驗總分上並不同於他們所選自的母體（低總分為二·六七和二·七四），但是，「改良的」參與者（民權行動者）得分卻較高（低分四·三一）。甚至，「在改良參與一案上」，心理病理學的屬性是社區政治人才甄用制度為敏感性的一種，亦即，實是選擇的一種屬性。馬可斯正確地指出，在一既定的社會，標示不正常的行為暗示就行為發生的社會制度的合法性設定假設。分歧行為指出，此種合法性值得質疑；當制度受到挑戰

時，自我和常規這些流行概念也受到挑戰。然而，在人才甄用上，在政治活動中受觀察的精神特徵，其他社會精英成員並未分享，卻沒有指示。

以上的觀察也被薛瓦茲（一九六九年）應用至政黨委員會委員的研究上。他清楚地假設，「一項頗獨特的需要、價值和認知的人格羣是預先傾向於政治活動的。」將其抽樣上麥德華人格偏好計劃的總分，與族長的全國性抽樣和大專學生的抽樣總分比較；他發現政治家在成就、自治、支配和侵略的低計分，比大專和一般團體為高（但標準差都很小）。如薛瓦茲所結論，這些發現僅指出屬於政治家人格結構的特性，被誤解為一般母體之低計分以替代其他社會人才控制羣之計分而已。

早期研究者在尋求一典型政治人格上已發現了一不同的類型。麥康諾（McConaughy, 1950）應用數個人格之編目和態度測驗到十八位南卡羅萊納州的立法者和兩個非隨機羣體上去。他發現政治領導者比一般成年男性遠較少神經質，較少內向，更為自我滿足，有些微支配感。他們在社會地位上之優越感也比一般人較高，且缺乏卑劣感。然而，他們平均低於法西斯傾向的控制羣之下。（Hennesey, 1959）比較兩個在社會經濟和教育特質上相匹配的團體，其一由七十二位黨派活動者、官員和候選人組成，其一則由阿利桑那州杜克森市一三八位已屆投票年齡的公民所組成。在權力取向的量表上，「政治的」比「非政治的」「得分較高」，男性的「政治趨向」則又高過女性的「政治取向」。在「妥協意願」的量表上，非政治性的得分通常都比較高，而在「冒險意願」的量表上，政治性的趨向於得分較高。雖然，政治性的在集權主義上一般的得分都較高，但在「堅定意志」和「集權主義」上卻找不出顯著的差異。

使用一不同的技術〔一投射性的主題統覺的動機測驗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of Motivations)〕在不同的環境上，勃朗寧和雅各 (Browning and Jacob, 1964) 發現政治家和非政治家在權力——感情和成就——動機上沒有顯著的差異。測驗團體是政治上積極或在位商人的隨機抽樣，一個東部城市中對稱的不積極之商人團體，和兩個路易西安那郡中三分之二當地所選出的官員。而且，在低計分周圍十分散亂，但是，商人——政客則較非政客更要關心友誼 (感情)。不過，在政治上有權力和成就潛力的個人也有較高的權力和成就動機計分，因此，有高權力潛力的職位似乎能吸引有相當強烈的權力動機的人士。最後，在高權力潛力位置上，官職持有者的動機特徵，類似於追求此種職位的候選人之那些特徵。作者們也評論有力的黨性或派閥政治上差異的衝激，作為候選人和官職持有者動機特徵上，無黨性職位的對待處遇。在一份以商人——政客的相同資料為基礎之次一文獻上，勃朗寧 (一九六八年) 報告稱，動機型模在人才初選上與主動關連，在角色履行上與行為取向類型關連。那些展示高成就和權力取向，又與低聯合動機結合的人，經常也是自我起程者 (參閱本文第二節)。

巴博在其康奈狄克州立法者的研究上的論點，則以下述的觀察開始：意圖在投票上積極的團體和志願的團體參與——高收入、受大專教育的專業和經理範疇——是那些最不以政治為一可慾的職業的人士。政治學有一撒離至「地方主義者」的趨勢，近代的組織人過份機動，以致不能建立所需要的地方性。而且，立法服務的經濟學阻止最年輕的或中年的商業或專業人士進入立法的政治。最後，州立法者中轉業的人數很高，(在康奈狄克州) 主要因為在職者於選前退休之故。因此，在人才甄用者

所面臨的任務上，大多依賴於有潛力的職位追求者之個人動機上，和他們期待掌握職位衝動上之滿足。由於不斷在政治上掌權不是志願性消遣活動的延長，吾人不應期待追求立法職務多的候選人，在急遽增加的休閒參與層面上，甚至更形展示活動者健康、信任的人格賦屬特性。事實上，在巴博的研究上，四種立法者模式中的三種——「旁觀者」、「廣告者」和「勉強者」——似乎在自尊上頗有嚴重缺陷的人士，他們尋求政治上機會以補償個人的不適應感受。祇有「立法者」具有此種他們能在涉入從非政治職歷到政治職歷的改變上「操縱威脅、緊張和渴望」的高度自尊。當自尊「十分低」時，就不像有益於成爲政治候選人了；但是，就那些「自疑能力不夠」的人而言，政治也許可滿足他們確認較高自尊的需要。

低自尊是理想自我和認知自我間的一種差異性覺醒。結果所產生的緊張可多少因將個人的問題轉變成政治問題而縮減。此種連繫可能是透過與政治人物的認同之性的結果，或正遭受各種政治力量剝奪的經驗（此即：對種族、宗教上少數團體，或低經濟地位團體的差別經驗）。就廣告者來說，這是「連結他不能連結的那些人」的一個機會，就其他的人而言，政治依據職業，或在尋求認可或敬重上，可提供一次要的機會。

雖然文獻資料不足，巴博的主題，就「逸軌」案的解釋，特別是指涉與低自尊候選人有關之選擇模式來說，是相當有趣的。不過，不論本案「逸軌」與否，皆依賴於供——需和風險的機會結構上，而「勉強者」和「旁觀者」之不能貼切地適合「廣告者」的同一範疇，正是這些術語故也。換句話說，低自尊者祇有經過中介變項——特定的機會結構——才變成與人才甄用有關；這就不像具有低自

尊的人士，僅因為他們不適任的感受，就會有政治職歷的取向，縱然他們認同於政治人物，或為少數團體的成員亦然。同理，高自尊不盡是政治候選人的專利；它對商人、科學家或軍人同樣有益。不論對錯，自尊是以與高度自我入涉之角色的適任評價為基礎的 (Sherif and Cantuil, 1947)。這樣的角色似乎很多，祇有其中幾種與政治職位上的人才甄用有關。因此，雖然，巴博動機分析上的心理次元是不足以識別的，它確定了他的模式上動機、資源和機會在人才甄用相關性上互賴的假設。而且，巴博的動機類型學公然拒斥了非模式的政治人格類型的假設。

不久前，巴博（一九七二年）擴展了其在美國總統個性學研究上的模式。個性在孩童時期是可辨識的，青年時期的世界觀，和第一次獨立的政治上成功時期的風格也是可辨認的。個性提供主要的衝力，但是，其後的文化環境和歷史事件在塑造世界觀和政治風格上增加了其衝激力。在首次獨立政治上成功所展示的風格表現在其後的行為上。巴博舉了總統風格四種型態的心理型態：主動——消極、主動——積極，被動——積極，和被動——消極。此類風格結合了已投入精力之測度和感覺滿足的範圍。此一個性學進而展示了政治行為者的動機分化，但是，卻並不意圖提供人才甄用本質的動機解說。

人格和架構的政治變項間複雜的互依模式出現在 (DiRenzo, 1967) 的意大利立法者的研究上，其結合政治心理學上兩個主要的研究層次：活動層次和意理層次。DiRenzo 發現，在教條主義的量表下，中分數對共產黨和社會黨非主動的支持者，比意大利國會這些政黨領袖要高，但這種關係是對基督教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和右翼意大利社會運動 (MSI) 是顛倒的。一個由 DiRenzo 提供的可能

解釋，是人才甄用模式上黨決定的差異，與政黨間立法權力潛力上的差異聯接。該研究也洩露了黨領袖間程度上差異和教條主義的中計分與左——右意理連續體上黨的空位有清哲的連接。DiRenzo 勾繪出分析中的黨結構和派閥主義以便解釋其發現，但是，格林斯坦懷疑 DiRenzo 的量度在教條主義量表上的有效性。

政治領袖動機上分歧的最近結果可在潘奈 (Payne) 的「政治領袖與誘因」之研究上找到 (Payne, 1972, Payne and Woshinsky, 1972)。這些研究已產生了歸納自動機類型學和行爲 (認同) 的特徵的結果，而在政治涉入的運作水平上概念化了。因此，經由政治活動，領袖們可獲得如下表示之滿足：

### 行 動

### 誘因的類型

工作在特別的公共政策上  
達到和展示特權  
個人的贊美和他人的感情  
委付一超越的原因賦予人生意義  
解除意識的焦慮  
愉悅他人而被接受  
在結構的互動上和他人相互競爭

規 劃  
地 位  
諂 媚  
任 務  
義 務  
歡 樂  
博 突

這些誘因顯示馬斯洛動機理論中三個最高層次的人類基本需要之較低層次的運作化。它假設這些誘因維持政治參與；他們因此意欲解釋在職的行為型態，而非人才甄用至政治的職歷。

誘因被界定為情境的需要，與「正式目標」或「工具價值」成對比；因此，潘奈堅持公共取向單獨並不能反映實際政治參與者的整個激力之併發症位置，而他在不同的政治文化中之立法者，和其他政治的人才的三個研究中，描述不同的非物質和非工具之人格取向。

在十六位康奈狄克州立法者的隨機樣本中，最常見的誘因是「規劃」(6)，緊接的是「博奕」(6)；在多明尼加共和國的精英中 ( $N=32$ )，最時常觀察到的誘因是「諂媚」(50%)，緊接的是「規劃」(19%)，在五十位法國國會議員的隨機樣本中，「任務」排名第一(58%)，緊跟著是「規劃」(28%)。

在上述三個例子中，規劃之唯一具有相當頻率的誘因，其在概念化上也有幾分混淆不清。潘奈強調，它並不訴諸任何特別政策目標，而是導自工作在公共政策事務中的滿足；它既非職責感，亦非利他的犧牲，僅是自私需要的滿足。但透過政治參與，滿足一個人的需要，以完成一個人的社會義務，也包含一般公共論題和政策的取向，而非一特別問題的興趣。潘奈希望建立在「認知」問題解決者(規劃誘因)和政治上非妥協的好戰者，可能反映不同的緊張力和一個非政治的特性，而非在政治參與的不同誘因。

更重要是潘奈之論斷，「混合的誘因幾乎決不會發生，政治領導者僅有一誘因，不會是兩個以上的結合」。引證來支持此一論斷的證據由訪談的摘錄所組成，但是，他們公然從重組的訪談，而非記

錄的訪談整個資料中選擇例證。而且，沒有獨立有效的標準以資適用（在誘因研究上，這樣有效程序的一個例子，參閱本章前文討論過之 Hofstetter 對創建「業餘者」之分析一段文字）。此種方法論上的困難，在諸如提及其他行爲者的行爲之「諂媚」，及提及反應者之行爲和其對自己角色之取向的「義務」這種強烈對比風格之認同上，卻並不嚴格。祇有當涉入等級上的差異時，研究者的立場就略感不安全了。

由於在每一種政治文化上祇出現三種或四種支配誘因（而它們並非相等的文化），追求這種比較分析，以便探討誘因類的文化和架構之決定因素，其相對穩定性，及其在人才甄用上、個人職歷上（以測試潘奈在多明尼加共和國有關誘因和職歷類型間聯接之假設），和系統出產上的衝激，是很有用的。

以此種人格架構的變化、量度手段和政治職位類型，以及動機研究，不產生決定性證據是不足驚奇的。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對於模型政治人格假設之拒斥，但是，甚至這一結論都是試驗性的。這就像有一種人格特性的併發症存在，此種在多種結合上的人格特性是各種人才甄用情勢上的汎函數。在此一領域上極少探究的區域之一是人才甄用對不同職位層面上人格類型的一種比較。不過，此種人格特性的併發症未必是政客們的單獨特徵。

除了人格需要之測度意義的比較情勢效度問題外，人才甄用之學者，爲了蒐集過去情勢中的動機資料，必需致力於訪談和測試政治精英的事實，充其量構成一種困難的研究技術。儘管謹慎的度量，訪談和測試有賴於獲得反應者的信任和合作，但是，由於政客們時常是衆目所視之人物，他們都具有

擬人化的能力，並且以不同的風格扮演許多不同的角色。他們酷似戲劇演員，時常享有聽眾取向和喝彩的需要。而且，政客們就其人格和工作上的意見則較其他許多職業團體更爲敏感。最後，有「參與的社會化」趨勢，亦即，採取吾人相信在未來的職務上從事之預見角色之性格的態度。在缺乏理論指引和較可靠的科技下，集中在人才甄用情況中的動機重建似乎是明智的，因此，就須集中注意在特定環境中的特殊行爲次序上。此種程序能使研究者解釋得自文字記載之回應者的資料，和涉入程序之其他行爲者的個人聲明。就某種程度來說，此意謂除了近代社會學的方法外，尚須採用史學者或傳記學者的那些方法。

此種人才甄用的動機方法被使用在以色列立法機構的四十五位立法委員的研究上 (Czudnowski, 1972a)，此種方法也介紹最初人才甄用上的職位層次，和作爲過濾變數的人種狀態。對於最初政治職位的支配取向展示一種四層次的分配：物質報酬 (M)；地位取向 (S)；表達的意識型態取向 (E) 和權力動機 (P)。高級種族地位的回答者，有百分之八十六包括在 E 和 P 兩個範疇中，低級種族地位的回答者，有百分之七十七在最初人才甄用上，展示 M 和 S 取向。而且，在最初人才甄用上，職位層次顯然與動機模式有關聯：在較低層次上，M 和 S 範疇居優勢；在較高層次上，E 和 P 範疇的準總額爲集中點。這些發現表示在社會經濟層次和最初人才甄用層面間有聯繫，而以反應在每一層面上能提供酬備的特徵爲媒介。

選擇

學徒制和動機是潛在政治候選者的必要條件，透過選擇的過程，潛在候選者才變成政治職位的實際候選人。但是在許多合格者中，誰是潛在的候選者？又如何去辨別呢？這些問題也許歸屬人才甄用程序最重要的階段。在一非正式的階段，不同角色採取不同的希望，以歸屬潛在的候選者資格於不同的個人。有抱負的政治家，讚助團體和人才甄用機構，並不需要同意誰是或不是潛在的候選者。祇在選擇的過程中，誰被考慮提名，並不十分明顯。

愈制度化及選擇過程愈公開，則愈容易決定認同和期待政治人才甄用的潛在來源之選擇上過程和標準。在選擇過程中，政治人才甄用溝通政治和政府制度化的下層結構。下層結構尋常依隨正式之政府結構，威權之層級結構，領域之細部區分，和選舉法規。在下層結構中，候選者的選擇緊跟著所有制度的類型。例如，重要決定非正式地由一羣有影響力者所作成的，而承認較常是過程的形式。美國的初，為一選擇的過程，是發現可觀察類型之唯一例外。

因為派系鬥爭和交涉在選擇上產生結果之後，政黨的團結就必需重建，甄選機構勉強散播反抗失敗的政客所引的反駁資訊。政治學者因此在大部份案子中，受到因遵守結構、機動和若干甄選過程的環境參數，和將甄選結果聯繫到這些觀察上的限制。因為政黨是政治人才甄用最重要的機構，許多詳盡的選擇結構和過程的描述能在政黨的文獻中發現。(Seligman, 1967, 1971) 聯結這些觀察於一般的選擇模式上，亦是在這困難領域中，政治人才甄用學者研究興趣之有系統概念化和敘述。

誠如在上文中所提及的，Seligman 的基本圖示句子，由有關選擇的三個問題所組成。(1) 被准，(2) 依何標準？(3) 透過何機構？理論興趣中心論題之一，也普及於 Seligman 依選擇之討論，橫切至

結構和過程標準，是政黨組織在合格中具有合法性和選擇標準之控制制度。此論題訊息上顯示在黨內結構和政黨體系以及政黨所運作之社會、經濟和文化環境的有關情形。這在 Snowiss (1960) 在芝加哥地區之國會人才甄用和羣體取向之人才甄用研究上有其例證 (Seligman, 1964; Valen, 1966; Czudnowski, 1970a)。

回答圖示句子的第一問題，包容了在政黨利益團體和其他監督或贊成的協會之角色間的區別。利益團體並不能監督候選人。因此參院在人才甄用過程中的政策輸入，他們也提供組織之資源，財政之貢獻和投資，它有能力的提供資源和支持，使他們獲得在選擇過程上之影響，結果政黨能維持控制之程度，是在利益團體和政黨組織以及政治獨立聯結——有效組織和物質的資源增加——羣體的能力影響選擇的過程；然而，不管羣體能行使如此影響，依賴在政黨間理念或社會距離和他們有關係的選擇力量之體系中之更多於一黨。在一非競爭的情境，政黨可能不需要特別由監督的團體提供的支持，而可能寧願一較小的勝利之聯合。

在以色列立法者之研究上，Seligman (1964) 提供一政黨的類型 (typology)，依他們在人才甄用之羣體取向，建立政黨尋求或能追求的支持架構。他區別較少羣體取向之全民政黨和主要代表不同類型之羣體的多元政黨，和部分化的政黨，其主要僅代表一羣體。在大部分時間反對政府的政黨，Seligman 認為是人民黨；在所有政府之聯合內閣中，中樞之政黨是最多元的。兩個政黨是正統宗教運動中保守和勞工取向的兩部分，前者幾乎連續反對政府，然而後者卻時常支持政府。部分的政黨代表僅一羣體。需要甄用候選人從其羣體之領導者中，以色列「全民」取向所維持的反對黨需要作一解

釋。然而Czudnowski (1970a) 提議在以色列較不競爭的政黨體系下，經濟和職業的利益團體下降至政黨較可能與在統治聯合的內閣，然而，增加這些政黨的多元主義和狹隘性，其反對黨之人才甄用資源，「人民政黨」之反對黨甚至變成較少羣體取向，且增加選擇其候選人，自傳統或理念上屬於此黨者。如此，人才甄用加強中心政黨多元主義和實證主義和反對的僵固性。

另外，選擇之結構標準是集中化對反集中化，在自由的政黨選擇，似乎較接近選舉的體系。在候選人必須由地方或地區選舉的區域，他將傾向於地方或地區政黨組織所甄選。在大多元的選區，政黨提名有比例席次之分配，包含國家政黨之名單，中央政黨組織有較大的影響，即使並非壟斷候選人之選擇性。當選擇歸於地方或地區的分支機構時，不同關係的類型下能在中央總部和地區間。

英國的兩大政黨就結構標準來看也有不同，認同候選人須透過此種結構。在地方性的保守者聯盟中，任何人員都可提出自己的名字，但是，選前遊說類都得不到通過；在勞工黨的選區，祇有一個與該黨有直接聯繫的機構——區委員會，當地的社會主義者社團，或工會——可以支持一位候選人，在選舉之前替提名的候選人籌備競爭是很平常的。因此，候選人甄選多少都被被這類有關組織和區委員會所控制。

區別英國兩大黨而與贊助有關的另一種甄選情形是競選費用。保守黨自一九四九年改革以來，已使甄選與財務贊助分立，以便阻止「販賣席次」，他們對候選人指定最低限額的捐助標準。然而，勞工黨部公開表示有襄助能力的工會或相關團體負擔大量競選費用，和捐贈地方黨部基金會。兩黨間此種差別也許是事實的結果，直到勞工黨在蓋茨基爾 (Hugh Gaitskell)、特別是威爾遜 (Harold

Wilson) 領導之下擴張了社會基礎爲止，勞工黨和保守黨才經地區性社會層階中汲取選舉和財務的支持，此種社會階層在其提供對黨之財務需要上，依賴個人爲基礎，勝於組織爲基礎，則有相當大的差異。

美國政黨之異質性和鬆弛的關係，加上作爲甄選方法之公開初選，也在導致正式甄選的程序策略上反映出來。(Seligman, 1961) 對奧勒岡州四個地區的州下院之候選人甄選的研究，是甄選類型和黨結構間關係之第一次經驗性調查。假設地區競爭是歸結甄選程序的主要變項，Seligman 比較了一個民主黨佔優勢的地區，和一個共和黨佔優勢的地區，以及兩個競爭的地區，發現黨在一九五八年初選時教唆和支持候選人上的下述干擾模式。(1) 在多數黨穩操勝券的地區，黨官很少從事甄選候選人的活動，各種團體和個人都不自由提名候選人。然而，此種不活動情形來自大多數在職的人員再度出馬的結果。在民主黨穩操勝券的地區，派閥主義較在共和黨穩操勝券的地區扮演著更爲重要的角色。(2) 在多數黨穩操勝券地區的小黨，就必需招募候選人，人才甄選完全集中在黨的手裏。(3) 在競爭性的地區，候選人「市場」是開放的，在提名和支助候選人資格上，派系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地區競爭並不會帶給黨較大的團結或人才甄用的集中。因此，雖然，在民主黨人中，較常依賴由黨提出的人才甄用方式，和共和黨候選人甄選中，利益團體和其他聯盟有較大的干涉，集中制祇在多數黨佔優勢的地區中之少數黨中才盛行。

派特生和鮑恩頓(一九六九年)以探詢郡黨主席(九十人)、立法者(一百八十一人)、遊說者(九十九人)和「關心選舉的選民」：此即在立法者選舉區政治積極層階(四百八十四人)間人才甄

用目的之人際接觸，而蒐集了愛奧華州甄選過程的資料。黨領導報告了「由有潛力的候選人頻頻接觸」和「可能的候選人」兩者的最高頻率，但是，有半數「關心選舉的選民」也報告了在這些接觸上相當份量的參與。立法者肯定，競選州立法機構之初期和中期候選資格在積極層次中造成一片大亂。他們報告，與他們接觸準備競選的人有當地商人（百分之五十八）、郡黨主席（百分之五十六），前立法者（百分之四十五），地方官員（百分之四十三）。在這一序列遊說者人數非常少。商人和地方報紙的發行人與共和黨人的接觸，則要多過與民主黨人的接觸。

一般而言，都市的黨領袖在人才甄用上較鄉村的黨主席更要涉入。但是愛奧華州鄉村的黨主席——除了穩操勝券者為例外而外——在甄選候選人方面，比起都市來要用力得多，對地區性競爭的控制上顯示，在競爭性地區，報導了由黨領袖、立法者和注意選舉的選民所作的許多人才甄選活動。然而，民主黨的黨領袖報告說，在大部份民主黨地區，人才甄選活動十分高漲，因此與 Seigman 在奧勒岡州的發現就矛盾了。

就國會候選人甄選來說，並沒有類似可用的資料。一九四九年和一九六七年間，美國衆院代表職歷歷程之研究顯示，大約有三分之二的衆議員至少曾擔任過州或地方黨部的一個重要的政治職位，大約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衆議員佔有過兩個職位（Mezey, 1970）。此一資料並不包括失敗的候選人在內。先前在州或地方上所佔有的職位也許是由黨支持和自願出馬之有潛力的國會候選人提供了一個分離點。有百分之三十六的國會議員以前沒有擔任過公職，但是，Mezey 並沒有說他們是否出任過重要的黨職位；誠如這一研究所指出的，他們未必是沒有經驗的業餘從政者。這一點業已由費雪（Fishel,

1973) 最近所出版一九六四年國會挑戰者研究上得到證明。在這羣挑戰者中，有百分之六十二的民主黨員，和百分之七十的共和黨員在全國性、州或地方黨部擔承過黨職位。先前的公職經驗所佔比例不高：民主黨員約百分之五十，共和黨員百分之四十 (Fisher, 1973, p. 50)。

有潛力的政治候選人之合法性標準，比候選人選擇之標準較常被研究。巴博 (1965) 在康奈狄克州立法者中「勉強者」、「旁觀者」、「登廣告者」和「立法者」數個典型範例之選擇過程之研究，提出某些在人才甄用情況之選擇標準的見解。這情況是藉環境之特性和獲勝之或然率而描述的。「勉強者」來自鄉下小城，其社會角色重疊，而社會接觸面狹小且連續的。政治性並不嚴重；在個人間之選擇而非在政黨或羣體，「有足夠之獎賞給每一個人」。在職者時常被重選，而當他們退休後，也時常選擇其繼承者，主要選擇的標準似乎是避免衝突：候選者在一生中最大部分居住於城市，捲入許多社會角色，為人所熟知。「勉強者」是長者或退休的人，了解政治「有機會展示他們仍是重要的。」「旁觀者」時常甄選自中型城鎮。在少數黨中，他們是政黨委員會的委員，輪流提名他們不希望贏取的不同職位，除非他們發現自一較高職位之競爭對他們有利。多數黨尋求之候選人，「不僅要競爭而且還要服務」。「退休的在職者」傾向於選擇一候選人他認為「安全、友誼、不可說服的人」。他可能「缺乏競爭性政治領導才幹」且「長期在有用、小心、機智和忠實」上著力。一般不熱衷政治和沒有野心的人，常被成爲一位內行人的榮耀所迷惑。

「登廣告者」主要甄用自中型和大型城鎮，選擇的標準不是補滿選票，而是在擴張和政治競爭之社區中增強選票。因此，以特別訓練或成就來提高一位相當有社會經濟地位之人之優越性。

最後，「立法律者」，也自中型和大城鎮中，優先甄用的人才，與「登廣告者」分享社會經濟的許多特性。黨派的環境是競爭性的，當兩黨提名條件良好的候選人時，人才甄選者需要一特別的標準，以增進立法席位的可贏取性。在立法者的實例中，它是一種論題取向：「候選人不僅能處理超級市場拜票活動，也參加鄰里的政治茶會」——候選者在黨內滿足論題取向的參加者日漸增加的需要，他在政治上受到激勵而在市民組織中工作。

巴博的輪廓概述指出，選擇的標準，如同一機會結構的功能，從一環境變化至另一環境。爲了比較性和理論性之通則化目的，選擇分析上的變數是政黨能行使合法性和選擇標準的控制程度。事實上，選擇的策略——互選、徵召、代理（利益團體的代表）。自我選擇——相當好的反映在遞減重要的次序上。政黨控制選擇過程的程度。派特生和鮑恩頓（一九六九年）概念化「人才甄用之文化」，爲一政黨集中化（聯結物質報酬）到自我人才甄用（聯結地位之焦慮和野心）的連續範圍；他們認爲州立法者人才甄用爲混雜的市民文化和各種動機併發症所持性化。

在美國之外，並不舉行初選，政黨完全控制合法性和選擇。當然，他們並不輕視選舉情況之刺激，即使某些英國選區，勞工黨並不像一九六四年美國對高華德之支持者所宣稱：「一位真正信仰者的失敗，也要好過一位不可知論者的勝利」（Raney, 1965）。意識型態事實上是依據明示之選擇原則，區分勞工黨和保守黨的少數標準之一。勞工黨全國執委會否決某些左翼候選人，但是，如果候選人已給予黨或贊助之組織實質服務，地方黨部和贊助之工會似乎就不太關心候選人就當時問題之「正確」觀點了。不像保守黨、勞工黨考慮對黨之服務和忠誠爲主要的甄選標準，也許僅次於對人的「人

格」，即使可慾的人格之正確意義似乎是因時因地而異的。迥異於普遍所主張的假設，Raney相信，勞工黨和保守黨的地方工作者「選擇他們認為比自己還要適合的候選人，因為他們受較高的教育，具有能使他們在民衆眼中更能代表黨的技巧和風度。因為他們……知道，他們要選的是黨的領導人。」就以英國國會和黨體制之本質來說，好像這些甄選標準，在英國的黨制上，要比在美國鬆散的政黨上更爲典型一點。

雖然，英國政黨的甄選過程，將最後責任指派給有份量的大組織，●而並非少數積極人士，和被選的黨官，參與甄選程序。自由派估計，經常參與黨活動保守派黨員的比例在百分之三和七之間，勞工管理委員會正式會員資格則由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地方黨部成員所組成，但是，祇有小部份代表參加候選人甄選和投票。他們的會議決不像市政主管舉行的秘密會議那樣秘密，證據明白地確定，不管甄選機構如何集會和決定，依據層階控制，抑或依據廣泛的標準，祇有一小撮黨官和經常的工作者參與候選人甄選的最後假設。

① 地方保守黨組織，所有會員的會議，和地方工黨的總管理委員會，僅屬於國家執行委員會的承認。

延續服務似乎是政治分工上先天性功能分工的要求，但是，祇有少數人能夠或注意到滿足此種需要。一個黨的社會基礎和意理取向決定，此小部份工作者，縱非選區的全部成分，也是大部份的代表性成份，抑或一特定層階或利益團體的聯合。①然而，縱使在這一小撮工作者中，全天候，或不斷工作的黨員在控制甄選過程上，較臨時性工作，處在較爲優越的地位上。由於鬆散的中產階級之黨組

織，比社會主義或馬克斯派的勞工黨，所擁有的全天候專業政客要少，美國保守黨的地方聯盟的黨主席，或德國基民聯盟區主席，在甄選程序上，較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民黨的類似組織，也許擁有較大的個人影響力。不過，若以下院和西德的聯邦會議之黨紀來說，此種在甄選方式上的差異也許並不重要。兩黨間看起來有些不同的則是有關黨際關係的，以別於獲得或維持外圍團體支持之利益（Beyme, 1971）。

● Ranney 最近指出，甚至（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六八年間）美國總統初選上，選民平均投票率為百分之二十七，接下去的大選的投票率為百分之六十二，在他作詳細調查的兩個州——新罕布什州和威斯康辛州——中，黨認同的初選參與者，在社會經濟層次和其他代表性手段之數目上，與其不參與的黨派同志，有相當小的差異。參閱 Austin Ranney 的 "Turnout and representation in a presidential primary elec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 (1972): 21-37。

少數有系統探討甄選標準的研究之一，是瓦倫一九五七年在挪威西南 Savanger 地區訪談一百四十九位地方之黨領導者。問及何種條件是被提名至政黨名單之要件時，不同政黨的領導者，表示了不同的偏好。所有保守或大多數的中央政黨之領導者時常提到候選者政治和專業的競爭力和分辨力，但僅百分之六十的自由黨人和基督教人民黨的領袖，以及僅百分之四十一的工黨領袖與有同感。道德的要件，諸如誠實和可靠性，僅被自由黨所強調，而勞工黨領袖比其他黨的領袖更時常提到對黨的忠實和經驗。這似乎是所有歐洲勞工黨的特性。僅基督教人民黨和中央政黨提到被提名者的羣體取向之

代表性。然而，當要求領導者解釋在他們各自的名單中五位最上層的候選人爲何被選擇時，所有政黨第二個最常見的反應是代表羣體的利益。甚至在勞工黨中，堅信和黨的忠實也比羣體利益之代表性要較少提出。這種發現，不應解釋爲相互排斥之標準。羣體代表性，特別是工會，很容易符合政黨忠實和意識型態的委付。

討論德國聯邦共和國的選擇研究上之發現，貝美（一九七一年）提出在下院的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之選擇標準的區分：在基督教民主黨強調羣體代表性，在社會民主黨則強調年輕之年齡羣，在兩黨中，潛在候選人有強烈的地方聯結性（然而在英國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候選人有地方的聯結性）。貝美注意到個人對議會職位的條件和適當性，以作爲選擇標準是附屬的角色，是政黨機構增加權力的結果。職業條件和特權顯然具重要性，因他們能被地方甄選委員會較易辨認和評估。羣體支持是一中心標準；在社會民主黨，羣衆是實際的組織，在基督教民主黨，是功能性的利益團體和聯結政黨的青年運動。在中央政黨的總部，幾乎無任何干預，但地區聯結是獲得提名的工具。強烈的地域主義取向很盛行，地方聯結則是個人和制度兩者。（所有候選人，二分之一在地區被提名者，曾執地方政治職位，而有百分之十九至二十五，曾在州立法機構；邦議會曾擁有過席位，二分之一曾任區黨部主席，連地方黨部主席都沒有擔任過者，似乎就沒有被考慮過）。

此種不像是提昇以慾望或能力在波昂的國會政黨中個人的地方主義取向，祇有在西德聯邦議會的一半議員選自黨名單這一事實範圍內才受到制衡，黨名單補足依據比例代表制而由各黨贏取之區席次數目。少數不在其區內被提名之候選人，在名單上也分配到合理的保障順位。名單除了作爲藉增加

利益團體的代表，或增加鮮有機會在地方上贏取提名機會的婦女名額，以「平衡」選舉之方法外，就該黨的州或全國性統御來說，也是一種安全的設計。這對密切注視西德聯邦共和國雙重選舉制之運作的人才甄用學者是非常有趣的。

吾人早已指出，選舉名單制不與直接的個別候選人資格接合在一起時，在候選人甄選上，有一種甚至更要強烈的團體取向。依據名單制，與其說是個人甄選，毋寧說是職業、人種或候選人其他有關之社會經濟特徵，才是團體合法性之標準。當一個團體成爲合法的代表時，在候選人甄選上就必須適用附加的標準；這些也許是歸屬或成就取向，但是，成就可以指對黨的服務，或對非政治的社區行動和其他高價值活動。社會文化變項就團體的適任性具有不同的意義，個人甄選已展示在以色列低地位移民之人才甄選的研究上（Czudnowski, 1970a）。

近來就甄選結果之代表性的選舉制衝激的研究上，頤德門、史文森和康威爾（一九七〇年）結論稱，若以某類普選之資料來看，儘管結構上有差異，結果卻是類似的。從集體結果的大處著眼，此種評估是十分公正的；經候選人的觀點來看，甄選過程之架構、階段的數目，對行爲者或成份涉入每一階段之可控制程度，便是決定甄選機會和資源之主要變項。然而，吾人應加上考慮中作爲獨立變項之甄選體系導致不重要的理論關係之描述分析。甄選體系服務政治目的；它們因政治目標而採用，而因政治目標而改變。甄選體系的嚴格性本身就是政治上相關的文化變項，應集中注意在人才甄用制上以作爲報酬的指標——或接近報酬分配的途徑——在那些價值系絡上。它們是任何既定政治制度上集體行動的目標。

在地方政府階層之非黨派的政治，主要藉選舉體系之代表性而檢驗。非黨派之選舉傾向於強制投票者集中在個人之資格和個別候選人之憑據，而非在政黨的思路上。結果：非黨派的選舉對於較高的社會經濟階層是利益的。（Prewitt, 1970）在舊金山灣區域的市委員會之人才甄用研究，和普瑞維特和尤勞（1969, 1971）研究資助的效果和選舉系絡在領導者之選舉上是唯一有體系嘗試認同在無政黨環境之選擇的主要模式。這些研究之主要發現已在正文中報告了。剩下來要補充的則是與候選人甄選有關的一些發現，因此，百分之二十五的市委員起先曾指定了他們的職位，幾乎被選的百分之六十和最初被任命的百分之七十二是在成為委員會委員之先是已知的在職者，就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來說，現職的市委員最初在政治上是候選人活動的工具。起先被任命二分之一的議員和百分之四十被選出的市委員曾充任輔助性政府任務的委員。因此，「互選」顯示為在無黨派環境上的主要選擇模式之一。而且，在職者時常不被挑戰，百分之八十起初被任命和起初被選出的在職者常獲連任，缺位時常因自願退休而發生。

任命和互選充當三種不同目的之甄選方法：(1) 確保志氣相同的候選者；(2) 互選意見不同團體之發言人；和(3) 建立聯合。這些目的中，可能有重疊，在舊金山灣地區的少數黑人市委員之一，被任命預先安排之一較好鬥的黑人的選舉。藉限制人才甄用來源在甄用在職者自己之意氣相投的政治活動層次上，任命和互選確保城市政治之連續性。

在黨派環境中，政黨提供學徒制的機會，且執行人才甄用代理人之功能。在舊金山灣地區無黨派的城市政治上，這些功能首先移歸市民組織和輔助政府，其次，在大部分實際上——移歸在職的官職

擁有者。任命和互選如何影響市政府之反應，不能從普瑞維特的研究中推論。但選民支持這些甄選策略就如同市政論題一樣長久，政治不能反映說明非代表性統治精英在相同差異路線上的社區分裂。

### 結論：人才甄用研究可研討之模式

前面就研究發現之複習和討論，釋明了經驗性研究和經驗性創立理論——依然有一些重要的例外——致力於人才甄用過程的不同階段，和預述內向的研究設計之長期和短期觀點之事實。多階段和多變化模式難於操縱，特別是仍在基本理論架構之研究的訓練之次領域上者為然。特定的職歷模式和政黨間人才甄用之差異來源是研究的重要課題；不過，在那些願意和不願意成為政治職務之潛在候選人之間——在政治活動的範疇內——它們不能導致一能區分的理論。利用一種內向研究設計：即於過程完成後開始調查人才甄用之設計，以取代正進行過程之人才甄用，是指向人才甄用過程上嚴格的階段和嚴格的控制團體缺乏指導理論之結果。一種縱的研究設計必然是不切實際的。集中在直接由初期的人才甄用致延續的和全天候的政治情勢上可增加可研究性，而沒有人格因素和先前社會化輸入之任何損失 (Czudnowski, 1970b; Beyrne, 1971)。

政治候選人並非甄選自芸芸衆生的。「學徒制地位」的概念組合兩種變項：一為分享政治職位之角色素描調和之職業或地位的人格架構；一為由毗鄰政治決策中心和控制人才甄用相關資源兩者而表徵特徵之社會架構上的空位。因此，人才甄用理論的主要任務似乎是人才甄用相關之學徒制地位的認

同。當然，這些地位因制度或文化而變化；因此，此一理論的角色是斷言和展示跨體系上學徒制地位的普通次元，和可能進入側門的種種條件。

(1) 當人格架構是政治的功能；(2) 當社會地位是人才甄用的相關要素；(3) 當政治是人格和社會的顯著特徵時，政治人才甄用似乎更容易發生。此一人才甄用理論圖示句子反映三種觀點間的明顯區別，但是，就關於依附間或彼此的獨立上並沒有作成任何假設。就人才甄用之研究和理論尋求分離點之經驗取向之學者就會自問二三種參考架構中的那一種構架，已作成較進步的經驗性理論呢？那一種構架更易於研究呢？在寫作時，若以其本身為一種研究可達到結果之經驗科學的社會心理學之急遽發展來看，毫無疑問，對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社會地位。社會地位的政治人才甄用適應性尚未受到經驗性調查；所能垂手可得的祇是政客先前職業的集體資料，理論則集中在社會層化系統或技巧上。上述的圖示句子，「社會地位」指涉社會心理學的側影，而並不排在教育、收入或地位的傳統等級之一上面。職業社會學已顯示了某些角色側影的特徵，事實上是與地位或收入層階上的較高序列有關聯，但是，角色側影自身與人才甄用理論較為相關。在近代的多元社會，政客是「表情階層」的一份子——他的角色側影包括與人交談的能力，和抽象觀念或資料，以及操縱複雜情勢的能力。因此，政客類皆甄選自與這些要求相襯而有社會心理學的側影之社會地位。

有許多職業角色具有類似的社會心理學側影，但是，其中某些職業角色較其他一些角色要求更多的專門化。Mitscherlich (1967) 主張「真正的近代權威形式是專家權威形式」的理論。政客的角色側影是專家的角色側影嗎？隨著政府在許多生命領域日趨成長的干涉，專家——例如，在經濟或管

理領域內——就越來越接近政治生活是千真萬確的。然而，管理的例子表示，專門化和複雜性是兩個不同的層次：管理理論與實務幾乎適用到組織的每一領域。複雜與簡陋對立，專門或特定則與通稱對立。專門——通稱層次並非柏森斯的特殊——擴散變項；通稱取向意味數種特定態度或範疇的綜合，反之，擴散意味特定範疇的缺乏。社會和職業分化的過程是關係、需要和問題愈趨複雜的結果，吾人視為一位專家在一實際領域內已爛熟了問題或科技的複雜性是眞的。因此，分化意味複雜的活動。然而，並非每一種複雜的運作都意味分化取向。管理與複雜運作和通稱取向有關。「政治功能存於目標成就的資源之動員和整合上。高度變化和分化的下層結構之整合需要高度複雜的組織。政治角色是此種組織上的統御角色。這些角色的整合觀點說明了通稱取向和涉入運作的複雜性兩者。」(Zandrowski, 1970b) 政治專業化要求依據技巧為標準的分化，但並非目標取向。

處理人和資料，操縱複雜的運作，和把它們隸屬於通則取向能力之標準，已將某些特性引進政治角色社會心理側影的描摩之中，並已減縮甄用政客之類似側影的種種社會地位。此外，另有兩種過濾變項：思想者和作為者間的區分（大多數政治學教授應從「人才甄用相關地位」上排除），和商業（或本質）間的區分，而社會取向甚至更進一步縮小人才甄用的可能資源。

不過，職業角色側影的類似性並非是社會地位人才甄用相關性的充分條件。政治人才甄用的文獻時常在自發者和受贊助之候選人間有區分。認為自發者為一種自己指定的意象就更正確了。Seligman (1961) 不久前指出，「除極少的例外而外，候選人進入初選，是一種集團企業。更通俗的說，所謂自我發生的企業家式之候選人擁有一個社會關係組織。他時常激勵此一組織的某些成員，但是，

他倚重他們的支持以促進他的政治理想。」人才甄用理論假定候選人職位起源自溝通網上的中央聯繫地位 (Czudnowski, 1970b, Beyme, 1971)。溝通和組織研究在許多年前表示，溝通網上的中央定位事實上便於統御角色的履行 (Bavelas, 1951; Berkowitz, 1965; Glanzer and Glaser, 1965)。在組織研究上，「傳統上注意力集中在組織內涉入權威關係運作的溝通網」(Guelzkow, 1965)。因為，最初候選資格的分析幾乎不變地導回到一個可辨認的相關小團體，因此，小團體中便於統御權出現的條件，密切地聯繫在大社會中政治人才甄用的結構需求上。當最初之人才甄用在高層次職位上發生時，在非政治角色上，先前在大眾媒體上的曝露時常是核心支持團體的功能性對等體（亦即：軍事統帥、名演員或作家）。

「溝通網上的主要聯繫位置」可界定為一個涉入控制訊息流佈之某程度的位置。訊息控制通常為影響資源，未必暗示權力、權威或統御。不過，它是社會統御關係發展上的一種結構功能的協調劑。● 政治人才甄用上此種主要聯繫位置的相關性，溯源自對政治權威或統御的主張可以從聯繫位置，或從社會統御位置上出現的事實，此一事實通常與溝通網上的聯繫位置有關聯。「不能對社會統御提出主張，並且與主要的聯繫的社會權力，不像被用為對政治權威提出主張的一種表示基礎」(Czudnowski, 1970b)。

● 與政治上連接地位有關聯的相關利益之一些證據，已由 Marvick (1976) 提出。使用政黨的溝通模式，Marvick 描述了印度在一九六七年大選中，「遙遠的」上層梯次和地方「外圍」活動者間，訊息傳遞和解

釋中，主要聯繫人物之角色。Marwick 也報告，依據大學教育、專業、公共官職和全天候黨職務為標準，聯繫幹部對「遙遠的」上層梯次有一致性的優勢，而對「外圍」的活動者，甚至更是如此。

這些社會地位人才甄用相關性的調查表示，人才甄用理論圖示句子上之陳述(b)就研究和理論提供了堅實的依據，此種依據可導致有關(a)和(c)陳述的理論命題。參與層次（亦即，政黨的活動）不僅使政治的人格和社會需要——陳述(c)聯繫到陳述(b)結構參數上，而且，也為有潛力的政治候選人觀察焦點之人才甄用研究設計上，有經驗團體之運作定義，提供了額外的過濾變項。同理，此類經驗性團體，可與角色側影和社會地位匹敵，卻包含政治上非涉入個人的控制團體比擬，以便探究人格結構上的差異。

此種個體理論取向研究的發現和類化，可能整合入允許環境或機會結構變項的模式：競爭性、政黨結構和政黨體系，以及穩定和危機甄用的對抗。危機甄用研究，諸如 Dogan 對法國於二次世界大戰抵制人才甄用效果的展示，戴高樂於一九六二年的立法機構候選人資格的狂熱衝激 (Dogan, 1961, 1965), Legs (1969) 對希臘的人才甄用研究，和 Lutz (1968) 就東德精英轉化的資料，便是流行的政治常模上有關人才甄用資源展示不連貫效果的集體分析之例子。此種不連貫可以影響人才甄用之動機和結構功能之優先性，是一個在缺乏甄用和選擇的個體理論下，不能回答的問題。因此，此種個體理論的發展，是甄用研究日程上的第一要務，而此一可研究的模式在本章的結論中描述了。

## 參考書目

- Adelson, Joseph, and Robert P. O'Neil (1966). "Growth of political ideas in adolescenc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295-306.
- Almond, Gabriel A. (1960).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Gabriel A. Almond and James S. Coleman (eds.), *The Politics of the Developing Are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65).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to political systems." *World Politics* 17:183-214.
- Althoff, Phillip, and Samuel C. Patterson (1966). "Political activism in a rural county."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0:37-51.
- Barber, James D. (1965). *The Lawmaker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72). *The Presidential Characte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Barth, Ernest, and Baha Abu-Laban (1959).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Negro sub-communi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4:69-76.
- Bavelas, A. (1951). "Communication patterns in task-oriented groups." In Dantiel Lerner and Harold D. Lasswell (eds.), *The Policy Sciences*.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rkowitz, L. (1965). "Personality and group position." In A. P. Hare, E. F. Borgatta, and R. F. Bales (eds.), *Small Groups*. New York: Knopf.
- Berrington, H. B., and S. E. Finer (1967). "United Kingdom: the House of Commons." In *Decisions and Decision-Makers in the Modern State*. Paris: UNESCO.
- Beyme, Klaus von (1971). *Die Politische Elite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unich: Piper.
- Black, Gordon S. (1970). "A theory of professionalization in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865-78.
- \_\_\_\_\_ (1972). "A theory of political ambition: career choices and the role of structural incentiv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6:144-59.
- Bochel, J. M. (1966). "The recruitment of local councillors: a case study." *Political Studies* 14:360-4.
- Bowles, B. Dean (1966). "Local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as a route of recruitment to the state legislature in California and Pennsylvania, 1900-1962."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9:491-503.
- Bowman, Lewis, and G. R. Boynton (1966). "Recruitment patterns among local party officials: a model and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in selected local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0:667-76.
- Boynton, G. R., Samuel C. Patterson, and Ronald D. Hedlund (1969). "The missing link in legislative politics: attentive constituents." *Journal of Politics* 31:700-21.
- Browning, Rufus P. (1968). "The interaction of personality and political system in decisions to run for office: some data and a simulation techniqu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4:93-109.
- Browning, Rufus P., and Herbert Jacob (1964). "Power motivation and the political personalit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8:75-90.
- Bryce, James (1894).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New York: Macmillan.
- Buck, Philip W. (1963). *Amateurs and Professionals in British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ullitt, Stimson (1959). *To Be a Politicia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Clark, Peter B., and James Q. Wilson (1961). "Incentive systems. A theory of organizatio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134-7.

Clubok, Alfred B., Norman M. Wilensky, and Forrest J. Berghorn (1969). "Family relationships. Congressional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31:1035-62.

Cohn-Bendit, Daniel, and Gabriel Cohn-Bendit (1968). *Obsolete Communism: The Left-Wing Alternative*. London: André Deutsch.

Conway, M. Margaret, and Frank B. Feigert (1968). "Motivation, incentive systems, and the political party organiz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1159-73.

Cornwell, Elmer E., Jr. (1960). "Party absorption of ethnic groups: the case of Providence, Rhode Island." *Social Forces* 38:205-10.

Cotter, Cornelius P., and Bernard C. Hennessy (1964). *Politics Without Power*. New York: Atherton Press.

Czudnowski, Moshe M. (1968). "A salience dimension of politics for the study of political cultu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878-88.

\_\_\_\_\_ (1970a). "Legislative recruitment under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in Israel: a model and a case study."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4:216-48.

\_\_\_\_\_ (1970b). "Toward a new research strategy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recruitm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Eighth World Congress, Munich.

\_\_\_\_\_ (1972a). "Sociocultural variables and legislative recruitment." *Comparative Politics* 4:561-87.

\_\_\_\_\_ (1972b). Review of K. Prewitt, *The Recruit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A Study of Citizen Politicia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6.

\_\_\_\_\_ (1975). *Comparing Political Behavior*. Chicago: Aldine-Atherton.

Davies, James C. (1963). *Human Nature and Politics*. New York: Wiley.

DiRenzo, Gordon (1967). *Personality, Power and Politics*.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Dogan, Mattei (1961). "Political ascent in a class society: French deputies 1870-1958." In Dwaine Marvick (ed.), *Political Decision-Maker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_\_\_\_\_ (1965). "Le personnel politique et la personnalité charismatiqu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6:305-24.

\_\_\_\_\_ (1967). "Les flières de la carrière politique en France."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8:468-92.

Dye, Thomas R. (1965). "State legislative politics." In Herbert Jacob and Kenneth Vines (eds.), *Politics in the American States*. Boston: Little, Brown.

Edinger, Lewis J. (1960). "Post-totalitarian leadership: elites in the German Federal Republic."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4:58-82.

Edinger, Lewis J., and Donald D. Searing (1967). "Social background in elite analysis: a methodological inqui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428-45.

Eisenstadt, S. N. (1956).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Glencoe, Ill.: Free Press.

\_\_\_\_\_ (1967). *Israeli Societ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Eldersveld, Samuel J. (1964). *Political Parties. A Behavioral Analysis*. Chicago: Rand McNally.

- Epstein, Leon (1958). *Politics in Wisconsi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_\_\_\_\_ (1967). *Political Parties in Western Democracies*. New York: Praeger.
- Erikson, Erik (1950). *Childhood and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 Eulau, Heinz, William Buchanan, Leroy Ferguson, and John C. Wahlke (1959).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 legislator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88-206.
- Eulau, Heinz, and David Koff (1962).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political career."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5:507-21.
- Eulau, Heinz, and John D. Sprague (1964). *Lawyers in Politic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 Feld, Richard D., and Donald S. Lutz (1972). "Recruitment in the Houston city council." *Journal of Politics* 34:924-33.
- Fiellin, Alan (1967). "Recruitment and legislative role conceptions: a conceptual scheme and a case study."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20: 271-87.
- Fishel, Jeff (1972). "Parliamentary candidates and party professionalism in Western Germany."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25:64-80.
- \_\_\_\_\_ (1973). *Party and Opposition*. New York: McKay.
- Forster, John (1969). "A note on the background of parliamentarians." *Political Science* 21:42-7.
- Frey, Frederick W. (1965). *The Turkish Political Elit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George, Alexander (1968). "Power as a compensatory value for political leader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4:29-49.
- Gerth, H. H., and C. Wright Mills (1958). *From Max Web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lanzer, M., and R. Glaser (1965). "Techniques for the study of group structure and behavior: empirical studies of the effects of structure in small groups." In A. P. Hare, E. F. Borgatta, and R. F. Bales (eds.), *Small Groups*. New York: Knopf.
- Glick, Henry Robert (1966). "Political recruitment in Sarawak: a case study in a new state." *Journal of Politics* 28:81-99.
- Goodman, Jay S., Wayne R. Swanson, and Elmer E. Cornwell (1970). "Political recruitment in four selection systems."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23:92-103.
- Greenstein, Fred I. (1968).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and Free Press.
- \_\_\_\_\_ (1969).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Chicago: Markham.
- \_\_\_\_\_ (1970a).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2n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 \_\_\_\_\_ (1970b). "A note on the ambiguity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definitions, criticisms and strategies of inquiry." *Journal of Politics* 32:969-78.
- \_\_\_\_\_ (1970c). Review of Gordon J. DiRenzo, *Personality, Power and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85:365-8.
- \_\_\_\_\_ (1973). "Political psychology: a pluralistic universe." In Jeanne N. Knutson (ed.),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Guetzkow, Harold (1965). "Communication in organizations." In James March (e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Chicago: Rand McNally.
- Guttsman, W. I. (1963). *The British Political Elite*. New York: Basic Books.

- Hacker, Andrew (1961). "The elected and the anointed: two American eli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539-49.
- Hennessy, B. (1959). "Political and apoliticals: some measurements of personality trait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336-55.
- Herzog, Dietrich (1970). "The structure of elites in post-war German political parties." In *Transactions of the Sixth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Genev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Hess, Stephen (1966). *America's Political Dynastie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Hirshfield, Robert S., Bert E. Swanson, and Blanche D. Blank (1962). "A profile of political activists in Manhattan."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5:489-506.
- Hofstetter, Richard C. (1971). "The amateur politician: a problem in construct validation."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5:31-56.
- Hyman, Herbert (195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Hyneman, Charles S. (1940). "Who makes our law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55:556-81.
- Inglehart, Ronald (1971).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Europe: integrational change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991-1017.
- Ippolito, Dennis S. (1969). "Political perspectives of suburban party leaders."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49:860-15.
- Jacob, Herbert (1962). "Initial recruitment of elected officials in the U.S.—a model." *Journal of Politics* 24:703-16.
- Janowitz, Morris (1954).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political biography." *World Politics* 6:405-12.
- Jewell, Malcolm E., and Samuel C. Patterson (1966).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Keller, Suzanne (1963). *Beyond the Ruling Class. Strategic Elites in Modern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Key, V. O., Jr. (1956). *American State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 Kim, Young C. (1967). "Political recruitment: the case of Japanese prefectural assemblyme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1036-52.
- Kirchheimer, Otto (1950). "The composition of the German Bundestag."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3:590-601.
- Knutson, Jeanne N. (1972). *The Human Basis of the Polity: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Political Man*. Chicago: Aldine-Atherton.
- \_\_\_\_\_ (1973). "Personality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In Jeanne N. Knutson (ed.),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Kornberg, Allan, Joel Smith, and David Bromley (1969).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atterns of Canadian and American party officials: a preliminary report."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64-88.
- Kornberg, Allan, Joel Smith, and Harold D. Clarke (1970). *Semi-Careers In Political Work: The Dilemma of Party Organizations*. Beverly Hills, Cal.: Sage Professional Paper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 Kornberg, Allan, and Norman Thomas (1965). "Th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of national legislative eli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Journal of Politics* 27:761-75.
- Kornberg, Allan, and Hal W. Winsborough (1968). "The recruitment of candidates for the Canadian House of Comm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2:1242-57.
- Ladd, Everett Carl, Jr. (1966). *Negro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the South*.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anger, Walter C. (1972). *The Mind of Adolf Hitler*. New York: Basic Books.

Langner, Thomas S. (1962). "A twenty-two item screening score of psychiatric symptoms indicating impairment." *Journal of Health and Human Behavior* 3:29.

Langton, Kenneth P. (196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aqueur, Walter Z. (1962). *Young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German Youth Move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Lasswell, Harold D. (1930).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printed in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Harold D. Lasswell* (1951).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1948). "The garrison state and specialists on violence." In Harold Lasswell, *The Garrison of Political Behavior*.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 (1954). "The selective effect of personality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Richard Christie and Marie Jahoda (eds.), *Studies in the Scope and Method of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Glencoe, Ill.: Free Press.

Lasswell, Harold D., Daniel Lerner, and C. Easton Rothwell (1952).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ites*.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egg, Keith R. (1969). "Political recruitment and political crises: the case of Greec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527-55.

LeVine, Robert (1963).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lifford Geertz (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Levinson, D. J. (1958). "The relevance of personality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2:3-10.

Linz, Juan J. (1969). "Ecological analysis and survey research." In Mattei Dogan and Stein Rokkan (eds.), *Quantitative Ecolog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1973). "Continuidad y discontinuidad en la élite política española." In *Estudios de Ciencia Política y Sociología*. Madrid (publisher not given).

Linz, Juan J., and Amando de Miguel (1966). "Within-nation differences and comparisons: the eight Spains." In Richard L. Merritt and Stein Rokkan, *Comparing Na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itt, Edgar (1970). *Ethnic Politics in America*. Glenview, Ill.: Scott Foresman.

Loewenberg, Gerhard (1967). *Parliament in the German Political Syste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udz, Peter Christian (1968). *Parteilite im Wandel*. Cologne: Westdeutscher Verlag.

McCloskey, Herbert, Paul J. Hoffmann, and Rosemary O'Hara (1960). "Issue conflict and consensus among party leaders and follower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4:406-29.

McConaughy, John B. (1950). "Certain personality factors of state legislators in South Carol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4:897-903.

Marcus, George E. (1969).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al recruitment." *Journal of Politics* 31:913-31.

Martin, A. W. (1956).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New South Wales, 1856-1900."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2:46-67.

Martin, Robert E. (1953). "The relative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Negro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Negro Education* 22:363-79.

- Marvick, Dwaine (1961). "Introduction: political decision-makers in contrasting milieus." In Dwaine Marvick (ed.), *Political Decision-Maker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_\_\_\_\_ (1968). "Political recruitment and careers."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Macmillan.
- \_\_\_\_\_ (1970). "Party cadres and receptive partisan voters in the 1967 Indian national elections." *Asian Survey* 10:949-66.
- Marvick, Dwaine, and Charles R. Nixon (1961). "Recruitment contrasts in rival campaign groups." In Dwaine Marvick (ed.), *Political Decision-Maker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Maslow, Abraham H. (1970).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2nd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 Row.
- Matthews, Donald R. (1954).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Political Decision-Mak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_\_\_\_\_ (1960). *U.S. Senators and Their Worl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Mayntz, Renate (1961). "Oligarchic problems in a German party district." In Dwaine Marvick (ed.), *Political Decision-Maker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Mezey, Michael L. (1970). "Ambition theory and the office of congressman." *Journal of Politics* 32:563-79.
- Milbrath, Lester W. (1965).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hicago: Rand McNally.
- Miller, William (1951). "American lawyers in business and in politics." *Yale Law Journal* 60:66-76.
- Mills, Charles Wright (1956).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tscherlich, Alexander (1967). "Changing patterns of political authority: a psychiatric interpretation." in Lewis J. Edinger (ed.),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Industrialized Societies*. New York: Wiley.
- Monsma, Stephen V. (1971). "Potential leaders and democratic valu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5:350-7.
- Mosca, Gaetano (1939). *The Ruling Class*. New York: McGraw-Hill. (Translation of Elementi di Scienza Politica, 1896.)
- Nicholson, Norman K. (1972a). "The factional model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5:291-314.
- \_\_\_\_\_ (1972b). "Factionalism and the Indian Council of Ministers."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Political Studies* 10:179-97.
- Olson, Mancur, J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areto, Vilfredo (1935). *The Mind and Society*. London: Jonathan Cape. (Translation of *Trattato di Sociologia Generale*, Florence, 1923.)
- Parsons, Talcott (1959). *The Social System*.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Patterson, Samuel C. (1963). "Characteristics of party leaders."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6:332-52.
- Patterson, Samuel C., and G. R. Boynton (1969). "Legislative recruitment in a civic cultur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50:243-63.
- Payne, James L. (1972). *Incentive Theory and Political Process*. Lexington, Mass.: D. C. Heath.
- Payne, James L., and Oliver H. Woshinsky (1972). "Incentives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orld Politics* 24:518-46.

- Pfautz, Harold W. (1962).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Negro sub-community: a case study and a comparative view." *Phylon* 23:156-66.
- Polsby, Nelson W., and Aaron B. Wildavsky (1971). *Presidential Elections*, 3rd edition. New York: Scribner.
- Pomper, Gerald (1965). "New Jersey county chairmen."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8:186-197.
- Prewitt, Kenneth (1965).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leadership selec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61:91-111.
- \_\_\_\_\_ (1970). *The Recruit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 A Study of Citizen Politicians*.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 Prewitt, Kenneth, and Heinz Eulau (1969). "Political matrix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prolegomenon to a new departure from an old proble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427-41.
- \_\_\_\_\_ (1971). "Social bias in leadership selection, political recruitment and electoral context." *Journal of Politics* 35:293-315.
- Prewitt, Kenneth, Heinz Eulau, and Betty H. Zisk (1966-67).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political rol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0:569-82.
- Pye, Lucian W. (1961). "Pers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deology." In Dwaine Marvick (ed.), *Political Decision-Maker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Quandt, William B. (1970).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ical Elites*. Beverly Hills, Cal.: Sage Professional Paper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 Ranney, Austin (1965). *Pathways to Parliament. Candidate Selection in Britai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Robins, Robert S. (1967). "Political elite formation in rural India." *Journal of Politics* 29:838-60.
- Rogow, Arnold A., and Harold D. Lasswell (1963). *Power, Corruption and Rectitud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Rokeach, Milton (1968). *Beliefs, Attitudes and Value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Rosenberg, Morris (1957). *Occupations and Value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Rosenzweig, Robert M. (1957). "The politician and the career in politic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163-72.
- Rutherford, Brent M. (1966). "Psychopathology, decision-making,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0:387-407.
- Salisbury, Robert H. (1965-66). "The urban party organization member."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9:550-64.
- Sartori, Giovanni (1967). "Members of Parliament." In *Decisions and Decision-Makers in the Modern State*. Paris: UNESCO.
- Scheuch, Erwin K. (1969). "Social context and individual behavior." In Mattei Dogan and Stein Rokkan (eds.), *Quantitative Ecolog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Schlesinger, Joseph A. (1957). "Lawyers and American politics: a clarified view."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6-39.
- \_\_\_\_\_ (1966). *Ambition and Politics*. Chicago: Rand McNally.
- \_\_\_\_\_ (1967). "Political careers and party leadership." In Lewis J. Edinger (ed.),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Industrialized Societies*. New York: Wiley.
- Schwartz, David C. (1969). "Toward a theory of political recruitment."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22:552-71.

- Searing, Donald D. (1969).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elite socializ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471-500.
- Sellgman, Lester G. (1961). "Political recruitment and party structure: a case stud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77-86.
- \_\_\_\_\_ (1964). *Leadership in a New Nation*. New York: Atherton Press.
- \_\_\_\_\_ (1967).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recruitment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Lewis J. Edinger (ed.),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Industrialized Societies*. New York: Wiley.
- \_\_\_\_\_ (1971). *Recruiting Political Elites*. New York: General Learning Press.
- Sharpe, L. J. (1966). "Leadership and representation in local government." *Political Quarterly* 37:149-58.
- Sherif, Muzafer, and Hadley Cantril (1947). *The Psychology of Ego-Involvements*. New York: Wiley.
- Singer, Marshall R. (1964). *The Emerging Elit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Snowiss, Leo M. (1966). "Congressional recruitment and represent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0:627-39.
- Sorauf, Frank J. (1963). *Party and Representation*. New York: Atherton Press.
- Soule, John W., and James W. Clarke (1970). "Amateurs and professionals: a study of delegates to the 1968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4:868-98.
- Tucker, Robert C. (1965). "The dictator and totalitarianism." *World Politics* 17:555-83.
- \_\_\_\_\_ (1971). *The Soviet Political Mind*. New York: Norton.
-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1967). *Decisions and Decision-Makers in the Modern State*. Paris: UNESCO.
- Valen, Henry (1966). "The recruitment of parliamentary nominees in Norway."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1:121-66.
- Verba, Sidney (1961).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hlke, John, Heinz Eulau, William Buchanan, and LeRoy Ferguson (1962). *The Legislative System*. New York: Wiley.
- Weber, Max (1921).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 Munich. (See also Gerth and Mills, 1958.)
- Wells, Richard S. (1964). "The legal profession and politic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8:166-90.
- Wilson, James Q. (1960). *Negro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 \_\_\_\_\_ (1962). *The Amateur Democra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olfinger, Raymond E. (1972). "Why political machines have not withered away and other revisionist thoughts." *Journal of Politics* 34:365-98.
- Woodward, Julian L., and Elmo Roper (1950). "Political activity of American citize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4:872-85.
- Zapf, Wolfgang (1966). *Wandlungen der Deutschen Elite*. Munich: Piper.
- Zariski, Raphael (1960). "Party fac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7-51.
- Zeigler, Harmon, and Michael A. Baer (1968). "The recruitment of lobbyists and legislator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493-513.
- Zeller, Belle (1954). *American State Legislatures*. New York: Crowell-Collier.



# 第四章 團體理論

J. David Greenstone 著  
陳 春 因 譯

## 導論：經濟、社會和政治團體

在美國的政治學者中，團體理論的傳統一直是最重要的，歷來都有意要解決在他們的學問中兩個古老的問題。社會關係和經濟活動形成的常模、制度、衝突和政治體系的政策決定至何種範圍？反之，經濟和社會生活所受這些政體特質的影響至何種程度？特別因為有許多傑出的研究，已經認為這種傳統較為一般性，本文特別集中在最有影響力和代表性的五位人物——阿瑟·班特萊（Arthur F. Bentley）、大衛·杜魯門（David B. Truman）、羅伯·道爾（Robert A. Dahl）、格蘭·麥康奈（Grant McConnell）和西奧圖·洛威（Theodore J. Lowi）上。●即使這幾位學者，我們將更集中在三個中心問題上。第一，縱然有時指出他們主張上的不一致，美國的團體理論卻陳示了主要的連續性因素；他們事實上的確形成了一個傳統。第二，在一定的情形下，後來的團體理論學者們，有見於穩定和抑制的政治現實，已變更班特萊的最初程序公式。第三，這批後來的作者，繼續墨守班特萊的基本方法，認同於政治相關團體之方法，以及在穩定性問題上，他們有不同於他的見解，已經使這個傳統不能說明政治、社會和經濟生活的一些——雖然不是全體——有關性問題了。在討論班特萊的

著作和他的門生之前，我們願用簡賅的文字，勾勒一下這些論點。

- ① 就這一團體理論傳統的發展，有過許多十分不同觀點之一般性討論。其中請閱 Dowling (1960); Golembiewski (1960); Hagan (1958); MacKenzie (1955); Monypenny (1954); Rothman (1960) and Truman (1960)。在這篇論文中，則選擇集中在五位作者上，正因為這些分析事實上至少涵蓋了一九五〇年代的一般性範疇。

連續性因素：政治利益團體和特定的政策目標

對某些問題，在團體理論學者中已產生尖銳的分歧。這一點有時被忽略了，例如，道爾較杜魯門、麥康奈或洛威顯然更不強調有組織的團體，關於這一點，他與班特萊最為相似。唯為一般所公認的，這五位作者和許多其他的人，關於他們的主觀事物之倫理狀態，彼此間時常不一致。對某些人來說，主要是杜魯門和道爾，在新哈芬 (New Haven) 的工作上，政治利益團體的活動，縱使不是必要的，至少似與美國政治的健全性是相容的，對其他人來說，諸如麥康奈和洛威，利益團體的行爲，時常惡毒地破壞了自由民主的至高理念。然而，這個問題顯然比常模較少經驗性；由各方所列舉的事實和觀察，並未遭受到尋常的責難。②

- ② 有些當代的觀察者指稱，這些倫理上的不協議較其在開始出現時更要受到限制，至少與一九六〇年代後期再出現的那些美國社會的激進或社會主義的批評者比較時是如此。雖然，筆者同意這些批評的部份意見，本文

的重點意在指出其所充份主張的地方，和它所遺漏的地方。參閱 Balbus (1971); Haupt and Leibfried (1972), and Balbus (1972)。

當作一份學術事業考慮時，當然團體理論的傳統，就不能提供自然科學上所共有的嚴格和充分可運作的體系。但是，它卻提供了一份累積的研究資料，此資料已增加了其經濟性命題範圍之特性，其中包括關於團體活動及其描述性情報，和提供或限制特殊利益影響的廣大條件範圍，以及在某些情形，視為整體的利益團體。這些因素包括政府制度的效果，統禦策略和影響，由政治集團常模所賦予之束縛，以及團體本身的官僚層階之重要性。

這種成功的主要因素，必需歸因於西班牙時代一直到現在的團體政治和政治活動的繼續性臆測——最重要的為政治利益團體自身的定義。就團體理論的學者來說，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在尋求與其社會或經濟情勢有關的特定政策目標上，各個由個人形成之特殊的一套努力是可觀察的。誠如郝林 (Herring) 在其有關二十世紀初葉之遊說的經典研究上所着意的，利益團體「得定義為結合在一個共同目標，或以類似利益而聯合成爲一個有組織單元的一羣人」(一九二九年，頁六)。或如班特萊早在二十年前所說的：「……就以它所影響的人羣爲準，更恰當地說，政治生命的要素，……直接堅持(一個政策)的團體，……直接反對這個政策的那些團體，和較間接地參與政策的那些團體——較以私利、理論或理念等說法之任何陳述更爲具體」(一九六七年，頁二〇四)。

對於班特萊，就如同對許多其他的人士，大多數團體的基本關懷便是經濟，夏特奈奈德 (C. B.)

Schattschneider) 在其著名的關稅政治之研究上視之「為當然」，「即在經濟利益和政治行為間有一種聯繫存在」(一九三五年，四)。甚且，此種利益透過團體活動而自顯，團體活動創造了政治衝突和慎思的問題議程，接著影響了隨之而產生的價值之權威分配 (Easton, 1965, 1953)。就稍後的理論看，誠如我們即將瞭解的，涉入政治團體的因果關係是互動的；團體的活動、需求、甚至是優越性本身，都受到政體自身的屬性所影響。但是，縱然這種後期的發展代表班特萊方法的重要修正，它們卻並不困擾依照其成員的態度，特別與一特殊政策問題有關之各種活動為準的政治利益團體之傳統基本定義。

當然，這種政策壓力決不表示美國團體政治的每一經驗性研究之特性。然而，這種政策壓力遠超過本文所考慮的五位作者以外，包括赫林和夏特奚奈特以外的奧特加德 (Odegard, 1938) 著名的排斥酒類同盟的研究 (the famous study of the Anti-Saloon League)；柴格勒 (Zeigler, 1961) 關於作為壓力團體的小商業組織；喀里爾 (Kariel, 1961) 美國政治價值影響有組織經濟利益的政治活動方法之周延性討論；威爾達夫斯基 (Wildavsky, 1962) 公私電力公司之比較研究；和塞茨尼克 (Selznick, 1953) 田納西流域管理局之研究在內。②

② 請參閱 Mahood (1967); Salisbury (1970); Zisk (1969); Kessel, Cole, and Seddig (1970), and Roche and Levy (1964)。就其關係到政治權力的整個多元論者文獻之週延，且經常為卓越的摘要而言，還包括施於壓力團體上相當分量之著作，參閱 McFarland (1969)。

團體理論的前途這種影響並不限於美國。有感於團體理論的方法，一羣對西歐有興趣的美國學者，已顯然領悟到，大多數集中注意在諸如階級和宗教這種較廣社會範疇之歐洲學者，有時在政治權威上的團體影響之微妙情況，已有不充份強調的趨勢。③

③ 就例子而言，請斟酌 Eckstein on Norway (1966), and Britain (1962), Beer (1956 and 1966), La-Polombara (1964), and Lijphart (1968)。團體理論方法也已清楚地影響了由 Almond (1960), and Almond and Powell (1966) 整理的功能主義者比較政治學的觀點，它甚至與由 Schmitter (1971) 典型化的新法人主義者之團體活動觀平行。

在某些方面，如哈茲 (Hartz, 1955, 1964) 所主張者，連續性因素構成了反映美國政治的多元和易變特質之共同政治現實觀——特別是不甚顯著的階級結盟，因此，社會主義團體和工會就相對軟弱。這種論點主張，美國政治已見到不同的政治需求、問題和爭端的困惑體系，這一體系可能因諸如種族、階級、民間資本主義及類似之社會生命安定因素之集中而變得十分彰顯。正因為團體理論的方法，依據個人代表經常在變遷的政策優越上之活動予以個別化，因此，在理解一種變易的策略類型，相對策略以及對變動條件之適應上，這種方法都已有了良好的配備（參閱 Bauer, Poole, and Dexter, 1963）。就其明顯的穩重性而言，聯繫階級和其廣義的社會範疇至這種變動的類型是很困難的。

那末，利益團體的政策，特定觀點部份須依據於它們的美國政治現實之實質上瞭解。照波士

(Polaby) 的話來看，「歸咎於顯然不可避免的任何階級意識類型之階級成員資格的事實是一種錯誤」(一九六三年，頁一一八)。事實上，由於美國社會是「分散成數以百計的特殊小利益團體的一個集合體，……它不僅毫無效率，而且，當階級成員的偏好受到壓制，或時常逐步地……滿足時，就整個階級動員而論，通常也是不必要的」(同前)。或者，如班特萊所主張：「就事實而論，近代社會中的每一案件……不同的利益計劃將不會如此決定，或自我統一於羣衆，猶如成爲一個分類而一勞永逸地解決者然」(一九二七年，頁二〇六)。

這種對特定政策的利益團體之強調，並不必然如所假設般意謂，團體理論學者們，無能處理類如種族、越南，或一九六〇年代生態問題這種激烈或重大的衝突。反之，此處所提出的批評，意在指出，這些團體理論，與如階級或種族這種突然出現的政治抗議有關的永久社會差異，已經遭遇到某種特殊的困難，這種政治抗議與其說僅是改變基本的社會類型，毋寧說是在尋求轉變這些基本的社會類型。報導一次全國性的起訴，否認團體理論學者們能處理任何重要的問題，迅速出現的社會衝突就會誤解自班特萊以來在這種傳統上的發展。

#### 團體理論的傳統：對於其發展的一次概觀

班特萊的方法要點對政府的程序，因此，依其政策目標而論，其在界定團體所堅持的來源便是出現在一個團體、其活動及利益方程式上的矛盾論。實際上，班特萊以一個政治團體來意指其成員所共享的政治活動，此政治活動繼之由其所慾尋求達成之目標——團體的利益來認同(與其他活動有別)。

以多少近似當代的語言來說，每一個團體的成員，依照他們在特定政策上所共享的偏好而結合在一起，這種偏好則由成員的活動或行爲表示出來（活動或行爲尋求穩固政策）。

這一方程式賦予班特萊兩個目的。誠如前文所陳示，它幫助他描述政治程序、戰略、策略的繼續改變，和團體的需求，因此，就在團體自身的特質上表示出來。但是，這一方程式也反映了班特萊對認識論考慮的明白和仔細，這一點使他別於大多數其他團體理論學者們，包括直接由赫林、奧特加德，特別是夏特奈德等人的下一代之經驗性重要工作在內。祇有與杜魯門的政府的程序（The Government Process）連在一起時，整個團體理論傳統上的軸心工作，使得班特萊的認識和分析上的焦點——即一個團體的適當定義的一次廣泛討論和描述之種種方法——才在美國政治學上如一個主要問題般再度出現。

然而，就以他轉變成謹慎來說，杜魯門的論文，也在美國政治現實的團體理論傳統實質瞭解上提供了最周延和系統的改變。因爲，班特萊重復強調活動程序流程的決定性重點，杜魯門則廓然公認那些安定的社會和經濟團體，未必就有連續的政策目標，但是，卻可能會在突然間「干涉」政治。他對政府中政治制度的任務，和對團體自身的正式組織，如相當穩固的重復活動之因素者然，仍然賦予較多的注意，這些因素且形成了團體影響公共政策的努力。實際上，杜魯門導引並有系統地考慮了類型式結構的因素，在他的政治和社會生命的分析之中了。

雖然，道爾、麥康奈和洛威各人在一定重點上俱別於杜魯門，下文的論證正要指出他們每一個人所發展出來的方法，仍然在指出杜魯門與班特萊最初的程序上識見之距離。例如，道爾在接受班特萊

對政治生命變動特質的強調，多少要多過杜魯門。但是，本文則集中重點在他對新哈芬的理論有依據的研究上，道爾檢證團體活動的方法，因活動、目標和政治積極份子的聯盟，和因他們經常追求美國政治團體之常模限制則超過杜魯門。對我們的目標同樣重要的，是他比杜魯門更要吃力地說出較詳盡的條件，這些條件在代表某一確定之公共政策上，也許導致非政治性的社會團體突然轉變為積極。

就麥康奈這一方面來說，何以政治利益團體自爲之特別需求，首先由他們自己組織爲民主的或民主的特質來形成（實際上，在他們內在的統制上，參與的狹窄或廣度），甚至更要強調的，則由每一團體自身的社會或經濟異質上，則遠要比杜魯門爲詳盡。但是，他辯稱，這種異質依次由政治因素所影響，特別是公職官員和政府機關對之回應的選民之廣度和密度上。藉此將重點集中在制度所指涉的每一社會，和經濟團體的選民廣度或狹度上，麥康奈在單一的命題上，形成了偉大的理論上重要的團體行爲變化多端的共同方法。

在某些方面，洛威將這一分析更朝前推進一步。團體的行爲和需求，不祇由政治制度形成其選民的方法，且以公共政策的模式爲條件。這種先前的政府模式，依照洛威（一九六三年，b）著名的權力類型爲準，依次決定了不論爲一種政策，其產出和團體本身的行爲將依據廣義再分佈的政治活動模式，依據高度個別再分佈模式，或依據由大多數有組織團體的研究所強調的統制模式。這些模式一旦建立，洛威相信，它們就變得十分嚴謹和有拘束性，組織不良的政治利益團體可能成爲重大變動的源頭（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一年）。從某一觀點上看，因爲這些社會運動的確有公正特定的態度，洛

威依照它們的政策需求為標準，仍繼續與班特萊的政治性重要團體認同是一致的。不過，在另一意識上，他先充分地明白表示，由班特萊之後的其他團體理論學者所認定，一個充分的團體理論必需斟酌依照社會——經濟術語所界定的團體，事實上的確會干涉而改變政治生命的方法。

#### 團體理論傳統的選擇

雖然，班特萊就關於其方法之適應性，作了十分總結的主張，許多批評家（Rothman, 1960; Weinstein, 1966）已主張，而杜魯門本人（一九六〇年）準備承認，團體理論學者們決不提供一套完整的政治理論。流行的文化和政治常模，政治和經濟制度兩者的特質，社會階級中的傳統關係，宗教和其派別、黨派競爭，和羣集的個人以及團體需求的種種問題，也許都影響或受到政治權力作用所影響，或者，事實上，受到團體自身廣大的特質所影響——此即，不論其為民主的或集權的——這一切之發生，未必涉入政治取向的利益團體直接和可見的參與。

比較言之，雖然自班特萊之後，繼續與政治取向的團體有關的團體理論傳統，主要仍維持這一關於以檢證來表達政治上的經濟和社會的優先方法，然後再協助作成政策決定。我們在本文所關心的，就是這一組問題。因為這一理由，我們將不討論公共政策的研究，公共政策在調查特定單元的相互關係（諸如美國各州），不過，卻不直接檢證如這樣的團體活動（Dye, 1965, 1969; Sharkansky, 1971, 1972; Wolflinger and Field, 1966; Walker, 1969）。事實上，我們將考慮如道爾在近十年中論民主理論的主要著作（一九六七年，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三年），麥康奈對有組織的支持之

強調（一九五三年），和洛威關心行政法體系和聯邦市的關係（一九六九年，第五章和第七章）的論題；唯有如此，他們才有助於闡明造成團體活動的種種限制。縱使集中重點在何以具有類似心智的個人，同意在他們優先權上的作爲，具有經濟取向的集體行爲之理論家們的研究著作（Frolich, Oppenheimer, and Young, 1971；特別是 Olson, 1965），祇有當我們調正某些團體，在作成需求失敗之各種理由時，才會得到考慮，不僅是因為他們的分析在本叢書中已到處受到了查證，而是因為班特萊派的傳統，大批集中在不同的觀點上之故；對各個社會——經濟團體（以各種態度）就它們的成員在政治集體作爲上成功後究竟發生些什麼。

但是，當對杜魯門到洛威的團體理論自身之發展弄清楚了時，有一種不能被視爲與我們目前目標不相關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生命的選擇性觀點之存在：一種與其說是界定政策優越性，毋寧說是界定依據社會或經濟特質爲準之政治性重要團體的方法。正是這種總體性，在單一由古典政治哲學所提供的政治生命周延上，說明視爲主要的成份。在若干情形，一個單一的字彙——民主的、貴族的、寡頭的——可同時分類爲政治團體，統治的社會階階，和個別公民的典型活動。就成功方面來說，這些公式所達成之典雅的分析經濟學，則遠要大過團體理論的學者們所達成的，同時並集中焦點在政治團體上，的確不是班特萊所使用的方法。

不過，這種分類方法，在異質的當代政治上有其重要的限制，在政策和政治活動模式上，各種不同的社會階階和主要改變間的公開衝突，可在不危及或實質地改變團體自身之下發生。然而，一種有最低限度類似性的周延方法，且更適於近代政治而已爲那些依據由其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次文化類型，

以及經濟地位而別於基本社會團體中明爭暗鬥的觀點，爲解釋政治活動的分析師們所採取了。縱使從整個團體來看太分散，以致不能便於用單一的字彙來分類，這種對廣大的社會階層、財產及類似事物的關心，提供了一有限的範疇，用此分類同時討論制度的總層面和廣大的社羣，以及個人的政治行爲之各別層面。因此，就任何既定團體來說，我們一旦正確地認同各別的階級時，我們似乎就會知道，誰是他的政治同盟，和什麼是他們所一致追求的政治目標了。這種方法對於十分不同取向的歐洲學者，諸如托克維爾 (Tocqueville)、貝哲荷 (Bagehot)、狄斯累利、布萊斯 (Bryce) 以及一羣馬克斯主義者的信徒，具有很明顯的吸引力。他們的許多說明，在闡明美國和歐洲的政治生命上具有持久的價值。同理，至少由於階級是經濟和社會範疇的一種產物，階級分析在說明社會和經濟對政治生命的影響上，提供了一條選擇的途徑。的確，一位目光炯炯的英國學者 (MacKenzie, 1955) 曾主張，美國論團體政治之上乘著作，已經查證過諸如農民、工人或商人的社會和經濟團體，這種團體依據尋常的政治論述，作了廣汎的定義，而非由特定的政治目標所指定。⑤

⑤ 例子，請參閱 Key (1964), Lubell (1956), Wilson (1960)。

然而，至少在美國方面來看，公民太受與他們有關的許多複雜都市工業社會中社會狀態的和角色的種種政策所影響，以致不能充份被這種廣大的社會範疇所涵蓋是很清楚的。換言之，個人的社會地位已變得愈來愈少成爲他(她)的政治態度和活動的一定指標。例如，杜魯門和麥康奈這些團體理論學者們，的確在這些如商人、農民和工人的一般性——經濟定義——的題目上考慮政治影響的團體。

不過，他們的著作通常集中在正式組織上，在這些範疇中的某些個人是屬於正式組織的，但是，這些組織足以聯合起來在特定的政策提案上，採取相當明顯的立場。

本文所考慮的四位班特萊派後期的團體理論學者，當然也都已承認，在某些問題的某些觀點上，依照社會和經濟範疇，而不涉入他們正式組織為準而指定的團體，事實上能影響——實際是干涉——政治的生命。但是，以折衷的態度，承認這種方法，對團體理論方法選擇之部份正當性，依次引起兩種方法間適當界定的問題。首先，可觀察案件在那一種類型上，才是一種不充份的團體理論方法呢？換言之，我們必須從何處著手，超越政治利益團體，而觀察那些也影響政策的制訂者，事實上，是政治利益團體自身活動之廣大社會範疇呢？雖然，這些問題的確太複雜而不能在本文內充分解決，卻儘可能以尖銳的筆觸，來鋪陳這個問題，使這個問題依照政策取向的標準，來劃分團體理論的團體認同和方法，這種方法以階級、財產、種族或其他依社會——經濟屬性為標準而認同團體，對結束這一導論式的討論也許是很有用的。

### 團體理論和社會——經濟團體的問題

這兩種方法間的基本問題，可概以如何定出政治團體的利益標準來述明之，亦即，作為估計任何既定政策問題的社會和經濟影響力的經驗性程序。一方面，主要的團體理論方法在調查那些特定政策上積極活動的個人，並在他的政策優先權之基礎上分割出來。以此方法接著觀察在每一種包括勝敗雙方參與者之社會和經濟特質。例如，假設石油公司在某一既定的問題上支配決勝的聯盟，而石油消費者

在失敗者中就佔了絕大多數，經濟地位和石油公司的權力，可以說成爲這一情勢上已經形成了公共政策。然而，就原則上來說，這種方法與這一問題上積極參與者中每一政策取向的派系之幸福比起來，每一分母爲一切可觀察的積極之個人，而每一分子實爲支持一特定政策選項的數字。

誠如班特萊自己所瞭解的，這種過程並不消除觀察者集合個別參與者的需要，相反的，所有就問題上的那些積極活動，都被觀察者基於他們的優先權基礎而分割了。然而，誠如我們要瞭解的，班特萊時時表現對這種認同之利益團體的方法之偏好，是因爲這個分數式的分子（那些偏愛一既定政策選項的人）和分母（參與者之總人數）兩者是以參與者可觀察行爲爲基礎的。關於誰應是積極行爲的觀察者之期望，和他們的團體之忠誠參與者自己口頭上主張之聯合，他們拒絕之，蓋此兩者可能會帶來危險的誤導。

然而，也許在若干情形上，這種團體理論的方法導致了未決的結果。例如，考慮作爲社會改革的提案，由依照高所得的若干累進稅作爲給付。如依照可見的政治活動來衡量，這種改革就會遭到如大亨這種小團體的多數，和計時受僱人員這種龐大的團體的少數兩者之激烈反對。（在這種假設的情勢上，倡議者自認是中產階級之人道主義者）。就以整個社會中佔相當龐大數字的受僱人員來說，他們在決勝的聯盟中遠多過僱主是可能的。在那種情形，作爲估計社會經濟影響的團體理論之方法，就會指出該提案由一個受僱人員所支配的團體所擊敗，或者，在最好的情形下，社會——經濟的影響不能作出清楚的決定。

避免這種具有直覺上不能滿足的結論之方法，旨在辯稱，由於這種政策顯然仍有利於工人們，而

徵收僱主們的累進稅，僱主的經濟利益事實上是由結果提供滿足，因此他們是勝利的。這種客觀的利益因為要求觀察者主張，受僱人縱然大多數正好是政治上積極反對這種政策的人，都從這種政策上獲益，已為許多團體理論學者所拒斥。不過，事實上，一個強調社會階級，甚或（完全以經濟來定義的）職業團體的方法，提出另一種也許更要率直，且以經驗為基礎的方法，開始作為說明這一類的情勢之用。就在適才所考慮過的假定情形上，積極反對這一政策的僱主，所佔全國僱主的比例，則較具有類似心智狀態的計時受僱人的相關比例要大。事實上，有助於造成由這種團體理論的方法所產生的結果，在直覺上竟如此不可接受，便是很明顯的考慮。但是，這同一考慮也導致認同政治相關團體的一種極其不同的方法，以便評估在一既定政策問題上的社會經濟的影響。至少在原則上，它產生了一道分數式，其分子是由偏愛這種政策的政治性積極之受僱人員所組成（或者，在某些情形，積極地偏愛人數少於積極地反對之人數），而其分母是社會上計時受僱者的總人數。

然則，一個社會經濟影響指標包括估計那一類社會或經濟團體，就關於其全部會員人數，成功地偏好或反對某一政策上，是很積極的。觀察者又重組了相關的個體——在這種情形，積極和不積極是一樣的——但是，依據經濟的或社會的特質觀點，則是與政治活動無關的。當與團體理論學者之方法比較時，此種方法在那些有許多先前不作為的團體成員——亦即與我們的社會改革提案有關的按時計酬工作者——在支持該方法上突然變得十分積極的情形，都已變得十分具吸引力。筆者要在本文的結尾主張，在該提案之命運的社會和經濟影響模式上討論這種決定性的改變，而不說到該相關的社會——經濟團體的政治上積極比例，事實上，早就已經增加的情形，似乎不是充分滿足的方法。

但是，觀察者憑藉什麼權利挑選按時計酬的受僱人爲相關團體——以使積極工作者的的人數爲相關分數式的分子，而工人總人數爲分母呢？的確，我們可以觀察到，這些受僱人都具有一個或以上的經濟特徵，亦即計時給付。但是，另有一些同樣可觀察的屬性，諸如宗教、宗教聯盟，種族，性別或由一個特別的公司或製造業者的僱傭關係這類相同關係存在。

正如我們要在這裏強調的，班特萊事實上嚐試對這些改變的問題提出了解決方案，該方法由杜魯門大膽設計，更由道爾竭智盡慮地精細籌劃，且經常由麥康奈和洛威兩人採用。對這種解決方法的述說都太簡賅，這在政治活動上的突然出現，被解釋爲對正常收入提供保障的新努力，這種正常收入以前單獨由社會或經濟活動來保障，但以後可能祇由政府幫助才被保持（或恢復）。這道公式的一大優點是它保存了班特萊的利益觀點；團體成員自己的活動標準維持了挑選一種特定的總體：即按件計時受僱人這種基礎。它們是相關團體，不是因爲觀察者相信，該項提議的政策將有益於他們，而是因爲團體成員自身在私生活中具有積極追求因爲該提案的政策目前受到政治之支持，而保持了相同的好處之故。因此，在尋求特別目標上，團體成員自己的活動，該團體的成員在政治上變積極之前，或之後認同於一個社會——經濟的團體。當然，與基本的團體理論方法分道揚鑠，因此就減至最低的程

度了。

雖然，這道公式的確說明了社會團體在政治上「干涉」的許多重要情形，本文的以後幾節要主張，這道公式沒有說明社會團體的成員，不尋求保護或保存一既定的收益，而是推翻或變更的那種情形：亦即徹底改變先前既存的情勢。正是在這一點上，才是這一論點所要主張的，此即滿足認同相關

的社會——經濟團體，使我們回到一種客觀的利益分析上去，也就是說，依據誰從一特定的政策上獲益的標準來認證團體利益，而不是依照團體成員積極追求之目標為準而決定此種利益。對抗班特萊的知識上批評的這種方法為不可少的精確情勢之一次討論，和該公式可能要防衛的種種方法不得不予延宕，直到本文稍後幾節為止，那時我要簡賅地考慮關鍵性的意識型態和文化立場。

總之，班特萊在依照他們的特定政策需要為準之認證利益團體上，堅持解決可靠估計團體活動的推進力或目標的方法問題，同時誠實地抓到了他有關美國現實觀點為團體複數中的變更過程。然而，後來的團體理論學者們，改變了班特萊程序的現實觀點，而沒有變更他認證政治上相關團體的方法。在下述討論中，筆者的立場首先同意班特萊和後來的團體理論學者們關於（至少是美國）政治現實的多數特質；亦即衝突發生在幾個社會——經濟，事實上，是政治和文化的差異範圍上；其次，同意班特萊的門生堅持一種更要定型和結構的、即較少變動和程序的——政治和社會生活觀點，易言之，即主張政府制度和穩定的社會——經濟團體事實上的事務；而第三，儘量詳盡地指出，班特萊現實觀點上的這種改變，祇有這道公式在我們瞭解所意指的「團體」和「利益」為何有一些改變產生時——這一點後來的作者尚未採用。

### 班特萊政治程序的見解：團體——活動——利益

有少數美國政治學者的著作，如同班特萊的著作（一九六七年）一樣，是屬於屢屢遭到深刻批評

的著作。（參閱 Weinstein, 1962，及其所引之資料：Crick, 1959; Kress, 1970; Hale, 1960; Balbus, 1971; Dowling, 1960）。因此，筆者的目標，儘同情心之所能及，復述班特萊氏準備要做的，而不另附加其他的批評，然後轉移注意到他處理程序之一個重大問題上去，此問題已引起許多近代團體理論之學者，採取了一種更具架構性的正確眼光。

畢竟，班特萊藉減少經濟和社會生活與政治體系間的區別至最少限度，以便解決其間的聯繫問題；易言之，祇考慮那些已經在政治上積極活動的團體，為政治上相關的社會和經濟的集合體。此意謂經濟和社會在政治上的影響是局部的——班特萊認為是一大部份——，關於這一部份，我們觀察的結果，認為是政治上的活動。誠如班特萊本人所說：

如果因我自己的經驗而邀得一點原諒，那末我所要說的是，我在政治上的興趣並不是主要的，但是……我希望從這一（政治的）方法上，獲得對經濟生活的一點較佳之瞭解。（一九六七年，頁，二〇〇）。

缺乏經濟和政治活動上任何明顯的劃分範疇，導致班特萊的這種著明卻矛盾的團體，其活動及利益之方程式，正是此一高度一元論的觀點之所致。

團體——利益——活動方程式

「供研究政府之用的素材，」班特萊認為：「自始至終，且經常是活動，作為『正在著手的事情』，沿著變動不居的線索，有些人避免另一些人的行為，……由一個團體對另一個團體的力量之分散。」此外，這種「素材……實際上所履行的國家立法——行政——裁判諸活動」不是個別的行為，毋寧是各團體所分擔之活動：「團體和團體活動是相等的術語。」同時，「當這一術語使用在本文中的一種利益是一個團體的同義詞……。團體和利益是分不開的。那裏祇有一件事存在，沿著一條確定的路線，以結集了非常多的人在一起」（一九六七年，頁一七五—七六，一八〇，二二二）。政府的程序一書，因此集中二點在尋求集體（即團體）的活動上，而這種活動則由它們所尋求以保障的利益來命名和界說，團體則由其活動來定義，易言之，由其成員所做的事來定義和命名。

這一道團體、活動以及利益的方程式，因為在一般論述上，各團體由其成員自身以口頭來表達忠誠，或如上文所指，由若干對其他諸如職業等甚為重要的屬性之可能認同，故理所當然似乎是矛盾的。換言之，團體時常當作政治上的「落腳處」來提及和思考，所以，團體全體甚或大多數成員，也許就不被約束在一個普通的政治性活動上。政府的程序一書，弄清楚了導致班特萊否認這種較廣義的團體觀點的兩種考慮；第一，作為對繼續變動的程序之政治現實的瞭解，和第二，正確地認同團體，並估計其在政治衝激的知識論上的關注。

### 團體活動為一政治程序

班特萊反對將他的部份政治分析，奠基於如階級等的團體上，正是因為它們經常是如此穩定之緣

故。就他而言，關於當代政治的「真正問題」何以「現在正在作爲的男女，改變他們的行爲方式，並停止去從事他們先前所做之種種」（一九六七年，頁十八）。誠如史密斯（David G. Smith）信誓旦旦地主張的，數十年來，程序在實用主義者和美國政治思想的團體理論傳統兩者上，雖已普及，卻仍爭論不休的一個術語。（並參閱 Kress, 1970; Jacobson, 1964）。雖然，政府的程序一書沒有提供一個清皙簡明的定義，其在政治的流動性和改變上的強調是很清楚的。「活動一直在繼續，行爲便在此發生衝突；於是，意見團體，意見活動就出現了；這些意見團體和活動的消失、自我轉變、組織，反映了許多形式的次要團體，綜合性團體，又變成了嶄新的活動階段。」事實上，由於程序的「根本性」，各種團體「依據其方針自由組合、解散和再組合。」在傳統社會中，階級、種族或種族社羣，也許已經從相當永久的利益或不利益的立場上享受或遭到折磨。但是，至少就美國的情形而言，馬克斯的階級論是「太過僵硬和激烈」（一九六七年，頁二四二，二五九，四二七；並參閱頁四〇四，四二一—二二）。不同的團體情形，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問題上，以及由那些不滿意的人所要攻擊和修正的每一政策，似乎都是很重要的。⑥總之，政治生命顯然就如程序一樣太易變，太意外，太容易特殊化，不能基於正式的權威和政治哲學，作一致的解說或概念化。班特萊因此是屬於摩頓·懷特（Morton White, 1957）非常允當地稱之爲一種「對形式主義反叛之角色。」⑦

⑥ 這種政治現實觀也影響了班特萊對其他學者的估計。例如，他因公式太紮實，因而不採 Goodnow 在科學和行政管理間的著明區分，而堅持「隨時隨地都有行動」（一九六七年，頁三二七）。

⑦ 由於強調美國社會思潮上如此卓越的個別權利，事實上已經滋潤了班特萊和其他學者所攻擊的政治形式主義，班特萊的團體理論方法之反形式主義特質，也許似乎與關於其典型之「美國」分析觀的主張是不一致的。然而，這種就權利的同樣關心，對政治過程的方法也是意氣相投的。主張個別權利任意涉入一肯定的活動，事實上是主張一有關的「非權利」，該「非權利」指述其他的權利將不——否定它們對權利——干涉那種活動的追求。在美國的情形，「非權利」非常公然限制了有限制性的政府權力。這種結果讚同一種活動模型，在這一模型中，沒有一位行為者能合法地迫使其他的人遵照他所期望的情形而產生結果。一種與權力的關係，因此在美國政治思想上醞釀了緊張狀態，可比擬史密斯觀察由過程和社會變遷所制造的緊張，或由 Rogin (1967) 所考慮從工具——道德二分法上所產生的緊張。

這種與程序的關係，也很清楚地與班特萊強調的特定政策之利益團體相容。有多種利益——諸如階級或種族的團體，如果它們在政治上是重要的，且都頗願堅持而非解散，組合和再解散，或在相關部份上消長，因為它們在許多情況中和問題上，都是糾纏不清的。⑧ 然而，班特萊相信，有特定政策的利益團體，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蘊釀蓬勃主張以代表絕大多數個人的團體，就如同班特萊時代的社會主義者，當其「聲稱代表」普天下的「人類團體之活動」或甚至「人類中絕大部份的比例」時，可不認為是「依照支配程序而計算的」。祇有「當我們對內向的特殊社會主義理論而行動時」，他繼續說，那末「我們就得到依照在特徵上有更多限制的團體標準陳述它們的機會」，易言之，社會主義者的「黨就密切地……與仍然更要特定計劃……的行動結合在一起。」然而，就他的每一批評者而言，班特萊決不排斥馬克斯實質上的錯誤，主要卻非難他以集體主義之概念，穩固和含混在實際政治生命

上不甚相關卻處理了「抽象概念」，用來「說明」班特萊的種種並非修辭上的狀況，而是「最直接的實際政策或是計劃」（一九六七年，頁四三七，一三九）。

③ 雖然，若干有限制的利益團體可長時期追求其利益，但問題仍寂然而存，對多元利益團體的強調，幾乎可肯定會導致與其說是我們期待，毋寧說是轉移性的團體模型，更毋寧說是重複的團體模型。

這一相同的現實觀點，如不斷地變更時，也說明了班特萊時常誤解的個人心智特徵，或如「幽靈」似的國家特徵和態度。廣義的意識型態和抽象的性格特徵兩者，可視之為加在一高度變動的政治生命上的一種虛假性安全感——可更要適切地描述為一種層出不窮的程序——每一個人在其中不斷調整其自己的行為，以迎合變動不居的情況。

#### 團體利益和政治研究

導致班特萊的團體——活動——利益方程式的第二個考慮，就是他有關與團體有效的認同，和決定其在政治上之衝激。無論對一個團體或一種政策程序的研究，第一步是認同利益，這些「改變的路線」之方向，有些人就在其中「作避開」另外一些人的「行為」。但是，在採取此種步驟上，班特萊至少暗示了他有意解決由馬克斯派的意識型態說所強調的問題。他承認描述團體活動的許多口頭公式，也許十分曖昧不彰，並非精確地描述和解說。且舉一例以明之，這些由觀察者和參與者雙方所作之描述，便是團體活動自身的部份：「寫作、談話和講演，如同其他任何種種情形，都是活動」（一

九六七年，頁一七六）。事實上，「任何一個意識型態莫不是一種社會活動的反映，」如許多馬克斯主義信徒一般，班特萊特別提到經濟活動。

當然，政治生命的經濟基礎，獲得了充份的承認，雖然，它毋須亦步亦趨，認為「它」……是特定的，甚或在每一細節上都是支配的基礎。（頁二〇九）

將這一點說得更概念化一點，如果個人頗能隨心所欲地選擇其所偏愛的種種政策，解散固有的團體或組織一些新團體，那末，倘若在口頭上誤解其目標是適於他們的目的之便宜措施，或特別的成功之希望時，他們也就在口頭上誤解其目標了。事實上，甚至由於學術分析而理所當然支持的政治或經濟利益，他們就不可能再採取其表面價值，而不顧到政客們的聲明。因為這層理由，班特萊就避開一個團體的措辭，而使用它的活動——在處理其他的團體時，它顯然設法使所要達成的——以之而決定其利益。因此，在他的「團體等級」這一章上，班特萊拒用行為者自己的演說，團體活動的「討論面」，為

理論的一個困境，告誡和冗長激烈的演說夢想、事實和虛構，它的每一點都反映一些它所引起的人類真實世界的一些事情，它幾乎毫無忌憚的自我主張之每一點，都可成為現實宇宙的中  
心。（頁，四三五）

對於他就這種「討論團體」所稱謂之「便宜說明」而言，班特萊就在已經討論過的一節，轉到他那個時代的社會主義上去，這一節也顯示他對取得有效和可信賴的知識之關心。就其最普遍和純粹的理論層面上來說，「如前所述，伴稱代表人類團體活動之社會主義，是可與時間和地點的限制所分開的。」除開這些不很實際的主張，班特萊以活動為基礎的可靠資料：「在進行中調適……的壓力證據上，我們可見到直接涉入在內的團體。」

因為這一理由，班特萊以有特定計劃的社會主義各黨派之一名觀察者的身份，體會到最大的慰藉。在這種情形下，「所呈現的壓力是顯而易見的，且在某程度內，也可作精確的估計。」因為祇有在積極團體的自身水平上，易言之，吾人與作為「銜接」時，我們才發現「反對壓力就非常精確地估計而得了……，而對實際存在之利益的描述是非常逼真的。」班特萊結論稱：「至於如同任何價值一樣，需要一種量器和證明來決定所影響之任何討論的情勢，對其他任何情勢產生或發生影響，則經常成爲一個問題。」（一九六七年，頁四三七，四三八，四三九）

這種對於由個人提供說明其行爲的口頭說明之明白可信性之攻擊，決不導致班特萊拒斥有目標導向的社會行爲之意識型態。事實上，這種意識型態對他的團體利益觀是很重要的，至少在政府的程序一書中是如此。如許多後期的團體理論學者一樣，班特萊事實上不同於無視人類動機的粗俗行爲決定論。例如，他反對集中焦點的性格特徵主要是方法學上的。他主張依據勇敢或吝嗇的觀點對行爲之說明，僅是描述性的無謂重複，因為證據指出，吝嗇的（動機）個人，結果變成行爲者的吝嗇個性，是可以說明的（結果）。「我並未否認，」他堅稱：「一種產生意識型態的素材之正眞活知識……感受

和思想之存在，是我們在說明社會之前所擁有之材料」（一九六七年，頁一六五）。他在政府的程序一書中不斷主張，當正確地使用時，態度和特定的目標是重要的資料。

符合這一目的觀點，班特萊看不出利益歸屬於問題中實際上不能充分承認它們而積極追求目標或利益之個人的價值。雖然，如巴布斯（Balbus, 1971, P. 226-27）所指，班特萊在某一點上，就這一立場反映了若干測不準性，他概括地堅稱，因共享之利益，個人也需要分擔目的。他因此放棄「客觀有用性」的要點，而使用經濟學家的術語……因為，畢竟沒有這樣的「客觀有用性」出現在政治上……這是……一種社會的無效性」（一九六七年，頁二一三）。縱然這樣的有用性，也許有助於後來預測的事情，它們沒有經驗性情況；它們不能被聯繫到實際的——即可觀察的——活動上去。

一位相當聰明的人，如果沉迷於預知之習性上時，也許正確地預知一個活動終將沿著由他認為所發現的若干客觀條件所揭示的方向上所形成。但是，我們可考慮的利益，必須與實際存在的人羣十分接近。（頁二一三，並參考頁二一四，二二七）

起初，班特萊的觀察者不接受強調參與者自己利益之計算（他們的「口頭上公式」）也許與他同樣指出的拒絕允許觀察者自己所建議，而參與者不承認的客觀利益不一致。不過，與我的觀點相得益彰的，是班特萊倡議一種仔細挑選的中間地位，這種地位既不強調參與者主張所要尋找的，也不強調觀察者就關於他們所應尋求的判斷，而是參與者事實上確實追求由他們自己的行為所宣示的目標，

使用具有類似觀點的某些經濟學家更要時髦的術語。當然，他充分承認這樣的行為可能具有的曖昧意義；由分析師來解釋是必要的，但是，這些可能且應當基於「他們的社會結果」之經驗性觀察，亦即，一個團體的活動，在其他一些團體上具有的可觀察之衝激，結果，因為他不能依賴行為者提供適當的意義，他就轉向相關的社會系絡上去。他說：「我們有一個正要去研究的偉大運動程序，而……除了在其他部份的觀點上已作了評價外，陳述任何部份都是不可能的。」因為祇有「當我們把一切團體活動聚攏在一起，並依照各自的標準就全體予以評價時，每每就依照全體的標準來評價」，科學的真理才會出現（一九六七年，頁一八四，一七八，二四三）。

#### 班特萊程序觀之種種困境

如果班特萊依照行為上所宣示的愛好觀點，解釋團體利益之知識論點，沒有遭到後來的團體論學者之直接挑釁，他對政治生命程序上的實質解說之堅持，已出現了難以爭辯的情形，縱然依照他自己著作的觀點來看，他的立場就生物生命的瞭解出現了嚴重的困難，特別關於杜魯門強調之政府制度為然。不可否認的，這個問題多少被班特萊的複雜政府觀所矇蔽。「廣義地說，」班特萊可能以如「一組利益團體的調整程序……沒有任何差異的活動或官能，集中注意力在正所發生的事情上」之完全非制度上術語來界定政府。當然，自比較狹隘的觀點來看，班特萊視政府為「一個有區別的，代表性的團體或一組團體（有機體或一組有機體）」所以，他決不完全忽視制度。結果，雖然由於有機體自身「僅是一種指示特別代表類型的無意義之文字……不是一羣確定的人民，而是一個確定的活動網」，

故制度自身就是綿延不絕的活動部份。的確，班特萊在某一點上將「支配體」的現象與「支配程序」等量齊觀。（一九六七年，頁二六〇，二六一，三〇〇）

換言之，制度祇有在依照透過問題中制度的功能之深厚利益觀點時才有意義。但是，班特萊不斷地說，這種團體利益自身是在不斷地運動的。班特萊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觀察家，不可能全盤忽視制度安定性現象。因此，他承認「……有種種價值類型和……永久等級」的制度，「……這兩種制度（法院和立法院）便是其自身建構最堅固的一些制度……」。然而，這種制度的任何價值；完全依賴於透過它而發生作用的一些壓力。」但是，此種方法，當一切透過它而代表的每一種重要的團體利益，自身是在不斷變動中時，就不能使班特萊解釋如何以四年為期的總統任期能這麼「固定」了（一九六七，頁三〇〇，三〇八，三〇六）。

說得更籠統一點，班特萊似乎因為不重要之故，而已經排斥其目的已有如此經常性成就之重複活動，即團體間的鬥爭，事實上，是團體程序的永久改變和損益，因此，是缺乏的，甚或其相關性極為有限。因此，他縱使說到有關如權力分立，國會委員制，和司法複判制這些社會上支持或反對之特定政策，獨立於社會和經濟團體諸因素的制度上論點之效果，都非常有限。

除了作為程序的期望而外，除了依照透過它而發生功能的深厚利益之觀點而外，統治體自身並無價值，甚至不能適當地被描述出來。因此，它似乎沒有希望如它們自體所抽象地陳述般要去分類這些統治體（頁三〇〇）。

這種過程的假設和可觀察的制度穩定性間的緊張，明顯地導致偶然彎曲的分析：語言本身在這種分析中似乎正瀕臨破裂的邊緣。

現在，如果一套法律自我建立並運作順利……時，事實上，我們就會發現其尋常是自我維持的……。這種似乎漠然的活動，便是一種真正的團體活動，縱然一種利益，一個價值，一種抽象性意含依照其他團體的標準似乎很困難……，這種困難祇有使用在文字中時，才使得它在一般演說中有肯定的價值（頁二九三）。

班特萊在普遍的團體活動之易變性上堅稱，縱然在道爾的政治團體上是很不易運作的困難，也阻礙了他較廣義之討論，依照他的觀點，這些差異不是因禁止若干活動，而是在政治行為上提供穩定限度的共同常規問題；反之，它們是在團體技術上的差異（團體活動類型上的差異），所以，尋求十分類似目標的團體程序，在一定觀點上已包融了暴力而非說服性。因此，依照沙皇時代的俄國之說法，

除了暴力或表現暴力而外，對大多數被壓迫的團體而言，根本就沒有可用的技術。在美國，以其固定的四年總統任期和最高法院……我們有時釀成暴亂，但是，我們依然能在沒有它們的情形下，而計算到正在進行中的相當穩定性（頁三〇六）。

因此，極權制和民主制間的差異，主要是程度問題，正反映了利益所代表的不同方法。

除了直接蹂躪在征服者鐵蹄下的被統治之民衆的情形以外……，統治階級在一定範圍內，便是被統治階級所選擇的（即被接受的）統治者，不僅為其主子，並且也是其代表，而專制君主……是其自己的階級兩者的代表，和對一個弱小而依然是真正被統治階級範圍兩者之代表（頁三一四）。

有關政治態度的這許多觀察，包括寡頭政治，民主政治，或專制君主政治集團的常規性統治，似乎都是十分酷烈的。但是，班特萊在團體對抗團體的衝突上所堅持強調的，就是聯合他的分析符號和關於集團和組織的隱含瞭解上，就沒有留下多少空間，這些都是由不同的團體成員所共享的，而(1)其自身就應獲得說明，和(2)在形成政治行為上，有其自己的獨立效果。④

④ 誠如我們所了解的，班特萊在其潛在活動的考慮到集團的衝突上，此處考慮的效果是繼續的，並且時常涉及已經積極地在追求其自己目標的團體。我們不關心提昇自己至顯然已列入名單的一些不可接受之緊張衝突且又不相關的活動。

也許，最令人感動的，由他極端易變性的程序觀點所產生的種種困難，甚至可適用到班特萊自己的基本分析單位——團體自身——上去。他說：「由一團體成員所產生的異議，也許不能使他拋開這種序列。在某些情況下，它將會，不，它代表他對另一團體的地位之實際轉變。但是，在其他情況下，異議也許是團體立場的一種錯誤表示，而異議者實際上也許是和他假設的敵人在合作上所作之安

排」(頁二二五)。在本節中，由於同一團體的各成員也許並不具有相同的行為所表現之利益，故班特萊的決定性利益、團體和活動的三字訣，至多是在極端壓力之下。因此，如果界定團體的活動自身經常在變動中時，要使政治團體自身成為班特萊所追求的明確單位是很困難的。誠如我們即將明白，後來的團體理論學者所攻擊，且在有意義的範圍內，作了改正的，便是這個基本問題。

結果，班特萊藉與其活動以認同團體，因此，使自己去從事似與政治事實的理性說明矛盾者——至少，對追隨他的團體理論學者重要事實——的政治程序之觀點，以解決他的知識論上之問題。然而，就如本文後述部份所主張的，這同一羣修正班特萊的政治現實程序觀的團體理論學者們，在班特萊小心地避免其政治團體觀點上，就碰到了某些困難。

#### 班特萊的倫理樂觀主義：趨向穩定——分裂——保護模式

至少，毋庸置辯，班特萊就他的團體、利益和活動程序方程式，承認了第二種困難。在一定情形，非政治性團體，那些與有影響力的政策不直接有關的團體，可能變成有政策性，藉認知政策目標，發展出利益。在政府的程序一書中，當班特萊在對他那個時代的美國政治表示其明顯而複雜的倫理態度時，他基本上承認了這種可能性，這種倫理態度自身與他的程序觀是密切接合的。在若干點上，班特萊的倫理地位類似於許多進步的知識份子的觀點，其中的一些知識份子，如同班特萊，在一九二四年是支持拉福賴特的(LaFollette)。當然，與馬克斯主義對照，政府的程序一書沒有討論全球性的歷史哲學，勞働疏離，或資本主義社會程序中無產階級的政治任務。另一方面，班特萊強調經濟

的因素，他依照團體利益為標準的意識型態觀點，和他強調社會系絡為與馬克斯思想的某種情緒平行的政治意含之淵源。然而，由於許多浮濫威脅到與一變動的社會所確定穩固之種種矛盾，班特萊從程序遠景上某些部份攻擊許多已確立的實施方法和制度是毋足訝異的。例如，他在第一章中，挑出工業資本主義的性格特徵，作為對芝加哥肉類包裝業者，依賴於最基本生活費的工資，和使用童工為強迫罷工者復工的措施。

不過，這種對特別浮濫的批評，不會導致班特萊貶斥整個美國社會，因為理論就暗示在他關於政治機構為掠奪者，為「一個富庶——但就現時而言——似乎是毫無希望的國家——之劫掠者的評論上。」這種鳴款，表示美國團體關係的易變性，在美國的團體程序中，將會決定性地產生非馬克斯派結果的樂觀信念。結果，他感到可以依賴「利益的調整」。「協調——不僅在邏輯的意義上，且在實際生活上——是在行動團體交織行為的基本程序之自身。」這種協調會發生，而浮濫會受到限制，部份是因為致勝的團體自我限制之故。誠如班特萊所說：「團體程序的基本本質……便是……當其滿足了生理上的需要時，就會躺下來安靜得如綿羊一般的一隻獅子，不論牠的吼聲多大，他的貪慾卻已得到了滿足」（一九六七年，頁二二九，三七一，二〇五，三五九）。

然而，自我限制在團體際的關係上，還祇是這些調整的一個來源。這種辯正班特萊某種發展的批評之同一易變性，就任何引伸的時期來說，也意指相關的政策決定，甚至由最有權力的行動者，既不可能完全指陳，也不可能預測。這種類型的高程序政治，最後保證了由認可之非利益團體改變此種情勢，使之更近乎平等的結果。注視十年或二十年為期的計劃，他承認

吾人也許很容易就說出，我們有一個趨向於偏愛階級統治的政府。但是……我們有經由政府的溝通途徑，此即，階級趨向在全軍覆沒之前，可能祇向前進至一定的程度（頁三五八）。

理所當然，那些要以這種方法去覆沒一個有非常成就的階級，顯然勢須不牽涉這一初期的鬥爭。誠如班特萊所云：「當鬥爭在任何點上進行太兇猛時，社會上就會出現比較有意要鎮壓此鬥爭的那些團體，更要有權力的一個團體的持續狀態。」（頁四一五）

很顯然，班特萊已相當受到不論由工人或一般大眾所形成的政治上沉默的團體，於政治權威的決定或行為過分不能接受時，出而干涉政治的能力之印象。例如，他評論稱：「利用姑息的歷史……很彰明昭著：一度在法律以外組織的黨如何自己擠進政府機關中去的……，組織的邪惡如何及時激起一個反對它們的團體，我們現在知道這就是民政改革運動。」（頁四一五）

不論一個團體對其他一些團體成就了多少看似永久性的利益，這種在一先前穩定關係上之破裂，會導致透過至少有點平衡的政治抗議，而回復這種關係的相反運動——至少還有點像二世代後的杜魯門所謂之團體關係中的「平衡」作用。班特萊自己的話來看，這種政治活動並不是……我們必需尋找出它們的進步階級上相同範圍內的「證明」、證據，或可觸知的……，它們也許是用「潛在的」這個字來描述之種種活動……。這種趨勢便是活動的本身……，它們是任何其他活動一樣頻繁的活動階級（頁一八四—一八五）。這些觀察祇有當解釋為意指一種社會或經濟團體正要進行的非政治性活動，從政治分析的觀點上看也有潛力時才有意義；易言之，如果這樣的非政治性活動不再有效地追求

時，團體就會轉向政治，然後，活動就變成可感覺了。但是，不論班特萊的此種解釋是否對，它的確描述了後來之團體理論學者們所追求的常規。

充其量，班特萊的立場，因他努力維持活動，可同時觀察的政治上相關性，和僅是潛在且隱晦不彰。因此，就是在分類這一點上，杜魯門對團體理論傳統提出他主要的貢獻之一，便是這種實質的論爭，同時，也就與班特萊的立場在實質上就分道揚鑣了。

### 杜魯門的政府的程序中之組織和制度上的限制

政府的程序一書（一九五三年）被廣泛地視為對一九四〇年代美國的政治利益團體之行爲，和其社會學上的相關文獻兩者之明確調查。不過，杜魯門的書，因為兩點特殊的理由，而在整個團體利益傳統上被列爲舉足輕重之著作：杜魯門明確地重新介紹並強調在美國的利益團體之政治研究上使用班特萊的方法，他同時藉強調團體程序流程上，政治和社會限制兩者之要素，來修正班特萊的立場。後來的改變，非僅是他的企圖之偶發事故。有些學者（如 Mackenzie, 1955）已視政府的程序一書爲兩種基本之企圖：界定概念和介紹論題的「可爭論」理論之導引，和更要長久，更要具說服力的相關資料之綜合。不過，事實上，這種導論性概念、假設和差別，都形成了杜魯門後期的經驗性分析。

### 杜魯門的班特萊式之利益程序觀

如同班特萊，杜魯門顯然感到，美國的一些政策結果，理所當然是不可接受的不平等主義，或與意義繁雜的政治民主制是不相稱的。另一方面，雖然，他並不如班特萊一樣，在政府的程序上就這一點有同樣明確性，一般來說，他似乎接受如同他發現的一般團體政治模式。

流傳普遍的非組織利益，在……美國國內十分頑強，似乎是很可能的。（因此）……對代議政府是壟性之種種危險，來自於基本上支持這些利益之缺乏，則要少過來自於政治組織本質之其特徵（杜魯門，一九五三年，頁五一九）。

或者，誠如他在前幾頁上所說，美國有一套政治體系，而其中的「有組織之利益團體……從其基本本質在政治程序上逐漸膨脹」，而其基本「活動……暗含了矛盾和衝突」，此不僅是可慾的，而且，事實上，也是「政治的本質」（頁五〇—三四）。結果，他結論稱：「目前的偉大政治任務，就如同過去，是藉支持各種條件而恒久化的一種有活力的體系，在這些條件下，這種普遍的瞭解和（有組織的利益之修正主張）的認識才能生存」（頁五二四）。

杜魯門也接受班特萊依照明智的政策觀點，對政府產生主張而界定政治利益團體，作為目的和目標導向的政治和社會生命的看法。因此，他與班特萊聯合拒斥任何客觀的利益期望。例如，為政治分析之故，排斥公共利益為一種有用的概念，「公共」（public）一字在那種場合，被界定為一種不能分解成各構成因素的整體，他將它的情形置於所表示的各個意見之相異性上，正如同他所表示的——引

用班特萊的話——「國內（即公共之謂）時常有若干部門，發現與其他部門互相傾軋，」此即，一些沒有承認所意謂的公共利益之少數民族（班特萊，一九六七年，頁二二〇，由杜魯門引述，一九五三年，頁五〇〇）。「縱然，在戰時，」杜魯門自己補充說：「……我們經常發現和平主義者，有意識的反對者、間諜和從事顛覆者，都反映了反於「國家整體」利益之利益」（頁五〇〇）。●

●九章以後，杜魯門可能因此處理公共利益為一宣傳工具，在一次辯論中，由一造謠頌其主張時，這一宣傳工具也許增加了那種派閥的立場。

杜魯門反對「公共」一字被定義為一不可分割的整體，部份似乎也在抵制頗為近似於繼續變動過程的班特萊觀點，依照此一觀點，其穩定性如同整體的公衆之集合體，沒有真實的地位。因此，雖然杜魯門在其經驗性分析中強調正式的組織團體，他對它們彼此間的互動之說明，誠如它們尋求的政策目標，通常都強調改變與運動。杜魯門說，縱然極有權力的政治利益團體，祇能對公衆利益（第八章）和政黨兩者行政不穩定的控制，設若後者本身「有變幻莫測的性格」時。他罕有描述一個團體的此種權力，該團體能充分控制與其他團體的關係。反之，這些通常組織良好的團體，與在不同問題上最明顯的不同觀點之各團體的鬥爭、磋商和妥協，在此變動的條件下，團體自身就不可能預見可信的結果了。

政府的決定，因各種不同的利益而成為有效方法的結果，關於這一點，有組織的團體，也許

祇是一種診斷。這些決定也許多少依賴支持利益之力量，和依賴影響該力量的嚴重騷擾而得以穩定了（頁五〇七）。

● 誠如杜魯門在另一點上所說的：「在事件的影響下，（團體成員）重疊的方針和緊張度以及衝突是不斷地在轉移的，這種轉移必定影響了不同團體能運作的團體要求和相關的影響力」（一九五〇年，頁三六一）。

雖然，受到麥克爾斯 (Michels, 1958) 著作的嚴重影響，但是，卻並不如班特萊一樣，杜魯門承認控制有組織的團體之整合生命的「積極少數」，是導引團體實際穩定性的一個相當要素（第五章）。不過，他的分析指出，縱使這些少數，對團體政治的易變性特徵作了一份貢獻。團體間的衝突和交涉所必需的有效壓力和反壓力，依賴於團體的向心力，而依照他的計算，團體主要所依賴的相同之積極少數的努力，而得到此種向心力。

#### 制度和社會團體的地位

杜魯門與班特萊的分歧點，出現在他的最初幾章中，在區別政治和非政治的團體上，他在這幾章中臚列得非常詳細和有系統。一方面，他在分析中完全排斥祇由若干成員之特質——「農夫、保險人、碧眼和白膚、白丁、母親、神經病患者等等」——定義的那些「斷言所判斷的團體」。另一方面，以「互動」或「有關人員的關係」為基礎，如果團體成員有一定的「共有態度」或「參考架構」時，他考慮一羣各自獨立的個人，為一有社會性意義的團體。這些團體可以想見包括階級、種族、宗

教派別和職業，那些澄清後者之各種討論，則完全以社會團體這一標題提及，使它們截然不同於杜魯門自稱之所謂的利益團體。他主張後者的成員，除了參考架構以外，一定共有「在一個既定的情勢上，對於所需要或所缺乏的種種態度，社會中可觀察的要求，或對其他團體的主張。」最後，「如果當利益團體對任何政府機構的聲明或要求有主張」時，利益團體就變成一個政治性的利益團體了（杜魯門，一九五三年，頁二三—二四，三三—三四，三七）。

● 「甚至共享的特徵是該團體基礎的地方（界定團體成員的合格性）便是決定性之特徵……而非共有的特徵便是互動」（杜魯門，一九五三年，頁二十四）。

杜魯門既於類型學上包括了社會團體後，他繼續觀察到它們本身也許形成了政治生命。

也許影響接近（官署）最基本的因素，便是團體的立場或其在社會架構上的發言人……。這種服從也許與一個地位較高的團體，不僅便於對其宣傳的接受，同時也方便其對政府的接觸門徑（頁二六五）。

杜魯門甚至更強調穩定的政治行為類型，易言之，政府的制度和利益團體自身的正式組織。雖然，班特萊不能給予這些現象滿意的說明，甚至更重要的，偏失於估計它們獨立性的政治衝突。誠如班德（Leonard Binder）最先向筆者指出的，杜魯門首先堅決強調，這些制度如何公然扼止班特萊所

強調的政治程序，和第二，它們如何形成團體影響和許多關鍵性人物的捷徑（第十一章和第十五章），因此，首先在第二章中引用龍柏（George Lundberg, 1939, P. 375）的主張，他討論諸如「司法、立法和行政，以及其他政治制度」這些制度上的團體之「穩定性、統一性和普遍性」（頁二六）。雖然，這些正是班特萊碰到的困難之政府單位一類問題，杜魯門就它們在形成團體活動之重要性上的分析例如行政困境（the Ordeal of the Executive）——是政府的程序一書上最有識見的見解。他對「捷徑」的討論，特別在立法範圍內，導入一個似乎有助於集中後來經驗性研究焦點的新術語。杜魯門應用這相同的識見到團體本身的管理上。因此，內在團體生命的「結構類型」上有一節，討論到領袖控制「聯邦式」組織的「形式」（如美國勞工聯盟）的重要性，以及相對於地理上團體關係形式功能之重要性（頁一一五—一九，一二二）。當然，杜魯門同意班特萊一個制度是一種「互動模式，與社會上其他團體模式有程度上差異」的主張（頁二六三）。但是，這種程度上的差異是實質的。「在美國，政府的正式制度沒有訂定所有政治潮流上的各種細節。然而，它們的確摒棄了其他一些限制，並且指出它必須經過的若干要點（頁三二二）。最後，這種與穩定模式的活動有關之明白性，特別在社會團體中，在政治上不作爲的團體，有時在政策程序的干涉方法上，仍然讓杜魯門有較班特萊更能作制度性說明的另一種便利。

穩定——分裂——抗議模式

在政府的程序一書中，杜魯門很早就討論了「制度化團體」——那些組織良好、穩定、且在社會

上分佈普遍的團體——自我維持的方法。他主張，許多此種類型的團體，由「沿著標準路線」所涉及之行爲的參與者互動中的一種均衡性特徵。此種「均衡性意圖自我永久化」。事實上，我們「使用制度的穩定性，」意謂一種「維持或扭轉均衡的趨勢。」●而這種維持或恢復先前存在之種種類型的趨勢，表示存於制度以外之更多的社會生命特徵。除了反常的或精神病的行爲外，面臨這些精神分裂的個人和團體，將會透過「也許能發揮出恢復平衡功能作用的新團體之形成……」，而尋求終止此種分裂的方法。「這些新團體似乎……就變成了政治團體；雖然，它們未必就會如此。」那末，這一決定點便是這些失去平衡的事件可能產生的新政治主張，這種新政治主張，似乎成爲「在既定的制度性團體均衡上是一種對感動的補償作用」（杜魯門，一九五三年，頁二七，三一，三二）。

●這種均衡也適用到團體的個別成員上去：「當吾人說明一種制度模型上的困擾時，吾人也提到個別有組織上的困擾」（杜魯門，一九五三年，頁二十九）。

●饒有意義的，杜魯門將這一均衡的討論放置在「一般性團體」即「團體概念」和「利益團體」之間（一九五三年，第二章）。

杜魯門相信，此種有組織團體對這些騷亂的反應，事實上，是美國政治頻頻出現的特性。因此，（由於）「隨之而生的專業化曝露」了農夫「在市場上來自變動不居，且難以預測的不安全性，對農業團體帶來了商業性農作物……之推廣」。關於商業組織的一個基本觀點，便是「爲回應個別團體的習慣性關係（互動）上的變動和紛擾，貿易聯盟就應運而生了，這些聯盟爲了穩定團體內或團體間的關

係，就不得不依靠政府的制度」(杜魯門，一九五三年，頁八七，七五)。

● 關於工會的類似觀察，參閱杜魯門(一九五三年)六六頁以下。

在他這個穩定——瓦解——抗議模式最著名的應用上，杜魯門藉考慮「非組織的利益，或潛在的利益團體」，意圖說明美國的以及其他的政治體系之能力，以「排除不可調和的衝突之可能性。」這道普遍受到攻擊的公式，與班特萊「潛在活動」的觀念是互為表裏的。的確，杜魯門以「信念體系」或「普遍理念一致性」來提及這些非組織的利益——十分像班特萊的「習慣背景」一詞。杜魯門討論得最清楚的潛在團體，出現在保護「這個運動的規則」上。卻引用了班特萊的話(一九六七年，頁三九九)，他主張潛在團體的成員會變得很積極，事實上，會形成「新的組織」利益團體，以限制其從形成美國憲法上所要求和「民主政治模式」上「明顯而持續的分歧」(杜魯門，一九五三年，頁五一〇—一一，五二二，五三—一四)。

不過，杜魯門在延伸他的分析到集團維持以外的任何「社會上處處已有建樹的關係和期望中的紛擾上去時」是很小心的。●這種情勢甚至影響了諸如家族、商業或教會這類特殊的組織團體——在本文的術語上為社會團體——此即從事一些普遍性活動的個人，但是，「它們卻並不如同」尋求公共政策目標的「利益團體或政治利益團體，是不斷地在運作的」。易言之，杜魯門主張，一個已成立之社會團體，有一套永久卻非政治的目標，祇以其自己的因子來說，包括兒童扶育，適當的宗教上敬祀和儀式，或商業上成功的運作。社會團體似乎會獲得政治的利益，以達到這些被瓦解的目標所達成的習

慣性方法之程度（杜魯門，一九五三年，頁五一—）。

① 的確，此種困擾可包括「代表各自分離的少數民族因素的潛在團體」在內（杜魯門，一九五三年，頁五一—）。

此種說明，因其能導致杜魯門對社會團體之討論，似乎較班特萊的說明更要令人滿意，對於這一點，因為班特萊沒有明確的類似討論。但是，吾人要指出，這種方法保留了班特萊的三字訣：團體——活動——利益方程式的許多範疇，藉以限制它在政治行為範圍內是不分軒輊的。就杜魯門來說，團體變成政治的相關性組織——此即，變成政治利益團體——祇有在它們從事政治性活動關係時為然。這些活動祇有當它們聯繫到政治利益，亦即尋求政策目標時，依次被考慮為政治的，當界定一個社會團體（及其利益）的非政治活動失敗了時，亦即當團體的關係瓦解了時，那末，它才成為社會團體，對包括政府在內之其他團體提出主張，要求政治利益，因此，就變成了一個政治利益團體。

許多批評者攻擊這種潛在團體的公式，為不合法地擴張了團體的意義，因此就沖淡了這種理念的重要性。不過，依照筆者的觀點，如果這一公式與杜魯門的社會團體——利益團體——政治利益團體類型學合併瞭解時，它就意義非凡了。雖然，杜魯門的語言較其所應表達的要曖昧，潛在團體通常可被視為尚未政治化的社會團體，祇有缺乏目前的政治目標上，它們才是潛在的。這不是說杜魯門的決定是很充分的，祇是任何批評必須要三思而行，最好多所限制——誠如筆者在本文的結論上所要嚐試的才行。

道爾的誰統治？積極的統禦術、集團常模、和團體程序中的公民默認

羅勃·道爾在新哈芬的政治上做過經驗性調查，並就關於他對美國政治的統治精英模式的理論批評（一九五六年）寫過「誰統治？」（Who Governs? 1961）一書。道爾對團體理論的貢獻應有不可抹煞的成就，是在此一批評和他有關美國團體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影響力，以及權力淵源之系絡內。本文集中在相當早期的著作上，很不幸，卻忽視道爾有關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民主集團之後期著作——這些著作，就美國政治的理想狀況，則較「誰統治？」一書更要具有頗為不尋常的識見（參閱道爾，一九六七年，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三年）。不過，與本文所考慮的其他分析最直相關聯的，卻仍然是「誰統治？」一書。說得更詳細的，雖然，此書在幾個關鍵性觀點上，類似於班特萊和杜魯門的著作，在聯繫曝露在團體活動上的限制，到團體自身的關係上，特別當它們由最積極的公民所接受和作為上，它提出了明確的貢獻。同理，因為如此截然區別這些積極分子與一般市民間之政治參與時，道爾的確苦心鑽研了穩定——瓦解——抗議模式。更要特殊的，在那些社會團體政治化之前，藉著詳細分類其非政治性之觀點，他能夠就它們干涉且適當地改變正在進行的團體程序方法，提出更可信的說明。

道爾的利益和程序觀點

如同其他的團體理論學者，道爾認為相關的政治團體都具有清哲的政策承諾，它們因此可界定為「有若干共同價值、目標和要求的」一羣個人之集合。至少，在新哈芬檢定的兩個政策性範疇內，道爾發現，其本身在變動中的許多重要的團體，其所以如此易變的一個模式。在重新開發都市的問題上，對新政策的提案畢竟不是一個既存的主要利益團體所產生的，而是由李市長（Mayor Lee）——一位雄心勃勃的能幹政客——所發動的。事實上，李市長寧願創設有高度影響力的個人最重要的團體來支持他的提案，也不願因此一政策而屈服於團體集中的壓力。雖然，一些有相當悠久歷史的團體，對這種問題饒有興趣，而它的共同支持卻非常有助於李市長。道爾結論稱，就整體來說，它們扮演了一個相當被動的腳色。甚至那些相當穩定的團體（特別是幾個在教育方面的正式組織），至少在它們的問題範圍內之重要性上亦殊為分歧。當然，教育「政策之制訂」，事實上「較注重開托要例行性得多」，也許還承認較大的利益團體之影響力。但是，羅馬天主教會卻沒有顯著的直接影響力。雖然，教師聯盟（而不是父母教師聯誼會）要有更深遠的衝激，他寧願創設一個新團體，卻不願響應主要利益團體，以找尋對教育的改變的，卻正是這位市長，而他所創設的團體，就是市民教育咨議委員會（the Citizen Advisory Committee on Education）（道爾，一九六一年，頁五，一三七—一三八，第十章至第十一章，頁一四八，一五一，一五五—一五九）。

關於穩定有組織的利益之有限的影響力，使他與班特萊的較如杜魯門這些後來的作者更為接近，道爾在「誰統治？」一書上的立場，擴張至他在新哈芬的經驗性發展以外。在一篇緒論性的討論中，道爾考慮幾個穩定的社會要素，為「誰統治？」問題的可能性回答，並在結論上說，它們全部——政

治團體，經濟精英和利益團體——在剝奪其可能而不確定的特質之政治上是不完美的。「比較起來，」他主張：「一個古老的觀念……強調老練的、成竹在胸的，有手腕的領袖的巨大潛力……，一位知道如何使用其資源之卓越領袖，不會如他人之爲其代理人般，成爲他人的代理人。」此處，道爾通常認同政治爲如新哈芬市 李市長所例示的一種改變來源。不過，在道爾的說明中，甚至市長的立場也是隨著相關的環境而變更的，其中包括每一位市長在特殊問題上的侵略性。因此，該市政治聯盟的基本模式，從一個世紀前的自治功能之政策範疇，到以行政爲中心的另一個世紀之聯合，有了相當大的轉變，就如一般市民，無視於團體的關係，對特殊的政治發展之反作用非常巨大（道爾，一九六一年，頁六，第十章至第十一章，第十六章至第十七章）。

非常明顯，這種分析具有如班特萊和杜魯門的美國政治多元論者的觀點。至少就新哈芬而言，道爾結論稱，沒有一個穩定的利益團體或一羣團體控制政治體系，部分是因爲「發生逾時對政治資源之使用……上的波動」之故。新哈芬是「一個由許多不同的領袖們所支配的體系，每一領袖接近一種不同的政治反應。簡言之，它是一種多元論者的體系」（道爾，一九六一年，頁三〇〇，八六）。

● 至少與其他政體比較時，這種結果如道爾界定在民主政治理論（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1972, p. 145）一書上一般，顯然是一種民主政治或多頭政治，亦即，一種「積極的和合法的團體……能使自己有效地獲得聽聞；「有效地」一詞，意指有一名以上的官員不僅隨時準備聽這種喧鬧，並且，如果他們不能緩和該團體、其領袖，或大多數重要的成員時，而期待一些有意義的方法以忍受痛苦的高度或然性之」體系（一九六一年，頁二七五）。

又一次，道爾類化了美國政治的範疇這些特點。誠如他在總結時說：「大多數參與的市民，就如我們已觀察到的情形，畢竟都是偶然的，專業化的參與者。」個人投入政治資源之方法，隨著「在政治體系上……發生的不同事件」而變化，除了選舉而外，「大多數市民是雜亂蕪草地利用他們的資源。」（一九六一年，頁三〇〇，二七三）

誠如這一特點所指出的，這些政治活動，也是有目的的或是志願的，道爾因此拒斥使用客觀的或不予承認的利益到政治研究上，因為它們通常不與任何可觀察的目標所追求的活動有關聯。因此，雖然道爾承認個人有其立場之「客觀情勢」之重要性，他卻堅持「在客觀情勢」這種「差異」上，對個人之意義，祇是因爲它們被解釋爲……諸如價值、性向、情報和認同……等客觀因素之故。●結果，「個人的主觀生命有一經常聯接的方式和模式，對他的『客觀』情勢祇有鬆弛的形式上存在。」（一九六一年，頁二七五）。

●道爾承認這些客觀的差異「在解釋何以（政治要求上）引起的主觀差異經常如此懸距。」不過，「每一位在同樣客觀情勢上的人，都並不以相同的方法來回應」通常是真的（一九六一年，頁二七五）。

這些觀點導致他在一次想像的對話上的冗長辯論，即團體的影響力必需如不完全依賴可獲得的資源上，而是依賴其爲認知之政策目標而使用的客觀傾向而予以瞭解（第二十四章）。「誰統治？」討論了新哈芬的黑人人口，以及愛爾蘭、意大利和德國人的人口，祇有於諸如選舉等的特殊情形，他們可見的有目的活動，才引導他們提出重要的政治上要求。

## 集團常模和政治統禦術爲團體政治的種種限制

在這些方面，如果道爾亦步亦趨緊隨班特萊，他在接受極端的美國政治之程序觀上，依然不如杜魯門那樣有準備。但是，杜魯門對政府制度和團體組織爲穩定的束縛要件和最注意的地方，道爾卻首先強調這些制度生根的集團特性，其次，則爲這些集團常模特別重要的政治領袖們的創制權。當然，他在新哈芬的決定沒有忽視制度和組織的團體。他指出，市長的官方立場至少能使得他非常獨立地創制極爲重要的經濟單元方面之提案，事實上，並能抗拒對自己再度提名之任何派系際的挑釁。在其他方面，道爾指出有時與組織利益聯合而作爲其他公職人員的衝激——包括派克委員會的董事會（The Board of Park Commissioner）和教師聯盟挫折和限制李市長及其同盟的權力之種種情勢（一九六一年，頁一一一，第十七章）。

然而，道爾自己的著作，主要集中在政治常模和期望上——心理的「內在在世界」——即由集團支持之美國市民的行爲模式，且最特別的，是支配主要制度和組織精英的模式，這些要求公平計票，給予勝利者公職，尊重言論和異議的自由，以及其他的類似情形之規則，卻限制了每一團體運用和尋求政治權威的方法。當然，道爾知道：

既不是流行的一致意見、教條，甚至更不是政治體系本身是民主政治理念的不易產物……，它們在若干措施上時常是公開的，透過那些複雜的共生程序和變動以求更替。

然而，至少在新哈芬，他發現了「如筆者所描述過的政治體系之基本特質，在過去的一世紀中，卻依舊原封不動。」當然，大多數市民「在某種民主常模、規範或程序上」不能隨心所欲地修正基本信仰。但是，道爾最後辯稱，「美國這種民主政治的教條力量，就全體而言，卻不是依賴堅信它的人數，而是……『依賴』——在行使他們的信仰時——他們使用——或期望他們使用——的資源之總和上。」（一九六一年，頁三二五，三一三，三一四）

道爾發現使團體穩定的真正資源，以及李市長和其同盟孜孜不倦地開始，且各種利益團體對之反應的特殊政策的許多創制權，毋寧是在其政治層次及其信仰上的。詳細地說，他主張，「經過相當長時期，廣大的市民，在一抽象的高水準上，擁有公平穩定的一套民主政治的信念。然而，比較起來，「這個政治層次上的成員」具有一種「更要持久的，有意識型態的，詳盡和明確的……常模上合意。」借用道爾的術語來說，他在新哈芬的發現，依次在多元論者的形式中維持了美國團體，由這些穩定自由的民主團體常模最有意義地型模或架構的，便是這種同質的政治（*homo politicus*）行爲。由於政治利益團體的行爲依次由根據這些常模而運作的領袖們所形成的，道爾與班特萊分道揚鑠是十分明顯的。結果，他主張政治利益的活動限制和穩定的影響，正是班特萊認為表達並滿足利益團體不同科技的團體架構上的那些主要變化。（一九六一年，頁三一六，三一九，三二一）。

道爾的穩定——分裂——抗騷模式之成果

當然，「誰統治？」一書因其著重大多數市民尋常的非政治傾向，而在政治學中非常突出——由

道爾就大多數社會團體重復地、常規性的和絕大部份的非衝突性和非政治性活動的經驗性分析所支持的一類所強調。

在歷史性和實地研究的感人之結合基礎上，道爾發現，新哈芬的社會和經濟界名人，在一九五〇年代的政治上已經很沉默，縱然，當十九世紀的某幾個時期，他們曾處於支配者的地位。但是，在他的社會團體中，李市長關心新哈芬商業社團的反應是很清楚的，同樣重要的，在一定的條件下，縱使地位較低的社會團體，都可能干涉當時的政治。他之較杜魯門的穩定——分裂——抗議模式甚至更彈精絕慮的，便是在分析這種干涉。

雖然，他假定一般市民通常為非政治性的，道爾卻認為，「如果人們在初次活動中受到挫折，如果他發現或認為在政治活動上找到滿足他們原始需要的手段時，那末，政治也許就變得較為突出了」（一九六一年，頁二七九）。他以新哈芬政治上的一個具體範例，生動地闡明此一通則——對金屬廠的爭論；該次爭論，威廉·梅爾（William Muir, 1955）有詳盡的描述，不像其他的一些問題，道爾認為金屬廠問題由一個民間的政治利益團體所引起，該利益團體出現得非常突然，卻缺乏熱心團體常模之政治上有經驗的個人有意義的統禦。反之，於一個時期之後，正式命名為希爾民衆協會（the Hill Civic Association）的這個團體，是由抗議密集的意大利勞工階級地區內設置六十五家金屬廠意圖之附近低中收入居民所組織的。這種鄰近地區，「粗心的觀察者也許很容易作出結論稱，是一個相似的地點，從其中可找到大社會的政治型態，」易言之，一種無效的團體生命政治（道爾，一九六一年，頁一九六）。然而，事實上，這種地區卻住著「有朝氣、精力旺盛，和辛勤工作」的居民，他

們「以自己的家、工作、子女和鄰里爲榮」（一九六一年，頁一九三）。此處，依照杜魯門的術語，便是指依據頻繁的互動影響爲基礎，並已經組成一個社團，卻因不瞭解而不作明確主張以對抗他人之需要，然而，再尋求其在政治上的保障之集體共有態度的一羣個人。然而，在這種情形上，

建立金屬廠的提議……對附近的居民，似乎認爲對這種毗鄰關係構成明顯的威脅……（包拈）一羣黑人之擁入，資產價值之式微，和在這一地區中許多居民過著他們完整的生活之截然改變。（道爾，一九六一年，頁一九三）

「所以，」道爾主張：「這羣基本上非政治性的民衆暫時轉向政治行動，以避免他們認爲正面對著他們的危險」（一九六一年，頁一九三），集體向各級官署抗議該計劃，組成一個正式的利益團體，且與有同情心，有影響力之市民結成聯盟。

道爾本人相信，假若「冷淡、漠不關心和共同合議」通常爲新哈芬政治的特性的話，這與其說是非典型的，毋寧說是偶然的。的確，希爾的居民在政治上變得很積極，「並不來自義務感，也不是出之於在政治上的一份持久性利益，而祇是因爲在他們生命焦點上的主要目標受到了危害，而政治行爲被認爲阻止這種危險的唯一方法之故。」不過，無論由何種特質所致，金屬廠案便是其特殊的情景，道爾也描述了許多如教育和再開發的一些全市性問題，這些問題在實質上符合穩定——分裂——抗議模式。例如，李市長可能爲都市重整而贏得堅強的支持，因爲新哈芬貧民區的墮落已經威脅到提供住

宅的機會，使得到市中心區的採購日趨不便，且在經濟上威脅到主要的商人，其中一些人已見到此種危險。同樣地，道爾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刺激了新哈芬學校政治團體活動之增加，導致新的學校政策組織的，是由於初中和高中學校的傾頹（一九六一年，頁一九七，一九八；一二〇，一三五，一六〇—一六一，三〇六）。

然而，這一切情形，符合團體理論文獻所載的理想，該理論認為新團體會在先前的均衡分裂之後出現，此種均衡讓它們不依賴政治而獲得一定的利益，縱然那樣，政治的活動是不確定的。誠如道爾所說：「在政治文化中，個人的成就和非政府的科技，在問題解決上賦予很高的優先權，人們也許在他們的主要活動上受到挫折，卻從不轉向政治以求解決。」這些運動祇於他所謂之「個人心理經濟學」(the *Psychic Economy of the Individual*) 昂貴的利益比例上，截然改變後才會出現（一九六一年，頁二七九—八〇）。

**麥康奈對反多元論的批評：私權為團體程序的抵制力**

格蘭·麥康奈的私權和美國民主政治 (*Private Power and American Democracy, 1966*)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關於美國團體政治最重要且經驗性分析的倫理批判之一本書。雖然，他無意要寫一本包括所有美國政治的一道周延性理論，麥康奈對團體活動的經驗性分析之貢獻，卻是相當令人感動的。在展示政治制度和利益團體本身組織以限制團體活動的程度上，他甚至勝過杜魯門。同時，他對

道爾的流行政治常模的討論，補充了美國的「正統在私權力中心問題上」的分析法（頁五一），藉讚揚地方主義、分權和民衆民主政治，使此種學說鼓勵了社會上被剝削者和不涉入政治者進一步的沉默；它歧視「一般的公衆」。在這一切之上，加上強調對限制團體程序之模式的扼制。麥康奈並不完全悲觀的，若以有利的政治條件而論，在若干方面是相當開放的，變動的團體活動仍然有其可能。部份也許是因爲他如此小心地使用如杜魯門等作者自己之術語來陳述之故，他因此提出選民之多寡和密度的理論，顯然是以麥迪生的聯邦主義者第十論（Tenth Federalist）爲基礎的，該理論就團體目標和活動上的變化以及政策結果之說明的周延性，可與任何可比擬的團體理論之傳統上說明要更爲詳明。

● 當然，麥康奈的著作是一個較大的知識事業的一部份，特別在一九六〇年代期間，常激烈地批評美國的團體政治和政治上的民主制。對這些批評，團體程序不僅歧視社會性和經濟性的剝削者——並且，較道爾，或杜魯門尋常所強調的範圍爲廣——且也忽視或破壞一般性的公共利益。例如：柯納利指責「流行的體系抑制在（團體）平衡過程上不同於涉入的一些社會成份」（一九六九年，頁十七）。參閱 E. E. Schattschneider，他除承認利益團體活動以外，並強調團體過程偏見的許多因素：「壓力團體的商業或上層階級之偏見到處都出現」（一九六〇年，頁三一—三二）。（並參閱 Engler, 1961, Passim；特別是第四頁；Kariel, 1961, p. 68; Foss, 1960, Passim; Selznick, 1953, p. 387）。

## 麥康奈爲團體論學者

麥康奈在對政策取向（如在杜魯門的說明中，通常有良好組織的）美國政治上有政治利益團體的衝激估計，與其他團體理論學者之立場是一致的。「自美國共和的早期歷史上看，」他說：「有組織的利益團體，已支配了相當強烈的政治權力。」然而，社會階級擁有有限度的相關性。「當歐洲的政治和思想鑄成階級模式和階級衝突時，美國的政治卻絕大部份都免於階級的區分。」則是之故，「馬克斯派的公式，長期以來就不能得逞。」●在特性上，就如道爾一樣，麥康奈也拒斥賴特·密爾（C. Wright Mills）的美國政治之權力精英的說明。儘管在私有經濟利益限制了團體衝激的過程上，他的論題和密爾的論題間有若干已知的重疊存在，麥康奈卻對

私人生活上有組織團體的絕大多數都印象良深，許多重大的影響，有時不啻控制了公共機關，許多則透過顯著的權力，而結合成特殊的國會委員會上。

在私權力一書上，對盛行的美國政治常模之說明，就大多數美國人而言，與其說與道爾強調私人事務之支配密切相關，毋寧說是互爲表裏的。「最後，」依據這廣泛分享的政治常模，「唯一的測驗，似乎屬於個人的選擇，不是什麼客觀之「善」，而是個別正當或錯誤的宣佈，都是他自己的利益。」麥康奈對其他團體理論學者如此重要的私有複數論之德目也並不忽視，「藉此以一種利益反對另一種

利益，和以野心扼阻野心的識見。」雖然，這種識見時常受挫，而其成就之處，也許就是美國政體「最偉大的功績」，因為在那種情形，「事實上，沒有明確界定的團體，長期以來都無助地已被迫考慮置身事外於」團體體制了（麥康奈，一九六六年，頁一三，二五，三三七，三六四，一六四，二六）。

● 依照多少類似於 *Polish* 的術語，麥康奈說：「在美國政治的大模型中，真正一致的衝突威脅出現在小於階級的單位中」（一九六六年，頁二十六）。

論團體利益為主觀上掌握的優先權，甚於為客觀的恩惠的，則由無視於團體成員自己觀點之觀察者所認同這一點，麥康奈也與其他的團體理論學者一致。至少，這正是他列舉在「私權力」一書上的觀點。因此，他說：「美國人非常重視的許多價值，祇能透過廣大的選民才能實現，」又若干團體排斥於既仔政策過程之外，依照已經承認的利益都會詳盡地討論過。國家政治制度的特質，試舉例說明之，「輕視——或壓制佔全國人口主要成份之呼聲。」的確，他似乎也同樣接受班特萊基於知識論所作之主張，即此種優先權，祇有透過公開的作為才取信於大眾。誠如我們不久就會明白，就麥康奈來說，在估計一個政治團體極重要之因素而涉入其選民之認同。但是，我們不能滿足團體自身經常性的自私特徵。更正確地說：「詳細指明實際的選民，大過那些其利益習慣性地作為之選民是必要的：。行為是良心的指引」（麥康奈，一九六六年，頁三六六—六七，三四四）。

最後，麥康奈頻頻使用團體理論學者的穩定——分裂——抗議模式，以說明重要的新政治抗議

團體。在土地平均分配之民主政治衰微 (The Decline of Agrarian Democracy) 一書中，他解釋民粹主義之抬頭，為對農產品價格上衰微的顯然分裂之反應，並視價格上漲為說明該運動的後期崩潰之原因。同樣，有組織的壓力團體之後期發展，便是一種對農民理解「其愈來愈成為……盲目的市場波動力犧牲品的反應」(一九五三年，頁一〇，一四)。在私權力一書中，他復解釋革新論，和更要短暫的勞工武士 (The Knights of Labor) 和世界勞働者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簡稱 IWW) 勞働階級之抗議，為對「公司採取近代形式，並……在一般事務上取得前所未有之影響力」的事實反應(一九六六年，頁三〇)。

#### 團體理論的傳統和對美國團體政治倫理的批評

麥康奈的倫理批評，類似班特萊的美國政治好惡相尅態度的負面——集中在許多例證或辱罵，超特權和不平等的一面上。如道爾和杜魯門一樣，例如，麥康奈認證團體活動上種種限制，包括政黨的地方分權和政府的聯邦制以及政策統治；但是，他發現它們比我們到目前為止所考慮的，較三位理論學者中任何一位都要嚴肅。的確，他非難這些模式，因為它們違反團體理論學者們對一種公開的，易變的、程序的、自由的民主政治所共有的約束之故。一方面，由於支配單元是如此「微小，它們缺乏正式的政府制度」，鼓勵了特別「緊張和極端」的「統一性壓力」，所以它扼阻了意義非凡的自由(一九六六年，頁三四八)。

與杜魯門比較，麥康奈非常強調組織內精英控制的程度和影響；即，杜魯門的積極少數(麥康

奈，一九六六年，第五章），和多少強調政府制度的趨勢上，偏好固定的利益。同時，麥康奈認為，除了對道爾十分重要的那些有關選舉的言論自由和行為自由外，還有確定的團體常模和價值。特別在「私權力」一書上，討論了非正式自發的大眾民主政治和地方分權，他相信這種情形，由於將政策決定歸選團體精英而挫折了真正的民主控制（頁一一二，一一五，一六六，三三七，三五一一五二）。因此，麥康奈接受道爾關於缺乏普遍性的政治行動主義之要點，但是卻視它為普通市民的特殊指票，此即：來自決定性決策制訂地區的貧苦農民，易言之，就是農業政治（麥康奈，一九五三年）。

這些常規性和制度性的限制淵源，如同麥康奈的解釋，當它們在一起運作時，由於它們去除了程序的或易變性的不同要素，這種要素，縱然從班特萊的程序觀上分道揚鑠，而道爾和杜魯門卻予以維持，因此，就有了特殊的不幸結果產生。麥康奈關於有組織團體的極端寡頭政治性之主張，暗示了對政治上沉默的個人之迅速活動的一種阻礙，道爾在考慮時並不將這一要素包括在許多沉默的來源之中。反之，在分權式的大眾民主政治上，信仰之重要性——麥康奈稱此（一九六六年，頁九二）為「美國式的正統」——對麥康奈來說，卻斷傷了杜魯門有組織的團體時常作有意義的競爭之假設。說得更正確一點，他相信藉抓住一個特定政策地區幾乎特定的控制，各團體就穩定政策制訂的模式，排斥所不期望的其他團體之干涉，因此，縮小對杜魯門十分重要的開放性團體間衝突之重要性。總之，麥康奈拒絕道爾對特殊問題的反應上，出現頗為迅速的團體之信賴，和杜魯門對已有的團體中競爭之信賴兩者，為公開無限制的政治生命資源。

## 公共利益、選民多寡，和團體活動的限制

麥康奈在團體理論傳統上，也不同于其他若干位學者，在這方面，他強烈地主張公共利益的重要性為一種分析性或經驗性的有用概念。班特萊和杜魯門拒絕這種有用性，因為在國內沒有一個問題，吾人可期望其為一致的，而麥康奈則同意，「有一種利益為所有的人所共享，並且十分一致是很困難的」（一九六六年，頁三六四）。與班特萊和杜魯門的認識論之懷疑主義一致的，是他也同意「公共利益」的主張，就「狹隘的團體之自私目的」言，可能隨時都會成為一種偽裝（一九六六年，頁三六八）。

① 麥康奈指出，無論如何，這一點將「時常是廣大意義上的不確定性」（一九六六年，頁三六八）。

然而，這一概念上不合意的精義，因此就必需要詳細臚列了。班特萊和杜魯門兩人，畢竟提到了一種行為模式，在這一模式上，一個更要廣義的集合體，當其衝突或活動傷害到不即時參與的那些團體時，也許在一個特殊政策問題上干涉而限制或阻擾了直接參予的那些團體，這一模式，依照班特萊的合著人約翰·杜威（John Dewey, 1927）非常類似麥康奈「公共」一詞的觀點，亦即：沒有直接涉入一個特定問題的衝突之個人或團體，也許受到那些更要積極地參與的團體之不利影響（例如，由特定團體形成的健康和環境政策，對一般人口上的影響便是）（麥康奈，一九六六年，頁三六六）。他以頗為不同於其他一些團體理論學者之全然強調的口吻評論說：「說到公共價值，並非毫無意義。

在它們由廣大的選民所共有的意識上，它們是共有的」（一九六六年，頁三六六）便在此一脈絡中了。使用他本身並不暢順的截然不同語言，麥康奈所關心的是一種經常要求，被利益團體所限制之相當可分性物品供應之私人趨勢……即：以諸如未被污染的水和空氣，環境美化以及類似情形的公共物品為代價，而援助石油工業利益之種種政策。只要在公共利益內每逢提及這種情形發生時，代表公共物品的「廣大選民的動員」範圍內時，公共利益因此有其分析上的重要性（頁三六六）。但是，在麥康奈的用法上，廣大的選民顯然毋須與全人口認同。因此，接著他就關於先前不涉及的團體，有關的團體之若干特殊抗議的期望，事實上並不直接違反杜魯門和紐特萊的用法和期許。

然而，麥康奈就公共利益的用法，對概念本身所實際指謂的，要較他對美國團體政治更要普遍性說明中之地位為少，使得他與其他一些團體理論學者分道揚鑣。「公共」一詞，實際上，是有限制的，那些龐雜廣大的選民，他們的利益則與遠為狹隘的有限團體之需求發生衝突，這種廣大和狹隘的團體間之對照，依次集中在麥康奈的一個團體的選民之大小，和紛雜所形成之行為和成功的方法之變性分析上。麥康奈基於選民的大小和紛雜而考慮之團體活動上所流佈出來的這種常規、制度和社會經濟的限制，對於其他不滿紐特萊的極端程序觀點的團體理論學者，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因為麥康奈的公式（由於適用到基本上別於所有之團體）成就了通則水平，和（由於提供了一組仔細限制的說明變數）而對團體理論傳統的新經濟，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很顯然，麥康奈主張，由團體以些微同質的地理上選民（如地域上的聯盟）和類似功能的選民（如農業上個別的貨品團體）控制的政策，遍及特權者，因而有害於一般公眾。比較而言，相關的政治利益團體之龐雜處，就相當偏向於平等主義或對

公共價值有反應的，或是包含兩者的一些政策。因為有些微同質的選民團體已支配了公共政策上的衝突，所以麥康奈在美國團體政治的批評上，就倫理上而言，是十分中肯的，部份是因為強調基層的決策制度之保守的美國正統結果，部份是因為癱瘓了正式的政治制度和偏好廣大選民的政治之政黨組織進步運動的結果。

總之，選區的方法，聯繫了有組織的團體和制度之特徵，和由其他的團體理論之學者所討論的集團常模之特徵，到由團體活動所影響的政策產出上。同理，一度與麥康奈自己的語言分離上而言，它特定了一種明確和周延的（選區選民之多寡和紛雜）獨立變化羣，且透過經驗性分析的財富，聯繫到（因大多數有權力的團體所獲得之團體需求和政策產出之特徵）決定性之附隨變數上。

#### 社會團體、總統職位，和選區大小的分析上限制

當然，麥康奈的理論所提供的正確指示，便是經驗性可測驗的主張。但是，一九六〇年代後期和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政治動亂指出，依照他自己的價值而論，他在「私權力」一書中的期望，有些地方太樂觀，在其他方面則又太悲觀。一方面，麥康奈認為會鼓勵大選區選民的那些政治制度，特別是總統職位和聯邦政府的行政機構，從詹森政府的後任起，至少在尼克森總統任期，就不像已經如此了。就麥康奈來說，大選區選民的政治，與其說是排斥性的，毋寧說是包容性的，因此，涉入了大量的參與者的人數。當然，麥康奈的確已認知，經過普及的參與，已尋找到平等和改變若干團體的選區，也許因時間而漸漸地縮小——特別於它們獲得了其自己組織上地位之後為然。●此處的困難似乎

成爲正式維持相當大選區的全國政治制度，也許也從鼓勵廣大選區的政治上轉移開去，的確——誠如密爾（Mills）和其他的人士所宣稱的——這些制度也許勾結必然的共謀政治，排斥了大多數市民，且嚴格限制了各種團體的參與，如越戰的策略所證實的一般。團體衝突的緊張度，且團體程序的確試次是變動和公開的範圍，因此並不如此充分地被相關政治選區的大小和變化所決定的——雖然它們在假設上受到了影響。誠如筆者正準備要爭辯的，其他的一些因素——雖然包括了客觀團體利益之主觀被承認的等級——也是很重要的。

② 的確，關於美國的勞工運動，他作了這種論證，美國的勞工運動，以多少要勝過筆者信以爲證明的較多力量，排斥了許多未組織的工人（麥康奈，一九六六年，第九章，並比較 Greenstone, 1966, Passim）。

客觀利益的問題，在分析上使得麥康奈的期望看起來過份悲觀的那些發展同樣是相關的，即麥康奈偏好的那些大選區利益團體之出現。事實上，一九六〇年代後期不僅由抗議越戰，和總統的權力上表現出來，而且由諸如消費者的保護、保守和環境諸問題上所引起。雖然，這些包容甚廣的團體，包括生態運動和雷爾夫·奈達（Ralph Nader）的消費者和工人取向的安全運動在內，依照活動成員的範圍而論，在數目上都是很小的。它們爲十分龐大綿密的團體尋求不可分割的利益，且至少激起一些廣大的支持，因此，提供了通常各自分立的利益，終久使自己受到注意的班特萊的期望，有了一些有限度的肯定。誠如事實所顯示的，麥康奈本人在保守運動上扮演著很具體的角色，而他在「私權力」一書上指出，甚至「到了一九六〇年代初期，然而，至少在若干地區中所『見到的』，相信正朝著政

治上有有效的普選區發展的進步上而言，是有一些理由的」。雖然，他感到對「這一點的紀錄是不幸的」（一九六六年，頁二二九）。大多數未能說明的一些問題，便是這幾個抗議團體的出現何以能夠說明了。

誠如我們已看到的，如其他的團體理論之學者一樣，麥康奈時常依賴穩定——分裂——抗議模式。但是，如道爾所特別指明的，這種模式堅持這些新團體之出現，是爲了要達成過去經由非政治方法上已經圓滿獲得之目標。一九六〇年代中出現的種種團體，時常轉向代表本質上是新的目標之政治。我們即將主張的這些新要求，由客觀的利益來分析，就更容易處理了。除了共同的大選區政治問題以外，這個問題多少可因轉向西奧圖·洛威的作品而得以澄清，該作品幾乎充分說明了團體理論學者的繼續拒斥客觀利益（基於班特萊的知識論之理由）和逐漸強調的信仰間之緊張度，此卻不同於班特萊美國團體政治決不是充分公開和程序的。

### 嚴格化的團體政治——西奧圖·洛威著作上公共政策的限制

雖然，身爲團體理論學者的西奧圖·洛威，其著作之大部份仍然太近代，尙未準備置於正常的希望上，有四種理由指出其重要性。第一，洛威對權力區域的討論（一九六四年b）是一位美國團體理論學者，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所發展出來的最有影響力的類型說。第二，縱已指出團體活動隨著待解決的問題之公共政策型態化之等級，洛威卻仍然認出政治架構的另一要素，一種原初政治行爲的通常模

式，以扼制團體活動的流程。第三，洛威使一個戲劇性的字彙和一種著名的文化佈局（從經濟學到公法和政黨史）闡述和延伸麥康奈的美國團體政治之倫理批評。最後，由於直接考慮一九六〇年代有抗議取向的團體活動，他的較近期作品（特別是一九七一年）在團體理論學者的穩定——分裂——抗議模式上闡明了肯定的弱點。

團體活動上的政策限制：權力的活動場所

洛威一九六四年之美國政治（一九六四年）●上分配、統制和再分配的活動場所類型學，經常有系統地區別如「團體政治」聚攏在一起的集體政治活動模式，包括十九世紀的公有土地或關稅立法和當代河流以及海港計劃在內之再分配的政治，時常有裨於個人或單一的公司，產生了因個別情形而不同的許多變化，最後的決定時常不能正確地稱之為一種政策。這種高度可分的結果，因許多極小的團體甚或個人而鼓勵了獨立的政治活動，因此使公然的衝突減至最低限度，因為「受縱容的和被剝奪的損失者和接受者，從不需要發生直接衝突」（一九六四年b，頁六八九）。

●洛威在其市長的樂趣（*At the Pleasure of the Mayor, 1946a*）一文上，指出紐約市卓越的讚助研究，首先以人種為主要且任意的方法提出了界限學觀點的公式。他繼續（一九七〇年）又補充第四種類型，簡賅地描述在下面的選民策略上。

在統制範圍內的政策，也裨益或侵奪特定的個人，但是，卻缺乏在分配情形上「幾乎無限止散漫

之總和」。換言之，「至於」在諸如鐵路或卡車運輸業者這種有組織的團體活動間，誰將受到「縱容或剝奪」，是有「直接選擇方法的」。尤又甚者，這些團體通常將它們的鬥爭帶進衆院或參院議場，利用「較在分配活動範圍內遠爲不穩定」的種種聯盟，問題則就在國會委員會中平靜地解決了（一九六四年b，頁六九〇，六九五，六九七）。

在再分配的情形，政策產出尙未全部可分割時，勝利者和失敗者「接近」「社會階級」的大小和廣度，「……粗淺地說，便是有和沒有……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一九六四年b，頁六九一）。●因此，舉足輕重的組織之行爲者，都是典型的高峯聯盟，諸如美國勞工聯盟和工業組織會議，或商會，至少主張爲極廣大的階級說話，而基本的決定雖然並不經常，卻也時常在它們與重要的行政和立法領袖們協商中作成，而非在公共的立法上針鋒相對。②

● 洛威信誓旦旦地辯稱，一件政策性提案，因爲那些受重視的現實狀態盛行，縱然沒有作成再分配決定，還是可以再分配的，決定性的問題不是如何再分配一個計劃，而是如果最後實現時，它如何能再分配（一九六四年b，頁六九一—二）。

● 誠如我們即將瞭解的，洛威在再分配情形上衝突之緊張性觀點是一很複雜的東西。

在這一討論中，洛威顯然顛倒了班特萊主張之極低的隱含原因秩序。依照過去相關產出可分性之政府決定程序，他似要說明那一些團體在一定政策問題上是積極的，和它們所採取的是那一類的行爲。洛威主張，這種過去的政策決定，形成了行爲者現在的期望，因此，決定在活動上以分配，再分

配或統制來處理這些問題的情形。總之，形成團體活動的是過去政府決定的穩定模式，並非僅決定政府決定的團體活動。

雖然，此種類型學已影響了美國政治上許多專家僅有的字彙了，卻也引起了許多探討性的批評。例如，洛威的許多著作，並不充份地運作其類型學，而在一特定的範圍內，隨時準備幫助我們並明白地指定每一政策。部份問題也許是洛威至少證明了特化，且也區別了數種活動場所之四個要素：第一，政策產出的實際集合體（不可分性）；第二，關於這一集合體的作為者（亦即團體成員）之期望；第三，解決每一問題的制度狀況；和最後，在每一場所中的衝突（或強制）的緊張度。然而，在這些主要的相關重要性上，他卻未能清哲地區別。

● 部份由於這一理由，不論自一九六四年起，包括一切可能的內政策略上證明之三種類型，或選擇性地代表最常經驗性觀察到之範疇，是完全不清楚的。洛威本人就在最近更強調的壓制上，而非集體性上的變化為決定之標準，兩者間的正確關聯，並沒有明確地作出來。然而，不論水平之壓制水平的經驗性涵蓋，一定是集體性的，不論一種水平概念性地或界定性地襲取了另一水平，抑或不不論它們有沒有聯結在一起，我們就不得而知了。此類事件可推定在洛威即將問世的論界限一文中有很充分的討論。同時，由於洛威有關其選民政治和壓制，僅有建議性討論尚未完成，且似乎在其概念不同的方向上，使其類型學別於團體理論傳統自身（與其說是國家的理論，毋寧說是團體活動的理論）之主要衝刺，本文將集中在一九六四年的類型學，及其與洛威最重要的後期著作相關性優點和缺點上（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一年）。

儘管有這些缺失，儘管這個客觀的利益分析對本文所考慮的每一位作者是共同的，在洛威已解開的範圍內，一種謹慎的理性不應當受到忽視。的確，就類型學在其他當代政治學者的衝激上而言，認為好的部份便是這份理性。洛威認為，每一種決定也許最後將有價值的物品，從一個廣義定義的團體再分配給另一個團體。但是，洛威卻說服性地主張，有三種類型對有關問題中的政策產出條件將成為如何立刻（可分散）在團體成員的期望基礎上予以區別（一九六四年b，頁六八九—九〇）。的確，由於集中在這一集合性次元上之故，吾人在原則上就能尋出一九六四年場所類型學內的一切特殊政策動向。顯然，這種團體活動和政策產出的模式，如其適切的制度狀況上經驗性觀察到的一般，形成分配、統制和再分配三種各別的类型，就全部落入集合性次元之中了。

比這些特殊的缺失和德性還重要的，便是場所類型學以其簡明的筆觸，重鑄了關於利益團體在政治上涵蓋之整個政治過程範圍內時常無結果的討論。藉主張尋常有組織的利益團體政治祇發生在統制的問題上，洛威從尋常團體理論的界限上，排斥了大多數階級或個人影響力的情形，但是，他因此留下了統制場所自身的一種團體解說，就更形堅固和更具說服性。同時，藉作成此一區別，在達成經濟或社會目標上，洛威將研究的焦點投射在有組織的團體政治上是最有支配模式的等級。這篇一九六四年的論文本身就集中在從個別公司時常具有決定性的新政以前分配模式之轉移上，到有組織的團體和聯盟具有支配力的統制場所的一種關稅政策的轉移上（此即，一九六四年b，頁六九三—九四，六九九）。許多可能的因素也許說明此一改變（即新政經濟規劃的延伸和發生在一九三〇年代公開的團體衝突頻頻增加上），但是，不論正確的說明為何，擺出分析問題的姿勢的則是洛威的類型學。

洛威爲團體理論學者

洛威從團體理論架構內提出這些貢獻。場所類型學本身藉其政治目標來分類團體，因此，主張政治上相關團體具有政策特定的利益。同樣地，自由主義的終結 (The End of Liberalism) 一文，集中其注意和論爭上的攻擊幾乎完全在諸如聯盟、公司和商事農民聯合這些有明確政策事務的有組織團體上 (一九六九年，頁三三三以下)。

●洛威顯然也同意其他團體理論學者就經驗分析之目標而言的密切相關之見解，團體利益應當考慮到主觀因素，因此就如若干活動可能所宣示的。因此，他批評有組織的團體，因爲它們不能「合併所享有……由組織正在追求之利益的人……」。像勞工聯盟這樣一個組織，不可能代表所有感到勞工聯盟顯然是對他們的利益之人的利益的」 (一九七一年，頁一八一—九)。

如同麥康奈，洛威攻擊那些利益的團體政策上之除外事件，這些事件，與其說是由各個關心的人明顯地遺留 (或重新認定) 的，毋寧說是客觀的 (或非重新認定的)。自這一理由上觀之，利益必需被認定爲政治上有意義的，且深知個人的社會上或經濟上地位，以預述其所活動的範圍或效果是不充分的。事實上，在排斥任何「地位和權力間的簡單關係上」 (一九六四年 b, 頁六九七)，洛威和道爾是一致的。政治上的資源祇有當其代表有組織的政策目標，此即，主體利益而在政治上使用時，才是真實的。

●洛威在紊亂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Disorder) 一文上考慮的集體政治活動之四個階段，有三個階段涉及政治問題的「表達」、「接合」和「定義」問題，即政策目標，而第四階段依賴於由團體成員所爲之「此類目

標」之整合上（一九七一年，頁五〇—五二）。

與這種有特定政策目標的團體之主體利益焦點不相矛盾時，洛威才依賴由其他團體理論學者所發展之穩定——分裂——抗議模式。另一方面，洛威同意杜魯門「正常」的團體際的關係，通常可被描述在均衡的術語中。這種情形的確「是近代生活的本質」（一九七一年，頁三四）。許多——雖然，誠如我們即將明白的，決不是指全體——有意義的政治抗議，因此代表一種對這些穩定的社會和經濟生活之分裂的反應。這種十九世紀後期「緊張的」農村抗議，是對農事商業化的反應，最後，「每一農民突然發現自己成爲運輸、貯藏，交易和銀行問題的奴才」（一九七一年，頁六）。這種模式決不限於農業政策。●

● 洛威見到工會之出現爲「保證工會控制勞工市場」的一種努力，因此，先阻止了其成員的正常經濟地位之攻擊（一九七一年，頁十八）。當然，洛威從來沒有掌握住這種均衡觀點，特別指出在資本主義企業的機動性上。但是，代表商業的正式利益團體，也是一種對這些由經濟競爭和其他因素所賦予不平均的反應（洛威，一九七一年，頁二十二）。

洛威也同意其他團體理論學者關於美國的這種政策——和目標取向的團體，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超過廣大社會階級的見解。馬克斯派的信徒對於人人不平等的信念，特別爲資本家對美國政府的控制（指內戰之後）也許是對的。但是，關於「由組織所代表的基本利益能夠且願意使用權力」，他主張「多元模式是絕對優越的」（一九六九年，頁四一—四二，並請參閱一九七一年，頁四）。

最後，洛威對團體政治活動的倫理批評，時常與如麥康奈這種團體理論學者的那些批評是平行的，則要多過與社會主義者或激進主義者的那些批評之平行性。在自由主義的終結一文中，洛威清楚地指出他對麥康奈所考慮的小選區政治之一般性反對，這種小選區政治分配「給私人團體制訂公共政策的權力，（而）結果，其自身就成爲一種主權力」。如同麥康奈，洛威也相信，這種模式大大地超過「支持既得利益的捷徑和權力，且抗衡了諸如農業產品消費之一般性的公衆」（洛威，一九六九年，頁五八、七二，九二）」。⑤

⑤ 在攻擊當地精英的權力分散上，洛威也藉描述南方城市中，治安官員用在管理聯邦計劃以便再實施會是黑人社區星羅棋佈的種族隔離方法，來闡明麥康奈的關心（洛威，一九六九年，頁二五一）。

在混亂的政治一文上，洛威十分注意麥康奈的另一主題，不民主的，且時常爲團體自己內部生命的保守性格（一九七一年，頁三八以下）。若有此情形，洛威將這一公訴甚至表現得比麥康奈還要透澈。「每一已成立之團體，」他說，「都是保守的」（一九六九年，頁六六，他的強調），是順應腐敗或正在式微的尚武精神之一條「鐵則」。二種增加外在的注意和極不民主的內在生命之命運，一旦正式地組織時，甚至期待著最嚴格的社會運動（一九七一年，頁四〇以下）。的確，由於「自由人士和保守人士，共和人士和民主人士」主要「在他們所認同的利益團體範圍以內」不同，他們之間的問題是頗有限制的；迨至一九六〇年代後期，雙方在有意義的改變上同樣都變得毫無興趣（一九六九年，頁七二）。

洛威在其他觀點上，類似其他的一些團體理論之學者。雖然，麥康奈因為小選區政治的排斥，也許挑激已有建樹的精英，因此，縮小了活動的程序流量，故反對小選區政治，他承認訴諸公開性和自發性，對小選區政治也能產生明辨作用（麥康奈，一九六六年，第三章）。同樣地，洛威一方面偏愛一種真正公開、易變、自發的政治生命，他認為這是被特定確立的團體所預先排除掉的；他因此喜歡以紊亂來突破利益團體的權力穩定之複雜結構（洛威，一九七一年，頁 xix，三七—三八）。另一方面，洛威主張顯然免於衝突之有組織利益，也許祇是擬態的；團體的互動，事實上也許維持「重要戰鬥員的分立」。的確，在一種政治情勢上，這是太容易被利益團體的自由主義程序上之修辭所辨明的，政府也許僅批准「更有效組織之團體」中的「合意和適應」。洛威攻擊「多元主義政府」便是基於這種理由，那裏「並無……實質存在。也沒有程序可言，那裏祇有過程」（洛威，一九六九年，頁七一，九九，並比較頁 X）。

### 洛威的團體理論之傳統發展：公共政策的病理上分析

洛威的場所類型學和他對美國政治的批評彼此相輔相成。實際上，誠如馬克·梭魯門（Mark Solomon）向筆者指出的，洛威因為利益團體的自由主義（一九六九年）以其蓬勃的團體國際競爭而退化至一種分配的政治以鼓勵統制的政治，所以就攻擊利益團體的自由主義，此即最少限度的衝突和既有的小利益之自私的排他主義。而且，依照一九六四年場所分析的術語而論，這種分配的政治模式，普遍扼制了團體和個人，所以，它們仍將繼續依照分配的術語來界定政治的問題。就洛威來說，美國

的團體政治因此藉政策「反饋鍵」(伊斯頓，一九六五年)而受到嚴格的限制，經過政策「反饋鍵」過去的政策決定，影響了有影響力之新決定的一切努力。●接著就以明顯的政策目標符合目前流行，且已得到政府批准和立法之適應，以及妥協模式之組織團體而言，有一種幾乎無法逃遁的趨勢存在。結果在主張美國團體政治的嚴格特質，和因此拒斥班特萊的公開、易變程序的理由上，是一種迥乎超越麥康奈的美國團體政治的說明的。

● 在作成這一點上，筆者非常感謝 Mark Solomon。

洛威在擴張團體活動上團體理論傳統的政治限制觀點之程度上，也許因他與麥康奈作明哲的比較而獲得最好的瞭解。就麥康奈而言，團體活動上許多不幸的限制，可歸責於進步的世紀，不幸的制度改革，進步的世紀在尋求增加政治的參與上；事實上，卻是鼓勵小選區政治，並轉而鼓勵既有的私益霸權。然而，仍存留著確切的種種條件，特別如總統職位的一定之制度類型，這種制度鼓勵大選區政治，因此，更多的平等主義者之公共利益——有取向的計劃，就如由麥康奈對農業安全局(the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及其當時的成就之研究(一九五三年)所闡明的。洛威的觀點相當悲慘，因為就他來說，新政及其成功者們自己鼓勵的利益團體之自由主義大事分配了政治。更普遍地說，麥康奈相信，與其說是國會，毋寧說是總統，與其說是州政府，毋寧說是聯邦政府，與其說是眾議院，毋寧說是參議院，與其說是地方性派系，毋寧說是中央集權的黨派，更容易產生真正公開的和衝突的政治。嚴格地說，可慾的公共政策卻仍然大部份是團體互動的產物，由不同利益充分地合併成廣

大異質的集體政治（非司法）的作爲（由全國性政黨或由全國性政客的總統所領導）。麥康奈刻意從十分普遍的分配政治之紀錄上，區別的政治衝突和真正妥協，因此就會繼續（麥康奈，一九六六年，頁三五〇，並參閱頁三五一一—五二）。

就洛威來說，對照起來看，這種解決不是基於團體互動上較良好的政治結果，而是基於政府方面較良好的制度行爲模式——這是他強調與其他團體理論學者所不同的一點。●的確，使洛威較其他任何團體理論學者更要刻意地不同於班特萊觀點之限制分配的政治，便是這種對政府的信賴，若干團體自由地在其中對其他團體反應和反抗的一種過程，可以計算來補償嚴重的誤濫。

●的確，洛威本人也許過份陳述了這些差異，在一篇文章中，他似乎極要地批評了美國的政治學者們，並且特別（推定）團體理論之學者「設法從無秩序的政治上弄出科學性」（一九七〇年，頁三二三）。洛威無疑有一要點，但是，這篇論文之前述階段已將班特萊的信徒們自己所強調的制度上因素作出清晰的範疇。

洛威的團體理論傳統上發展：作爲治療的司法民主政治

洛威對病理上的團體政治之診斷，強調拒絕利益團體自由主義以組織政治作爲一致的原則，這種原則從既有的私益所加於政策上保護被剝奪的社會階層，和一般性的公衆兩者。這種爲吾人所愁的政府行爲，祇因爲它時常使用強制力而常常反對那些已經獲得的偏好之利益時——此即既得利益——是可行的。依次，祇因爲行政權威有明確和不動搖的目標，且毋須依賴它們自己的慎辨時，此種強制才

是可能的。洛威相信政府的強制力是特別有效的，因為其市民有「可適用的內在化（政府）之批准」，換言之，這種強制「在不聲不響中已充分地接受了」；因此是「合法的」。因而，洛威呼籲司法的民主，以這種立法規則形式上毫不含糊的政府行為，為符合復制的特定標準。利益團體自由主義的邪惡可因此制訂如此精確的規則而有所縮減，反應團體壓力的行政上慎辨的確就可以避免了。如果由文官在層階官僚政治職業性從事「自覺的正式方法，適應到最後實行時，就特別來得逼真了（洛威，一九六九年，頁五二，二七六以下，三一〇以下，三〇，並請參閱頁二九九，三〇三—四）」。

然而，司法的民主堅持那些統制或再分配政治的形式，那裏有組織的兩極利益團體的衝突，迫使權威作出相當明智的政策選擇，並接著以大部強制般的需要實行這種選擇。祇有在這種方法上，政府才能維持其不受利益團體壓力上的自治。

### 嚴格化政治秩序上之社會運動

洛威非常蒼白的經驗性分析引起了一個嚴重的問題。如果團體過程上的既存限制，似乎是偏向利益團體之自由主義的永久性時，司法的民主如何付諸實行呢？毋庸驚奇，他對司法民主的信賴事實上被批評為完全不可行，因為它忽視了對正式規則強制的政治上抗拒性，就如同北方的白人抵制洛威所偏愛的普遍合校的情形一般（洛威，一九六九年，頁二七九）。②

② 洛威自己報告了對自由主義的終結一書之種種反應，「許多同事們」相信，「我是在期待最高法院來解決我們的問題」。

爲了回答這些問題，洛威看到了有組織的利益團體之勢力範圍以外的情形——因爲它們僅有的組織指示抑制保守主義和串聯的交涉。特別於轉向社會運動，此即在社會團體以共謀的聯盟和部署，僅〔陳爲〕高度有組織的團體之前，若干透過衝突而尋找實質改變的嚴重困境，使社會團體生氣蓬勃。事實上，因爲那些社會團體用社會術語來描述，而不是其政策目標，洛威祇強調那些尚未優越地在社會團體理論傳統上計及的社會團體。依照他的觀點，這些運動或則將直接獲得洛威所偏好之特殊實質意義的法治，或則創造導致其他團體去發展此類混亂的規則，十分像一九六〇年代初期黑人民權的要求導致了聯邦的民權法案（一九七一年，頁xxv，第二章，頁五〇—五一，五八以下）。

這種與社會運動之關係，似乎與穩定——分裂——抗議模式是一致的，此一模式爲其他團體理論學者（和洛威自己在上文所指出的）已用來說明各種社會團體的政治上干涉。不過，事實上，洛威似乎承認其集中重點在如民權運動這類團體上，使得他超越了這種模式，因此，也超越了團體理論傳統之主體。「成功的批評，」誠如他所說的，「從一較大的比較標準上採取了論辯形式。」洛威的確考慮了與其說是尋找恢復先前穩定的團體關係模式，毋寧說是有時攻擊和分裂的運動，對他而言，這種方法時常例示了失效的保守主義（一九六九年，頁八）。

當我們回顧洛威的著作時，我們立刻就瞭解，具有這種途徑的問題，並非是他集中焦點在與其說是恢復先前穩定的關係，毋寧說是尋求改變這些運動。反之，問題是這種運動的觀點，並不完全與他的政治團體觀點、團體利益、特別和客觀的團體利益對抗主觀的團體利益的問題一致。但是，在我們能進一步檢查洛威的立場之前，我們首先需要明晰地回到力量的整個問題，和穩定——分裂——抗

體模式自身的缺失上。

### 團體理論、社會團體和激進的改變需求

從班特萊到洛威這些團體理論學者的主張，共有一套生動的假設和見解，如果不是明白地受到忽視，也似乎疏忽了它們所指的要點，有時在美國政治理論的特質上有明顯的不調和及不協議存在。當然，其中許多衝突，可以解釋為不同的經驗性事務和資料種類的結果。麥康奈、洛威和其他的批評家們強調一般公共的和沒有社會上特權的團體之弱點，而他們的說明經常來自行政策略。杜魯門和其他具有較有利估計的理論家，有意集中在已有的政治活動關係上，特別在自主立法方式的立法機關內者為然。同時，道爾和他的部份學生則強調選舉自由和政治權利的重要性，至少在新哈芬是如此。不過，這羣作者事實上研究不同情勢之範圍——正如同不同於同一政策制訂過程之種種觀點——則依然不清楚。而就我們的目的而言，其重點是，在這一辯論的雙方共有許多相同的優點和缺點，特別以複雜的社會（非政治的）團體問題居多。

### 社會團體和團體策略

杜魯門的政府的程序一書，是團體理論傳統上的軸心作品，大致說來，因為它如此有系統地介紹了結構上的要素——此即系統化模式活動——到美國的團體策略分析中去之緣故。不過，除了

麥康奈和洛威以外，就杜魯門來說，大部份的模式要素在特質上是政治的：集團常模、政治選區、政府制度、由政治領袖結集的聯盟、政治利益團體明顯的正式組織、（政府的）公共政策。另一方面，杜魯門的確討論了社會團體——宗教的、經濟的、區域的等等——這些團體不能對其他團體作出要求，而由其成員的行為互動維持在一起，依次導致共有的「比較標準」（一九五三年，頁二四，二三）。而結構和區別不同的社會團體之重複活動，便是這些比較標準和行為的模式。

其中若干團體，有明顯的政治上重要性——而團體理論的文獻，則充滿了參考資料。撮要說明早期的觀察，班特萊自己承認，階級、財富和早期的類似情形支配了政治的角色——十分像道爾在新哈芬略上指出的社會影響力；然後，是經濟上的顯著事實，至少，迨至內戰時期是如此的。杜魯門觀察其在權威的接近上，一個團體的社會地位之不同衝激，而麥康奈則詳細描述了農村中的窮人，在爭取農業安全管理局上的衝激。最後，洛威集中其大部份注意力在當代利益團體的策略，在公平、公正地處理美國黑人的失敗上。

在這些例子中，社會團體並不如這樣的當代政策之制訂中心。這種焦點便在政策上具有團體的效果（麥康奈和洛威），或在較早時期，這些團體之有影響力的活動（班特萊和道爾），或團體在接近（杜魯門）或選舉（道爾）之間接效果。以這些方法增補結構要素之後四位著者，因此，在不強調大而穩定的社會團體為分析之主要單位上，在現行的團體策略趣味上的主要角色，則仍與班特萊接近。

這種觀點的明顯理論基礎，便是社會團體的會員資格，並沒有依照政治目標而界定，所以，團體

的成員似乎在紛爭的政治問題上遭到分割。當然，杜魯門觀點上的社會團體，確能承擔起有目的之活動，但是，因為它們不具有反對其他團體的要求，這樣的團體就關於目的或方法不能作出連續的選擇。反之，當杜魯門提及「比較標準」時，他正確地指定了在其內之有關可作成政策的這些有意識選擇的基本取向。誠如道爾在 *homo civicus* 佔優勢的非政治活動之討論中一樣，大多數家族或職業團體，對如何撫養孩子或履行其工作上則全然不知選擇。這樣的社會團體，尋常依賴過去的經驗或常例，這些經驗和常例已典型地被主觀所特定，因此，在更替要求中，不斷地選擇可節省的時間和精力。<sup>③</sup>

③ 當然，有些政治利益團體，特別是那些有精密組織之團體，可能也很穩定，數千年來，代表相當一致的政策目標，運用了巨大的影響力。然而，這種團體中的成員資格，主要界定對這些利益的干涉標準——即杜魯門所謂對其他團體的要求。甚且，這些團體繼續關心選擇達成其目標最好的戰略和戰術，而社會團體典型上卻不能如此。

在更要直接地聯繫社會團體活動與政策決定之發展性提議上，卻依然有真正的好處存在。一方面，這種步驟擴大了資料的範圍，而使可變性的團體理論才能聯合；另一方面，這種命題特定了此種社會團體的衝激在其下面發生的條件，因此，增加了整個團體理論途徑的機動特徵。穩定——分裂——抗議模式的一個優點，便是它確能聯接社會團體與公共政策上的衝突與明辨的功夫，而強調保留在主觀認知和在團體利益上的作為，因此，關於社會團體在團體理論方法上的地位之決定性問題，不

是有無的問題，而是這種概念和基本假設，如具體地在穩定——分裂模式准許這些社會團體的政策衝激之滿意說，在什麼範圍內的問題。

### 社會團體和穩定——分裂——抗議模式

穩定——分裂模式的優點在不同團體理論學者的著作上頗為不同。雖然，道爾在金屬廠一案的討論上提供了一種就此一模式十分良好的發展說明，他事實上相信這種紛爭是一種「罕有的例子」（一九六一年，頁一九八）。雖然關於這種活動的類仍，並不直接與這種判斷矛盾，洛威瞭解由社會運動帶來的此種干擾——在效果上，有大量抗議取向的社會團體——是極其重要的。在某些情形，這種模式的確定要素，頗為含混也是真的。例如，班特萊的著作和杜魯門的著作，就「有潛力的活動」和「有潛力的團體」討論頗為簡明。另一方面，我們已經瞭解，這種模式至少在本文上所提及的每一位團體理論學者所援用，並且依賴如杜魯門所作為的一般性職業、鄰里、宗教和種族的範疇，而藉以證明習俗方法上相關之非政治化的團體，以避免含混不清的「潛勢力」為一概念是十分可行的。

誠如在此種方法上所使用的，穩定——分裂——抗議模式既不是一種如社會生命的簡單反射般完全自由化約論者意圖要解釋的政治行為，也不是一種完整的「政治」理論，而政治活動能在其中由政策本身的需要來解說。一方面，大多數團體理論學者，特別與道爾都主張，關係到「食物、性慾、愛情……娛樂、居室、幸福、友誼、社會尊重等等」，（一九六一年，頁二七九）為非政治的私人目標，

而就大多數認為政治活動正常地採取輔佐之主要立場的美國公民而言，充分是原始的和支配的。結果，在金屬廠一案的鄉里關係與繼續其傳統生活方式之關係，祇有當尋常的非政治活動不再有效時，才會轉移到政治上去。另一方面，這種社會活動和隨著分裂而來的政治活動兩者，經常如影隨形，隨時都可見到。不論其起源如何，然而團體政治活動不被視為對外在情勢所加給社會需要之盲目反應，而是為團體成員自己達成團體長期建立之客體的一種嚐試。誠如前文所指出的，成就這些私人的政治上目標的嚐試，是由一連串政治條件——制度的，規範的等——所形成的，對這些條件，團體理論學者都已詳述過。<sup>④</sup>

④ 當然，團體理論學者也承認，基本上有一些政治活動，與其說是由「原始的」自私目的，毋寧說是由政治上的自私所鼓動的。道爾使用 *homo politicus* 這一術語指述包括職業性政客在內之少數個人，他們的政治活動反映了其自己的政治生活面。

總之，這一模式能使團體理論學者認識到政治活動之機關和目標的經常性支配地位，毋須對待政治活動為非政治行為的簡明反射。因此，如團體理論學者自己在其經驗性工作上所做的，當模式被諸如「均衡」和「潛在」活動這些術語的意含剝奪了一定概念上的困難時，它提供了討論，也許是解釋美國政治史上許多顯著的抗議運動頗為複雜和微妙的方法。

穩定——分裂——抗議模式上「組織」和「制止」的代價

這種穩定——分裂模式，作為說明相關的和重要的抗議活動之可能性，特別是那些充滿衝突的一九六〇年代出現的抗議活動，至少由同一時期中發展的兩個相關研究和分析的新領域已經予以加強：個人必需在締造新政治組織上所要付出的代價，和某些抗議者能從他們的政敵方面所期待的報復。

雖然，組織的成本並沒有由本文所討論的特定團體理論學者很周延地考慮，譬如，道爾首先提議，社會團體的成員，理所當然未能抗議他們的悲慘命運——亦即：當他們的社會活動分裂時——因為此類抗議會使時間、精力和金錢從其他正在進行的私人活動上分散。照道爾自己的術語來說，政治利益團體之出現，非常依賴相關的「刺激性經濟」。祇有當分裂——如在金屬廠的情形——嚴重地騷擾了那種經濟時，才會發生活動的結果。此種活動相對地受到限制的一個理由——也許是發展中的有效組織之一筆大成本。

「組織成本」的意義在曼柯·奧遜 (Mancur Olson) 的集體行為之邏輯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一書的基本討論上已有還原的公式。一言以蔽之，奧遜的分析考慮所期望之好處是，「公開的」或「集體的」情勢中，非工會會員享受工會活動成果的工資問題。如果一個社會團體或其他的集體組織之全體成員享受這種利潤（即較清爽的空氣或較良好的公共運輸），一旦任何人都享受到時，在此一意義上，這一好處是公開的。換言之，這一好處不可能實際分割而給予一人或少數人，而必需同時供應全體。奧遜主張，在此類情形，如果是一個龐大的社會團體，通常就很理性地（即自利的）讓其他團體成員為這種利潤而工作——例如，藉籌組一次抗議——正因為不積極的個人從利潤上獲益之多，不下於那些付出籌組代價的人。因此，在罷工者尋求提高金屬廠工資的集體好處之情形

下，「理性的工人」，在奧遜的意識上，享受了工會活動的成就，此即，若非繼續工作，便即（如果社會壓力使得那樣無利可圖時）至少不浪費他們的時間和精力在積極參與罷工上。

⑤ 求得對這些問題有一個闡明性和創造性的討論，參閱 Robert Salisbury 在本叢書第四冊的「利益團體」一文。

然而，誠如奧遜所指出的，如果這個社會團體的全體成員，以此方法而「理性地」作爲時，就沒有人以罷工的方式而爲集體的好處去作爲了，那末，這種努力就會失敗。在穩定——分裂模式的情形，除非非工會會員都享受工會成果的工人問題被克服，一種既存活動模式之分裂，就不會導致有意義的政治抗議；而先前的穩定模式，理所當然就不被保存。但是，如在金屬廠一案中的抗議就會發生。至少，在若干例子上，社會團體的成員就不是白享工會活動的成果了。組織成本和刺激的另一種分析（巴納特，一九三八年；克拉克和威爾遜，一九六一年；特別是薩里斯堡，一九六九年；和弗洛立克、奧本海瑪以及楊，一九七一年）依照領袖們技巧地誘使，有潛力的支持者對共同的努力作出各別「捐贈」的範圍，已部份解說了此類發展。⑥

⑥ 在其他諸因素中，他們引述組織領袖的企業角色，他們很成功地指出，製造有組織活動之有限度貢獻的自利性潛力支持者，但其他的人也同意如此做。以那種方法，每一個別因素在交互中支持了既有的可能性，即一個有技巧的領導組織，事實上會獲得集體「善」。

然而，並不是爲了尋求集體的好處之每一組織的失敗，能以未來領袖們無能克服非工會會員，卻享受工會活動成果的工人問題，予以解釋似乎是很清楚的。別的一些學者已強調一套極不同的成本：對抗有潛力抗議者迫在眉睫的未來報復，和對抗那些先前已設法抗議的現行行爲。這些成本是由團體的敵方所加的，他們依照穩定——分裂模式，從既存的社會——經濟關係模式上受益，並且如果一次有效的抗議出現時，就會受到責難。這種主張——不同的壓迫、抑制和鎮壓，使許多利益免於團體過程之干涉——在有些人看來，如一次範圍廣大的控訴，不僅是美國團體政治的自身，而且是祇集中在積極、可見的團體之團體政治文獻上。這樣一種有嚴格限制的後見之明，巴哈雷克和巴雷茲 (Bachrach and Baratz, 1962) 在其對「誰統治。」一書的著名批評中作過這麼卓傑的辯論，僅次於權力的兩種面相 (The Two Faces of Power) 一書之一的經驗討論。然而，整個論辯十分貼切地適於團體理論的立場——至少，那種立場被美國團體政治的作家們的批評所澄清。誠如我們已經瞭解的，麥康奈因爲小選區政策排斥或壓制許多團體利益，所以就毫不含混地責難小選區策略；因此，由聯邦政府所擬訂的農業政策組織，已有組織地排斥了貧農、佃農和佃戶的利益，同時也裨益了更繁榮和有政治上影響力的農人。縱然當非政治活動分裂時亦然，然而，政治活動的利潤一定大過組織抗議和壓迫或報復所可能造成抗議者傷害兩者之成本，雖然，這種壓制的實際範圍，就目前爲止所完成的研究基礎是不很清楚的，在此種「無可辯爭的案子」中，如美國的種族關係者然，若干壓制的存在是衆所週知的 (伍芬格，一九七一年，頁一〇七七)。

準此以觀，一種「壓制成本」的關係，加強了穩定——分裂——抗議模式。例如，如果我們忽視

這些成果，誠如托克維爾在許多年前所指出的，由不利益的團體所作的抗議，時常緊隨著壓迫或不平等上的一種式微，的確似乎令人不解；因為，如果窘況較不尖銳，在作出抗議上，他們的利益也就不太尖銳（如奧遜的術語中，由抗議尋求保障的集體「善」之重要性所測量者然。因為，從鎮壓成本上觀之，不平等的式微，也許同時意指一種流行的鎮壓之式微，或在未來的類似事件的式微是很清楚的；所以，抗議也許仍然在這些條件中產生結果。換言之，當集體利潤範圍內的式微，被抗議爭取到了時，也許有一種甚至因鎮壓所加諸成本的更大式微就存在了。一種與「鎮壓成本」的關係，也有助於說明若干先前非政治活動的分裂類型遭到挫折的社會團體之成員，就不會結合為全體會員尋求集體利潤的抗議政治利益團體的事實了。在許多情形上，此類參與或不參與的決定，隨時可以不同團體成員對鎮壓的不同弱點而說明之。①

● 例如，在某一工會的全體工人，以大致相同的方式，使一個工業工會在認識上（一種集體善）獲益，但是，那些規模較大的工廠之工人，因為企業控制和報復更難產生效果，也許就更易趨於罷工，因此，可能的鎮壓成本就要低些。

由於在原則上，一個階級何故不能被視為社會團體並無任何理由，設若抗議發生時，在團體理論分析上包括的政治上各階級之抗議甚至就可能。誠如在我們對每位作者的討論上所指出的，團體理論學者們沒有賦予具有其他見解之馬克斯派信徒和許多歐洲學者們階級策略之卓越性。但是，這僅僅是經驗性判斷，不預先排斥事實辯明政治活動的地方之階級的，或近於階級的政治活動之討論——如道爾

所指出在內戰前新哈芬的情形是排斥的，或如麥康奈指出在十九世紀末期的農村抗議事實，或如洛威所深信，關於確定的新政或新政前之聯盟運動，和更近來的一些「高峯聯合」(peak association)。同時，有限度的階級策略之範疇，能部份說明組織和鎮壓成本的標準，這些時常使集體作為發生困難，特別以各大團體為然。

然而，就全體來看，團體理論傳統，事實上能分析許多實質的情況，團體界定階級的，種族的或宗教的術語條件，已是政治情況上一個重要的要素——或者已明顯地趨於沉默了，既已主張這一點，筆者現在下文的討論上，集中重點在團體理論傳統遭遇的某種困難，更要有有限的地區上，即在一個特殊社會團體尋求轉變其先前穩定經濟或社會關係的案件。這一點可藉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一世代期間最重要的內部政治衝突之資源——黑人要求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平等——就能很方便地獲得闡明了。

穩定——分裂——抗議模式和蒙哥瑪利市的公車抵制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幾年，美國的黑人不斷成爲一個社會團體的成員。彼此不斷地交互影響，分擔著共同的生活方式——事實上，是認可的次級文化。同時，無論如何，他們要求平等的大量民權抗議，深深地重鑄了美國的政治。就團體理論的方法來說，這些抗議的重要性，是很容易由金恩博士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於一九五五年末在阿拉巴馬州、蒙哥瑪利市領導杯葛市公車制度這種黑人要求的第一次重要事件來闡明之。

茲撮要敘述這次杯葛的複雜事件如下：羅莎·派克斯太太（Mrs. Rosa Parks）因為不願在一輛市公車上讓位給一位白人乘客，而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一日被捕，不到三十六小時，蒙哥瑪利市的黑人社區，已組成了一次杯葛公車的抗議，不僅抗議她的被捕，並且也抗議實施隔離的法律。一旦組織完成，這次抗議似乎在許多方面是與尋常的團體理論分析一致的。由金恩博士領導的這個政治利益團體——蒙哥瑪利市市政改進聯盟（the Montgomery Improvement Association，以下簡稱M·I·A）集中其初步的努力在取消公車上種族隔離的特定問題上。至少，為要使問題過份戲劇化而不遭到忽視，M·I·A協助促成由聯邦法院通過一次有利的判決。這一抗議因此擴大了衝突的範圍（夏特桑奈德，一九六〇年，頁一九），依照麥康奈的說法，這次抗議有效地訴諸一個非常廣大的選區選民，因此，M·I·A的少數積極份子（部份是黑人牧師）利用此種資源作為正當的教育，他們認可的社會地位，和維持平民支持的組織技巧，和（如杜魯門所強調的）他們自己團結的正式教育；在外表上，這個團體鞏固了「接近」許多戰略上置於政治權威上的途徑，以與其他的團體締結聯盟，其中包括同情的白人，並將他們的活動與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之類似性質的聯盟取得協調。說服、交涉和衝突的最後過程產生了結果，特別超出公車的直接問題之範圍，在某種意義上那的確是程序運作，沒有一個行動者能全盤預料到它們的充份事實。因此，如道爾順理成章地指出的，一九六〇年代中的這些成就，部份反映了友善的總統統禦術之衝激。依次，這種統禦術又反映了選舉計算和南方黑人直接訴諸美國集體對基本常模之承認。接著的十年中，所產生的結果便是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的民權法案。

這種人人所知道的杯葛及其影響之團體理論的說明是很動人的，部份因為這種說明同時說明了黑人的特定勝利，和我們一旦轉向反對團體的龐大資源時，他們在一九五〇年代和一九六〇年代中，為全面爭取種族平等上有限度成功兩者之故。這種杯葛因此闡明了複雜情勢中團體理論的門徑，便於經驗性研究的方法，縱使並不常如定量分析般正確，特別於透過明確的公式，和經驗性基礎的命題。

然而，這種杯葛特別有趣，因為它涉入如此多的蒙哥馬利市的黑人之突如其來的政治活動，縱然如此，如以他們的活動來測量，他們先前尚未顯著地被任何周延的組織，或一套合意的特定公共政策目標結合起來。同樣切中肯綮的，這種民權運動的基本形式——特別是其迅速地普及和熱烈的支持——除了共有的價值、期望和社會溝通的模式，以及美國黑人中的宗教經驗外，似乎完全不能說明。支持公車的種族隔離抗議，以顯著的速度蔓延到推定為黑人社會中，非公車乘客的中產階級，和其自己的公車並無種族隔離的北方黑人之中，縱然這兩種團體不可能從杯葛的成功上期望有意義的獲益者亦然。<sup>38</sup>

<sup>38</sup> 在考慮這類全國性的問題上，好像杜魯門的社會團體成員彼此互動的類型學沒有充分適用性。例如，若以美國黑人的龐大人口和廣大的地理分佈而言，他們似乎不適合他的團體的全體成員彼此互動的標準。然而，這一點不像是很重要的批評。的確，在閱讀政府的程序一書時，不集中注意在一切社會團體的彼此互動上，而是集中在有類似意義的其他人（縱使在不同地理區域內）之類似行為的互動上似乎更有意義。此種互動理所當然導致那種共有的參考架構，在美國黑人的情形，此種參考架構意指一種明確的生活方式和明確的次文化。

很顯然，因為杯葛部份是對種族隔離的一種象徵性攻擊，廣義地說，是對黑人不平等的整個社會制度的攻擊，所以杯葛喚起了如此衆多的支持。無論北方和南方，都訴諸先前在政治上不活躍的許多黑人。一方面是這種祈訴，另一方面是這種蔓延的社會支持，的確說明了有時合作，有時衝突的民權取向之團體的混合性，許多觀察者和參與者，在當時以此種情形，作為一個大運動的一部份。

總之，M·I·A和數個其他的民權團體，在政治的比例上之重要性，變得還要快過數十年來黑人社區的經濟和社會上獲益之所得。如同在道爾的金屬廠爭議中一般，如果不是整個社會團體的干涉，我們至少擁有不再在政治上沉默之普遍增加的蒙哥瑪利市黑人居民的比例。團體理論學者們能轉向穩定——分裂模式，便是在這樣一種情形中。就以這篇短文的導言而論，這種模式的使用是必需的，因為用作解釋的資料，不僅包括全體黑人在政治上積極行動者比例的改變，而且在數字上的巨大改變，因此，變成積極行動者，是黑人在比例上的一大改變，但是，姑且准此而論——一個傳統上沉默的團體，如何轉變成為杯葛情形中的大量政治抗議——這種模式的適用性就變得大有問題了。

### 穩定、抗議和社會轉形

羅茲曼主張（一九六〇年），杜魯門的方法在分析如美國種族關係這種問題上通常是不適當的。

雖然，我們已經瞭解，團體理論的觀點可以說明杯葛的許多特別情形，蒙哥瑪利市的抗議，不符合團體理論的方法所必需用來解釋此種發展的穩定——分裂——抗議模式上的嚴格假設，似乎是很清楚的。詳細地說，杯葛似乎不符合既存的私有目標和活動轉變成為政治模式之期望。既非M·I·A，更

非這個時期的其他民權團體，可合理地視爲，阻止或變更分裂進行中的社會活動之一種穩定模式若干不利益發展之嚐試的一種在尋求恢復的抗議模式。當然，因爲黑人社區的成員彼此間，以及與城市中的黑人在相當種族隔離的方法上，已有數十年之久的交互影響，所以，先前的模式已有許多穩定的要素。但是，那種相互影響，肯定了黑人的卑下地位。杯葛所尋求保護的當然不是那些活動，因此（依照班特萊的意見），更不是那些長久成立的活動模式以宣洩這些利益。反之，如果我們視活動爲對他們的目標之一種具體指針的話，我們便可瞭解，黑人的抗議，在尋求改變南方種族關係的錯綜結構。

在一九五〇年代後期，事實上，有一個社會團體，的確轉向政治以保持和恢復種族際活動的先前同一之穩定模式。但是，有一個南方的白人團體，卻反對黑人的抗議和種族改變的要求。

這一點也許類化了美國以外的種族關係。依據穩定——分裂模式，新的抗議性政治團體，應尋求恢復社會性睦鄰關係，以對抗正式出現的威脅，保持或重建一個經濟市場，以對抗「掠奪公司」的分裂，或保障勞工運動的集體交涉地位，以對抗僱主的反擊。在這一種情形，既存的私人（非政治）的活動——扶養一個家庭，定居在一個特定的鄰里，要求生存，或其他等等——繼續界定此一目標。唯一的不同是，政治行爲於適當的恐懼（鎮壓）和優點（建立一個組織成本對比之利潤）的計算後，已被選爲最好的措施了。

有幾點考慮指出，當一個社會團體尋求一個新的目標，一條涉入其本身正在實施的社會活動之變更或終止的新活動途徑時；這些新的活動就落在穩定——分裂模式之界限以外了。效舉一例說明之，這不是設法重建既存的情勢，這些新的利益時常尋求轉變，以便此一既存的，正在履行的活動之基本

脈絡成爲可能，亦即，整個種族不平等的文化模型支持黑——白的關係。第二點，不似食物、運動、祭祀、性和職業上的利益，本文問題中正在轉變之利益，本質上是政治的，至少在美國政權上是如此。他們要求的改變是涵蓋極廣的，所以，它們祇可經由政治作爲來贏取，因爲它們對政權自身而言，時常擁有直接的錯綜性。除了最初爲私人的；繼之變成政治的而外，這些轉變中的利益，至少在美國這樣的社會中，必定涉入訴諸政治的手段。在這一意識上，它們一開始便是政治的。第三——雖然這一點引起複雜的理論問題——在此種情況下，組織成本，事實上，整個「刺激經濟」的計算也許暫時地低落是吾人所相信的一些理由，部份因爲所期望的利益不能與已知的成本作有意義的比較。如亞里斯底特·左貝格 (Aristide Zolberg) 所指，當每一件事似乎都可能，且尋常的「理性計算」被遺忘（一九七二年）時，那裏就出現成爲一定高負擔的時間存在。

如果一定要強調，這個問題在範圍上是受到限制的；美國政治史上的許多抗議，可以用穩定——分裂——抗議模式來處理。因此，解決這個問題，需要與班特萊的主觀利益方法來一次決裂，班特萊的方法依次意謂藉政治團體可觀察的活動，對政治團體的認同之意。從另一方面來看，雖然，後來之團體理論學者們因承受在突然的抗議情形中社會團體的相關性，而部份放棄了班特萊的現實程序觀，他們在一定情形上，未能採取關係團體和政治利益概念的相同步驟。

### 主觀利益和政治抗議之成本

設若穩定——分裂——抗議模式有種種限制，我們就轉到客觀的利益方法上去，以便說明突如其

來的緊急社會抗議。然而，第一，我們先要扼要地檢查一下另一種方法，同如穩定——分裂模式，此一種方法特別依賴主觀利益，但是，因為它並不假設正在進行的社會活動之分裂，所以，這種主觀利益不同於此一模式。反之，這種觀點主張，改變一個既存的社會情勢之慾望，就如同社會團體成員刺激經濟上出現之充分改變的結果，所以，抗議的成本不再超過利潤。在這一觀點上，許多蒙哥瑪利的黑人在終止種族不平等上有一長期性承認之利益。<sup>④</sup>一九五五年前，他們未能行動，因此，可以組織的成本、恐懼報復和非政治活動的巨大誘惑的一種綜合性情勢來說明之，這一切很容易適合團體理論的方法。因此，一九五五年突如其來的杯葛，並不反映先前的穩定和滿足情勢的分裂，我們已瞭解，這是難以置信的，而在學校種族隔離政策的情形，於最高法院的判決之後，逐漸增加的成功或然率，和嚴酷報復之遞減或然率。

④ 誠如 Wolfiger 十分正確地指出的：「至少，有些黑人是不滿意的，且設法就此有所作為」（一九七一年，頁一〇七八）。

但是，正因為有那麼許多蒙哥瑪利的黑人，在一九五五年前許多年沒有作任何對種族隔離政策之抗議，結果，這種解釋僅被視為如口頭甚或非口頭表達不滿的主觀上之優先要素，由於團體利益不能與行為上宣洩的優先要素認同，這種觀點實際上拒斥了班特萊的利益、團體，和活動的方程式。<sup>⑤</sup>結果是認識問題上以為重要其實是無價值的東西，這是班特萊的利益——活動方程式所要避免的。特別是我們目前關於利益的內容，要仰賴團體成員的口頭上主張，這是屬於要求、混淆，和有意無意間自

私自利地彎曲之多數。這種信賴依次創造了認同中的團體成員的困難。例如，無疑地，在蒙哥瑪利市或其他地方，有若干傾向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的民權感受之黑人的存在。但是，也許因為他們從繼續存在的種族隔離上獲取經濟上的利益，當這個問題如同杯葛案的情形一樣變得敏感時，仍然不願有所作為。然而，也許很可能有另一些傳統主義的黑人，他們在杯葛案之前，口頭上反對民權的期望，但是在危機呈白熱化時，卻支持了金恩博士。這種情勢創造了一次嚴重的困境。考慮到如那羣——不過，僅是那羣——黑人團體成員時，他們卻表達了不滿，意指包括了在團體中應該被排斥的人，即僅口頭上聲援的黑人。不過，它也排斥了那些不以言辭或口頭反對民權的黑人，由於他們願意——且曾——參與了實際的杯葛，他們應該被包括在裏面。

● 我們也許要指出，由於這個團體（首先）由分裂前之社會或非政治活動來界定，茲後由其政治的或抗議的活動來界定，而穩定——抗議方法避免的正是這種困難。與團體利益活動方程式的分裂，因此減少至最小限度。當然，活動改變了，但是，由於在每一種情形下，有一種意圖與其說是透過早期的非政治手段，毋寧說是透過政治手段以保障此同一利益，故為基本的利益，因此，團體的同一性則仍不變。

同理，不像穩定——分裂模式，這種方法未能界定依照種族為準的團體，因此，從社會生命（此處指種族關係）和政治活動（杯葛）間的連繫上分開，這是團體理論傳統所要求予以建立的。畢竟，什麼原因發動了這次杯葛是個別黑人對在白人支配的社會中，他們的共同處境和共有的經驗之不同反應。

比較而言，班特萊起初的利益——活動方程式，沒有從主要依附於優先權或、和利益的口頭表達上受到挫折。班特萊的方法也不要求我們區分蒙哥瑪利市的黑人——如這一選擇的、廣義的主觀主義所必要的——成爲兩個截然不同的團體：一個爲積極的黑人之政治利益團體（和其白人之聯合），以及一個包括全體其他黑人的社會團體。畢竟，嚴格的班特萊學派界定，祇如那些可見且積極有志於保障一既有目標的黑人之相關性團體。然而，如果祇考慮政治上積極作爲的人，試問一個中心問題就變得困難了；在杯葛期間，相當少數的民權積極份子，何以如此突然地從他們先前沉默的黑人同胞上，取得如此多積極的支持呢？

### 客觀利益：選擇性的方法

擺在任何特殊的主觀利益之觀點前面，有更進一層的困難存在，這種困難依次闡明了客觀利益分析的理性。且再以蒙哥瑪利市的情勢作爲例子，那裏有一些黑人，在一九五五年前的幾十年，以文字和行爲表示對種族不平等的抗議。不過，縱非這羣以其社會活動——他們不斷在參與之工作上、公平上、個人的互相影響上之種族隔離的不平等關係——所指示的個人，至少與流行的種族制有若干接受或合作是存在的。若以此種同時存在的政治上反對和社會上適應而言，一種持久性適應之主觀利益觀點不得不說，這些個人的目標（即主觀利益）是互相矛盾的。而相同的判斷一定也由那些在他們杯葛時接受和參與其他種族隔離或不平等關係的許多杯葛者所作成。

就直覺上來看，由這一點「僅」依賴行爲利益之指標上，縱然沒有偏見，也似乎是強制的。因

此，可以用「這種矛盾」是臆造的來論辯。由於杯葛者在他們堅持改變上十分清楚，這種論辯也許是可行的，他們的真正利益是在獲得種族上的平等。但是，縱然此類抗議性政治行為伴隨著熱烈的口頭上真誠抗議，何以應當較諸通融性的社會行為更要處理得嚴肅一點呢？說到「真正」的利益（或其同義詞）以回答此一問題，事實上，意指觀察者關於這種情勢正主張了其自己的判斷——精確地說，這正是主觀利益分析所設法避免，而客觀利益方法卻公然採取的步驟。①

① 此種裁定——事實上，觀察者就關於一個既成的團體或情勢的分配之假設，將證明為決定性的——可藉任何方法而避免也不很清楚。任何經驗性的分析，涉及不同於觀察者面對無數資料之一些抽象性。

無論如何，正因為透過明確的假設架構，公然涉及觀察者的判斷，客觀的利益方法可以描述同時存在的政治衝突和社會通融的情勢，於如此做時，並不破壞其自己的主張。的確，我們當可瞭解，由於客觀利益方法是導致尋求主要改變的抗議正在進行的合作行為之非充分特徵，這種客觀利益方法視這些行為並不矛盾，而是密切關連的。這些觀察是可能的，換言之，一旦我們非常清楚地區別了若干有益的社會政策或其他「善」的客觀（非承認的）利益，和宣示在個別或團體行為上那種利益的主觀承認。②準此而論，蒙哥馬利市的黑人社區，在終止種族隔離的種族關係之模式上有其客觀利益，直到一九五五年，派克斯太太被捕時止，卻並未認識到此種客觀利益（如同行為意向）。在那一點上，這種利益便變成主觀（承認的）了，黑人社會經由M. I. A組織在目前承認的利益上行動。③

● 雖然，筆者到處 (Greenstone, 1969; Greenstone and Peterson, 1973) 使用 Ralf Dahrendorf 的淺顯利益術語。爲了避免比較這兩組術語的延展性分歧，筆者將堅守較習慣性和主——客觀利益的用法。

● 如果該團體已有相當時期不活動，然後在驟然間復活時，就現存之政治利益團體而言，我們可能也說到先前主觀利益之承認。此處隱含了主觀承認（或明示）的等級上標記，這是在 Greenstone and Peterson (一九七三年) 著作上所討論的一個問題。因此，繼續與抗議俱來的同時調解；即在杯葛期間，在若干不平等的種族關係上之繼續參與，可解釋成爲總體變更或改變上對該利益之部份承認。完全的——在行爲上宣洩的——承認，意指與此種不平等制度的完全不合作，因此，代表該有限度的情形。但是，除了充分革命以外，這是少數所能達到的一種承認水平。

因此，一種客觀利益指定什麼是對一個既定的社會團體 (弗雷哲曼，一九六六年，頁二二)，和目前討論的目的是好的，這種益處可能經常是一種特定公共政策之完成 (或拒絕)，亦即，撤銷市公車的種族隔離。一般來說，客觀利益之內容來自於社會團體的社會場所，與其他團體的穩定關係可以獲得改良。因此，不論它們是否在任何既定時間依靠它來作爲，與美國黑人相當清楚的例證，它們的從屬性或社會隸屬地位，指出在抗議和變遷的既存之種族關係上的客觀利益。更詳細地說，蒙哥瑪利市的黑人在杯葛之前，在終止公車種族隔離上有一種客觀 (縱然行爲上不承認) 的利益存在——此即，轉變 (消除) 這種特定的活動模式，事實上，是支持這種模式的較大社會系絡。

很顯然，使用客觀利益割斷班特萊的利益和活動的方程式。一個團體的成員據說具有這種利益——一個特定的政策，據說對他們是「好的」——不論他們是否經過過政治活動，或 (事實上的任何其

他行爲類型)來找尋。若以這種缺乏活動爲一種標準，這種客觀利益的方法，在歸屬某些特殊客觀利益到一既定團體上，具有其他特定保證的問題，則是之故，班特萊和杜魯門明確地拒絕由外在的觀察者所獲致的任何這類客觀利益之責難。此類責難，連同他們的一切政治偏見和理論上的約制，都留給這羣觀察者，而非留給團體成員自己的行爲，團體利益上所具有的決定，即對其成員爲「善的」，因此，是這個團體所應當採取的活動。

然而，正如同班特萊自己所觀察，這種客觀和主觀利益的分野，植基於與我們通常的語言使用之一致性上。至少在英國，說瑪麗的(客觀)利益變換工作是非常適當的(不論她是否想到，對她都是好的)，和如說她有志於改變(較喜歡如此做)。例如，如果當代的英國不能夠在一些經濟性可獲利的公共政策上區分相當持續性的客觀利益，與有關的那種政策，也許在個人的態度、政客的雄辯，或有益的情報類型上，十分迅速地改變優先權的話，那麼，她顯然是貧窮的。

然而，筆者的目的不是停留在喚起、說明和認可這種客觀利益用語的許多語言和哲學的論辯上。(貝利，一九五五年，弗雷哲曼，一九六六年，畢特金，一九六七年，巴爾巴斯，一九七一年；康諾利，一九七二年；彼特生，一九七〇年)。●反之，筆者所關心的是要表示以什麼方法，客觀利益能協助發展團體理論的方法。在這一關聯上，指出客觀利益方法很像若干要重的穩定——分裂——抗議模式是很重要的。首先，如本文所使用的，主觀利益和班特萊的利益以及活動方程式是平行的。主觀利益在這一點上與其說祇是一種抽象的或口頭上的優先，毋寧說是一種政治上的取向。●第二，穩定——分裂模式和客觀利益方法兩者，有意將一個團體的社會狀況特質，聯繫到其政治所需要的內容

上。例如，每一種方法論都描述如全國工廠主聯盟（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簡寫爲N·A·M）爲高峯聯盟之出現，作爲保護商業社區抵抗有權力的工會之入侵，或否認政府對統制之努力。在穩定——分裂模式的情形，這種政治活動是設計來保護界定之社會團體的商人所共享的活動。就客觀的利益方法來說，這些新的利益團體，縱然迄今尚未獲得充分承認，是組織起來繁榮共同利益，以扼制工會和政府權力的。就兩種研究方法來說，關於所期望要改變之態度——如果這種態度出現時——離開了這個團體的社會情勢，就沒有相關性和意義了。第三，設使在有利的條件下，客觀利益要奉行的期望，密切地與穩定分裂模式上的不景氣資源的觀念平行——此即，因爲在滿足的社會情勢上，所以，政治活動在那種情勢就沒有採取，並且潛在的資源沒有「浪費」，或者，從抗議上所應獲得的類似利益小於類似的成本。在不景氣資源的情形，社會團體尚不是一個政治利益團體，就穩定——抗議模式來說，指明改變關係成本和抗議利益的條件是必要的。同理，一種客觀的利益分析必定指定種種條件，在這些條件下，一種主觀利益得到承認，而獲得因而就發生了。

● 總之，筆者亦頗不願就經驗性研究上對輸入客體或潛在利益之有用性再事論辯，那種論辯筆者已作了不少，特別與 Paul Peterson (Greenstone and Peterson, 1973, chapters 2 through 5)。

● 當然，雖然這種觀點似乎是馬克斯與班特萊的觀點，吾人對此觀點可能有主觀利益，並不是唯一可能的解釋。但是，如果我們視主觀利益僅爲一種優先權，而不提及活動，主——客觀的區別就會失去其許多有用性，蓋利益之承認就不必說明與其激烈活動之抗議運動的分裂。

然而，當指明利益的內容時，我們就達到一個決定性的差異點。我們可觀察穩定——分裂模式上穩定進行的社會活動，並假定團體成員期望一種他們那時在政治上尋求的既定目標。但是，客觀利益之「存在」——一種既定政策最後有益於（適於）這羣社會團體成員的事實——不可能以相同的方法觀察。用另一種方法來看，就穩定——抗議模式來說，團體利益之內容，已經呈現在界定團體的社會，非政治活動之中了：商人在藉他們共同關心的利益而轉求之於政治之前，指出了其所共享之利益。祇有當全國工廠主聯盟藉有組織之政治活動之協助而製造利潤時，才形成全國工廠主聯盟。祇要它如此做時，客觀利益方法才輕易地採取這種分析。隨著抗議之出現，所理會的對既存社會活動之威脅，可描述為有裨益團體之客觀利益的主觀承諾。但是，在那些情形，社會團體成員的政治性干涉之轉變基於保持既存的情勢，而穩定——分裂模式因此解體，客觀利益方法不會，且不能依賴直接觀察來建立團體的客觀利益。當然，我們可經驗性地觀察到被一種特殊政策（如撤除種族隔離）改變那些社會團體情勢之方向。縱然團體的成員並不積極地設法去改變者亦然。然而，我們祇能假說，在一定條件下，個人事實上會發現這些成本不可接受，然後就積極地要求改變。團體的行為——事實上，其在行為上所宣示的優先權，如終止種族隔離——因此，與其成員的社會情勢是相關的（種族隔離和較卑微的地位）——但是，祇在一種臨時性的方法上。尋求改變的行為祇出現在其他一定條件所主張的地方。因此，一種客觀利益的屬性意指假定將會得到承認的主觀利益，因為這種主觀利益在團體成為政治化而不能被觀察到是很清楚的。另一方面，至少在原則上，一旦條件獲得了，看看抗議是否發生，以測驗這些經驗性之假設是可能的。

然而，此一步驟決不是容易的。事實上，不是客觀利益方法或穩定——分裂模式屢屢指明這些相關的條件，因此，成功地預測任何精確的未來抗議。依筆者之見，這種類型的精確預測，設若依變數之重要性在兩種方法的範圍之外時，縱使不可能，也極為困難。（事實上，我們不能充份地任意挑選這些突然出現的抗議發生來扼制此種外來的影響力，因此，發展出可依賴的預測性假設）。依筆者之見，吾人可期待的最好方法，便是事後的看法——說明過去已經發生過的事件之經過——或者，更通俗一點，藉證明其一度發生之資源（條件）以瞭解此種抗議之出現。此處的問題，是一種與客觀利益關係是否幫助我們形成准許這類分析上的命題。

縱然我們陳述這樣謙卑的客觀利益分析目標，然而，這種方法事實上是否闡明比南方黑人抗議立法上種族隔離更要複雜的發展，則仍然不很清楚。爲了要檢證這一點，更通俗地說，客觀利益的價值，我們可以轉到西奧多·洛威的著作上去。

#### 團體利益和社會運動：洛威對重大政治改變的說明

洛威的社會團體干涉要求新公共政策之討論，特別包括那些社會運動，如民權抗議，這種運動與其說是尋求保存或恢復，毋寧說是尋求轉變既存之社會生活模式。但是，洛威的這種緊急抗議性社會運動之分析，並不使依照先前客觀（即未認可）利益爲標準之問題公式。相反的，在每一階段，一種社會運動是一種有明哲、可觀察的政治關係行爲取向之集體行爲（洛威，一九七一年，頁五〇—五一）。的確，在這些社會運動上的會員資格，與其說是由具有如階級、種族或宗教這種非政治團體成

員之性格之社會屬性，毋寧說是由這些政策取向所界定的。當然，洛威的社會利益反映一文（一九六四年b）的確提到了社會階級。不過，在那時如同在一九七一年的社會運動的討論，他並未廣泛地分析任何社會團體之穩定的，不公平的情勢，爲一改變中的客觀利益之繼續資源，這在主觀上承認則尙未定數。

不過，不能因此就說，洛威的有希望之意見不能提供一種抗議性社會運動出現的說明。顯然，因爲他討論的社會運動，時常要求重大的改變，（雖然，我們已經瞭解他已將穩定——分裂——抗議模式應用到如農民和商人等的團體了）。在這些情形，洛威不能涵蓋穩定——分裂——抗議模式。然而，一九五五年前，瞭解南方黑人爲承認終止其不平等上有益，卻缺乏行動的手段，或恐懼此種行動所承受的成本，完全與洛威一九七一年的社會運動的討論是一致的抗議性社會運動的出現，因此，可視爲類似鎮壓或其他阻礙式微的結果——所以，剩下來的祇有指明使這些阻礙消除的條件了。不過，我們已經知道，這種說明意指主觀團體利益，除了包括行爲上宣示的優先權外，還包括口頭上的主張在內。誠如前文所指，因此，僅避免吾人口頭上描述的目標，先天上的問題將沒有較明確的方法。事實上，一次社會運動的成員資格，是否由政治活動抑由如種族或職業等其他屬性來界定，洛威沒有清楚地描述。例如，政治上不活躍的黑人，和那些在民權運動上活躍的黑人，屬於相同的團體（或運動），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 我們亦未告知，在命名階段，領袖氣質充分承認的聯盟（諸如保守派的建築聯盟）是否更要機動（並推定包括UAW）如在第二階段的聯盟在同一運動上（See Lowi, 1971, pp. 39, 18）。

另一方面，就客觀利益方法而言，作成抗議的政治利益團體，是一社會團體內的次級團體（由一個以上與不相關的政策利益標準界定的，諸如種族、職業、所得等），它承認一種目標和採取相繼的政治行為取向。

當然，就洛威來說，藉採取一種客觀利益的方法來解決此問題，因此，種族、階級、宗教等就界定一次社會團體運動上的成員資格為可能。迄至這個團體擁有社會性剝奪或不平等的地位時為止，它在社會變更中可說有一客觀的利益。這種利益一旦主觀地承認了，社會運動也就形成了。洛威最後並未探究這種分析的可能線索，然而，縱然如此，我們相信，它事實上也許避免了說明上的一定困難了。

就整體來看洛威的著作，的確其集中於團體成員資格上的精確標準上，則要低於有組織的政治利益團體和社會運動間的對比。不過，縱然在這一問題上，客觀利益的問題仍有其相關性。若以他在有組織利益團體的保守主義信仰上而言，洛威視社會運動為可產生重大社會變動的唯力量，但是在這一點上，洛威截然不同於一種客觀利益的未來展望。誠如前文所述，指出一種喚起重大社會變遷的客觀利益屬性，若有適當的條件，不問團體是否已經組成，意指即將認可和付諸行動的變遷可慾性之假設。<sup>(7)</sup>

● 自客觀利益觀點上觀之，問題中團體已獲組織之事實，也許是得自承認之利益的負影響可能性的條件之一，但是，它決不阻止那種結果。

依照客觀利益的術語，那末，如果如黑人或計時工這樣一個有組織團體的成員，於該團體正式組

成後，仍然處於不平等狀態時，他們在變遷中的客觀利益就會繼續。不管團體的官員變得如何保守，預見他們的成員之未來需求，一般民衆或其領袖維持之可能性，也許再度變成好戰份子，換言之，主觀地承認該利益和主動地尋求變遷。事實上，果適當的條件確能獲得，那末，成員就如看到由變遷所獲致的利益。團體的（不平等）社會情勢之「邏輯」就團體領袖們爲了保持一般民衆的忠誠，而訴諸好戰份子是有裨益的。●但是，此種發展與洛威的團體順從「鐵則」的主張是不一致的。

● AFL-CIO 不斷努力以保障更多累進稅結構之情形，似乎的確是真的，洛威自己指出的一個問題顯然就是再分配。

這種由客觀利益觀點所指陳，與洛威的鐵則間之困難遠甚於推定的可能性。指出長期建立的美國利益團體並不時常符合這條式微的「鐵則」有相當多的證據，洛威自己已提出了其中一些證據。在描述美國勞工運動有組織之保守主義時，洛威指出此種「反潮流」之存在，即爲汽車工人聯盟（一九七一年，頁一七）。在許多方面，於一九六〇年代期間，汽車工人聯盟的確較其他聯盟要有較多的變化；至少，在全國性的水平上，它繼續支持黑人種族平等的要求，甚至設法加強消除空氣和水污染的政治上要求。然而，這個聯盟設立太久，組織太龐大，有時——即一九七二年的總統大選——有太多其他聯盟之支持，所以不能適當地僅依賴好戰份子「殘餘」的標準來討論（一九七一年，頁一八，註）。汽車工人也不是獨一無二的。設立得還要長久的全國有色人種促進會，提出種族平等的要求已有數十年之久，而諸如 Sierra Club 這類環境保護者的組織，不斷主張同樣廣泛的目標也已有許多

年。

的確，當本文正在撰寫時，U·A·W和若干其他的工業聯盟，已開始要求非志願的加班、成品比例、健康和安規則以及工作本身例行或意外性質範圍內的管理權威，作進一步的限制。

當然，甚至汽車工人聯盟，爲了有限度的收獲而作成妥協、解決，卻仍不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的組織是真的。它以及那些有類似理想的團體之努力，決沒有消除洛威和麥康奈如此刻意描述之利益團體自由主義的模式。雖然，該聯盟的行爲（和其他一些聯盟的行爲）至少與變更（改良）中成員的利益多少抵銷其組織保守趨勢之社會和經濟立場之命題，則是一致的。的確，它們的成員在其愈是好戰的水平上已有變化的事實，符合這種客觀利益的水平愈是昇降至主觀的主張。

### 客觀利益和權力類型學之場所

有組織團體式微的問題，並不是客觀利益方法與洛威的著作相關的唯一點。在洛威的權力場所類型學的核心，關於團體實際衝突的特性，有一重要的曖昧點，這一點祇能藉有系絡地考慮客觀利益，繼而作相當程度修正他的最後概念——以他近來才勾勒的理念方法（一九七〇年）——才能予以解決。

洛威一九六四年的論文，在許多屬性中，指出他那時已證明的其他許多屬性中的三種界限，在典型的團體衝突水平上變化相當懸巨。最明顯的，分配和統制界限對於精英間私人協商的範疇上是有區別的——就如同雙方明顯地承認卻反於利益而作爲的直接公開衝突之對立，因此，就使用他們可用

的大部份資源。第一種類型表現了分配界限的特徵，而參眾兩院聯席會議在那種界限上，主要批准其委員會靜靜地安排之決議。比較起來，統制策略涉入不穩定聯合同公開在議會的鬥爭（一九六四年 b，頁六七九），誠如洛威所主張，這是一種與杜魯門（一九五三年）的國會政治討論是一致的類型。如果蒙哥瑪利市的杯葛，和類似的一些案件，提供任何指引的話，這些在衝突水平上的差異，似乎顯然是與主觀承認或客觀團體利益之承認有關。因此，那些承認在轉變（實質改良）其基本社會情勢上的利益團體，似乎就陷於高度衝突的政治策略中了。反之，如果此種在變遷中的廣義利益未被承認時，衝突似乎就大會減少，這種情形在分配政治上必然是真的，那裏，一定個人和小團體上的焦點，遮蔽了如種族或階級這些團體的利益。

然而，事實上，洛威在統制界限上的衝突觀點好像已經有所改變，所以，他一九六九年的討論，頗類似於麥康奈有幾分沉默的衝突之討論。例如，政府祇批准「競爭之領袖間解決的協議和調解」。洛威似乎攻擊利益團體之自由主義為有組織團體策略的意念，因為它藉「解決已增加衝突的問題和如何避免這種問題」，使它有助於作成統制策略類似於分配界限。（洛威，一九六九年，頁七一，七六）。

● 洛威明白地指出，利益團體的自由主義提及管制策略及其多少關涉卻並不完全合意（不可分割）的政策產出。他列舉處理與其說是單一物資，毋寧說是廣義物資「範疇」的一九六二年之關稅法，作為一個主要的例子（一九六九年，頁八十一）。

甚至更要意義深長的，一九六四年界限的論文本身，關於再分配策略上公然衝突的範圍是很曖昧的。一方面，再分配問題在「共有利益」的衝突上，分別了「中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或「有產者和無產者」（一九六四年 b，頁六九二）。「共有利益」十分「穩定和清楚，且在供應應理的基礎上非常一致」（一九六四年 b，頁七一）。誠如洛威親口說的，這些特徵是與馬克斯主義者或準馬克斯主義者所瞭解之階級衝突是平行的。不過，他說再分配問題並不經常如同典型的統治策略，是在參院或衆院議場上經過戲劇性的公開衝突來解決的。反之，國會批准由高峯聯盟或其他精英在「輿論和利益團體真空」（一九六四年 b，頁六七九，六八〇）中，私下協商的決議。誠如洛威正確地指陳的，這些觀察與其說是與階級衝突的希望一致，毋寧說是與密爾的精英合作觀是一致的。事實上，洛威承認在這種合作問題上，和再分配策略上的衝突，馬克斯和密爾間仍有差異存在，但他卻公然拒絕在他們中間作一選擇（一九六四年 b，頁六八一，註五）。

洛威十分警覺，衝突水平，在再分配和統制界限兩者上可能有變化，似乎是有充分保證的。美國在外交、軍事和內政之年度會計上的許多政策，縱使當其結果不可分割地影響了極廣大的團體時，已是在相關的私人間創制和決定的。美國參加越戰，便是一個恰當的例子。然而，那場戰爭，在稍後的年頭，喚起了嚴重的公開衝突。其次，縱然沒有在被認為階級的僱主和工人間引起激烈的再分配經濟權力，而十分恰當的華格納法案（the Wagner Act）也是一九三〇年代公開衝突的一件事。●更要近來的，曾經有過包括洛威親自選擇來作為再分配的聯邦所得稅立法之決定性議場投票在內的公開衝突。●

● 就以其在建立全國勞工關係理事會 (National Labor Relation Board) 以調節聯盟的管理關係上，雖然，華格納法案是一種管制措施，由於其贊助者偏好勞工聯盟的設立，這種法律是公然偏向一邊的。祇有僱主可被指控對勞工待遇不公平的事實，直到十年後通過了塔虎特——哈特萊法案，才是切合要點的僅有情形 (See Edelman, 1957)。

● 例如，Gore 對一九六九年賦稅改革法案的修正案，該修正案在參院獲得通過，實際上改變了其財政委員通過的條款。雖然，該修正案並不是減稅最進步的可能形式，修正案集中在低所得者中的減免類，遠要比委員的預見為大，委員會的意見削減稅率百分比，因此，十分偏向於最高所得分類內的個人。當然，類似的觀察可以制訂關於管理策略，公開在勞工問題上的衝突，是地方性的，但是，在有用性的規則上，則較不經常發生。

在這些問題上，如果主觀承認的階級利益，或一面尋求實質的社會或經濟變遷的其他廣義界定的團體間有公開的政治上衝突時，期望對這些利益的若干承認就不發生，也是與客觀利益的分析一致的。至少，在暗示衝突水平之逐案不同上，洛威是非常正確的。承認此類廣義界定的利益也許因愈時而變化，即聯盟在一既定的分配政策上，也許變得較不好戰，較不堅持。但是——此處的客觀利益方法，不同於洛威強調的團體衰微鐵則——其成員屬於社會性被剝奪的團體組織，有時也許增加其在好戰而產生衝突之政治行動上的一致性是十分可能的。現在，如果這種衝突水平——因此，在此種客觀利益變成主觀承認之水平上——被認為政策產出之集合（不可分）的獨立向度，洛威在一九六四年證明的三種界限，可在六欄表（見表一）找到其位置。●

● 在有高度可分性利潤的分配界限內，洛威的衝突十分微弱的信念，似乎是非常有基礎的，至少關於立法的策略上是如此。個人間的衝突，在美國的體系上，私法事件經由民事訴訟，如表一所指，也許可獲得根本解決。

表一 洛威的權力界限之兩種向度的修訂

| 政策產出可分性的總量 | 衝突的水平 (利益的主觀承認)           |                          |
|------------|---------------------------|--------------------------|
|            | 低                         | 高                        |
| 高          | 洛威的分配策略                   | 民事訴訟                     |
| 中          | 合作性利益團體關係——政策影響力的分裂，如麥康奈者 | 利益團體中的公開衝突——不穩定的聯盟，如杜魯門者 |
| 低          | 合作性「權力精英」策略，如密爾者          | 如階級或種族衝突                 |

● 在其一九六四年之類型學的一九七〇年修正本中，洛威親自指出兩種界限類型學的狀態，首先考慮代表一種既定政策之政府壓迫的可能直接性（或輕微性），其次是政策在個別行為上或較廣義的行為環境上之衝突。他主張，分配策略影響個別行為，卻不經過直接的壓迫，管制策略也影響個別行為，卻經過直接的壓迫。比較起來，也依賴於直接壓迫的再分配策略，的確影響了行為的環境。洛威也表示「選區選民」的策略影響行為的環境，卻沒有使用直接的壓迫，但是，他在一九七〇年的論文上沒有詳盡地討論這種界限。

雖然，洛威對壓迫的討論是典型建議性的（並請參閱一九七一年，頁五七以下），它與其說是建立，毋寧說是變更其早期權力界限的觀點。藉論辯管制和分配策略兩者影響個人的行爲，洛威似乎放棄了政策分割性（不合意性）的主要屬性，他在一九六四年，以此區別了各種界限，因爲在那種觀點上，管制策略涉及影響整個經濟上各段落頗爲普遍的通則，而不是個人或公司。此一九七〇年的修正案，也不對酌此處討論的策略上各種衝突水平。

洛威的類型學擴張地表示了這種客觀——主觀利益方法的有用性，但我們假設這些不同的衝突水平可能解釋爲反對客觀利益的承認（或不承認），甚於假設爲正在增加的保守主義之鐵則。筆者想指出，藉指明依據統制和再分配界限的條件，社會團體將承認其在積極保障改變上之利益，而關於統制和再分配界限兩者中，衝突發生的經驗性可測驗的命題。

客觀利益的內容：文化意義和政治作爲

就團體理論學者而言，不管如何期望採用客觀的利益方法，在如此做的過程上，他們必需解決祇可在本文概述的一些重要困難。第一，以區域的、宗教的、經濟的、人種的、種族的、性別的或其他術語界定的團體種類繁多，這些團體遭受到若干重大的不平等處遇。然而，許多此類團體，卻保持了長期的沉默；若干團體畢竟從未參加過抗議。那末，對這些團體賦予客觀利益，在經驗上有用嗎？換言之，以何種方法區分觀察者自己的優先權，或理論上的干預，我們才能說明有些團體承認此種利益，並以此種利益而作爲，而其他團體卻不如此的事實呢？

就某些範疇來說，這種問題也許可藉檢證每一種情形上的不平等範疇，以及使一個團體或另一個團體爲其成員的一種相關範疇之政策性發展的結果，那樣他們才從事抗議而得以解決。但是，此種不平等在實施上是比較有些困難的：在大的方面，它們依靠正確估計團體生存上的文化特徵。例如，美國人參予的階級區別，和他們強調的個體自助，便是在大的方面的一套方法，正說明了美國工業工人相對地（如與歐洲比較）遲延和非社會的政治實踐主義。

由於客觀利益方法可能被解釋集中焦點在瞭解上，甚於期望之預測上，這一問題也許比第二個問題爲簡單，在第二個問題上，文化要素至少扮演了傑出的角色——這就是指明，一旦團體期望要抗議時的客觀利益內容。一個團體是不平等的，或以某些方法而在其他方面剝奪觀察，並不藉其自身不變地指出其在政治上尋求的一些內容。換言之，在什麼樣的特別指向上，觀察者應假設團體尋求轉變其社會情勢呢？當然，在此一點上，穩定——分裂——抗議模式有一明確的益處，因爲依照該模式的術語，我們知道抗議團體將尋求保持或恢復其明確的活動模型。但是，正因爲客觀利益方法說明轉變此種模型的努力，在這些情形指明此方法上的利益內容是不可能的。

當然，這一困難的範圍之變化相當大。就那些已明顯地附屬於，或與另一個團體的社會團體之關係而言，至少該團體尋求的若干目標也許是相當清楚的。追求更多金錢、控制工作條件、比擬爲監督者的那些利益而侵蝕利潤，和保護不負責任以及類似情形的工人——或追求撤除公共措施上種族隔離的黑人們——是與本問題有關的。說得再通俗一點，客觀利益的政策內容，就很容易推演而得了，但觀察者和社會團體的成員，卻見到了同一方法上的不平等性，然而，甚至在此處，一旦我們超越了最

直接的壓迫性憂慮時，也許就有相當不穩定的存在了。且舉歷史性的著明例子來看吧，工人階級的團體，已經支持有限度傾向於聯盟的改革至烏托邦主義、虛無主義、共產主義和社會革命的差異之政治上需要。一個團體依據指定的條件，開始抗議其本身並未指出所追求為何種目標似乎也清楚。●

⑤ 當團體承認一種先前的客觀利益時，就在分類這種團體採取的正確政策目標上，向筆者指出這種困難的 Brian Barry，筆者深為感激。

不過，當我們轉到含混的不平等（所以，相關屬性並有所歸屬性安排）的關係或關係性的期望時，這個問題仍然變得很複雜。公共利益問題時常涉入上——中階級維持環境現狀者團體，對公司污染活動的抗議。其次，雖然，美國黑人在許多方面表現了社會性的不平等在流行的文化觀點上，至於哪一個團體較為低下的其他一些情勢是很複雜的，即宗教的實踐或烹飪；仍然還有其他一些區域，特別是黑人普遍被認為較優越的鄉土音樂文化的發展。例如，一九六〇年代出現的維持環境現狀者之崛起，和追求變更美國社會和經濟生活特質的黑人民族主義者之團體。事實上，由於要求社區控制，民族主義者之文化發展，和事實上，黑人機構和白人社會的隔離與合併主義者的民權傳統之分離頗為截然，黑人民族主義者以特別複雜的方法曝露了這種問題。總之，自蒙哥馬利市杯葛後十年間，黑人要求的內容，不能僅藉觀察種族差異和隔離的歷史性模型演繹。

這一組問題顯然太複雜和太難處理，以致不能在本文的討論中予以解決。筆者僅主張：第一，如果團體理論傳統希望說明，甚或滿意地描述要求重大改變的先前沉默之政治團體的政治干預，團體理

論傳統必須將一種客觀利益分析併入其他知識性架構上去。第二，這種客觀利益方法必須指明社會團體的利益內容，即是當和如果這種利益政治化了時，它將要求些什麼。第三，祇有當吾人檢證了團體運作的精確文化背景時，這種內容才能成功地歸屬。換言之，在一般性的文化上，和特殊的黑人中，以種族關係的情形說明民族主義者，在一九六〇年代後期轉入黑人的抗議，便是美國黑人的特定方法。●同樣地，瞭解何以近來對大公司的抗議，集中在特定的生態上和消費者的問題上，我們必定要問美國人事實上如何在文化上界定其社會和政治情勢的。我們不得不特別注視進步主義而非社會主義的立場，而美國抗議情形的一種傳統，注視在許多世代來追求「邊界征服」。●的社會中對「自然」的歷史性曖昧態度。祇有藉注視這些文化要素——不得不說明班特萊本人並未強調的一個問題——在發展和改良班特萊社會和經濟團體的政治活動之肇始公式，才會使團體理論傳統繼續近幾十年來的工作。然而，這件任務十分艱鉅：它必需多少要詳細闡明——遠較現在精詳——瞭解為實證的，政策相關的種種要求之政治意理，和吉爾茲（Geertz, 1964）十分明確地決定意理為「文化策略」間的交互關聯。

● 這一點在 Greenstone and Peterson 的著作上（一九七三年，特別是第三章至第十章）有詳盡的討論，這一點依次在 Harold Cruse (1967) 的劃時代著作上有精闢的論述。

● 將這同一問題列置在一比較架構上，而在美國政治取向上支持抗議運動的一些因素，這些因素轉而又較其他工業化國家，如蘇聯、法國、英國——這些國家有更要「政策化」的勞工階級或社會主義傳統——要早獲得嚴格的汽車安全法，並且擊敗了建立一種超音速運輸工具的提案，事實上是什麼要素要建立此種飛機呢？

## 結論：團體理論傳統上的政治現實性和經驗性概念

溫習了五位傑出的團體理論學者的著作，本文著重在後來的團體理論學者與班特萊政治現實觀的歧異上，以及他們以極相似於他所使用的方法繼續使用兩種決定性的概念——團體和利益。十分簡單，筆者的論辯是這些概念和班特萊的政治理念彼此相得益彰。結果，當後來的理論家們精確地觀察到政治生命較少程序化時，他們創造了可能祇充分藉修正其團體和利益之使用——事實上，藉客觀利益的術語描述政治發展——來解決種種困難。然而，他們迄未採取這種步驟。

至少，不言而喻，杜魯門、道爾、麥康奈和洛威都視班特萊繼續尋求社會的和經濟的目標之各團體在政治程序上所強調的經驗為不切實際。政治生活上一切重要的要素，卻不是綿密不絕地出現的，而事實上，是相當穩定的，每一位作者都挑選出政治活動的結構類型——制度、習慣和組織。另一方面，雖然，這些政治上的扼制，使團體政治行為的範圍變窄，而在這些政治組織的限制內，表現團體程序的繼續卻仍是可能的。由經濟上和社會上相關目標推動的政策取向團體，仍然在彼此互動過程上形成政治的決定。

不過，這羣班特萊而崛起的團體理論學者們，並不自限於認同主要政治結構要素。他們承認社會和經濟活動的重要要素結合成相當穩定的複數類型，則例示在諸如階級、鄰里、宗教和種族這些社會團體的例行性行為上。但是，如果吾人利用這些團體理論作為對「利益」的瞭解，決定這些穩定

的社會和經濟團體的政治影響力提供若干困難。由於這些社會團體，依其成員的政治活動標準來界定，祇由其成員的一部份可期望在任何問題上變成政治上積極性。因此，再回到本文導言的公式上去，這個問題並不變成那些已經在政治上積極的社會經濟組織要素，而是在一現存的社會團體中，在政治上的積極比例——以及何故這種比例突然間遞昇或衰微的原因。

同時，雖然因為這羣後起的團體理論學者，如同班特萊繼續關心產生政策決定的團體活動流程，他們發生了班特萊的公式不斷要避免的一個問題：如何以這些穩定的社會團體，亦即其活動由其重複的統制來區別的社會和經濟結構，以說明這種政策相關的活動——團體過程——的變動流程呢？因為班特萊堅持視政治為程序流程和依照其活動之標準來認證團體，所以他避免這一問題。誠如班特萊所期望的，如果團體的經濟和社會利益，能依照追求影響政策決定的政治活動標準來界定時，那末，社會和經濟的影響力，使他們設計來說明的政策過程同樣變動莫測。的確，行為上宣示的社會和經濟團體之目標，恰恰是那種政策制訂過程自身之不同部份。

由於後起的團體理論學者，與這種政治程序分開來認證社會團體，他們藉假設社會團體目標而繼續穩定，但是，代表這些目標的活動，卻變得使政策之穩定——分裂——抗議模式之標準尋求解決此一問題。換言之，穩定的團體祇有當政治在達成團體的穩定目標上是重要的時，在程序上藉干擾才見到如有影響力之變動的政治局勢。於此，道爾的金屬廠情形又可說明這一點。「希爾」的鄰里穩定目標，其居民祇有當需要時才作政治性干涉。道爾在此處的說明是「可行的」。從新哈芬市的政治觀點來看，他們突然出現的要求，祇是在變動情勢上的一套暫時性目標。

然而，在論證一種客觀利益方法上，筆者已經指陳，有許多改變穩定社會團體的行為，所宣示的目標則是存在的。如果我們祇以行為上宣示的主觀利益標準來認證團體時，團體政治就不能得到充分地分析。爲了充分描述改變其利益內容的這些社會性穩定團體，將團體活動與其利益分開，即其循例所作的社會性要求，與其在若干情勢上的政治要求之推動力是必然的。筆者已論證，祇有此一方法，才開始恰當地描述創造我們社會生活之穩定要素，和尋求改變其特定政治活動間的主要聯繫。

## 參考書目

- Almond, Gabriel (195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2:270-82.
- \_\_\_\_\_ (1960). "Introduction: a functional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Gabriel Almond and James S. Coleman (eds.), *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Almond, Gabriel A., and G. Bingham Powell, Jr. (1966). *Comparative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Boston: Little, Brown.
- Bachrach, Peter, and Morton Baratz (1962).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947-52.
- \_\_\_\_\_ (1963). "Decisions and nondecision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7:632-42.
- \_\_\_\_\_ (1970). *Power and Povert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gehot, Walter (1900).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New York: Appleton.
- Balbus, Isaac D. (1971). "The concept of interest in pluralist and Marxian analysis." *Politics and Society* 1: 151-77.
- \_\_\_\_\_ (1972). "The negation of the negat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3:49-63.
- Barnard, Chester I. (1938). *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arry, Brian (1965). *Political Argument*.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 Bauer, Raymond A., Ithiel de Soia Pool and Lewis Anthony Dexter (1963). *American Business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Atherton Press. (Second edition, 1972)
- Beam, George D. (1970). *Usual Poli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Beer, Samuel H. (1956). "Pressure groups and parties in Brita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0.1-23.
- \_\_\_\_\_ (1966). *British Politics in the Collectivist Age*. New York: Knopf.
- Bentley, Arthur F. (1926). *Relativity in Man and Society*. New York: Putnam's.
- \_\_\_\_\_ (1935). *Linguistic Analysis of Mathematics*. Bloomington, Ind.: The Principia Press.
- \_\_\_\_\_ (1954). *Inquiry into Inquiries: Essays in Social Theory*.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idney Ratner. Boston: Beacon Press.
- \_\_\_\_\_ (1967).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er, Samuel H., and John Dewey (1949). *Knowing and the Known*. Boston: Beacon Press.
- Blaisdell, Donald (1957). *American Democracy under Pressure*. New York: Ronald Press.
- Bone, Hugh A. (1958). "Political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319: 73-83.
- Bryce, James (1935).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New York: Macmillan.
- Clark, Peter B., and James Q. Wilson (1961). "Incentive systems: a theory of organizatio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6:129-66.
- Connolly, William E. (1969). "The challenge to pluralist theory." In William E. Connolly (ed.), *The Bias of Pluralism*. New York: Atherton.

- \_\_\_\_\_ (1972). "On 'interests' in politics." *Politics and Society* 2:459-78.
- Crenson, Matthew (1971). *The Un-politics of Air Pollu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Crick, Bernard (1959). *The American Science of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ruse, Harold (1967). *The Crisis of the Negro Intellectual*. New York: Morrow.
- Dahl, Robert A. (1958). "A critique of the ruling elite model."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2:463-9.
- \_\_\_\_\_ (1961). *Who Gover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67).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Rand McNally.
- \_\_\_\_\_ (1970). *After The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72).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_\_\_\_\_ (1973). *Regimes and Opposi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hrendorf, Ralf (1959).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wey, John (1927).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New York: Holt.
- Disraeli, Benjamin (1845). *Sybil*. London: Colburn.
- Dowling, R.E. (1960). "Pressure group theory: its methodological r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4:944-54.
-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Dye, Thomas R. (1965). "Malapportionment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states." *Journal of Politics* 27:586-601.
- \_\_\_\_\_ (1969).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olicy Outcomes in the American States*. Chicago: Rand McNally.
- Easton, David (1958). *The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Knopf.
- \_\_\_\_\_ (1965). *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Wiley.
- Eckstein, Harry (1962). *Pressure Group 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66). *Division and Cohesion in Democracy: A Study of Norwa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delman, Murray (1957). "Sensitivity to labor." In Milton Derber and Edwin Young (eds.), *Labor and the New Deal*.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Engler, Robert (1961). *The Politics of Oi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hrmann, Henry W., ed. (1958). *Interest Groups on Four Continent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Flathman, Richard (1966). *The Public Interest*. New York: Wiley.
- Foss, Phillip O. (1960). *Politics and Gras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Frolich, Norman, Joe A. Oppenheimer, and Oran R. Young (1971).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Collective Good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arceau, Oliver (1959). "Review of Bernard Crick's: *The American Science of Poli-*

tic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1117-9.

Golembiewski, Robert T. (1960). "The group basis of politics: notes on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4:962-71.

Greenstone, J. David. (1969). *Labor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Greenstone, J. David, and Paul E. Peterson (1973). *Race and Authority in Urban Politic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Gross, Bertram M. (1953). *The Legislative Struggle*. New York: McGraw-Hill.

Hagan, Charles (1958). "The group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Roland Young (ed.),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Politics*.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Hale, Myron Q. (1960). "The cosmology of Arthur F. Bentley."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4:955-61.

Hartz, Louis (1955).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_\_\_\_\_ (1964). *The Founding of New Societ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Haupt, Heinz-Gerhard, and Stephan Leibfried (1972). "Marxian analysis of politics or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toward a Marxian theory of the political domain." *Politics and Society* 3:33-47.

Herring, E. Pendleton (1929). *Group Representation Before Congres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Holtzman, Abraham (1966). *Interest Groups and Lobbying*. New York: Macmillan.

Jacobson, Norman (1964). "Causality and time in political process: a specul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8:15-22.

Kariel, Henry S. (1961).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luralism*.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essel, John H., George F. Cole, and Robert G. Seddig (1970). *Micropolitics: Individual and Group Level Concepts*. Hinsdale, Ill.: Dryden.

Key, V. O., Jr. (1964). *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New York: Crowell.

Key, V. O., Jr., and Frank Munger (1959). "Social determinism and electoral decision: the case of Indiana." In Eugene Burdick and Arthur J. Brodbeck (eds.), *American Voting Behavior*. New York: Free Press.

Kress, Paul F. (1970). *Social Science and the Idea of Process: The Ambiguous Legacy of Arthur F. Bentle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a Palombora, Joseph (1964). *Interest Groups in Italian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tham, Earl (1952a). "The group basis of politics: notes for a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6:376-97.

\_\_\_\_\_ (1952b). *The Group Basis of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ijphart, Arend (1968). *The 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 Plur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Netherlan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neberry, Robert, and Edmund P. Fowler (1967). "Reformism and public policies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1:701-16.

Lowi, Theodore J. (1964a). *At the Pleasure of the Mayor*. New York: Free Press.

\_\_\_\_\_ (1964b). "American business, public policy, case studies and political theory." *World Politics* 16:676-715.

- \_\_\_\_\_ (1969). *The End of Liberalism: Ideology,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Public Authority*. New York: Norton.
- \_\_\_\_\_ (1970). "Decision making vs. policy mak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0:314-25.
- \_\_\_\_\_ (1971). *The Politics of Dis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Lubell, Samuel (1956).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Lundberg, George A. (1939). *Foundations of Sociology*. New York: Macmillan.
- McAdams, Alan K. (1964). *Power and Politics in Labor Legisl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McConnell, Grant (1953). *The Decline of Agrarian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_\_\_\_\_ (1960). *The Steel Seizure of 1952*. Birmingham: Alabama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63). *Steel and the Presidency*. New York: Norton.
- \_\_\_\_\_ (1966). *Private Power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Knopf.
- McFarland, Andrew S. (1969). *Power and Leadership in Pluralist System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cKenzie, W. J. M. (1955). "Pressure groups: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Political Studies* 3:247-55.
- Macridis, Roy C. (1961a).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Governm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 \_\_\_\_\_ (1961b). "Interest group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s* 23:23-45.
- Mahood, H. R., ed. (1967). *Pressure Groups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Scribner.
- Mansfield, Harvey, Jr. (1970). "Disguised liberalism." *Public Policy* 18:605-28.
- Michels, Robert (1953). *Political Parties*. New York: Free Press.
- Mills, C. Wright (1956).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nypenny, Philip (1954).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groups."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7:183-201.
- Muir, William K., Jr. (1955). *Defending "The Hill" Against Metal Houses*. University, Al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Odegard, Peter H. (1928). *Pressure Politics: The Politic of the Anti-Saloon Leagu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Olson, Mancur (1965).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eterson, Paul E. (1970). "Forms of represent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Review* 64:491-507.
- Pitkin, Hanna (1967).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olsby, Nelson W. (1963). *Community Power and Political The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Roche, John P., and Leonard W. Levy, eds. (1964).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Rogin, Michael Paul (1967). *The Intellectuals and McCarthy: The Radical Specte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Rothman, Stanley (1960). "Systematic political theory: observations on the group approa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4:15-33.
- Salisbury, Robert H. (1969). "An exchange theory of interest groups."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32.
- \_\_\_\_\_ (1970). *Interest Group Politics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Schaar, John, and Sheldon S. Wolin (1963). "Review essay: *Essays 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litics*, a critiqu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7:125-50.
- Schattschneider, E. E. (1935). *Politics, Pressure, and the Tariff*. New York: Prentice-Hall.
- \_\_\_\_\_ (1942). *Party Government*.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_\_\_\_\_ (1960). *The Semi-Sovereign Peopl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Schmitter, Philippe C. (1971). *Interest Conflic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Brazil*.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mpeter, Joseph (196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Selznick, Philip (1953). *T.V.A. and the Grass Roo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arkansky, Ira (1971). "Economic development, representative mechanisms, administrative professionalism and public policies." *Journal of Politics* 33:112-32.
- \_\_\_\_\_ (1972). *The Maligned States*. New York: McGraw-Hill.
- Smith, David G. (1964). "Pragmatism and the group theor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8:600-10.
- Taylor, Richard W. (1952). "Arthur F. Bentley's political scienc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5:214-30.
- Tocqueville, Alexis de (1956). *Democracy in America*, edited by Richard D. Heffner. New York: Mentor Books.
- Truman, David B. (1953).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New York: Knopf.
- \_\_\_\_\_ (1959). *The Congressional Party*. New York: Wiley.
- \_\_\_\_\_ ed. (1965). *The Congress and America's Futur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_\_\_\_\_ (1960). "On the inventions of syste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4:494-5.
- Walker, Jack L. (1969).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880-99.
- Weinstein, Leo (1962). "The group approach: Arthur F. Bentley." In Herbert J. Storing (ed.), *Scientific Study of Poli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White, Morton (1957). *Social Thought in America*. Boston: Beacon Press.
- Wildavsky, Aaron B. (1962). *Dixon-Yates: A Study in Power Polit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James Q. (1960). *Negro Politics*. Glencoe, Ill.: Free Press.

- \_\_\_\_\_ (1962). *The Amateur Democra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olfinger, Raymond E. (1960). "Reputation and reality in the study of 'community pow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5:636-44.
- \_\_\_\_\_ (1971). "Nondecisions and the study of local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1063-104.
- Wolfinger, Raymond E., and John O. Field (1966). "Political ethos and the structure of city govern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0:306-26.
- Zeigler, Harmon (1961). *The Politics of Small Business*. Washington: Public Affairs Press.
- \_\_\_\_\_ (1964). *Interest Groups in American Societ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Zisk, Betty H. (1969). *American Political Interest Groups: Reading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 Zolberg, Aristide (1972). "Moments of madness." *Politics and Society* 2:183-208.

# 第五章 組織理論與政治學

Dennis J. Palumbo 著  
彭文賢 譯

## 導論

組織理論不僅是公共行政學的一門次科——它通常被政治學家們以官僚體制、小團體行為和管理理論的標題來論述；而且也是一塊廣闊的、多學科的 (multidisciplinary) 領域——包括來自經濟學、數學、社會學、心理學、資訊和電腦科學以及企業管理學等不同學科的貢獻。根據馬區 (James March) 的看法，組織理論在諸多的社會科學中成爲一個或多或少可加確認的研究旨趣，起始於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間所寫成的若干書籍。●從那時起，在數種學科中即產生了許多分歧的研究。雖然近些年來在爲組織理論尋求共同語彙 (common vocabulary) 方面，已有了相當的進步，但它仍爲一塊尙待認定的領域。

● March, James, e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5), P. xiii.

然而，這並不是說在組織理論中，毫無任何共同要素 (common elements) 可言，事實上是有。大部份教科書中，都網羅了幾分典型性的論題，它們包括正式結構、小團體、領導、人際關係、

官僚體制、溝通、創新和變遷、組織發展、權威和管制、決策作成以及評估。<sup>②</sup>然在組織理論方面所缺乏的是一個共同的概念架構，因而出現了許多相互對立的分析型模。在諸多的型模當中，有些強調引自經濟學的理性扶擇概念（concept of rational choice）；有些關注心理變數（psychological variables）；另有其他型模則建構於社會學或政治學的概念之上。

- ② 請參閱 Rubenstein, Albert, and Chadwick Haberstroh, "Some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 (Homewood, Ill.: Dorsey, 1966); Thompson, James, "Organizations in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67.); Carzo, Rocco, and John Yanouzas, "Formal Organization: A System Approach." (Homewood, Ill.: Dorsey, 1967.); Negandhi, Anant R., ed. "Modern Organizational Theory: Contextual, Environmental, and Socio-Cultural Variables." (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3.).

引用組織理論對古巴飛彈危機作精闢的說明中，艾立森（Graham Allison）指出：他不能對組織理論的諸多著作作一概論，而要讀者去參考厚達一二四七頁的組織手冊。<sup>③</sup>在本文中，我並不企圖將這一本書歸納為一單獨的概念體系；也不打算提供一篇內容廣泛的、書目提要式的短論；而僅將探討的焦點放在大多數現有著作中所持的主要理論和概念之上。因之，本章將會顯得比較的抽象。除此之外，我也不會描述實際的組織並為其分類，或討論特定的變數及其間的相互關聯性；關於組織結構、分權和事實——價值兩分法（fact-value dichotomy）的問題將於本章末尾討論。由於時間和篇幅的

限制，我不去處理下列組織理論所經常涉及到的課題：官僚體制、領導、人羣關係、溝通、創新和有計劃的變遷。幾經考慮與選擇，我深信將討論的焦點置於組織行爲的主要理論上，遠比把探討的重心放在組織結構、制度和過程上更爲妥切。換言之，本文主要目的乃在指出組織理論如何幫助我們瞭解政治學；以及政治學如何促使我們透視組織理論。

② Allison, Graham, "Essence of Decis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爲大多數的分析者用以解釋組織行爲的主要理論是理性抉擇理論。本文裏即將敘述的理性抉擇的組織理論，有助於我們了解在決策制定中有關一致同意多元目標、自利和激勵的角色。首先，公共抉擇理論——一門嶄新的學科（底下將述及）——能夠幫助我們去認識在估量和評價公共政策目標時所介入的若干問題；於此決策和博奕理論可以啓示吾人有關不確定性和風險性二者在達成目標時所扮演的角色。其次，小團體理論能夠告訴我們若干權力方面的合法性和強制性——在本章稍後，我將論及若干有關此一方面的重要發現。最後，組織的結構因素也幫助我們了解在達成目標上的種種限制。當我們綜合這些發展時，才能開始體認到決策作成和政治學的豐碩理論梗概，因爲公共抉擇與決策正是政治理論所探討的內容。

雖然理性抉擇理論是組織理論中最爲主要的理論，但是並非所有的組織行爲能夠或曾經就理性抉擇理論的觀點加以闡釋。其他的理論也曾被使用來描述組織行爲，它們計有操縱理論、③系統理論、④政治理論、⑤互換理論和技術理論、⑥博奕理論、⑦以及決策理論。⑧在本章裏，我不能詳盡地討

論這些理論：僅把研究重心放在理性抉擇理論上，不過還考慮其他理論——特別是政治理論、系統理論、博弈理論及決策理論——如何修正理性抉擇理論。

- ④ 羅登 Ackoff, Russell, and Fred E. Emery. "On Purposeful Systems." (Chicago and New York: Aldine-Atherton, 1972.); Emery, James, "Organizational Planning and Control Systems." (New York: Macmillan. 1969); Ashby, W. Ross, "An Introduction to Cybernetic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956.); Newell, Allan, J.C. Shaw, and H.A. Simon, "A Variety of Intelligent Learning in a General Problem Solver."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1959).
- ⑤ 羅登 Carzo, Rocco, and John Yanouzas, *op. cit.*; Seiler, John A. "Systems Analysis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Homewood, Ill.: Dorsey. 1967).
- ⑥ 羅登 Allison, Graham, *op. cit.*; Zald, Mayer N. "Organizations as Politics: An analysis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gencies." Social Work 2. 1960; Harvey, Edward, and Harvey Mills, "Patterns of Organizational Adoption: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In Mayer Zald ed. "Power in Organizations."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70).
- ⑦ 羅登 Perrow, Charles, "Complex Organizations: A Critical Essay." (Glenview, Ill.: Scott, Foresman, 1972); Negandhi, Anant R., *ed. op. cit.*
- ⑧ 羅登 Schelling, Thomas, "The Strategy Conflic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Allison, Graham, *op. cit.*; Farquharson, Robin, "The Application of game theory to Committee Procedure," in J.R. Lawrence ed. "Operational Research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Tavistock, 1966).

- ⑤ 羅瑟 Bower, Joseph, "The Role of Conflict in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Group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9, 1965; Crecine, John, "Governmental Problem Solving." (Chicago: Rand McNally, 1969); Luce, Duncan, "Individual Choice Behaviour." (New York: Wiley, 1959.); Raiffa, Howard, and Robert Schlaifer, "Applied Statistical Decision 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61); Menges, Gunter, "On Some Open Questions in Statistical Decision Theory." In Karl Borch and Jan Mossin eds. "Risk and Uncertain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8).

組織行為的政治學型模主要是規範、制約性的；因此許多學者聲稱政治的過程有時稱之為「混過去的科學」(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乃是一種較理性抉擇型模更為美好的決策制定方式。不過，所有型模是規約性與描述性同時並存的。當然，理論也並不只是說明實際的組織而已，因為理論的功能是在解釋與預測而不在敘述。譬如，理性抉擇型模除了以理想型式去解釋組織行為外，它也規範著如何去制定良好的決策。在這個意義上，大多數的型模並不意指實際組織的描述，但是分析者們則希望它們儘可能地將實情表現出來。申言之，型模不僅是一面透鏡，使我們更為清楚地觀察實際的組織行為；而且也是一項規約，規範著我們去制定更好的組織決策。因此，在本文中，我將同時地處理組織理論中描述性和制約性的要素。

- Lindbloom, Charles E., "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 798, 1959.

組織理論和政治學之間已有相當可觀的交互為用情形；亦即政治學中的理性抉擇理論已開始擴散到正式的和數理的政治理論之上；<sup>①</sup>同時組織理論家們終於也較大膽地使用權力和衝突的概念。但是，此一說明並不意謂組織理論和政治學完全採納對方的概念和理論，而融於自身的體系之內。事實上，此種採納也曾遭遇強烈的抗拒。

① Taylor. Michael, "Review Article: Mathematical Political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 1971).

大多數政治學中的理性抉擇理論是來自經濟學的，對於這種看法，我們作了如下的假設：由於經濟人的效用最大化業已應用，在對政治人的分析上，因此所有圍繞著個人和社會的選擇條件，也已廣泛地被網羅與分析。<sup>②</sup>但是，在政治理論中最為普遍的看法是政治決策作成，經常處理種種的價值問題，因此是與理性抉擇理論迥然不同的。抑有進者，雖然衝突和權力成爲組織理論中相當普遍的概念，但它們並非唯一的中心旨題；相反地，貫穿整個理論的基本論題則是經濟效率問題。因之經濟學家們容易把具有「科學的」意涵賦予此類的問題；而將具有「政治的」意涵保留給價值的問題。一般的結論似乎是後者不可能修正成爲科學的考慮；蓋因處理價值和意識型態的種種問題，並不屬於理性抉擇或科學的分析。我們將申辯此一區分不再是正確的。底下想對決策作成的政治型模和理性抉擇型模作一對照，以爲探討本章的起點。

- 請閱 Downs, Anthony,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7); Taylor, Michael, *op. cit.*; Riker, Willeman,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Sen, Amartya, "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 (San Francisco: Holden-Day, 1970); Rabushka, Alan, and Kenneth A. Shepsle, "Politics in Plural Societies: A Theory of Democratic Instability." (Columbus, Ohio: Merrill, 1972).

### 組織行為的政治型模與理性抉擇型模的對比

政治學家們主張行政行為能以政治過程作最佳的瞭解已有若干時日。●雖然他們的許多著作對傳統的政治——行政兩分法予以痛擊，但大多數的作品仍侷限於公共機構的分析。惟於最近幾年，組織理論學者除了開始採用政治概念外，●更將此類概念應用於諸如醫院、公司行號和工廠等的私人的或准私人的組織分析中；因為這些組織的行為不只是目標達成的理性工具，同時也能夠就政治觀點加以理解。

- 請閱 Wildavsky, Aar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fficiency: Cost-Benefit Analysis, Systems Analysis, and Program Budgeting." In Austin Ranney ed.,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Markham, 1968); Braybrooke, David, and Charles E. Lindbloom, "A Strategy of Decis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Crechin, John, *op. cit.*

- 譚因 Zald, Mayer N, ed. "Power in Organization."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70); Hickson, D.J., et al., "A Strategic Contingencies Theory of Inter-Organizational Powe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6:216-29, 1971; Perrow, Charles, "Departmental Power and Perspectives in Industrial Firms." In Mayer Zald, ed., *op. cit.*; Pondy, Louis, "Toward a Theory of Internal Resource Allocation." In Mayer Zald, ed. *op. cit.*

關於公共組織與私人機構兩者界限的模糊，以及試圖將所有組織的適用於同一分析型模的努力，構成了組織理論一項有利的發展。當然，分析組織行為應該使用那一類型模，並非一個不重要的問題。因為當敘述組織之際，一個人所作的假設選擇是重要的；況且概念架構也非中立的。艾立森非常自信地指出：一個單獨的事件——一九六一年的古巴飛彈危機——以理性抉擇型模來透視，和用政治或行政型模來觀察，其間的差異是非常大的。如此說來，事件被闡釋的方式，我們所關注的行為種類，不同行為者的重要性，以及最後我們如何評估不同的決策，全都仰賴著理論型模 (theoretical model) 而定。

此外，使用那一類型模較好，也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近若干年來，數位組織理論學者，曾對純粹的理性抉擇理論表示不滿；●進而各以不同的方式予以修正。在本章內，我將探討其中一部份的理論。然而，下列問題是值得深思的：以附加政治學的概念或其他的觀念來修正理性抉擇理論有否可能？或者是否必須摒棄理性抉擇理論，以有助於另一較好型模的建立？總之，理性抉擇型模和政治型模，在許多方面是大相逕庭的，而且它們常在主要假設上有著直接的衝突。

- 薩圖 Simon, Herbert, "Administrative Behaviour." (New York: Macmillan, 1945); Pondy, Louis, *op. cit.*; Cybert, Richard M. and James March,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3); Bower, Joseph, *op. cit.*; Harvey, Edward and Harvey Mills, *op. cit.*; Zald, Mayer N. ed, *op. cit.*; Burns, Tom, "On the Plurality of Social Systems." In J. R. Lawrence, ed., "Operational Research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Tavistock, 1966)。

組織行爲的政治型模，業已廣泛地運用在不同的實際組織之中。雖然，每位分析者所強調的面向各有不同，但當組織被視爲政治系統時，卻表現了下列共通的特性：不同權力團體彼此對抗的存在；種種統治聯盟的形成；以及勢均力敵的政黨制度（或是功能類似政黨制度的體系）的出現。其次，所有組織都表現著需求滙聚的現象，它們不但持有成文與不成文的約制性規則，並且顯示出權力轉移和繼承的特性。最後，它們類似於現代國家的特徵。介洛勒(Mayer N. Zald)曾經認爲：某些組織可用老化的寡頭政體作最佳的描述，其他組織則可用現代化的民主政體作最好的寫照；並在基督教青年會的研究中，自認爲是「傾向於多元的和雙層的(dual)政治者。」●

- Zald, Mayer N., *op. cit.*, p. 233.

當組織被看成政治系統時，預算成爲年度的協定(annual treaty)；重組成了統治聯盟改變的指標，決策規則則反映了現成的內部聯合。上述這些特徵可說是類似於國際關係的現象，其中許多組織彼此的接觸導致了「同盟的漸進」，因而不僅提高了成員們的利益，而且也創造了一個有力的「影響

網」(network of influence)。⑦這類的同盟可能是開放的；也可能是封閉的。那麼，組織行爲的關鍵就在於參與權力分配過程的說明，及有關行爲者的描述。因為醫學院中醫師和研究員二者之間的爭執，⑧公司廠商中製造部門和銷售部門彼此之間的競爭，⑨以及保健機構中衛生官員、護士和公共衛生學家們的爭鬥都是經常發生的。⑩

● Thompson, Victor, "Bureacracy and Innovation."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69)。

● Zald, Mayer N., ed., *op. cit.*

● Bucher, Rue, "Social Process and Power in a Medical School". In Mayer Zald, ed. *Ibid.*

● Palumbo, Dennis, "Power and Role Specificity in Organization Theo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9, 1969.

這種大規模正式組織的政治型模，大大地不同於傳統的理性抉擇型模。在理性抉擇型模中，組織被假定爲有著單一的目標；決策者對於達成目標的各種可行方案，具備充分的訊息，並永遠在爲最佳的(optimal)目標實現而行動，以及成員們對於這些目標都有著一致的合意。此一型模，爲我們提供了「行政人」(administrative man)能夠排列其所瞭解的每一行動方針的種種結果。⑪此即當行政人面對著相互競爭的若干方案時，他不僅能夠依照偏好的高低而順序地排列之，並且能夠決定方案A超過B的偏好，是否大過對方案B超過C的偏好(那就是所有數字系統原理的應用)。如此說來，

行政人須要具備發展基數效用函數 (a cardinal utility function) 的能力——此指理性人能夠對每一方案的有關價值作一線形的轉換，以保持每一方案的層級，和這些方案彼此の間隔距離 (interval distance)——從而才能就組織的既定目標，作一最佳的抉擇。因此，如果行政人面臨確定性的情況，即有一個最佳的決策；要是面臨著風險性或不確定性的情況，他會選擇可使預期效用增至最大或預期損失減至最小的方案。②

② March, James, and Herbert Simon, *op. cit.*

③ Luce, Duncan, and Howard Raiffa, "Games and Decisions." (New York: Wiley, 1957); Savage Leonard J., "The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s." (New York: Wiley, 1954); Hurwitz, Leonid, "Optimality Criteria for Decision Making Under Ignorance." (Cowles Commission Discussion Paper, Statistics, No. 370, 1951).

假使我們將傳統的类型視爲實際組織的寫照，那麼便可以預測行爲者們的行動永遠是爲了組織既定的或明示的目標的最大實現。再者，如將它視爲規範性的話，則會認爲決策者本身的行爲理想途徑，有可能相當於科學調查 (scientific inquiry) 的理想準則，在這一型模中，並無暗示著決策或政策的問題，可能是反對的一方所扮演的結果，因而需要有個政治解決。

相反地，政治型模所隱涵的是行爲者把既定的目標視爲未決，因此他們企圖去管制使目標得以合法化的種種理由。另者，組織內的服務對象也不會排除這項努力。如此說來，意識型態是絕不能加以

忽視的。雖然它的作用仍然議論未已，但卻深深地影響著主義與決策，並在目標的設定中提供了「隱性的利益表達」功能。●事實上，每個黨派團體之間的爭鬥業已超越了目標的設定，而擴展到衡量目標達成標準的控制。因為決定績效標準的能力，顯然是龐大權力的來源。●扼言之，在政治型模中，問題不在於目標是否已被最佳化；而是在於何種目標才被認為是合法的。對於既定目標的一個挑戰，勢必代表著一場權力的鬥爭；並且目標的改變意謂著地位和權力關係的更改。如此說來，關鍵之點在於政治型模中的行爲，乃是系統政治學引發權力探討的一項功能。●

● Selznick, Philip, "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 (Evanston: Ill.: Row, Peterson, 1957).

● Goldner, Fred H., "The Division of Labour: Process and Power." In Mayer Zald, ed., *op. cit.*

● Wildavsky, Aaron, "Rescuing Policy Analysis from PPBS." In Robert Haveman and Julius Margolis, eds., *Public Expenditures and Policy Analysis.* (Chicago: Markham, 1970).

當權力作為獨立變數時，決策者便不能視為理性的行政人。因為他們並不專心致力於實現組織既定的目標；同時也不能排列其偏好；再者，他們既不是為降低或消除績效差距的慾望所激勵的行爲者；也不是經常地考查工作環境以擴大其反應領域的行動者。相反地，即使他們作了這種排列和探究，其目的也是在找尋種種能夠確保生存和維持權力的必要策略。●在政治型模中，行爲者不但強行他們的理念於世人；而且也漠視了種種的「事實」；進而，只考察環境中得以支持其偏見的訊息。●所以，酬報人員或選擇一項行動方針的主要標準是易接近的。一個人接近的程度如何、接近的對象是

誰，以及這個行動方針會不會促進他與秀異份子的接近機會等都是被提出的主要問題。在另一方面，理性型模中估量人員和行動的主要標準是技術和行政的適任能力，其主要的問題是：這個人勝任的程度如何？行動能否達成目標？

② Stein, Harold, e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Development." (New York: Macmillan, 1952);

Etzioni, Amitai, "Modern Organiz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4).

③ Barnett, Richard, "The Roots of War." (New York: Atheneum, 1972).

接近和技術的適任能力是截然不同的兩個標準；並且這兩者並不必然地相互關聯著。在政治型模中，個人花費他們的時間和精力，設計種種得以促進其與政府要員和訊息接近的策略，而不去改進其技能；亦即人們所關懷的不是目標的實現，而是贏得與政府要員的接近。●

④ Williams, Oliver P., "Metropolitan Political Analysis: A Social Access Approach."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在這種競賽中，決策者不僅持著潛在的或內隱的目標，而且他也在追求一項機會性的政策；進而放棄了價值遞移的原則。績效的差距只有當統治的秀異份子認為應予改變時，才有可能激發行爲的改變；那麼組織中的行爲者，便無法透過工作環境的考察去認識種種的績效。申言之，績效的改進並非訓練的成果；而且目標和偏好的改變，也非「理性」考慮的結果。因為這些改變的發生，不是被迫的

就是交易的結果。如此說來，脅迫、制裁和談判的現象，在組織生活中隱約地浮現出來。●

● Perrow, Charles, *op. cit.*; Allison, G. *op. cit.*

交易情況的發生，說明了組織並不是一個完全被監督或控制的系統。既然它們意涵著多元中心的制度，因此成員彼此之間就需要有著可加運行的合意。然而，這項需要不僅限制了統治的秀異份子，而且也束縛了那些在層級制中想要爭取權力的較低階層團體。秀異份子團體往往面臨著本身派系和對抗團體的危機，而呈現出內部不協調的種種特性，因此有關那個目標應被接受，他們時常持著不同的觀點。●這種衝突的現象也許是有害的，因為政策問題可能因此而無法達到組織的高階人員。即當政策問題被認知時，他們則常常採取隱藏性妥協的方式，以反應較低階層人員的特殊利益。●抑有進者，雖然衝突性與強制性常於組織中出現，但是它們不可能成為引發變遷的主要因素，蓋因在變遷成爲可能以前，一個團體必須在種種目標上達成高度的合意。●不過，變遷的需要可能導致權力捐客的生，因爲他們的功能乃在設法達成合意。但是，這些權力捐客的存在，卻往往犧牲了那些無法成功地履行這項功能的行爲者。

● Gordon, R.A., "Business Leadership in Large Corporations."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1945).

● George, Alexander, "The Case for Multiple Advocacy in Making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6:751-96, 1972.

● Palumbo, Dennis, and Richard Styskal. "Professionalism and Receptivity to 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s*. 1974.

組織中權力的鬥爭類似於美國政黨間的衝突。關於何種辦法會對組織的成功最具效能的不確定看法，促成了許多不同的意見與目標的存在；正如同不確定的情況允許許多黨派理念在社會內自由地存在一般。●就此觀點而論，在組織裏，功能類似於政黨制度的團體和聯盟，支持某一特定的目標，其目的是爲了期待在組織內增加他們本身的利益；然而，在特定團體所提出的部份目標，及整個組織自身的生存之間，必須要有若干的調和。在理性抉擇型模中，用來測定領導的標準是組織目標的達成；然在政治型模中，此項標準並不與政治組織成長和生存的標準並行不悖的。不過，由於政治組織的成長和生存，往往就是官僚權力的擴大，所以在大多數的政治哲學內，此項標準不被認爲是理想的。

● Downs, Anthony, *op. cit.*

在政治型模與理性抉擇型模中，我們可以看出幾個重要的差異。首先，在理性抉擇型模中，行爲者是有目的的；他們所考慮的乃是儘可能有效地達成組織的目標；以及認爲每位成員的利益都補充了組織的利益。然在政治型模中，雖然行爲者本身也是有目的的，但是他們所關心的卻是自身權力的達成。再者，政治系統內每位成員的利益，並不必然補充組織的利益。事實上，在某些有規範的民主理論中，個人的自我利益（權力）與團體的利益（公共利益）時常是相互抵觸的；但是一味地想去提高個人本身的利益，被認爲是不道德的。

其次，政治型模中，個人目標與組織目標不能調和，是由第二點差異所引起的：理性抉擇型模假定組織的目標是單一的。郎斯（Anthony Downs）以為「要是多元的目標被允許的話，適合於某一目標達成的方法，可能會妨礙另一目標的實現，因而沒有一個單一的行動方針為一理性的決策者所遵行。」●因之，在政治的理性型模中，一個政黨勢必被界定成一個團隊，其中不僅成員們同意團隊所有的目標而非部份的目標；而且每位成員都有著完全一致的目標。相對地，在政治型模中乃假定組織存在著多元的目標，而且它們可能彼此衝突；因此，如何使那些支持不同目標的成員達成合意，乃成為政治行動的當急之務。扼言之，衝突的管理而非目標的達成被認為是政治的主要目的。艾立森概述了這些論點而認為：在政治型模中，許多的行為者不僅持著互不相同的目標與各式各樣國家的、組織的和個人的目標概念；而且他們是以彼此妥協、商議而非理性抉擇的方式去制定決策。●

● Downs, Anthony,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op. cit.*, p. 25.

● Allison, Graham, *op. cit.*

理性抉擇型模與政治型模的第三點差異，在於後者並不需要邏輯一貫性的假定。合意可以不在基本數效用函數甚或序數效用函數應用下達到最大的程度。事實上，抉擇的遞移律在政治交易的場所中不是可欲的，因為它會助長團體之間因支持特定目標所形成的非妥協性態度，而使衝突更形惡化。反之，若是偏好隱晦不顯，妥協將更容易達成；合意也較容易獲致。●

● Lindbloom, Charles E., *op. cit.*, pp. 79-88.

兩種決策作成型模的第四點差異，在於理性應該被視為一種過程還是一種實質結果的問題。在政治學上，理性經常被視為一個制定決策的過程，而非達成一項實質之目的；因之，一位理性的政治行為者，是一位企圖去擴大自身權力的個人。亦即他並不關心政策的內容，而僅關心他的地位如何在一政策問題上幫助他去獲取權力。●在組織中，理性通常被視為成功地達成目標。簡而言之，政治人關心著權力，而行政人則希望達成目標；這個問題是相當重要的，值得作更進一步的探討。

● Downes, Anthony,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op. cit.

理性被視為一種過程而非成功地達成目標

政治學家們經常認為政治是非理性的，因此它無法本著理性行為的理論作一精闢的解釋。然而，許多政治行為學者們，曾就個人的行為合乎理性的前提加以解釋。有一個衆所週知的劇本，顯示政客們是理性的個人，他們爲了增多選票，靈巧地操縱資訊，並且經由恩寵和分贖的方式去酬報他們的朋友，懲罰他們的敵對者。他們唯一的目的是在贏得選票；從而就職之後便去擴展他們的支持領域。同樣地，選民也被描寫成理性的個人，他們企圖藉著投票的行動來增進自身的利益；他們願爲有相同道德、倫理背景的候選人投票，因爲他們深信將因此而得到更多有效的代表；他們甚至爲了恩惠、就業和定期的交通車票而交換選票。李普塞 (Seymour M. Lipset) 認爲：那些在政治中下過賭注較多者，其去投票的比例高過一般的百姓。●再者，假如選舉不能賦予百姓種種有意義的選擇，他們就容

易對投票裹足不前；而且自稱爲獨立份子的選民之比例逐漸增加，主要是他們把投票的決定奠基於選舉中問題的理性考慮之上。<sup>38</sup>

<sup>38</sup> Lipset, Seymour M., "Political Man," (New York: Doubleday, 1963).

<sup>39</sup> Stock, Donald, "Some Dynamic Elements of Contests for the Presiden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0, No. 1, March, 1966; John A. Ferejohn and Morris P. Fiorina, "The Paradox of not Noting: A Decision Theoretic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8, No. 2, June 1974, 525-37; Andrew Glassberg, "The Linkage between Urban Policy Outputs and Voting Behaviour." *New York and Lond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3, 1973).

但是，我們須要注意的是：理性抉擇並不僅僅只有一個單純的意義；在另一方面，它所指的是行動的過程及手段而非成功地達成目標。例如，郎斯認爲不管行動過程是被完全地履行，一個非理性的個人絕不是抉擇型模的一部份。<sup>40</sup>繼而，他基於理性的過程定義(a process definition of rationality)發展出二個主要的理性人通則：其一，政客們企圖增多選票以贏取職位；其二，選民們投票給他們深信能爲其提供最大利益的政黨。申言之，政客們從不以追求職位作爲實現特定政策的工具；他們唯一的目标是在獲得他們個人的目的，而這些私人的目的只有經由被選舉才能達到。<sup>41</sup>

<sup>40</sup> Downs, Anthony,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op. cit.

<sup>41</sup> *Ibid.*, pp. 28-36.

另一方面，在組織的行為中，一位理性人比起一個僅憑「預感」或「直覺」作決策的行為者更能夠成功地實現他的目標。譬如，在私人企業的理論中，所強調的目標乃是利潤的獲得，因此所有的組織行為是以組織如何成功地達成此一目標來衡量的。又如在消費者選擇的理論中，一位理性人是在達成最高的慾望滿足，所以他的目標可用本身的主觀感覺清楚地界定。<sup>④</sup>最後，在一般組織中，一個理性的行為者乃企圖在下列的條件下使產出功能達到最高：(1) 確定性：此時組織中可找到一個最佳的方案；(2) 風險性：組織裏雖然沒有一個最佳的答案，但是它可對真實狀況設定概率，從中選擇能使產出功能達於最大的方案。在上述的例子——公司廠商、消費者和組織——中，理性是成功地達成目標的觀點界定的，並非僅就決策制定的「過程」予以定義。這般的理性定義，賽蒙 (Herbert Simon) 和史特利 (Richard Steady) 將其應用在準理性行為之上。他們所謂的準理性行為即指著目標達成的滿意程度，但是端賴著目標達成而定的報酬功能，卻被最大化。

<sup>④</sup> Simon, Herbert and Richard Steady: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in Gardner Lindzey and Elliot Aronson (ed.),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 (Mass.: Addison-Wesley, 1969) p. 279.

這種理性的定義往往在分析公共政策時帶來若干的困難，因為它需要我們闡釋為公共機構所擬訂出來的廣泛性的目標。然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人能夠滿意地作到。因之，對政策分析而言這是一項嚴重的困局。另一方面，理性的過程定義對分析公共政策來說也是不恰當的，因為在經濟行為方

面，不能假定政府官員們個人的自我利益的總和就是公共利益。顯然地，公共利益是要比政府中所有的政治和行政官員權力的總和為多。

但是，當我們界定理性為成功地達成目標時，即會面臨著理論的和衡量的難題：我們應否假定公共機構只有一個目標（此即公共利益）？這一特殊的定義夠不夠讓我們衡量目標達成的程度？公共機構內的成員被視為一個團隊的成員，在理論上是否有利？若是不利的話，將其認為是一種妥協，能否把所有目標減低到一個單一的構面（a single dimension）呢？

顯然地，使用理性抉擇理論分析公共決策的可能性，要看我們回答上述問題的方式而定。假若我們並不認為公共機構有個單一的目標，那麼，便須要修正理性的定義，俾使它能夠適應那些目標是多元的或交相對抗的情況。或者，我們可能接受理性的過程定義，並就有關公共利益的意涵以種種規範的理論來適應它。此時，這些規範理論告訴了我們應該去考慮理性的內容和過程。這裏所涉及的若干難題，可用成本利益分析——經濟學家用來評估公共政策抉擇的方法——加以說明。

### 所得分配效果與成本利益分析

公共抉擇理論在組織理論與決策作成之著作中是一個晚近的、新增的研究主題。不過，它早已被經濟學家們所發展和採用。●

● Buchanan, James, and Gordon Tullock, "Calculus of Cons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在公共抉擇理論中用以評估公共政策的一種比較重要的技術，是成本利益分析。在成本利益分析中，公共政策的目標是以精確的金錢數字加以衡量的。但是，絕大多數的成本利益研究不能說明誰是公共政策的接受者，他們的富有程度如何？和政黨認同是什麼等類似的重要問題。因而，一位富者在所獲得利益中的一塊錢，被認為與一位貧者所得到的一塊錢是同具分量的。●今有兩個計劃均需要相同的成本，一個計劃是給一位富者一百萬元，另一個計劃是給一千位貧者各得九百元，依照目前的知識去作成本利益分析時，我們僅能判定前者優於後者，因為它的成本利益比例偏高。

● Zeckhauser, Richard, and Elma Schaefer, "Public Policy and Normative Economic Theory." In Raymond Bauer and K. J. Gergen (eds.), "The Study of Policy Form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Weisbrod, Burton, "Income Redistribution Effects and Benefit-Cost Analysis." In Samuel B. Chase (ed.), "Problems in Public Expenditure Analysis."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1968); Rothenberg, Jerome, "The Measurement of Social Welfar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1); Foster C. D., "Social Welfare Functions in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J. R. Lawrence (ed.), "Operational Research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Tavistock, 1966).

此一結論違反了許多經濟學家所持有的正義感，因而導致了不少學者企圖將公共服務受領者的所

得水準加以考慮。然而，所有這些努力都陷入一個嚴重的問題：人與人之間效用的比較是不可能的。亦即問題的癥結在於一個個人或團體所獲得一塊錢的邊際價值是否等於另一個個人或團體同樣的取得一塊錢的邊際價值？果若如此，那麼達成社會福利的途徑是直截的。因為我們只要把所有個人的福利總合起來就可得到整個的社會福利。⑤然而，在實際的公共抉擇中，我們瞭解政府官員必不會（也許也不能）考慮每個團體的福利是相同的；更確切地說，決策者並不認為一個團體的每位成員所得到的。一塊錢的邊際效用，等於另一團體每位成員所收到的一塊錢的邊際效用。

⑤ Bergson, Abram, "A Reform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Welfare Econom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2:314-44, 1938), Little, I.M.-D., "A Critique of Welfare Econom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Foster, C.D. *op. cit.*; Zeckhauser, Richard and Elina Schaefer, *op. cit.*

今以採用成本利益分析最爲成功的水利資源決策例子加以說明。在一項關於此一問題的研究中顯示：國會之所以批准了比其他計劃更低成本利益比例的水利資源計劃，僅僅因爲這些水利資源計劃的範圍是在較有影響力的國會議員們的住所區域內。⑥在這些例子中，國會對接受這些計劃區域內的人們，所得到的每一塊錢比在其他區域內的居民所取得的每一塊錢，給予了更多的份量。申言之，這類的決策，是基於議員們彼此之間的妥協和互捧，而非基於成本利益的計算。

⑥ Haveman, Robert, "Water Resource Investmen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65).

這一問題同時摻雜著不能解析的規範性和經驗性的要素。爲了說明起見，我將引用底下簡化的例子。首先，假定我們把在一特定計劃下將會受到利益的人們嚴格地區分爲富者與貧者兩類。然後再問：一個政府計劃對富者所提供一塊錢的邊際價值，與對貧者所提供一塊錢的邊際價值是否同具份量？許多讀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假若如此，那麼富有者所獲得的金錢利益將賦予什麼份量？

處理這個問題的一個途徑，是以實際的觀察作爲起點，再就觀察的結果加以規範性的推理。在這個處理途徑中，最佳福利分配的界定並不來自分析者所作的任何價值判斷。因爲他是百姓價值判斷和意見的觀察者，如同他是百姓在消費財上嗜好的考察者一般。不過，從這些資料裏，他可以推論出最佳的財富分配。因此若干經濟學家相信，具有價值的規範性的經濟學，是一門經驗的科學，因爲它是植基於主觀意見的客觀觀察。①

● Kolm, S., "The Optimal Production of Social Justice." In Julius Margolis and H. Guitton (eds.), "Public Econom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9), p. 148.

然而，當我們試圖從經驗的觀察中去作種種「份量」的推斷時，讓我們明瞭一些即可能發生的事情。今以下列簡單例子說明：假定有兩個彼此對抗的國民住宅方案甲和方案乙，然後政府必須就此二方案選擇一種。如果方案甲產生二百五十美元的總利益，其中包括：二百位貧者各得一塊美元；和五位富者各得十塊美元。若將成本假設爲二百美元，那麼利益成本比例就是一·二五。相對地，方案乙將能提供一百五十美元的總利益，其中包括：五十位貧者各得一塊美元和十位富者各得十塊美元，假

若方案乙的成本和方案甲同爲二百美元，那麼它的利益成本比例是〇·七五。依照這兩種方案的利益成本比較結果，政府應該優先採用方案甲。

但是，我們目前假定政府採納方案乙而非方案甲。倘若我們假設方案乙被優先採用的唯一理由是所得分配效果，那麼我們便可作人與人之間的效用比較。在這假設的例子中，政府認爲富者所得到的每一塊錢的邊際價值是三倍於貧者所獲得的一塊錢的邊際價值。因此，我們將富者所得到的每一塊錢乘以三，那麼方案乙的總利益即可等於方案甲。不過，政府採用方案乙，顯然是使用高於三的權數。然而，究竟要使用多少的權數是不能經驗地決定的。任何大於三的權數，將使方案乙的總利益高過方案甲，因而使方案乙有著較高的利益成本比例。但是，我們缺乏任何方法說明實際上使用的權數。當然，有人可能認爲權數大於三是可以了解的。然而這並不意指著政府總是絲毫不差地採用這個數字。職是之故，經驗性的方法不僅不能告訴我們在特殊的情況中什麼權數將被使用，而且也不能告知我們在將來應該採用什麼權數。

寇羅 (Kaldor) 和 海格斯 (J.R. Hicks) 曾經嘗試解決這個問題。他們主張倘使那些從改變中獲取利益者能夠補償損失者的話，雙方的情況可能會更好些；以及如果 巴列圖標準 (Pareto criterion)——在不傷害某個人的情況下，進一層的互換是不可能的——是滿意的話，那麼某個計劃將被採納。不過，他們的答案並不需要補償行動實際進行，蓋因政府能夠透過其他方法（如果進所得稅）重新分配所得。然而，這一答案的癥結，在於理性抉擇理論並不告訴我們爲何政府官員會去補償損失者。事實上，如果政府官員的目標是在擴展他們自身的權力，那麼一旦他們取得了某些權力之後，便會形

成若干誘因，以阻止他們從事所得的重分配。<sup>49</sup>亦即，在任何事件中，公共抉擇理論，不能提供理由，以說明為何政府官員將會補償任一特定的政府計劃的損失者。

<sup>49</sup> Zeckhauser, Richard and Elma Schaefer, *op. cit.*

<sup>50</sup> Foster, C.D., *op. cit.*

許多且逐漸增加的經濟學者深信，公共抉擇理論能夠不再迴避這個問題。<sup>51</sup>政府官員們對他們的決策分配效果比起效率效果給予更多的關注。例如，政治人物和行政人員，都不持效率最大化的標準去制定有關都市更新、健康、教育、法律強制或福利方面的決策。他們所考慮的只是誰得到什麼利益。因此，只有當公共抉擇理論包括公共政策的利益如何被分配的種種衡量尺度時，它才有可能對上述的決策作出有意義的貢獻。不過，這將是一條遙遠的路程，因為目前還沒有人能夠提供一項可接受的公共政策分配效果的衡量標準。事實上，在若干的情況中，這一作法是不可能的。譬如，在所提供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服務性例子（如國防）中，要去衡量它們如何分配，實在不可能。因為依照性質，它們是不可分割的。又如其他的例子（如租稅政策）中，由於一團體的利益可能等於另一團體的損失〔亦即產生零總和利益（a sum of zero benefit）〕所以就沒有利益成本比例可言。最後，理論並不告訴我們，為何政府官員將嘗試達成一項理論的利益分配，即使這一項理論的利益分配能夠界定出來。

- ⑧ Kolm, S., *op. cit.*; Rothenberg, Jerome, "Urban Renewal Programs." In Robert Dorfman (ed.), "Measuring Benefits of Government Institute."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1965); Weisbrod, Barton, *op. cit.*; Elkin, Stephen L.,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Analysis of Public Policy." *Social Policy*, 1974.

這些困難是不易克服的，因而具有遠見的學者們，試圖去修正理性抉擇理論，而不作機械式的利益成本衡量。

### 全知理性的若干限制

賽蒙氏曾經說過：經濟學者們把經濟人的特徵描述為一「荒謬地全知理性」，是我們處理理性的第一個端點。接著他說道，經濟人不但具有一套完備和一致的偏好，而且能夠了解所有呈現在他眼前的方案；從而作最複雜的計算以發現最佳的方案；同時，他更不畏懼風險性的和不確定性的情況。賽蒙氏深信，當經濟人的特徵被延用 to 相互競賽的局面和在不确定性下決策作成的領域之內，決策理論即可達到一種神聖優美的狀態。不過，它雖然持著大量規範性的利益，卻甚少關聯著現實人類的實際或可能行為。因此，此類高超的型模，對政治學的研究而言似乎是一項「危險性的工作」。<sup>⑨</sup>

⑨ Simon, Herbert A.,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op. cit.*, p. 23.

這些理論性的批評被若干經驗性的發現——政治人幾乎不是理性的——所支持。譬如坎培爾 (Angus Campbell) 等人曾云：非理性的因素時常決定選舉的結果。那些對政黨認同脆弱者，和對問題僅持最低度的知識者，經常基於候選人意象的這種事情轉移他們的選票，因而導致了他們的行為決定著選舉的結果。④再者，企業家對貿易政策這類關鍵性問題的態度，也絕不是全然理性的，蓋因他們的決策涉及較多的自我利益，況且他們還基於諸如理念、社會角色、背景等非理性前提的考慮。⑤因此，即使在大規模的正式組織中，理性的自我利益之純粹表達是很難獲致的。

● Campbell, Angus, Philip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Stokes, "Elections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Wiley, 1966).

● Bauer, Raymond, Ithiel De Sola Pool, and Lewis A. Dexter, "American Business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Atherton, 1963).

然而，徹底地、全然地放棄理性概念，倒是不必要的。行政人不完全不是理性的；僅是有意地理性的。⑥因為他所企求的是在達成「滿意的」而非「最佳的」決策，這是賽蒙氏的論點。再者，他界定它為一種「夠好的」的行動方針，⑦意指一位滿意的決策者不斷地從其所隸屬的組織中，找尋它所發展出來的選擇方案。在這一有限的範圍內，決策者選擇一個僅能滿足其熱望層次的行動方針。（不過，他的熱望層次也會因時間的不同而改變。）其次，決策者大大地簡化了決策制定的環境。因而，在某些時刻裏，一位決策者為了理性地達成目標而缺乏效率與經濟，甚至也是必須的。藍陀 (Martin

Landau) 曾經指出，一個體系的重疊性的確會增加該體系的可靠性，尤其當體系面對著高度的不穩定性時，更是如此。由於重疊性、雙重性和重覆性是避免錯誤的方法，因之它們可以視為理性的。●  
費爾瓊 (John A. Ferejohn) 和費爾利納 (Morris P. Fiorina) 也表明：一位選民若遵守能使最大預期損失減至最小的原則，即使他不在追求最大利益的實現，也應該被視為理性的。●

- Harsanyi, John C., "Rational Choice Models of Political Behavior vs Functionalist and Conformist Theories." *World Politics*, 21:513-38; Simon, Herbert,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op. cit.*; Landau, Martin, "Redundancy, Rationality and the Problem of Duplication and Overlap."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9:346-8; Dising, Paul, "Reason in Societ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2).
- Simon, Herbert, "Administrative Behaviour," p. 25.
- Landau, Martin, "Redundancy, Rationality, and the Problem of Duplication and Overlap." *op. cit.*;
- Braybrook, David, and Charles E. Lindbloom, *op. cit.*.
- Ferejohn, John A., and Morris P. Fiorina, "The Paradox of not Voting: A Decision Theoretic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527-37.

既然我們不願放棄理性的概念，那麼就要對它給予修正。自從賽蒙氏在一九四五年出版的大著行政行爲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中，第一個提出理性抉擇理論兩個主要修正以來，數種修正

型模就相繼出現。這些修正型模通常來自心理學、系統理論、操縱理論、訊息理論、或決策與博弈理論等方面的作品。在本節裏，我將討論數種此類的修正型模。

首先，讓我們考慮詳盡訊息的假定。大多數的組織決策涉及兩種情況：一為缺乏詳盡的訊息，另一為決策者無法完全控制影響他們的諸多變數。決策理論極為龐大，逐漸增加的部份是在處理各種風險性下的決策制定。在這種情況下，決策者必須基於不詳盡的訊息去設定選擇方案的機率。反之，一個人為了獲得詳盡的訊息，而投資了非常可觀的資源和時間，如果收益情形不能說明這一支出是正當的，他就不被認為是理性的。實際上，所有政治決策所涉及的情況都類似於此。例如，一位投票者無法獲得足夠的選舉報告，以完全認識選舉中的所有問題，因此，他可能仰賴著專家提供他所需的訊息去作較好的決策，並且有時使用理念作為過濾環境訊息的方法；甚至他會將不確定性降低到選票的邊際報酬超過情報取得的邊際成本的位置。特別是當候選人提出的方案並無實際的差別時，或者他覺得選舉對公共政策或是他本身的福利發生不了影響時，不去投票對一個選民而言甚至是理性的。但是，對專業化的人員（如新聞記者）而言，獲取詳盡的訊息是理性的，因為他們以分析選舉維持生活。不過，一般選民並不為他的選票取得充分的報告，以證明獲得詳盡的訊息是理所當然的。簡言之，當一個人在邊際報酬超過邊際成本時，即不再去蒐集訊息，他就不是一位企圖達成「最大化的」決策者，而只是一位想去達成賽蒙氏所謂的「滿意的」決策者；再者，他探討週遭的環境，僅在增進一正確決策被制定的機會，而不在確保他制定一項正確的決策。

理性抉擇理論的另一主要的修正是關於誘因的問題。政府的決策者往往深受各種非經濟的需要、

外界的因素以及自我利益所激勵。●當政府官員的個人利益不受強烈影響的情況時，他們可能自動地讓其本身的行爲爲一般社會福利的考慮所左右。若有衝突存在時（因爲每個人均從他個人的觀點判斷問題），不受直接影響的第三者如民意探查員，便可能去追求社會福利的最大實現。爲何政府官員有時會制定利他的決策？原因在於他們對組織和對社會的個人承諾。大多數的個人在組織的持續中均下了一個較大的賭注，使得他們在某些決策情況中拋開了直接的自我利益。另外，沉入成本、傳統、家庭考慮和國家感情也都是誘因的一部份。●最後，一個人的行爲爲多少可就社會接受慾和經濟獲得慾加以解釋。

● Harsanyi, John C., *op. cit.*; Rawls, John,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Harsanyi, John C. *Ibid.*; Downs, Anthony, "Inside Bureaucracy." (Boston: Little, Brown, 1967).

上述所討論的兩種方法在修正理性抉擇理論上雖爲可能，但是，組織行爲還有著其他更複雜的方面，以致使得被矯正過的理性抉擇理論又陷入更多的陰影。其中之一爲目標彼此對抗的問題。如上所述，有時個人所持的種種目標彼此發生衝突；那就是適合於一個目標達成的方法可能會阻礙了另一個目標的實現。在行爲者面臨這種交錯壓力的情況下，理性的界定是極其困難的，因爲我們缺乏一共同理論以說明行爲者將會採取那個目標。如果一位行爲者是一名投票者的話，一個可能的答案便被作如下的假定：每位投票者在每種構面中，從其最佳的立場比較每一方案彼此之間的差距，以使問題能夠

簡化，從而再以簡單的線形方法去組合種種的差異。④然而，這種解決方法並不能運行於組織的決策制定。尤其當組織內部有數位決策者以及多重目標的環境下（此意指組織並非單一首长制的嚴格層級節制的形式）更是如此。因為這些不同的立場無法加以整合，實由於團體的若干目標和利益彼此衝突的緣故。如此說來，任何修正理性抉擇理論的方法，似乎不能解決這個問題，那麼唯一可行的途徑便要訴諸於決策作成的不同型態。

● Rae, Douglas, and Michael Taylor, "Decision Rules and Policy Outcom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 1971.

理性即使就尋求一滿意的而非最大的行動方針而言，仍然需要在組織行動與目標達成的關聯性中經常有著反饋行動的發生。系統理論、操縱理論和訊息理論促進了我們對此一過程的瞭解。從決策者的觀點而言，他們的報酬大大地決定於目標達成的程度，及其所獲得的情報如何傳達於整個組織的方式。假若一個決策者所選擇的方案不能達成目標或被認為註定失敗，那麼，那些支持目標和方案的行為者可能因此而免職或降級。然而，這並不是說反饋行為是準確的，即使在以利潤為重的廠商中，也是如此。有個經驗性的證據指出，管理報酬和公司利潤之間的相關性是很低的。⑤但是，反饋行為對組織的生存而言是重要的，因為系統的產出是獲取支持的手段。⑥直到最近，理性抉擇理論才包括某一特定的政策到底會產生多少影響的分析，以及有關目標達成的訊息，如何再傳佈於整個組織的研究。

● Gordon, R. A. *op. cit.*; Cooper, W. W., "A Proposal for Extending the Theory of the Fi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5, 1951.

● Easton, David,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5).

雖然，系統理論和操縱理論有助於我們了解反饋對組織決策作成的重要性；但是，時至今日，以這些理論應用於經驗性的資料中還沒有多大的成功。尤其在公共決策方面，要採取這種作法將會困難重重，原因在於界定公共抉擇目標的不易性。當然，它尚有許多重要而實際的和理論的影響。例如，由於公共機構的目標向來都以最普遍的或含糊的字眼加以陳述，因此要去說明這些目標是否被實現，將陷入極端的困境；進而，要使政府主管們去對目標的達成擔負責任，也會遭逢到非常的阻礙。其中一個重要的理論支系認為：當目標不被詳明和衡量時，公共決策作成中的反饋圈勢必很微弱，因而不可能把不確定性化約到可加管理的層面上。在決策理論的術語中，這意指公共抉擇理論大多在不確定的情況下被制定。因之，我們便認為在不確定的條件下，理性的決策是不可能的。如此說來，我們必須全盤地放棄理性的抉擇，而非僅對它作一修正而已。決策理論在這立場上並不十分的肯定，但是大多數現存的理論邏輯卻深深地朝著這個方向。

## 決策理論與不確定性

決策理論曾經有過數種方式的分類，其中之一為鄧肯和魯斯 (Duncan and Luce) 所作的分類。他們將決策理論區分為確定性的決策、風險性的決策和不確定性的決策三類。●(1)在確定性的條件下，決策者不僅對決策情況有著詳盡的訊息，而且他還能夠運用如線形規劃、動態規劃等確定性的型態求取最佳的答案。(2)在風險性的條件下，決策者對決策的相關變數無法獲得詳盡的訊息，他更不知道決策後果將會如何。不過，他卻能夠設定每種「真實狀況」的種種概率，然後選擇可使預期效用達到最大化的成果。(3)在不確定的條件下，決策者對將會發生的真實狀況毫不知情，同時他也無法設定種種的概率。因此，他最好的作法是從許多不同的決策規則中，選擇一種規則作為決策的標準，諸如最大的收益，最大中取最小的損失和何威茲規則 (Hurwitz's  $\infty$ )。至於那一種規則的採用最為恰當，往往決定於與理性選擇並無關聯的種種因素之上。

● Luce, Duncan, and Howard Raiffa, "Games and Decisions," op. cit.

理性抉擇理論極為重要之點，在於風險性和不確定性之間的分野。依照魯斯和雷發 (Luce and Raiffa) 的定義，不確定性意味著對行動結果的不知情；因此，在這些環境下制定理性的決策顯然是不可能的。況且，許多學者深信大多數的組織行為都處在不確定的狀況裏，因之，組織行為就不可能

成爲理性的。當然，並非所有的學者相信不確定性就是意涵著完全的不知情；甚至許多學者聲稱它只不過於風險性的一個特殊例子；或謂它能夠用主觀的機率加以處理。由於不確定性與風險性之間的區別和不確定性的意義，對理性抉擇理論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因此我將在本節中詳加討論。

關於風險性和不確定性之間的區別，可能是一九二一年首先爲奈特 (Frank Knight) 所作的區分。但是，近些年來大部份經濟學家仍對此一區分加以漠視；因爲它似乎不爲他們提供任何一有用的用途。有人乾脆把風險性與不確定性視爲相同的；蓋因此兩種情況均顯示出行爲的結果不能被確定地預測；但是我們卻能詳明所有可能的結果，並對每種可能結果設定種種機率。一旦我們設定選擇方案的機率時，就不需對風險性與不確定性二者作一劃分。亞克寇夫 (Russell Ackoff) 指出，這種區別是不必要的，因爲將所有的不確定性化約爲風險性是可能的。假若一個決策者有足夠的訊息去規劃決策問題時，他將同樣有足夠的訊息去就不同的方案設定種種機率。<sup>④</sup>再者，機率不必是「客觀地」真實的。因爲決策者若能對決策的情況掌握若干訊息時，不管這些訊息齊備與否，他將能夠對各種不同的真實狀況設定種種判斷性的概率；從而藉著判斷性的或主觀的概率之設定，使他能夠應用在風險性下決策作成的相同型模。有關客觀概率與主觀概率二者的比較問題相當複雜與重要，需要詳細說明，因此我們立即處理這個問題。首先，讓我們敘述在確定性、風險性與不確定性的每種條件下的決策作成，然後討論客觀概率和主觀概率之間的區別；最後，指出所有的不確定性與組織理論的關聯性。

506-8

17A 17E

● Borch, Karl, and Jan Mossin, "Risk and Uncertain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69), p. 13.

● Ackoff, Russell, "Scientific Method: Optimizing Applied Research Decisions." (New York: Wiley, 1962).

確定性決策作成的例子涉及非常寬廣的領域。不僅在作業研究中有極多的範圍，而且在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和管理科學中也有相當的部份，都能夠拿它來作分類。在企業管理中一個典型的情況是：一家公司擁有數家工廠與倉庫，並須就產品從工廠用船運到倉庫儲存。在此過程裏，它應該確切地計算船運的費用、工廠生產的能力和倉庫的容量，從而決定何種產品應被裝運以及那裏的倉庫可以容納那家工廠的貨物。像這類的決策，僅牽涉到複雜的數學計算，實際上並沒有風險性或不確定性的介入。

1 ( 22

數學工具使用來分析此類的決策遠比分析不確定性或風險性的決策有著更高度的發展。它們涉及到(1)微積分學的演算以求最大值和最小值——亦即線形規劃；(2)變異微積分學的應用以發現種種功能、產品目錄、存貨目錄——這指動態規劃；以及(3)在政治學和社會學中許多因果型模技術的引用。在所有這些數學工具的應用中，決策者對所有選擇方案的可能結果有著詳盡的訊息；並且完全控制著影響結果的種種變數。亦即在這封閉系統中，決策者能夠挑選最佳的行動以及確切地掌握住它的發生。扼言之，在確定性下的決策作成是決定性的，因此，決策者不是冒風險的，也不是對行動後果不確知的。

在博奕理論中，若干部份屬於在確定性下決策作成的一種範疇。博奕理論——決策理論的一個重要部份——早為數理經濟學家馮紐曼和摩根史頓（Oskar Morgenstern）發展出來，●後經不同學科廣泛地應用而成為一門蓬勃有力的科學。因之討論博奕理論如何處理確定性、風險性和不確定性下的決策是有所裨益的。

- Von Neumann, John, and Oskar Morgenstern,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7).

博奕理論中涉及到決定性和確定性答案的那些部份是屬於鞍點（saddle point）的零和賽局（zero-sum game）。這裏的鞍點是指行中最小值的較大者等於列中最大值的較小者的一種狀況。理性的行為者勢必去選擇導致此種答案的策略，因為任何其他策略都會帶來更壞的情況。●在這類賽局中，每一位行為者僅有一最佳的策略，那就是最大中求最小的策略。鞍點的零和賽局是相當決定性的賽局。然而，它和確定性的決策唯一的差別，在於後者的對象是「自然環境」，而博奕者本身的對象則是另一位企圖凌駕決策者並迫使其作最差勁選擇的理性行為者。

- Palumbo, Dennis, "Statistics in Polit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9), pp. 315-16.

在政治中，確定性的決策作成情況極為少見。因之，在政治學中甚少使用線形規劃、動態規劃和

零和賽局型模的機會。時至今日，零和賽局理論僅僅發現應用在軍隊交戰的研究中。●不過，這並不意指此一決定性的型模在政治學中毫無地位可言；尤其最近若干年來，因果型模在政治學裏業已被廣泛地使用。●然而，這些決定性的型模對建構組織行為理論而言，似乎不像或然性型模那麼有用。

● Taylor, Michael, *op. cit.*, p. 368.

● Blalock, Hubert, and Ann Blalock, *"Methodology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Alker, Haywood, "Statistics and Politics: The Need for Causal Data Analysis." In S. M. Lipset (ed.), *"Politics and the Social Scien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在風險性的決策中，決策者對於每一方案的種種結果並沒有詳盡的訊息；再者，他也不能確定何種「真實狀況」將會發生，因此他必須基於不同真實狀況的機率  $S_1, S_2, \dots, S_n$  去選擇一種方案  $A_1, A_2, \dots, A_n$ 。今舉個例子加以說明。假定問題是為一個新的政治事件請求財政資助的決策。為簡化說明起見，我們以為這項請求財政資助的呼籲需要在電視上進行。今假設(1)電視上一分鐘的廣告要花費七百元美金；(2)有  $A_1, A_2, \dots, A_n$  等幕的廣告節目預定被購買。(3)這項活動的經紀人事先並不瞭解到底要購買多少分鐘，但他卻有經驗去籌募基金和估計究竟多少人可能會對一項電視活動產生反應的種種機率。(4)真實情況  $S_1, S_2, \dots, S_n$  被認為是對每一方案可能反應的捐助者的不同人數。(5)活動經紀人有足夠的體驗了解捐助者的不同人數所呈現出的概率型態非常近似於波森分配 (poisson distribution)——●它指著「獨立事件 (discrete event) 的分配，其中 P 代表成功的概率，Q 代表

失敗的概率，兩者在事件中，都是非常微小。見表一。

● Palumbo, Dennis, "Statistics in Polit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op. cit., p. 92。

表一的資料構成了一個實際的賭注型模。因為反應一項電視活動最可能的捐助者人數是二百人或三百人，但是它卻有可能低到零或高到九百人。一位決策者面對著表一的資料，可能企圖購買能夠達到二百人或三百人捐助的恰當 (just) 時間，因為他們的概率是最高的。然而，決策的制定還得因電視時間的費用和每個反應者捐助的金額而定。假如電視時間是免費的，他將要求充裕的時間以達到至少有九百位的捐助者，或者達到可能的最高人數。但是，電視時間並非免費的，決策者的預算也非寬裕的，因而決策的制定是不能僅僅基於概率的考慮而已。

爲了在我們的決策中包括成本和利益起見，就必須去計算收益矩陣 (payoff matrix)。上述假定電視時間每分鐘的費用是美金七百元；如果我們再假定每位反應者將捐助美金十元，以及反應者人數，對長短不同的廣告時間，都有一個限度——那就是一分鐘的廣告，反應者最多達到四百人，二分鐘的廣告頂多只有五百人等等——就可逐一地計算圖表二中的收益情形。例如，活動經紀人買了三分鐘的廣告，並且有三百位反應者，他的總捐助將是  $300 \times \$10$  (捐助的金額) -  $3 \times \$700$  (總成本) =  $\$900$ 。

表二顯示了活動經紀者採取的行動，端賴他對風險性所持的態度而定。如果他決定購買一分鐘的廣告，不管如何將可得到美金三百元的報酬。但是這是風險性程度最低的決策，因而保守的決策者可

表一 波森 概 率 分 配

m = 300

| 捐助者事件:<br>x 的人數 | 概 率<br>P(x) |
|-----------------|-------------|
| 0               | 0.050       |
| 100             | 0.149       |
| 200             | 0.234       |
| 300             | 0.234       |
| 400             | 0.168       |
| 500             | 0.101       |
| 600             | 0.050       |
| 700             | 0.024       |
| 800             | 0.008       |
| 900             | 0.003       |
| 1000            | 0.000       |

※ m: 一事件預期的成功平均數

表二 收益矩陣

| 事件：<br>捐助者的人數 | 方案：被購買的電視時間 |           |           |           |           |
|---------------|-------------|-----------|-----------|-----------|-----------|
|               | 一分鐘         | 二分鐘       | 三分鐘       | 四分鐘       | 五分鐘       |
| ○             | \$ 負 七〇〇    | \$ 負一、四〇〇 | \$ 負二、一〇〇 | \$ 負二、八〇〇 | \$ 負三、五〇〇 |
| 一〇〇           | 三〇〇         | 負 四〇〇     | 負一、一〇〇    | 負一、八〇〇    | 負二、五〇〇    |
| 二〇〇           | 一、三〇〇       | 六〇〇       | 負 一〇〇     | 負 八〇〇     | 負一、五〇〇    |
| 三〇〇           | 二、三〇〇       | 一、六〇〇     | 九〇〇       | 二〇〇       | 負 五〇〇     |
| 四〇〇           | 三、三〇〇       | 二、六〇〇     | 一、九〇〇     | 一、二〇〇     | 五〇〇       |
| 五〇〇           | 三、三〇〇       | 三、六〇〇     | 二、九〇〇     | 二、二〇〇     | 一、五〇〇     |
| 六〇〇           | 三、三〇〇       | 三、六〇〇     | 三、九〇〇     | 三、二〇〇     | 二、五〇〇     |
| 七〇〇           | 三、三〇〇       | 三、六〇〇     | 三、九〇〇     | 四、二〇〇     | 三、五〇〇     |
| 八〇〇           | 三、三〇〇       | 三、六〇〇     | 三、九〇〇     | 四、二〇〇     | 四、五〇〇     |
| 九〇〇           | 三、三〇〇       | 三、六〇〇     | 三、九〇〇     | 四、二〇〇     | 四、五〇〇     |

能選擇它。如果他買了五分鐘的廣告，他就冒著高度的風險，因為他可能損失美金二千五百元，也可能贏得四千五百元。一位投機的決策者可能選擇這類的決策。

表三 買兩分鐘電視時間的預期總捐助

| 捐助事件：<br>事件：<br>的人數<br>$(x)$ | 概<br>率<br>$P(x)$ | 總<br>收<br>益<br>$\pi$ | 預<br>期<br>總<br>收<br>益<br>$\pi \cdot P(x)$ |
|------------------------------|------------------|----------------------|---|
| ○                            | ○·○五○            | \$負一、四○○             | \$負 七○·○○                                 |
| 一○○                          | ○·一四九            | 負 四○○                | 負、 五九·六○                                  |
| 二○○                          | ○·二二四            | 六○○                  | 一三四·四○                                    |
| 三○○                          | ○·二二四            | 一、六○○                | 三五八·四○                                    |
| 四○○                          | ○·一六八            | 二、六○○                | 四三六·八○                                    |
| 五○○                          | ○·一○一            | 三、六○○                | 三六三·六○                                    |
| 六○○                          | ○·○五○            | 三、六○○                | 一八○·○○                                    |
| 七○○                          | ○·○二四            | 三、六○○                | 八六·四○                                     |
| 八○○                          | ○·○○八            | 三、六○○                | 二八·八○                                     |
| 九○○                          | ○·○○三            | 三、六○○                | 一○·八○                                     |
|                              |                  |                      | \$ 一、四六九·六○                               |

表四 每一方案的預期總捐助

| 方案：購買電視的時間（單位：分） | 預 期 總 捐 助：  |
|------------------|-------------|
| 一                | \$ 一、八一八·三〇 |
| 二                | 一、四六九·六〇    |
| 三                | 八四二·二〇      |
| 四                | 一七五·六〇      |
| 五                | 負 五〇一·五〇    |

綜上所述，決策者選擇方案的一項標準是決定於他的個人人格。顯然地，這不是一條理性的途徑。一位理性的決策者應該在他的決策計算中包括捐助者不同層次的反應概率，以及每種方案的費用。爲了說明起見，我們勢必再去計算每一方案的預期總捐助。表三顯示了「買二分鐘的電視時間」的各種計算：其中「總收益」這一欄是指購買二分鐘的電視廣告所得到的捐助金額（見表二）；不過，這一方案的預期最大捐助僅爲四百三十六·八〇美元，預期總捐助也只有千四百六十九·六〇美元。這一數值可被看成一個隨機變數的預期值。如果決策重覆出現多次，而且每一次決策者都選擇同一方案時，將會產生平均的捐助值。但須注意的是總捐助將不是一千四百六十九·六〇美元。然而，倘若決策者買了兩分鐘的電視時間，和有五百個捐助者反應的話，他的總收益爲五千元減一千

四百美元等於三千六百美元是可能的，不過這種事件發生的概率是稀少的（ $p=0.101$ ）。

爲了制訂一個理性的決策，去計算每種可能方案的預期總捐助是必要的。（見表四）。表中顯示最高預期總捐助的方案，是購買一分鐘的電視時間；因此，一位理性的行爲者將會選擇此一方案。（此時理性的答案也是保守的答案，乃是一種巧合）。

正如我們所能瞭解的，許多的方案是由三個變數的值加以決定的。其中電視時間的費用和每位捐助者將捐出的金額是已知的，但是究竟多少人數會對所購買的不同電視時間給予反應，則是未知的。所以，一旦未知變數的概率被設定之後，一位理性的行爲者所作的方案選擇就毋需置疑了。此時所謂的「風險性」決策，即指決策者無法確切地知道收益的情形，但他可以了解購買一分鐘電視時間的決策也許會損失三千五百美元，或會賺得四千五百美元。不過，這些結果的概率是稀少的；如同在一輪盤賭上，二十六個黑球同時出現在一排中，或在橋牌賽中拿到一手完美的牌，都是罕有的事件。然而，決策者卻確切地知道到底要承擔多少風險以制定理性的決策。

然而，如果決策者沒有足夠的經驗，在若干「客觀基礎」上設定真實狀況的種種概率，他是否仍能制定一個理性的決策？這個答案顯得曖昧不清。有人認爲是可能的，只要我們能夠把決策者所面臨的不確定化約到風險性的程度。假若他缺乏「客觀的」基礎去設定電視觀賞者不同反應水準的種種概率，即有可能採取「主觀概率」的途徑；如是的話，便可把所有的不確定性視爲風險性的例子。但是，有些人卻認爲這是不可能的，特別是那些同意概率有其客觀立場的學者。爲使這一問題得以澄清起見，讓我們更加精確地考慮不確定性和風險性的差別。

關於不確定性和風險性之間的區別，可用底下的例子作一說明。假定你需在下列兩個不同賭注之間作一選擇：

- 賭注一：如果美國下任總統是民主黨人士，將可獲得一千元；若不是民主黨人士，則一無所得。
- 賭注二：假若從一副完好無缺的牌中，抽出的王牌是紅色的話，將可得到一千元；如為黑色，就一無所得。

在這兩個賭注上，你認為下那個賭注較好？涉及到此類的賭注之試驗，大多數的個人較喜好賭注二，因為它可就方案設定明確的概率，而賭注一則不然。●賭注二是風險性的例子，賭注一則為一確定的事件，原因為何？實在是由於下屆總統是否為民主黨人士，沒有客觀的概率能夠設定出來的緣故。當然，讀者可能反應：我們可以對賭注一設定若干直覺的或主觀的概率；譬如，我們可能基於過去的選舉行為，認為下任總統將是民主黨人士的概率為 $0.60$ 。但是，這是不同於從一副牌中抽取紅牌的概率為 $0.50$ 。總統的選舉既不是重覆無限次的事件，也不是我們能夠設定一數學概率的事件；因為我們無法像玩撲克牌一樣，了解一組中每個元素的所有特性。然而，過去我們所選擇的概率仍是一種概率，它是基於歷史的知識和政治的分析而非基於相對次數或集合中元素的計算。當然，這種方法所表明的概率準確性程度要比抽取一張紅牌的概率準確性，更令人置疑。原因在於我們缺乏充分的訊息去計算精確的數學概率。但是，為了決策理論要是有此看法的話，它便不必考慮概率的準確程度如何。再者，在風險性下的決策，大部份的概率不必是客觀真實的。譬如，經驗的證據指出：即使在各種賭注清楚的和種種概率確定的場所中，主觀概率也無法強化客觀概率的效用。●這種說法

是頗具真實性的。但是應記住的是，照上述的論點，組織的理性定義需要我們的決策能有幾分達成目標的成功；那就是我們如何辨別它與理性的過程定義，底下這一論點是值得強調的：不論如何客觀地或主觀地去設定方案的種種概率，它們總是經驗性正確的；否則的話，就不可能去衡量目標達成的程度；因而，也不可能是實質理性的。

① Elisberg, Daniel, "Risk, Ambiguity, and the Savage Axio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5:643-69; MacCrimmon, Kenneth, "Descriptive and Normative Implications of the Decision Theory Postulates," in Karl Borch and Jan Mossin (eds.), op. cit..

② Edwards, Ward, "Probability Preference in Gambl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66, pp. 349-64; MacCrimmon, Kenneth, "Descriptive and Normative Implications of the Decision Theory Postulates," in Karl Borch and Jan Mossin (eds.), "Risk and Uncertainty." op. cit..

在博奕理論中，沒有鞍點的零和賽局類似風險性的決策作成。在這些賽局裏，決策者所選擇的策略比其他的策略產生較多的次數；再者，他不僅決定了最佳的組合，而且也設定好了在組合中其將採行的每一策略的種種概率。簡言之，在這些賽局裏有個從最大中取最小損失的答案。如此說來，在風險性的情況下，所有的決策者能夠選擇成功概率最高的策略，因之，他們並沒有唯一的、最佳的行動路線，而只有一風險性的路線。然而，由於他們會去計算選擇正確策略的種種概率，因此他們可能是理性的。

在博奕理論中，不確定性的決策作成也是決策理論的一個類別。在不確定性的賽局裏，除了一位奕者所得的不等於另一位奕者所失的（他們涉及到非零和競賽）之外，決策者也無法知道他的對手將會採行的策略，因此他沒有一個最佳的策略。然則，決策者採行的策略是由數種因素所影響，諸如他是否肯作旁的支付，他能否預期對手與之合作以及對手可能行爲的諸多變數。●譬如美國和蘇聯的軍備管制協定，就不被引入一場零和競賽中，乃因爲軍備管制被採納後，雙方將可獲益，而且每一方的政策是被他們的聯盟和內部政治所限制；於是奕者們並非無拘無束地採行可資運用的最佳策略，即使他們能夠充分地化約不確定性到事實的眞象，也是如此。

● Taylor, Michael, *op. cit.*; Farquharson, Robin, *op. cit.*

在不確定性的賽局中，並未發展出許多的決策規則。其中關於最小中取最大的收益和最大中取最小的損失是廣爲人知的。前者引導一位決策者選擇提供最高安全層次的行動路線；如此說來，在圖表五的範例中，決策者將會選擇方案 A<sub>1</sub>，因爲它保證他得到至少三的收益，但是只有當我們假定自然環境並非不利的情形（即某一人每次收穫不是另一人每次的損失）下和決策之前，並不知道他的選擇的狀況中，這一行動路線才被認爲是合理的。●

● Luce, Duncan and Howard Raiffa, *op. cit.*

表五 不確定性矩陣

|      |       |       |       |
|------|-------|-------|-------|
|      |       | 方 案   |       |
|      |       | $A_2$ | $A_1$ |
| 自然環境 | $S_1$ | 八     | 三     |
|      | $S_2$ | 一     | 五     |

最大中取最小損失的標準，乃將焦點集中在一項不正確決策所造成的機會損失上。所謂的損失，是指決策者在曉得真實狀況將會如何的情況下，以被實現的收益和將被達成的收益的差數來計算的。就上述例子而言， $A_1$  的最大中取最小損失是  $A_2 - A_1 = 8 - 3 = 5$ 。此一決策規則的標準，說明了決策者將去採行為真實狀況所選擇的任一策略中，可使預期損失得以最小化的行動路線。

上述兩個標準，作為決策作成工具的缺點，在於它們僅注意到結果，而不去考慮相對的真實情況的可能性。讓我們將它和上述已討論過的風險性決策作成例子相比較一下。如果我們能夠就表五中的例子，設定真實狀況之種種概率的話，便可將不確定性化約為風險性。若能如此，將有一最佳的選擇；不然，就沒有辦法決定，那一種決策規則，在不確定的情況下是理性行為的妥適標準。●因此，在不確定性下的決策作成，並非理性抉擇的一個修正例子；至少不只是將不確定性化約為風險性是不

可能的。總之，我們無法了解如何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作一理性的抉擇，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標準以告訴吾人那一種決策規則是最好的。泰勒（Michael Taylor）結論道：關於不確定性個案的應用——包括著囚犯進退維谷的傳統問題，對於合作與衝突，博弈理論在此情況下的適用性，以及「理性」本身的意義等若干方面，提出了許多有趣的問題。●

● Arrow, Kenneth,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the Theory of Choice in Risk-Taking Situations," *Econometrica*, 19, 1951.

● Taylor, Michael, *op. cit.* p. 371; Rapoport, Anatol, and Albert Chamnah, "Prisoner's Dilemma: A Study i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5).

許多實際情境（尤其在政治上）類似於不確定性的狀況。在很多政治場合中，決策者對於他的對手可能採取的行動全不知情；或者他也不能針對種種方案設定合理的概率，即使他可以詳明它們。譬如，美國與蘇聯的外交關係中，美國無法詳明蘇聯可能採取的一切方案，甚至它也不能就其所確認的方案設定種種合理的概率，更且，它無法充分地瞭解有關蘇聯的決策作成結構，國民性格以及主要行為者的人格等，因此美國便不能預測蘇聯對其所採行的特殊行動作如何反應。一九六二年的古巴飛彈危機便是良好的說明。有關此一危機的電視訪問，甘迺迪說道：封鎖蘇聯船隻駛往古巴的決策，對俄國產生的影響，實比他早期所預料的為大。俄國人對於美國士兵登上蘇聯船隻，並對其隱藏的飛彈予以嚴厲的監視，頗感尷尬。這種反應是甘迺迪在他早期的決策中始料不及的。甘迺迪又說：對於已經

設立在古巴的飛彈基地進行低平面的、密集的拍攝之決策，同樣是正確的。飛機大大地困擾了卡斯楚，但他不能將它們擊落，因為那將給予美國侵犯古巴的口實。從此觀點，卡斯楚無意中幫助了美國，卻使蘇聯蒙受撤回飛彈的壓力。艾立森強調：這些令人驚愕的結果是由古巴封鎖所導致的；並且他敘述其間發生過的許多誤算、誤解和不確定性。因為，在此類的決策中，對手的可能反應是不可預測的。果若反應並不依循著任一已知的概率分佈的話，這種情況就不符合我們的風險性定義。雖然決策者在此情況下，不可能是毫不知情的，但是卻近似於此。

類似上述的情況，最適合於我們對不確定性決策作成所作的界定。因為決策者不能就選擇的真實情況設定種種客觀的概率。假若我們同意，大多數的政治決策落在這一決策作成的範圍內（那就是不能夠預測對手的反應），那麼便可以認為，大部份的政治決策不可能是理性的。這顯然是一個頗為重要的理論性結論。鑒於它的重要性，讓我們詳加探討客觀概率和主觀概率的意義。

客觀概率可以二種方法予以界定：第一類的界定乃在使它成爲相對次數（relative frequency），此即求出符合一事件範圍內那些實例，與組成一羣體所有實例的比例。譬如，我們能夠計算關於年齡四十五歲死於肺癌、二十一歲男性騎士發生車禍，以及智商高過一二〇的客觀概率。由於這些事件和許多其他類似於此的事件，在非常近似的情況下重覆地出現多次；因此它們出現的相對次數便被使用來作爲概率。客觀概率的第二類界定是數學的，此即找出符合一事件範圍內所有組合裏的各個部份，與在有限的抽樣空間內一切可能事件的比例。此時，事件和抽樣空間必須是有限的和可加計算的。如此我們才能界定抽樣空間爲從三個黑色與兩個紅色玻璃珠的母體中，選擇三個玻璃珠作爲樣本的所有

可能結果；至於事件，則被界定為至少包括兩個黑色玻璃珠的樣本選擇。或者我們可能界定抽樣空間為從一組撲克牌中取出三張牌的所有可能結果，而把事件界定為三張王牌的選擇。對於這些事件的任何一種，我們都可以設定明確的概率。

大部份的政治事件，並不接近於上述客觀概率任何一類的界定。蘇聯是否將在中東發動核子戰爭、國會是否通過國民福利法案，或者特殊的個人是否將在一九八〇年當選為總統等類的事件，不是也不可能重覆多次的；更且，它們也不是在一有限的和可計算的抽樣空間內的事件。事實上，它們是在無限的抽樣空間內的事件，因之不能夠設定一項客觀的概率。關於這一論點相當重要，以致令我一再地強調。在一個開放的和無限的組合中，想對事件設定種種客觀的概率是不可能的，因為概率的設定需要我們確認並列舉事件的所有可能結果（也就是組合與排列事件一切可能的結果）。由於在不確定性下的決策作成經常涉及一個開放性的組合，因此不能經由客觀途徑來分析概率的問題。

前面說過，處理不確定性情況的一條可能途徑，即試圖將它們化約到風險性的場合中。有數種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其中之一是武斷地將我們所考慮的抽樣空間縮減到有限的與可加計算的範圍內。例如，即使在還沒有確認變數以前，我們可能假設吾人已經確認所有相關的變數了。當我們在非實驗的研究設計中作因果推理（causal inference）時，能夠製作上述的假設，是基於我們假定：不在方程式體系內的變數是外來的、先決的。由於我們認為這些外來的變數是「既定的」，●所以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就可採用與風險性決策相同的程序。然而，這可能涉及到組合質然的終止而導致錯誤的結果，尤其在我們尚未確認所有相關變數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 Blalock, Hubert, and Ann Blalock, *op. cit.*; Simon. H. A. "Models of Man" New York: Wiley, 1957).

另一種處理不確定性的較好方法是對概率採取主觀的途徑；亦即將概率視之為僅存在決策者腦海中的判斷或信念的問題，而非發生於「外界」的某項事物。事實上，從哲學的觀點而言，一旦我們採取了主觀的途徑，就完全沒有「客觀地真實」之概率可言。所有的概率只有在我們的心目中被認為是真實的，因為它反映了我們對即將發生的不同真實狀況所持有的信賴程度。如此說來，大多數的概率經常植基於我們所擁有的不完備知識之上。這一主觀的途徑打開了為過去所封閉的大量嶄新的應用領域，同時它也帶來了非常深遠的和有趣的理論問題。因此，我將花些篇幅探討決策如何就這個途徑加以制定。

今舉個例子作為開始。假定一家公共保健機構按月從一家私立醫院租借醫療房間。假若它在某個月租了太多的房間，將因房間未被使用而賠錢；如果租了太少房間的話，它勢必排除需要房間者。為了制定一個健全的決策，這個機構必須估計未來的需要，並為每個需要層次設定種種概率。例如，它可能一天使用六、七、八、…… $n$ 間房間，並且設定每個需要層次的概率為  $P_1, \dots, P_n$ ，此即：

$$\sum_{i=1}^n P_i = 1.00.$$

這個機構如何針對著各種可能的需要層次去決定概率呢？如果它採取客觀途徑的話，則將建構每

天每種需要層次的相對次數，並依此設定不同需要層次的種種概率。要是它採行主觀途徑的話，這個機構將引用某個人對於不同需要層次所作的概率判斷。在後者的情況下，概率意味決策者針對每種需要層次所持的個人判斷的信賴程度；而且他能夠憑著預感、邏輯或直覺，精確地達成概率的設定。果若決策者修正這些主觀判斷以符合每天的實際經驗，那麼，他便使用了貝氏方法（Bayesian approach）去制定決策。邱曼（West C. Churchman）認為，不論客觀途徑能否適用，這種方法將帶給決策者像客觀途徑一樣的結論。<sup>⑯</sup>申言之，決策者能夠基於客觀的經驗而去修正主觀概率的話，這兩種途徑均可獲致相同的結論。

⑯ Churchman, C. West, "Prediction and Optimal Decis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1).

處理概率的主觀途徑可能被認為優於客觀途徑，因為它可在客觀途徑能夠使用以及不能夠使用的場合中加以運用。在前一場合中，主觀途徑並不與客觀途徑相互衝突；主觀途徑只不過是在明示的效用和權數的形成中，以表達主觀判斷的方式，使得判斷功用顯現出來。況且，它也被認為是客觀途徑的形式上的實現。更且，在客觀途徑不能夠採行的場合裏（也就是決策不可能被重覆和計算時），主觀途徑對於決策作成的概率設定增添了一全新的面向。然而，主觀途徑是否有此優點，仍然是個有待深思的問題。蓋因在沒有已知的客觀概率情況下，決策者所使用的概率可能大大地不同於他想去影響的經驗事件。如此說來，主觀途徑不是有利的，而是有害的；因為它拘束著我們去運用那些可能產生

極爲錯誤結果的決策制定程序。目前有數種嘗試圖去解決這個問題。

馮紐曼和墨根史頓以下述的方法去發展主觀概率的途徑：●我們能夠讓決策者去對真實狀況中概率爲未知的冒險加以比較一下。假定他認爲下列兩件事情並無差異的話——其一是假使真實狀況發生時，他將可獲得貴重獎品的彩券；其二爲如果他從裝有三十五個紅球和六十五個黑球的瓶缸中取出一個紅球的話，將能夠得到同樣獎品的彩券，那麼我們便可依照上述的界定說道：決策者對真實狀況所設定的個人概率是 $0.35$ 。然後，基於這些個人所設定的概率，便可計算每種方案的預期效用和選擇能夠提供最高預期效用的方案。雖然這種方法可以將不確定性化約爲風險性，但是它在應用時仍存著一項缺點：決策者可能不願去作必要的概率判斷；或者他的判斷也許是完全錯的。在這些情況下，這種解決方法顯然是行不通的。

● Von Neumann, and Oskar Morgenstern,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7).

在理論上，主觀途徑的運用或能排除我們在不確定性下決策作成的困擾；至少它能夠就不同的真實狀況設定種種概率，而不論它們是否「客觀地」正確或真實；而且如果決策者能夠憑著概率去規劃問題時，他即可能成功地將問題化約爲風險性的情況。不過，即使所有不確定性的決策，能否化約爲風險性的決策，在理論上被解決了，但是有關主觀概率的功用，仍然是個經驗的與實際的問題。時至今日，主觀概率的途徑尚未被充分地試驗，以爲我們達成它是否能夠實際運行的任一結論。

## 理性抉擇理論的若干意涵

從上述兩節的討論，我們可以導出幾項重要的結論。首先，在確定性和風險性下的決策，將有可能獲致一個最佳的答案，因為我們能夠瞭解所有可能的結果或者就它們設定種種的概率。然當組織目標不只一個時（亦即它處在不確定的場合中），就不可能採取這種作法。更何況二個或二個以上的目標相互衝突時，沒有一個共同理論（告訴我們將去選擇那個目標。倘若我們把所有的目標擺在一個單一的尺度上，並去比較目標(1)達成 $m$ 單位，與目標(2)損失 $n$ 單位的話，那麼我們就能夠說明到底應該採行那個目標。然而，時至今日，決策者們尚未發展出此一共同的理論。

第二項的結論是有關組織成員之間的合意問題。前面說過，在理性抉擇理論中，行為者被假定為個人所組成的單一團隊。因之成員們贊成他們所有的目標，而非部份的目標。這種說法意指的是，我們不去考慮合意達成的費用或多元行動策略的種種問題。●然而，在不確定性下決策作成理論裏，卻允許我們去思考衝突與合意的問題。例如，我們是否遵循最大化利益或是最大中取最小損失的規則，端視著我們假定對手想和我們合作或是想擊敗我們而定。因此，在運用理性抉擇原理時，我們仍有若干理由懷疑決策理論能否為這些不確定的情況尋求一個最佳的答案。●

● Pondy, Louis, *op. cit.*

● Taylor, Michael, *op. cit.*

第三點要強調的是，設定概率的主觀途徑能夠將不確定化約為風險性，以便我們在許多不可能使用客觀概率的場合裏，得以運用理性的抉擇。不過，這些概率準確程度的問題，迄今仍未被解決。顯然地，「滿意決策」理論在此問題上是有所助益的，蓋因它使決策者限制其所探討的方案組合，也就是它可以把抽樣空間縮減到有限的和可加計算的範圍之內。但是，滿意決策論仍然存在著若干曖昧之處。那些倡導最佳決策型模的學者，認為滿意決策論並無不同於他們所持的論點。此即他們從不相信最佳決策分析的目的，在於發現最好的行動方針。<sup>⑫</sup>滿意決策論只不過說明，在我們的決策型模中，應該包括研究費用的另一種方式；而且大多數的經濟學家，也都同意將蒐集訊息的費用包括在型模中。然而，滿意決策論的原理並沒有告訴決策者在什麼時候其研究工作已經足夠了。再者，當世界的情勢改變時，決策者的熱望程度 (*aspirational level*) 也會跟著改變。這些熱望程度的改變，部份是觀念性的和心理層面的，因此，我們很難把金錢價值置於這些因素之上。<sup>⑬</sup>最後，一旦決策者發現一個滿意的方案時，他便可能停下研究工作或不去考慮其他可能的方案，即使它們是非常珍貴的。也就是說這些未被考慮的選擇方案之一，可能會比滿意的方案好得多。在這種情況裏，我們實在很難體會到所謂的理性行爲。因之，有關滿意決策論的問題，我們可能依照傑克霍爾 (Richard Zeckhauser) 的看法，作了下列的結論：在不齊全的條件下，訊息取得和最佳決策作成的一般經濟理論還須發展出來；否則，最佳抉擇的概念，雖在原則上能夠加以界定，但在實務上卻是往往行不通的。<sup>⑭</sup>

<sup>⑫</sup> Raiffa, Howard, and Robert Schlaifer, *op. cit.*, p. viii.

● Zeckhauser, Richard, and Elma Schaefer, *op. cit.*, p. 92.

● *Ibid.* p. 96.

第四點的結論乃在於強調「對手」是「自然」或是「理性行為者」二者的區別。對手在「自然」的決策情境中，通常被界定為經濟學上的「需求」，或者統計假設檢定中的「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es)。我們並不確知自然將會呈現什麼情況，因此吾人運用概率理論作為克服它的一種方法。但是，我們沒有假定自然總是給與我們最壞的可能方案。事實上，統計推論的最具可能方法，乃在假定大多數典型性的價值 (typical value) 是以隨機抽樣的方式出現的。在統計上的決策理論中，自然不被考慮為一理性的和懷有策略的對手。●再者，自然也不能夠加以改變的。因之，對於真實狀況的概率設定並不決定於決策者的心智狀態，更且，它們反映著實體 (reality) 的若干客觀「事實」。●

● Menges, Gunter, "The Suitability of the General Decision Model for Operational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J.R. Lawrence (ed.), "*Operational Research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Tavistock, 1966), p. 141.

● Churchman, C. West, "*The Systems Approach*." (New York: Delacourte Press, 1968), p. 139.

博奕理論為決策作成注入了一個全新的面向，因為它涉及到對手是一位企圖以智取勝決策者的理性個人。亦即這個行為者可能是惡意的；並且迫使決策者去選擇最差勁的或最不利的策略。在博奕理論中，奕者雙方是理性的（決策者試圖去達成最大的自利是理性的；並且他的對手也想去達成他本身

的最大利益，同樣是理性的。）假若它涉及的是零和的情況，對手勢必使決策者的獲益始終保持在最小的程度裏。然在非零和的賽局中，奕者們並非經常有著直接的衝突，因此折衝和妥協對他們而言，可能是理性的。不過，在這兩種場合裏，決策者了解對手的動機和意向是重要的。進而，在不確定性的賽局裏，決策者去溝通甚至企圖去改變對手的行爲，也是重要的。當然這將大大地擴充了理性的概念。它引入了妥協要素，在政治上似乎是必要的。

在實際的政治場合中，一位參與者的能力往往決定於其他參與者的種種選擇。因之決策者不可能總是取勝於對方或者制定最佳的決策，而必須從事妥協。薛林 (Thomas, Schelling) 寫道：「將衝突視爲交易的過程，以避免我們對衝突或共同利益產生獨斷的成見，是有所裨益的」。●因爲在交易過程中，存在著一項強有力的共同利益，以達成不對雙方的價值產生極大破壞力的一項結果。如果一位行爲者堅持去達成最大的收益，但卻面臨著一位能使其獲益減至較低程度的對手時，他妥協並接受次於最佳的方案，似乎是理性的。譬如，我們假定決策者的最大收益是二十單位，若他無法得到這一結果時，便去接受僅能獲得十五單位的方案，對他而言是理性的。

● Schelling, Thomas, *op. cit.*, pp. 5-6.

決策作成的妥協型模 (the compromise model of decision making) 賦予了決策制定時大量的彈性。主要在於它認爲組織行爲就是權力鬥爭，因此其中沒有明顯的勝利者，也無絕對的成就水準，更無最後的問題答案。軍備管制 (arms control) 便是一個良好的例子。假若談判雙方破裂而引起衝

突時，決策者無法知道他的潛在敵人，可能使用何種武器系統，只好基於主觀的判斷發展一套武器系統——那就是「因應的計劃」(contingency)；但是，理性的作法則是繼續妥協、避免衝突並企圖達成限制軍備的協定。

在妥協的型模中，不存在客觀的、真實的情況（此處所謂客觀真實的情況，與決策者從決策環境中獲取相當多的訊息以建構的情況是不同的）；況且決策者可能錯誤地塑造了環境，以及誤解了對手的意向，但是當他犯下這類錯誤時，他並非經常蒙受損失。換言之，在這類型模中，決策者持著多元的目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為它們被敘述為每個人在組織中都為其自身目標，並且企圖去擴展本身權力的「團體聯盟」(coalition of group)。<sup>28</sup>再者，有時組織本身是沒有什麼目標可言。如此說來，在這些情況下要想達成理性的決策是頗成問題的。蓋因在妥協型模中的決策，是不同行為者的產出結果，而這些行為者主要是被組織裏早就樹立的常規所決定的。<sup>29</sup>更由於在型模中的行為者並不指向實質的目標，因此它不是理性的。

- Simon, Herbert A., "On the Concept of Organizational Go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9:1-22; Cohen, Michael D., James G. March and John Olsen, "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 Choic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7:5; Etzioni Amitai, *op. cit.*;

- Allison, Graham, *op. cit.*, p. 68.

我的結論是：我們能夠擴展和改進理性抉擇的理論，以便它在公共抉擇和政治的情境中更為有

用；但是它仍然留下許多有待解決的問題。再者，擴展理性型模，實際上是在排斥理性型模，尤其我們所作的若干假設，如(1)組織持著多元的目標或是毫無目標可言；(2)組織成員彼此之間缺乏合意；(3)對手也許是惡意的；(4)決策的制定大多在不確定的情況下發生的，似乎和理性抉擇理論不能相互調和。

綜上所述，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是否把本章裏所討論的理性抉擇理論的修正，視之為理性新定義的一部份（此即「有限的」理性理論），或者一個截然不同的決策理論的一部份。為了使上述的若干假設（那就是目標的多元性、不確定性等）成為理性定義的一部份，需要我們揚棄一些理性抉擇理論的基本原理，尤其是那些關於目標與合意的原理更應如此。就此而論，被修正過的理性抉擇理論，業已不再是個理性抉擇的理論。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將目標的多元性、決策情況的不確定性，以及妥協的必然性等若干觀念，視為理性行為的限制，而非理性定義的一部份；並把理論應用到型模能夠合理地接近經驗事實的有限場合裏，便有可能仍然保有著理性抉擇的假設。雖然在這種場合裏需要一個非常符合實際事件的理論型模，但是我們的選擇也許不是恰當的一個。因為極少組織行為的層面，可以絲毫不差地符合著嚴謹的和有限的理性理論。由此觀之，大多數的組織行為，似乎較合於非理性的、心理的型模，這正是賽蒙氏和其他學者長久以來企圖說服我們的論點。

這類問題的答案並非伸手可得的，然而在我們對它們作結論之前，需要去探討組織理論中一些補充的重要問題，其中頗為重要的是，關於決策作成結構的問題。

## 決策作成的結構

傳統的行政理論中，決策的正式結構，被視爲一種爲了實現制度的目標，而限制個人選擇的體系；●至於非正式的結構，則被看成一種非理性的限制，它使決策者不能理性地引導個人行爲朝向組織的目標。就最具簡單的形態而言，非正式的團體，被認爲是人類感情的具體表現；因此，它不是理性的；然而正式的組織，卻僅僅考慮到最佳任務的實現而已。

● Selznick, Philip, *op. cit.*

所謂的正式結構是指組織中的規則、條例及組織圖表裏所列舉的正式角色。諸如誰持有何種權威？他們的制裁力是什麼？組織集權程度爲何？最佳的控制幅度是那一類等等的問題。

在科學管理的衝擊下，正式結構所關注的問題，即是以一個最佳的方法去履行特定的工作，甚至包括行爲者應該配合身體動作進行操作，使得時間和努力的浪費減至最少。●至於專業化、指揮統一、控制幅度以及目標依目標、過程、服務對象與地點而分類的論點，被傳統的學者們發展成若干的原則，並且認爲它們是可透過科學方法予以印證的。然而，人羣關係運動——它肇始於一九二九年西屋電廠的浩桑研究，並隨著決策理論、角色理論及電腦革命的發展而作了改革——卻推翻了早期的「科學原則」，認爲它們只不過是格言、諺語罷了。●由於這個運動的崛起，正式的結構逐漸喪失了

重要性；相反地，非正式的團體卻被重視起來。

● Gross, Bertran, *The Managing of Organiz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Willoughby, W. L., *Principl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27); Gulick, Luther, and Lyndall Urwick, eds., *Papers i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37).

● Simon, H. A.,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op. cit. chpt. 2; Roethlisberger, F. J. and W. J. Dickson, *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巴納德 (Chester Barnard) 在其著作主管人員的功能中，將非正式組織界定為：個人與有關團體成員間彼此接觸與互動的集合體。接著又道：非正式組織並非經常與正式組織交相衝突的；它作為溝通的工具、團結的源泉與維護人格完整的手段，對正式組織而言是重要的。學者們曾對正式組織及非正式組織作過區分，並且假定法律的和憲法的敘述不足以適當地說明一個制度的體系。因為非正式組織會減弱、修正與重新安排正式體系的決策。在這一方面，政黨不僅可以視為非正式的組織；並且還能夠真成隨著環境以建構「真正決策」所在的無形政府 (an invisible government)，所以它在任何場合中將會阻礙導向目標達成的理性 (a directed rationality)。

上述關於正式組織與非正式組織的區分，在政治系統中依然存在著相同的分類，此即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的分別。的確，由於行為科學的發展，政治學家們似乎常把有關正式規則的研究工作委託

給法律學家們，而自身則僅擔負非正式的說明工作。研究告訴我們，政府內的每個機構，都被頗多的非正式規則顯示其特徵，因之不管正式規則的限制如何，它們的支配與管制，不僅是了解系統過程的關鍵；而且也是政治行為者成功之所在。讓我們考慮國會中種種獨特的和有趣的非正式規則：議員們的滾木立法 (logrolling)、參議員禮貌、恩寵、民意試探、內部俱樂部、和請願交易。此外，政治風格——不論是總統的風格或是參院議場領袖 (the Senate floor leader) 的風格——也應算是非正式決策規則的一部份。雖然總統的風格也許是獨特的，但它卻也以明顯的態度在非正式的法典上留下深遠的影響。

鑒於此類非正式的規則普及於種種的決策結構內，因而促成了近年來去設計有效正式規則的努力。當然，想去發現有效之正式規則的企圖是屬於約制性理論 (prescriptive theory) 的一部份；不過，它卻經常植基於實際決策結構的經驗說明中。再者，約制性理論的主要工作在於設計使人們的可欲目標得以最大化的種種規則。因之，這項工作不僅強調著規則的說明，而且也著重於決策制定的結構。申言之，這種努力是組織設計中的一項運作，同時也是形成理性的、決定性的系統的一個企圖，以有效地實現組織既定的偏好。<sup>33</sup> 在這一概念上，約制性理論的學者與理性性抉擇理論的學者是彼此雷同的。如此說來，在正式與非正式規則的兩種場合裏，決策規則透過設計的，以致是它們「導向一個前已界定的目標；在這一連串過程中的每個元素……接受一項功能的職位和角色。」<sup>34</sup> 這是曼寧 (Karl Mannheim) 的看法，並且它界定了正式的或功能的理性。

- Bennis, Warren,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Its Nature, Origins and Purposes." (Mass.: Addison Wesley, 1969); Galbraith, Jay, "Designing Complex Organization." (Mass.: Addison-Welsey, 1973).
- Mannheim, Karl, "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41); Weber, Max,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 M. He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在組織中爲限制理性所引起的問題，業已發展成爲實質理性的問題。縱然許多理性政策分析去探究選擇方案的種種決策規則；但是，它們卻甚少考慮目標的選擇。政治文化、意識型態、階級、地位和道德因素，侷限了目標與方案的選擇，是毫無疑問的。這種方案與目標彼此之間的關聯性，也可以在非常重要的「非決策」概念中表達出來。那些發展此一概念的學者大體認爲，終能成爲正式組織系統之一部份的組合元素，都被受惠於系統的成員們所決定的。因之，不去制定決策顯然是一種支持現狀的方法。這種不作決策的選擇，就如同採取積極政策行動的決定一般。

然而，不作決策要比限制選擇組爲多。非決策的概念是與實質理性攸關的。那些考慮非決策的人，對於實質結果和目標的達成，比對手段的運用給予更多的關注。●如此說來，他們經常所持的看法是與曼寧的論點分道揚鑣的；此即在現代的社會裏，功能理性業已取代了實質理性的道理。的確，在高度複雜和技術的情況下，決策者完成目標的能力是被減低的，這使得集權化的決策行爲有更爲增加的趨勢，從而個人角色將被減弱；而結構角色則被強化。

- ④ Lowi, Theodore, "The End of Liberalism." (New York: Norton, 1969); Bachrach, Peter, and Morton Baratz, "The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7: 947-52.

然而，僅用以處理過程的理性途徑很容易引來不合理的問題。由於目標涉及到與絕對值（absolute value）的關係。⑤ 因此它不能單就工具性的權力加以衡量。許多關於決策系統特性的爭論，事實上對目標而非對決策制定過程的爭執。但是，目標的考慮與評估，卻往往不在斟酌權力的實際問題下進行。因為，以特定的工具去遂現某種目標，經常被權力（權力不是一件毫無止境或毫無界限的東西）加以圍限。

- ⑤ Weber, Max, *op. cit.*

### 組織理論的權力

最近幾年來，組織理論學者們才開始去關注權力的概念。雖有大量的著作對於權力及其同義詞——權威、影響力和控制——作過界定，但是觀念仍嫌模糊與曖昧不清。關於這方面，本節裏僅敘述若干晚近的發展。

傳統上，組織內的權力被認為是垂直的，並且它時常涉及到上級主管對屬員們的控制。這種權力關係的看法，有時透過它被轉換為權威關係領域的方式，而忽規了權力問題之所在。「管理科學」即

是在使組織藉著個人的工作去達成組織的目標。再者，就傳統的觀點而言，權威是來自職位的，因此它僅僅涉及正式的結構；權力則導源於組織中非正式的關係，因之傳統學者們雖承認權力的存在，卻認為它是一項需加克服的障礙。如此說來，權威意指的是一種經常從上向下移動的非對稱關係 (an asymmetrical relationship)。

近幾年來，那些在層級體系中較低階層的權力和屬員們，從其主管中獲取獨立的能力，才被加以探討。例如，繁文褥節的規則往往被屬員們視為迴避主管們的恣意措施；進而用以自保的工具。●另外，權力的水平面向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也廣泛地被研究者，這包括在組織中一個團體的權力 (如售貨部門) 高於另一個團體 (如生產部門)。●布契 (Rue Bucher) 在說明醫學院中基本科學教授與臨床醫師的衝突中，發現每個團體的權力來源，端視他們的身高與正式權威而定。●杜賓 (Robert Dubin) 則認為一個團體的權力是與組織中能夠履行團體功能的其他職員人數攸關的。●湯普遜 (James Thompson) 認為權力的大小與不確定性是彼此關連的；那些必須處理較不確定情況的單位，便擁有較大的權力。●克羅茲則以為「……一個人行為的可預測性是他卑屈地位的明證。」●

- Crozier, Michel,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 Perrow, Charles, "Departmental Power and Perspective in Industrial firms" op. cit..
- Bucher, Rue, "Social Process and Power in a Medical School." op. cit..
- Dubin, Robert, op. cit..

- ① Thompson, James, *op. cit.*
- ② Crozier, Michel, *op. cit.*, p. 168.

在組織理論中，權力顯然沒有一個標準的意義。雖然關於它的整個歷史目前尚未記述下來，但是，我們卻可以發現它幾乎成爲「強制力」的同義詞。威伯寫道：權力乃指社會關係內的一個行爲者，不管遭致反抗與否，能夠貫徹其個人意志的可能性，而不論這種可能性植基於何種基礎之上。③拉斯威爾和開普勒亦云：權力是指爲了持續一項政策並防止反抗，而預期地或實際地使用嚴厲制裁的種種關係。④

- ③ Weber, Max, *op. cit.*, p. 152.
- ④ Lasswell, Harold and Abraham Kaplan, "Power and Society: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強制力不論它是否介入了武力的使用，總涉及到獎懲的控制；同時，它也涉及到意志的衝突——那就是行爲者A想去達成若干的目的卻爲行爲者B加以阻撓。⑤由於B阻礙A去遂現目標，因此A必須設法使B幫助他。此意味著A想要稍有成就的話，他應該具有強制的力量。

- ⑤ Dahl, Robert,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2:201-15, 1957. \_\_\_\_\_, "Power." In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rowell-Collier-Macmillan, 1968).

然而，在沒有強制力的使用下，A有可能使B照其囑託行事，B也有可能出於自願地幫助A，因為他認為它是一件值得去做的正確事情。但是，當B幫助A達成目標時，縱然在強制力未被使用的情況下，我們能說權力沒有介入嗎？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否則會把權力的概念侷限在極端狹隘的領域內。角色理論中若干方面的應用或能幫助我們解決這個問題。例如B在無強制力使用的情況下與A合作，便能稱為「合法的權力」。●「合法」這個字表達了「不管B是否為A所監視，B的合作行為是存在的」觀念。B以被期待的方式去行為，因為他承認它是角色合法範圍內的一部份；甚至B會自發自動地、熱心地去履行它，此乃由於他相信它是正確的行爲。在另一方面，強制力總是涉及監督的行使，因為A有意使B以特定的方式行為；如此說來，A必須監視著B以了解其是否照著指示行為，否則他就不能使用他的制裁了。

● Collins, Barry, and Berthran Raven, "Group Structure, Attractions, Coalitions, Communications, and Power." In Gardner Lindzey and Elliot Aronson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ition. (Mass.: Addison-Wesley, 1969); Apter, David, and Charles Andraim, *Contemporary Analytic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1).

強制力和合法權力之間的區別，有助於解決部份「非決策概念」所提出的問題。我們可以把實際決策和非決策之間的區別視為同義於強制力與合法權力之間的分別。實際的決策諸如法律、條例、行政規則、法庭判決等大都涉及到強制力的使用（那就是命令、指揮、威脅與制裁等），因為一旦一個

問題成爲公共活動領域內的一部份時，它總會形成反對的一方（或利益團體）及贊成的一方，而幾乎很少有完全一致的決策。況且法律、條例、行政規則等等都會導致角色定義和主要行爲者目標的改變，由於這些改變可能隱涵著地位的喪失，因之那些受影響者便會加以反對。又如在一特定的決策中，雖然若干參與者支持行爲者A採取某項行動，因爲他們相信它是正確的（涉及到合法的權力），但是還有一部份的參與者反對A並企圖阻撓他。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反對者只有透過強制力的使用才能勸導他們去幫助A。

當強制力與合法的權力彼此排斥而無重疊的領域時，它們才有可能作最佳的瞭解。照著定義看來，這種說法是相當正確的，因爲如果行爲者A能夠單獨運用合法的權力，那麼強制力的使用是不必要的。這種看法並不意指著所有的決策僅僅涉及強制力而已。若干行爲者可能支持某些決策，原因在於他們認爲它們是正確的，但是，除非存在著完全一致的立場，否則，任一決策將牽涉到若干強制力的使用。

即使強制力與合法的權力在不同的時代裏可能發生彼此消長的現象，但是認爲合法的權力在範圍上要比強制的力量更爲廣闊，似乎是有用的。由於絕大多數的決策制定行爲是合法的行爲，因之決策者在面臨著決策作成的既定前提和結構下，通常沒有很多的方案可資選擇。譬如索倫森（Ted Sorenson）便有這樣的看法，他說：「就寫下清楚的結論而言，總統幾乎不去制定決策，尤其是在外交事務上。……；限制他們選擇的基本決策，往往在以前就被制定出來了。」●的確，這種看法對組織中的每個層級而言，可說是正確的。尤有進者，雖然何種規則將被使用來制定一項決策的問題，可能成

爲強制力量的主題，但是一旦它們被決定之後，規則隨即內化 (internalized)，並有助於在大部份的決策情境中去指導行爲。上述所云只不過是以另一種方式說明角色規範是合法權力的一部份而已。由此觀之，一個人若接受了某一特定的角色之後，除非他再面臨著新的訊息，否則將不會改變行爲。●

● Sorenson, Ted, "You get to walk to work."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19, 1967.

● Simon, H.A., "*Administrative Man*," op. cit.

由上面的論述，當我們意指的是合法的權力而非強制力時，權力便能夠用來說明角色行爲。不過，這是一個廣泛的權力概念（也許因其範圍太過寬廣，以致於在織組理論中不被大量使用）。貝特斯 (F. L. Bates) 在這方面結論道：「除非自我 (ego) 所作之改變行動的某種有意控制，或決定概念，包含在權力定義之內，否則自我與改變之間的交互行爲，均將變成權力行爲，而且權力變成了支持行爲本身的隱涵同義語。」●由於這個權力的定義，幾乎包括所有的行爲，因此它並沒有太大的用途。然而，區別強制的力量與合法的權力的一個方法，是要我們去關注這項事實的，因爲它所作的區別，要比傳統對權威與權力所作的劃分似乎好得多。

● Bates, F. L., "Power Behavior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Mayer, Zald, (ed.), "*Power in Organization*," op. cit.

當權力在組織行爲中是最爲重要的變數時，目標達成就不是一個關鍵性的因素。克羅茲認爲：一

且權力介入時，個人就無法以其自身的成就，獲取物質報酬甚或地位的機會。●再者，由於組織內的每個團體是獨立自主的，因而以團隊工作的方式將不會有什麼斬獲；更因為成就績效是不被要求的，所以權力行為——對比於理性行為——並不促進組織目標的遂現。如此說來，組織的主要問題，在於每個團體能夠獲得多少的自由與自主；但是，這並不意指著它們不去考慮目標的達成。至於限制衝突及權力行為的種種規範，以及對績效的期待，需要就目標的達成作若干的限制與關注。一個組織必須隨時考慮本身的錯誤，並設法予以糾正，尤其是在一個民主制度下，公共領域內的組織為然。因為促使一個組織向其服務顧客和一般大眾負責的壓力，將可避免它一味地考慮權力的問題。總而言之，本章裏所特別強調的論點是，當權力是組織行為中一個因素時，實質理性就不可能。

● Crozier, Michel, *op. cit.*, p. 139.

印證這些假設的困難，在於目前沒有人能夠成功地衡量組織中的權力，亦即組織理論或政治學尚無法建構一個良好的概念類型以資我們運作。不過，此一類型如被發展出來，將被運用在非決策的場合中。換言之，它之能夠運用在不採取行動的場合中，原因在於不去採取行動的選擇，表現著權力運用的結果。

## 組織的集權與分權

在討論有關組織如何建構時，集權與分權經常是主要的考慮課題。倘若我們不能衡量權力的話，將如何說明組織在何時業已被分權化？有一個方法便是去探討所涉獵的決策種類。此時，概率概念就變得相當的有用。在官僚體制分權的研究中，布勞（Peter Blau）認為，主管們很可能把處理標準化的決策授與屬員們，而自身卻保留若干「風險性」的決策，藉此分散了決策作成的責任。<sup>①</sup>主管們之所以能夠採行這種作法，乃因為在風險性的決策中，他們可以指明屬員們應該遵循的程序。然而，如果說組織中大多數的決策是可以設計的話，那麼組織便有可能分權的現象，顯然是不符實情的。原因在於此類的決策，不僅其結果被準確地決定；而且屬員們僅有的少許裁量權又被限制在決定採行某種方案之上；況且，這種業已設計好的決策，大多是在確定的情況下制定的，因而屬員們在計劃執行中所犯的錯誤容易揭穿。簡言之，由於決策問題被準確地決定，因此，我們不能認為組織實際上已有若干分權的現象。

● Blau, Peter, "Decentralization in Bureaucracies." In Mayer Zeld ed., "Power in Organizations," op. cit., p. 169. cf. Thompson James, "Organization in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67).

主管們嘗試設計各種可能的決策，有時是必須的，蓋因這種作法將可大大地減輕他們監督性的工作。況且，它既能解釋功能理性（考慮過程的）取代了實質理性（考慮目標的）趨勢，並可以表明在政治現代化過程中，經過設計的決策比例，已有逐漸增加的傾向。然而，即使在現代的社會中，只有

極少組織的多數決策能夠加以設計：在公共機構的歷程上，確定或近似確定的情況，似乎是極爲罕見的現象；即使存在的話，它們的範圍可能會被嚴格地限制。●

- Landau, Martin, "Redundancy, Rationality, and the Problem of Duplication and Overlap," op. cit., p. 355.

由於涉及風險性和不確定性的決策不能夠輕易地被分權化，因而任一組織的最佳設計，端視環境中不確定性的程度而定。或謂「有機的」設計 (an organic design) 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可能是較好的；「機械的」設計 (mechanistic design) 則在確定的條件下也許是較優的。● 因爲在機械的型態中存著高度的角色專化，正式規則和強而有力的層級權威；反之，在有機的型態中，則呈現出較多的分權、低層級的屬員廣泛地參與決策作成以及彈性的角色。環境愈加不確定，執行決策就愈須大量的訊息，所以在這些條件下，有機的型態可能是最佳的設計。● 若以假設的形式提出的話，這個約制性的論點便說明了當組織衝突增加時，建設性的想法與行動也會隨之增加，而且這類增加正是在不確定的環境中所需要的。● 雖然經驗證據指出：在更爲分權化和廣泛參與決策作成的組織裏，便具有較多的創新 (innovation)。但是這並不必然是正確的，它還須視所涉及的技術而定。●

- Galbraith, Jay, op. cit.; cf. Bennis, W., op. cit.; Palumbo Dennis, "Power and Role Specificity in Organization Theory," op. cit.; Burns, Tom, and G.M. Stalker, "The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 (London: Tavistock, 1961).

- George, Alexander, *op. cit.*
- Bower, Joseph, "The Role of Conflict in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Groups," *op. cit.*
- Palumbo, Dennis, "Power and Role Specificity in Organization Theory," *op. cit.*; Hage, Jerald, and Michael Aiken, "Routine Technology,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al Goal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4, pp. 366-76.

以上這些假設尚存若干曖昧之處。在不確定的條件下，出現較大的集權現象，似乎是必然的。因為在此等環境下，需要具備充分的判斷以估計不同的真實狀況之種種概率，或對手可能採取的策略；同時，對於每種方案的收益，與尋找可能行動方針的費用二者之間價值分配的決定，也需要判斷的涉入。在這些情況裏，主管無法指明屬員應該遵循的程序，因之，他們必須對屬員們加以監視，以了解其所意欲達成的目標，是否為他們努力地實現。此點正說明了在不確定性下的決策，強制的力量可能比合法的權力運用得更多。

實質理性的需求，也會助長組織和一般社會中的集權現象。此意涵著為了能夠達成意欲的目標，需要有個指導性的結構。如果組織是在達成特定的目標，那麼屬員們就不被允許以其自身的目標取代組織的目標，而且除非在嚴格的會計程序下，否則權力也不容被分化；因為沒有方法確保屬員們將去遂現組織的目標。譬如，波第 (Louis Pondy) 發現：假若組織中的合作行為是出於完全的自願，那麼每個部門將會過份倚賴外部的控制，而不去履行原已設定的目標。● 歐斯桐 (Vincent Ostrom) 也認為：若無中央干涉的話，每家座落在共同水池旁的地主，將有抽取過量用水的動機，因而造成了

短期和長期水力資源的浪費。●這些弊端唯有透過層級權威 (the hierarchical authority) 的運用，才能加以克服。●如此說來，要是所有的權力被固定在一個答案強加於其他答案的單一出處時，最佳的答案和意欲目標的實現才有可能；否則，目標的轉換便有可能產生。相反地，當組織的權力為數位行為者均等分化時，就很難獲致一個最好的答案。如果我們即時考慮這項假設時，便會發現：在風險性和不確定性的情況下，組織愈是多元中心的，愈是不可能發現達成目標的途徑。因此，當我們的主要考慮是從諸多對抗的目標中決定那一個目標最為可欲的場合裏，有機型模似乎是最恰當的；然而，當目標是在確切的情況下；機械型模則可能較妥恰些。

● Pondy, Louis, *op. cit.*

● Ostrom, Vincent, "Policentricity." *Paper delivered befor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eeting*, 1971. p. 124.

● Arrow, Kenneth,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 Wiley, 1958); Downs, Anthony,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op. cit.*

然而，正如我們前面所說的，這些假設存著若干曖昧之處。權力在大多數的組織中呈現「J」曲線的分布型態；亦即它顯示出極少的行為者握有極多的權力；而大部份的行為者卻只有極少權力的集權化特徵。●原因也許在於組織的環境特性中，不確定性要比確定性為多的緣故。但是，在組織設計上的大部份約制性著作都表明了：有機的和分權的型模，適合於組織面臨著不確定的環境。●不過，

有機型模是否可能比集權化的政策制定體系更會達成目的，卻絲毫沒有經驗性的證據。這個問題的關鍵往往還須視重要主管的風格，以及社會價值與理念而定。

● Shapley, L. S., and Marlin Shubik, "A Method for Evalua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a Committee Syste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48, 1954, pp. 787-92.

● George, Alexander, *op. cit.*; cf. Bennis, Warren, *op. cit.*.

## 決策中的事實與價值

當問題被全盤地考慮時，大部份組織理論著作所持的論點，即是事實與價值之間的區別，大抵相當於決策作成的理性因素，與非理性因素之間的分別。就傳統的邏輯實證觀點而言，事實是可知的，並且可加經驗性印證；●而價值則不然。由於價值經常是衝突對立的，因之要量化地比較各種不同的價值誠非可能。況且決策所涉及的價值，很可能類似於「零和」的情況，使得想對價值作一理性的選擇更加困難。健康服務便是一個例子，其中表現了平等和品質兩種價值的可能衝突。申言之，為使特定的產出更趨於平等，往往就不可能同時顧慮到品質的提高。或有人相信平等應比品質重要，甚至認為為求服務在平等方面作少許的增加，應該放棄大量的服務品質。但是，這種看法並不為他人所苟同。職是之故，經驗性辨明某一個價值優於另一個價值，或者決定多少平等相當於特定數量的品質，

實在不可能。●因之，在組織理論的著作中，學者一致的立場是，價值應被看成是既定的；●原因在於科學不能處理價值，僅能處理達成它們的手段。

● Simon, H. A., "Administrative Behaviour." *op. cit.*, p. 46.

● *Ibid.*, p. 50.

● *Ibid.*, cf. Mckean, Roland, "Efficiency in Government Through System Analysis." (New York: Wiley, 1958); Hitch, Charles, J., and Roland Mckean, "The Economics of Defense in a Nuclear A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很不幸，這一推理的過程引起了許多複雜的、無法解決的理論問題。時至今日，這種推理對事實價值的分辨而言，是發生不了什麼結果的。首先，傳統論點以為事實可作經驗的印證，是頗有問題的。因為理論模型不僅決定了我們所觀察的事實，而且所謂的事實可能也僅指特定理論系絡內的事實而已；離開了理論，這些事實就變成毫無意義或不是經驗性存在。●有一部份正成長中的科學哲理，對於一個理論是否僅用相反的事實加以反證就可建構，提出質疑；再者，它亦對「事實」是否能夠獨立於理論之外，也發生疑問。●最後，經驗性方法能否或應否被運用來「證明」人類行為的規則，亦不無爭論之處。●

● Allison, Graham, *op. cit.*

● Lakatos, Imre, and Alan Musgrave,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DiRenzo, Gordon J., ed., "Concepts, Theory and Explanation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6).

● Palumbo, Dennis, "Comparative Analysis: Quasi-Methodology or New Science?" *Comparative Urban Studies*, 1973.

這些較複雜的哲學上或方法論上的問題，在本節裏不擬作更深一層的探討。底下將儘可能對於組織理論中有關事實與價值問題最有可能發展的傾向略作說明。首先，將事實——價值兩分法視為連續體是比較恰當的。一個應加注意的重要論點是：在每個決策中，事實與價值都同時的出現；雖然在若干決策中，其所涵括的價值成份，要比事實成份為多，但是事實與價值之間的區別是分析性的而非經驗性的。此即，在實際的組織中，每種決策同時存著事實與價值成份的理由。其次，經驗性的方法，可以運用來決定目標的期望程度。比如，我們可以使用抽樣和統計方法來決定健康服務、福利事業、或公平服務等措施上的缺陷。關於這一點，應該不致有太多的爭議。再者，經驗性的方法也能夠運用來協助目標的選擇。在這一方面，除非經驗性的方法涉及更多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否則將會引來更多的爭論。最後，採取經驗性方法將會涉及演繹性的推理，因此它在道德和實際問題上顯得異常的重要。「型模建構」或數理政治理論顯示了經驗理論是從大量的資料中推論而來的，所以，這一理論的形式應該和能夠推展開來。

當然，從經驗性觀察中得到的價值命題是不可能的。如上所述，關於一位貧者與一位富者所接受

的一塊錢，究竟要分別地給予多少的權數的決策，可能只在非經驗的基礎（即意識型態、道德）上才能被加以制定。譬如，我們經驗性決定各種不同的分配（如所得分配、健康服動分配、福利分配等）對支出或經濟成長產生什麼影響是有可能的；但是，關於經濟成長是否為一個可欲的目標，則將同時涵括了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如此說來，我若去選定一項「健全的」決策時，便需要具備大量的事實與道德知識，原因在於所有的決策兼有經驗成份（關於選擇特定目標可能產生什麼影響）與道德成份（關於一個目標期望的程度）；況且，這兩種成份不能經驗地區分。再者，當我們評價一項政策時，也需要具備上述兩種知識，以便我們將決策適用於問題上，宛如我們把資料應用於座標曲線上一樣。

不需打開最後價值的難題，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必不會導致目標與手段的倒置，或事實與價值的兩分化。相反地，此類的發展不僅增加了可資運用的選擇組的數目，而且也擴大了每個選擇組內的方案領域。這一知識的成長藉著提供我們更多的、適切的目標方案的方式，賦與了我們更大的選擇自由。再者，它也能透過選擇組擴展的途徑，幫助了我們目標的澄清；即使我們無法提供一個規則來說明如何選擇目標時，也是如此。最後，在決策系統內，由於事實前提的提高，也增加了選擇妥切的和滿意的答案的可能性。④

④ Landau, Martin, "The Self-Correcting Organiz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ve Review* 33, 1973, 533-

如果我們擴大理性的定義，將它看成同時包括目標探討和工具選擇的兩種內涵時，便有可能理性地與科學地從事價值的選擇。有一個業已提過的、有趣的標準，作為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那就是社會平等。●那些倡導以此作為評估組織標準的學者，總將他們的見解和對理性的攻擊聯為一體。後者的論點雖然有時聲稱為道德中立的，但是它卻傾向於提高經濟和效率的價值。就此觀點看來，雖然價值的選擇仍然爭論不已，但是由於它的必然性，因此我們將選擇較富民主色彩的價值，作為公共抉擇的主要目標。

● Rawls, John, *op. cit.*, cf. Frederickson, H. George, ed., "Symposium on Social Equity in the Public Service," *Public Administrative Review*, Jan.-Feb. 1974.

然而，由於組織目標的選擇，大多是在不確定的條件下發生的，所以目標本身就不可能完全地接近經驗事實。新問題的觸發、不被預期後果的出現和變遷的發生，在在需要我們對於到底什麼目標是所欲的，以及何種真實狀況最有可能發生的判斷，作若干的調整。就此而論，在任一事件中，如果我們拋棄事實——價值的兩分法及其伴隨而來的邏輯死結 (*logical impasse*)，而去運用各種足以合理地處理事實與價值問題的語言，似乎是有利的。但是，如同組織理論中其他的發展一樣，合理地處理價值問題，在理論上雖為可能，在實際上卻不容易。

## 結 論

理性抉擇理論不僅在假設上顯得簡單而有力，並且它也為廣闊的行為領域提供了有趣的解釋，尤其在它所起源的經濟學裏更是如地。雖然它業已成功地應用在僅涉及個別決策者的情況（如個體經濟學），以及價值是單一面向（unidimensional）或只能以金錢表達的問題上，但是這類情況並非大規模組織的特徵。●況且，(1)組織中的個人都被更多的自我利益所加以激勵；(2)成員較可能地達成滿意的而非最佳的組織目標；(3)組織目標往往不只一個；(4)目標與手段兩者同時被考慮並為之選擇；(5)設定客觀概率的困難；(6)決策反饋的模糊與錯誤，以及(7)合意達成的費用等，都是大多數組織決策面臨的主要問題，所以純粹理性抉擇理論的大部份假設，對組織行為而言，是不太適合的。

● Bower, Joseph, "The Role of Conflict in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Group,"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9, 1965.

在組織中的許多（或許是大部份）決策，無法根據嚴格界定的理性抉擇論點加以理解，因為它們的制定涉及到許多不確定的情況，況且個人並不永遠在作正確的選擇；最後，那些最合理的或最滿意的決策也非伸手可得的。如此說來，相當多的決策只能就非理性抉擇的看法作最佳的瞭解。

當我們處理公共決策時，將會面臨一項額外的難題，此即公共機關的目標往往以泛泛的、抽象的

言辭加以指陳。原因在於這些目標經常是象徵性的，藉此機關組織，可以掩飾其在實際運作中所持的多元目標。況且，此等目標總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制定的。易言之，它們的制定是與無數的和無法控制的行爲組彼此關聯著。在這類場合，由於我們無法對決策的原因與結果加以明確的認識，因此，不能課以行政官員應負的責任，因而造成了他們在不同的問題中，僅爲其自身的職位而非實際的績效負責。上述的說明，意涵著公共的決策涉及到理念的成份，與績效的成份是同樣的。

組織需要不斷的學習、適應、妥協和尋求，能使新的目標足以合法化的途徑，因爲它們的生存端賴其是否能夠在一組目標上成功地達成合意而定。職是之故，決策的制定，經常決定於權力的分配與改變。因此組織行爲以權力改變的觀點，或以有意達成目標的看法加以解釋時，不是前者優於後者，就是兩者優劣互見。顯然地，我們可以透過若干心理因素，以處理組織行爲中重要的個性與學習問題。雖在本文裏，它們不被廣泛地討論，但在表面上，它們可能較容易併入在政治型模而非理性抉擇的通則中。然而，這並不意指權力、自我實現、需要滿足的追求，以及任務的達成等彼此之間毫無關聯可言，只是目前，我們對此二者間之關聯性的了解，尙隔著一段差距而已。因此，本文裏唯一的結論是：用以解釋組織行爲的經驗現象，組織行爲的政治型模，似乎比純粹理性抉擇理論優異得多。

## 參考書目

- Ackoff, Russell (1962). *Scientific Method; Optimizing Applied Research Decisions*. New York: Wiley.
- Ackoff, Russell, and Fred E. Emery (1972). *On Purposeful Systems*. Chicago and New York: Aldine-Atherton.
- Alker, Haywood (1969). "Statistics and politics; the need for causal data analysis." In S. M. Lipset (ed.), *Politic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llison, Graham (1971). *Essence of Decis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Apter, David, and Charles Andrain (1972). *Contemporary Analytic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Argyris, Chris (1957). *Personality and Organiza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Arrow, Kenneth (1951).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the theory of choice in risk-taking situations." *Econometrica* 19.
- \_\_\_\_\_ (1958).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New York: Wiley.
- \_\_\_\_\_ (1973).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Public Policy* 21:303-19.
- Ashby, W. Ross (1956). *An Introduction to Cybernetics*.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 Eabihot, George (1966). "Basic problems in taxation and welfare theory." In Paul L. Kleinsorge, (ed.), *Public Finance and Welfare Essays in Honor of C. Ward Macy*. Eugene: University of Oregon.
- Bachrach, Peter (1967). *The Theory of Democratic Elitism*. Boston: Little, Brown.
- Bachrach, Peter, and Morton Baratz (1962). "The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7:947-52.
- Barnard, Chester (1938). *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arnes, Louis B. (1957).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field experimental methods." In Victor H. Vroom (ed.), *Methods of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Barnett, Richard (1972). *The Roots of War*. New York: Atheneum.
- Bates, F. L. (1970). "Power behavior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Mayer Zald (ed.), *Power in Organizations*.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 Bauer, Raymond, Ithiel De Sola Pool, and Lewis A. Dexter (1963). *American Business and Public Policy*. New York: Atherton.
- Bauer, Raymond, and K. J. Gergen, eds. (1968). *The Study of Policy Form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Bennis, Warren (1969).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Its Nature, Origins and Purpose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Bergson, Abram (1938). "A reformation of certain aspects of welfare econom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2:314-44.
- Blalock, Hubert, and Ann Blalock (1968). *Methodology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McGraw-Hill.
- Blau, Peter (1970). "Decentralization in bureaucracies." In Mayer Zald (ed.), *Power in Organizations*.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1972). "Interdependence and Hierarchy in Organization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1.

- Borch, Karl, and Jan Mossin (1968). *Risk and Uncertain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Bower, Joseph (1965). "The role of conflict in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group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9.
- \_\_\_\_\_ (1968). "Descriptive decision theory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viewpoint." In R. Bauer and K. J. Gergen (eds.), *The Study of Policy Form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Braybrooke, David, and Charles E. Lindbloom (1963). *A Strategy of Decis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Buchanan, James, and Robert Tollison (1972). *Theory of Public Choic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uchanan, James, and Gordon Tullock (1962). *Calculus of Consent*.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Bucher, Rue (1970). "Social process and power in a medical school." In Mayer Zald (ed.), *Power in Organizations*.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 Bucher, Rue, and H. G. Nutini (1969). *Game Theor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Burns, Tom (1966). "On the Plurality of Social Systems." In J. R. Lawrence (ed.), *Operational Research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Tavistock.
- Burns, Tom, and G. M. Stalker (1961). *The Management of Innovation*. London: Tavistock.
- Campbell, Angus, Philip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Stokes (1966). *Elections and the Political Order*. New York: Wiley.
- Carzo, Rocco, and John Yanouzas (1967). *Formal Organization: A Systems Approach*. Homewood, Ill.: Dorsey.
- Churchman, C. West (1961). *Prediction and Optimal Decision*.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_\_\_\_\_ (1968). *The Systems Approach*. New York: Delacourte Press.
- Cohen, Michael D., James G. March, and John Olsen (1972). "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oic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7:5.
- Collins, Barry, and Berthran Raven (1969). "Group structure, attractions, coalitions, communications, and power." In Garner Lindzey and Elliot Aronson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i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Coombs, C., and D. Beardslee (1954). "On decision making under uncertainty." In R. M. Thrall, C. H. Coombs, and R. L. Davis (eds.), *Decision Processes*. New York: Wiley.
- Cooper, W. W. (1951). "A proposal for extending the theory of the firm."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5:
- Crecine, John (1969). *Governmental Problem Solving*. Chicago: Rand McNally.
- Crozier, Michel (1964). *The Bureaucratic Phenomen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yert, Richard M., and K. R. MacCrimmon (1954). "Organizations." In Garner Lindzey (ed.),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Cyert, Richard M., and James March (1963).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Dahl, Robert (1957).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2:201-15.
- \_\_\_\_\_ (1968). "Power." In David L. Sills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Crowell-Collier-Macmillan.
- Diesing, Paul (1962). *Reason in Societ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DiRenzo, Gordon J., ed. (1966). *Concepts, Theory and Explanation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Downs, Anthony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_\_\_\_\_ (1967). *Inside Bureaucracy*. Boston: Little, Brown.
- Dubin, Robert (1963). "Power, function, and organization." *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6:16-24.
- Easton, David (1965).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Edwards, Ward (1953). "Probability preference in gambl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66:349-64.
- Elkin, Stephen L. (1974).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analysis of public policy." *Social Policy*.
- Ellsberg, Daniel (1961). "Risk, ambiguity, and the savage axio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75:643-69.
- Emery, James (1969). *Organizational Planning and Control Systems*. New York: Macmillan.
- Etzioni, Amitai (1964). *Modern Organization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Farquharson, Robin (1966). "The application of game theory to committee procedure." In J. R. Lawrence (ed.), *Operational Research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Tavistock.
- Frederickson, H. George, ed. (1974). "Symposium on social equity in the public service." *Public Administrative Review*, Jan.-Feb. 1974.
- Ferejohn, John A., and Morris P. Fiorina (1974). "The paradox of not voting: a decision theoretic analy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525-37.
- Foster C. D. (1966). "Social welfare functions in cost-benefit analysis." In J. R. Lawrence (ed.), *Operational Research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Tavistock.
- Galbraith, Jay (1973). *Designing Complex Organization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George, Alexander (1972). "The case for multiple advocacy in making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 751-96.
- Goldner, Fred H. (1970). "The division of labor: process and power." In Mayer Zald (ed.), *Power in Organizations*.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 Gordon, R. A. (1945). *Business Leadership in the Large Corporation*.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 Green, Philip, and Sanford Levinson, eds. (1970). *Power and Community*. New York: Knopf-Vantage Books.
- Gross, Bertram (1964). *The Managing of Organiz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Gulick, Luther, and Lyndall Urwick, eds. (1937). *Papers in the Science of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ge, Jerald, and Michael Aiken (1969). "Routine technology, social structure, and organizational goal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4:866-76.

Harsanyi, John C. (1969). "Rational choice models of political behavior vs. functionalist and conformist theories." *World Politics* 21:513-38.

Harvey, Edward, and Harvey Mills (1970). "Patterns of 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In Mayer Zald (ed.), *Power in Organizations*.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Haveman, Robert (1965). *Water Resource Investment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Hicks, J. R. (1940). "The valuation of social income." *Economica*.

Hickson, D. J., et al. (1971). "A strategic contingencies theory of inter-organizational power."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6:216-29.

Hitch, Charles J., and Roland McKean (1961). *The Economics of Defense in a Nuclear A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urwitz, Leonid (1951). *Optimality Criteria for Decision Making Under Ignorance*. Cowles Commission Discussion Paper, Statistics, No. 370.

Kolm, S. (1969). "The Optimal production of social justice." In Julius Margolis and H. Guitton (eds.), *Public Econom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Lakatos, Imre, and Alan Musgrave (1970).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andau, Martin (1961). "The concept of decision making in the fiel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Sidney Mailick and E. Van Ness (eds.), *Concepts and Issues in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_\_\_\_\_ (1969). "Redundancy, rationality, and the problem of duplication and overlap."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9:346-58.

\_\_\_\_\_ (1973). "The self-correcting organiz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3:533-42.

Lasswell, Harold, and Abraham Kaplan (1950). *Power and Society;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awrence, Paul R., and J. W. Lorsch (1967). *Organizations and environ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ikert, Rensis (1961). *New Patterns of Management*. New York: McGraw-Hill.

Lindbloom, Charles E. (1959). "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79-88.

Lipset, Seymour M. (1963). *Political Man*. New York: Doubleday.

Little, I.M.D. (1960). *A Critique of Welfare Econom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wi, Theodore (1969). *The End of Liberalism*. New York: Norton.

Luce, Duncan (1959). *Individual Choice Behavior*. New York: Wiley.

Luce, Duncan, and Howard Raiffa (1957). *Games and Decisions*. New York: Wiley.

MacCrimmon, Kenneth (1968). "Descriptive and normative implications of the decision theory postulates." In Karl Borch and Jan Mossin (eds.), *Risk and Uncertain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annheim, Karl (1941). *Man and Society in an Age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March, James (1962). "The business firm as a political coali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24:662-78.

\_\_\_\_\_, ed. (1965).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Chicago: Rand McNally.

March, James, and Herbert Simon (1958).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iley.

Marini, Frank, ed. (1971). *Toward a 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Chandler.

Marschak, T. A. (1965). "Economic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 In James March (e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Chicago: Rand McNally.

McCoy, Charles A., and John Playford, eds. (1967). *A Political Politics*. New York: Crowell.

McKean, Roland (1958). *Efficiency in Government Through Systems Analysis*. New York: Wiley.

Menges, Gunter (1966). "The suitability of the general decision model for operational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J. R. Lawrence (ed.), *Operational Research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London: Tavistock.

\_\_\_\_\_. (1968). "On some open questions in statistical decision theory." In Karl Borch and Jan Mossin (eds.), *Risk and Uncertain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Michalos, Alex. "Rationality between the maximizers and the satisficer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n.d.

Mott, Paul (1972). *The Characteristic of Effective Organization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Nedd, Albert (1971). "The simultaneous effect of several variables on attitudes toward chan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6:258-69.

Negandhi, Anant R., ed. (1973). *Modern Organizational Theory: Contextual, Environmental, and Socio-Cultural Variables*. 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Newell, Allan, J. C. Shaw, and H. A. Simon (1959). *A Variety of Intelligent Learning in a General Problem Solver*.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Corporation.

Ostrom, Vincent (1971). "Policentricity." Paper delivered befor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Meeting.

Palumbo, Dennis (1969a). "Power and role specificity in organization theo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9.

\_\_\_\_\_. (1969b). "A systems analysis of local public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59:673-79.

\_\_\_\_\_. (1969c). *Statistics in Politic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_\_\_\_\_. (1973). "Comparative analysis: quasi-methodology or new science?" *Comparative Urban Studies*.

Palumbo, Dennis, and Richard Styskal (1974). "Professionalism and receptivity to 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s*.

Perrow, Charles (1970). "Departmental power and perspective in industrial firms." In Mayer Zald (ed.), *Power in Organizations*.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_\_\_\_\_. (1972). *Complex Organizations: A Critical Essay*. Glenview, Ill.: Scott,

foreman.

Pomper, Gerald M. (1968). *Elections in America: Control and Influence in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Dodd, Mead.

Pondy, Louis (1970). "Toward a theory of internal resource allocation." In Mayer Zald (ed.) *Power in Organizations*.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Rabushka, Alan, and Kenneth A. Shepsle (1972). *Politics in Plural Societies: A Theory of Democratic Instability*. Columbus, Ohio: Merrill.

Rae, Douglas, and Michael Taylor (1971). "Decision rules and policy outcom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

Raiffa, Howard (1970). *Decision Analysis: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Choices Under Uncertainty*.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Raiffa, Howard, and Robert Schlaifer (1961). *Applied Statistical Decision 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

Rapoport, Anatol, and Albert Chammah (1965). *Prisoner's Dilemma: A Study i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Rawls, John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iker, Willeman (1962).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ivlin, Alice M. (1971). *Systematic Thinking for Social Action*.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Roethlisberger, F. J., and W. J. Dickson (1947). *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oos, Noralou P. (1974). "Influencing the health care system: policy alternatives." *Public Policy* 22: 139-67.

Rothenberg, Jerome (1961). *The Measurement of Social Welfar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1965). "Urban renewal programs." In Robert Dorfman (ed.), *Measuring Benefits of Government Investments*.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Rubenstein, Albert, and Chadwick Habersroh (1966). *Some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 Homewood, Ill.: Dorsey.

Savage, Leonard J. (1954). *The Foundations of Statistics*. New York: Wiley.

Schelling, Thomas (1960). *The Strategy Conflic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ultze, Charles L. (1968).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Public Spending*.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Seiler, John A. (1967). *Systems Analysis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Homewood, Ill.: Dorsey.

Selznick, Philip (1957). *Leadership in Administration*. Evanston, Ill.: Row, Peterson.

Sen, Amartya (1970). *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 San Francisco: Holden-Day.

Shapley, L. S., and Martin Shubik (1954). "A method for evalua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a committee system."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8:787-92.

Shephard, Herbert (1965). "Changing interpersonal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hips in organizations." In James March (e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Chicago: Rand-McNally.

Simon, Herbert (1945).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New York: Macmillan.

- \_\_\_\_\_ (1957). *Models of Man*. New York: Wiley.
- \_\_\_\_\_ (1964). "On the concept of organizational goal."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9:1-22.
- Simon, Herbert, and Richard Stedry (1969).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In Garner Lindzey and Elliot Aronson (eds.),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2nd edition.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Sorenson, Ted (1967). "You get to walk to work."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19.
- Stein, Harold, ed. (1952).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Development*. New York: Macmillan.
- Taylor, Michael (1971). "Review article: mathematical political theor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
- Thompson, James (1967). *Organizations in A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 Thompson, Victor (1969). *Bureaucracy and Innovation*.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 Verba, Sidlacy (1961).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Behavi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Von Neumann, John and Oskar Morgenstern (1947). *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allace, Anthony F. C. (1961a).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 \_\_\_\_\_ (1961b). "The psychic unity of human groups." In B. Kaplan (ed.), *Studying Personality Cross-Culturally*. Evanston, Ill.: Row, Peterson.
- Weber, Max (1947).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 M. Henderson and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isbrod, Burton (1968). "Income redistribution effects and benefit-cost analysis." In Samuel B. Chase (ed.), *Problems in Public Expenditure Analysis*,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 Wildavsky, Aaron (196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fficiency: cost-benefit analysis, systems analysis, and program budgeting." In Austin Ranney (ed.),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Markham.
- \_\_\_\_\_ (1970). "Rescuing policy analysis from PPBS." In Robert Haveman and Julius Margolis (eds.), *Public Expenditures and Policy Analysis*. Chicago: Markham.
- Willoughby, W. L. (1927). *Principl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Zald, Mayer N. (1960). "Organizations as polities: an analysis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gencies." *Social Work* 2.
- \_\_\_\_\_ (1962). "Organizational control structures in five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8:335-45.
- \_\_\_\_\_. ed. (1970). *Power in Organization*. 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 Zeckhauser, Richard, and Elma Schaefer (1968). "Public policy and normative economic theory." In Raymond Bauer and K. J. Cergen (eds.), *The Study of Policy Form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S8706/6 (中1-9/55)